

西方文化史鉴

叶胜年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希腊文化.....	1
第二章 罗马文化	39
第三章 犹太文化和《旧约全书》	69
第四章 基督教文化和《新约全书》.....	100
第五章 中古时期和日耳曼文化.....	135
第六章 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前后的文化.....	167
第七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	211
第八章 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251
第九章 18—19 世纪欧洲的社会和哲学思想	286
第十章 19—20 世纪的西方社会概况和现代主义文化 运动.....	335
十一章 二次大战后的西方哲学和神学.....	382
十二章 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绘画、建筑 and 音乐	426
十三章 二次大战后的文化潮 :电影电视和文学文化批评 ...	460
十四章 20 世纪的西方城市文化和大众文化	506
后 记.....	541
主要参考书目.....	5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化史鉴 / 叶胜年编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7-81080-374-3

I. 西... II. 叶... III. 文化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43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责任编辑: 高玲玲

印刷者: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字数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月第 1 版 2002 年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册

书 号: ISBN 7-81080-374-3/G·178

定 价: .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订)厂调换

绪 论

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西方的崛起和发展大体是从15世纪前后开始的。那时,他们的纺织和冶炼技术有了一定的进步,开始使用简单的机械装置以提高生产力,于是,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发明的火药和指南针从13世纪起传入欧洲,大大地改进了欧洲人的军事技能和航海技能,帮他们制造出火枪和庞大的海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进一步把欧洲人从封建专制和神学桎梏里解放出来,把资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从此,西方文明就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国内采用剥削和压迫的手段,进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在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里面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又通过殖民和侵略的方式对外扩展,积累财富,扩充实力,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正视西方的文明和进步究竟是如何取得的,它为什么能够在几百年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它的物质成就当中究竟有多少是以它的文化积淀的形式换取的等诸多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西方文化的渊源问题和它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也即所谓的古典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的很多东西,诸如办学制度、议事方式、公民机构、精神追求乃至对科学文化的重视都可以归结到古典主义时期的影响。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式、讲究实效的精神、对人本观念的尊崇以及喜欢研究自然的习性似乎都离不开古典主义

的熏陶。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民主议事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外,在哲学、文学、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影响都有所显现。

哲学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乃至辩证法,最早均起源于古希腊;对人类哲学思想最早进行专门研究的也是在古希腊;最先在哲学方面取得引人瞩目成就的还是古希腊。谈到希腊哲学,不能不提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可以说是留给西方人最有影响的哲学成果。西方人的理性主义,从哲学渊源上说,最早的源头也在他们身上。在社会思想方面,这两个人的独特的见解也是替西方人文科学建立丰碑。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类社会未来的模式,勾勒了奴隶社会的发展经历。他们俩是师生关系,同属于奴隶主阶级,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看法却并不一样。一个主张从奴隶主的立场来构建和统治社会;另一个则主张用较为宽容的态度、考虑多方面的利益、采用折衷的方法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这也就从一个方面告诉我们,继承和创新有时是很难完全统一的,不同的思想认识或许反而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西方有文字记载的文学、艺术也是从希腊开始的。戏剧起源于对丰收的庆祝,文学起源于对战争胜利的歌颂,神话起源于对大自然的恐惧和崇拜,绘画起源于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审美。如果说希腊文化点燃了西方文明的最初烛光,后来的罗马文化则使得烛光变得更为明亮。虽然罗马人以暴力方式消灭了雅典、斯巴达和其他希腊城邦,但它并没有完全排除希腊文化。恰恰相反,罗马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吸收和融合了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因此变得和希腊文化一样光辉灿烂。无论是哲学、史学、神话乃至文学、艺术,罗马文化都可以看成是希腊文化的延伸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文化缺少自己独特的创造,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罗

马文化和希腊文化是珠联璧合、密不可分的。在大部分领域,情况确是这样,在有些领域(例如建筑和雕刻方面)罗马人则显示了更为耀眼的才华。

虽然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文明,但是希腊文明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完全依靠它自身的力量形成的。希腊文化本身也从其他古代文化当中吸收了许多营养(例如古希腊文字就是从古埃及和伽太基的文字当中演变过来的)。古典主义文化为西方文化搭建了日后发展的框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情趣爱好、个性特征乃至民主务实的作风,应该说和古典文化的熏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如果西方文明仅仅满足于在古典文化上的停留,以后也难以取得新的进步。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吸纳,希腊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借鉴,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西方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兼收并蓄,西方文化的优势正是在于它不断地吸收一切对它有用的东西。这在西方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犹太人文化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犹太文化最早出现在中东地区。犹太人对神灵的虔诚,可谓历经多少腥风血雨的磨难而始终不悔。历史的灾难使得犹太民族多次迁移,饱经忧患,也因此而丰富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积淀。基督教的诞生与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密切相关。虽然后来基督教对犹太教反目为仇,做了不少对不起犹太人的事,但它成立伊始,却是作为一种秘密组织和罗马人进行斗争而发展、壮大起来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基督教逐渐成为罗马统治阶级以及后来的其他统治者控制西方人思想的工具。此后,西方文化便由古典文化和犹太—基督文化一道组合,完成了一种文化的融合和新生,对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范围,超脱了政治和其他世俗社会的各种存在,遍及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历经千年风雨而不衰。

从地缘历史的角度看,犹太文化并非是西方文化,因为犹太文

化早期起源和发展的地区是在中东 ;从二千年前的情况看 ,它离开西方文化的中心——欧洲地区还相当遥远。可是有两个重要因素使得犹太文化融进了西方文化 ,使之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其一是犹太人的迁移 ,其二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接纳。第一个因素使得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有了互相接近和了解的机会 ;第二个因素使得犹太文化冠冕堂皇地登上了西方文化的大殿。虽然犹太人在欧洲各国之间颠沛流离 ,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虽然基督教会对犹太人的常常是恶语相加、冷箭不断 ,但是犹太人的文化精华和道义力量早就通过《旧约全书》和其他途径加入到西方文化的行列 ,成为西方人文学艺术的重要源泉之一。无可否认 ,部分西方人对待犹太文化不像他们对待希腊罗马文化那样理直气壮 ,亲切自然。这是因为犹太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所形成的无家可归、倍受折磨的形象造成了一种误会 ,似乎这样的民族 ,其文化非常卑微 ,不配作他们的先行者。然而 ,犹太人的先知比起西方人的狭隘民族心理来要高明得多。想当年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力排众议 ,果断解除对基督教的禁令 ,并决定亲自受洗而加入基督教 ,使得基督教几经磨难后终于成为罗马国教。当时 ,基督教气势和影响力十分有限 ,其成员几乎都是一群聚众闹事的山村野民。可是这支在犹太文化滋养下发展壮大起来的队伍 ,在君士坦丁看来具有巨大的潜在亲和力 ,是罗马帝国可以依靠的精神力量。于是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改往日的镇压方针 ,而采取了积极的拉拢、收买、为我所用的怀柔政策 ,成功地把基督教改造成了为罗马帝国服务的宗教。这样做需要相当大的胸怀和魄力。这里 ,君士坦丁个人因素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见了西方文化重要特点的一种显现——西方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博大和宽容 ,在于它能够容纳和融解不同派别、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异国文化。这是后来西方许多国家实行多元文化的重要前提和思想基础。

基督教虽说是从犹太文化发展而来,但基督教却又完全不同于犹太教。基督教发展到后来之所以成为罗马帝国上下认同的国教,除了前面提到的个别人的因素之外,还主要在于它突破了以往犹太教的一些狭隘教规限制,允许并鼓励不同种族、性别、阶级、出身和文化程度的人参加,从而大大扩大了教徒队伍,为一个波澜壮阔的传教运动奠定了基础。它从客观上限制了上层统治阶级的作威作福、腐化堕落的倾向,在精神上给了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的贫民百姓一些安慰。应该说,早期的基督教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曾经起到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教皇的设立、教会等级制度的完善,基督教内部的腐败和保守倾向日趋严重,它逐渐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的统治阶级工具。教会上层分子经常和封建王朝或其他统治集团相互勾结,致力于控制乃至禁锢人们的思想,反对和阻碍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发展。这种情况到了中世纪变得更加严重。一些神学家试图把对神学的阐释同古典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结合起来,以便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建立了所谓的经院哲学。但他们的陈词滥调和教会的腐败一起,终于让神学界的有识之士和普通的教民及百姓忍无可忍,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促使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脱离了天主教,创立了新教。加上以前东正教的分裂,基督教终于一分为三。然而尽管有这些分裂,基督教还是保持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两千年的历史长河,多少帝国土崩瓦解,多少朝代改换门庭,基督教仍然保持着它的地位,仍然对它的众多教民和普通的西方人施加精神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有强有弱,也尽管人们对它的态度不尽相同,它的精神却如同湿物春雨,已经撒落在西方国土的大街小巷、田野森林,体现在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融进了许许多多普通西方人的血液里。

日耳曼人的入侵改变和重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也给西方文化带来了无穷的莫名灾难。他们的无知和野蛮一时间曾经使欧洲

的历史进程倒退了几百年,以古典和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不得不听任日耳曼人的冷落和破坏。漫长的中世纪黑暗年代充满着各种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刀光剑影的攻城掠地战争和蛊惑人心的宗教迷信几乎无处不在。

中世纪的黑暗是蛮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恶果,也是基督教成为控制西方人心灵的思想工具后带来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在世俗社会,还是在精神殿堂,西方人都仿佛被这只无形的手牢牢地抓住,无法摆脱它的统治和束缚,从而失去了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行动和言论自由。这种自由曾经使得他们的祖先生活和工作在一种生动活泼、民主和谐的氛围里,创建了古典主义时期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战争和阴谋是这种黑暗的最明显标志。基督教神权上层集团和世俗统治阶级的贪婪、虚荣和权欲,为他们的一次次屠杀、一次次掠夺和一次次阴谋作了最好的注释,也为普通百姓的不幸遭遇,为他们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提供了最好的说明。

但丁在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用他的《神曲》喊出“人生来不是为了像野兽般地生活,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表达了当时西方人对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的憎恶,也表达了人文主义者对新生活的憧憬。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使得西方文化经历了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在争取人性解放和人的权利的过程中,其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向我们揭示了这么一条真谛:人类一旦摆脱了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羁绊,就会显现出巨大的创造才华。无论是绘画、雕刻、戏剧,还是诗歌和叙事文学,无论是建筑还是其他的科学技术,都在这一时期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画卷。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提香、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乔叟、莎士比亚、拉伯雷、塞万提斯、蒙田、莫尔、马基雅弗利、布鲁诺、弗朗西斯·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为人类的文化和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

贡献,也把人类文明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艺复兴的意义首先在于人文主义的张扬。经过一千多年的昏睡以后,西方人终于发现原来他们身上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他们的形体,他们的声音,还有他们的智慧,都被长期的禁锢所埋没了。在这些与生俱来的品质和特性得到释放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他们可以创造出难以想像的文学与艺术成就,他们的才华完全可以和一千多年前的希腊和罗马时期的文艺巨人相提并论,他们应该以希腊罗马文化为榜样,重新振兴和构建人类思想文化的灿烂篇章。于是他们提出了“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运转。

文艺复兴的意义还在于它敢于向封建文化和神权思想挑战。作为文艺复兴发祥地的意大利在中世纪后期还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除了个别的城市共和国(如佛罗伦萨)外,大多数诸侯小国还处在教皇的统治和封建专制的奴役下。其他欧洲国家也大同小异,离不开封建专制和教会的双重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的生活苦不堪言:物质上的贫困使得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精神上的压抑使得他们失去了许多乐趣。他们整日里郁郁寡欢、萎靡不振,并对当时统治者产生了不满和反抗。这些不满和反抗除了部分诉诸公开批评乃至武力发泄之外,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嘲弄和讽刺的形式进行的,讽刺文学和讽刺文体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愚蠢的统治者,当权的朝臣,市井无赖,放荡女人,都是他们的嘲弄对象。这种文学的代表人物有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故事,都对当时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和教会神权的腐败昏暗进行了鞭挞,吹响了进攻的号角,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发展鸣锣开道。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对神学的批判和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经院哲学的。由于经院哲学在整个神学的发展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批判与否定也就有力地动摇了神学和教会势

力的社会影响,从而为科学和世俗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典型事例是意大利大学教育的发展。先前只有宗教法、民法和医学三个学科的意大利大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先后增添了修辞学、哲学和天算学等以讲授希腊、罗马这些古典学识为内容的新学科。这些新学科都是非基督教的,它们的出现挤掉了神学在大学教育中的举足轻重位置。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用本国语言取代传统的拉丁语进行写作,从而为学术思想和经典文化的大众化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是对神权思想和封建专制的一种反抗,更是对古典文化的一种肯定和张扬。如果说古希腊罗马曾经在西方文化的灿烂辉煌里起到过火种作用的话,那么当初的火光经过一千余年的风雨吹打,已经黯淡下来,快要熄灭了。对古典主义文化的重估和重建,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对古典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挖掘和再现,而是通过了解他们的作品和思想,提倡和发扬一种精神。具体说来就是强调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世俗思想,其中包括享乐主义、自由意志和怀疑主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是针对中世纪以神学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主义而言的。享乐主义针对禁欲主义,自由意志针对专制主义,而怀疑主义则显然是针对信仰至上的神学主张而提出来的。

严格地说,文艺复兴并非一个运动,而是一个时期的延续。更确切地说,是中世纪封建社会后期的泛指,泛指人的思想观念及社会意识形态处在一种转型期。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和他们的作品,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中世纪的文化观念,然而却不能说文艺复兴已经完成了反对神学和封建主义思想的任务。恰恰相反,文艺复兴只是开始了一个反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是漫长的,其高潮直到18世纪才形成。它便是启蒙主义运动。

西方文化通过文艺复兴,通过仿照古典文化的精粹,进入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世界文明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起点。然而不要忘记中世纪的黑暗并没有因为一次文艺复兴而消失,封建神权文化的禁锢和窒息通常需要政治上的革命和思想上的解放来完全消除。当科学家们无法将自己的科学发现公布于世的时候,当宗教信仰成为通向真理的障碍时,当资产阶级无法依靠政府扩大生产、增加盈利时,西方人的先进分子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揭露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所造成的弊病,进一步唤醒人们的觉悟和良知,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准,启蒙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启蒙运动既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先进思想和社会进步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的思想准备。文艺复兴揭开了中世纪的神秘面纱,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思想,弘扬了人文主义精神,开始了人的思想解放进程,在文学和艺术上面创造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当时人们才从封建主义和神学的束缚下摆脱出来,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和推翻封建和宗教的东西,他们与这些旧东西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随着经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不仅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在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当中,而且由于经济上的富有而进一步滋发了攫取政治权力的愿望。和这一趋势相对应,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国家学说和社会思想理论,为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思想基础。

就思想内容而言,应当说启蒙运动思想家远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全面、深刻和彻底得多。在对社会的认识、国家制度的观念、法律的论述乃至普通人的参与这样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向传统的封建和神学观念发起了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成建构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这方面无论是作为启蒙运动先驱者的洛克和霍布斯所阐述的社会平等思想,还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

人物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和三权分立学说都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不是第一个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思想家,但他们是首批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家性质和建立权力制约学说的人。他们的思想理论为以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将它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奠基石恐怕也并无不妥。此外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则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从而推动了法国和欧洲各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启蒙运动的纵深发展也有很大帮助。

启蒙运动的高潮在法国,其中几位主要思想家都是法国人,或者他们和法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为什么会成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呢?这恐怕与当时法国的社会背景分不开。从路易十四开始的法国封建统治者给法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内横征暴敛,对外连年战争。法国人民因此而怨声载道,成了最具反抗精神的民族,从而在法国形成了一种为传播反封建、反神学的思想的合适的社会环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进行反抗斗争的战斗口号是由启蒙运动里面传出来的。它象征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封建贵族和教会等级制度的革命精神,从而成为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人类共同财富,世世代代相传,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创造的宝贵精神产品。

如果说启蒙运动还只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增加了普通平民的社会平等、信仰自由和以人为本的意识的话,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则将这种意识付诸于行动,把新兴的资产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和文化秩序,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对人类历史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标志着资产阶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者,也是政治上的领导者。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人类首次从理性的角度,用理论的方式来勾勒未来社会的政治蓝图,来指导自己今后的行为。在处理国家问题上,人类变得更为

理智,更有创造力,并尝试以新的途径来实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

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对西方文明的进步有着重要的开拓意义。从此以后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西方各国内部的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文化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西方的军舰和军队在世界各地到处耀武扬威,殖民主义者开始不断扩充他们的版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着。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更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各国的生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伴随着他们探险家的环球旅行和军事征服,通过商船运抵世界的各个角落,到达了包括古老的中国在内的一些历史悠久,但在沉重的封建或奴隶枷锁下经济文化发展缓慢的国家。宣传西方文化的传教士们也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他们的教堂和传教点,传播着基督教文明的思想种子,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军事上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物质上的空前发展和进步,也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之而来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将西方人的文化影响送向四面八方,一直延续到当代。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二三百年来,一大批西方的文化精英和思想家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开始思考和探讨人类的未来,涉及社会、哲学、经济、心理、艺术、生物和科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包括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李嘉图、傅立叶、圣西门、欧文、边沁、约·穆尔、威·詹姆斯、马克思、恩格斯、达尔文、叔本华、弗洛伊德、本格森、尼采、爱因斯坦、海德加尔、萨特等人。他们的理论和学说对于社会发展,增加人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丰富和发展了西方文化的内涵。综上所述,西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发展创造出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如殖民侵略和世界大战。战争铸就了西方人的一些主要特性,如勇敢、坚毅、富于冒险

精神、开放和讲究实际等。这些特性在 20 世纪,尤其是在二次大战之后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二次大战之后,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战后到 70 年代。第二阶段则从 70 年代到当代。第一阶段主要是战前的一些重要思潮继续得到了发展,诸如存在主义和其他一些现代派流派进一步展现了它们的内涵。以存在主义为中心的西方哲学在围绕人的生存方式和意义方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的成果是存在主义在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扩大,使得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带上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这个思潮和当时西方世界所蔓延的反战情绪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大大动摇了人们的信念,加深了西方人的危机感。70 年代开始,越南战争的结束,西方国家由于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而迎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这也是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里,西方人文科学呈现出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既有主张争取女性更多权力的女权主义思潮,也有声称用东方主义视角审视非西方世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更有热点不断、到处渗透的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此外还出现了风头正健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物质主义等理论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福考、德里达、哈波莫斯和赛伊德等人。虽然多元化思想的发展有时会让人无所适从,但却教会人们独立思考,不盲从。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和资本,还是文化思想和知识,都在不停地流动和变化。这种流动和变化的中心目前虽然还在西方,但和一个世纪之前相比较,情况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奋起直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然而我们还是要承认西方国家目前仍有一定的优势。西

方社会不但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地方,科技成果最多的地方,也是生活比较丰富多彩的地方。他们除了在人文科学方面拥有一批一流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以外,其日常文化生活也是五彩缤纷的,值得我们的关注。西方人的生活展示了西方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两个层面,既有高投入、高科技和高收入所带来的高档次物质享受,也有经过长期发展、融合和积淀的传统文化蕴含。这些内容在他们的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旅游和其他文化生活中已一展无遗。我们有必要了解西方人的现代生活,也有必要了解西方社会的发展经历,例如西方城市的变迁。我们有必要了解西方人的一日三餐、衣食住行,也有必要了解他们的闲暇生活、精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花费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一下西方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其他精神、物质生活层面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绘画、音乐、电影、电视以及其他文化领域发展都很快。文学方面,相当大的一部分文学奖,例如诺贝尔奖都到了他们的手里。叶芝、艾略特、庞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劳伦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纪德、贝克特、加缪、萨特、贝娄等一些文学大师的名字早就为人们所耳熟能详。除了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以外,文学理论似乎也是西方人独领风骚。从现代派开始,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理论的源头都来自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精神分析、神话—原型批评、阐释学、现象学、读者反应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物质主义这些理论就像是走马灯似的,每隔几年就轮换一个,你方下场我登场,好不热闹。

绘画方面,西方也是人才辈出,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康定斯基、卢梭、蒙德里安、夏加尔、基里科、恩斯特、米罗、达利、穆尔、波洛克和劳申堡等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应有尽有。经典音乐中的大家包括奥地利的阿诺尔德·勋伯格、俄国的伊戈尔·F·斯特拉文

斯基、匈牙利的贝拉·巴托克和英国的拉尔夫·沃恩·威廉斯,而在通俗音乐方面则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格劳莉亚·盖纳、道娜·塞姆、迈克尔·杰克逊、鲁西阿诺·帕瓦洛蒂、埃尔维斯·普赖斯莱、麦当娜等著名歌手以及甲壳虫演唱组、比基斯演唱组、阿巴演唱组、契克演唱组等蜚声世界的演唱组织。

电影自从 19 世纪爱迪生发明问世以后没有多少时间便成为西方文化娱乐的主要形式,深受西方人的欢迎,不仅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影片,也培养了许多影视导演和明星。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要数美国的好莱坞。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制作中心,拥有八个电影制片公司,而且还以拍出的影片风格迥异、领导世界潮流而著称。每年世界上拍出的影片成千上万计,并通过各种电影节评出优秀电影。世界的电影节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的奥斯卡,法国的嘎纳,德国的柏林,日本的东京,埃及的开罗,可以看出大部分也都集中在西方。其他的,诸如电视、运动等娱乐休闲活动本书都有所介绍,这里就不涉及了。

大幕已经拉起,布景也已配上,演出即将开始,但愿表演还能如意。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能够展现出西方文化的五千年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演出”的观赏,我们能够有所感悟,有所借鉴,有所裨益,以推动我们民族的一次复兴。

第一章 希腊文化

西方文明最早的源头来自希腊 ,其形成大约在 5 000 年以前 ,其诞生地在希腊及其邻近的岛屿。这个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和小亚西亚的西部海岸地带。

这一带的地形海陆交错 ,山峦起伏 ,和海洋紧密相连。希腊半岛三面环海 ,具有世界上最曲折的海岸线 ,但又与隔海相望的陆地相距不远 ,几乎没有一处距海超过 50 公里以上。爱琴海的岛屿星罗棋布 ,总数超过 480 个。

希腊地区又多山 ,其主要山脉包括半岛西北部的品都斯山 ,东北部的奥林普斯山 ,中部的巴那撒斯山 ,南部的太吉斯山等。由于多山 ,陆地被隔成许多小块地区 ,彼此闭塞 ,可耕地很少 ,与小亚西亚和爱琴海诸岛的地形情况相似。

希腊气候较欧洲内陆温暖 ,但夏天少雨 ,农业因此不够发达。粮食在雅典等大城邦也不能自给 ,需从黑海沿岸和埃及进口。但希腊具有较好的航海条件 ,并出产大理石、白银、陶土等矿物 ,可为建筑、制陶及冶金等行业提供原料。它的造船和贸易都很发达 ,很早就和四周地区有商业交往。这些地理位置和基本情况都为希腊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条件。

一、希腊社会和文化的早期发展

希腊民族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逐步形成。它的早期文化可以追溯到 4 000 多年前的克里特文化以及稍后的迈锡尼文化。

爱琴海南部最大的岛屿就是克里特岛(Crete)。该岛东西长约 250 公里 ,南北较狭窄 ,只有 12—60 公里。这里多树木、气候滋润 ,宜于农业发展 ,海上交通也很方便。

自从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发掘荷马时代遗址获得成果以后 ,克里特文化的历史意义逐渐为历史学家和世人所认识。对克里特的考察任务主要是由英国人伊文思(Sir Arthur John Evans)完成的。从 1900 年开始 ,他经过多次考古发掘 ,发现了位于岛北克诺萨斯(Cnossos)的米诺斯王宫遗址 ,获取了大量文物 ,包括使用象形文字的文物和两种线形文字的泥版文书。根据伊文思的划分 ,克里特的文化可分为三个时期 ,即早期、中期和后期的米诺斯(Minos)文化。

早期米诺斯文化属金石并用时代 ,约从公元前 2600 到 2000 年 ,是克里特原始社会逐渐瓦解的时期。这时候他们的文化才从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 ,类似于小亚西亚和塞浦路斯的新石器文化 ,因此 ,其居民可能是从那边迁移过来的。中期和后期米诺斯文化属于青铜器时期。中期出现了阶级 ,建立了国家 ,并走上了统一和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约为公元前 2000—1600 年。考古中有大小不同的城廓宫室发现 ,证明克里特人生活在一个君主制国家里。后期是克里特的统治者米诺斯王朝由繁荣走向衰亡的时期 ,约公元前 1600—1125 年。

大约在公元前 17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 ,克诺萨斯的米诺斯王朝统一了克里特全岛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 ,工业已有了相当的水平 ,可以制造出金银工艺品和陶器 ,也可以造出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克里特文化最高成就的米诺斯王宫。设在克诺萨斯的米诺斯王宫依山而建 ,千门万户 ,曲折通达。宝殿寝宫、神宫长廊、门厅偏殿排列有序 ,主次分明。宫内宫外还有大量壁画 ,画上既有隆重热烈的庆典游行 ,也有国王贵族的活动和自然景物。这些画都具有强烈的写实主义倾向 ,有一定的艺术风格。

约在公元前 1400 年左右克诺萨斯王宫突然遭到破坏,稍后,克里特和其他地方也遭到相同的命运。造成破坏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到了公元前 12 世纪,希腊的多利亚人(Dorians)入侵,占领了这个岛国。从此以后克里特文化就消失了。

克里特人迄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线形文字。最早的一种线形音节文字,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被用来写在泥板、家用陶器、皮革和棕榈树叶上面,学者们称它为线形文字 A,以区别后来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的线形文字 B。学者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这些文字的涵义,只是认为线形文字 A 表达的内容都和经济报表有关。1952 年英国学者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es)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多方探究,认出线形文字 B 的一些音节和词组,并与柴德威克合作,确定它是希腊人的语言。^①此外,克里特人还有数字符号,知道十进位制,能够进行精密的计算,

迈锡尼(Mycenae)文化和克里特文化密切相关,迈锡尼人也就是希腊人中的一支阿卡亚人(Achaean),其遗址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部,发现较早。最早的发掘是由德国历史学家施里曼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进行的。创造迈锡尼文化的阿卡亚人约于公元前 1600 年前后进入希腊中部和南部。在迈锡尼国家形成过程当中,克里特的影响起着重大的作用,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克里特的影响。但在园顶墓王朝时期迈锡尼的实力已经超过克里特,输往埃及的货物也已比克里特多。公元前 1450—1400 年期间,克里特的克诺萨斯王宫为使用迈锡尼文字的希腊人所占,这可能是迈锡尼竞争胜利的一种反映。

迈锡尼社会是奴隶社会,在工农业生产上和建筑工地上均使用奴隶,在已发现的资料上有奴隶清单的记载。拥有奴隶的主要是上层统治阶级,国王和寺院是最大的奴隶主。他们可根据等级

^① 参见《欧洲文化的起源》45—48 页,兹拉特科夫斯卡雅,三联书店,1984 年。

不同而拥有数量不同的私田。

在迈锡尼文明的末期,即约公元前12世纪的初期发生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当时迈锡尼诸国组成联军,渡海远征小亚西亚的富裕城邦特洛伊。经过十年苦战,特洛伊被攻陷,但迈锡尼也遭受巨大损失。不久后由于多利亚人的入侵,迈锡尼也灭亡了。这次战争出现了留传到今天的两部史诗——《奥德赛》(*Odyssey*)和《伊利亚特》(*Iliad*)。它们传说为盲诗人荷马(Homer)所作,实际上为集体创作,先是口头吟唱,到公元前6世纪才被定稿。因此从它最早出现的公元前11世纪到9世纪被称之为荷马时代。

二、希腊的城邦国家和社会兴衰

随着迈锡尼的消亡,住在希腊西北部的多利亚人大量迁移到希腊各地,铁器逐步代替了青铜器成为较普遍的生产工具。生产也随之得到发展,社会逐步发生了阶级分化,城邦国家也一个个出现,其中有底比斯、拉尔斐、米利都、雅典、斯巴达、阿果斯等。城邦的特点是它的小国寡民。每一城邦均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有乡镇。全希腊共有数以百计的城邦。这些城邦最先进的是爱奥尼亚城邦和少数多利亚城邦,但以后雅典和斯巴达发展最快,成为最大的城邦。

刚建立的城邦政权往往由贵族奴隶主阶级操纵,军事首领此时成为国王,但却没有实际权力。大多数城邦通过长老会议来削弱国王权力,以建立贵族的专政。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邦往往以“僭主政治”代替贵族统治。僭主就是通过政变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他们大多出身于贵族,但能够维护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倾向自由民群众。僭主统治一般都不长久,很快为工商奴隶主寡头政治或奴隶主民主政治所代替。历史上有名的僭主有四位,即德拉科(Dracon)、梭伦(Solon)、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和克利斯梯尼(Cleisthenes)。

当时的雅典,一方面是氏族贵族对农民、奴隶及平民进行压迫,另一方面则是平民反贵族的斗争。后者终于导致了基伦暴动,给了贵族统治以打击。在德拉科领导下雅典城邦制定了有名的《德拉科法典》,它纠正了雅典以前在法律上的混乱状态,统一了法律,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但仍然有不少弊病,特别是在农业和商务上仍然维护私有财产和贵族利益,仍保留了用奴隶还债的习惯。同时有些规定由于过于严格而难以执行。公元前594年在另一位僭主梭伦的领导下,雅典城邦对《德拉科法典》作了纠正。梭伦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了解工商业奴隶主和下层人民的疾苦。他的政策包括取消一切土地抵押,废除奴隶抵债法,缓和了社会矛盾。然后,他实行公民陪审团审判制,限制了贵族权力。再之,他推行了货币改革,承认私有财产继承的自由,消除所有制关系上的氏族残余。在政治方面,梭伦规定按财产资格把全体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和第二个等级的公民可担任最高执政官,第三等级的公民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则不能担任任何官职。此外,他还恢复了公民会议和四百人会议。公民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决定战争与媾和等大事,并进行选举。四百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会议,由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参加,一、二、三等级的人均可当选,其职能为负责准备和审理公民会议的提案,代替了部分贵族会议的职权。

梭伦对改革尽管热情很高,立法不少,但由于条文太多、刑法太重、完全实施绝无可能,所以平民群众的要求没能得到满足,工商业奴隶主和农民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公元前560年,贵族出身的庇西特拉图依靠山地派的支持当上了僭主,开始了进一步的改革。他对山区贫民发放贷款,鼓励农民经营对工商业有利的橄榄和葡萄种植。他还设立巡回法庭,帮助农民处理纠纷,减少乃至免除了部分农民身上的赋税,得到了农民和工商业主的拥护。在他统治期间建造了许多公共建筑,同时还出资支持戏剧演出、诗歌写

作和朗诵。荷马史诗据说就是在他影响下编成的。另外他还组织了雅典娜女神节和酒神节庆典,使雅典成为希腊文化的重要中心。

在他之后的克利斯梯尼对他的改革又做了完善。他取消了雅典原有的四个部落,代之以十个选区,创建了议会,由每个选区各出 50 人组成。其职能除为公民准备议案外,还执行会议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担当政府的职能。他还建立了十将军委员会,制定了贝壳放逐法。前者为十选区轮流派人担任军队领导,后者为用贝壳或陶片投票决定放逐人选。恩格斯指出,克利斯梯尼时期,氏族制度残余已完全扫除,它是雅典国家形成的最后阶段。

雅典的国家机构由两个立法机构和一个负责司法、行政、军事和总监的执行机构组成。议会由 4300 名军民组成,从理论上说每次开会都应参加。但由于交通不便,每周一次的会议实际上只有 2000—3000 人参加。一系列的法案和议案主要由 500 人的执行班子负责,这些人的任期为一年。执行班子除有咨询功能外,还负有重要的行政权,以控制国家的金融、公共工程、宗教仪式和其他城市项目。这个班子由十个行政官轮流执政,掌管日常事务。除了议会之外,另一个立法机构是雅典最高会议。这是个半荣誉性的组织,由执政期间政绩卓著的人员组成。它主要担当法庭的职责,负责审理谋杀、殴打、纵火和放毒案件。在伯利克理斯时代,这个组织变成了一个监督机构,行使检查地方官员和教师行为的职责,必要时还可以行使仲裁权。

尽管这种制度高度民主,几乎不可能出现立法人员的贿赂行为,但它动摇不定,难以产生强有力的个人或集体领导。不久,国家的大权落到了十将军委员会的手里。该委员会也由公众选举产生,可连选连任,其中的首席将军也就成为实权人物。著名的伯利克理斯(Pericles)当了十多年的首席将军,在他的领导下雅典成了一个民主君主国。

雅典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谷物不能满足需要,必须进口。它

的手工业品,尤其是铁器陶器则有利可图,但很少成批生产。雅典致富主要依靠造船业。它对雅典成为海上大国和重要的金融中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银行业高度发展,所发行的硬币成为地中海一带商品交换的标准媒介。

在特洛伊战争到克利斯梯尼统治的 700 年时间里,希腊城邦主要忙于自身的发展,但在公元前 5 世纪初,希腊发现自己正面临邻国波斯王朝的威胁。公元前 490 年波斯国王大留士派兵十万攻打雅典,遭到雅典人的重创。后来,大留士的儿子泽士尔又组织了第二次远征,但在主要由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组成的希腊大军攻击下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以后波斯帝国一蹶不起,而希腊则步入了黄金时代。这个时期不长,却是希腊文明的顶峰。这一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是伯利克利斯。

希腊和雅典的繁荣期在战胜了波斯入侵者后又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波斯战争后建立的提洛联盟没有得到斯巴达和其他伯罗奔尼撒国家的认同和参与。与此同时,提洛联盟内的一些小城邦对雅典的统治也表示了不满,这就为以后希腊诸城邦之间的矛盾埋下了隐患。波斯战争后,雅典在伯利克利斯的领导下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伯利克利斯是克利斯梯尼的侄外孙,他以不同凡响的辩才和能力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统治雅典达 14 年之久,后死于一场鼠疫。雅典在他的领导下不仅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扩大了对外贸易,积累了财富,同时也加强了民主政治的功能,让大多数雅典人都能享受到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的好处。除了兴建公共建筑外,他还积极倡导体育、戏剧活动,举办文化沙龙,甚至还发放娱乐津贴。他身体力行,亲身参加并推动了这些活动。但他的对外政策却并不十分成功,他对斯巴达及其盟友采取了“大棒”和海上封锁政策,虽然后来与之签订了《30 年和约》,但仍无法避免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 459 年延续到 404 年,以雅典城被斯巴达人攻破而结束。

这场历史上称作伯罗奔尼撒的战争不仅意味着雅典的失败,也标志着希腊文明解体的开始。斯巴达虽获得了胜利,担当起领导希腊世界的责任,但它落后和保守的生活方式却让它难以胜任其职。不久其他城邦就向它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引发了城邦间长期的不和,大大削弱了希腊内部的团结,从而加速了希腊世界的衰亡。从公元前346年左右起,希腊诸城邦就不断受到马其顿、高卢和罗马人的威胁。到了公元前146年,整个爱琴海地区都被训练有素的罗马军队所征服,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在希腊诸城邦因内部矛盾闹得不可开交的同时,它的北部邻国马其顿在国王腓力二世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它通过“科林斯会议”迫使希腊大部分城邦称臣。以后腓力二世之子亚历山大即位,率领包括希腊人在内的马其顿军队向东扩张,沿途得以传播希腊文化,史称“希腊化”。从此,希腊文化不再局限于本土,而是走向了世界,奠定了它在世界文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其影响远远超过一般民族文化。

三、希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希腊文字起源于对腓尼基字母的学习和创造。文字的创立,为以后文学和其他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希腊文明如从克里特文化算起,前后持续有2000余年,在此期间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财富,其主要成就概括起来大致有这么四个方面,即希腊诗歌,希腊神话,希腊哲学和希腊戏剧。

1. 希腊诗歌

希腊文化早期的主要成就是荷马史诗。史诗的语言简练、结构严密,是古希腊人口头文学在长期发展中的优秀成果。它包括《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得赛》(*Odyssey*)两部著作,据说是盲诗人荷马(Homer)所作,但实际上是在很长时间里由几代人口头相

传、集体创作所完成的。经过 19 世纪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的考察,诗中所反映的特洛伊战争被证明是确有其事的。

《伊利亚特》现今传世的版本是公元前 3 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修订后留传下来的,叙述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诗中的主要人物是阿喀琉斯。据说他的父母举行婚礼时没有邀请不和女神厄里斯,引起了她的不满。于是她来到酒席上扔下了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写“赠给最美的女士”,结果造成赫拉、雅典娜和阿弗洛狄特三位女神争风吃醋,争抢起这个苹果来。宙斯此时也无计可施,让她们去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评理。为了得到这个荣誉,三位女神各许帕里斯以最大好处。赫拉许他成为最伟大的君主,雅典娜许他成为最勇敢的战士,阿弗洛狄特则许给他一位美丽的妻子。帕里斯于是把金苹果给了阿弗洛狄特。后来他在阿弗洛狄特的帮助下到斯巴达作客,拐走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美丽妻子海伦。于是希腊人组成了联军,由斯巴达国王之兄阿伽门农任统帅,向特洛伊宣战。战争持续了 10 年,最终希腊人设计了内藏兵将的大木马攻下了特洛伊,夺回了海伦。

诗歌讲的是特洛伊战争,但并没有讲述战争的全过程,而是重点描述了第十年里的 50 天里的事情。对此之前和之后的事诗人只是作了些必要的交代,做到了详略有别,重点突出,叙述技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奥德赛》叙述了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联军将领——以智慧闻名的奥德赛离开特洛伊还乡的故事。他在海上漂流了 10 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家。在这期间,许多人到他家纠缠,向他妻子求婚,挥霍他家的钱财。他在儿子的帮助下击败并杀死了那些无耻之徒,一家人得以团圆。故事体现了作者高度的想像力,把神话和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道。例如描写他在海上碰到风暴,他带的一部分人被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吞食;又如到了椰枣国,那里的人都以吃枣为生,过路人吃了便乐而忘返。风神送给他们的一只袋

子 里面都装着各路大风。水手们将袋子打开 ,大风放出 ,将他们吹走。到了妖岛上遇见了能将人变成猪的女妖。女妖斯库拉有 6 个头 12 只脚 ,甚是可怕。奥德赛和他的水手们一一克服了这些风险。后来在太阳岛上水手们违反规定 ,宰食岛上的神牛。宙斯得知后 ,一怒之下用雷霆击沉了他们的船只 ,唯有奥德赛幸免于难 ,在海岛上被仙女卡路普索挽留了 7 年 ,后来在宙斯的帮助下才得以回家。

《奥德赛》广泛地涉及到了当时希腊时代的社会生活 ,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家庭生活 ,着重歌颂了妇女的贞洁情操。同时它又是一部颂扬英雄主义、描写航海生活的史诗 ,表现了奥德赛的英勇顽强、聪明机智和热爱妻儿的优秀品质。它的风格和《伊利亚特》并不相同 ,没有后者的悲壮和急促 ,而是显得比较平静 ,富于变化 ,为欧洲以后的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模式 ,是文艺复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

荷马史诗之后又出现了赫西厄德(Hesiod)的诗歌。赫西厄德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 ,其作品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贫困境地以及他们对贵族的反抗 ,如《农民和日子》。另外一类诗则描写了当时贵族的生活和神谱的情形 ,如《神谱》就是这样一首诗。它描写了宇宙的形成和众神之间的斗争 ,写得比较生动。此外还有些抒情诗歌 ,例如派罗斯岛的阿客罗科斯 ,他时而对自己的敌人进行讽刺 ,时而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歌颂 ,感情奔放 ,富有感召力。除他外 ,抒情诗人还包括阿尔升俄斯及女诗人萨福(Sappho)。他们的诗歌很少接触政治问题 ,多半以自然、友情和饮酒作为题材。另外也有宫廷诗人 ,如阿那克瑞翁(Anacreon) ,他的诗纯粹是用以歌功颂德 ,取悦于统治者的 ,多为风花雪月、歌舞升平之作。从公元前 6 世纪末开始 ,抒情诗便逐渐衰落 ,无论是写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幅下降 ,不能满足新的社会要求。到了希腊后期 ,诗歌形式更加多样化 ,除了田园诗、讽刺诗和史诗之外 ,还出现了一种科普诗 ,通过诗的语言来介绍各个学科的知识。这种诗体的代表人物是卡利科

斯。他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馆长,博学多才,但有些矫饰自炫。他的代表作《爱提亚》涉及到地理、历史、神话和民俗等数种学科,是名符其实的杂烩。

除去诗歌以外,希腊人还给世人留下了寓言和历史著作。《伊索寓言》相传是曾经当过奴隶的伊索(Aesop)所作。后来在公元1世纪,巴布里乌斯改写了120余则,以格律诗的形式把它流传了下来。传说伊索相貌丑陋,但人绝顶聪明。他编的故事反映了平民和奴隶的思想感情,短小精悍、比喻恰当、通俗易懂、寓意深刻,深受普通人的欢迎。这类故事包括《狼和小羊》《农夫和蛇》《龟兔赛跑》《乌鸦和狐狸》等许多脍炙人口、久经磨炼、永听不厌的名篇,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也很大。

希腊人的史学著作也有不少,其中最为人知的历史学家是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395)和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355)三位。希罗多德写的《历史》是西方第一部史学著作,共9卷,主要讲述希腊同波斯的战争,所用的资料除了部分是从前人记载的史料里获取的以外,还有不少都是他从各处搜集而来的,观点比较客观,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也比较平和、公正,他因此而被人称为“历史之父”。修昔底德曾任雅典将军,所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他治学态度严谨,注意结合经济问题分析历史事件,语言简洁,叙述严密,并带有批判眼光,深得后世推崇。色诺芬的历史著作更加强调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的代表作是《长征记》,叙述了公元前401年,一支希腊雇佣军远征波斯,帮助波斯皇帝之弟小居鲁斯夺取王位之事。作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得简洁,但缺乏必要的思考和深刻的内容。

2. 希腊神话

希腊的宗教和神话传统形成于荷马时代。希腊宗教起源很

早,一些主要的神如宙斯、雅典娜等都可以上溯到迈锡尼时期。在荷马史诗中希腊人的宗教传说已形成为系统的神话,对于日后整个希腊艺术都有很大影响。马克思说过,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也是它的土壤,这话确实有道理。

希腊宗教神话的最大特点是它包含着“神人同形同性说”。神是人的典型和提高,是最美、最有智慧和力量的“超人”。他们和凡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永远不会死亡,这是当时人的一种精神支柱。希腊神话是从米诺斯宗教发展而来的,从本质上说米诺斯宗教是一种自然宗教,不但是因为发掘的祭坛和双面斧都来自于山洞和地洞这样一些自然场合,而且从表现米诺斯文化的一些造型艺术来看,很多图案都有树木和树枝,说明米诺斯宗教对植物非常崇拜。

出土文物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米诺斯神祇。这些神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家庭女神,另一部分是自然女神。家庭女神的标志是长蛇,先是用来保护家庭,后来则是代表死去的亲人。自然女神则手提猎物。雅典娜属于第一种类型,而阿尔特密斯则属于第二种类型。

自然宗教的进一步演化是将大自然的各种形态和神联系起来,出现了森林女神、水泽女神、海洋女神等。当然也有森林男神萨提罗斯,山林之神潘这样一些威力无比的神祇。

在希腊神话里,诸神都住在奥林匹斯山里(Mt. Olympec),其首领是宙斯(Zeus),他用雷电维持着天地的秩序。他的妻子赫拉(Hera)是婚姻和家庭女神。他的兄弟波赛冬(Poseidon)是主管海洋的海神,另一个兄弟哈得斯(Hades)是主管死亡之国的冥王。他的女儿雅典娜(Athena)是智慧女神,为雅典娜神庙的保护神,象征着文明和艺术。他的儿子阿波罗(Apollo)是太阳神,是主管真理、光明和医药之神。阿波罗的孪生妹妹阿尔忒弥斯(Artemis)是月亮和狩猎女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为爱 and 美的女神。赫菲斯

托斯(Hephaestus)是跛腿煅冶之神,锻造了宙斯的雷电。宙斯的另一个儿子赫尔墨斯(Hermes)是宙斯的使者和仆人,也是商人和小偷之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是酒神,代表狂喜原则,也主管戏剧,和阿波罗的智力原则正好相反。宙斯的妹妹赫斯提(Hestia)是灶神和家室之神。阿瑞斯(Aris)也是宙斯的儿子,是战神。此外还有些小神,如五谷之神得米特(Demeter)、爱神厄洛斯(Eros)、丘比特、森林之神潘(Pan)、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Erinues)、青春女神赫柏(Hebe)、学问和艺术女神九缪斯(Mousai),她们分别主管历史、天文、悲剧、喜剧、舞蹈、史诗、情诗、圣诗、抒情诗等。

在众多的希腊神话和传说当中最有名的是下面几个:特洛伊战争的起源和经过,阿特柔斯家族、底比斯缔造者卡德摩斯家族,金羊毛的故事,赫拉克勒斯和忒修斯的传说,俄迪普斯的故事,七英雄远征底比斯,奥得赛的故事等。这些神话基本上以家族为中心,具有不同的系统,但都反映了当时普通人民避恶扬善、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歌颂了富于幻想、英勇豪迈的气质。例如传说赫拉克勒斯力大无比,襁褓之中便扼杀了一条蛇,成人之后杀死过九头毒蛇和女妖美杜萨,甚至击败了冥王哈得斯,救回了被囚禁的忒修斯,让他们夫妻得以团圆。金羊毛的故事更带有些浪漫色彩。希腊塞萨利的古国约尔科斯国王埃宋遭其异母兄弟匹里阿斯的谋害,王位也遭其篡夺。匹里阿斯夺位后派埃宋之子伊阿宋去寻找金羊毛,声称如能找到羊毛就将王位还他。出于安全原因伊阿宋带领一班人乘坐阿尔格号船出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其妻美狄亚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得到了金羊毛。返回后美狄亚设计杀死了匹里阿斯,但不久却遭伊阿宋的遗弃,美狄亚悲愤交加,杀死了她和伊阿宋的几个孩子。这个故事以后成了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悲剧《美狄亚》的主要素材。

希腊神话是构成希腊宗教的重要基础,也显示了它的重要特

点。希腊宗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没有许多僧侣。希腊宗教的地位尽管非常重要,管理人员却并不多,这有利于希腊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宗教对物质世界、日常献祭和各种社会制度作了解释,为诗人和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框架。另一方面它并没有对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内容做出什么限制,没有妨碍人们的正常生活。希腊人尽管建造了许多神庙,举办了各种宗教仪式,但这些仪式往往和歌舞、体育、诗歌朗诵等娱乐活动联系在一起,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3. 希腊哲学

希腊文化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哲学,其进步意义在于它突破了宗教的桎梏,很早就提出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等重要的哲学命题。公元前7至6世纪在小亚西亚西岸的米利都产生了最早的朴素唯物论学派米利都(Miletus)学派。它的创始人泰利斯(Thales)认为,万物始于水复归于水,这就否认了万物为神创造的说法,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的学生阿拿克西曼德(Anaximander)主张万物的根源为“无限”,世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物,如干与湿,冷与热等。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提出了“斗争是万物之父”;“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辩证法思想。后来的一位哲学家德模克里特(Democritus)则认为,万物是由最小的、不能再分的物质粒子(被称作原子)的东西构成的。和唯物论相对应的是唯心主义。早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便认为,宇宙的根源是抽象的数,他还相信灵魂转世。他的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后来的诡辩论代表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认为,客观世界的知识可以因人而异,可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当也属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399)、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

totle,公元前 384—322)。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 469 年。他没有多少钱,也不想发财。他身体结实,乐于助人,但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喜欢和人讨论问题。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记载得到的。公元前 399 年,他以从事非雅典的活动而被判处死刑,被迫服毒自尽。

苏格拉底的思想观念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认为对钱财不必看重,二是认为应该探究一些伦理术语的含义。柏拉图称他提出了“中庸”、“友谊”和“勇敢”等德行问题,但没有给予最终解答。他认为重要的是必须追求知识,人犯罪的原因是缺乏知识,无知是罪恶的一个最重要根源。为了具备美德、达到“善”的境界,必须有知识,因此德行和善亦即知识。他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知识和德行联系起来的哲学家,因此受到后世许多人的尊重。苏格拉底以他的幽默感和反嘲而著名。当他说他一无所知时,他是在嘲弄别人无知。当有人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总想把坏的说成好的时”,他说他不是科学家,不像诡辩家那样为挣钱而讲授,更不知他们能懂得什么。他也有些不足之处,例如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人的行为可以证明人的思想,宇宙的和谐可以证明神的精神及其组织作用。他的思想也带有些神秘色彩,例如他认为他有时候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 427 年,活了近 80 岁。他出身于贵族世家,年轻时曾想终生从政,但苏格拉底的遇害对他打击很大。他变得突然消沉起来,不久就离开雅典,周游埃及、小亚西亚和西西里等地,后返雅典办学,开办阿卡德美(Academy)学园,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和讲学,终其一生都在探求一种完善的国家思想。该学园先后长达 900 余年,开创了西方高等教育先河。

柏氏著作多采用对话形式,共有 25 篇传世,其中 24 篇以苏格拉底为对话者,借苏氏之口说出己意,主要著作有《理想国》《法律篇》和《政治家》等。他的哲学思想包括道德和形而上学两部分。

他的道德思想涉及到灵魂、上帝以及上帝和世界的关系等问题。他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理念论。所谓理念就是有关某件东西本质的绝对概念。他认为这些理念的知识只有从纯理性当中获取,不受情感的影响,而是通过辩证的方式进行。最高的理念是善,善建立在所有其他理念之上。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认为美德是一种知识,是最高理念的知识。在我们观念之外具有真实的存在,在不断变化的外表之后是不变的真实。他还认为政治学是灵魂的科学,包括道德学,一个城市的善取决于这个城市市民的道德价值观,取决于人们是否有正义感。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主要观点都反映在他的《理想国》里。该书主要描述一种完美的国家,是一部集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和其他社会理论于一书的著作,着重谈了以下七个问题:

首先是阶级结构问题。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是公正的,应具有智慧、意志和节制三个条件,体现在不同人身上。人依据人性和社会分工划分成等级。在他看来,人性有三种:理性、意志和情欲。人性的三种活动使人类社会产生了三个阶级:求感官和身体享受者,求荣誉和成就者,陶冶理性追求真理者。一国的阶级相应于人性的三部分,体现了三种天赋和职能:相应于理性的是统治阶级,其职能是以才智管理国家;相应于意志的是武士阶级,其职能是保卫国家;相应于情欲的是劳动者阶级,其职能是安分守己地从事生产劳动。简言之,理想国有三个阶级——普通劳动者、军人和统治者。

其次是最高统治者。柏氏认为真正拥有统治权的仅仅是第一等级,或者只有一个人,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注定只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个人只能是哲学家。哲学家之所以能当统治者是因为他有很高的“善性”,此外他好学、会学,有过人之胆量、远大之目光。他把哲学家比做船长和高明的医生。

第三是“共产”制度。他认为国家一切灾难的祸根是私有制和

私有观念。在他看来一个社会是否公道与正义,就是看它的贫富悬殊是否过大。他说私产会毁灭社会。解决办法是在一、二等级中实行“共产制”。除了生活必需品,任何人不得拥有私人财产。后来他意识到这种禁欲主义的共产制行不通,在其晚期著作《法律篇》里他已允许人们拥有私产,将公民财产分成四个等级:一等的动产不得超过不动产(土地)的4倍,二等的不得超过3倍,三等的不得超过2倍,四等的不得超过1倍。超过部分由国家抽税。

第四,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批驳了荣誉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僭主政治,认为它们各有弱点,不应推行。他主张所谓的“贤人政治”,即宪法下的一人统治。认为好的政治是人治加法治,类似于君主立宪。

第五,在婚姻制度方面柏拉图主张共产必然共妻。他认为财产私有造成“党争”故需共产,财产私有又是家室妻儿累赘所至,故需共妻。另外他还认为婚姻的目的不在于追求财富、权力和地位,而在于造就身心健康的儿童,为国家提供优质后代。所以婚姻是社会所必需的,应取消家庭,实行共妻。

第六,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上,柏拉图主张一视同仁,完全平等。他所谓的平等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接受相同的教育,二是从事相同的工作。

第七,柏拉图把教育看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任务,其地位仅次于“共产”。他认为教育应分成两个层次,一、二等级应进行高等教育,第三等级进行普通教育。一、二等级的教育着重培养优秀的统治者,按年龄档次分别予以考核。50岁后的品学兼优者,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峰,其中一部分人可以从事哲学研究,另一部分人做领导工作,或指导下一代统治者的工作。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的另一位杰出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18岁从家乡哈尔基斯的斯塔吉拉来到雅典师从柏拉图,在柏氏学园住了20年,被柏氏称为“学园

之灵”。柏氏死后,亚氏离开雅典,四处游历,后担任马其顿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历山大即位后帮助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了一个学园。他在那里讲课喜欢边走边讲,有逍遥派哲学(peripatetic school)之称。后来亚历山大去世,希腊各地掀起反马其顿的浪潮,殃及亚氏,他被判为不敬神罪。亚氏逃走加尔西斯,次年死在那里。

亚氏博学多才,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最博学的人物”。身后留下了400多篇著作,涉及政治、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修辞学、美学、物理和生物等多种学科。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在很多方面还是逐步摆脱了柏拉图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见解。比较起来他更强调联系实际进行认真仔细的思考,就某件物体的物质形式做出分析,认为思考应该建立在实际经验和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他的这些特点使得政治学和伦理学从一种抽象的理论变成了和实际生活联系紧密的学科,使得哲学成为一种包容天下万物的学科。在自然哲学方面,他提出对事物自然存在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讨论诸如物质和形式,以及时间、空间和运动等问题,揭示出所谓的四大原因,即物质原因(事物由此而产生)、形式原因(事物可理解的本质)、运动原因(变化即产生于此)和终极原因(变化的结果或目的)。关于天地的概念,他认为地球是个单一的天体,坐落在宇宙的中央。西班牙向西到印度的航程可能不是很远,这个观念以后影响了哥伦布。在动植物学的研究方面他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他对动物的繁衍、分类,器官的适应性变化和进化都有独到见解,甚至知道鲸是哺乳动物。

在国家和政体方面,亚里士多德主要遵循柏拉图《政治篇》里的观点。然而他也做了些修订,例如他指出在国家统治当中重要的是财富而不是人数的多少。不论是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掌握了经济权。他在考察了各种不同政体后得出结论认为,在最好的政体中间财富既不是最多,也不是最

少。因此中等阶级占优势的国家最好,也最稳固。他还强调家庭的作用,认为一个孩子在父母关照下才能够得到关心,单纯交给集体看管会变得没人管。他还建议土地应归私人所有,但生产出来的东西应归社会享受。他提出城市国家在村镇和家庭合在一起的基础上面发展,国家应保证市民的良好和自足的生活。一方面他承认民主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统治者本人完美的话,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形式。他把伦理学归于政治,因为他认为归根结底个人是社会的成员。他还认为善是人的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人生的目的是幸福,但是快乐、荣誉和财富并不是幸福的基础,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沉思,这是人类独有的活动。他认为沉思有两种,一种是对哲学真理的沉思,一种是普通人的沉思。普通人的幸福可以通过道德和智慧的实践来获取,他在论述过程中区分了道德和智力两方面的德行。

他在形而上学上面对宇宙物质的实在性进行了探讨,对物质及其形式作了划分。他提出宇宙当中的等级存在方式,认为每种存在都和紧靠它上面的存在紧密相连,并为紧靠它下面的存在提供了形式和变化。在这个范围底部的物质没有什么形式,只通过逻辑的方式存在。在这个范围顶部的物质不能动弹,是一种永恒的思维活动,和物质没有什么关系,通过一种近似爱的方式在宇宙当中移动。他把这种活动方式和神等同起来。在逻辑学方面他第一个提出了对后世有着广泛影响的三段论。他的《诗学》可能是西方文艺批评史上最早的著作,其篇幅虽然不长,却对艺术批评史,尤其是对戏剧文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在这本书里声称一切艺术都是模拟的,从而成为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论鼻祖。他首先把绘画和雕刻同其余的艺术分开,把音乐、舞蹈和诗歌归为一组,然后根据模拟方式的不同把诗歌分为不同的类型。他认为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区分人的模拟行为:一是可以如实地表现,二是可以用高于正常行为标准的方式来表现,三是可以用低于正常行为标准的方

式来表现。由于模拟方式的不一样,戏剧可以区分为悲剧和喜剧。在悲剧里人表现得比生活中的形象高大;而在喜剧里人表现得比真实的形象要矮小,突出了生活的荒谬一面。在这里,人性中的滑稽一面被认为是缺点,艺术价值和伦理价值被糅合到了一起,显然是受到了《理想国》的影响。柏拉图在这本书里将对艺术的评价和社会伦理准则联系起来。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在哲学、科学以及知识的传播上几乎无人可以和他相比,在中世纪尤其如此。无论是经院哲学,中世纪的大学课堂里,还是早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科学家或是文学家那里,他的思想都被作为一种权威经典广泛引用,用来论证和支持各种不同观点,前后几乎长达20个世纪。然而希腊哲学到了后期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也有明显的变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曾经一度不是非常吃香。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更加注重追求个人幸福,寻求解决痛苦的途径。代表这种趋势的有四种哲学派别。它们是斯多噶派(Stoicism),伊壁鸠鲁派(Epicurianism),犬儒派(Cynicism)和怀疑主义派(Scepticism)。

犬儒派最早是由狄奥根尼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创立的。主张人要自然地生活,反对事事按照传统惯例,反对因循守旧的观念,把培养人的自足精神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但它同时反对听、视觉享受,认为音乐和艺术是矫揉造作的表现。它和现在西方的颓废派有些联系,是一种失意或者绝望心态的表现。后来这个学派的继承者昔尼克派的成员经常到普通群众中间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批评当时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声称社会制度不合理,但他们并不想去推翻这个制度。他们只是抱怨社会不公,主张回归自然,认为贫穷光荣。他们的这些观点因此得到了不少穷人的欢迎。他们还主张只有放弃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才能获得幸福,声称哲人虽然处在贫困当中,却比任何国王都富有,所以一般人应当听从哲人的教导。这个学派在希腊化时期不但在普通群众中间,而且在

许多国家的统治阶层当中都有一定的影响。

伊壁鸠鲁派的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公元前270)。伊壁鸠鲁从小聪敏好学,18岁时就去了雅典学习哲学。他在那里接触到了各种哲学流派,特别受到德谟克里特哲学观点的影响。后来他自成一家,创办了一所哲学学校。据说他招收的学生不分男女和贵贱,甚至奴隶也收,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他的一生著述颇丰,一共著有30本书。但绝大部分都已失传。

在哲学思想上他基本上继承了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观点,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并处于运动当中。他认为构成物质的原子不仅有大小、形状、位置和秩序的差别,而且还有重量的不同,原子不仅有直线运动,而且有斜线运动。原子在直线下降过程当中有可能脱离原来的轨道向旁边倾斜。通过这种偏离运动和其他的相互冲击、碰撞,原子才能互相结合,形成千姿百态的物质世界。与此同时他比德谟克里特更加强调感觉的作用,认为感觉是判断真假的标。他认为,理性不能否定感觉,因为理性是感觉的结果。感觉本身不会有错,错的是我们对感觉的解释。他还是个无神论者,表示人的灵魂是物质原子组成的。灵魂只能依附于身体才能存在,身体死亡了也就没有了灵魂。他虽然没有直接否认神的存在,但他不赞同神可以干预自然和人类的说法。他的这些观点因此而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评。

在伦理学方面,伊壁鸠鲁主张追求快乐,认为任何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权利。他不主张纵欲,而是认为过度的肉欲必然会导致一定的痛苦。他主张精神快乐应当胜过肉体快乐。他还反对公民对政治过于热心,认为政治不利于人的心态平静。另外他声称个人在追求快乐时,不应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为国家和社会是后天形成的,是人们为了避免互相伤害而订立的一种契约。他的这个观点是社会契约的最初由来。

伊壁鸠鲁的一系列思想对欧洲的哲学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唯物主义理论和伦理学方面有很多积极的东西。但也必须看到他的一些观点代表了部分奴隶主的失败主义情绪,有一种消极、出世和脱离实际生活的倾向。

斯多噶派的创始人是芝诺(Zeno,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年轻时的芝诺原打算经商,后因故留在雅典,喜欢上了哲学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创建了斯多噶派。斯多噶是他讲学所在地的名称。斯多噶派继承了古希腊唯物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同时又结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既有积极主动的一面,也有消极被动的一面。积极主动指的是内在的理性,消极被动指的是物质。它们虽有内容上的区别,但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认为,世界是由火构成的,但是万物最初的本原是上帝,原始的火是上帝,只有上帝才能使得宇宙变得有目的、有秩序。由此他们提出了世界大火和世界轮回说,声称宇宙起始于火,经过一定的时间,又为了一场大火所毁灭,复归于原始的火,如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这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双手上,所以上帝是万物的主宰。

斯多噶派在伦理方面推崇自然和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应当按照宇宙的本性去安排生活。因此顺应自然或是顺应理性都是人的美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代表神的理性所决定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自己的不幸命运,只有逆来顺受,听从命运的安排。在他们看来人应当清心寡欲,从物质利诱和情感波动当中解脱出来,而应加强伦理道德的修养。只有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不在物质而在精神和道德。为了所谓的“合理的原因”,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斯多噶的这些思想影响了不少人,也为以后的基督教思想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斯多噶派还提出了世界国家概念。这就是说,所有的城邦和种族都应当消除,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都可以享受平等的权利和

地位,前提是接受一个最高权力的领导。实际上这是在鼓吹君主专制代替城邦制,为以后的专制统治做了舆论准备。尽管如此,斯多噶派还是有些积极因素,例如它主张人们不要逃避现实,而是要参与公共事务,承担公民的义务。斯多噶派后期竭力强调人应当克制和忍让,宣扬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走上了宗教神秘主义的道路。但是它作为一个流派,持续时间达400—500年之久,流传很广,对西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怀疑论派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他们实际上是些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知道认识世界是不可能的才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安宁。确切地说,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抱着不相信、不可知的态度。他们认为他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不能认识很多事情的正确和错误。他们声称人们应当放弃理论上的判断,在实际生活当中对一切都应当漠不关心,以求心灵上的宁静。怀疑论派表现了当时的一种绝望思想,这和当时部分奴隶主碰到很多矛盾,无法解决,陷入了一种得过且过的颓丧境地有关。怀疑论派由皮浪在公元前4世纪末创建,在以后的200—300年甚为流行。

4. 希腊戏剧

希腊戏剧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活动,起源于古代希腊的崇拜节日。这些节日开始于乡村,后来传到城市,采用一种合唱的形式。戏剧表演则是它的一个分支,主要在狄俄尼索斯节(Dionysia, 酒神节)期间进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戏剧在表演的深度和技巧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早先的戏剧都是些酒神赞美歌,由一个经过训练,身着森林之神服饰,上面涂满酒的合唱团来进行齐声合唱,其主题则反映狄奥尼索斯的磨难和痛苦。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叶,戏剧表演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一位叫做狄斯比斯(Thespis)的诗人将表演者从合唱队中分开,让他单独扮演角色。这样做的结果是建立了表演的概念,引进了对立或冲突的成分,创建了

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后人称他为“戏剧之父”。公元前5世纪埃斯库罗斯又增加了第二个演员,以后索福克勒斯又增加了第三个演员。这样戏剧形式就逐步完善,并出现了专门编剧和表演的人。希腊剧场和对酒神的祭拜分不开。祭拜酒神时人们在祭坛附近山坡上环立,其形状就像是半圆形剧场。以后希腊剧场就采取这种形状,一直流传到后世。当时的剧场规模都很大,如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剧场可以容纳上万观众。有时候全城有一半人去看戏。开始演戏只在酒神节进行,后来则成为一种经常性娱乐活动。希腊人之所以具有较高文化水准,应当归功于戏剧。随着剧院的建造,剧团的成立,戏剧作为一门艺术和文化活动,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时演戏必须遵守所谓的“三一律”,即同一的时间、地点和剧情。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戏剧理论,一直保持到18世纪。

在古希腊戏剧中最负盛名的有三大悲剧家和三大喜剧家。三大悲剧家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古希腊悲剧只传下了他们三人的一小部分作品。三大喜剧家是克拉提诺斯(Cratinus)、欧波利斯(Eupoli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他们当中只有阿里斯托芬传下了一些完整的作品。

希腊悲剧内容丰富多彩但主要取材于希腊神话,而极少取材于现实生活。悲剧作家常常运用这些非现实的故事来表现各种现实问题,如人的命运、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以及其他社会问题。这些悲剧不但想像力丰富,而且语言精炼、辞藻华美。虽然其形式多为神话故事,但由于其内涵和现实生活贴近,故对观众有一定的吸引力。希腊悲剧的力量在于其崇高的英雄主义思想,维护正义,反对独裁和压迫的精神以及争取自由的愿望,具有鲜明的倾向和深刻的思想。

埃斯库罗斯是希腊悲剧的奠基人,被恩格斯称为“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出身于贵族家庭,但他在政治上拥护民主派,作品里处

处流露出民主精神。他的《波斯人》是现存唯一的一部以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的悲剧。该剧通过对波斯水师在萨拉米遭覆没的描写,表现了雅典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波斯专制制度的腐败。希腊人是为自由而战,所以勇敢无比;而波斯人都是些被奴役的人,在死亡的威胁下作战,自然也就溃不成军。他的最重要作品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该剧取材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神话,讲述了一个他如何拒绝和宙斯和解,敢于说出他能够推翻宙斯的秘密,结果被打进深渊的故事。这是“普罗米修斯三部曲”的第一部,富于哲理和情感,运用神话故事来影射雅典城邦里的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的斗争。由于这个剧本的描写,普罗米修斯由原来的一个小神而成为一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伟大神灵和民主的不朽化身。宙斯则被描写成一个恩将仇报、不讲信义、残忍暴虐和荒淫无耻的暴君。埃斯库罗斯的其他作品还包括“俄瑞斯忒斯三部曲”。这是现存古希腊悲剧中唯一完整的三部曲,由《阿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三部分组成。

索福克勒斯是另一位著名悲剧作家,一生写了大约 130 个剧本,现存 7 部,其中以《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最为人知,而后者最有代表性。俄狄浦斯从神那里知道自己的命运,一心要与之斗争,却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最后还是杀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全局以母亲自杀、他自己戳瞎眼睛而告终。该剧表现了个人的意志行为和命运的冲突,反映了雅典自由民在社会灾难面前的一种无能为力。

第三位著名悲剧作家是欧里庇得斯。他一生写过 92 部剧作,现存有《美狄亚》、《特洛伊妇女》等 18 部悲剧,但最重要的要数《美狄亚》。该剧说的是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爱上了伊阿宋,帮他杀了她的兄弟,抢去了她父亲的金羊毛,随他去了希腊,并跟他结了婚。但伊阿宋后来却要遗弃她、另寻新欢,让她痛苦万分。为了惩罚伊阿宋,她决心使他断绝后代,忍住痛苦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儿子,自

己乘车逃往雅典。该剧反映了妇女地位的不平等和痛苦的生活，如同美狄亚在剧中所说：“我们女子算是最不幸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不同于他的前辈和同辈剧作家，着重表现社会现实，把普通人，如农民、奴隶、儿童和仆人作为悲剧人物。他还善于描写人物心理、抒发人物感情，语言自然流畅，能够调动观众情绪。

和悲剧比较起来，喜剧的内容和形式都更加自由，人物更多，服饰和面具也更为多姿多彩，其语言、布景和舞蹈都不加什么限制，更受到普通人的喜爱。在喜剧家当中，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以其反映当时雅典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闻名于世。他善于运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讪笑打诨来反映生活。例如《阿卡奈人》里的狄开俄波利斯和拉马科斯的争辩原本正常，但他们却在台上撒野，互相扭打。阿里斯托芬的想像力非常丰富，往往虚构情节，采用夸张手法，但却紧密联系现实生活，语言朴实生动，有很强的感染力。这些特点都体现在他的剧作《鸟》里。该剧是一部以神话幻想为题材的喜剧，讲的是两个雅典人和一群鸟之间所建立的一个“鸬鹚国”的故事。这是一个理想社会，没有贫富之分，也没有剥削，只有劳动才是唯一的谋生手段。这部戏嘲讽了当时城市里的寄生生活，有一定积极的思想意义。同时其艺术手法也有独到之处，不仅剧情丰富多彩，还有人扮演的鸟出入其间，富于幻想和抒情色彩。他一生共写有44个剧本，保存下来的有11个。他的剧本既有完美的形式，又显示了他特别善于运用讽刺手法的才智。他对上层社会的种种丑恶行为予以强烈的抨击和嘲弄，讽刺的对象既有将雅典人引向灾难的统治阶级，又有那些喜欢摇唇鼓舌的知识分子，还有那些自私贪婪的小市民。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他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因而受到恩格斯的赏识，把他称之为“喜剧之父”。

5. 希腊及其之前的艺术和建筑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从希腊文明开始，但在希腊文明开始之前

人类文明就已经在埃及和两河流域出现了。大约在公元前 4000 年埃及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证据,而 20 世纪发现的人类最早艺术形象——韦伦道夫(Willendorf)女性塑像则更是把人类的艺术活动提早到 25000 年之前。

史前人类艺术活动的证据除了在奥地利韦伦道夫发现的女性塑像外,还有在法国拉斯本(Lusignea)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道尔尼·维斯托克(Dolni Vestoc)挖掘出的女人像和象牙雕塑。这些早期艺术品虽然看上去有些粗糙,但几乎毫无例外地突出了人体的胸部、腹部和臀部这三部分的形体。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此外,同样的男人象牙塑像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鲁诺(Bruno)找到。塑像虽已损坏,同样表明了人类艺术活动的源远流长。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塑像要比绘画艺术的历史更为久远。20 世纪在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山区岩洞里发现了用粗线条勾勒的动物形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拉斯科岩洞(Lascaux Cave)。这些画经测定后认为,最古老的已有 15000 年,其余的也在 10000 年以上。它们从形体到神态乃至肤色都不完全相同,动物种类不囿于捕猎的鱼、鸟、兔这些小动物,也不仅仅是牛、马之类人比较亲近的动物,而且包括狮、虎、猛犸和犀牛这样凶猛、高大的动物。这些动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如公牛受到雷声的惊吓互相夺路,各不相让,疾蹄狂奔,表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这些画经过如此长的时间还能得以保存下来主要得益于石灰岩地形长期封闭的地势缘故。

早期人类经过自身的繁衍,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人口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加。生产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野兽的捕猎改为对野兽的圈养,其次是对植物的采集改为种植。这种变化是长期演变的结果。前者的变化形成了畜牧业,后者的变化形成了农业。这两种

变化对人类的进步具有重大作用,尤其是农业的建立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类由于有了农业,进而占有了土地,从而产生了阶级和国家,建立了城市,形成了社会,进一步有了学习和掌握技术,推动社会和生产发展的要求。

生产技术概念的形成首先来自于新石器时期人类对于劳动工具——石器的改进。由于劳动工具的革新,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制造出了陶器,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一次质的进步。现今伊拉克南部发现的陶器饰有鱼、鸟及其他飞禽走兽乃至人的图案。考古学家认定,这是在5000年前制作出的,先由人通过手工方式采用泥糅合成形,再在窑上用火烧制而成。这种陶器不仅在中东,而且在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一带都有发现。

约在5000年前两河流域出现了一种新建筑物——神庙。神庙无论是在外形上还是在位置上都不同于一般住房。在马耳他和邻近的高佐(Gozo)岛上发现的神庙均修建于公元前3000年,它们是人类已知最早的一种公共型建筑物,全部用石块砌成。这种房子的结构已经采用水平式的砌砖法,即用长石压在两根座柱上作为门框。后来这种方法普遍推行到北欧和西欧的许多地区,不少中石器时代的墓地都用这种方法来建造门框。有些建筑里的石块还具有特别意义,例如英格兰的撒里斯伯里平原上竖立有19块巨大的蓝色石块,每块均有1.8—2.4米之高,组成了蔚为壮观的巨石阵(Stonehenge)。据说这些石块约在公元前2100年时由人从威尔士的山上搬过来的,称为石碑。这些石碑有些什么样的功能,至今还是众说纷纭,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掩盖着,不过可能多半和祭神,举办宗教仪式有关。

希腊古代文化从克里特文明开始,到迈锡尼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明中心从克里特岛转移到了希腊大陆。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从北方来的入侵者极大地摧毁了早期的希腊文明。希腊社会此时进入了一段500年左右的黑暗时期,社会发展

滞后,文化艺术上也没有多少成就。值得一提的只有一些陶制品。这些陶器主要产于雅典,呈轮形,纹络平滑,线条粗犷而对称,饰有近似几何图形的图案,因此被称之为“早期几何图案”,是后来遍及希腊本土和邻近地区几何图案的先驱。后来陶器图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各种呈方形或菱形或圆形的框里画有各种形象,既有人体,也有动物。最为精致的一只瓶器高达2米,上有疾驰的鹿,下有一排倚地而坐的鹿,中间为一行人,他两手抱头朝向一名死者,像是在悲伤难忍,悼念亡灵。

这种几何图案不限于陶器。保存在纽约大都市艺术品陈列馆的青铜器塑像“制作头盔的人”当属另一类。塑像的主体是位工匠,手握工具,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工作对象——头盔。人体取坐姿,一腿盘坐地上,一腿曲立支撑,两臂伸曲自然,人体各个部位比例合理。塑像虽然有些残缺,仍然显示了当时铸造和雕塑艺术的高度水平。

希腊人在艺术领域的建树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首先它的艺术受到它当时的社会发展影响,得到奴隶制民主政体的鼓励和帮助,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健康完美的理想主义形象。二是受到希腊神话的影响,从希腊神话里吸取了大量营养,根据神人合一的特点,创造了具有人的面貌和情感的各种神的形象。三是由于贸易和航海业的发展,希腊人和地中海一带及两河流域的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希腊艺术因此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作品里带有不少外来文化的痕迹。四是希腊人一向喜欢体育,崇尚健美的体魄,一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运动员的裸体竞技为艺术家提供了塑造健美人体的良好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有利因素,希腊艺术才能得以取得辉煌的成就。

古希腊艺术主要包括雕塑和陶绘两个方面。早在希腊氏族社会的末期,即公元前10世纪前后,就已经出现了造型艺术。前面提到的带几何风格的陶瓶,造型简朴,大小不一,主要用于敬神

和陪葬。出土的一些陪葬用雕像也呈几何形状,没有细节刻画。陶绘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段时期里东方文化通过贸易交往对希腊艺术产生了一些影响,希腊艺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瓶画、建筑和雕刻上。

希腊人对陶瓶似乎情有独钟,无论是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出口商务中都需要大量的陶瓶,雅典和科林斯是当时制造陶瓶的中心。这些陶瓶往往都饰有不同风格的绘画,画的类型包括东方、黑绘和红绘三种不同的格调。东方风格主要是在公元前七世纪初出现的,这时的陶瓶受到了埃及和两河地区的影响,上面有兽首人身像、植物纹络等图案。黑绘风格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图案上的主体人物被涂成了黑色,但背景仍保持陶土的赭色,这样形象轮廓就更加突出了。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阿喀琉斯与埃阿斯玩骰子》等。红绘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和黑绘风格恰好相反。它是在背景上涂以黑色,留下背景部分的赭色,人物轮廓用线来勾勒。这种风格主要流行于古典时期。瓶画表现的多是些带有故事情节的场面,以神话和日常生活题材为主,各种人物栩栩如生,表情丰富,具有动态感。

希腊建筑上的成就主要反映在神庙的建设上面。神庙的典型建筑形式是圆柱式,即周围用柱廊环绕的样式。圆柱有两种,其一为多利亚式,朴素、粗壮,没有柱基,柱身由下向上逐渐缩小,中间略鼓出,柱身有凹槽,柱头上接方形桂冠。其二为伊奥尼亚式,柱式精巧、纤细,有柱基,柱身长而匀称,凹槽密而深,柱头呈涡卷形,檐壁有浮雕饰带。后来在小亚西亚一带又流行科林斯柱式,是在伊奥尼亚柱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装饰更加华丽,其柱头为繁密的花篮。这类建筑最负盛名的当推雅典娜神殿和以弗所的阿尔特密斯神殿。

随着时间的发展,希腊古典时期的圆柱式建筑日趋成熟,其格

式和比例也逐步固定下来,日趋简练合理。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雅典卫城(Acropolis)建筑群。该城重建于古典初期,耸立在山崖之上,地势陡峭,仅有上下通道。卫城的各个建筑顺山势而建,远看呈不规则形状分布在山顶上面。它包括山门、巴底农神庙、尼开神庙、伊开瑞翁神庙等建筑,但主要的是献给雅典娜女神的巴底农神庙(Parthenon)。巴底农神庙长 70 米,宽 31 米,柱高 10.50 米,采用多利亚柱式,但檐壁却采用伊奥尼亚式的浮雕饰带,东西三角楣装饰着高浮雕。其结构匀称,比例合理,有着丰富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其纪念性和装饰性、内容和形式取得了高度的统一,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建筑典范之一。不远的伊克瑞翁神庙采用了爱奥尼亚柱式,显得苗条秀丽。其南侧是一组女性像柱,体态轻盈,落落大方。可以和这两座神庙相提并论的是普罗庇莱雅遗址。该建筑原来是作为雅典卫城神庙而修建的,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而停顿下来。由于地势有些坡度,建筑师姆尼西克勒斯设计了带有两个正面多利式图形的方案。这两个正面如同庙宇的前部,由一个爱奥尼亚式圆柱相连接。后来建造的卫城神庙完全是爱奥尼亚式的,包括雅典娜·奈克神庙和埃莱克西神庙在内。爱奥尼亚式源于小亚细亚一带的希腊城市建筑,后来这种建筑发展很快,传到了爱琴海东部诸岛那些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地方。而这一地区文化的发展以后对希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希腊化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建筑是将建筑和雕刻融为一体的“宙斯大祭坛”(The Great Altar of Zeus)。这座位于小亚西亚西北伯家姆的大型建筑原来建于公元前 200 年左右,是庆祝这个小国击败北方高卢人入侵的纪念品。建筑物分上下两个部分,由台阶连接。上方为爱奥尼亚式列柱,供祭祀用,下方为 2.3 米高,90 米长的浮雕。上方列柱后面还有一组浮雕,这些浮雕约有 73 米长,1.5 米高。这座建筑历经岁月沧桑,后来又在 19 世纪遭到战争破坏,可谓命运多蹇。但在 20 世纪初叶经人修复又重新在德国柏林

展出。其主体主要表现了神和巨人之间的搏斗。众神一个个肩宽腰圆,而巨人则得更加高大,只是他们一个个呲牙咧嘴,摆出各种不同的姿势和神态,通过工匠们的精心雕刻将其形态表现得极为自然、生动。上面的浮雕比真人身材要小一些,但雕刻得更加细致。

希腊化时代的建筑明显带有东方特征,城市建设有了总体规划,一些东方式的拱形模式普遍得到了应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亚历山大里亚城,这座文化名城既有许多壮观的建筑物和宫殿,也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广场和花园。其中的“缪斯神宫”规模宏伟,是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又称博学园,藏书达70万册之多。里面设有大厅、研究室以及各种标本陈列室。亚历山大里亚灯塔竖立在城市入海口附近,高达135公尺,极为壮观,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大约3000年前爱琴海地区就已进入了青铜器时期,但有价值的文物还是新石器时期的一组石雕。这些人物塑像都是白色大理石制作的,光滑平整,大小不等,大多为女性裸体。虽然人物构造还比较简单,刀工不够细致,但其中有一些具有三维特征,个别的甚至还有比较丰富的面部表情。克诺萨斯王宫残留的塑像中有一位持蛇的女神——裸身、泥塑人形,但只有30厘米大小。此外还有些动物和自然景物,如鸟、牛、水草、章鱼和海豚等的塑像。米诺斯王宫最常见的艺术形象是公牛,几乎所有的艺术品当中都有它们,甚至神也经常以牛首的形象出现。保存最完好的浮雕是从墓地发掘出的两只金杯,上面有栩栩如生的两只牛。一个年轻人正在使劲地用绳子套住其中一只的腿。小伙子肌肉发达,动作敏捷。虽然有关金杯的制作地仍有争议,但毫无疑问那时的工艺制作已有相当水平。在马其顿德芙尼发现的酒杯上既有细雕精刻的各种图纹,又有酒神狄奥尼奥斯和女神阿利亚登一起玩耍的场面。另一座青铜塑像“跳舞的人”身着长披风,左手曳着衣角,侧身

转头,右脚前迈,臀部凸起,腰身紧缩,摆出一付舞步轻盈的模样。

希腊早期的雕刻受到埃及的影响,人物多为正面直立的形象,显得有些僵硬,无论男女,均带有千篇一律的微笑,且衣纹和头发常有装饰性的特点。后期雕刻开始出现些变化,例如男人的举止较为自然、生动,被人称作“阿波罗”。创作于公元前6世纪的“荷犊的男子”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小牛的表情生动活泼,举着牛犊的男子结实有力。在爱琴海萨莫斯岛上发现的象牙雕男孩裸体像,从外形上看很像是叙利亚或是腓尼基那边的作品,其刀工细腻,人物轮廓、表情、形体都表现得十分逼真和精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裸体像不符合那里的风俗。类似的吸收还体现在母亲和生殖女神阿斯塔特像上面。德罗斯岛上的这座女神像原来在她的家乡腓尼基时是不穿衣服的。希腊人把她请进来时替她遮了羞,让她变成了宙斯的妻子赫拉。

希腊人在雕塑方面大概更多地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真谛。他们在埃及看到了巨石制作的人像和其他建筑物,尤其是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那样的至极精品,以后便开始用石块作原料来创作艺术品。公元前7世纪之前他们只会用木料和石灰石,而从埃及人那里得到启示之后,大理石便成为他们雕塑原料的首选。希腊人创造的塑像当中最多的是年轻人的形象,现存的有100座之多。既有完整的也有不完整的,其中最高的达3.35米,遍布希腊各地。这些塑像均为裸体,而且模样相似,神态雷同。一个个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双手握拳、双臂向下、肩宽腰细、腿壮臀圆、肌肉发达、年轻英俊,很像是健美运动员。他们当中有的可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但更多的则是他们对崇拜偶像(如阿波罗等年轻神祇或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年轻运动员)的一种向往,是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至于裸体的形象,与其说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希腊人相信人的灵魂是赤裸的,人在赤裸时才可以摆脱一切信仰的束缚。

一些神庙里的塑像也很有特色,例如离雅典不远的伊基纳岛上的阿法亚神庙里的一组雕像。这些雕像分别来自波斯人入侵的前后,都反映了当时战争期间的各种战斗情景,姿势各不相同,从各个不同侧面记录了战争对人的冲击和后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一个侧卧地上的武士形象,其脸上呈现出一种痛苦和悲伤的表情,既有一种无奈,也有一种深思。另一组乘战车武士的青铜塑雕则表现了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喜悦情感。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当中竖立的阿波罗神像以其健美、英俊和光彩夺目的形体成为一种光明战胜黑暗,文明战胜愚昧的象征,是这一时期塑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到了古典时期,希腊的雕刻艺术已经完全摆脱了早期的拘束和装饰特性,形成了具有写实特色的风格,其作品的成就达到了希腊雕刻艺术的顶峰,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雕刻家。今天我们知道名字的就有米隆(Myron)、菲狄亚斯(Phidias)、波留克列特斯(Polycleitos)、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史珂珀斯(Skopas)和留西波斯(Lysippos)。米隆是古典初期的雕刻家,其作品造型准确,代表作是“掷铁饼者”。它不仅表现了运动员在运动中的发达肌肉和健全体魄,也出色地解决了人体重量落在一只脚上时的重心问题,改变了以前雕刻中的直立程式。

希腊雕刻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菲狄亚斯。他设计了雅典卫城的建筑,创作了大量雕刻和装饰浮雕,创造了典雅、静穆的形象。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巴底农神庙的雅典女神像。该女神一手托胜利女神童,一手执盾,身高达12米,由黄金和象牙包以木胎刻成,其形象雍容气派、庄重威武,深得同代和后代人的崇敬和喜爱。另一座雅典娜女神持矛的雕像屹立在雅典卫城上,也高达9米,从海上就可目睹闪闪发光的镀金长矛。他为巴底农神庙创作的高大浮雕被视为古典雕刻的经典之作,尤以“命运三女神”姿势最为优美,女神丰腴的体型和柔美的动作表现得非常充分。

波留克列特为菲狄亚斯同代人,不仅是雕刻家,也是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他写的《法则》一书系统阐述了人体各部分的比例,首次提出了人和头的比例是7:1。其雕刻作品“持矛者”就体现了他的这一理论原则。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带有更多的形式方面探索,过分强调艺术的规范化,因此多少束缚了他的作品的创造,缺乏创新意识,其创作成就难以和菲狄亚斯相媲美。

普拉克西特列斯的作品以柔美、抒情为特征,能给人以诗意和美的享受。他的人物多半取材于神话题材,如潇洒的萨提尔,优雅的赫尔墨斯。最早的裸体女人像“尼多斯的阿芙罗底德”就出自他的画笔之下。史珂珀斯的作品特征主要体现在他的人物面部表情上:头部处在强烈的扭动之中,突出的眉骨,深凹的眼睛,张大的嘴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安、痛苦和渴望的情感。留西波斯是雕刻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波留克列特斯的理论,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它,提出人的头部和身体之比为1:8。他的人物既具有运动员般的强壮体魄,又表现了充满矛盾的复杂内心世界。他的代表作“赫拉克列斯”是一位正在休息的英雄形象,发达的肌肉对称着沉思的表情,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

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对希腊各城邦的征服和马其顿王朝的扩展,希腊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雕刻艺术在不同的地区则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在希腊本土,雕刻技巧更为成熟,这时期的作品“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动作飘飘若仙,舒展自如,生动自然,其形体面向大海,立于坐落在悬崖峭壁上的船首形底座上,周围环境浑然一体,交相辉映。另一代表作“米洛斯的阿芙罗底德”也以其柔美的表现力而亟具感染色彩。黎巴嫩出土的石棺浮雕“亚历山大石棺”不仅在雕刻的技法上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无论是人物还是马匹或是其他动物都表现得十分逼真,而且从内容上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亚历山大大帝头戴希腊神话中大力神虎皮徽章和埃及羊神阿门的羊角,成为西方君主中第一个被同

时赋予分别来自东、西方文化神圣象征的人。

埃及地区的雕刻主要以世俗人物为表现对象,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些市井小人物,例如流浪汉、渔夫、乞丐和醉汉等。这些作品着重刻画生活细节,如“小孩与鹅”,写的是孩子和家禽一起嬉戏的情景,十分生动有趣。小亚西亚地区的雕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希腊艺术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它的柏家摩斯是当时希腊化地区的重要文化中心之一。史珂珀斯的艺术风格在这里随处可见。“柏家摩斯宙斯祭坛”的祭坛浮雕表现了众神与巨人之间的战斗场面,而“垂死的高卢人”、“杀妻后自杀的高卢人”则表现了异族人失败后的痛苦和悲伤以及顽强不屈的个性。另一个著名的雕塑学派位于爱琴海上的罗德斯岛。它以雕塑出矫健有力的男性人体和长衣飘拂的女性形象著称。前者的代表作“在祈祷中的男童”雕法精良,男童的表情生动。后者的代表作是名闻遐迩的“米洛斯的维纳斯”,也即断臂维纳斯。19世纪之前它一直躺在爱琴海上的米洛岛上,当时它的发现曾经震惊西方世界。女神像两臂已经失落,因此而引起许多人的猜测和遐想。有的人认为原来的手拿着两只金苹果,有的认为是拉着下身的衣裙,有的认为是指向前面的小神丘比特。女神的手臂虽已失落,但头部和身躯保存完好,形态优雅,形象迷人。上身裸体,下身裹裙,体现了一种健康、活泼的气质。除了以上两种雕塑外,这个流派还以人物群像和高大雕像闻名于世。“拉奥孔群像”取材于特洛伊战争的一个神话故事,说的是特洛伊的祭司拉奥孔识破了天神帮助希腊人的阴谋,结果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被海神派来的巨蟒缠死的故事,其群像雕刻逼真,表情生动,拉奥孔父子和巨蟒搏斗时的痛苦和勇敢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了写实主义的倾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罗德斯巨人像”是一尊用青铜铸造的太阳神像,高达34公尺,因其宏大壮丽而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6. 希腊的科学成就

希腊文明在人文科学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在自然科学上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为西方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指明了初步的方向,主要表现在天文、数学和地理三个学科中。

希腊最有名的天文学家叫做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公元前310—230)。他是萨摩斯人,写了一本名为《论月亮及太阳之大小及其与地球之距离》的书,提出了太阳中心说。他在书里声称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的行星,都是按照圆形的轨道围绕太阳运行的。他的这种提法不够准确,把椭圆形轨道当成了圆形轨道,但是在当时这已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了,他也因此被称为“希腊时代的哥白尼”。另外一个天文学家是希帕卡斯(Hipparachus,约公元前160—125)。他除了发明了观测天象的天文仪以外,还尝试用几何推理解释太阳的表象运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地球中心说。他的这一理论为以后的托勒密所继承和发展。

希腊时期的数学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最有名望的数学家首推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30—275)。他写的《几何原理》涉及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其他数学领域,运用了严密的推理、运算和例证,逻辑性强,论证有力,从而奠定了古典几何学的基础,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几何学的教科书。我国早在明朝时期就由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该书翻译成中文,成了最早翻译过来的西方名著之一。

另一个著名科学家是阿基米德(Achimedes,公元前287—212),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到数学和物理两个方面。他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计算理论的探讨上面。他利用圆的外切和内接96边形计算出来了圆周率,并求出了计算球体、圆柱体和复杂立体的体积、表面积和周长的公式。在推演公式时他所用的方法已有现代微积分的雏形。对物理的贡献主要是在力学上面,他不但

证明了杠杆的平衡条件,提出了杠杆原理,更为重要的是发明杠杆、滑轮和螺旋等机械装置。他还提出并证明了著名的阿基米德定律——浮力定律。

欧几里得的学生阿波罗尼斯(Apollonius,)是圆锥曲线的创立者。他在《速度法》一书里说出了比阿基米德更为精确的圆周率。在《圆锥曲线》里他系统地论述了圆锥曲线的性质,并对坐标制和曲线方程做了研究。他在圆锥曲线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对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乃至笛卡尔建立微积分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地理方面希腊文明也有很大的成就。这个领域里的杰出科学家是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公元前276—193)。他爱好广泛,勤奋好学,文理兼治,博学多才,触类旁通,于文学、哲学、史学、数学都有所造诣,但最有成就的还是在地理学科方面。当时他搜集到不少古埃及的地理测量资料,同时又获取了希腊各地航海地理的信息,按照地球为一球形的原则,通过数学等科学方法,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建立了数学地理学。他在其撰写的《地理学概论》里第一次使用了“地理学”这个名词,描述了地球的形状,并准确地将地球分成了5个地带,绘制了较为完备的地图。他根据日晷仪观察到的夏至日太阳阴影在两个地方之间的差距,计算出地球的周长为约39 690公里,和实际值(约40 008公里)的差别很小,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说埃拉托色尼在地理学上的成就已为地理学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章 罗马文化

罗马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另一重要源头。意大利的罗马是罗马帝国的发祥地,是西罗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罗马文化的发源地。

意大利所在地阿平宁半岛三面环海,是地中海北部的三大半岛之一,其海岸线较为平直,岛屿较少,缺少良港。北部多山,南部则较为平坦,中部和南部多河流,各地之间的联系也比较便利。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境内多火山灰,土壤肥沃,加之气候良好,雨水充足,宜于农业生产。意大利一向以其小麦、大麦等谷物和葡萄、杏等水果闻名于世。

意大利境内最古老的居民是利古里亚人(Ligurian)。公元前2000年前后意大利人祖先印欧人由东北方迁入,拉丁人即其中的一支。几世纪以后约公元前1200—1000年,第二批印欧人部落进入了阿平宁半岛。又过了约一个世纪伊利里亚人(Illyrian)和伊特鲁利亚人(Etrusco)先后来到了意大利,然后便是高卢人(Gaul),跟在后面的是希腊人。这些不同民族的移民在这里定居下来或是设立了自己的移民点,使意大利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居住地。一般来说罗马的三个古老部落拉姆尼斯、提特尔和卢瑟勒斯,代表了当时三支最大的移民群体,即拉丁人(Latins),莎宾人(Sabians)和伊特鲁利亚人。这些不同种族人的融合,乃是今天意大利人的祖先。

一、罗马帝国的建立和兴衰

最早的罗马是由一些村落合并而成的。村落散布的地带离海岸不远,土壤肥沃,适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公元前1000年左右已有一些部落就出现在这里,到了公元前800—700年时,一个称作“七丘同盟”的联合组织出现了,后来又有些其他组织参加进来。他们在周围修建了城墙,开辟了广场,逐渐形成了早期的罗马。

罗马的最早时期称为“王政”时期,为父系社会。血缘相近的家庭组成氏族,氏族共同占有土地,成员相互有继承权,有共同的宗教节日和墓地。传说有300个氏族、每十个氏族组成称为“库里亚”的胞族,十个胞族组成部落,最后三个部落构成了“罗马人民”整体。人民大会按胞族为单位召开,称为库里亚会议。该会议可就战争、死刑、选举“王”和其他重大问题做出决定。王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审判长,但他的权力又有限制,例如无权支配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可以被罢免,由氏族首长组成的元老院和王一道处理公共事务。恩格斯认为,王政时期的罗马社会具有军事民主制性质,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

从公元前7世纪起,罗马人开始使用铁器,商品交换也开始出现。由于国力的增强,他们经常对外发动战争,扩大自己的领土面积。有一个传说,国王图拉斯·何斯提留斯当政时罗马就消灭了另一个小国阿尔巴,后来伊特鲁利亚人势力日渐强盛,一度成为罗马的统治者。随着氏族公社趋于瓦解,家长制和奴隶制开始形成,其重要标志是下层“平民”的产生。这些人通常不是氏族里的人,无权分得公有土地,多数依附于贵族,向他们租地借贷。公元前6世纪时,这些遭受压迫的平民在数量上已居优势,其中一小部分劳动致富,拥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人开始强烈反对贵族特权,于是出现了王政时期第六王赛尔维·图里阿的改革。他的改革主要是采用财产标准把罗马人分成了五个等级。用地域和财产代替了以前的血缘和贵族统治,用财产制度代替了家世出身。虽然如此,富家贵族

仍然处于重要地位,只有少数富有平民可以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公元前 510 年,罗马爆发了反对暴君伊特鲁利亚人小塔列文的斗争,导致了王政的废除,成立了共和国,从那以后平民和贵族的冲突日益加剧。这种冲突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第二阶段以土地和债务为中心。在第一阶段里由于广大平民开展“撤离”运动,携带武器离开罗马,拒不应敌,迫使贵族让步,允许平民当选具有执政官权力的军政官。

在第二阶段负债平民只以财产而不是人身去还债,实际上废除了债务奴隶制。这一斗争成果缓和了罗马的阶级矛盾,扩大了共和国的社会基础,从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平民的利益。公元前 4 世纪罗马通过军事占领统一了意大利,并在几十年时间里打败了伽太基,以后又把地中海沿岸国家希腊、马其顿纳入到了它的版图。在被占地区罗马建立了行省制度,到公元前 2 世纪后叶,罗马帝国已拥有 9 个行省,其中西部 6 个,即西西里、撒丁尼亚、科西嘉、西班牙、山南高卢、阿非利加(非洲)。东部 3 个,即伊利里亚、马其顿和西亚。这样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空前庞大的罗马帝国终于建立起来了。

长期战争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大量的奴隶,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矿山开采劳动。但也有少数有文化的奴隶被选去充当教师、医生和乐工。奴隶的地位十分低下,生杀之权都操纵在奴隶主的手里。奴隶主的残酷压迫逼迫奴隶们奋起反抗,先后有西西里岛和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起义,给奴隶主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公元前 83 年罗马军事统帅苏拉(Sulla)凭着手里的军队镇压反对派,建立了独裁统治。苏拉死后,凯撒(Caesar)和庞培(Pompey)、克拉苏(Crassus)形成了“前三头”同盟关系,具有代表骑士、平民和军队反对贵族斗争的意义。凯撒由于征服了高卢,其兵力、财力以及威望都大为提高,文治武功,显赫一时。他乘机击败了庞培,占领了埃及、叙利亚、小亚西亚和西班牙等地,建立了他的独裁

统治,成为不是君主的君主。他对元老院进行改组,并扩大了公民权,这些措施触动了元老贵族的利益,同时也威胁到了罗马的共和民主制度。公元前44年他被以布鲁都(Brutus)为首的反对派刺死。

继凯撒掌权的是执政官安东尼(Antony)、凯撒的侄孙屋大维(Octavian)和骑兵长官雷比达(Lepidus)。他们于公元前43年的10月组成了“后三头”同盟。三人中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势力最强,双方最终发生了冲突,以安东尼失败自杀而告终。从此屋大维一人执政,元老派复辟梦想破灭,罗马共和国最终不复存在。

屋大维的统治称为元首制,他自称不是君主而是所谓的“第一公民”,意思即为元首。他一人集军事、行政、司法和宗教大权于一身,并接受“奥古斯都”(Augustus)和“祖国之父”的称号。在他死后,其养子提比略(Tiberius)继承其位,改称皇帝,历经四帝后为其他家族所取代。尽管帝位多次易人、政权屡屡变更,罗马帝国却一直维持到公元5世纪。

罗马帝国后期,社会上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全面爆发,农村城市不断衰落,内战接连发生,帝国政府全部瘫痪,军队操纵着政权,一连杀死了多个皇帝。后虽经改革,但罗马帝国在战争、政变和起义的风暴里日趋衰败,已不能实行有效的统治。公元476年,帝国的日耳曼雇佣兵首领奥多亚克(Odoacer)推翻了最后一个罗马皇帝罗慕洛(Romulus),正式宣告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此之前80年左右东罗马帝国已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因君士坦丁堡为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故又称拜占庭帝国(Byzantium Empire)。

二、罗马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

罗马人由于拥有肥沃的土地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很早的时候就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农业和其他生产相比显得更为重要,但由于不能满足罗马人的需要,在更多情况下,他们必须依靠战争来夺取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战争需要军队,服兵役是罗马男性公民最

重要的义务。不管他们家庭情况如何,罗马公民从小就接受军训,以后则要被分到常规军事组织——百人团里,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为国家效命。

罗马人的生活主要奉献给了他的军事职责。他们从小就培养了高度的组织纪律和对权威的尊重,甚至连家庭关系都带有这种特性。在一个家庭里,父亲具有绝对的权威,其他人都没有法律权力。他自己可以占有财产,决定儿女的婚姻,甚至要求儿女为他提供服务。无视一家之父的意愿便是一种叛逆和对父权的亵渎。相比之下,女人就显得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她们可以轻易地被休掉,永远在父亲、丈夫和儿子的阴影下生活。但她们并不像东方女人那样固守闺房,男人们对她们参加些社会活动乃至接受些基础教育都并不反对。这是因为家务事大都由奴隶们承担,女人们的空余时间比较多的缘故。

罗马人的名字受命名法的限制,体现了一定的宗教关系。例如男孩名包括三个部分,即中间名代表宗族,姓氏代表家庭,本名代表他自己,而且只有15个本名可供他选择。女人的名字则取宗族姓名的女性形式,如凯撒的全名是该尤斯·儒略·凯撒,女儿的名字叫儒略亚而没有教名。

在罗马的社会生活里,奴隶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从最卑下的劳役一直到高级的土地监管、记账、教书和图书复制。罗马公民因此得以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来进行各种社交和娱乐活动,例如游戏、宗教仪式、澡堂闲聊。有时他们会参加豪华的酒宴,观看残酷的格斗或人兽之间的搏杀。有时他们也会和家人团聚在一道弹琴读书、促膝谈心。他们的生活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变得比较优雅,更加重视教育和生活本身的文化内涵。所有贵族子弟都接受拉丁文的阅读和写作教育,并受到辩论的训练。他们经常举行家庭聚会,让孩子朗诵诗文,偶或贵族本人也会宣读自己的作品。这些当然只是上层社会贵族家庭中的一幕,对于大多

数市民来说这种文化生活还只是一种心向往之的奢求。

罗马人的房屋比较高、宽敞,大都用石头砌成,但光线和通风都不好,也没有什么装饰和其他生活设施,个人生活质量不是很高。罗马的市政工程建设却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罗马帝国后期的城市经过了科学规划,街道排列有序,纵横交错,宽敞舒适。城镇一般都分为4个正方形或长方形部分,每一部分都有明确的功用,如政府机构、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它的市政供水系统特别令人赞叹,其导水管显示了高超的工程技术,有些可以将水输送到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他们建造的桥梁也是这样,有些直到今天还保存完好,表现出了精湛的工艺水平。

三、罗马人的文化成就

罗马人通过武力征服了希腊和其他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帝国,但在文化上却不得不对希腊称臣。希腊文化的影响在罗马帝国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并渗透到了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先后征服了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更广泛地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随着奴隶经济的发展,逐渐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文化框架。这种文化体系主要由宗教神话、文学、建筑艺术、哲学和史学等方面组成。

1. 罗马人的宗教和神话

在公元前2到3世纪之前,罗马文化在伊特拉里亚(Etruria)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早期罗马宗教的神祇没有人形,只是些神灵,其仪式简单、机械,缺少思想内容,不能对一般人生活和道德产生什么影响,而只是一般性地称颂神的恩惠,主要集中在田野生活和个人家庭上。他们相信的家庭神包括保护神(即家庭的监护者)、阴间诸神(即祖先的精灵)。家神即保护家庭财产者,如维斯太为管理家灶者,两面神伊阿诺斯是门神,农业诸神包括拉

瑞斯——农业和田野神,刻瑞斯为主管谷物的神,波莫拿为主管果园的神,法乌诺斯为主管动物的神等。罗马人对这些神灵采取了一种非常恭敬、虔诚的态度,一家之父的职责就是充当家庭祭师,主持抚慰众多守护神的仪式。这些仪式包括日常祈祷、烧香以及饮奠酒,但到忙时则只要念念诸神的名字以示崇拜就行了。

随着罗马势力的扩展和巩固,国家采取措施对神灵的设置进行了整顿,将分散和设置上带有一定任意性的诸多神灵统一到1—3个神上。他们分别是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和密涅瓦(Minerva)。朱庇特是主神;朱诺是他的妻子,主管工艺和智慧的女神;密涅瓦相当于希腊神话的雅典娜,为守护和保卫手工艺、医术、乐师和诗人的女神。后来罗马神话又引进了些其他的神,主要有玛尔斯(Mars)——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阿瑞斯(Ares),墨丘利(Mercury)——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以及畜牧之神。罗马宗教还从东方宗教当中吸收了营养,例如埃及神话里的生殖女神伊希斯(Isis)、冥神奥西里斯(Osiris)、波斯的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s)、小亚西亚古国弗里吉亚的萨巴神(Sabazius)和叙利亚的阿塔伽神(Atargatis)都先后传到了罗马,受到许多人的喜爱。特别是密特拉神在一段时间里曾经风靡一时,为以后的个人崇拜打下了基础。没过多少时间,凯撒在遭到暗杀以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受到了神一般的崇拜。屋大维上台以后也利用人们崇拜神的心理,极力宣传他自己,一时间屋大维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成为神一般的人物,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罗马官方宗教由祭司团主持,其功能包含宗教事务的记录和管理,监管祭品的焚烧,通过观察飞鸟和检查祭品动物内脏的方法来占卜未来等。每到神祇纪念日,通常都有丰富多彩的节日安排。

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合到罗马文化里。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罗马宗教逐渐完善起来。朱庇特和宙斯、朱诺同赫拉、密涅瓦同雅典娜的地位和作用开始等同。这些神尽管

带有些官方性质,却并不是强制的,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确定他信仰什么。或许由于这个原因,罗马宗教虽然看上去比较混乱,但它却提供了一种稳定和安全感。每当一个人碰到了困难或危险,他就会到神祇那里找到精神安慰。然而伴随着一系列征服的胜利,罗马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多,道德观念却每况愈下。虽然屋大维上台后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大力推动对他本人的崇拜,想通过此举来恢复罗马人的道德活力,却收效甚微。只是从那以后罗马社会对英雄的崇拜渐渐成为一种风气,每年都不惜花费大量的感情和精力去称颂一位征服者或领袖,而不再循从宗教仪式,逐渐开创了西方独裁统治的先河。

罗马宗教对哲学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斯多噶主义哲学就包含了上帝和人的关系这样一些内容,新柏拉图主义更是包容了各种信仰,其中就有一神教的宗教思想。基督教的诞生重申了一神教的主张,不允许向任何异教的妥协,也不允许其他思想的存在,所谓三位一体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也体现了一种哲学倾向,可以视为宗教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例子。

2. 罗马人的建筑和艺术成就

罗马帝国在征服了地中海一带的国家和地区之后称霸一时,所向无敌。为了炫耀其国力的强盛,它花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建造各种大型的公共建筑物。它们当中有古罗马广场(the Forum)、万神庙(the Pantheons)、圆形露天竞技场(the Amphitheatre)、神殿(Deity Palace)、大会堂(Great Hall)、柱廊(Pillard)、拱门(Arch)、剧院(Playhouse)、圆形剧场(Colosseum)、凯旋门(Triumphant Arch-es)、纪功柱(the Columns of Emperors)等。

最大的建筑物当属韦帕芟至狄时代留下的大圆形露天竞技场。这座建筑分为三层,环以列柱,可容观众5万人,即使在今天

看来也不失为一座壮观的体育设施。它对拱券的运用具有相当高的技巧。整个体育场共计有三层拱券,层层相叠,下面一层供人们进出,上面两层则用作休息。这三层拱券外形各不相同,分别由多利安式、伊奥尼亚式、科林斯式三种柱式装饰拱券门,第三层上面还有一层饰有半圆柱的围墙。

罗马人非常注重柱式建筑,这种建筑主要是继承了古希腊的建筑传统。他们在希腊多利安柱式的基础上形成了罗马多利安式建筑模式,后来他们又吸收了希腊爱奥尼亚柱式的优点,将它发展成为一种集合柱式。古典柱式在罗马就由原来的3种变成了5种,成为西方古典建筑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在建筑上的另外一项重大成就是拱券的广泛应用。以前拱券在建筑上只是偶尔用之,罗马人将其与柱式建筑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几种不同的拱券,既有半圆形拱顶,又有四方拱顶和穹隆圆顶,既为建筑物内部提供了宽阔的空间,又使建筑物外部更具气势,开创了建筑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万神庙是拱顶建筑的代表作,其内部为一宏伟的圆形殿堂,顶部是穹隆形屋顶,圆顶直径达33米多,高达42米,用砖和三合土砌成。墙四周没有窗子,而由屋顶中央的一个直径9米的圆洞提供采光。匀称的光线在洞内形成了一种静谧和谐的氛围,巨大的圆顶仿佛悬于空中,成为头顶上的又一重天穹。凯旋门为狄托镇压犹太人起义后建造,以便迎接胜利归来的战士和将军。它用云岗石砌成,拱门上刻有歌功颂德的文字,饰有浮雕。君士坦丁凯旋门是后期凯旋门的代表作,呈三跨式模样,两边辅以4根复合柱装饰,柱基和门墙都是些装饰浮雕,颇为壮观,只是稍显堆积。耸立在罗马广场上的图拉真纪功柱则配有长达200多米的环式浮雕,盘旋而上,高有27米,表现了罗马皇帝图拉真进行历次战争的情景。

罗马帝国由于打仗的需要非常注重道路和引水工程的建设,其建筑风格以坚实耐用为主,不大在意其外表的美观。公元前

312 年,罗马建成了它的第一条全长 16 公里的地下引水道,将水引进了罗马城内。罗马城里共有 11 条引水道,其中 9 条建于帝国时期,令人惊叹的是有 3 条至今还在使用。罗马的公路建设也非同小可,它的第一条公路叫做阿庇乌斯路,全长 212 公里,上下共计 4 层,底层是石块夯实的路面,第二层是灰土和石块混合铺成,第三层是混凝土,第四层是平整和合缝的石块。另外还有一条北上的公路,通往北部重镇阿里米昂,长有 368 公里,也很结实。这两条公路都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水平和质量。

此外罗马帝国的神庙也很有特色。早在公元前 509 年,罗马人就建成供奉朱比特、朱诺和密涅瓦三神的卡波托林大神庙。从建筑风格上来说,它还属于木石结构的伊达拉里亚式的。以后又相继出现了萨冬农神庙、塞勒斯谷神庙、麦库里商神庙、阿波罗太阳神庙等。到了公元前 4 世纪前后,罗马神庙受到了希腊建筑的风格影响,从正方形向长方形过渡,采用了希腊柱式模式。奥古斯都时期,建造了战神玛尔斯神庙,这座位于罗马奥古斯都广场的中心建筑,为一色的大理石结构,高大的台阶上面竖立着 8 柱门廊,列祖列宗的塑像依次排列在柱廊间、殿堂里、和凹廊空间当中,威严神武,庄重肃穆。

就艺术和绘画而言,当时的中心显然在罗马和亚历山大城,那里集中了罗马帝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工匠,创建了许多一流的作品。然而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精品并不多。而一些边远省份,由于一些偶然因素反倒会出现一些例外。庞贝的一座乡间别墅里发现的壁画“狄奥尼索斯的神秘崇拜”就是件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一幅画的画面是一个新娘在另一位年长妇女的凝视下梳妆打扮。另一幅画的画面是女神阿里昂德依附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大腿上,表现了一种崇拜和献身的精神。画面层次分明,人物形象清晰,既具有高超的想像力,又表现了世俗社会的生活场面。这种宏伟壮观的大型壁画即使在庞贝这样经常看到古代艺术品的

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

比较而言,小型壁画或其他的装饰画却屡见不鲜。罗马时期的民住房屋一般都设有祭奉神灵的地方,起居间或客厅里通常都挂有酒神巴克斯(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画像,卧室里则放有爱神维纳斯画像。不同题材或出处的绘画显示了房屋主人的情趣和身份,如希腊神话一般为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喜爱,而装饰性的绘画则更多地受到新兴的有钱阶层青睐。当时的罗马、庞贝等城市里,绘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绘画的人显然得到了统治阶级或其他有钱人士的赞助,不仅数量增多,品种也有所增加。历史场面、人物肖像、山水画、乃至日常生活场景都是常见的绘画题材。随着喜爱艺术品的人逐渐增多,购买画像的人也越来越多。艺术画廊开始出现,一些名画的价格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一幅公元前4世纪的画在公元前1世纪居然卖到了36000德拉利,而当时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也不过卖到500德拉利,而一个自由农工一年的收入才250德拉利。尽管如此,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似乎仍然非常低下。无论是西塞罗还是辛尼加这样具有很大影响的文人或是其他统治阶级成员都没有把绘画和雕塑当成一种艺术形式,或是把画家当成艺术家。在他们的眼里,画家和雕刻家同铁匠、木匠这些人差不多。比较起来,建筑家们的地位要高得多。他们不仅被当成了艺术家受到了尊重,而且成为一种集各种知识和才干、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象征。这种高估或许不无道理,因为罗马时期的一些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则说明当时参与它们设计和建造的人确实具有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

在雕像艺术方面罗马人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罗马人的早期雕像带有自然主义特征,艺术成就并不高,后来在希腊艺术的影响下走向形式的多样化,面部表情比较生动。“奥古斯都像”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奥古斯原型矮小跛脚、体弱多病,但在雕像里却被表现为一个高大健美的统帅形象,具有运动员的体魄。他的脸庞也在形似的基础上被理想化了,显然是希腊雕刻艺术的理想化原

则在这里起了作用。罗马帝国后期的雕像进一步突出了个性和内心世界的表现。例如“卡拉卡拉像”表现了一个凶狠紧张而又冷酷无情的暴君面孔,眉头紧皱,眼神不安。另一座“马尔克·奥里略骑马像”则表现了一位君主的形象,面带沉思,具有一种消极、静观和颓废的神态。这座铜像由于符合基督教的学说而得以保存下来,对以后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人物雕像外,罗马的雕刻还有专门反映公共场面和历史事件的,布置在神庙、祭坛和凯旋门上面。这种浮雕到了奥古斯都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和平祭坛”(The Altar of Peace)。祭坛四周用大理石砌成,石上布满浮雕,下面刻有栏杆,上面刻有花环,代表着和平,外壁上雕有花草,反映着和平的景象。此外还有奥古斯都巡视帝国各地的情景。

除此以外,罗马艺术还包括绘画创作。早期绘画多记载具体历史事件,用以装饰公共建筑和私人房屋,保存下来的很少。我们今天了解的主要是所谓的庞贝壁画。由于火山爆发,庞贝城曾一度被埋没,长达1 000余年,直至18世纪才被发掘出来。一些壁画由此而得以重见天日。这些壁画的风格各不相同,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们把这些风格迥异的壁画分别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种风格。其中第一风格是将色彩涂绘在建筑的细部上面;第二风格则在平面墙上直接描绘建筑细节,并插进一些情节性绘画;第三风格更强调墙的平面性,绘制的对象都是些精致的静物;第四风格将透视效果和装饰纹样结合在一道,人物活动同景物细节描写互相穿插,惟妙惟肖,将色彩和动感融于一体,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被称为“庞贝的巴洛克”。

3. 罗马史学与法制

罗马文化领域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史学。从公元前3世纪末起,仿效希腊的罗马历史学开始出现,较早的有非比阿·皮克托尔

用希腊文写的年代记和一些编年史 ,加图用拉丁文写的《创世纪》罗马史。

罗马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史学家是李维(Livy ,公元前 59—公元 17 年)。他和屋大维是同时代人 ,并和他保持了长时间的友谊。关于他本人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是很多 ,只知道他可能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 ,年轻时去了罗马 ,没有担任过什么公职 ,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伏案疾书。他所写的《罗马史》卷帙浩繁 ,长达 142 卷 ,现存 35 卷 ,至死未脱稿。他写史的目的是追述罗马帝国创业的艰辛 ,以便唤起国民爱国的热忱 ,但他取材宽泛 ,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刻画过于细致 ,并附以许多神话传说 ,以致行文繁沓 ,但也因此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史料。书的前 5 卷记述了罗马城建造经过 ,历代国王、共和制早期的传说以及公元前 390 年被高卢人征服之前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书的 6—15 卷描述了和伽太基冲突之前意大利全境收复的经过 ,书的 16—30 卷记载了前两次布匿战争的情形 ,书的 31—45 卷是有关马其顿和其他东方战争 ,书的 46—70 卷写了社会战争爆发之前的以后这段时期 ,71—90 卷关于苏拉之死 ,91—108 卷关于高卢战争 ,109—116 卷从内战写到凯撒之死 ,117—133 卷有关安东尼之死 ,134—142 卷写奥古斯都在公元前 9 年的统治。我们今天的存书是从中世纪所知道的那些资料当中保存下来的。

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 ,公元 55 ? —117 ? 年)是元老贵族里共和思想的最后代表人物。有关他的生平后人了解得不多。只知道他出生于罗马的一个有身份人的家庭 ,从他著作的只言片字里我们得知他曾经当过军队的高级将领 ,娶了当时执政官裘留斯·阿格里古拉的女儿为妻 ,以后依靠岳父的庇护而官拜封疆大吏 ,当上了不列颠的总督 ,甚至还出任过一个任期的执政官。他的主要著作《编年史》和《历史》分别记述了从奥古斯都到尼禄以及弗拉维王朝的历史事件。他的《日耳曼尼亚志》描写了日耳曼人的原始刚健

风俗,有所指地对照了当时罗马社会的萎靡不振和每况愈下。

他的著作措词十分尖锐,揭露了罗马专制政体的黑暗,对后世反抗独裁统治颇有影响。他对历史人物的介绍,尤其是对统治者的描述通常都比较严厉并着重揭示其阴暗面,以对后人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例如在对提比略的叙述里,他主要把其晚年的那些暴行和劣迹一一陈述出来,而对其以前的赫赫战功只是稍加提及。他的这种独特的历史叙述视角和手法使得他的著作在他那个时代受到了很多冷落,以至于在他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到了中世纪都鲜有人问津。幸运的是意大利的薄伽丘发现了他的《编年史》和《历史》的部分手稿,得以昭示世人。从那以后,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开始对他的作品关注起来,并显示了越来越多的兴趣。

在史学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是公元前2世纪的波里比阿(Polybius,公元前202—120年)。此人原是希腊贵族,和塔西陀是同代人,到罗马后成了罗马国家制度的热烈拥护者,写了一部长达40卷的《通史》,综述公元前264—145年的希腊、罗马以及地中海东部的历史,记录了从布匿战争(Punic War)到马其顿战争期间罗马帝国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这部书现只存前5卷。从这5卷书中,我们可看出作者注重历史上的因果关系,重视历史对人的教育。另一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公元46—120年)也是罗马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传记作家。他写的《希腊和罗马名人传》则列举了他认为气质和命运相似的希腊和罗马名人,引用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是一部较有影响的史著。

罗马帝国的法制建设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不容忽视,这体现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6世纪长达1000年之间所有的罗马法律上面。在罗马文明的前期,罗马社会尽管还很落后,阶级和阶级矛盾已经出现,这主要表现在普通平民对贵族滥用职权的不满。那时虽然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原则来约束贵族和平民的行为,但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一旦出现争端,吃亏的还是平民,因为那时候还没

有正式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平民们强烈地要求制定出一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人身安全。经过长时间的斗争,贵族们被迫做出了让步,公元前450年,《十二铜表法》终于制定了出来,它分门别类地对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有关问题做出了规定。

这部法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规定了诉讼程序和法律规则;第三部分列出了有关债务的规定;第四部分规定了父权和家长权;第五部分规定了监护、遗产和遗嘱;第六部分规定了契约、贸易和各种财产权;第七部分规定了土地的分配和转让;第八部分规定了伤害的鉴定和处理办法;第九部分是有关宪法的规定;第十部分是神圣法;第十一部分是婚姻法;第十二部分是对诉讼法的一些补充规定。虽然这部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很多方面还很落后,例如同态复仇、巫术惩罚、对债权人的残酷处理、不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通婚等方面都有这种情况,但它作为罗马的第一部正式法律,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划时代意义,从此以后在有些方面(例如审判和量刑)都有了依据。它打击了贵族专权,赋予了平民最起码的生存权。此后,由于平民不断开展反对贵族的斗争,新的法律也陆续出台:公元前445年通过的卡努利乌斯法案允许平民和贵族通婚;公元前326年通过的彼提留安法废除了债务奴役制;公元前287年通过的霍腾西乌斯法案规定平民大会拥有最高立法权。这些法说明所有的罗马公民在法律上已处于平等地位。

虽然罗马的公民法律在公元前3世纪已大体完备,但它的适用范围还只限于拥有罗马国籍的罗马公民,对于那些住在罗马的外国人来说,还无法享受到这些法律提供的权益。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起罗马就开始为住在罗马境内的外国人考虑一些办法来解决他们在涉及到纠纷时碰到的问题。这些办法既不同于罗马本国人的法律,也不同于这些外国人自己的法规。久而久之,一套仅适用于外国人的罗马法律也就形成了。这样罗马实际上就有两套不同的法律,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法律称作公民法,而适用于外国公

民的叫作万民法。

罗马法律的完善还同法律专家的作用分不开。这些人一般出自平民,对法律比较熟悉,不但向平民,也向执政官和法官提供咨询。但他们的意见在早期并无法律效力,这种状况持续到奥古斯都授给了他们“解答法律特权”才有了改变。在这些法律专家当中最为出名的共有5人,他们是盖乌斯、伯比尼安、保罗斯、乌尔比安和莫迪斯蒂努斯。他们既对公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作了解释,也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为罗马法律的完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3世纪开始,罗马的法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在212年罗马境内所有的自由民都获得了公民权,原先区分出生地的公民法和万民法之间的差异也就不复存在。由于法律的趋于统一,罗马法也就有必要进入汇编阶段。虽然这种汇编很早就开始了,但大规模地清理和编撰工作还是在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统治期间完成的。查士丁尼命令组成了一个十人委员会,对过去皇帝的敕令进行整理和审定,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内容,将它汇定成册加以公布。这就是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 of Justinian),加上以后编的《法学总论》、《法学汇编》和《新敕令》,被统称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这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奴隶制法典,明确规定了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其私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在人类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用法律形式对当时社会历史和现状的总结和概括,而且由于涉及到的是私有财产的地位及其关系,它也是对以后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部法典。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

4. 罗马哲学

罗马人的哲学在开始阶段受到希腊哲学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很大影响,但罗马人更加强调实用。罗马哲学家们往往调和

各派哲学思想,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倾向。

伊壁鸠鲁派的中心思想是对快乐的强调。该派把快乐看成是最高善,把经过欲望的推动、追求并得到的东西视为一种人生目标,把摆脱无知愚昧所造成的恐惧、增加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当成生活的乐趣。罗马哲学家兼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9—55)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为《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这是一部长达数十万言的诗体哲学著作,力图让人摆脱封建迷信,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具有积极的意义。他在书里认为,灵魂是一种特殊物质,它的粒子和肉体粒子同时存在,都属于物质范畴。当死亡来临时,灵魂粒子和肉体粒子失去了联系而散布开来,与人的躯体同时死亡。通过这种论述,他阐说了人不必怕死的道理,表明死亡是不能经验的,因此也就不必害怕。另一方面,他虽然反对宗教,却承认神的存在。他同时认为,神的存在对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影响,并主张沿着一条审慎而中庸的道路前进,从而达到一种心安理得的平衡状态。这是快乐之极,也是最高的善。卢克莱修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唯物论,试图解开束缚人们心灵的宗教枷锁,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并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卢克莱修的社会历史观也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人类最初也和动物一样,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经过漫长岁月的变迁才开始刀耕火种、定居下来,逐步进入文明社会。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出现了家庭、国家,社会才开始不断进步。由于伊壁鸠鲁的大部分著作已经散失,《物性论》是研究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特别是研究原子论思想的重要资料,它对后世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伊壁鸠鲁主义在罗马帝国早期受到上层人物的尊重,但在伦理方面因为强调了感官的愉悦而受到部分人的指责,其中心地位逐步为斯多噶主义所取代。斯多噶哲学持续了5个多世纪,

其学说本身虽有多种变化,但其核心的伦理学说却始终如一。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源于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即勇于面对危险和苦难,同时对物质待遇采取了淡泊态度。这些都是斯多噶派强调的德行,正是它的这种对忍受和超然的强调,使得该学派广受人们的注意和欢迎。斯多噶的学说通过文学家西赛罗的各种活动而在罗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对斯多噶主义在罗马的实质性发展作出贡献的主要还是以下3个人,他们是西班牙裔的罗马元老院议员辛尼加,奴隶出身的埃比克泰德以及罗马皇帝马科·奥勒留斯。这3个人都对斯多噶学派的伦理学做了自己的阐述。

卢修斯·安纳乌斯·辛尼加(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出身于一个学者家庭,其父老辛尼加是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他本人生在西班牙,但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往罗马接受教育,学习修辞学和哲学。后来他在罗马政府和参议院先后供过职,尼禄上台以后不久他就辞去了公职专门从事著述。不幸的是由于牵连到一件政治案件,他还是没有能够逃脱厄运,晚年被处死刑。辛尼加一生著作繁多,既有哲学论文,又有文学剧本。他的哲学思想表现了斯多噶派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他认为,一个聪明人不会承受冤屈和侮辱,人在麻烦不断的世界上应当追求一种平和的心态,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工作应当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适当建议。人应当有放松自己的闲暇,对一些问题进行些思索是有价值的。此外对于一些道德伦理问题他也有论述,诸如幸福、最高的善、死亡的恐怖、财富等。总之他的思想体现了一种仁义,对早期基督教思想具有较大影响,有人甚至称他为“基督教徒”或是“基督教叔父”。他曾经和圣保罗有过通讯联系。

埃比克泰德(Epictetus,公元60?—140?)原为奴隶,其主人是罗马皇帝尼禄的秘书。他在获得自由之后开办了一个学校进行讲学,有不少学生。他的思想就是由他的一个叫做阿利安的学生通过笔记整理出来的。阿利安编了两本书,一本是《演讲录》,一本是

《手册》。从他讲课的内容来看,他是个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人,同时又具有坚定的信念。他坚信在英明的神灵下面应当有一个世界性政府。为了不犯错误,过上太平日子,一个人应当记住两个词,即忍耐和戒绝,这样他就可以永远不受环境的支配。他还主张人应当坚信自己的意志力量,这样他就可以克服生活当中的烦恼和悲伤。

马可·奥勒留斯·安托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21—180)作为一个皇帝,公务繁忙,之所以能够留下这些文字,和其经历不无关系。他从小过继给人,寄人篱下。当了皇帝以后内外交困,日子也不好过。这些经历促使他读书思索,从而用希腊文写了《沉思录》。全书共分12卷,主要是他的个人备忘录,掺杂着他对哲学、人生和社会的见解。虽然他在书中不时流露出一些失望和沮丧的情绪,更多的还是表现出了一种抗拒死亡恐惧、摆脱世俗烦恼、匡正时弊和不公的勇气和气魄,并试图探讨出斯多噶主义和自我反思的一些途径。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人是社会的生物,应为国家尽责,这就把斯多噶派认为人的德行或罪行是私事、不会影响别人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外斯多噶派发展了先天理念论,关于人的概念也比古典时期的学说宽宏得多。斯多噶派认为,按照某一意义来说,应该是人人平等的,他同时提出了自然法则和国家法律的区别。这对当时完全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有着安抚作用,对以后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君权神授的斗争也有一定的影响。

罗马哲学里的折衷主义主要以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为代表。他竭力反对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认为世上没有虚无且又无看不见的原子。他把斯多噶派的观点和柏拉图的回忆说掺杂起来,认为一切真实的知识都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的回忆。与此同时,他又声称一切事物都是不可知的。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上,他追随毕达哥拉斯的唯心主义看法,认为灵魂不朽,而肉体及

其享受则是低下的。他因此提出了禁欲主义观点,要求人节制肉体快乐,追求美德和心灵享受。他的思想实际上并未超过希腊人的见解,只是他善于辞令,能用生动的语言将希腊哲学通俗化,有利于普通罗马人对于希腊哲学的了解。

5. 罗马时期的文学

罗马文学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而拉丁语则是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吸收了伊特鲁利亚、希腊和高卢等语言因素形成的。拉丁语的口语和书面用语区别很大,文学语言用的是书面语,简洁有力,语法严谨。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拉丁语的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它的西方各个行省逐渐代替了当地的土语,成为正式语言,以后分别发展成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等所谓的“罗曼斯”语。罗马文学由诗歌和戏剧两部分组成,早期的文学主要是仿照希腊文学写的,有的就是希腊文学的翻版。例如号称“罗马第一位诗人”的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Andronicus)原来就是希腊人,在一次战争中被俘为奴,后因文学上的成就而被放,他遂将《奥德赛》译成拉丁文,该书因而成为罗马文学的第一部教材。另一位被誉为“罗马诗歌之父”的埃尼乌斯(Ennius)也曾模仿荷马史诗创作《年代记》。尽管后来诗歌在罗马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罗马文学中最早的作品还是戏剧。由于战争所取得的胜利,罗马的贵族们变得更加富有,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乃至手下人需要娱乐消遣。当时罗马人中间已有一些民间歌舞,加之希腊戏剧的影响,罗马戏剧便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活动。除了诗歌和戏剧以外,罗马文学还包括一些散文,主要是些游记和演讲。它们当中的一些较为成熟的作品是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的,代表作家有普劳图斯、泰伦提乌斯、凯撒和西赛罗。

提图斯·玛求斯·普劳图斯(Plautus,公元前254—184)出身于平民,早年从意大利北部来到罗马,在一个剧场工作。他曾经经

商,后来失败,便一边在作坊打工一边写作,一生写有100多部新喜剧剧本,传至今天的有21部。《吹牛的军人》描写一个贵族青年在他的奴隶帮助下从一个军人那里夺回被后者霸占的情人的故事。剧中,这个奴隶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他替主人出谋划策,不但嘲弄了那个军官,让他无话可讲,而且让他乖乖地交出了他主人的女友。《一坛黄金》讲述一位老人的黄金失而复得的故事,中间经历各种感情变化——惊喜、不安、怀疑直至把黄金送给女儿才算是平静下来。另一部作品《孪生兄弟》说的是一对兄弟自幼失散、后历经反复终于重逢的经过。他的作品善于针砭时弊,矛头指向当时社会的各种腐败现象,如淫乱、贪婪等。他嘲弄富人和贵族,同情奴隶和穷人。罗马社会的各种人物形象几乎都在他的剧本里出现过,同时他还善于创造喜剧情节,充分利用独白、旁白等手法来加强戏剧的感染力。

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统称泰伦斯(Terence,公元前190—159),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剧作家。他原是出生在北非的一个奴隶,因为人聪明而受到主人的赏识,后被带到罗马接受教育并获得了自由。他的代表作有《婆母》和《两兄弟》。前者讲一个青年生活作风荒唐,却怀疑妻子不忠,婚后生下的孩子他认为不是自己的,几经周折发现孩子的父亲正是他自己,其主题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谅解。后者描述兄弟两人对待孩子错误的不同态度。兄长米丘结婚后没有孩子,从弟狄米亚处过继一子。兄对待孩子比较宽厚,而弟则比较严厉。一次这个孩子抢了一个奴隶商的女奴,米丘开始非常生气,后来发现他是为了狄米亚才这样做的。最后狄米亚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很受感动,对孩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作者认为,宽容可以防治孩子欺骗父母。泰伦斯的作品不多,共写了6个剧本,大部分都是刻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表现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尤其擅长描写人物内心活动,作品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里,罗马整个国家缺少政治自由,一些有才干的作家的创作受到限制,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成了歌功颂德的东西,作品的质量也因此减弱了很多,泰伦斯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戏剧家。这种局面随着罗马法律的完善而有所改变,人们开始敢于对一些问题提出些看法,辩论一度非常流行,出现了以口才著称的辩论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西塞罗。同时,还有一些文笔简洁优美、具有个人风格的散文问世。除了历史著作之外,也有些政论性质的作品。

凯撒是罗马帝国的重要政治人物,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但会打仗还会演讲,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传世的作品有《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两部。《高卢战记》记载了他攻打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以及两次入侵不列颠的经过。全书文字简洁优美、前后连贯,雅俗共赏。《内战记》则描述了他战胜庞培,登上权力顶峰的情形,篇幅短小,文笔简练。这些文章虽然带有政治宣传的性质,但由于文字洗练而气度轩昂,不仅具有史料的价值,而且也是散文中的精品,在当时就是罗马人家喻户晓的名篇,以后又成为历代学习拉丁文的范本。

西赛罗和凯撒是同代人,但政见不一,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他留下的著述甚多,但均为演说辞和信件,计有57篇演说辞和864篇书信。他的文章结构严谨,辞章考究,语气激昂,富有感情,内容涉及政治、哲学、伦理和园艺等方面,是罗马散文的代表作,其风格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因此有“拉丁散文泰斗”之称。他是元老院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曾经当过执政官,是共和制度和自由的坚定不移的捍卫者,因此被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杀害。他经常是先在元老院或是什么地方进行演讲,然后经过修改后成文。他的主要作品包括《控诉伯利斯》、《反对卡提林》、《反对安东尼》等。

罗马文学的更高成就是在罗马帝国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取得的。这一时期的标志是奥古斯都的上台。罗马帝国在这段时期里

经济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文化上表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人大力提倡复古尊古,拉拢诗人学者以粉饰太平。此时的诗歌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诗人,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维吉尔、贺拉西和奥维德。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19)的全名是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他堪称罗马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他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具有高卢人的血统,最初的教育是在意大利的克雷莫纳和米兰进行的,以后又去罗马学习法律、哲学和修辞,学成后又回到他的故乡。由于他人的介绍,他认识了屋大维,并为土地的问题而上书给他,因此和奥古斯都结下了一段不寻常的关系。他一生中有3部作品问世,即《牧歌》、《农事诗》和《伊尼德》。《牧歌》的写作显然受到了希腊田园诗歌的影响,分爱情、哲理、友情和哀歌等类型,运用了对歌或独歌的形式,表现了农民厌战和消极对抗的情绪以及对和平和黄金时代重新到来的希望。虽然作品带有怀疑及感伤的色彩,但由于作品内容和形式都比较新颖,问世后曾经风靡一时,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在《农事诗》里,作者肯定了劳动的价值,描述了农村和平宁静的生活和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诗里既保留了些神话片断,也可以看到些农业常识。

诗人的代表作是《伊尼德》(*Aeneid*)。该诗计12卷,近万行,系其生命最后十余年的产物。前6卷完全仿照荷马史诗《奥德赛》,描述特洛伊王子伊尼阿斯在特洛伊沦陷后,背父携子逃到西西里,又辗转到了北非古城迦太基,遇到女王狄多,两人相爱并结婚。但由于神的旨意他必须离开迦太基去意大利重建自己的国家,致使狄多悲愤自杀。伊尼阿斯到达意大利后在神巫指引下游历地府,见到了亡父,亡父向他预示了罗马的未来。后6卷基本仿照《伊利亚特》,写他到了拉丁姆后受到国王的款待,并被许以女儿相婚配,但却激怒了早先的求婚者图尔阿斯,因而引发了一场战争,最终以伊尼阿斯杀死图尔阿斯而告结束。这部史诗写完后在

当时便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赞赏。伊尼阿斯被说成是女神维纳斯之子、朱理亚家族的祖先,也就是凯撒和屋大维的先祖,迎合了屋大维和统治阶级吹捧自己、宣传罗马帝国的需要。此外,史诗的语言艺术也很有特色,如在人物刻画上,伊尼阿斯没有为自己对于狄多的情感而无视神的命令,在爱情和责任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表现了虔诚、克制、仁爱的品质。狄多和图尔努斯作为失败者,悲伤愤慨,为了爱情奋不顾身的形象,被描写得非常生动,特别是一些心理描写十分细腻,作者还爱用幻景、梦境、寓言和讽喻等手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风格上来说,该诗比较严肃和朦胧,显示了其深沉和严肃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比较大,其文学地位堪于希腊史诗相比美。

罗马帝国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是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公元前65—8),通称贺拉斯(Horace)。他父亲是拍卖行业的职员,有些资产,他送他先后到罗马和雅典接受教育。罗马内战爆发时,贺拉斯还在希腊,后来在布鲁斯的军队里当过官,离开军队后又在地地方上当过职员,这些公职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他的家产却全部丧失。他在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开始了诗歌的创作,后来在维吉尔的介绍下认识了贵族米西纳斯。米西纳斯是当时著名的文学赞助人,不仅有钱,而且是奥古斯都的密友和顾问。经过米西纳斯的提携,贺拉斯成了奥古斯都的宫廷诗人,并且得到了一块封地。这块地位于提波附近,景色秀丽,给他带来了许多欢乐,为他很多美丽诗篇提供了精神支柱。他终生未娶,和米西纳斯维持了30多年的友谊,后来两人去世的时间只相差几个月。

他的诗歌中心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小康和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表现了中小奴隶主的理想。他的诗歌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看法,对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进行了讽刺,例如暴发户的洋洋自得,有钱人对金钱的追逐以及淫靡的社会风气等都成了他讥讽的对象。他在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抒情诗,这些诗基

本上都收集在《歌集》里,其思想内容涉及恋爱、友谊、饮酒和作诗等,体现了他的中庸享乐思想。另外还有一部分诗歌则是对帝国统治者的歌颂,替屋大维和奴隶主歌功颂德,代表作是《世纪之歌》。除诗歌创作以外,贺拉斯还有些论及文艺思想的言论被收集在一封称为“诗艺”的信里。他在这封信里重申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模仿自然之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并提出了戏剧应当宣扬公民道德、歌颂英雄业绩和爱国主义的主张。在创作方法上他强调作家应当感受生活,创作要合乎情理,作品要注意整体效果。他注重形式,强调判断力,认为形式和语言都应当仔细推敲。这些主张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过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第三位重要诗人是普布留斯·奥维第乌斯·纳索(公元前43—公元18),通称奥维德(Ovid)。他的家乡位于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上的一个山谷里,本人出生在一个富有的骑士家庭。根据他父亲的安排,他在罗马学习了修辞学,主要是为了今后当律师的需要,以后他先后到雅典、亚洲和西西里等地旅行,并且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包括著名诗人贺拉斯和普洛陪提乌斯。他在罗马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官,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他写诗只是出于一种业余爱好,却因此在那些悠闲懒散的贵族和有钱人圈子里大受欢迎,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早期的诗歌比较轻浮,但风格纤巧,表现了奴隶主贵族和上层社会的糜烂生活。这方面的作品包括《爱情诗》3卷和《古代名媛》21首。后者系用哀歌体写成,大多为作者以古代女子身份写给丈夫或情人的书信,均为离愁别恨、闺房怨语之类,思想价值不大。他的这些作品因违背了屋大维有关整顿道德的政策,也有人说他因有一首诗提到了皇帝女儿的荒淫,引起了生性多疑的皇帝的不快。他在65岁时遭受放逐,皇帝的一道命令又将他送到了黑海西岸的托密斯。在那里,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0年,死在流放地。

奥维德一生经历坎坷,始终不能得志,但他写的东西涉及诗歌、戏剧和叙事体文学等多种文体,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他写的东西诙谐风趣,富有智慧,语言简洁明了、坦直而练达,描写生动而有激情。他的戏剧构思具有想象力而在表现上却不失动人之处,他的诗歌表现手法不像维吉尔和贺拉斯那样严肃正规、寓意深刻,也不像卡图卢斯那样多愁善感、情意绵绵。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用作娱乐休闲的目的,寓教于乐。他的爱情诗歌有些矫揉造作,有的人物(例如考利娜)就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类似的原型。

他的主要作品是《变形记》(*Metamorphoses*),15卷,由250个故事组成,全部都是六韵步。故事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罗马当时的社会,集古代神话之大成,几乎包括希腊和罗马的所有神话故事,是后世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寻找素材的最佳选择。书的开头是描写混沌宇宙如何转变成井然有序的世界的,接着是一连串的希腊神话故事,再去描写埃涅阿斯和狄多、努马和伊吉丽亚、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及更近时期的一些故事,最后记述了凯撒的被害和对他的神化。书里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故事,如巴比伦的皮刺摩斯和提斯帕为爱情而殉情的故事,此外著名的故事还有日神之子法厄同的传说以及阿剌克涅变蜘蛛、金羊毛、菲勒蒙和皮格玛利翁的故事等。这些不同的故事组合在一起,并没有统一的主题,也没有多少道德和宗教的涵义和说教。但是作者通过大故事套小故事、轮流说故事、运用对话等叙事方式组成了一连串的情节,加之富于想像力,注重人物心理描写,故作品问世以后便深受欢迎,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尤为流行。

奥古斯都去世后,罗马帝国完全实行了专制制度,文学作品中的空洞颓废倾向更加明显。许多作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效法斯多噶派提倡的宁静坚忍主张,甚至有人从此走进了修道院的大门。虽然有些人还在写东西,但一般都没有多少价值。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是卢修斯·安纳乌斯·辛尼加。他以宣扬斯多噶哲

学、提倡内心宁静、克服精神痛苦而著称,他富于同情心,宣传仁爱,认为奴隶也应得到平等。除了哲学著作以外,他还写过不少剧本,代表作《美狄亚》表现了流血复仇的主题,《费得尔》描写了情欲,《特洛伊妇女》则反映了残酷的命运。他的作品多半取材于希腊悲剧,以生死、情欲、意志、罪恶和惩罚为主题,强调人的内心痛苦,并常用巫术来烘托悲剧气氛。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戏剧创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以后的影响都不算很大。

另一位著名诗人德西谬·朱纽斯·尤维纳利斯(公元60?—140?)以讽刺诗而闻名于世。有关他的生平已经难以考证,只知道他一度生活比较贫困,后来在提波尔附近得到了一个农场,生活有所改善,还在罗马有了住宅,能够款待朋友,并且访问过埃及。他传世的作品有16首讽刺诗,内容主要是对当时罗马社会的各种丑行和愚昧进行抨击。这些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冷嘲热讽、机智幽默、警句隽句,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流露出一些悲观主义情调。他的诗歌风格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和模仿者,对后世具有很大影响。

罗马文学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卢西安(Lucian,公元115—200)。他出身于一个普通人家,祖籍是叙利亚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知识渊博,恩格斯称之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他赞同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思想,称当时的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家是个“吹牛的人”、“骗子”和“各种各样的坏蛋”。他一生著述70余篇,深刻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宗教,包括希腊罗马的宗教和基督教。他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参与创建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讽刺对话。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这么几篇:首先是《梦想》,记述了他如何放弃原来的职业雕塑而著书立说的;第二是《尼格里努》,主要将雅典人的简朴、平和的生活和罗马人的污浊、奢侈的生活作了对比;第三是《文学上的普罗米修斯》,论述了他的讽刺对话的起源,如何把喜剧和对话结合起来;第四是《历史写作之路》,该

书首先对当时历史学家的一些怪僻作了批评,然后又对历史及其作者的特性进行了揭示;第五是《真实的历史》,对古代作家把编造的探险故事当成历史大加讽刺和鞭挞;第六是《德莫纳》,记述了他的老师的哲学家特性;第七是《想象》,内容包括当时希腊的一些重要艺术家的参考资料。除了这些,最重要的、数量最大的还是他的讽刺对话。这些对话显示了他的机智幽默以及对宗教和哲学当中的虚假性的痛恨。对话当中的名篇有《神的对话》,内容涉及雅典的诞生、阿波罗的爱情故事等;《死神的对话》内容包括冥神、赫尔姆斯和其他神仙的交往;《梅尼普斯》说的是一个哲学家到地狱去问一个希腊先知如何才能过上最好的生活,先知告诉他从手头上的事情做起。《出卖生命》描写各种不同的哲学信仰通过它们的代表出现在拍卖会上的情形。他的这些色彩斑斓、富有高度想像力的对话,对后世文学具有重大影响,拉伯雷的《巨人传》、斯威夫特的《格里弗游记》等经典名著无疑都从中吸收了许多营养。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出现了小说最早的形式,它就是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的《金驴记》(*The Golden Ass*)。阿普列尤斯的出生年月不详,公元2世纪前后是他的主要活动时期。相传他年轻时去亚历山大城,途中生病而得到一个有钱的寡妇照料,后来他就和她结了婚,遭到寡妇的族人非议,说他是用魔法把她骗到手的。他的这段经历难以考证,但是《金驴记》的故事情节多少和对他的这些传说有些联系。书的内容取材于希腊的民间传说,经过作者的改编后,扩展成了一个完整的冒险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位叫作路克优斯的希腊少年外出旅行时,来到了一个以魔术著称的人家里。他看见女主人吃了一种药变成了一只猫头鹰,也想学她的样子,就引诱女佣,请她将那魔药偷来给他,不料却拿错了。他因为误吃魔药变为一头毛驴,历经艰险,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后在埃及女神爱希斯的帮助下,终于复归人形。这部书描写生动,有情节、有人物,是罗马文学里最为完整的故事形式,为以后欧

洲长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

6. 罗马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

罗马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初步的机械装置,这些技术革新加上科学研究都对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农业方面来说,罗马人很早就发明了带轮子的重型犁具并使之广泛运用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对农业有研究的行家。他们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著书立说,将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对后世了解罗马时期的农业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其中最著名的有三位:第一位是加图(公元前234—149)。他所写的《农业论》是一部向他的子侄辈传授农庄管理经验的书,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时意大利奴隶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情况;第二位叫做瓦罗(公元前116—27)。他的书名也叫《农业论》。这部三卷组成的书从三个方面介绍和总结了罗马的科技成果——首先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其次是牲畜饲养的经验,第三是喂养鸟、鱼的经验。他的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罗马人的农业科技成果,是后代认识罗马奴隶种植园的重要资料来源。第三位是科鲁美拉,他的《论农务》长达12卷,各卷内容包括序言、土地和农作物、葡萄种植、土地面积和树木、饲养家畜动物、家禽和鱼类饲养、野牛和养蜂、菜园和果园管理、庄园的管理和历法、女主管职责。以上三部书对后人了解罗马农业生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除了农业以外,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科学成果。首先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Older,公元23—79)编著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老普林尼系行伍出身,一生好学不倦,锲而不舍,广征博收,兼收并蓄,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37卷的巨著。

其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动物学、植物学、医学、农业、矿业、冶金等诸多学科,摘引和参考的文献多达2 000多种,提到名字的作者有500多位,存有大量古代的科技信息,甚至还提到了中国。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他不但参考有关书籍,还经常亲临事发现场,有时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公元79年,老普林尼为了搜集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第一手资料而亲赴现场,不幸中毒身亡,为科学事业而英勇献身。

罗马人在医学方面也有重要成果。名医塞尔苏斯(约公元前30—公元45)撰写了8卷本的《医学大全》,将医学分成了饮食医药、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等三个部分,其内容涉及脸部整形、扁桃腺手术和膀胱结石手术,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另外一个著名医生叫做盖伦(公元129—199),他不但行医,还开展了解剖实验,并撰写了《解剖过程》和《身体各部分的机能》等书,为现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此外他还在生理学和病理学等方面做过研究,将神经分为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和混合神经三类,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章 犹太文化和《旧约全书》

犹太文化对西方文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犹太人创建了基督教,帮助西方人构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意识,犹太圣经成了基督教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大批的犹太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很久之前就融入到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犹太文化也因此和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融合到一块。就这个意义来说,犹太人的祖先虽然来自中东,其文化很早之前就已经是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化继希腊、罗马以后的又一重要源头。

一、犹太人的祖先和国家

1. 以色列建国

犹太人的祖先是贝都因人,和巴比伦人、亚述人以及腓尼基人一样同属闪米特族(Semite)。约公元前2 000年中叶,游牧部落哈卑路人出现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其经济水平低于迦南人,可能即为希伯来人最早的祖先。这些人后来经过和迦南人的长期斗争逐渐随着部落定居下来。住在死海以西山区南部的称为犹太人部落,住在巴勒斯坦肥沃之地的称为以色列部落。这些入侵者和土著的迦南人逐步同化,共同开发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后来,他们遭到了非利士人(Philistine)的侵略,和非利士人之间不断爆发冲突,这些非利士人以后演变为巴勒斯坦人(Palestine)。

在反抗外来入侵者的斗争中,以色列部落首领不断强化手上

的权力,加速了国家的形成。公元前 11 世纪,由民众会议选举出的扫罗(Saul)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带领所有以色列和犹太人的部落击退了非利士人的入侵,连续取得了胜利。在他死后,南方犹太首领大卫(David)夺取了王位,他将非利士人赶出了以色列,定都耶路撒冷,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犹太国家。他的儿子所罗门(Soloman)继承了他的事业,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依靠征收税赋和强迫劳役建筑起王宫和神庙,并修建起耶路撒冷城,将它确定为首都,对外则与扫罗和埃及结盟。以色列在大卫和所罗门手上强盛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圣经》将他们描绘成“英明”君主。

2. 以色列的分裂和灭亡

所罗门死后,北方分裂运动首领耶罗波在埃及的支持下发动叛乱攻陷了耶路撒冷。公元前 925 年以后,统一了 80 多年的以色列—犹太王国开始分裂成两部分,南方仍由大卫后裔统治,称作犹太,而北方则另立王朝称作以色列。

以色列和犹太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彼此削弱了力量。公元前 722 年,亚述(Assyria)王攻陷以色列首都撒马利亚,俘获以色列王和臣民 2.7 万人,以色列灭亡。犹太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千方百计进行改革,企图缓和矛盾,如把债权奴役期改为 6 年,6 年期满后债权必须付以谷物、羊、酒等物,并以耶和華(Jehova)为全国之神。犹太虽然做了些努力,但仍然不能挽救其垂亡的命运。亚述灭亡之后,继起的新巴比伦王国倾兵北犯。先是击败埃及,公元前 597 年和 590 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犹太,先后两次重兵围困耶路撒冷,并兵临城下。第二次围城达 3 年之久,犹太被迫于公元前 587 年投降。全城许多贵族、贫民均被掳至巴比伦关押起来,此即所谓巴比伦之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从此犹太作为独立国家不复存在。

3. 犹太人的出走和遭遇

公元前 538 年,波斯征服了巴比伦后,波斯王居鲁士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该城,允许其在波斯管辖之下行使自己的行政职权。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耶路撒冷得以重修城墙、重树神殿,恢复了旧貌。公元前 333 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了耶路撒冷。从此犹太人开始了仿效希腊人衣饰、行为举止和其他生活方式的进程,许多犹太人搬迁到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和其他一些地中海文化中心城市。这是犹太人散居到世界各地的开始。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一直由亚历山大部将托勒密(Ptolemy)统治,这段历史直到公元前 63 年被罗马人征服后才结束。公元 66 年犹太人不堪罗马人压迫奋起反叛,但遭失败,耶路撒冷和神殿均被罗马军队所毁,大约有 100 万犹太人被杀,其余的大部分成为奴隶,也有部分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从此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但他们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宗教,并且不断地给它增添新的内容。他们先是将有关犹太法律系统化,并记录下来,写成旧约首五卷(Torah)。公元 2 世纪末,犹太拉比将法里赛(Pharisee,一种犹太人宗教组织)教义汇编成犹太教义(Mishna),后来又经过了 300 余年的使用和传播,到了 6 世纪前夕这些犹太教义里又加进了一些评论,遂编成了著名的《犹太教法典》(Talmud)。

与此同时,犹太人往世界各地不断迁移,受到了各种迫害和驱逐。公元 3 世纪,巴比伦提供了犹太人的临时避难所。公元 10 世纪,许多犹太人又迁移到西班牙。公元 1215 年,基督教教会颁布了《犹太标志法》,禁止犹太人占有土地,迫使他们只好经商和从事金融活动。从 13 世纪起,欧洲又掀起了一股迫害犹太人的浪潮。1290 年犹太人被逐出英国,1394 年被逐出法国,1492 年被逐出西班牙,1497 年被逐出葡萄牙。而在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则被限令

住在犹太人区。迁到土耳其的犹太人和在波兰、俄国避难的犹太人一样,采用了一种混有西班牙语的希伯来文字,被称作意第绪语(Yiddish)。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犹太人的迫害更是达到了高潮,许多犹太人在此期间死于非命。1948年5月14日,联合国宣布成立现今的犹太国——以色列,允许犹太人重新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地方重建国家。但这又引发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乃至所有阿拉伯人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旷日持久的中东问题。

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约6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杀害。根据1970年的统计数字,全世界约有1400万犹太人,其中北美约600万,主要是在美国,南美和中美约75万,南非和澳大利亚约20万,西欧有100多万,大部分在英、法两国,前苏联约有200多万,以色列约250万。^①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中国的犹太人。虽然在对犹太人何时来到中国这个问题上学者们之间还有分歧,但根据有关资料分析,最迟到了唐朝就有犹太人到中国来生活和工作,而大规模在中国定居则可以从10—11世纪的宋朝算起。根据有关资料证明,那时候由于经商的需要,大约有1000多人定居在开封,他们建立了犹太会堂,形成了一个犹太社区。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些犹太人最后还是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近代犹太人移居中国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的上海、天津、哈尔滨、香港等城市,主要是做生意,也从事些其他活动。在上海还建有一个犹太人社区,其中设有犹太公墓、犹太会堂、犹太学校,甚至还办了犹太报纸《以色列传讯报》。另一个犹太人社区是在哈尔滨,那里的犹太人主要来自俄国,最多时有1.5万人,是

^① 有关统计数字见《犹太百科全书》,徐新、凌继尧(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区。二次大战期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迫害,在中国的犹太人纷纷离去,只有香港的犹太人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至今仍然有很多犹太人住在那里。

二、犹太人的科学和教育

犹太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向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根据一项 1983 年的统计数字,他们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开支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学者数多达每万人中有 58.4 人,远远超过了瑞士的 36.1,美国的 33.2,加拿大的 32.6,英国的 28.2 和日本的 10.3。当然,历史上还有些杰出人物也是犹太人。例如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贝娄、卡夫卡、普利策、伯恩斯坦、门德尔松等人。

以色列立国以后对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支持不遗余力。在科学研究领域,它在政府里设有科学发展部,制定有关政策,确定优先拨款的项目,奖励和协调科学研究,优化组合全国的科技力量,下设科学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由著名学者、工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在科学发展及研究活动安排上面向政府提供咨询。以色列科学院负责具体实施科学研究活动,在自然科学领域鼓励基础研究,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它鼓励对犹太人的历史、哲学、文学和艺术进行研究。

在教育方面,以色列设有高校研究基金委员会和高等教育问题委员会负责对高校的研究基金进行管理,为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提供咨询。以色列对学术信息的搜集、整理和传播很重视,担负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一些图书馆。首先是以色列最大的图书馆——犹太民族和希伯来大学图书馆(300 万册),它肩负三种功能:犹太民族中心图书馆的功能,以色列全国图书馆的功能以及希伯来大学图书馆的功能。此外还有几家大型图书馆,如特拉维夫大学图书

馆(100万册),海法大学图书馆(60多万册,约9000种学术刊物),巴尔·伊兰大学图书馆(70万册,3000种学术刊物),以色列科技大学图书馆(25万册,约5000种学术刊物)等。

以色列的中小学教育是全民免费的,对象是5—15岁的儿童,其中包括一年幼儿园教育和十年义务教育。10年以后还可以再享受两年免费教育,但可以不去。高等教育不是免费的,但发展很快,在校生已经超过10万,分布在5所综合性大学,1所科技大学和若干所专科性学院里。此外还有全部招收研究生的魏茨曼科学研究院以及技术培训学院等学校。

三、犹太人的哲学、文学和艺术

犹太人的古老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远在上古时代,犹太民族就已经拥有自己的宗教和思想体系,在独特的生存环境当中产生了自己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犹太人虽然在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当中都没有自己的祖国,却能够保存住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并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包括一批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人物,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1. 犹太哲学

犹太哲学最早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对地中海一带国家的征服。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影响下,犹太哲学一是用来协调犹太教和希腊哲学,特别是和斯多噶—柏拉图主义的关系;二是用来为犹太教辩护。当时的犹太哲学家们多用希腊文写作,认为犹太教高于希腊哲学,并斥责希腊文化中的多神论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斐洛。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柏拉图和斯多噶派观念的影响,同时也带有神秘主义的成分。

中世纪犹太哲学由前后两个时期组成。前期基本上在北非、西班牙、埃及等地发展,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犹太哲学

家大部分已用阿拉伯语写作,思想上受到伊斯兰教卡兰姆学派(Kalam)影响较深。12世纪末开始,穆斯林国家中的犹太社团逐渐衰落,而基督教国家的犹太社团却日渐兴隆。这样,对犹太哲学的研究在基督教国家成为一种气候,犹太哲学家们改而用希伯来语进行写作。从内容上说,中世纪犹太哲学可以分为三个派别:卡兰姆派,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派等。

卡兰姆派源于伊斯兰教的一个哲学派别,强调上帝既是唯一的真神,也具有多重属性,试图论证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将其研究延伸到神性、人性以及来生这几个方面。虽然他们反对希腊哲学,但在实际研究当中还是运用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念,因此呈现出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其代表人物为萨阿迪亚。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认为上帝完全高于他所创造的万物,主张灵和肉同时存在,人要坚守道德操行、纯洁灵魂。这表明其伦理观是禁欲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撒·以色列和所罗门·加布里奥。12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派在犹太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它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只能从纯理性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当中获得。在伦理学上,它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人生的目标是完善理性,中庸是美德,但在政治上它却遵循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人应当分为哲学家、武士和劳动者,国王应是一位哲学家,其代表人物是亚伯拉罕·伊本·达乌德和摩西·迈蒙尼德。

18世纪以后的犹太哲学继承了希腊文化和中世纪犹太哲学传统观念的同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修改。首先在犹太律法上,近、现代犹太哲学不再认为律法是上帝的启示,具有永恒的约束力,而认为犹太律法是人类思想,直觉或感悟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一些次要部分可以根据时代的变迁而予以摒弃。在科学和哲学的看法上,近、现代犹太哲学不再认为天地有天壤之别,一切由上帝安排和以地球为中心,而是认为天地都受自然法则支配,宇宙的中心是太阳。早期的犹太哲学喜欢把哲学和科学混为一

谈,声称人生应追求精神的完善,认为道德是这种追求的必要条件,从而把形而上的内容当成了哲学的核心。到了近、现代时期,犹太哲学家们把哲学和科学加以区分,强调哲学要实现人生价值,不应以形而上为其主要研究内容,而要更多地涉及伦理学和其他行为规范。

在近、现代犹太哲学家当中,第一位有影响的学者是荷兰哲学家伯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他积极宣传泛神论思想,将上帝等同于自然,背离了犹太教的传统思想。他认为没有神就不会有其他一切,但他怀疑神的超自然存在。他还提出犹太圣经是想像力的产物,其中掺杂了不少迷信的成分。犹太教规曾经起过一定作用,但犹太国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犹太礼仪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位重要犹太哲学家是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他熟悉洛克、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思想,赞同斯宾诺莎政教分离的主张,但他认为宗教是一种人类理性,犹太教是有理性的宗教,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给犹太人带来了幸福。其他的犹太哲学家们(包括纳赫曼·克罗克马尔,所罗门·福尔姆斯泰彻尔和撒姆尔·希尔施等人),他们都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克罗克马尔认为,所有宗教都相信精神力量,它们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犹太教更关注世界的普遍精神,它的历史就是一部认识普遍精神的发展史。他断言世界万物均源于上帝,存在于绝对精神。人的精神遇到了神的精神就产生了启示,神迹意味着神对世俗事务的介入。福尔姆斯泰的《精神宗教》一书把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伦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他认为世界是由灵魂构成的,这些灵魂存在于自然现象当中,但又超越于自然现象,等同于神。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宗教。自然宗教认为,神即自然,神创造世界是因为神也需要世界。精神宗教认为,神超越自然,神创世是一种自由意志的表现,因此提倡人通过道德伦理和神接近,其代表是犹太教。犹太教虽然在创始阶段为一民族宗教,但随着犹太民族

的解放,犹太教将走向世界,为更多人所理解、所接受,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宗教,犹太人不再孤立。比较而言,希尔施更加强调哲学的真理性。他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他有自由意识,犹太教和其他宗教的不同取决于对自然的认识。其他宗教往往把自然神化,这样人就得听命于自然,而犹太教则认为神超乎自然,从而控制自然。犹太教的最高阶段发现了道德自由的真理,其传播要依靠基督耶稣,这一点和早期的基督教是一样的。但是保罗的原罪和赎罪说将基督教和犹太教截然分开,基督教于是就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只有剔除保罗思想,这两种宗教才能殊途同归,取得本质上的认同。

2. 犹太文学

犹太文学可按时间分为早期、中世纪和近现代三段不同时期。早期文学(约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包括经典文学、历史文学和《塔木德》(Talmud)文学。经典文学主要指圣经文学,系希伯来语写成的《圣经》、《次经》、《伪经》、《死海古卷》,为集体创作而成。

历史文学指公元前200—公元100年间的犹太史方面的著作,最有名的是约瑟福斯·弗拉维的作品。他的《犹太战争史》有7卷,《犹太古事记》有20卷。这些书既是史学著作,也是文学作品。《塔木德》是犹太教的口传律法总集,在犹太教中的地位仅次于《圣经》,实际上为一部公元1世纪到5世纪的百科全书,由《密西拿》(Mishnah)和《革马拉》(Gemara)组成。它不仅是犹太教的经典,也是一部文学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巴勒斯坦和巴比伦一带犹太人的生活。

中世纪文学还是以宗教为其特征,大部分作品都是对圣经的注释,或者是围绕犹太神学及其礼拜仪式这些题材的描写。世俗题材也会偶然出现,但基本上都只是点缀之作。诗歌成就最高,一是宗教题材的礼仪诗,二是世俗题材的生活诗。不仅诗歌的内容

有了充实,诗歌的形式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如贯顶法、离合体、韵脚和节奏都在不断改进当中。拉比文学在这一时期涵盖面最广,含有评注、法典和答问三部分,主要有对经典著作的评介,不仅是诠释,也有评论。另外还有神秘主义文学,如摩西·德来昂的《光辉之书》解释了造物主的10个阶层,说明创世之功和宇宙同时存在,揭示了《托拉》(指犹太律法书)的神秘意义。散文体作品在这一时期也已出现。主要包括历史、地理、游记、传记和小说。历史方面不仅有记录犹太人在各地生活和迁移的书籍,而且还出现了论述犹太文学的专著,例如约瑟·戴尔美地哥在17世纪所写的书和沙贝塔·约瑟·巴斯以及哈伊姆·约瑟·大卫·阿米莱在18世纪所写的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虽然他们的书没有多少分析,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游记作品里既有对欧亚社会、地理、人情风貌的记载,也有对各地犹太人生活的描述。中世纪小说主要指故事和寓言一类的文学作品,部分出自西班牙犹太人之手,部分出自意大利犹太人之手。较有影响的是约瑟·伊本·扎巴拉在12世纪用希伯来语写的一个故事集,它以作者和一位陌生人在旅途中的一次争执为楔子,引出了一连串诙谐有趣的故事。另一部故事集是艾萨克·伊本·萨胡拉用希伯来语写的,系依照圣经故事的内容改编而成。

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犹太启蒙运动首先在德国开展,以后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这个启蒙运动使得犹太民族逐渐摆脱了犹太教的束缚,用理性和科学思考问题。作为这种思潮的反映,犹太文学更多地关注世俗题材。从此以后,犹太文学开始真正地表现犹太人的现实生活,并迅速地和世界文学潮流相融合。这一时期的犹太文学主要分为意第绪文学和希伯来文学两种。

意第绪文学最早出现在13世纪的德国,后来延伸到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其辉煌时期是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段时间。第一位著名的意第绪文学作家是门代尔·莫海尔·塞法里

姆(Mendele Sefarim),他的作品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犹太人变革时期的生活,具有史诗风格。真正给意第绪文学带来繁荣的是肖洛姆·阿莱赫姆和艾萨克·雷伯·佩雷茨(Isaac Peretz)这两位文学巨匠。在他们的带领下,意第绪文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成为其他国家人民能够接受的东西。肖洛姆·阿莱赫姆是位多产作家,发表过40多部长篇和300多篇短篇。他的作品文字优美、语言幽默,有“犹太马克·吐温”之称。佩雷茨则主要以短篇形式写作,严格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除他们两人以外,还有几位著名作家,如肖洛姆·阿施、别尔里切夫斯基、诗人莫利斯·罗森菲尔德、耶胡阿西、剧作家雅各·戈丁、大卫·平斯基等人。一次大战以后,意第绪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许多犹太人迁往美国,那里的意第绪文学掀起了一个高潮,用意地绪语进行创作的辛格曾经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大部分意地绪语作家却没有那么幸运,在德国和苏联他们都在二次大战前后受到了迫害,意第绪文学的创作走入了低谷。现在世界上只有以色列还有意地绪语的文学创作,除了辛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外,以色列小说家阿格农(Samuel Agnon)也在1966年和另外一人分享了该奖。他获奖的小说《昨天才发生的事》(*Only Yesterday*)描写了早期来以色列定居的犹太移民故事。

相比较而言,希伯来(Hebrew)文学的发展要顺利一些。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希伯来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复活”,迅速成为犹太人的日常语言,从而为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希伯来文学获得了繁荣发展的机会,一批优秀作家用他们的作品质量为自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希伯来文学最早见于公元前9世纪写的诗歌,以后则主要通过圣经反映出来。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出现了一批希伯来文学作品,但真正的发展还是在19世纪。当时在犹太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下一批反映世俗社会和生活的文学作品开始问世,希伯来文学

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了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欧洲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中心在欧洲,主要在东欧和俄国,其特点是犹太人的民族自尊心重新复活,犹太传统文化又受到重视,如著名作家阿哈德·哈阿姆在他的作品里将犹太教和人文主义传统及现代文化结合在一道,探讨运用民族精神和人类共性共同复兴犹太民族和个人自由的途径,一些作家的作品开始把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作为小说的重点。第二阶段为创建民族家园阶段(1918—1948年)。这时的文学中心已经迁移到了巴勒斯坦,主要作家都是在那里进行创作,一些现代派手法越来越多的得到了应用。另外美国也有一批用希伯来语写作的犹太作家。第三为国家文学阶段(1948—迄今)。这一阶段的文学不再以拥有一个家园为满足,而是要走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对现代主义手法十分有兴趣,出现了诸如荒诞派、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特色的作品。诗歌方面,最为著名的是诗人耶胡达·阿米海(Yehuda Amichai),他对语言、反讽、隐喻以及其他现代派手法的运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小说方面更是人才辈出,穆谢·沙米尔(Mohe Shamir)、阿哈农·海格德、汉诺克·巴托夫艾莫斯·奥兹等作家的作品都密切联系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操理想,有着厚实的生活基础,深得读者的喜爱。现代小说家当中最有才华、最受欢迎的还是穆谢·沙米尔,他的作品扎根在以色列人的社会生活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感召力,如长篇小说《在他自己的手掌中》、《血肉之王》等。

除了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写作的犹太人之外,还有一批用英语及其他语言写作的犹太裔作家或经营文化事业的人士。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例如卡夫卡(Kafka)、普利策(Pulitzer)、爱伦堡和贝娄。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时期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的卡夫卡并没有直接描写犹太人的社会和生活,但他手下的主要人物却和犹太人的禀性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都是一些工作勤恳,为人正派却没有归属,四处漂流,受人欺凌和迫害的正直、善良的角色。这种孤独和异化特征使得他成为现代派小说大师。

爱伦堡的出名和卡夫卡的成名经历不完全相同。虽然前者是前苏联基辅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但他远在帝俄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他觉得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才能推动犹太民族的复兴。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爱伦堡在世时已经出够了风头。他不仅获得了两次斯大林文学奖,而且他的一部《解冻》以其灵敏的政治敏感预示着当时的斯大林时期要向非斯大林时期的转化,可以说是把握了时代的脉搏。虽然他的判若两人的表现被人插上了政治投机的标签,但无可否认,他的这种表现也是那种政治气候里的一种求生本能的反映。

相比之下,贝娄和辛格乃至马拉默德,却要幸运得多。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6—)童年时代是在加拿大度过的,他的父母都是俄国的犹太移民,后来跟着他们在芝加哥定居下来。他的长篇小说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探讨了人性的各种特征,带有一种独特的调侃和悲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并没有刻意追求犹太人题材,但他的作品无疑都打上了犹太人文化的烙印,无论是《摇来晃去的人》、《奥基·玛琪历险记》,还是《雨王汉德森》和《洪堡的礼物》,都勾勒了一个在社会上东晃西荡,为一种内心欲望所驱使,想要做点什么事,却总是碰壁的形象。

艾萨克·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的创作方法和贝娄的不完全一样。他在31岁之前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波兰,到了30年代中叶,他看到对犹太人的迫害有增无减,波兰不再是个安全的地方时这才移居美国。他的创作语言一直是意第绪语,其中只有少数译成了英语。他的作品门类繁多,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这些作品都以犹太人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尤其是300年以来欧洲犹太人历史文化的变迁,从华沙的犹太人居住区到美国的

犹太人社团,从17世纪欧洲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到二战期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犹太人的文化风俗、宗教信仰、思想情操和个性特征,他都通过意第绪语把信息传达给了他的读者,得到了犹太人和全世界的认可,他本人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用意第绪语写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1914—1988)的父母是本世纪初从俄国迁居美国的犹太移民,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大学任教,同时笔耕不断,主要是写小说,既写长篇,又写短篇。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犹太人特色,表现了生活在美国社会底部的普通犹太人的生活信念和精神风貌,也揭露了沙俄时代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歧视。与此同时,作者对犹太人的命运和前途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将犹太人问题和人类面临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从而拓宽了小说主题的蕴涵。从创作手法来看,作家喜欢采用神话、寓言和隐喻以及一些魔幻主义手法,将现实和虚幻、过去和现在巧妙地连接到一起,构成了一幅幅亦真亦假、扑朔迷离却又含意深刻、发人深省的画面。

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不是作家,但他对文化和文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一个成功的报业界巨子,他完全是白手起家,凭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美国社会站住了脚。他17岁时从匈牙利移居到美国,以后当过兵,为了谋生而干过各种工作,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既当记者又当编辑,把一家濒临倒闭的报纸买了下来,5年时间里使之脱胎换骨,死而复生,一跃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报纸。他的努力既给他带来了声望,又给他带来了财富。他的金钱取之于民也用之于民,生前他把200万美元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建立了新闻学院,同时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普利策奖金,自1917年起每年评奖一次,授予那些在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中的成绩优异者,成为美国影响最大、声望最高的奖金之一。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从奥地利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家庭,年轻时曾在一个汽车零件批发公司工作过,后因他的剧本《全是我的儿子》获得纽约剧评奖而从事专业创作。他最有名的剧本是《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更重要的是为他带来了国际性声誉。剧本所揭示的虚假信念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有普遍意义,被誉为当代美国最优秀的剧本之一。他的作品专门写犹太题材的不多,但作品中不少主人公都是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大都带有些悲剧色彩,如同《推销员之死》里的那个威利。

3. 犹太艺术

犹太艺术早在上古时期就已展露,只是由于受到犹太礼教的限制,没有能取得明显的进展。在造型艺术当中,这一点尤为如此。但在装饰艺术里,例如妇女的金银首饰和其他工艺品的制作上,犹太人却显现出了高超的水平。《圣经》里提到摩西领导犹太人穿过西奈沙漠,来到西奈山下。当上山40天未归时,妇女们把自己的金银首饰铸成了一头金牛以祷告耶和华,后来在旷野里又铸成了铜蛇以防蛇咬。在各种礼仪活动当中,如圣幕、约柜的庆祝活动里,那些礼仪用品的制作也都有详细记录。考古发掘当中,巴勒斯坦、土耳其和突尼斯等地的犹太会堂里都发现过艺术品,在叙利亚的一座犹太会堂里甚至还找到了一幅圣经题材的湿壁画。由于犹太教的严厉教规,有些艺术形式是不准采用的,例如三维艺术就受到了禁止。雕塑和浮雕也因此很少有人问津,但镶嵌、金属雕刻、装饰画、刺绣、镶饰和剪纸则都是很普遍的艺术活动。流行的工艺品有多枝头灯台、香坛、节日酒筵上用的各种器皿,金器、银器、铜器、木雕等。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画家莫里兹·奥本海姆在肖像画和风俗画上面贡献最大,他的画表现了犹太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吸收了印象派的技法,在当时很有影响。

虽然犹太人当中出名的画家不多,但也有顶尖的画家。饮誉世界的大画家毕加索就是其中之一。帕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出生于西班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年轻时去巴黎学习绘画,以后入了法国籍。他的画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善用色彩和形状抒发内心感受,带有他人难以超越的创新意识,所谓“蓝色时期”、“玫瑰色时期”、“立体主义”都是这种创新意识的体现。他的漫长绘画生涯和多变的画风为他自己赢得了超现实主义绘画代表人物的名声。他的正义感和浪漫故事,他的充沛精力和丰富想像力,他的不拘一格和传统的熏陶,这些相辅相成的个人特色,几乎将他塑造成 20 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绘画大师。

阿伦·科普兰(Aron Copland, 1900—1990)的名气虽然比不上毕加索,但在美国音乐界的知名度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他是俄国犹太移民的后裔,从幼年时代起就跟姐姐一道学弹钢琴,以后又去巴黎学习作曲,是著名女音乐家布朗热的第一位美国弟子。他一生当中写了不少曲子,既有电影插曲之类的应景之作和流行歌曲,也有钢琴协奏曲、芭蕾舞曲、歌剧这样比较庄重、典雅的作品。他的作品特色是融合了美国民歌和爵士乐,表现了美国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俗,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他还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并担任音乐指挥,对美国 20 世纪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世纪另外一个著名犹太音乐家是列奥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他毕业于哈佛,以后去过音乐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库斯维茨基,后来长期担任纽约爱乐乐团、以色列交响乐团的指挥,并客串欧洲的一些知名乐团,担任客座指挥。此外,他还写了不少乐曲,代表作是交响乐三部曲以及一些歌剧和轻音乐作品。他的音乐常常从犹太教的礼仪乐里吸取营养,并参照爵士乐的节奏,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音乐亲和力和感召力。

撒缪尔·高德温(Samuel Godwin, 1882—1974)本人并不是艺术家,但却是个造就艺术家的人。没有他,美国乃至世界的电影事业或许要倒退几十年。他出身于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1岁丧父后到伦敦的一家铁匠铺学艺,14岁只身一人去美国闯荡,18岁就因为推销手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套经销商了。有了钱以后,他和他人合作建立了电影公司,第一个在好莱坞拍电影,成为独立的电影制片人。他请人写剧本,也请人拍电影,在他手里电影真正成为产业。他经手制作并推出了第一批有质量的好莱坞电影,博得了许许多多人对电影的喜爱,从此以后好莱坞逐渐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电影的象征,他也因此而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著名和最成功的电影界巨头之一。

四、犹太教和宗教节日

1. 犹太教的形成

在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早期,他们和当地的伽南人有许多类似的宗教信仰,例如他们都敬奉树木、石柱以及各种自然力。各个部落都奉耶和華(Jehouah)为主神,认为他是火、雷雨及风等自然力的化身。国家成立后,耶和華又被奉为护佑国家的主神,首都耶路撒冷则定为全国的宗教中心,但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以色列人还没有形成宇宙一神的观念。

在巴比伦囚禁时期,沦为俘虏的犹太人酝酿着新的宗教。他们祈求一个“救世主”的来临,引导他们摆脱异族的压迫,去重建一个犹太王国,实现宗教和贵族权力的统一,他们认为耶和華作为宇宙的唯一主宰,将要保佑这个国家。这些思想最先由先知以赛亚(Ezekiel)在被囚的犹太人中传播。后来在新巴比伦被波斯消灭以后,犹太人最终回到了耶路撒冷,以赛亚的思想成为现实。祭司贵族这时规定除信奉耶和華外,不准信仰其他任何神,只有虔诚信

奉耶和华的信徒才能在神权政体中享有完全的权利。到了这时，崇信一神、排斥其他宗教并维护祭司贵族统治的犹太教才最后形成。

2. 犹太教义的组成

在犹太教形成的时期，希伯来人留下的各种文献由祭司整理成为一部汇集各种教义的总集，称之为《圣经》。基督教创立以后，也宣布接受它为圣经，称之为《旧约》，以区别于基督教兴起后编写的《新约》。后期的犹太教，无论是在教义还是在训海上和基督教宗旨都相去不远。随着犹太教神殿的毁灭以及犹太人迁居到世界各地，神殿礼拜已不再进行，只有摩西十诫教义和拉比阐释的先知启示作为犹太教的核心保存下来。

3. 犹太教的宗教节日

犹太教里有不少宗教圣日，用来纪念一些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或节日，为教民提供休息时间。

犹太安息日(Sabbath)从星期五的日暮持续到星期六的日暮，主要是纪念历史事件。很难用日历标定它的具体时间，这要依据犹太人的太阳历安排，和复活节一样日期可以变动。

岁首节(Roshhashanah)，即犹太新年，安排在早秋，可用以持续10天时间，进行忏悔，最后以赎罪日(Yom Kippur)告终。

结茅节(Sukkot, Sukkoth)，又称住棚节，赎罪日后的第五天为节日，主要是纪念从埃及逃出的犹太人在旷野里过的天幕生活。在这一天里犹太风俗也要建立一个类似的棚子并在里面短期生活以示纪念。

光节(光明节, Chanukah, Chanukkah, Hanuka)，通常安排在12月，和圣诞节大致相同。这个节是为纪念公元前168年犹太麦克比斯打败叙利亚异教徒、收复耶路撒冷、净化和重建神殿而设立

的。根据传统通常安置一个可以燃烧 8 天的献祭油罐 ,每天点一支蜡烛 ,一直到第 8 天感恩节互赠礼品而告终。

普珥节(Purim) ,又称普林节。放在 6 月里 ,主要是欢庆犹太人的宗教独立 ,依据《旧约·以斯帖纪》记载的以斯帖设计救犹太人的故事而设立。

逾越节(Passover ,Pesach ,Pesah) ,为期 8 天的春节盛庆 ,以纪念犹太人成功逃出埃及 ,其名称来源于死亡天使越过涂有羊血的家庭。所以节日的开始是一种家庭晚餐 ,晚餐上的苦草使人想起他们祖先在埃及的苦役 ,宰杀的羊使人想到了解救 ,没有发酵的饼让人想起沙漠里食物的严重短缺。

五旬节(七七节 ,收获节 ,丰收节。 Shavuot , Shabuoth , Shabuot) ,类似美国的感恩节。它不仅庆祝谷物丰收带来的喜悦 ,还庆祝首五卷所带来的精神礼品。受戒仪式或按手礼通常在这个节日里安排。

五、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文化内涵

1. 犹太复国主义的起源

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囚禁时期 ,那时的犹太先知和祭司们为了呼唤被俘犹太人的故土意识 ,编造了“弥赛亚(救世主)”的神话 ,让他们相信所谓的救世主会来拯救他们于苦海 ,让他们回去重建国家和家园。这种传说实际上表明早在 2000 多年前犹太人就已经有了复国的思想。以后的漫长年代里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 ,遭受到了各种歧视和迫害 ,这种复国的思想始终没有消失 ,但由于各种原因似乎总难以实现。18 世纪启蒙运动吹起的自由平等之风唤醒了犹太人沉睡已久的民族民主意识 ,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思考自己的民主权利问题 ,除了政治上的觉醒 ,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其在教育、卫生、文化等领

域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他们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能够忍受对他们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欺凌。与此同时,非犹太人社会在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上也出现了分化,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一部分主持正义的人也开始对犹太人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同情。这样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开始得到更多的理解,为其发展成一种运动而创造了条件。

2.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思想到了19世纪不仅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而且其内涵也有了质的变化。以前的犹太复国主要是指等待弥赛亚的到来,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信念和精神上的安慰。19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强调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也更为现实。这一时期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主要有2位代表人物。首先是奥多·赫斯,他于1862年第一个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目标。他在他的《罗马和耶路撒冷》里说:“犹太人问题是当前欧洲最后一个重大的民族问题。”他指出,要想摆脱反犹主义迫害的唯一办法就是返回以色列,在那里重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赫斯的设想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勇敢的行为,但由于没有切实可行的实施细节,只能是画饼充饥、昙花一现。赫斯的提议过了将近20年之后,俄国发生了迫害犹太人的严重事件,大批犹太人纷纷外逃。痛定思痛,犹太复国主义重新得到人们,尤其是犹太人的重视。这时一个俄籍犹太人利奥·平斯克挺身而出,写出了一本叫做《自我解放,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同族人的忠告》的书,发展和完善了赫斯的思想。他在这本出版于1882年的书里进一步论证了建立犹太国家的必要性,指出了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土地就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一样是不正常的。他在书里还就如何实施这一计划制定了具体的办法,例如召开俄国所有犹太团体参加的大会,讨论购置一块可容几百万人土地的设想。

然而平斯克的计划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未能实现。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西奥尔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身上,赫茨尔的贡献在于他为犹太复国提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案。他认为,犹太人问题不是什么社会或宗教问题而是一个民族问题,解决的必要条件是犹太富人的金钱和大国的支持。他建议成立“犹太人大会”和“犹太公司”两大机构,分别负责政治谈判和筹集经费。这样,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方案被提了出来。

随着理论和认识上问题的解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逐渐开展起来。最早的犹太复国组织是1860年法国犹太人组织的“世界犹太人联盟”。后来,德国犹太人建立了犹太移民巴勒斯坦协会,俄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并有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农业定居点。1897年8月29日在赫尔茨的倡议组织下,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通过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宣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为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家”,于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统一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就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开始出现了,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注意。又过了半个世纪,这个运动的活动导致联合国在1947年11月29日通过决议承认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虽然犹太人建国所引发的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有了实质性成果。

3.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文化内涵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特别关注犹太发展文化对犹太复国的意义。他们认为,犹太复国首先是坚持犹太文化传统,具体表现是坚持希伯来语犹太教、犹太哲学和犹太习俗。其次,他们认为犹太文化的核心是犹太人和主耶和華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由于这种联系,犹太人才能在经过千年劫难之后仍然

能保存下来,不被同化。如果失去这种联系,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价值将消失殆尽。第三,犹太人文化只有在回归故土时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也就是只有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文化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流落在各个国家的生活不可能真正建立和恢复犹太文化。第四,创建犹太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流落他乡的犹太人提供避难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为保存犹太人文化遗产、发展犹太文化提供物质手段。

这种思想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在何处建立犹太国家的问题上,原先曾有人建议在美洲或世界任何地方买块地方,但经过广泛讨论,他们选定了他们祖先的居住地——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工作方向上,他们坚持认为,移民和定居这些实际行动应和对大国开展外交活动同样重要。他们还反对过分依赖少数犹太富翁,而主张动员更多人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在语言问题上,他们主张把希伯来语确定为唯一正式语言,其他一些为部分犹太人所用语言,如意第绪语、阿拉伯语等语言要限制使用。

这种重视犹太复国主义文化内涵思想的人后来成为一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派别,对推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它的一些代表人物以后也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随着它的主张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普遍接受,这个派别在一次大战后已自行解散。

六、《旧约金书》介绍

《旧约》教规由 39 部书组成,由于宗教不同,这些书也略有区别。后来,犹太人将 39 部书分成三部分,即首五卷、先知和圣文。

1. 首五卷(Pentateuch)

首五卷又称法规,由五部书组成,其作者一般认为是摩西。早

在公元前 400 年就已成文叫做《上帝的话》,作为上帝之道而流传下来。它们分别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部书描述了从宇宙创始到迦南入侵的整个犹太人历史,其内容包括历史传记、宗教教义、法律、礼仪、歌、家谱、故事等,几乎包容了所有同古代犹太传统及文化有关的事物。它们创作的时间相当长,开始可能是一代代人口头相传,后来才由几位无名氏执笔而将它记载下来。

《旧约》的首篇《创世纪》(*Genesis*)通过一系列故事(许多学者认为只是传说),包括上帝创造世界、亚当和夏娃、伊甸园、蛇和禁果、该隐和亚伯、洪水和诺亚方舟、巴布尔之塔、亚伯拉罕、以赛亚以及从约瑟夫到埃及这样一些故事,勾勒了宇宙和人类诞生以及犹太民族形成的经过,看上去像是一部历史书。

《出埃及记》(*Exodus*)记述了摩西(Moses)受上帝委派而领导犹太人出逃埃及的故事。它记述了自约瑟夫时期以来,犹太人在埃及的生活以及受到的压迫,摩西反对埃及人的斗争,他的兄弟亚伦如何在法老面前游说,让法老同意他们离开埃及,后来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奇迹般地穿过红海后的西奈山之行的经过。摩西在西奈根据上帝的指示向他的追随者转述了十诫(Ten Commandments):信仰专一,安息日不能做事,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陷害他人,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和财产。摩西领导以色列人继续在荒漠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死去,由约书亚(Josue)接替了他的位子。以色列人在经过长途跋涉,胜利到达迦南之后,开始建立起一个神权国家——一个祭司统治的王国。这个国家以摩西十诫为其基本的诫律,士师为各个部落的首领,亚伦和后裔被任命为祭司。一个有着军事、民政和宗法功能的国家终于建立了。

《利未记》(*Leviticus*)是一部精心编写的法律和礼仪文献。它记载了祭品、祭司等活动,提出了“贞洁”与“不贞洁”的区别,对健

康的性行为和伦理道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告诫。规定违者将受到惩罚,或赔偿,或同民众隔离,或被处死。

《民数记》(*Numbers*)的名称源于开头对各个部落的人口普查。这部书主要讲述了摩西死后,犹太人在约书亚领导下抗击米甸人而取得战争胜利的故事,描述了在通往迦南(*Canaan*)的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挫折,同时也穿插了许多关于法规的叙述。

《申命记》(*Deuteronomy*)可能是公元前 621 年由大祭司奉献给约书亚王的法书的文本,或是其中的一部分。书里描绘了摩西生前所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其文体雄辩有力,所表现的行为准则更具人性,更加文明,代表了犹太宗教发展的一个高峰。公元前 7 世纪进行的申命改革运动体现了这本书的精神,强调人类只有一个上帝,以色列就是“上帝的选民”。除此之外,这个运动还提倡严格的道德,如热爱上帝、对穷人和客人要慷慨大方等。

2. 先知(*Prophets*)

《旧约》的第二部分为先知书,由 21 部书组成,其中有 6 部继续讲述了犹太人征服迦南到巴比伦囚虏的这段历史,被称为“前先知”。“后先知”包括 3 个“主要先知”和 12 个“次要先知”。

1) 前先知(*The Former Prophets*)

①《约书亚》(*Josue*)被认为是公元前 511 年完成的早期文体的又一汇编,从《民数记》结尾开始描写了征服迦南的过程。作品的基调是英雄崇拜,主要歌颂了战无不胜的领袖约书亚。根据这本书的描述,对迦南的整个征服花了 25 年时间。这一段时间里,神奇事件屡出不穷,如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领导下抬着约柜准备渡过约旦河时,河水就突然停住,露出干地,好让以色列人通过;攻打耶利哥时,以色列人吹响了羊号角,城垣顷刻之间就倒塌了;在和亚摩利人作战时,约书亚向耶和华请求让日月暂时消失,借此大

败五王。

②《士师记》(*Judges*)是编排最为零散的一部分。书的开头生动地描写了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在迦南的实际情况。他们当时生活十分艰苦,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士师们的组织下又重新振作起来。这些士师故事包括底波拉、基甸和参孙等,时间跨度比较长,从公元前11到12世纪。

底波拉是个女先知,能够预测将来的事。她叫一个叫做巴拉的以色列人领兵去打迦南统帅西西拉的铁车军,在耶和华的帮助下,一举将他们击败,并杀了西西拉,使得以色列人重新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参孙出身于一个普通的以色列农民家庭。据说他出世之前,耶和华派使者告诉他父母不要喝酒,不要给孩子剃头发。参孙长大后,果然不剃头发,力大无比。他有意和一个非力士人结亲,然后找机会放火烧了非力士人的村庄。他被人绑着交给了非力士人,却轻松地脱了身,并大开杀戒,杀死了许多非力士人。因为骁勇善战,他当上了士师,并长达20年之久。他的妻子大利拉被非力士人收买,还诱使参孙说出了他的弱点:他的力气源于他的头发,如把他的头发剃掉,他的力气也就没有了。参孙头发被剃掉后终于让非力士人抓住,剃去了双眼,被铜链拘锁。但在一次非力士人的庆功宴上,他抱住神庙里的两根柱子,使尽全力扳倒了它们,致使神庙倒塌,压死了里面的3000多人。

③《撒母耳记》(*Samuel, I*)(上)详细记述了宗教领导人撒母耳在以色列重建时期所进行的统治。讲述他如何根据耶和华的旨意挑选扫罗和大卫来担任以色列建国初期的国王,展示了大卫和扫罗儿子约拿单之间的友谊,记叙了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一些感人故事。

④《撒母耳记》(*Samuel, II*)(下)主要讲述了大卫错综复杂的性格。他一方面是个正义感异常强烈的人,另一方面又不能避

免很多缺点错误。他在受到扫罗迫害之后,能够冷静地处理和他的关系,还两次饶了他的生命。他是个非常重视感情的人,当他得知约拿单和扫罗被非利士人杀死时,表现了一种极为愤怒、哀伤的情绪,体现了多重性格。当装有耶和华神谕的约柜被带到耶路撒冷时,他在约柜前疯狂地跳舞,体现了一种崇拜和喜悦之情。但他对他的下属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怀有强烈的占有欲,并借敌人之手谋害了乌利亚,这展露了他的一种丑恶的心态。这种正反两面性格也体现在他处理他和他儿子押沙龙的关系上。当他的儿子背叛他时,他对他恨之入骨,派兵讨伐他;而当押沙龙最终被他下面的人杀死时,他又表现出了一种无限的悲痛。

⑤《列王记》上Ⅹ(*The Kings, I*)的开头介绍了大卫之死以及所罗门的光辉业绩,叙述了以色列和犹太的众多国王和部落首领的故事。所罗门是大卫和拔示巴所生,最为大卫喜爱。在大卫众多的儿子当中,大卫和哈及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最有野心。当大卫病重之时,亚多尼亚乘机想自立为王。这时,拔示巴出面乘大卫还清醒的时候请他正式宣布立所罗门为王。所罗门即位后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他在位的40年时间里做了不少好事。他首先把大卫家的仇人一一除掉,以巩固他的地位。在处理民事纠纷当中,他显示出高超的判断力和决断力。例如在著名的断子案里,他利用母亲不愿伤害孩子的天性来确定孩子的归属。另外所罗门还善于创造财富,并拿这笔钱修建了圣殿。但他晚年昏聩,沉迷于女色,为以后以色列的灭亡埋下了隐患。书中虽然有一部分语言使用平淡,文体也有些混乱,但后半部讲述先知以利亚带领以色列人并做出预言时的叙述比较生动,以利亚也因此而成为希伯来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以他的道德观而闻名于世。

⑥《列王记》下Ⅹ(*The Kings, II*)开始仍然是有关以利亚的故事,一直讲到他神奇般地升天。接下来讲述了他继任以利沙的神迹,此外还有以色列被亚述夺取、犹太人进贡、申命改革运动、犹

太人被俘获及巴比伦等事件的叙述。这本书和前面一本书一道对以色列灭亡之前列王的主要事迹作了近乎连贯的历史记载。

2) 后先知(The Latter Prophets)

尽管传统上后先知分成了 3 个主要先知和 10 个次要先知,但在叙述上是按照历史顺序编排的。每位先知讲的都是个别的情况,但却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背景。

①《阿摩司书》(*Amos*)。阿摩司是一位活泼有趣、视野广阔的先知。他原先是位牧人,公元前 8 世纪住在犹太后受神感悟,在梦幻里见到了纯洁而高贵的犹太国家。他显然知道北方王国面临危险,便来到这个国家(以色列),并预言,如果它不回到对纯洁的崇拜上,它的末日就要来临。他预测他将被赶回到犹太,事实果然如此。他在那里创作了一本印有他名字的小书。那本书提倡社会正义,强调耶和華对受害者的关心。

②《何西阿书》(*Hosea*)。何西阿是北方王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先知。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遵循先知阿摩司的教导进行布道,但他的言辞更为激烈,将以色列描绘成一个妓女,抛弃了她所钟爱的配偶耶和華。这个极富想像力的寓言为后世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教徒以及作家所津津乐道,它因此也成为但丁《神曲》中象征手法的一部分,故事上帝的新娘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个寓言的重复。

③《以赛亚书》(*Isaias*)至少有二组作品组成。前 39 章是以赛亚本人的作品,而后面的诗篇则为 200 多年后的作品。以赛亚一边怒斥他的同代人,一边重申阿摩司的教义,认为纯洁的心灵高于礼仪。此外,他还持有个人不朽观,认定以色列遗民必归主拯救,而行恶者必入地狱。有一篇讲到路西弗(明亮之星,象征巴比伦的荣耀)欲同上帝争夺权利而被打入地狱,由此在后人中间产生了天使坠落的传说。这个故事经过弥尔顿的《失落园》的传播已是

家喻户晓。以赛亚是位只收门徒、没有结过婚的文学先知,特别不喜欢轻浮的女人,似乎过着类似于洗礼者约翰、耶稣和圣保罗似的禁欲生活。

④《弥迦书》(*Micah*)是一部公元前8世纪的作品,主要谴责了富豪和地主并总结了以前先知的一些最好的经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⑤《那鸿书》(*Nahum*)实际上是公元前621年巴比伦征服尼微后写的一首颂诗,因而被认为是上帝的正义战胜了以色列从前的敌人亚述和邪恶。

⑥《俄巴底亚书》(*Obadiah*)篇幅最短,谴责了犹太南部的以东省投降巴比伦,而《耶利米书》(*Jeremiah*)和《耶利米哀歌》(*Jeremiah Elegy*)是篇幅较长的先知作品。耶利米是生活在巴比伦囚禁时期前后的先知,他在巴比伦没有发兵之前就预言犹太国要灭亡。他还强调,应在教堂而不是在耶路撒冷举行祈祷以传授一种上帝和选民间直接对话的教义。这种教义以后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基础。书里有许多比喻,例如视耶路撒冷为妓女,以及但丁所用的三只野兽形象,爱伦·坡用的“基列里乳香”等。

⑦《以西结书》(*Ezekiel*)里的比喻所指模糊,但它有力地传达了一种以色列精神长存的思想,通过让上帝神秘显圣,表明耶和華会恢复以色列的存在。在《以赛亚书》下(*Isaiah, II*)里,作者还提出了一个上帝和他的“选民”关系的理论,声称上帝是一个永久的精灵、万物的创造者(包括罪恶),他选择以色列做他的“受难女仆”。以色列经过多种折磨的洗涤,现在应恢复其世界精神领袖的地位。

⑧在《但以理书》(*Daniel*)里作者描述了公元前168年,叙利亚王安提奥克斯三世妄想根除犹太教的企图。书中还对弥赛亚的神秘梦幻和死者的复活,对在巴比伦囚禁期间,但以理在维护耶和華法规方面所做的事情等都作了生动的刻画。但以理被带到巴

比伦以后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怪梦所作的解释很准确,这个杀人如麻的国王竟然佩服得向他叩起头来。非但如此,他以后的预言也很灵验,他自己还躲过了几次灾难。这是因为耶和华始终都在保护他。书中讲到他被投到大火里面却平安无事,被摔到狮子窝里也毫发未伤。由于这些特点,尽管这本书比较短小,却是《旧约》的著名篇章之一。

3. 圣文(Hagiographa)

《旧约》的第三部分叫做圣文,共有 13 部书,含历史、诗歌、短篇故事和智慧书。

1) 历史

①《以斯拉记》(*Ezra*)。这是一部公元前 5 世纪的文献,记述了耶路撒冷陷落后的历史。以斯拉是犹太人祭师,曾经被巴比伦人俘虏,后返回耶路撒冷,负责圣殿的重建。该书共计 10 章。前面 6 章讲的是对神殿的修建,后 4 章讲的是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后的个人见闻。有人认为,以斯拉就是教堂的缔造者,是现代犹太教规的创始人。

②《尼希米记》(*Nehemiah*)。尼希米原来是给波斯王亚达薛西一世斟酒的犹太人,素得波斯王的喜爱。该书描写了他请假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经过,讲他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外族人的反对和讽刺,犹太人的不团结。在他的带领下终于修好了城墙,把犹太人重新团结起来。后来,他当上耶路撒冷省省长,后和以斯拉进行合作。

③《路得记》(*Ruth*)。路得据说是摩押人,是犹太人拿俄米的寡妇儿媳,后来又找了个犹太丈夫。她既贤惠善良,又勇敢坚强。在她的努力下,她终于改变了命运,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也为子孙后代树立了榜样。其后裔可下溯到大卫王。

④ 《约拿书》(*Jonah*)是一篇寓言,其教诲之意是以色列人有责任将上帝的知识传授给外国人。开始时约拿乘船逃跑,想逃避这个责任,但在海上遇到了惊涛骇浪。为救他人,约拿让人把自己抛到海里,后被一条巨鲸吞没,三天后又吐出。以后他才逐步懂得了布道的责任,去了尼尼微,宣称耶和华是所有人的上帝,那里的人由此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罪恶,并得到了耶和华的宽恕。这个故事后来成了一些文学经典的出处,麦尔维尔的《白鲸》即与此有关。

⑤ 以斯帖(*Esther*)。以斯帖原为一犹太姑娘,后因其美貌而被波斯国王亚哈随鲁立为王后。当时奸臣哈曼当权,阴谋族灭王国内所有的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下,以斯帖设计在国王面前揭露了哈曼的诡计,不但保全了所有犹太人的性命,而且治了哈曼的罪。她的养父末底改因救驾有功而也受到重赏,后来官至宰相。

⑥ 《约伯记》(*Job*)是一部哲理剧。在这部戏里,无名氏作者将撒旦想象成一位诱惑天使。他在征得上帝同意后将各种灾难施加到约伯身上。约伯的三位同情者认为,邪恶是受难的原因,但约伯却拒绝认罪,认为好人要忍受苦难,还指控上帝对此漠不关心或是远远躲避,以至于普通人无法将受难情况报告上帝。这时第四个安慰者以利户出来指责老人的傲慢和反叛精神,暗示谦卑是通向上帝恩惠的必由之路。剧终之前,上帝出现,将神权和人的无能做了一番比较,指出上帝之道是意味深长的,但人却太柔弱,无法理解上天的旨意。

2) 诗歌

希伯来原文的《圣经》里诗歌占有很大的篇幅,其特征是采用对句的形式,但在翻译成其他文字的过程当中,这一特征没有得到保留。

《诗篇》(*Psalms*)含有150篇圣诗,分为5卷,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宗教诗文库之一。这些诗言简意赅,生动地表现了希伯来人的

宗教情感。从形式上看,它们包括诗、歌、祈祷文和赞美、哀悼词语。《颂歌》主要是对上帝的赞扬,《雅歌》里的诗篇主要是歌颂爱情的。这些诗最接近后期希腊的田园诗,例如俄克里托斯的《牧歌》。《哀歌》是一部哀悼耶路撒冷的挽歌诗集,表现了犹太人的强烈情感。

3)《旧约·伪经》(*Apocrypha*)

共计 15 部,统称“经外书”,系希伯来文《圣经》正文里没有收入的经文。伪经意为“模糊”,由于其中大多数作品写于公元前 2 世纪至 1 世纪,因而被认为感悟不足或历史不够悠久而未被收入真经。但其中的一部分有一定的历史、宗教或文学价值。《麦克比斯前书》(*Maccabees, I*)描述了从公元前 166 年犹太人重新获得独立到公元前 135 年恢复了国势的历史。《透比书》(*Tobias*)是一篇想像力丰富的短篇故事,描述了天使拉菲尔对囚虏时期一家贫困犹太家庭的照顾。《朱迪丝书》(*Judith*)主要讲述了美丽、勇敢、聪明、贞节的寡妇朱迪丝如何砍杀敌将霍尼芬尼斯的故事。《所罗门智慧》(*Wisdom of Solomon*)作于公元前 1 世纪,是一部布道集,承袭了希腊和希伯来的传统。该书告诫人们要弃恶扬善、主持正义、发扬智慧,否则就要面对末日,接受审判,受到惩罚。

第四章 基督教文化和《新约全书》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之一。在 2 000 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对西方社会 and 思想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一般宗教的范围。在漫长的中古时期,它曾经是西方社会的支配性力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着社会的发展,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教会的地位和影响已有所减弱,但无可否认,它作为西方人的重要精神支柱,仍然对他们的思想文化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章里我们将就基督教的渊源、内容、特点和影响以及它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作一概述,同时对基督教的主要理论依据《新约全书》的基本内容做些简单介绍。

一、基督教产生的背景

1. 犹太人反罗马的斗争

公元前 4 世纪之前,古典文化和犹太人文化之间还没有多少的联系。公元前 63 年罗马将军庞培率军队侵占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罗马行省。这样,犹太被罗马帝国占领,普通犹太人受到犹太国王、祭司以及罗马统治者的双重压迫。犹太人奉为神圣的耶路撒冷神庙及其库藏连续遭到罗马人的二次掠劫,促使犹太人十分痛恨罗马统治者,他们把以前对国王祭司统治的反抗和对罗马统治者的斗争结合起来。公元前 53 年,也就是罗马统治 10 年

之后,犹太人发动起义,遭镇压后,除大批战死外,仅卖为奴的就达到了1万余人。50年之后,即公元前4—3年,国王大希律死后,犹太人利用混乱之际又一次举行了起义,却再次遭到了残酷镇压。所有起义的城镇均被烧毁,被俘的起义者则被钉在十字架上。虽说如此,但以后的几十年间犹太人反罗马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公元6年和66年,由西卡尼派(也译短刀党)领导的起义曾一度席卷全国,其中后者得到了犹太各个阶层的支持,只是后来在清除下层平民的债务问题上和上层犹太人发生了对立和分裂,才遭到罗马统治者的镇压,最终导致了失败。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起义群众对罗马军队作了殊死抵抗,大部分都英勇牺牲,其人数多达百万,被俘的起义者则都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以至于“没有地方可以再立十字架,也没有十字架可以再钉人”。除了遇难的起义者之外,耶路撒冷居民被卖为奴的多达7万人,剩下的人也被迁到世界各地。起义尽管失败,但犹太人对罗马统治者的仇恨和反抗并未结束,只是斗争从公开转为地下,转向秘密的教派活动。第二次大规模起义于60年以后再度爆发。公元132年起义初期,犹太人曾一度夺回耶路撒冷,犹太教公会也恢复了工作。公元134年罗马军队开始镇压起义军,第二年起义军领导人先后牺牲,犹太人起义再次宣告失败。罗马皇帝哈德良在耶路撒冷建立新城,禁止任何犹太人进去居住。这样,犹太人的圣城成为一座外邦人的城市,犹太人从此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成为一个在世界各地到处漂流的民族。

2. 犹太文化和古典文化的互相影响

公元前333年起,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将希腊文化介绍到西亚,从而使得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开始融合。与此同时,一些犹太学者也开始研究柏拉图的思想,而有些人则将犹太教圣经《旧约》译成了希腊文,所谓70人译本就是指这次翻译。许多希腊人

和其他西方人通过《旧约》了解了犹太教 ,从中发现了一种比其他古代的宗教更为牢固的传统信念和更加高尚的伦理系统。另外一方面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也给虔诚的犹太人的基本信仰提供了一个更为理智化的模式 ,例如《旧约·创世纪》里提到的“雅各之梯”在柏拉图有关仁爱是天地之媒介思想的影响下 ,被重新命名为“爱之梯”。

二、基督教的诞生

1. 早期基督教的传闻

根据 1947 年在死海附近沙漠中发现的纸草文献记载 ,公元前 2 世纪 ,犹太人当中流行着一种笃信“救世主”的秘密组织 ,宣扬关于救世主的信念 ,基督教大致就是从这些秘密组织里产生的。

最早的基督教文献是公元 1 世纪后期产生的《约翰启示录》。这里面只提到小亚细亚的宗教会社 ,估计是流亡的犹太人出于亡国的痛苦和对罗马人的痛恨之情而写的。新形成的基督教具有强烈的反罗马倾向 ,同时它也为各种地方性宗教思想的融合做了准备 ,为其最终建立一种统一的思想理论创造了条件。

早在公元前 18 世纪 ,当时的犹太先知阿摩司就暗示在耶和华的眼里 ,心灵的纯洁和大方的举止比任何仪式都更重要 ,从而贬低了神殿祭祀的重要性。后来 ,随着神殿的毁灭 ,对教义的传播和对仁爱的强调就逐渐取代了空洞的对神的参拜 ,成为犹太教的主要内容 ,也是后来基督教的重要特征。

随着许多有关弥塞亚(Messiah)到来预言的传播 ,基督教的神秘特性也逐渐形成。起初弥塞亚可能被视作一个类似摩西或大卫式的精神或世俗的领袖 ,他帮助以色列恢复以前的荣耀。后来他又被看成是死而复活、满载荣耀而来、让尘世各国惊惶失措的超凡脱俗式的人物 ,他被等同于“上帝”或被描述为“人子”。

由此说来基督教的基础早在公元前 2 世纪就已大致确定下来了。

传说中的耶稣诞生时,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正在受到罗马的代理人希律的残酷压迫。当时的犹太人大体分成了 4 个派别:首先是拥护希律以及由他任命的祭司组成的贵族,主要是撒都该人;其次是法利赛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教义(不受祭司的权利约束),在犹太教堂里有自己的拉比宣读和解释戒律和预言,他们以严格的宗教礼仪和相信不朽而闻名。第三是人数众多的埃森人,他们过着严厉的禁欲和集体生活,作洗礼,带有后来许多基督教的特征。第四派为狂热的犹太教信徒,他们猛烈反对罗马的统治,将希望完全放在弥赛亚到来的预言里。

耶稣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公元 1 世纪的任何著作里都还没有提到过耶稣。他的名字起初只是在口头里流传,公元 2 世纪才被记录下来,这就是《新约全书》的四部“福音书”。据说耶稣是上帝的亲子,为了拯救人类,上帝显灵使耶稣母亲玛丽亚未婚而孕,生下耶稣。他后来在巴勒斯坦传道,多次在医治病人、驱逐魔邪、让死人复活等方面展现了奇迹。他教人忍受苦难,因为一切受难的人死后都会升入天堂,而有钱人升天堂比“骆驼穿针孔”(骆驼为粗绳之误译,现已习惯)还难。后来,据说是犹太上层分子勾结罗马总督迫害耶稣。由于犹太人的出卖,他们逮捕了耶稣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教徒以后就用十字架作为该教的标志。

根据传说,耶稣死后埋葬他尸体的坟墓于第二个星期天(复活节, Easter)变空了,以后他在他的门徒面前显现,让他们相信他已死而复活。这个传说以及他死后升天的记载成了基督教具有神秘性的一种基础。他的许多忠实门徒对此深信不疑,但也有些追随他的人感到失望,甚至认为他是骗子。然而他的忠实信徒们仍然相信他的预言:他将在最后的审判上出现。于是他们开始了一次

热忱而又成功的传道运动,其中心内容体现在约翰那段著名的声明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以外的一些犹太部落也开始皈依耶稣。

2. 基督教的传播、建立和完善

对基督教最后的创立贡献最大的人是保罗(Paul)。保罗原名扫罗,是一个笃信宗教的犹太人,和耶稣年龄相仿。他早年曾参与迫害耶稣信徒的活动,但在公元33年前后皈依了基督教,并在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等地开展了传教活动,建立了一些基督教组织。他通过给这些组织写信的方式来阐述基督教的教义。这些信以及其他几位信徒写的东西经过复制和传阅,作了广泛的传播,和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书》以及《圣约翰启示录》一起形成了早期基督教的本旨,后来则变成了《新约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成员起初主要是些穷人、奴隶甚至罪犯等,表明早期基督教吸收信徒不分阶级、种族、等级。信徒入教后互相帮助、救济,关系非常密切。其教义主张人人平等,仇恨富人,反对罗马统治,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在其建立过程中,它逐步经历了一些变动并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罗马人态度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帝国的中上层人士逐渐接触到了基督教,并开始接受它的教义。基督教的出现迎合了当时罗马帝国里许多人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普遍对当时生活感到厌恶,对来世非常向往。由于官方的宗教已不复存在,他们没有地方去寻求精神安慰。在这种混乱而无所适从的社会与宗教环境里,犹太宗教团体以其稳定和善恶感而逐渐取得了许多罗马人的好感与信任。

2) 对其他思想流派的兼收

从内容上说基督教在创建过程当中注意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特点,特别注意吸纳当时罗马帝国境内影响比较大的几种思想,使其主要教义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派及灵知学派等流行的一些思想主张基本相吻合。《新约全书》的出现和耶稣的殉难更加推动了一般人对基督教的信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组织里来。

3) 对本身教义的修正

与此同时基督教为了进一步提高它的感召力,对其本身的一些教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加入基督教的人不必施行割礼。一些烦琐的犹太习俗,如妇女遮头、男人露头等也都普遍予以遗弃。从简单的洗礼仪式和纪念耶稣的最后晚餐开始,基督教逐渐将其他宗教的一些习俗、节日和礼仪改为己有,使之适应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创建了一种以保罗书信和《约翰福音》为开端的神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希腊哲学思想对基督教的演变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如基督教认为其教旨里,耶稣即为逻各斯(logos,其在柏拉图神学里意思为精华,在亚里士多德思想里为“理性”,在斯多噶派为“灵魂”的化身),也就是替抽象的上帝赋予了人的形象。

4) 此外基督教又从犹太教里引进了“圣灵”的观念,从而完成了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Holy Father, Holy Son, Holy Spirit)三位一体(Trinity)的组合工作。至此,基督教的思想框架基本组成。但这种三位一体思想成了以后新毕达哥拉斯和新柏拉图哲学的依据,因此也导致了基督教的分裂。由于这些原因,有的学者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折衷的宗教,但或许将它当作是犹太教的延续或变种更为合适。在此基础上,非犹太人和希腊化的犹太宗教皈依者又

加进了自己的阐释和礼仪形式。

3.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公元4世纪基督教取得了罗马国教的地位。当时密斯拉教^①试图和基督教争夺宗教领导地位,但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看到了基督教的强大影响力和可以利用之处,一改以前诸帝对基督教的镇压政策,而采用了一种亲善的政策来对待基督教,他本人临终前还加入了教会。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国教。从那以后,基督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教会开始拥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严密的管理机构,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主教统辖,大主教则管理着几个教区。公元451年,罗马主教列奥一世(Leo I)宣称罗马的主教是耶稣的主要门徒彼得的继承人。为了进一步巩固教会,他们在罗马设立了教皇职位,以模仿耶路撒冷圣殿里的高级祭司。这样,当罗马帝国在西部衰败时,教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它的继承人,因为它是帝国的官方宗教,象征着帝国的权威,又占有着一部名为《君士坦丁赠品》(*Constantine's Gift*)的文献(该文献在1440年被证明为伪作)。据说,在这部文献里君士坦丁大帝授权给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Cilvist I),让他享有对罗马帝国西部的主权。进入8世纪后许多真挚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逃避世俗世界而建立起寺院制度。他们仿效埃森人的禁欲生活,强调过一种集体的隐居生活。最著名的寺院为诺西亚的本尼迪克所建的蒙特·卡西诺寺院(Monte Cassino)。在这里,教士们除了简朴的生活就是念经祈祷,讨论和阐述对基督教的不同理解。正是这样的教会组

^① 密斯拉教(Mithraism),起源于波斯和印度的密斯拉神,到公元前5世纪密斯拉已成为太阳和智慧之神。密斯拉教曾在罗马帝国盛行一时,它宣扬善、恶之战,有一套礼仪和道德系统,但到了公元3世纪后期开始衰败。

织保存了古典主义和犹太文化的精髓 ,度过了哥特人入侵所造成的黑暗时代。

三、基督教的主要教义

基督教教义在基督教诞生后经过了一个逐步完善和统一的过程 ,其间几次重要的教会会议和产生的几个重要文献对于统一基督教传统和教义贡献甚大。

1. 两个重要会议文献

这些文献中最为重要的是《尼西亚信经》(*Nicaea Scripture*)。它在公元 325 年被“尼西亚会议”采纳 ,公元 381 年在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得到了扩充 ,公元 451 年又获“凯尔西顿会议”批准。它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阐述如下 :“我们相信唯一的上帝 ,无所不能的天父 ,天与地 ,有形物与无形物的创造者 ,我们相信唯一的基督耶稣 ,上帝的独生子 ,是天父在太古时代所产生 ,光中之光 ,真正上帝之中的真正上帝 ,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制作的 ,和天父同属一体 ,通过他万物始生 ;为了我们的人 ,为了我们能被拯救 ,他从天降临人世 ,被圣灵和圣母玛丽亚孕育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为了我们而被彭修斯·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受苦受难 ,埋入坟墓。根据记载他在第三天又死而复活 ,升入天堂 ,坐在天父之右侧 ,而后又带着天国的荣耀而来 ,审判人间的生死。他的王国不会有尽头 ,我们相信圣灵 ,即来自天父的基督 ,生命的赐予者。圣灵、圣父和圣子一起受到人们的崇拜和赞美。他们通过先知来说话 ,我们相信一个真正的天主教使徒教堂。我们承认洗礼可以赦免罪孽。我们寻求死而复活以及来世生命的到来。”

公元 529 年 ,“奥吉兰会议”(*Orchiland Council*)同意了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提出的罪孽以及赎罪观的理念 ,其要旨可从以下教规中看出 :

由于第一个人所犯下的罪孽 ,自由选择已成乌有 ,因此 ,如果没有上帝的恩惠 ,就没有人能按照其本意去爱上帝 ,或相信上帝能够行善事。

所有受过洗礼的人 ,在收到上帝的恩惠后 ,在耶稣的帮助和合作下 ,只要忠心耿耿地劳作 ,就都有权利和义务去做一切可以拯救灵魂的事情。

2. 其他教义教规

后来在这些基本神学的道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些中世纪基督教传统的重要内容 ,它们包括以下几点 :

1) 三位一体(Trinity)的特征

力量(Power)——圣父(Holy Father);智慧(Wisdom)——圣子(Holy Son) 和仁爱(Love)——圣灵(Holy Spirit)。

2) 圣礼(Holy Proprieties)

通过具有精神意义的象征标志和各种仪式 ; 来窥测内心的精神恩惠 ”。其中有 :

① 洗礼(Baptism) :浸洗在水里 ,或用水泼撒在身上 ,表明对原罪的涤除和已被纳入教会。

② 按手记 :施洗礼时将手按下 ,表明有能力承担基督教义务。

③ 忏悔式(Confession) :在神父面前忏悔 ,神父以上帝的名义赦免洗礼后所犯下的罪孽。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偏离了基督教正道 ,他可以通过忏悔或悔悟 ,来定期地和耶稣团聚。

④ 圣餐(Holy Communion) :即分享神圣化了的面包与酒以纪念耶稣及其门徒的最后晚餐 ,从而表明受圣餐者已神秘地收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躯体和血。

⑤ 授职仪式(Ordination) :牧师授职仪式。

⑥ 神圣婚姻(Holy Marriage) :向一对夫妻一生一婚制结合所表示的祝福。

⑦ 临终涂油礼(Anointment) :由一个牧师将特制的献祭油涂在临终者的身上以赋予恩惠 ,求得对罪孽的宽宥。

3) 最后的审判(Judgment)

在世界末日的法庭上 ,所有的人 ,无论活者死者 ,都将受到耶稣的审判 ,最终被分出善恶。

4) 天堂(Paradise)

星际之外上帝的住所 ,由天使和赎罪者的灵魂居住。

5) 地狱(Hell)

撒旦住所 ,被惩罚的永久之地 ,坐落在地球上 ,由火、黑暗及其他折磨人的惩罚手段组成。

6) 炼狱(Purgatory)

死后的一种暂时惩罚状态 ,以消除用其他办法无法消除的罪孽。惩罚期视罪孽大小而定。在炼狱受罪的灵魂可以得到神父的礼物和接受生者所作的弥撒。

7) 弥撒(Mass)

正式的宗教礼拜仪式 ,其程序包括一系列的准备仪式 :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十字架法规 ,圣餐仪式 ,一个大感恩祈祷及最后解散。它有 4 种循序渐进的简单形式 :由主教级教士主持的弥撒 ,庄严弥撒 ,大弥撒和小弥撒。小弥撒是朗读的 ,其他则从始至终是唱的。

8) 七种美德(virtues)

由柏拉图和斯多噶派提倡的四种主要美德(谨慎、节制、坚忍和公正)加上神学上的美德(信仰、希望和仁爱)组成。

9) 七种严重的罪恶(sins)

即骄傲、妒忌、发怒、懒惰、贪婪、暴食和淫欲 ,但这七种罪恶是“可以宽恕”的 ,这些罪并不疏远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不同于盲目崇拜、谋杀和通奸这些“不可宽恕”的罪孽。犯下那些不可宽恕的罪行以后 ,罪人就要有可能被开除教籍 ,要想重新加入教会组织就得进行严格的忏悔。

10) 圣徒(Holy Apostles)

已去世的基督徒。由于生前非凡的圣人品质而被教皇宣布封为已享受到的天堂待遇。所谓守护神是由一个人或组织选中的保护人 ,或人与上帝之间的特殊调解者。

11) 圣日(Holy Day)

每个星期天。到了 12 世纪每年共有 36 个特别节日 ,诸如圣诞节(耶稣的生日)、棕榈星期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受难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节(耶稣复活每年春分月圆后的第 1 个星期日)、五旬节(复活节后的第 7 个星期日 ,纪念圣灵的降临)。四旬斋(大斋期)或四旬斋季节则指圣灰星期三(大斋期的第一天 ,复活节前的第七个星期三 ,用灰涂额以示忏悔)到复活节前夕 40 天的忏悔期(星期天除外)。

12) 开除教籍

部分或全部驱逐出教会 ,通常伴有公民权的丧失 ,暗示永久性

地罚入地狱。

四、基督教的分裂和发展

基督教的最终形成估计是在公元 2 世纪前后,而它作为国教地位的确立显然是在 4 世纪末叶。从那以后,基督教的身价日趋上升,世俗社会的统治者可以不断变更,而基督教的地位却不可动摇,似乎已经成为西方精神世界的一种永恒象征。尽管如此,基督教的发展还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基督教内部经历了两次大分裂;其二是基督教和世俗政权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控制和反控制的反复变化;其三是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经历了几个大小不等、高低不同的阶段。

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确立为国教之后,发展势头迅猛,在较短时间里就成为帝国上下普遍认同的宗教信仰,任何其他宗教都不能与之相比。然而随着帝国的分裂,基督教内部的分歧也日趋明显。这种分歧主要不是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而是对罗马教廷的态度。自从罗马帝国分成两部分以后,基督教事实上就形成了两个中心。从 7 世纪起东、西基督教的分歧就愈发加剧。1054 年东西两部分基督教教会在罗马的会谈失败,双方互相宣布开除对方教籍,造成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基督教正式分裂成为罗马天主教(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和东正教(the Orthodox Eastern Church)两大教派,两教派势不两立,行同路人。500 年以后,马丁·路德等人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了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经过这两次分裂,基督教实际上一分为三,即天主教(服从罗马教皇领导的基督教教会)、东正教(不服从罗马教皇领导,相对独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基督教教会组织)和新教(the Protestant Churches,和罗马教廷决裂,主张基督教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教派的统称)。下面对这三个教派分别予以介绍。

1. 天主教

天主教除了遵循基督教的一般教义之外,还有几点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强调教会传统的权威性、教皇无错论、三位一体说、炼狱说、无玷成胎说以及圣母升天说等。它的一套神学理论经过几个世纪的加工和改造,尤其是经院哲学的提炼和升华,已形成了独特的框架和内涵(诸如它的修炼制度)。它一再提倡的独身生活方式和平等思想,使得它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从罗马传到了西班牙、爱尔兰、卢森堡、比利时、葡萄牙、奥地利、波兰、法国、拉美诸国,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成为绝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另外在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瑞士、德国、黎巴嫩、南斯拉夫、菲律宾、加拿大和美国天主教也都成为比较重要的宗教,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罗马尼亚和俄国等国天主教也拥有一定比例的信仰者和支持者。今天全世界天主教教徒已经超过5亿。

天主教是人类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不仅信教人数众多、覆盖地区面最广,而且它对哲学、思想乃至文学、艺术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天主教作为一个教派是从东正教分裂出去时开始的,但其渊源却要早得多。根据《新约全书》记载,早在基督教创建之初,基督教教徒们对有关基督教诲和表现的记述便有不同看法,所谓真假之分便是指这类事。后来写的《信使行书》一书中这个问题更加明显,当时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分歧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2—3世纪法国里昂主教艾雷尼厄斯正式提出了耶稣信徒之间有分歧的观点,他从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地整理出天主教的主要特点。首先,他认为《圣经·新约全书》是基督信徒们写的。其次基督信徒建立的主教中心是他们指定的继承人管理教会时的住地。第三,标准教义里,使徒的传统就是“信仰规则”,也就是基督教的行为标准。

这三条既有区别,又互相依赖,可以用来判断圣经经文是否出自信徒之手。如果出现不同看法,可以要求信徒委员会乃至罗马教廷做出仲裁。对于罗马教廷作出的决定,所有的教会组织都必须服从。这些规定和先例实际上为以后罗马天主教的出现作了准备,罗马天主教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创立的。

罗马天主教还和耶稣信徒彼得有关。根据基督教的传说,彼得是耶稣 12 门徒之首。他先在耶路撒冷和安条克传教,后来去了罗马,在那里以身殉道。罗马天主教将他视为耶稣弟子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同时也将罗马教区视为众多基督教教区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从而确立了罗马主教在基督教中的特殊地位。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罗马在罗马帝国中的政治地位。然而,当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将帝国首都东迁时,罗马的政治地位显然受到了削弱,教皇的权威也受到了挑战。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东正教终于从基督教里分裂出去,罗马天主教也就冠冕堂皇地登台亮相。

促成罗马天主教取代基督教的原因当中,除了基督教内部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首先是伊斯兰教的兴起。伊斯兰教由先知穆罕默德创建于公元 622 年,发展很快,不到一年,该教就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开来,取代了原来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成为北非、中东地区和部分亚洲国家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发动的圣战对基督教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 10 年当中,基督教早期 5 座牧首驻地城市有三座被穆斯林攻占,只留下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还在基督教手里。外部矛盾的加剧,显然给了罗马天主教加强自身地位的机会和借口。

另一个原因是日耳曼人尤其是哥特人当中信仰基督教人数的增加。西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日耳曼人大批进入罗马和其他城市,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哥特人接受了基督教文化,成为基督教信徒。他们的加入无疑壮大了罗马教会的势力。他们人在罗马和欧洲,接触的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正统思想,自然和罗马教会的

关系更为紧密。难怪法兰克人皇帝查理曼要罗马教皇给他加冕，并以获得罗马皇帝称号为荣了。

在基督教朝天主教转变期间，有两位教皇值得一提。一位是列奥一世(Leo I, 公元 440—461)，一位是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I, 公元 590—604)。列奥一世对基督教义的阐释，尤其是在 451 年加尔西顿会议上对基督具有的神、人两性的解释以及罗马教廷对边远地区教会管辖权的重申，都对加强和巩固教皇的权威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两次出面阻止了外族军队对罗马城的洗劫。一次是 452 年对匈奴人，另一次是 455 年对汪达尔人。由于他的出面干预，这些蛮族军队在攻下罗马以后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破坏，罗马城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另一位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对中世纪天主教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他在 6 世纪末成功地促成英格兰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任命圣奥古斯丁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使之服从罗马教廷领导。他在日耳曼人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巧妙周旋，取得了一种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与此同时，在基督教内部也加强了罗马教廷对世界各地教会的统治，声称他的管辖权在所有教会，包括君士坦丁堡教会之上，从而为确立罗马教会的至高无上地位奠定了基础。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天主教派在基督教世界里进一步巩固了地位，到了 10 世纪时它成为所有欧洲国家的国教。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国家已不再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但是罗马天主教廷通过组织十字军东征，取得了一些象征性成果。应该说十字军战争并没有收复多少失去的土地，但至少在精神上给基督教徒们一些鼓舞，增加了他们的凝聚力，让他们意识到了基督世界的力量。

天主教的影响从中世纪开始更多地通过其在教育、文化、思想方面的作用体现出来。资本主义的兴起对知识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欧洲一些国家先后办起了大学。早期大学中的教师大多

数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他们传授的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主义文化知识实际上大多来自阿拉伯人转抄的阿拉伯文译本。同时大学里也聚集了一部分研究神学和哲学的学者。中世纪经院哲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实际上天主教在罗马教廷的统治下已不再是单一的宗教机构,而形成了一个集政治权威、神学权威和知识权威于一身的庞大集团,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产生着任何其他力量无法替代的制约作用。

天主教教义的传播,促使部分笃信宗教和厌恶世俗生活的教徒们离开社会、聚集在一道过一种清贫寡欲的集体生活。这种修行在中世纪虽然并不普遍,却得到了天主教教会的支持。在那战争不断、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里,这种隐修的生活方式无疑给那些淡泊名利、心地善良、追求精神世界的人提供了一种摆脱人间烦恼的修行制度。

天主教在 10 世纪前后开始成为欧洲的一种重要政治力量,但它的威望并非至高无上,其内部的腐败和德意志皇帝的干预严重制约着它的工作效益。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继位后给天主教各教区的主教们和教堂主持分封土地和其他不动产,让他们为他效劳,并成为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后来,他攻占了罗马,迫使教皇为他加冕,封他为“罗马皇帝”。以后的几十年里,罗马教皇的任免实际上全部由他和他的孙子奥托三世说了算。法国和英国的天主教会相对而言比较自由些,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封建统治阶级处于分裂状态,或者说是由于政教合一的缘故而无人干预。

当时的基层教会主要依附于各地贵族。贵族提供的土地,是他们的经济依靠,他们负责喜庆婚丧和其他场合的宗教仪式,包括当地人的洗礼、涂油和葬礼这些日常工作。此外,一年四个重要的宗教节日,即圣诞节、复活节、圣灵节和圣母升天节的庆祝仪式也要由牧师亲自主持。

罗马天主教教廷从 11 世纪后半叶开始进行的一些变革使它

改变了以前的软弱形象。改革的发起者是格里高利七世,他曾经两次被开除了教籍,而且两次改革失败,但是他的勇气和刚直果敢的精神还是为他赢得了不少声誉。在教会内部的管理方面他也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例如任命了教皇全权代表,对外进行各种谈判。他通过举行宗教会议和印制各种出版物同各个教区主教乃至一般教堂的牧师建立了广泛联系。这样,原来分散的教区和教堂就在这种联系里开始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大大扩展了教会的势力,客观上有利于天主教会地位的提高。

另一位对教会改革有贡献的人是列奥九世。他主要通过外出巡视、召集宗教会议、发布各种命令和告谕来扩大天主教教会和他本人的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大胆起用一些非罗马籍人士担任教廷的神职人员,选派得力人手担任教皇代表、出访各地、监督和检查教廷命令贯彻执行情况。他是个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工作效率很高,但处理问题时不够冷静,犯了些错误。首先,是他的冲动导致了罗马教廷和诺曼人之间的战争,战争造成的损失惨重。另一个错误是任命了思维僵化,脾气暴躁的汉波特出使君士坦丁堡,不到一年功夫东正教就从罗马教廷分了出去,造成了基督教内部的第一次大分裂。

教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主教的任命。基督教早期,主教是由神职人员和民众选举产生的,担任什么职位都要举行正规的授圣职礼。但到了封建社会,国王和贵族却对这种授职方法表示反对,将选举变成了国王任命。他们的授职仪式也变了味,先是向主持仪式的贵族老爷表示敬意,然后再举行授职仪式。这种授职有些类似于买卖圣职,因为涉及给钱要钱的交易。这个问题后来经过教皇和德意志国王长达 50 年的反复争论,教皇格里高利二世和德意志国王终于达成了一个妥协协议,规定主教选举应当由神职人员自由举行,然后再进行授职仪式,向国王表示敬意。

从公元 11 世纪中叶到 12 世纪中叶这 100 年时间里,天主教

对欧洲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段时间里欧洲的高等教育、人们的思维和说话的方式乃至哲学和神学中的某些重要方面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和天主教教会分不开的,有的由教会支持进行,有的则有教士们的参与。哲学上的成就主要是对逻辑和辩证法的运用。除了对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习惯的改进之外,主要体现在神学的阐述上面。从严格意义上说,神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12世纪初。它最早源出于用作宣讲圣经经文的警句格言。这些格言采用了问答的方式归纳了基督教信仰,深入浅出,有些辩证思想,为以后三段论的神学研究开创了先例。这类格言警句后来收集在P·伦巴德的《格言四部》里。这部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两个重要成果——大学以及所谓的新亚里士多德逻辑一道推动了当时欧洲思想文化的进步,使欧洲进入到一个更为注重形式和知识的时代。

罗马教皇制度的权威到了12世纪中叶教皇格里高里七世的手上达到了顶峰。他视教会和国家为一体,视教皇权力高于一切,甚至可以管辖世俗社会和国王。在他的倡导和垂范下,教皇在欧洲,主教和牧师们在各自的教区和教堂当中都享有比以往更多的权力和权威。教皇颁布的命令在司法上的重要性超过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教皇领导的教会等级制度变成了教皇专制制度。这种变化的负面效应之一是抬高了部分教堂的地位,造成了拉丁教堂和希腊教堂之间的对立,负面效益之二是开始出卖赎罪卷和圣职,为教会以后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12世纪中叶有关教会的异端邪说还很少听说。对天主教的责备最早来自于意大利教士阿诺尔德,他对教会的财富和腐败提出了尖锐批评。后来意大利出现了一个叫做“纯洁”的异教教派,它在组织形式和宗教仪式上仿照基督教,但在教义上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将耶稣当成一种肉体的化身,视物质和人体为一种恶,而将精神当成一种善。它强调安贫乐道、真诚团结以及互相帮助。

比起天主教上层当中的奢侈腐败来,它对许多人都更有感召力。“纯洁”被罗马教廷宣布为异教之后,先后受到十字军的攻击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此外还有些其他的异教,如法国人瓦尔狄斯创建的“韦尔多派”,意大利伦巴迪的“羞辱派”等。这些组织普遍都强调要过贫困生活,主张诵读圣经和祷告。它们的产生表明当时天主教内部由于腐败等原因已经难以在思想上保持统一,组织上也已出现了裂缝,改革的呼声已经出现了。

1215年罗马教廷召开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产生了对天主教有重要影响的几种规定。首先是有关托钵教士的问题,规定允许那些安贫乐道,信仰纯洁的教士组织起来,到各个教区传教,不受当地主教或牧师的管辖。另外还对每年举行的忏悔和圣餐仪式提出了要求,减少了对结婚的限制,平息了许多人以前对此提出的批评。这些问题当中,托钵教士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调解了那些有志于从事教会工作人员的矛盾,为他们的传教和对神学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神学研究当中有一重要进展:天主教学者除了从西班牙和意大利西西里等地引进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典著作外,还把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观念,如逻辑上的三段论以及他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书中的一些看法运用到神学的研究当中。虽然有的观点带有些折衷主义思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显得不够坚定和彻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研究逐渐系统化,使得神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取得了些成果,渐渐形成了所谓的经院哲学,产生了诸如托姆斯·阿奎那和阿尔伯托·马格诺斯和波拿文都那这样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同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还在艺术等领域里得到了应用。

从13世纪末起,天主教的一些问题开始暴露出来。首先是曾经盛行一时的圣方济修会出现了分裂,一派主张坚持创会伊始的精神,仍然去过绝对贫穷的生活,追求精神的高尚。另一派则主张

接受教皇的意见,适当放松一下。两派的争吵长达 60 年,对罗马教廷乃至社会都有很多的负面影响。其次,宗教裁判所对持不同宗教观点者的宣判和迫害也大大破坏了罗马教廷的威望。任何对基督教教义有怀疑的人都面临着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这种审判又是极不公正、极不人道的,激起了许多人对罗马教廷的不满。第三是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犹太人大批流落到欧洲各地经历了许多沧桑后一度安定下来,人口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在基督教世界里他们仍被视为异己分子,和那些异端邪教一样。十字军东征时就有大批犹太人遭到屠杀,他们还背上了不敬神和杀害儿童的罪名。一些无知的人常常用这种诽谤来诋毁犹太人。天主教第四次拉特兰公报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区别于其他人的徽章,不得在政府部门任职。从那以后,犹太人被限定住在大城市的一些特定地段,这些地段被称为犹太区,犹太人还被规定只能经商。犹太人凭着自己的努力生存了下来,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其他商人,这引起了他人的忌妒。从 13 世纪末叶开始犹太人被英国和法国政府赶了出来,虽然德国和意大利没有公开那么做,但似乎也不怀好意。这一切都是在天主教教会的纵容乃至指使下进行的。

14 世纪初,罗马天主教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教皇伯尼法斯八世在他自己的寝宫里被人绑架,送到了法国的亚维农。这起绑架的幕后指挥是法国。他们出钱雇人,目的是羞辱教皇而不受任何惩罚。教皇和他的继任人被迫离开罗马,在亚维农一呆就是将近 60 年,比公元前 6 世纪犹太人的巴比伦之囚还要多十来年,所以也有人戏称教皇的这次劫难为“巴比伦之囚”。

这段时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传教士的活动。在教会的同意下,许多人跟随十字军宣传基督理想,也有的参与建立隐修的教堂或修道院。他们的足迹从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到西边的西班牙、中部的德国、北面的波罗的海沿岸,有的甚至跑到了中东和远东的亚洲国家,个别人还来到了蒙古和中国建立教堂。要不

是土耳其国王梯莫尔挑起战争,切断了欧洲和东方的联系,可能还有更多人去亚洲和远东去当传教士。来中国的传教士当中最有名的恐怕是明末到北京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巧妙地把对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义的宣传和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的崇尚结合起来,把传教活动和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起来,颇受当时中国人的欢迎。

教皇的亚维农之囚导致了天主教教会上层内部的分裂,出现了两个教皇,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并开除对方的教籍。吵吵闹闹,持续了30多年时间,直到1414年召开的康斯坦斯会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该会议不但对教皇的产生办法做出了规定,而且还就教会委员会和教皇的职权、地位提出了重要的改进意见,指出教会委员会不仅在紧急情况下开会,而且还应作为一个常设立法机构定期碰头。它是全体神职人员的代表机构,其职权应在教皇之上。这个会议精神后来在佛罗伦萨会议上得到了重申。由于这种至关重要的提法,这两次会议对天主教中世纪后期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13世纪以后天主教内部矛盾日趋突出,上层领导之间争执不断。因为腐化和道德问题天主教教会的威望也连续下降。新兴的中产阶级对天主教没有多少兴趣,许多教徒也强烈希望教会能够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新教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面对社会和教会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天主教开始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动,例如在教义当中增加了对圣母马利亚的条款,圣母马利亚故此在天主教当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这些调整和变动受到天主教徒们的广泛拥护。

东正教从基督教里分裂出去以后一度曾想缓和同天主教的关系,但是由于天主教以老大自居,要求东正教诸教会承认罗马教廷在基督教世界的领导地位,结果妥协未成,只好维持原状,谁也不买谁的账,直到800年以后的1956年罗马教廷撤消了当年开除东正教的法令,兄弟俩才有机会坐到一起。

由于罗马天主教会所奉行的保守、愚昧政策,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欧洲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方式都受到严重的压抑,缺少有益的发展。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为宗教的影响所扼杀,几乎很少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即使是自然科学由于缺乏必要的学术和思想自由也无法取得应有的成就。这些情况将在本书的文艺复兴部分作进一步介绍。

2. 东正教

自从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教廷的政治地位受到了很大削弱。虽然教皇仍然常驻罗马,但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首的一些东方教会却不时地对罗马教廷的权威性提出质疑。他们声称,在基督教世界里,罗马是和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一样平起平坐的,只是后来罗马成为帝国的首都,它依靠世俗社会的政治地位才成了基督教的中心。这样的争执持续了几百年时间,双方各不相让,严重地影响了基督教内部的团结。9世纪末君士坦丁堡教皇富提欧斯发布文告,正式谴责基督教尼西亚信文中有关三位一体的提法,其间,富提欧斯和教皇约翰八世虽有过接触和让步,但终究不能达成谅解。以后,双方各不相让、积怨甚深,终于在1054年双方在君士坦丁堡会谈时唇枪舌剑、各执一词,最终不欢而散。结果是互相开除教籍,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的第一次大分裂。

东正教教名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东”是指东正教的分布区域,即罗马的东面,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地区,包括东欧和亚洲部分地区。“正”是正统的意思。东正教信徒以基督教前七次会议规定的信仰和实践方式为自己的行为指南,对于和他们不同的基督教思想他们均视为异端邪说。东正教原来可能主要在希腊语地区,所以又称“希腊正教”,但后来显然扩大到了更多的地区。东正教强调自由、自力和自主的精神。虽然它的活动中心在君士坦丁

堡,重大决定却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一个全基督教会议行使最高权力。各地方教会有权决定本地区范围里的重要问题。君士坦丁堡教区的教主也是东正教教主,但在一般情况下,这只是个名誉称呼,从实质含义来说,东正教并没有“罗马教皇”那样高的职位。

东正教虽然没有至高无上的教皇,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要接受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皇帝的领导。自从东、西罗马帝国分开以后,普遍都认为基督教社会只有一个,由帝国和教会共同领导。从理论上说,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可用所谓“具有双重权威的政府”来表述,就像是一个生命由其灵魂和肉体两部分组成一样。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皇帝的权力明显高于教会。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历史上君士坦丁堡教主当中也出现过几位令东罗马皇帝感到头疼的人物。如10世纪的教主尼古拉·米斯提珂斯(公元901—907,912—925在位)以及波利欧克托斯(公元956—970在位)都曾经将皇帝开除了教籍。

东正教除了在君士坦丁堡设有教主外,在其他地方也有自己的组织。一般来说,各地的东正教发展和该地世俗政府的势力大小有一定关系。从13世纪中叶开始,君士坦丁堡从拉丁人手里转入到尼西亚人手里,建立了帕里奥罗格斯王朝。由于内战不断,帝国陷入内外交困、自顾不暇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教主充分利用这一局面,将东正教势力扩大到了俄国、欧洲的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附近的亚洲一带。然而,君士坦丁堡教会,不能得到拜占庭政府的支持,无法有效控制这些新成立的东正教教会。结果莫斯科、基辅、立陶宛、白俄罗斯乃至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东正教教会都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纷纷扯起了独立的旗号。

自从东罗马帝国进入帕里奥罗格斯时期,帝国的安全实际上一直受到拉丁人和土耳其人的威胁。出于安全的考虑,东罗马帝国皇帝总是试图和罗马天主教教廷重新建立一种友好关系,以便

在必要时得到昔日兄弟的援助。为此,东罗马皇帝几次派遣使节,有时甚至亲自出马商谈恢复关系的有关事项。然而皇帝的苦衷并不能为东正教的教主和主教们所理解,倒不是他们在基督教教义上面和罗马天主教教廷势不两立,主要是他们希望和罗马教廷平起平坐,以对等身份通过召开全基督教会议商谈解决分歧,而不是俯首称臣。罗马教廷不肯放下架子,这样问题三番五次地搁置起来。到了1439年,帕利奥罗斯格斯皇帝约翰八世和东正教教主及主教们再次赴罗马谈判,几乎接受了罗马教廷提出的所有条件,包括三位一体、炼狱的教义以及罗马的领导地位。但是回到君士坦丁堡以后由于个别人的异议,导致了許多参加会谈人的反悔,这样原来草签的协议再次被搁置起来。13年以后,东罗马帝国的形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在这危急时刻,东罗马终于同意签署这个和罗马教廷联合的协定,可是为时过晚。第二年,即1453年,君士坦丁堡就落到了土耳其人的手里。

尽管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作为一个国家是灭亡了,但是东正教还是幸存了下来。或许是因为它拥有广大的教民,土耳其人不敢对它轻举妄动;或许是它还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对稳定政局不无帮助。东正教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到了15世纪时已经成为东欧和西亚一带屈指可数的宗教,它不仅在政治上对国家政权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还有了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它所倡导的教会自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正教的发展。设有教主的东正教教会包括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亚历山大(埃及)和安提克(总部设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此外在耶路撒冷、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美国都有它的组织。这些教会负责人名称不完全一样,有教主、大主教和边主教之分,这些名称反映的只是过去历史的变迁。目前,东正教主要是根据地区的不同而确立管理范围和隶属关系的,通常全基督教会议还是由君士坦丁堡教

会负责,但这也只是种荣誉性职责而已。

东正教竭力提倡修行,继承和发展了基督教的这一传统。它修建了几处较大的修道院,供那些厌恶世俗生活、追求一种清静纯洁精神境界的人居住。修行的人在这里过着一种清贫的集体生活,每天诵读经文,清心寡欲,刻苦磨炼,希望能在浑浊的大千世界里找到一块净土。当时著名的修道院有君士坦丁堡的斯丢迪翁院,修士多达1 000余人。基辅的凯吾士修道院和亚瑟·纳特的圣亚莎纳修斯修道院也都名重一时,后者还受到过皇帝的御赐护院封匾。东正教在处理有关苦行静修问题上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为此举行过几次神学会议,由于皇帝的支持,苦行静修的主张最终占了上风,从而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静修运动的发源地阿索斯也因此名声大振,成为许多教徒向往和朝拜的地方,也是许多艺术家们创作的源泉,例如著名画家安德莱·卢布里约夫的人物肖像画题材就取自于阿索斯山,和拜占庭时期的文化精神生活联系紧密。

东正教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对天主教神学思想的了解一直比较关注。东正教神学人员普罗克卢斯兄弟在皇帝的资助下比较系统地把一些拉丁文神学著作译成了希腊文。它们当中包括圣奥古斯丁,圣安塞姆和托姆斯·阿奎那这样一些名家的著作。它们的翻译不仅有利于双方神学思想的沟通,也为当时双方的接触与和解创造了条件。

土耳其奥斯曼苏丹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后对东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不仅允许它继续进行活动,而且还提高了它的地位,让君士坦丁堡教主掌管土耳其帝国所有的基督教徒。当然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想让东正教和他自己的伊斯兰教一样平起平坐。事实上他对东正教的活动还是有限制的,例如在君士坦丁堡为基督教徒专门划定了一个叫做“罗马人区”的居住区,享有内部自治权,但其外部管辖权却在土耳其人手里。在苏丹看来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一

样,属于“书中人”,就是说其信仰并非都是假的,只是不全面而已。

东正教从土耳其人的政策当中起码获得两个好处。一个是君士坦丁堡教主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和提高。奥斯曼帝国内所有东正教教会这样一来便要听命于他。他讲的话和发布的命令不仅仅限于教义上或是精神上的意义,而且带有实质性的和政治性的作用。对于处于受奴役受压迫的希腊人及其他民族来说,东正教教主不仅仅是拜占庭教会的继承人,也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而对土耳其统治者来说,他又是受到严格控制的罗马人的管理者。为了庆祝自己地位的提升和获得的这些新权力,君士坦丁堡教主特意为自己设计制造了一副行头:头戴王冠般的主教帽,披肩长发,胸佩标有苍鹰的权徽,身着皇家衣饰。

另一个好处是东正教教会在它的教徒中间的威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一般教徒而言,东正教组织不仅为他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为他以后的社会出路创造了条件。后者对土耳其的希腊人来说尤其是这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神职人员职位当中很大一部分为希腊人所占据。教会地位的提高,促使希腊人把这些神职岗位当成了一种传统继承下来,形成了一个叫作法纳尔的阶层,专门在君士坦丁堡政府部门和教会里担任各种管理工作。以后这种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正教所有的主教职位乃至教主位置都由希腊人担任。虽然希腊人的这一现象为土耳其人所赞许,但却为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所憎恨。尽管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会有些狭隘民族主义的因素,但无可否认这也和希腊人关注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分不开。他们很早就向土耳其当局申请在自己的民族居住区开办学校,发展自己的文化,为自己民族的复兴作了准备。

16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内部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结果是一些新的教派从中分裂出来,这些新的教派统称新教。有关宗教改革运动和新教的内容将在本书的文艺复兴部分作介绍。

五、《新约全书》介绍

《新约全书》是包括 27 卷本的文献汇集。成书于 1 世纪后半叶或 2 世纪的前半叶 ,都是些对早期基督教的回忆。原文都是用希腊语写的 ,可能是从当时巴勒斯坦的通用语言阿拉米语翻译过来的 ,它包括四部简短地回忆耶稣生活的《福音书》(Gospels) ,一部描述早期基督徒传教活动的《使徒行书》(Acts of the Apostles) ,一部《圣约翰启示录》(The Revelation of John) ,还有些早期基督教徒中间流传的短信(Letters)等内容组成。

在《福音书》四部书里 ,马太(Matthews)、马可(Mark)和路加(Luke)三部书被视为对观福音书 ,因为它们有许多平行之处。合理的解释是《马可福音》最早 ,其他二部是在《马可福音》和其他已失传的资料基础上创作而成的。第四部《约翰福音》是一部独立的篇章 ,风格上别树一帜。

《马可福音》约在耶稣去世以后 35 年左右的时间里写完的 ,其中有关耶稣生平部分主要取材于彼德讲述的耶稣故事 ,包括耶稣给人看病、耶稣的遇难和复活。其开头是洗礼者约翰为耶稣洗礼 ,后又描述了约翰的被捕以及耶稣的一系列布道和神迹的表演。

《马太福音》传说是使徒马太所写。其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其一是耶稣的个人生平故事 ;其二是有关耶稣的传教活动以及一些犹太人对他的非难 ;其三是耶稣的遇难和复活。马太喜欢将耶稣的生活同《旧约》中的预言联系起来 ,如将约瑟夫的家谱追溯到大卫 ,又加进了圣灵感孕、贤哲出现、逃往埃及、躲避希律以及耶稣对死亡和复活的预见等内容。

《路加福音》是对观福音中语言最为优美的一篇 ,精心叙述了约翰出世、天使加百利和万福马利亚、马槽里的婴儿、天使在牧羊人面前的出现、耶稣的显现等故事。该书除了取材于比它早 30 年的《马太福音》以外 ,还从当时传阅的耶稣言论集里获取了不少素

材,另外还增添了作者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

《约翰福音》尽管重复了前面的内容,但它对耶稣是救世主的坚持、对耶稣的神秘表现以及富有哲理的讲解,表明该书进一步拓宽了前三部书的内容,其创作当在它们之后。作者在书中谈得较多的是对圣灵的理解,旨在让人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之子。只有具有这种信念的人才能获得拯救。

《使徒行书》作为福音书的续篇,生动地叙述了耶稣及其门徒享受了40天圣餐后升天而去的情景,后又描述圣灵于五旬节降临信徒中间继续显现神迹,和以后的大众皈依以及随之而来的迫害。书的后半部主要写保罗的传教旅行和被罗马人监禁的经历。

书信中以保罗的最多,21封里他有13封,时间和次序不清楚,但对阐述教义的作用重大。《罗马人书》是保罗最长的书信之一,写于公元58年左右。和其他书信相比,这封信更为正式,阐明了保罗的许多基本宗旨,包括接纳未施割礼的异教徒进入基督教,亚当传下来的原罪教义,通过耶稣来替代赎罪,拒绝物质生活和发扬精神生活,将摩西十诫归纳在耶稣的第二条诫律上——“你要爱邻如爱己”。

《哥林多前书》(约公元54年)。保罗在科林斯住了18个月。这个城市丰衣足食,有可能提供各种圣世的诱惑。保罗给科林斯教堂写了二封信,第一封信里他祈求团结,祈求终止各种礼仪细节,如女人在祈祷时应将头遮盖起来而男人则应将头裸露出来等。此外,他还在基督教徒美德里加进了三种美德(信仰、希望和友爱),颂扬爱的精神、宣扬死者以“精神驱体”复活的教义。第二封信(《哥林多后书》)里,他提到自己受到的迫害,并隐隐约约谈及疾病,还提出教会就是耶稣的新娘这一概念。

《加拉太书》是公元52年左右保罗写给加拉太省教会的一封信。当时加拉太的教徒们为割礼问题争论不休,保罗大胆地声称基督教徒不仅不需要割礼,而且还可以免除摩西法典所规定的繁

琐条文约束,只需要信仰基督教就可以获得拯救,从而奠定了他的传教士地位。这种理论后来在马丁·路德的新教教义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以弗所书》这封信的日期和作者都有争议,但它带有保罗的思想,主张妻子应服从丈夫。

《腓力比书》是保罗从罗马监狱里写给正在组织的第一个教会,将以色列是“受难的奴仆”这一思想运用到耶稣身上,从而加强了化身约翰的教义。

《提摩太前书》是三封田园信里的一封。作者先被认为是保罗,现在一般认为是一位后期的宗教领袖。其内容讨论了女人顺从的必要性,提出了主教、副主祭和长老应遵守的规范,还包含了人们常用的格言——“贪财是万恶之根”。

《提摩太后书》包括信仰坚定,继续传播福音书等积极建议。在这封信里保罗预见到了他的死亡,要求提摩太速去,声称路加和他在一起,并请求马可陪伴他。这些内容使得这封信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

《腓力门书》是保罗写给腓力门的,为后者的一個逃亡奴隶请求宽恕,提到他希望个人自由。

《希伯来书》的作者起初认为是保罗,但近来研究认为写作日期不早于公元90年,约为罗马人对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进行迫害的时期。该信强调希伯来和基督教有关世界七个时代的理论,将耶稣描绘成一个永恒的大祭司,以在最后审判日那天死而复活作为他生涯的顶峰。

《彼得前书》约创作于公元96年。它劝告人们服从异教徒统治,鼓吹善行和心灵纯洁作为真正基督教的标志,用诺亚和大水这个寓言来预示基督的洗礼。

《彼得后书》可能属于最后一批书信。它描述了堕落天使的故事并对基督再降临的耽延做出了解释,指出上天一日如千年,地上

千年如一日。

《圣约翰启示录》是《新约》里最后也是最杰出和最富想像力的一部书,是使徒约翰在流放拔摩岛期间所写。从其内容来看,该书反映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镇压,所以一般评论家认为该书写于多米提安对基督教进行第二次大迫害前后,也就是在公元95年左右。这是一篇充满象征隐喻,富于高超想像力的神话和预言,其风格完全不同于前面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章写拔摩的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告诉他们即将到来的显圣。显圣以耶稣为七只灯台(七个教会)所围开始,他右手拿着七星(七个教会的天使),从他口中伸出来一把双刃利剑。这是耶稣发怒的一个暗示,预示他将掌管死亡和地狱的钥匙(成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和复活之间入地狱的教义基础)。

第二、三章是有关七教会之间的会议和互相指责,第四、五章又回到宝座幻景上。宝座周围又加了24个坐位,上座24位长老(12位以色列子民加上12位使徒)。宝座四周为4只生灵,即1只狮子,1只牛犊、1个人和1只六翼飞鹰(后被解释为四部福音书的作者们)。宝座右边为一个封有七印的书卷,这7印后为羔羊(耶稣)成功地打开。

开启前4只印揭开了著名的“启示录四骑师”(象征袭击罗马的灾难)。分别为一白马和骑师象征征服,一红马和骑师象征内乱,一黑马和骑师象征饥荒,一灰马及骑师象征瘟疫。第五印象征不同的殉道荣誉观。第六印预示地震。第七章里从东方(7教会所在地)来了一位天使,命令四位骑师停止伤害,他还印了12部落14.4万位信徒的前额(12个部落乘以12位信徒,再乘上成千的人口,象征所有的上帝选民)。第八章描绘了第七印的开启,预示了最后的审判。

在这一章和第九章里,7个天使拿着7把号。第一位天使吹号暗示地上三分之一被烧,第二位天使吹号时,扔到海洋里的一座

大山摧毁了海洋生物的三分之一。第三位吹号时一颗星星从天而降,毒化了地上三分之一的鲜水。第四位天使吹号时,天体的三分之一都暗淡了。第九章里第五位天使吹号时,一颗星星从天而降(路西弗),打开了地狱大门,释放出一群折磨异教徒的“蝗虫”,这些“蝗虫”是人,也是动物和鸟儿的合成物,由亚坡伦统治。第六位吹号时,从伯拉大河(伊甸园里的四条大河)出来的四位天使释放了“2亿”神奇马军,杀掉了人类的三分之一。

第十章描述了另一位大力天使,手中拿着一本小书卷。七雷发声,天上有声音告约翰悄悄封上七雷的奥秘,吃掉天使手里的小书卷,然后再作预言。与此相对应,第十章还预示外邦人将践踏圣城(基督教全体教徒)42个月(三年半),两个见证人(基督教领袖)将有权布道1266天(拟指公元65年大火后尼禄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然后撒旦(罗马帝国)杀掉他们,再过三天半(影射三年半)他们将死而复活,升天而去。结尾的第七位天使吹号带来了上帝王国到来的异象。

第十二章带来了一系列涉及过去基督教历史的新象征。这些象征取材于原始太阳神话,先是一个怀有身孕的妇人出现了。“她身披日头(马利亚),头戴12星的冠冕。一个七头十角的大红龙(罗马)想要吞没妇人的孩子(耶稣),孩子为上帝所救(复活),而妇人(遭迫害的基督教)则逃到旷野(基督徒寻求安全),过了1266天(三年半)时间。后来天上发生了战争,那逼迫妇人(早期基督教)的撒旦被摔到了地上,而那妇人则披着神赐予的二个翅膀飞回到自己的旷野(逃避),在那里又过了“一载二载半载(同样是三年半)。此外,书中还多次出现了向基督教开战的龙(罗马),后来这条龙站到了河边上(小亚西亚)。

第十三章里描述了一头从海中(罗马)来的野兽。他从龙(在这个寓意里撒旦和罗马可以交换)那里接过手,又同基督徒打了42个月(又是三年半)。随后从陆地上来了一兽,作第一兽的帮手

(尼禄的辅助祭司试图加强对皇帝的崇拜)。这头兽的手上印有神奇的 666(666 天)数目。

第十四章里,约翰看见羔羊(耶稣)站在锡安山上,周围有 14.4 万上帝选民。有一位天使宣称最后的审判时辰到了,第二位天使宣布巴比伦城(罗马)倾倒了,第三位天使规定了对拜兽者(罗马异教徒)的惩罚。这一章的结尾是耶稣拿着镰刀获得心灵的收获,而另一位天使则收取一切邪恶,丢在上帝忿怒的榨汁机里。

第十五到十八章里描述了来日的七灾,以巴比伦(罗马)的陷落而告终。第十九章则是最后审判的景象。第二十章里,一位天使将撒旦拖到无底谷,用链子将他锁在那里 1000 年。1000 年后他将被释放出来,预示生者和死者在天堂或地狱里将接受审判,只有殉道者可以享受天国的荣耀。第二十一章则展示了一个新天地,一个赋予了神荣耀的耶路撒冷。结尾的第二十二章热情描述了生命之水从上帝宝座下面流淌出来,灌溉着天国的情景。《圣约翰启示录》结尾预示这些预言完成的时间已为期不远。

六、《圣经》版本介绍

公元 2 世纪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作品被汇集到一起,冠以《圣经》(*Biblia*, 希腊文,意为一组书),用来专指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基督教圣经的前半部分即犹太教圣经,称为《旧约全书》。后半部分为公元后的作品,仅属于基督教的经典,被称为《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犹太教不承认《新约全书》,而基督教则全部接受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即《旧约全书》。《圣经》的早期版本并未留传,现在版本是后人在早期各个版本复制品基础上互相比对,择优而取的。现存最早的《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希伯来文手稿是 9、10 二个世纪的复制品。最早希腊文《圣经》是 2、3、4 三个世纪的文献。

《旧约》除个别段落是用阿拉米文写的外,绝大部分都是用古

希伯来文写的。《新约》的语言则是通俗易懂的希腊科伊那语(Koine)。早期《圣经》翻译中,最著名的译本为希腊文本(Septuagint)和拉丁文本(Valgate)两种。前者是72位在亚历山大里亚工作的希伯来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约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后者由圣·杰罗姆(St. Jerome)花了25年时间,即在4世纪时将这本书译成了拉丁文。这个版本在1592年经过修改(克莱门汀版,Clementine)成为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圣经》。

基督教改革运动后出现了更多的欧洲现代语言译本,其中英语方面出名的有公元1535年的廷德尔—科费代尔(Tyndale—Coverdale)译本和以后由英王詹姆士一世委托50名学者完成的钦定本(成于1611年)。新修订本完成于1895年,美国版则于1901年出现,其重要特点是将许多深奥的词现代化了。

到了20世纪,则有了更多具可读性也更精确的译本问世,著名的有《穆法本》(Moffat,1935)、《史密斯与古德斯彼得本》(Smith & Goodspeed,1931)、《纳尔逊圣经》(Nelson,1952),另外还有《通俗文学圣经》(*The Bible Designed to Be Read as Living Literature*,1936)以及在这本书基础上产生的《达特茅斯圣经》(*Dartmouth Bible*)。前者将韵文和散文区别开来,去掉了诗歌编号,编排上采用了大号铅字,后者除这些特色外还增加了序言和解释性文字以及许多注释。该书是罗依·钱伯林(Roy Chamberlin)和赫尔曼·费德曼(Herman Fedman)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英文《新约全书》最新版本是1970年牛津和剑桥共同出的,由多德(C·H·Dodd)教授主编。

基督教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中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一方面它在罗马帝国被宣布为国教,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担负起掌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职责。另一方面由于它的独特的地位,它保持了一种超脱世俗社会和政权的姿态,能够影响乃至控制一些国家,又可以回避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它毕竟不是万能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得不做出一些改革和让步,不得不面对和容忍一次又一次的分裂,不得不缩小它的经营地盘。这些变化将在以后的章节里作进一步的介绍。

七、基督教艺术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对西方人的思想信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西方的文化艺术发展有着不可忽视乃至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和影响在基督教产生的早期就以它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成为基督教艺术的先兆。

大约在公元2世纪,基督教还处于创始阶段,带有基督教特征的画像便出现在罗马皇家侍从住地的墙上。画面为一个男人凝视着一个在十字架上遇难的长有驴头的人。上面写有“阿勒撒迈诺崇拜神灵”的希腊文字样。当时尽管基督教已经广为传播,但十字架还是一种处罚犯人的象征,所以这画没法被人把它与对耶稣的崇拜直接联系起来。然而此画作为第一个正面理解和使用十字架的例子,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来在罗马郊区的地下墓葬里也发现了画有十字架、鱼和牧羊人这样一些象征拯救和升天之类的基督教思想的壁画。这说明基督教思想在当时已经开始在绘画等艺术领域表现出来,基督教艺术已在形成。以后在叙利亚以及过去罗马军队设防过的帝国边境地区也发现过不少画有圣经题材的绘画,诸如亚当夏娃、伊甸园以及耶稣创造的一些奇迹,例如在水上行走,让人死而复生等圣经故事。

早期基督教一直把耶稣基督当成救世主、解除苦难的神灵和导师,把他视为制定法律和宣判善恶的最后审判者。但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会和各地教堂有关耶稣作用的观念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变化表现在耶稣的形象上——他不再是那种高大、伟岸,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神祇,而是一种饱受痛苦和折磨、背着沉重十字架的生灵。现存最早的这种塑像保存在德国科隆大教堂

里。这座耶稣像表现的肉体痛苦已经到了不能承受的程度：头颅下垂，两眼紧闭，嘴巴微开。类似的形象在西欧和北欧的罗马天主教教堂比较常见。比较起来，东正教和东罗马帝国似乎更愿意把耶稣当成一种正面的神灵形象，用以鼓舞和教育，而不是恐吓和震动普通的教民和世俗人士。

君士坦丁即位以后，解除了对基督教的禁令，并对其采取了宽容甚至鼓励的政策，罗马还专门为它修建了教堂。从此以后，基督教教堂出现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们还特意在耶稣遇难停尸处建造了一个圆形的神龛，周围为12对柱子，象征耶稣12位门徒，上为圆顶。这种把世俗的建筑形式和基督教义的阐释结合在一道的做法，在一段时间里在罗马帝国境内相当流行，带有基督教特征的艺术由此逐渐推广开来。

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以后，圣经里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开始以绘画和雕塑的形式出现在教堂里。开这种表现形式先河的可能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可惜的是教堂整体并没有保存下来。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些石雕。这些石雕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组被称为“两兄弟”的石棺浮雕。这些雕像的形象构造和罗马帝国早期的塑像形态非常相像，被称为模仿恐怕也不为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基督形象和圣经故事里的人物被广泛地塑造到教堂以及其他建筑物里，成为公众生活的组成部分。

第五章 中古时期和日耳曼文化

罗马帝国经过了 500 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未能抗得住它所面临的内困外患的侵袭而走上了灭亡之路。取而代之的是日耳曼人。从此,西方社会开始了一段相当漫长的黑暗时期。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作为统治者的日耳曼人属于“野蛮人”,其文化层次远远低于罗马人和希腊人,而且是因为基督教在中古时期掌管了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大权,阻碍乃至窒息了西方人的思想进步和社会发展。尽管这段时期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后期在科学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杰出人物和成就,但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和前面的古典时期还是和后面的现代时期相比较,其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想进步方面的确显得苍白无力,其成就极其有限。由此可见,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协调一致,或者说该社会的社会制度是否有益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或许正是由于这段时期的黑暗,西方人才引以为诫,吸取教训,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社会变革唤醒了人们的觉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此开始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纪元。

一、背景

1.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帝国后期日益显示其内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这些

危机加速了罗马帝国走向崩溃的步伐,达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它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隶农的不满和反抗

公元3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社会内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加深,许多奴隶的非自然死亡和逃跑使得奴隶数目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经济生产。为了维持生产发展,也为了减缓矛盾,奴隶主不得不重新改组他们的经济,将大田庄分成小块土地租给了农民。这些佃农在法律上来说有自由之身,但必须终生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土地的出售而转移自己的服务对象,成为一种隶农。这些人包括以前的奴隶、外来移民、部分自由民,形成了一个隶农阶层,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受到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却不能支配自己的财产,决定自己命运,逐步对罗马统治者开始不满,到处起义,参加了反抗罗马帝国的斗争。罗马统治者犹如坐在一座活火山上,随时都可能被喷出的岩浆所熔化。

2) 日耳曼人的威胁

罗马帝国的北方住着所谓的蛮族,主要有凯克尔也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其中日耳曼人大体分布在东起维斯杜拉河(波兰一带),西至莱茵河,南起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这一地区。根据凯撒公元前1世纪中叶写的《商战纪》和塔西佗公元1世纪写的《日耳曼尼亚克》记载,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日耳曼人却还生活在一种原始氏族社会里。他们每年都要移动一次地方,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土地还没有被私人占有,主要生产工具也都是氏族公共财产,其氏族事务由长老管理,最高权力属民众大会,战时才推选军事领袖。他们没有自己的城市,但已能制造毛、麻织品及陶器,还能采矿,冶炼金属。他们在罗马边境城市和罗马人进行贸易,使用罗马人的货币。从公元1世纪末到3世纪,日耳

曼人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有了阶级分化并出现了部落联盟,如东哥特、西哥特、汪达尔、法兰克、盎格鲁、撒克逊等。从3世纪起这些联盟常在罗马边境侵袭。罗马人无力防御,只得让他们以“同盟者”名义进入境内,防卫边区。到了帝国末年,罗马军队已多半由蛮族组成,其首领则担任高级军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逐步渗入之后,他们开始了民族大迁徙,这种迁徙通常以武力方式,胁迫迁移者一批批连同家人、车马一道进行的,其势不可遏止,一直持续到6世纪后期才告一段落。由于匈奴人(Hungaries)的入侵,西哥特人(Visigoths)求助于罗马皇帝瓦伦斯,得到许可便于公元376年迁入帝国境内麦西亚一带作为帝国的同盟军。西罗马帝国领土到了5世纪中叶就已丧失大部。先是不列颠受到撒克逊人(Saxons)和裘特人(Jute)的侵略,并在那里建立起几个小王国,后来法兰克人(Frank)在3世纪进入高卢(Gaul)东部。西哥特人则占领了其西南部,到了5世纪末高卢全部被法兰克人征服。

3)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与此同时罗马帝国的统治势力日益减弱,先是在5世纪中叶451—452年遭到匈奴人的侵袭,3年后又受到汪达尔人(Vandals)的洗劫。其时罗马帝国已气息奄奄,名存实亡,出身蛮族的将领以兵权操纵一切,皇帝形同傀儡。476年哥特人将领奥多阿克(Odoacer)废除了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493年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Diodoric)率兵攻占意大利拉文那(Ravenna),杀死奥多阿克,建立东哥特王国。

2. 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

奴隶和隶农对罗马帝国的反抗,加之异族的入侵和内部的不团结,促使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的“蛮族国家”。

1) 法兰克王国

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里,法兰克王国最大,存在时间也最长,达360多年。法兰克王国由克洛维(Clovis)创建,从5世纪末开始,克洛维不断出兵东征西扩,统一了他所在的法兰克诸部落,和教皇相互支持,终于建立了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到了6世纪中叶,它已成为日耳曼人中间最强大的国家。以后经过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多数土地被少数贵族占有,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受到威胁,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受到限制。国家实际上分裂成三个部分,国王地位十分虚弱,各地贵族成为实际统治者。从公元7世纪中叶起,各地大贵族分别推举宫相,处理各自政务,而国王只好闲居,不问政事。这个时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称为“懒王”(The Inactive King)时期。其间为争夺统治权,各个贵族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来一个叫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获取胜利,成为全国唯一的宫相。75年丕平利用教会支持篡夺了法兰克王位,从此墨洛温王朝灭亡,代之以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

2) 查理帝国

从8世纪后期到9世纪初加洛林王朝进行了多次战争,扩大了加洛林王朝的版图。加洛林王朝时期进一步确立了封建制度,兴建了封建庄园。国王和大封建主都有许多庄园。这时期的庄园都是闭塞的自然经济单位,其生产主要是供养庄园主及其家属,只有少量的产品才用来交换他们本身不能生产的东西,或者卖出后再购回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贫苦的农民们在庄园里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中的隶农人数最多。他们虽然名义上是自由人,拥有土地,但实际上世代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离开。

丕平之子查理曼(Charlemagne)继位后继续扩张。这时法兰

克王国西南至厄步罗河,北至北海,东至易北河与多瑙河,南面包括意大利的大部分,几乎和西罗马帝国差不多大。799年教皇利奥三世(Leo III)遭罗马贵族驱逐,向查理曼求援。查理曼派兵进军罗马,恢复教皇权位,进一步加深了和教会的关系。作为报答,利奥三世于800年圣诞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替查理曼加冕,号称“罗马皇帝”,这样法兰克王国变成了“查理帝国”。

3) 法兰克的分裂

查理曼大帝统治期间,封建庄园主和农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部分农奴不堪重压,举行了起义,虽受到镇压,但迫使奴隶主将农权的义务固定下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隶主的剥削。封建制度建立后,帝国出现了分裂倾向。查理曼大帝儿子路易(Louis)继位后,封建大领主不愿服从国王统治。路易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之间发生内战,日耳曼路易(Lewis the German)和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哥哥罗退耳(Lothair)。在二兄弟的压力下,罗退耳被迫同意让步。三人于843年在凡尔登(Verdun)缔结和约,将帝国分成三部分。莱茵河以东的地方归日耳曼路易,称东法兰克王国。谢尔德河和缪司河以西归秃头查理,称西法兰克王国。罗退耳承袭皇帝称号,管辖北起北海,沿莱茵河下游朝南,包括罗尼河流域直到意大利中部。自从凡尔登条约后,近代西欧三个主要国家的疆域开始形成。罗退耳领土南部形成意大利,东法兰克发展成德意志,西法兰克则发展成为法兰西的疆土。

二、日耳曼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1. 加洛林文化

加洛林时期的法兰克文化和它同时期的拜占庭、阿拉伯、印

度、中国文化相比较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除了哥特人原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欠发达以外,多年战争和不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也是重要原因。

加洛林文化是在教会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是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除了教士和僧侣外,受教育的人寥寥无几。教会学校里的教师全是教士。其次讲课语言都是拉丁语,所教课程称为七艺。前三种是文法、修辞和逻辑,后四艺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查理曼大帝出于为帝国培养人才的考虑,下令教会和寺院办学,并罗致僧侣学者,在宫中建立起学校。他还派人搜集和抄写古代抄本,以便增加人们的知识。但在当时的学者中已无人能理解古代学者的学术思想,更何况继承和发展。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只能算是一种补救,谈不上多少发展。此外查理曼还大兴土木,从拉文那和罗马拆除古建筑中的石柱,用以装潢首都阿亨的宫殿和教堂,但却因此而使原建筑风貌遭到很大破坏。虽然加洛林文化水平不高,但和以前一段时期相比已有所改进。随着学校的建立和文化的普及,不仅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艺术创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书籍的抄写有利于经典文化的传播,宫殿的兴修使得绘画和雕刻等艺术有所发展。和前一段时期相比,查理曼大帝当政的这段时间在文化上面确实有所进步,有人因此称它为“加洛林文化复兴”,虽然如此称呼似乎有些夸大,但却反映了这段时期文化艺术上的成就。

2. 中世纪的建筑

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也更加明显。十字军东征带来了大量的传教活动,扩展了教会的势力范围。对圣人遗物的崇拜几乎成为一种时尚,而到圣地朝拜很快形成了一种热潮。一段时间里,各个地方纷纷大兴土木,建造教堂和修道院。为了达到更为引人注目的效果,这些建筑普

遍采用了类似罗马风格的建筑形式以及希腊罗马纪念碑式的装潢艺术,因此被称之为罗马式建筑。罗马式教堂用石头屋顶替代以前的木屋顶,并用拱券支撑其重量。同时,丁字形的巴西利卡式房屋结构也已发展成为拉丁十字形结构,以满足容纳更多教徒的需要。罗马式教堂还具有封建城堡的特点,石墙很厚,窗户很小,而且距离地面较高,前后还配有碉堡似的塔楼,远看上去像是座监狱。这种建筑的典型代表包括法国的圣赛尔南教堂、英国的杜勒姆主教堂、德国的圣及列阿达教堂以及意大利的比萨教堂。

这一时期的教堂广泛使用了雕塑装饰。一般都在教堂正面留有一块半圆形空间,内装一块大型雕塑,大都取材于“最后的审判”。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法国奥顿教堂的浮雕。画面上耶稣作为审判者位于中间,周围是象征荣耀的光环,左边是善人上天堂的欢乐场面,右边是恶人接受天使审判,被赶入地狱的悲惨情景。雕塑的下方是复活的人群。人物形态生动逼真,表情夸张,或动或静,或悲或喜,或庄重或愠怒。

除了罗马式建筑以外,中世纪的另外一种建筑风格是所谓哥特式。这种风格首创于圣德尼修道院的改建工程。该教堂首次系统应用了助穹结构为基础的新建筑体系,该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把高而狭长的室内空间变成了一种更具神秘色彩的迷宫。这和当时亟具理性化的经院哲学和托马斯主义对教义的解释完全吻合。托马斯主义要求形象再现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秩序,教堂的主要装饰物的雕塑创造也必须遵循严格的固定程式布局,这样雕塑也就逐渐脱离主体建筑,呈现出一种独立的倾向,带有写实的表现手法,描写自然,追求感情,形成所谓的“哥特式现实主义”。它的最主要特征是高直细尖,例如尖拱门、尖高塔、尖屋脊、尖房顶和尖望楼,用尖形拱门代替罗马式的半圆形拱门,内部墙壁较薄,窗户较大,外部多尖塔,且常在门前堆放各种生动形象的雕塑,烘托典雅、庄重的氛围。此类风格的代表性建筑

有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夏特尔教堂、兰斯大教堂、德国的科伦大教堂、英国的林肯大教堂、坎特伯雷大教堂和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等。

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是哥特式建筑的著名代表作之一,它是巴黎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也以其高超的建筑艺术而饮誉世界。其西面工程更是别具一格:上下对称,左右连接合理,门窗匀称,未完成的塔楼依然耸立在上。圣母院内部分为三层,下层是柱廊和尖拱,中层则是带侧廊的隔层,上面是明亮的窗玻璃。三层之间是细长的石柱连通。整个设计和建筑都源于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此外,法国的夏特尔教堂也是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入口处的雕像高大挺立,左顾右盼。德国的瑙姆堡教堂前面的两尊塑雕形象逼真、比例准确,面部表情庄重,显得多愁善感。

中世纪的教堂建设得更加富丽堂皇,主要是因为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阶级有能力支配更多的钱财用到这上面。德皇奥托一世(Emperor Otto I)继承父位之后便开始仿照自己的先人加强和罗马教廷的交往,并于962年去罗马,让教皇替他加冕,封他为神圣罗马皇帝。从那时起,他和他的家人便慷慨解囊修建了教堂,增添了装饰画,重建了昔日的卡洛林文化。他弟弟布鲁诺大主教特意出钱赞助在科伦修建了圣潘塔梁教堂,里面的装饰和外部的设计和卡洛林时期的教堂十分相像。此外圣迈克尔(Saint Michael)教堂的装修也受到了卡洛林文化的影响。这两个教堂里都有根据圣经故事画的宗教画,例如耶稣遇难像。这些布置和装饰使得教堂变得更为庄重。

3. 中世纪的教育

进入中世纪以后,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逐渐重视起来。一方面他们建立了骑士制度,供一般封建主培养自己的孩子,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开始建立起各种学校,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

人才。

加洛林王朝分裂以后,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封建割据的状态。贵族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需要自己的军队和一批骁勇善战、知书识礼的骑士。普通的乡绅家庭也希望自己的子弟能有机会出人头地,一展才华。骑士制度的建立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它在法国出现不久便很快传到了其他欧洲国家,成为一种风靡几个世纪的培养人才方式。

骑士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侍童、护卫和骑士。侍童阶段就是把年方7—8岁的孩子送到贵族家里当侍童。他们这时候的任务主要是侍候主人、学习礼仪和一般的文化知识。随着年龄的增大,主人会派人训练他们练习骑马、击剑、角斗和游泳等体育和军事项目。侍童到了14—15岁就自然进入了护卫阶段。他们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侍候男主人,平时照料其饮食起居,战时要随同出战。在家里他们也要在女主人面前注意礼节,学会侍候她们。护卫阶段一直要延续到21岁,这时他们会被授予骑士称号。通常要为他们举行一个仪式,包括宗教祈祷、忏悔、圣餐和接受牧师祝福。然后要进行一次武艺表演,表明他在这方面已有足够的能力履行骑士的职责。最后是宣誓并接受象征性的武器,至此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骑士。

骑士制度主要是培养军事人才。对一般人来说,获得知识文化的主要途径还是学校。自从查理曼兴办学校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学校学会了读书写字以及一些基本的常识。当时的学校都由教会来办,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修道院、主教学校和教区学校。

修道院主要是培养僧侣的,但有时也会招收一些世俗子弟入学,只是人数十分有限。主教学校又称大教堂学校,一般设在主教驻跸地。这种学校首先在英国兴办,后来扩展到其他国家。主教在开始阶段往往充任任课教师,但8世纪后这类学校都雇佣了专

职教师。原来分为歌咏和文法两种,主要培养唱诗班和神职人员,但以后实际上也招收一般的学生。教区学校相对而言条件最差,一般设在农村小教堂或牧师自己家中,讲授些最基本的常识,教些读音、拼写、赞美诗之类的简单课程。这三类学校当中,前两类办学环境比较好,常常会得到社会和教会的资助,学生因此可以得到免费教育,学校在社会上也享有一定声誉,对普及文化和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

11世纪以后欧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对教育和文化的需求量也加大。同时阿拉伯人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加上他们保存的古希腊经典著作和科学文献也为他们学习科学文化,提高文化教育水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教育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中世纪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Salerno University)。该校原为一所医学专门学校,以编译和研究古希腊和阿拉伯的医学著作闻名,1137年改为大学。另一所古老的大学是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Bologna University),以研究和传播罗马法建立了其声誉,1158年被当时的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下谕命名为大学。从那以后大学有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诞生。

学校的管理模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组成的学生会社掌管学校行政,以制定学校规章、聘用上课教师、安排上课时间和确定学生交费多少。这种管理模式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南欧国家比较流行,而在巴黎大学和其他一些北欧、中欧国家的学校里,学校的管理则主要以教师为主。教师们组织自己的会社、选举校长、制定教学计划、负责考试和学位授予工作。学生们入学的年龄在当时基本上不受限制,13—14岁就可以进校,先花上7—8年学习七艺和拉丁语,通过后可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再选择一个专业方向,如神学、法学和医学,

学习 4—7 年的样子 ,通过后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学校虽然大部分仍然受到教会的控制 ,但无可否认对于知识的传播和人才的培养乃至推动社会的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意义在以后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楚地显现了出来。

4. 中世纪的宗教

中世纪基督教在日耳曼人国家里享有绝对的权威和势力 ,他们对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 ,和历史上曾经表现过的辉煌相比较 ,基督教已经是今不如昔。在很多情况下 ,封建统治者和教会互相勾结和利用 ,他们之间既同流合污 ,沆瀣一气 ,有时也会争权夺利互不买账。他们经常是奢淫无度 ,从事高利贷交易。教士的世俗化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教会的威信也因此而大大地打了折扣。教会内部于是产生了要求改革的运动 ,主张整顿教规、教会独立 ,以减少对世俗的依赖。首倡改革运动的是法国克吕尼修道院(Cluniac Abbey)。

教会修道制度首创于 6 世纪的意大利。当时圣本尼迪克(Saint Benidict)在意大利创建修道院 ,规定修道者必须安贫、离世守贞和服从僧正。克吕尼派继承了圣本尼迪克的修道传统 ,得到了广大修道者和世俗人士的响应和支持。教皇由于对世俗社会干预教会的现象心怀不满 ,因此也积极支持克吕尼运动 ,以打击世俗社会皇帝的权力。1073 年克吕尼派教士西尔德布兰德当选为教皇 ,号称格里哥利七世(Gregory VII)。他声称教皇权力来自上帝 ,至高无上 ,教皇不仅有权任免主教 ,而且有权任免君主。这样一来 ,许多由皇帝任命的主教因为怕丢掉主教职位而纷纷反对格里哥利。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在此情况下试图联合一些主教废除格里哥里 ,但由于实力不强 ,被迫暂时悔过妥协 ,保住了教籍。后来亨利四世赢得了时间 ,带领军队进驻罗马 ,另立新教皇。格里哥里不得不出走 ,客死他乡。

教俗之争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1122年订立的《沃姆斯宗教协议》才使此事取得暂时的妥协。协议规定:所有主教均由教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推选;日耳曼人选举主教时,皇帝或其代表有权出席会议,并有干预之权。主教受职时,指环和权杖等宗教权力象征由教皇授予,而权节这样的世俗权力象征则由皇帝授予。尽管如此,教俗之争并未结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此消彼长,互相抗衡。但总的来说教会权力逐渐缩小,而国家权力逐渐增大。

中世纪和基督教教会有关的另一重要事件是十字军(Crusaders)东侵。十字军完全是在教皇的鼓动下组建的,目的是扩大教会势力、增加教会的财富,企图以此控制拜占庭,进而占领穆斯林世界。参加者主要是封建主、贵族和教民,农民更是其中的主力军。从1096年开始,将近200年的时间内十字军先后十余次抵达拜占庭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代价,短时间地建立过耶路撒冷王国和拉丁王国,但却酿造成了惨痛的后果。战争不但严重破坏了拜占庭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生产力,给它们带来了惨重的财产损失,也给它们造成了沉痛的精神创伤。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十字军远征既不能转移农民对封建压迫的反抗,也不能巩固封建主的地位。对于教会来说,建立世界教会的图谋在这几次远征当中完全落空。十字军的侵略暴露了教会的欺骗本质,降低了教会的威信。当然,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一无长处。首先十字军东征有利于某些欧洲国家,例如意大利的对外贸易。由于十字军的东征,拜占庭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在东方商业当中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十字军东征结束时,从东方运往意大利和欧洲的商品比以前增加了十倍。与此同时欧洲和东方的交流通过十字军远征也变得更为密切了。东、西方之间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来往以后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世俗政权和教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

剧,教皇在14世纪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迫常驻法国的阿维农。后来虽然教皇又回到了罗马,结束了阿维农(Avignon)之囚,教会内部的矛盾又变得越来越严重,导致了三个教皇的同时出现,基督教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宗教会议运动”,要求终止分裂,恢复教会统一。在康斯坦次宗教会议上迫使原来同时存在的三个教皇退位,选出了新的教皇,基督教的分裂局面才算告一段落。但是基督教的威信此时已经一落千丈,难以重整旗鼓。从某种程度上说,梵蒂冈教廷已经沦落为一个偏安于意大利的君主国了。

5. 日耳曼人的神话

古代日耳曼人有自己的神谱和宗教信仰,但后来受到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的影响,部分人甚至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北方宗教主要内容来自于一本叫《埃达》(Edda)的书,其中《旧埃达》即《诗体埃达》是一位无名诗人写于1050年的,而《新埃达》则由斯·斯图尔卢森(Snorri Sturluson)写于1230年,即为《散文埃达》。

《埃达》告诉我们宇宙原是个无底洞,叫聂夫海姆,一个雾气世界在上面盘绕。唯一的生命迹象是一处泉水,从中流出了12条冷河。雾层下是一个叫做穆斯佩尔海姆的世界,里面送出的暖风融化了冰块,形成了云。从这些云里出生了霜巨怪伊米尔(Ymir)和他的奶牛安德胡姆拉(Andhumla)以及一些雾小姐。安德胡姆拉以冰中食盐为生,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创造了第一位生命神。这位神很快和一位雾小姐交媾,因此而生下了三个儿子,即奥丁(Odin)、维利(Vili)和威(Ve)。这三个儿子联合起来反对伊米尔,趁其不备把他绑在一棵秦皮树上杀了。他们用他的躯体建造了地球,用他的血建造了海,用他的头发建造了树,用他的骨头建造了山,用他的颅骨建造了苍天,用他的大脑建造了白云,用他的眉毛造了一堵围绕着土地的高墙,这块被围土地叫做米德加尔德,供人

类居住。穆斯佩尔海姆发出的光形成了行星和其他星星,随太阳照耀在地球上。从此,植物发芽、鲜花开放,秦皮树伊格德拉希尔支撑整个世界。它的三条根一直伸到众身之家阿斯加尔德、巨怪居所约顿海母和寒冷王国尼费尔海姆。延伸到阿斯加德的树根由三位命运女神监管,她们坐在命运之泉旁,可以各自监视过去、现在和未来。物质世界形成后,众神从秦皮树上创造了第一个男人阿斯克,并给了他一位爱侣爱姆布拉。他们还创造了一批具有超凡手艺的矮神,住在地下面,还有照看花木小溪的小精灵。奥丁赋予人以生命和灵魂,维利赋予人以理智和活力,威利赋予人以五官。

对日耳曼人来说诸神不是全能的,相反他们只是代表同霜巨怪拼搏的各种善势力。根据《大毁灭》记述,霜巨怪终将获胜而诸神则将毁灭,恶势力最终会战胜智慧和精神。诸神也意识到这点,在自己的领地爱斯佳德坐等拉格纳洛克(末日)最终的到来。

奥丁在建造大殿瓦尔哈拉(Valhalla,忠烈祠)时已引起了霜巨怪的不满。瓦尔哈拉是诸神的堡垒,又是死于战场的武士天堂。奥丁和他的渡鸦(为他传递人间信息)以及瓦尔基里斯(武士女儿)坐在大殿里。他的瓦尔基里斯每天都到战场上挑选一些烈士回来和诸神住在一起。这些烈士每天晚上都大吃大喝,白天则去战场拼杀,相互杀得粉身碎骨,到晚上则奇迹般地复活。这个命运未测的天堂是霜巨怪们建造的,奥丁曾答应他们送一位主管爱情和美丽的天神费蕾尔,但工程完工后却拒绝兑现诺言。在随后发生的争执里,雷神托尔用锤子砸死了一位霜巨怪,从那以后霜巨怪和诸神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主神和诸神虽然创造了光和智慧,却因贪婪导致了本身的毁灭。

在北方诸神里最重要的算是奥丁了。他是位没有什么朝气、备受折磨和痛苦的神,但他却因全心全意为人类创造幸福而受人喜爱和称道。例如,他曾献出过一只眼睛来替人类换取智慧泉水,

为了了解鲁恩(即日耳曼字母)的秘密,被一根矛钉在树上吊了9夜,他还从霜巨怪那里偷来了诗人的酒,让想成诗人的人喝上一口就可以诗才涌动,立马成诗。然而,他也做过些有失尊严、涉及贪婪和不道德的事,例如看到漂亮的女人就控制不住自己。

奥丁的妻子叫费丽嘉(Friga),她如同希腊神话里的赫拉,生性凶悍、刻板,其职能是保护婚姻和家庭。其妹叫弗蕾娅(Freja),是爱情和美丽的女神。奥丁的孩子是托尔(Thor)是雷神,拥有打击敌人的锤子,一条健身的力量带和一双铁手套。他和希腊的赫尔墨斯一样负责外交关系。托尔的弟弟弗雷(Frey)是生殖神,主管阳光和雨水。三弟提尔(Tyr)是战争之神。诸神当中最受爱戴的是善神巴尔都尔(Balder),是阿波罗和阿喀琉斯的日耳曼化身。他被认为是刀枪不入、水火不怕、本领十分高强的神。诸神常将各种致命武器向他投去,然后再看它们反弹回来,以此为乐。只有阿斯加尔德诸神中公认的专门从事挑拨离间的火神洛基知道他的致命弱点,晓得他的致命物是看上去无害的槲寄生。有一次,他设计让一位神向他掷去槲寄生,刺进了他的心脏,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日常生活里,日耳曼神话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是在星期的命名上面。除了周六源于罗马神话的萨图恩神(农神)以外,其余每天均出自北方诸神。如周日是太阳神,周一是月亮神,周二是战神提尔,周三是主神奥丁,周四雷神托尔,周五是爱情女神弗蕾娅。除此之外,其他一些神话传说,诸如贝奥武甫、贾尔等英雄人物以及《尼伯龙根之歌》等史诗作品都和日耳曼神话有关系。

6. 查理曼的传说和其他英雄史诗

从中世纪留下来的传奇故事当中,有关查理曼大帝的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些故事虽然多少都带有些历史事实,但更多的是虚构成分。它们就像是亚瑟王传奇一样,是经过许多人加工、流传了很多代以后的产物。这些传奇中的相当一部分讲的是他如何支持

基督教教会的活动和如何帮助教皇战胜罗马贵族恢复教皇统治权力的。另一部分则讲述他如何击败日耳曼人的另一支——撒克逊人的进攻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进而扩大他的版图的。前者当然是有史实依据的,事实上查理曼大帝的封号就是教皇出于感激封给他的。但后者似乎和他的祖父查理·玛特尔的经历混淆了起来。根据史载公元725年撒克逊军队占领了加尔加松,732年又占领了波尔多,然后迅速向南进军,威胁到了法兰克的安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查理·玛尔多率军击败了撒克逊人,阻止了他们北上的企图。公元759年查理·玛特尔的儿子丕平击败了穆斯林军队。这样当查理大帝,也就是丕平的儿子于公元768年登上王位时,他也就没有机会同撒克逊军队以及穆斯林武装分子遭遇,进行战争了。传奇中所说的有关他和这些人打的仗显然都是无稽之谈。拉丁编年史《查理大帝的生活和事迹》是他的同代人图尔班主教所作,但传奇却称这位主教在一次战争中英勇战亡,事实是他属于自然死亡。根据这本书的记载,查理曼是个白胡子大主教,具有非凡的才能,周围有许多骑士替他效劳。他的随从当中最杰出的是12位贵族。他们既是他的同伴,又是正义的捍卫者,极像亚瑟王的圆桌骑士。

最著名的骑士是查理曼的侄儿罗兰(即意大利人所说的奥兰多),他是法国中世纪史诗《罗兰之歌》的中心人物。《罗兰之歌》叙述了查理曼大帝反抗阿拉伯民族的侵略、远征西班牙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当时,查理曼大帝经过7年战争已经征服了西班牙全境几乎所有的地方,只有阿拉伯领袖马尔西王的地盘还没有占领。马尔西王为了避免被消灭的命运便派人前来求和。查理曼决定和他谈判。经过考虑,他接受了罗兰的建议,把谈判的任务交给了罗兰的义父伽尼龙。伽尼龙因此对罗兰怀恨在心,因为马尔西反复无常,这是件很危险的任务。于是,他暗中和马尔西的使臣勾结,和马尔西订下了卖国条约,并阴谋陷害罗兰。查理曼这时没有识

破伽尼龙的诡计,在撤退时,派罗兰断后,结果罗兰所带军队中了马尔西在隆世福山谷的埋伏。罗兰由于生性高傲,不肯吹号向查理曼求救,终于导致所率军队死伤大半,自己也以身殉职。这部史诗歌颂了罗兰的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优秀品质,表现了他的忠贞坚定的信仰。史诗语言生动、感情炽烈,不仅歌颂了一个英雄骑士的形象,也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创作的题材。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罗兰故事成为许多诗人取材加工的文学素材,比较有名的有卢纪·浦尔契的《巨人莫尔甘特》、博亚尔多的未完成史诗《热恋中的奥兰多》、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等。

除了查理曼的传说以外,中世纪还有些其他的英雄史诗,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贝奥武甫》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贝奥武甫》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不列颠之前在欧洲大陆的生活经历。全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贵族青年贝奥武甫替丹麦人除去巨妖的故事,表现了贝奥武甫的临危不惧,武艺高强的英雄气概。第二部分写他在50年以后作为国王和危害本国人民的火龙搏斗而英勇牺牲的故事,歌颂了他忘我无私、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高尚品质。

德国的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叫《西格夫里特之死》,下部叫《克里姆希爾特的复仇》。尼德兰王子西格夫里特早年曾经杀死过怪龙,因爱慕布尔莨特国王巩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爾特,帮助巩特尔打败了敌人并娶冰岛女王布仓希爾特为妻。后来西格夫里特终于和克里姆希爾特结成夫妻。10年之后,布仓希爾特和克里姆希爾特发生争吵,发现巩特尔是依靠西格夫里特的力量才娶到她的,感到深受侮辱,便唆使巩特尔的侍臣哈根在打猎时杀害了西格夫里特。克里姆希爾特为了复仇,在寡居13年之后嫁给了匈奴王。又过了13年,她借故请玛特尔一家来匈奴作客,大肆杀戮。她的部下不满她的残暴最终也杀了她。

三、拜占庭文化

当西罗马帝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终于灭亡的时候,它的孪生兄弟东罗马帝国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继续维持着它的军事和政治统治。在日耳曼人的野蛮入侵残酷地破坏了罗马文化的同时,拜占庭(即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文化依然以它的独特魅力将希腊罗马文化的精华和部分东方文化结合起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基督教成为拜占庭国教后,曾和古典文化有过激烈的冲突,但以后和罗马天主教分离的东正教要远比西欧教会温和得多,能够容忍和接纳不同的思想。这是因为无论是帝国政府还是城市里的商人都需要知识文化,需要教育。所以,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在拜占庭一直都没有中断过。同时,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也接受了些东方文化的影响,因此而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

拜占庭文化对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表现在众多方面。哲学方面的成就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是希腊的斯多噶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和东方神秘主义结合的产物。它首先由萨卡斯(Ammonius Saccas)在亚历山大利亚提出,由柏罗丁(Plotinus, 205—70)等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人的精神可参与神的活动,相信超验主义,确信人的精神可以超越一切知识和存在,是希腊哲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结合、互相影响而逐步形成的。新柏拉图主义后来通过圣奥古斯丁得到进一步传播,成为西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柏罗丁的代表作为《九章集》。他在该书里鼓吹神是万物之源,超越于存在和思维之上。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回到神那里,把灵魂与躯体分离,同神合一。不难看出,新柏拉图主义已经朝神秘主义靠拢,成为构成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基础。

拜占庭的建筑艺术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它的早期风格主要继承了罗马的建筑艺术,例如其教堂建筑就是沿用了罗马陵墓圆形

及多边形的结构,要不就是仿照罗马万神庙的圆穹顶,虽然也有些变化,但基本模式是一样的。到了拜占庭的中后期,其建筑风格开始发生显著改变,以四边侧翼相等的希腊十字式平面来取代圆形和多边形,成为教堂的主要框架结构。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Sophia Cathedral)。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结构十分简单,一个正方形的空间由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框架围住,在长方形的拐角上分别由巨大的支架托起圆顶。看上去就像是教堂分成了两半,中间用八边形的东西分开,圆顶就依在它们中间,非常引人注目。这种圆顶结构源于亚美尼亚和伊朗,但在君士坦丁堡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在外部形式上还是建筑材料上,索菲亚教堂和古罗马的水泥圆顶结构具有很大的不同。其墙和顶部都是用砖和泥灰砌的,这在当时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创新,但结果并不理想,20年以后圆顶就倒塌了,只好重新换了一个新顶。新顶采用了些补救措施加强顶部和外结构,尽管有这些不足,但从整个设计来看,索菲亚教堂还是成功的。现在的这个教堂是537年在原来被毁的教堂废墟上重建的。在构思和建筑上都受到罗马万神庙的影响,上面是巨大的半圆穹顶,前后左右又有大小不一的半圆穹顶,下面由两层列柱和厚实的墙体支撑,形成了一个宽大无比、气势恢宏的空间,十分壮观。土耳其人在15世纪入侵后将其改建成清真寺,不但在里面把基督教装饰画改成伊斯兰教的图案文字,而且在教堂外面的四个角上搭起了伊斯兰的尖塔,使教堂变得更为壮观。

此外拜占庭的镶嵌画也有很高的成就。这种以小块彩色玻璃和石子镶嵌的装饰图案是教堂的主要装饰形式,以圣维他尔教堂(San Vitale)的镶嵌画最为著名。该教堂位于意大利的拉文纳(Ravenna,曾经是西罗马帝国和东哥特王国的首都)。公元540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占领此城后,这里成为东罗马在西方的中心,圣维他尔也成了他的私人教堂。教堂主要祭坛上方是镶嵌画《荣

耀基督》,两边则分别是《查士丁尼皇帝和廷臣》以及《皇后提奥多拉和女官》。虽然人物的大小有些不成比例,但是却显得肃穆、庄严。另外,色彩和光线的掌握比较适中,变化匀称而自然。在服饰上充分发挥了镶嵌画的长处,表现了各种珠光宝气和绫罗绸缎的雍容华丽,也增添了几分神秘和梦幻色彩。

耶稣、圣母玛丽亚以及其他圣像在基督教诞生初期只是放在教堂或其他圣地供人瞻仰、朝拜之用。在拜占庭时期,教会允许人们制作和携带比较小的耶稣和其他圣人头像。这个过程中曾一度发生过激烈争执。罗马皇帝曾经发出过命令,禁止人们使用这种头像。但最终在教会和教皇的坚持下,这种头像还是在东正教的管辖范围内为人们普遍接受并流行开来。

拜占庭时期的文化发展还有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随着纸张的发明和运用,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便利,但由于当时一般的文字都记录在长卷纸上,这些卷纸长达9米,阅读起来十分不便。正是拜占庭人首先把长卷纸改成了书的形式。早期的书一般都是圣经文字。现存最早的书是公元6世纪出的两本《福音书》和一本《创世纪》,书的文字分别用金字和银字写在羊皮纸上,然后染成紫色,供皇帝颁发。

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另一项成就是它制定的《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Justinian 483—565)即位伊始就准备编撰法典,成立了由特理波尼安等10人组成的编撰委员会。其职责是审定罗马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删除失效和冲突的部分,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查士丁尼法典》10卷,加之后来陆续编成的《法理汇要》、《法学总纲》和《法理新编》,被统称为《民法大全》。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对以后欧洲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这部法典强调奴隶和隶农要服从主人,认为皇帝的意旨具有法律的效力,反抗皇帝要受处罚,它同时又允许释放奴隶。

四、斯拉夫人国家的形成及其文化

欧洲居民当中除了日耳曼人和拉丁人以外,人数就算斯拉夫人(Slav)多了。斯拉夫人分为东、西、南三支。南部斯拉夫人主要从事农业,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东部斯拉夫人人数最多,分布在辽阔的东欧平原上,6世纪之前他们还处于氏族社会,到了9世纪他们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称作基辅罗斯(Kievan Rus)。以后基辅罗斯分裂成许多小国,陷入了政治经济的危机当中,由于战争不断、饥荒连年而终于解体,但却为以后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莫斯科公国创建于1147年,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地处交通要道,远离蒙古、德国和立陶宛等传统敌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取得了快速的经济的发展。到了伊凡·达尼洛维奇大公(1325—1340在位)统治的年代,莫斯科公国已经变得十分强盛。后来,他的继承者们保持了这一发展趋势,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统一了俄罗斯,摆脱了蒙古人的枷锁,赢得了独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俄罗斯帝国。

东部斯拉夫人又称俄罗斯人。他们从拜占庭文化当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同时继承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优秀的斯拉夫文化。这里既有宗教历史方面的著作,例如11世纪的《教条和神恩讲话》、《当代记事》、《家训》,也有一些文学创作,如歌颂斯拉夫优秀人物的民间故事。俄罗斯统一以后,民族文化逐渐开始形成。伊凡四世注意倡导学术研究,推动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为了传播知识,他从其他国家引进了印刷术,帮助建立了俄罗斯第一个印刷所。他亲自参加编写了《世界历史》。该书从创世纪起一直叙述到16世纪,附有1.6万多幅图画,较为详尽地叙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俄罗斯的重要历史事件。大主教马卡里组织人编写的《每月读物》长达12卷,将当时所有的有关宗教的文献资料都放了进去。另外还有《世系纪》、《喀山编年史》和《莫斯科大公史》等。

俄罗斯人当时在建筑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最有名的代表便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Kremlin)。这座沙皇的宫殿是座巨大的城堡 ,12 世纪建成 ,包括皇宫和三座大教堂以及其他配套设施 ,现为俄罗斯政府所在地。1555—1560 年期间建造的瓦西里·布拉任尼教堂的顶部极富民族特色 ,教堂中央是一大圆顶 ,周围排列着八个小圆顶 ,犹如众星拱月 ,互相映衬 ,甚为壮观。

五、伊斯兰教的创立和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半岛虽然幅员辽阔 ,但是由于土地贫瘠 ,多为沙漠地带 ,生产一直很落后。大部分阿拉伯人都以游牧为生 ,社会进化缓慢 ,6 世纪时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半岛南部的也门土地比较肥沃 ,一度相当繁荣 ,但因受到伊朗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战争的影响 ,经济和商业活动遭到极大破坏 ,土地荒芜 ,人口锐减 ,民不聊生。半岛西北部的汉志地区靠近红海 ,地处交通要道 ,东通印度 ,西达地中海各国 ,商业和手工业都十分发达。麦加是汉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居住着古来西人。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Mohammed , 570—632)出生于麦加的一个古来西没落贵族家庭 ,从小放过牲畜 ,当过帮工 ,生活相当贫困。后因娶了个有钱的妻子才变得富裕起来。他在 610 年前后开始宣传伊斯兰教教义 ,声称古来西部落的主神安拉(Allah)是唯一的宇宙之神。伊斯兰教不完全排斥耶稣和摩西在宗教上的地位 ,但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和最伟大的先知。“伊斯兰”意为皈依 ;“穆斯林”意为信仰安拉、服从先知的人。伊斯兰教认为信仰安拉 ,行善事的人 ,来世进天堂 ;不信安拉 ,行恶事的人 ,来世下火狱。它还要求其信徒行五善功 ,即念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由于伊斯兰教影响了麦加的贵族和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伊斯兰教徒在那里遭到了迫害 ,迫使穆罕默德及其信徒搬迁到雅特里布 ,并把该城更名为“麦地拉” ,意为“先知城”。穆罕默德在麦地拉

建立了神权国家,利用信徒和部落武装力量征服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伊斯兰教不断扩大影响,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广大群众的拥护。统治阶级则利用它维护自身利益,对内加强统治,对外进行侵略。从此以后,阿拉伯国家走上了对外扩展的道路。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得以建立,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成为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帝国的中心从麦地拉迁移到叙利亚,分为9个行省。许多阿拉伯人这时也开始迁移到各个行省,这些地方的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也都因此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以《古兰经》(Koran)和穆罕默德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此时在阿拉伯世界继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又受到被占地区文化的影响,吸收了希腊和印度文化的许多成分,经过融合和渗透,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阿拉伯文化。这种新文化以统一的阿拉伯语言为基础,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知识,尤其是希腊的古典主义思想,在科学、历史、文学和文化普及上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阿拉伯人注意学习古希腊的科学文化知识,早在8世纪就开始组织人翻译希腊古典著作,进行研究。阿拉伯数学家确定了三角中的正弦、余弦和正切的概念,创立了代数学。阿拉伯科学家制造出的精密测天仪,可以测定天体和地球。巴格达天文台早在9世纪之前就已设立。扎比尔·伊本·哈扬是当时有名的化学家。他重视实验,改进了蒸馏和过滤方法。在医学上神医阿维森纳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写出了著名的《医典》,代表了当时阿拉伯医学的最高成就,从12到16世纪一直被西方医学界视为权威著作。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们的商船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地理知识,通过数学测量和计算经纬度,发展了希腊人的地图学。

阿拉伯人所写的历史著作也比较丰富,大体上采用了两种体裁。一种是编年史,以塔巴里的《编年史》为代表。该书从远古叙

述到 915 年 ,保存了丰富的阿拉伯史料。另一种是传记体 ,分别从朝代、国王和民族的角度来叙述。代表作是马苏第的《黄金草原》 ,长达 30 卷之多 ,详细叙述了埃及、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的风土人情 ,自然风光和地理概貌。阿拉伯人的文学杰作也有不少 ,其中最为出名的当推《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这本书以 6 世纪的波斯故事为基础 ,吸收了印度、希腊、犹太和埃及等民族的童话和寓言 ,反映了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表现了他们丰富的想像力。此外 ,阿拉伯人还非常重视知识的学习和传播。帝国各处的清真寺都附有图书馆和学校。10 世纪时 ,巴格达、摩苏尔、设拉子等地都已设立了自己的独立图书馆 ,成为帝国各地的文化中心。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 ,阿拉伯文化对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文化发展都有很大影响。许多希腊的经典著作通过阿拉伯人的翻译介绍才又重新回到欧洲。中国和印度的许多发明和知识 ,如指南针 ,造纸术 ,火药 ,数字和十进位法都是通过阿拉伯国家传到欧洲各国的。阿拉伯人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中介作用。

六、中世纪的社会思想

中世纪的社会思想 ,在前期和中期主要表现在用宗教神学为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关系与秩序的辩护上 ,其主要特点是将人世间的社会生活和现象看做是由上帝(神意)创立和支配的 ,是永恒不变、超自然、超历史和超社会的东西。所谓“君权神授论”就是典型的代表。到中世纪的后期 ,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发展 ,社会主导思想逐渐开始演变 ,成为一种农民阶级和市民阶级反僧侣、反教会和反贵族斗争的激进思潮 ,为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思想准备。这点将在介绍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时作进一步介绍。我们先来看看对中世纪社会思想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经院哲学和其他哲学思想。

1. 经院哲学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基督教教会及其代表人物在中世纪为了巩固基督教的精神统治所建立的理论体系——经院哲学所具有的一些特点。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分不开。11世纪后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政治上加强王权统治,各国的君主希望尽快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早日获得国家的统一。但是教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看到君主权力的扩大,于是造成了教会同王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文化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对于教会关于世界的解释也越来越不满意。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教会当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宗教思想应当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更新。这是经院哲学问世的缘由。经院哲学起源于9世纪的各种宫廷学校和教会学校。在这种场合里教师和学生经常围绕着《圣经》和一些宗教教条开展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试图运用古典哲学和其他的哲学思想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思想体系被称之为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 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社会建立的合理性。

经院哲学利用哲学为神学服务,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替基督教教义辩解。例如一位叫作安瑟伦的神父认为一切存在都有原因,整个存在的背后必有一个最真实、最有力和最完善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神的观念就包括神的存在,从神的观念就可以推出神的存在。这就是所谓三段论式:上帝的概念是最完善的东西,最完善的东西必然包括存在,所以上帝是存在的。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本身并不利于神学,但他的神学目的论却可以被利用。加上歪曲他的思维和逻辑理论就可以解释教义,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万能。同样,他们利用柏拉图的理念论这样解释上

帝的存在 :一般先于个别 ,理念先于现实 ,也最实在。上帝的理念最普遍(一般) ,所以上帝最实在。这里所谓最实在的东西显然是指教会 ,因为教皇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 ,教会是地上的天国 ,因此 ,信仰上帝就是要信仰教会。这就说明经院哲学家论证上帝存在就是要证明教权高于俗权 ,要世人全都服从教会统治。

2) 通过繁琐的推理去维护教义的神圣性。

经院哲学运用繁琐的形式主义推论方法对已有教条进行些空洞无聊的论证。诸如“一个针尖上能站立几个天使”、“死人复活后 ,是不是胖子仍是胖子 ,瘦子仍是瘦子 ,男的仍是男的 ,女的仍是女的”、“天上的玫瑰花有没有刺”、“神用泥土捏的亚当有否肚脐眼”、“创造世界以前上帝在什么地方”这些争论不休的超验问题无非是要证明整个世界是上帝意志活动的产物 ,人类社会要受制于上帝的意志。例如根据“实体转化论”安排圣餐仪式时 ,神甫念几句使饼酒成圣的咒语 ,面包和葡萄酒就可以得到救世主的生命。后来这种实体转化论就成为基督教的一条神圣教义了。

3) 宣扬宗教蒙昧主义

经院哲学强迫理性屈从于宗教信仰和教会权威。把《圣经》教条视为绝对真理 ,强使人们盲目崇拜。经院哲学反对人们去研究自然 ,让人们去期待上帝的启示和超自然之物。安瑟伦在《神何以成为人》一书中称 :“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 ,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因为我相信 :除非我信仰了 ,我决不会理解。”。他的逻辑是《圣经》的权威高于人类智能 ,教会之外无真理。基督教思想只能凭信仰去理解 ,教人诉诸理性是因为他们不信仰。

2. 阿奎那的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 他的学说已成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学说, 具有广泛影响。他出身于阿奎那伯爵家, 在那不勒斯大学 6 年学习之后于 1244 年加入多明我修士会。他在科隆和巴黎呆了一段时间后, 于 1259 年回到意大利, 用了 5 年时间写作《异教徒驳议辑要》, 后又写了部《神学纲要》。在这些年里, 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作了些注解。1269 年他又去了巴黎, 在那里他驳斥并击退了对亚里士多德在教会中影响的怀疑, 从而提高了他本人的学派在教会中的地位。在他于 1274 年去世后, 他的哲学体系被宣布为多明我修士会的官方学说, 以后不久被承认为基督教正典, 即托马斯主义。托马斯主义认为在探求理性知识之前必须先有信仰, 人们必须先信仰然后才能实践, 因为虽然理性的种种真理都是自主的, 但人们至少应探求它们, 这就涉及到启示的问题。然而启示的真理是人意的, 虽然阿奎那认为理性与启示并无冲突, 因而哲学与神学也无对抗, 可事实上一方总要损害另一方。

综上所述, 经院哲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神学体系, 其职能是为封建剥削制度和等级压迫制度辩护并使之神圣化, 从而宣扬天命论。其实质是禁锢人的思想, 让人容忍、恭顺以服从于封建统治。

3. 非经院哲学

和经院哲学相对应的是阿威罗厄斯和罗吉尔·培根的近似唯物主义的思想。阿威罗厄斯(Averroes, 1126—1198)是阿拉伯人, 在西班牙的科多瓦大学任教授, 是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他以接近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认为宇宙万物并非受神学的支配, 而受其自身固有法则支配。他否定荒诞的宗教观点, 主张应以智力思考为哲学基础。

另一位主张用事实而非抽象推理来观察世界的是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2)。在他的影响下, 中世纪的思想方式开始瓦解。他是圣芳济学者, 毫无贬低教会在宗教事务方面权

威的愿望。但在客观上由于对信仰和理性的不同看法,他的主张加速了中世纪托马斯主义的衰落。托马斯主义认为,理性和启示是可以互相重叠的,但培根和他的同伴却将理性思维和信仰加以区分,将神学和哲学加以区分。这样科学研究就可以依照自由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他同时要求科学与哲学对于各种信仰不要再事挑剔,也要求信仰不要对科学与哲学装腔作势地去宣传教义。罗吉尔·培根就读于牛津和巴黎大学,学识渊博,曾直言不讳地反对托马斯主义。他认为,托马斯主义对数学一无所知,要获得知识与其借助于权威不如借助于实验。他并不反对经院哲学的演绎法,而只是认为仅仅靠推导的结论是不够的,而要诉诸实验,才能有说服力,经得起考验。

七、中世纪政治文化的意义和特性

中世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算起到文艺复兴开始时结束,前后持续了大约有1000年的时间。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西方文明尽管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却为它的发展做了反思,积蓄了力量。因此可以说中世纪是它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深远的意义。没有中世纪的这段历史,也就没有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以后的历史巨变,没有西方世界以后在世界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

日耳曼人的入侵结束了罗马人的统治地位,也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做过重要贡献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被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文化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出现了曲折和倒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日耳曼人的统治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化。罗马帝国后期奴隶生产方式开始逐渐演变成封建式的农奴制生产,到了日耳曼人时期这种变化进一步加快,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普遍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有益于社

会的整体进步。这时候的农奴可以占有部分生活资料和简陋的生产工具,虽然他们仍然受到残酷的剥削,但比起以前的奴隶制来毕竟要好一些,因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大庄园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生产单位,由贵族或教会所有,农奴们迫于生计,在里面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不少城市,市民阶层从整体上来说也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和农奴们一道经常开展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同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因为各种利益冲突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社会关系的松动和变化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日耳曼人社会的出现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为以后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

2. 中央集权制的演变和削弱

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的政治体制,在它们的开始阶段都是一种比较松散的民主管理。主要领导人都有任期限制,其权力要受制于民众大会或元老院。即使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出现少数几位独揽大权的人,如希腊的伯里克利斯、罗马的凯撒,也都未能或是不敢称王称帝,实行独裁统治。奥古斯都虽然集各种大权于一身,还是不敢称帝,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他的继承人。但在日耳曼人的国家,例如法兰克的加洛林王朝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中央集权的趋势,一切政治军事大权都集中在国王一人手里,这一倾向到了查理曼时期达到顶点。这种类似东方专制制度的体制一度使得法兰克变得十分强大。但由于这种体制决定了安危系于一人,一旦这个人出了问题,整个国家也就受到威胁,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见得行得通。查理曼大帝死后不久,法兰克一分为三就是证明。以后,中央集权制从其高峰走向低谷,欧洲长期陷入封建割据、小国林立的局面。这在一方面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却为以后欧洲政治体制的变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3. 教会影响的增加

自从基督教诞生后,它的影响就在不断扩展。它的教义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不但穷人,而且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出于对社会丑恶的不满也加入了基督教。甚至连皇帝本人(君士坦丁)最后也成了基督教的一名成员。教会不仅拥有很多资产,在政治上它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教会的支持,某位皇帝或国王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拥护,教皇为一位皇帝加冕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与此同时,教会利用它在一般人中间的威信加紧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阻碍了进步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尤其是科学的进步,日益成为保守和愚昧的代名词。例如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哥白尼和白鲁诺等人的迫害。

4. 日耳曼人和其他民族对基督教文化的贡献

1) 日耳曼人在文化上的贡献

哥特人作为日耳曼人的重要代表,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基督教文化三位一体的特征(力量、智慧和仁爱)里面,智慧主要是从希腊人的理性思维里获取的,仁爱来自于犹太人那充满感情色彩的经历和体验,力量则主要是从哥特人那骁勇善战,强悍凶猛的特征继承的。正是在这里日耳曼文化和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化以及作为基督教先驱的犹太文化融合到一起,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耳曼人对西方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提倡。查理曼大帝在登基之后,依靠一次次战争的胜利成果扩大了他的法兰克帝国版图。在此之后,他让教皇利奥三世封他为罗马皇帝,试图像当年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屋大维一样,成为新的罗马帝国统治者。显然这一行动表明了他对罗马文化的尊重和恢复罗马式的政治文化秩序的愿望。正是在这一愿望的驱使下,他不但

大兴土木、建立了罗马式的宫殿,而且在上层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例如在教育上面,他在宫廷里开办了学校,请来了欧洲最优秀的学者来讲学,以使王室和贵族子弟多学些知识文化。与此同时,他还督促教堂寺院在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有关的学校,有力地促进了文化水平的提高。其次在文化上面,他组织了对经典作品的搜集和研究,开展了对罗马经典作品的保存和复制工作。他还指派人对罗马和希伯来的文化及经典著作进行了些研究,为以后古典文化的复兴打下了基础。这个被后来人称之为“小文艺复兴”的时期虽说没能持续多久,却为以后对知识文化的尊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和发端。

2) 穆斯林的贡献

除了日耳曼人外,这一时期里穆斯林人对古典文化的保存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首先是一群穆斯林在东罗马的首都拜占庭保存了许多希腊的经典作品并将它们译成了阿拉伯文。其次是他们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从事的学术译解工作。在这个学术中心里他们把很多希腊和穆斯林的作品介绍到欧洲和基督教世界,包括哲学、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推进了思想和科学的启蒙运动(当时很多希腊作品的欧洲文本已失传)。

5. 中世纪文化的功利性

1) 不同文化的出现

日耳曼人取代罗马人的统治地位后,亟力希望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来消除混乱。这种欲望在文化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建立和推崇宫廷文化,即是说创造出一种为皇帝、贵族和有钱人服务的文化,例如礼仪、习俗和趣味。另一种文化显然是对应平民百姓的粗俗文化,例如一些传奇、笑话和诗歌。这两种文化的存在和对立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表明在鲜明的阶

级地位和经济状况之外,还有一种区别他们身份的文化。

2) 等级制度的完善

文化上的另一重要问题是等级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方面教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首先设立了不同层次的牧师任命制度,从至高无上的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到普通教堂的牧师。然后又将天使从上到下分成了9个层次:顶上是六翼天使和司知识天使,中间是座天使、统治天使、道德天使、掌权天使和权天使,最下边是大天使和保护神。天文学家以后也模仿天使等级,将上天视为九个同心圆。封建贵族则根据高贵的程度获得若干等级不一的称号,分享不同的权力。公、侯、伯、子、男、从男,一级级等级森严。这样,至少从理论上说中世纪的神学思想和世俗社会通过等级制度建立了一种次序,固定下来。虽然这种等级制度并不一定就有利于人类的思想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当时的社会却起到了一种稳定作用。宏观世界(宇宙)和微观世界(人类社会)似乎各行其是,并行不悖。从神学角度上说从教皇到教民,从世俗角度上说从皇帝到贫民,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可以对照的标准,确定自己地位的依据。当然这种制度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阻碍了西方社会的进步,是中世纪黑暗产生的重要原因。

3) 基督教义的人性化

中世纪文化的功利性还表现在基督教义的人性化方面。上帝不再仅是可怕的启示录审判者的观念,而允许一种观念的修正,主要反映在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上面。马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经历了产事的阵痛和圣子吊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更贴近普通人的情感,而为普通人接受。那时的平民百姓在参拜马利亚时回想到日耳曼人对妇女的崇拜以及来自穆斯林的影响无疑都加深了对上帝的信仰,也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第六章 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前后的文化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工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在原来近似农村的城镇基础上,出现了一批以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并且普遍都建立了商业和手工业的行会,一些新的生产技术使得呢绒工业和丝绸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加上商业运输能力的提高,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英国的伦敦、牛津、诺丁汉和坎特伯雷等地,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趋强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长期束缚他们的封建主义和神权思想日益感到不满。在漫长的岁月里,欧洲各国文化几乎完全为基督教神学所垄断,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无不具有宗教性质。教会垄断了学校,学校虽然设有七艺,但内容完全为教会服务。在教会眼里,理性为邪恶之媒,唯有信仰才能导致神灵启发,获得真知。教会还大力宣传禁欲主义。早在罗马帝国末期,北非主教奥理略·奥古斯丁所著《上帝之城》就宣扬人世的罪恶与生俱来,欲想摆脱必须禁欲修行的主张。

作为对教会神学思想的反抗,在一些新兴城市里出现了市民文化。早期市民中不少以前都是逃亡的农奴,和农民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息息相通。市民文化当中,无论是多声部合唱,还是戏剧舞蹈乃至寓言、诗歌、谐谈都有一种新的思想倾向:摆脱教会神

学的枷锁。从 12 世纪中叶起,一些用通俗语言写的韵文故事开始出现,如法国的“寓言”和德国的“谐谈”(笑话)。这些故事反映了现实生活,浅显生动,嘲弄了各种地主阶级的人物,尤其揭发了教士们的贪婪和其他丑恶行径。类似的作品还有诗歌,如法国的长篇讽刺诗《狐狸列那的故事》。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骑士文学”,包括骑士历险记以及骑士与贵妇之间的爱情故事。

城市学校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又一特色。由于教会学校不能满足城市市民对知识的需求,一些城市学校应运而生。早在 10 世纪意大利就已办起了这类学校,后来西欧其他城市纷纷效法。这些学校以后成为中世纪大学的基础,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后来又有巴黎大学、牛津大学,接着便是萨勒诺、巴勒摩、萨拉曼加、海德堡、奥尔良、剑桥等大学的相继建立。这些学校学术气氛浓厚,不受教会管辖,有利于知识传播,受到社会的欢迎,但却为教会不容。如巴黎大学的领导权后来就被教会夺去,许多具有自由思想的教师受到了驱逐。

这一时期的建筑风貌也别具特色,尤其反映在哥特建筑上。哥特建筑原来出自法国南部,到了 12 世纪末叶,这种风格的建筑很快出现在欧洲各地,风靡一时。

一、起源和意义

1. 运动的起源和范围

文艺复兴最早产生于 14 至 15 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从 15 世纪开始,文艺复兴从佛罗伦萨传到了罗马、米兰、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等城市,以后又从意大利传到了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为文化思想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大大加快了这一传播进程。当时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其他几个城市里,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要

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反对教会神学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他们呼唤古典文化的复兴,注重对人的关心和尊重,用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对抗神学思想和经院哲学,以推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其实质是欧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过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资产阶级为自己登上历史舞台而最终夺得统治地位而进行的舆论准备。

2. 运动的特征和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人文主义,具体表现在科学、宗教、文学、艺术和教育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的作品和思想无不称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灵,反对来世和禁欲,肯定人本身和现世生活。人文主义者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要求科学为人生谋福利,要求教育发展人的个性,即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他们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中古时期的宗教束缚。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行为都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里冲击了宗教和封建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对于继承古代优秀遗产、打破教会权威、消除封建愚昧进而拓宽近代科学、文化、艺术和思想的发展道路,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

1. 早期的艺术

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特点在于它的现实主义倾向。当时艺术家才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影响。他们大都从宗教或者古代神话中汲取营养,寻找表现对象,而不是直接描绘当时的社会生活现象。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来自意

大利。意大利绘画的早期先驱者是佛罗伦萨画派的创始人乔托(Giotto di Bondone, 1267—1337)。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曾经当过学徒。他的主要创作形式是壁画,在罗马、佛罗伦萨和帕都亚都留有他的作品。他的壁画创造了富有现实感的男女形象,改变了以前的简单和呆板的绘画风格。他的一生作品很多,如在阿累那绘制的系统壁画。这几组画里包括《圣母生平事迹》、《基督生平事迹》、《善恶谕示图》和《最后的审判》。这些画的内容都取自于《圣经》,人物流畅自然,排列有序具有空间感,带有很高的观赏性。《金门之会》描述了圣母玛利亚的父母在金门相见的故事。画面突出了两人互相拥抱的情景,动作自然,形体美观,表情真实,欣喜之情从面部到手势再到全身,一览无遗。《犹大之吻》表现了犹大出卖耶稣的场景。画面中的犹大正要伸出嘴巴和耶稣接吻,以便让罗马士兵知道他们要抓的人是谁。但耶稣已经看出了犹大的险恶用意,并没有做出必要的反应,而是意味深长地盯住了犹大的眼睛。目光咄咄逼人,镇定无畏,与犹大的委琐、卑猥和心虚相比,对照十分强烈。《哀悼耶稣》选取了耶稣被人从十字架上抬下来的情形。周围是圣母玛利亚、耶稣的门徒和其他来哀悼的人。圣母俯视着耶稣的脸,显露出悲痛欲绝的表情。耶稣则表现了一种安详和满足,似乎带有完成使命感的献身精神。

乔托的画突破了中世纪的呆板绘画传统,展现了现实主义的绘画技巧。他和他的继承者玛萨乔发现了远近透视的规律,进一步缩小了和现实主义绘画风格的距离。虽然乔托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原则,但他没有来得及解决和现实主义有关的许多问题。直到15世纪20年代,佛罗伦萨的三位艺术大师出现后,意大利的艺术才有了新的发展,文艺复兴才算真正开始。这三位大师分别是雕塑家多那太罗(Donato Donatello, 1386—1466)、建筑师伯鲁涅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和画家马萨丘(Tommaso Masaccio, 1401—1428)。

多那太罗研究了人体解剖,对人体结构做了认真了解,把他的艺术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上面。多那太罗的青铜大卫塑像所表现的是纯朴的牧羊少年,其形象生动而逼真,是这一研究的成果。他的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格太梅拉达骑马像》。这是一座表现人马浑然一体,又以人的意志和精神更为突出的大型青铜塑像。作为一个带兵统帅,格太梅拉达坐在马上,潇洒自如,表现了一种必胜的信心。那战马迈出的步伐也显得从容不迫,人马之间有一种和谐与协调。身体的造型和表情都显示了一种朝气蓬勃的英雄主义特征。除了塑像外,他在浮雕上面也很有成就。他的《希律的宴会》取材于《新约全书》里的施洗圣约翰之死的故事。画面放在“宴会献头”的场景上。当时希律正在举行宴会,一个士兵手里托着圣约翰的头颅,突然跪在国王希律的面前,整个宴会因此而中断,士兵的手似乎有点发抖,希律张开手臂,显得有些恐怖。旁边的客人有的吓得惊慌失措,有的强作镇静。只有乐队的几个人还浑然不知,仍在奏乐。这座浮雕通过凸凹层次的变化,从前、后和中间三个不同的层面和位置准确地表现了不同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突出了主要人物的形象。多那太罗的艺术生涯长达60余年,其作品体裁多样,计有石雕、木雕、铜雕和泥雕,可谓文艺复兴早期的主要雕刻家。

建筑师伯鲁涅列斯基利用精确的计算解决了佛罗伦萨大教堂建筑无柱圆屋顶的结构问题。他善于把古罗马的建筑传统和哥特式风格结合起来,他的大教堂作品各部分比例协调、排列有序、装饰细致,是这一时期建筑风格的杰作。他的另一代表作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即使在今天来看仍然是佛罗伦萨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它坐落在市区中心,和周围建筑遥相呼应,融于一体,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他晚年的代表作是圣斯必利多教堂。这是座柱厅式教堂,侧廊的方形立柱排列井然,围绕着教堂的主体建筑散开,柱厅内部排列着整齐、优美的科林斯式圆柱,加上各式雕饰、各种颜色的配备,体现了完整和豪华的特色,不失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

筑。他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在于他创立了透视法原理,即所有基线最终汇聚于一个中心点。人处于这个中心点的时候,也能看到整个建筑物。运用透视法就能在平面上表现出三维空间,从而用数学的精确性判定各物体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平面产生出立体空间感。

马萨丘继承和发展了乔托的艺术传统,在绘画里运用了解剖学和透视学的知识。他的代表作是《逐出乐园》和《纳税钱》。在《逐出乐园》里,他利用斜射的光线,通过明暗对比凸现了人物悲哀和痛苦的表情。画面上的亚当伤心不已,正掩面而泣,夏娃用手护着下身,露出羞愧的神情。作品的创新体现在画家对光线的处理上面:亚当和夏娃的裸体被从侧面照来的光线直射着,具有强烈的肉质感。马萨丘虽然因为死得早,留下作品不多,但他的绘画不仅对意大利,也对欧洲的现实主义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大师是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4—1510)。他的画作多取材于文学作品和古代神话传说,而不是宗教题材。他的代表作是《维纳斯的诞生》和《春》。这两部作品表达了画家对美好事物的眷恋和赞叹,洋溢着人文主义的乐观精神。《春》是根据一首诗歌的寓意画的。画面的中央是爱神维纳斯,她的上方是小爱神丘比特,左、右、前、后分别是爱神的侍女、信使麦丘利、花神和风神。在明媚的春光里,春风和煦,百花盛开,万物生机盎然,一片欢乐景象,爱的暖流在骚动,美的旋律在荡漾,构建了一种对生命的呐喊和歌颂,体现了一种蓬勃向上、万象更新的场景。《维纳斯的诞生》也是根据一首诗歌创作出来的。画的是维纳斯从海上踏着波浪,在风神的护送下准备靠岸的情景。维纳斯立在画面中央,全身裸露,一丝不挂,玉肌冰肤,金发碧眼,面带羞涩,从而构成了一幅出浴美人图。这两幅画表现了画家摆脱中世纪宗教题材,争取更多创作自由的尝试,对世俗生活进行捕捉和描绘,在线条的运用上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细心的人不难

看出维纳斯的脸上带有一种忧伤的神情,似乎和周围的氛围不太相符。不少人认为维纳斯的形象和那时的美少女茜蒙奈塔很有些相似之处。茜蒙奈塔 16 岁嫁给佛罗伦萨的一个绅士,不久便被一个有地位的贵族据为情人,22 岁在一次选美会上被选为“女王”,但一年后即暴病而亡。作此画时是茜蒙奈塔病故前的二三年时间,因此,画家有些伤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2. 全盛时期的艺术成就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中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从 15 世纪中叶开始,罗马取代了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教皇为了重新建立其在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地位,不惜花费大量资金来加强罗马的城市建设,因此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到罗马来工作,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画派。虽然意大利中古后期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但文艺复兴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由于城市文化的长期繁荣,文艺复兴思潮一直很活跃,人文主义思想已经广泛深入人心。意大利艺术,尤其是造型艺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里说过:“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①

这种繁荣首先反映在绘画上,其中最优秀的代表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多方面显示了他的才华,诸如数学、机械工程、医学、地质、物理、生物等。他去过很多地方,足迹遍布意大利各地,从佛罗伦萨到米兰、罗马、威尼斯,最后客死法国。在他身后留下了 7 000 多张画稿。他的画善于突出人物个性,通过动作、姿态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将科学的准确性和高度想像力结合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445 页,1972 年。

来,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代表作是《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前者通过耶稣和犹大之间的对比,表达了画家对人生的看法;后者则通过一位女性市民的形象表现了画家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最后的晚餐》取材于《新约全书》。画面表现了当耶稣向他的信徒们宣布有人出卖他时,12个信徒的不同表情和动作。除耶稣以外的12个人被分成了4组。左边的三个人朝向耶稣,似乎显得激动,特别是年轻气盛的巴多罗米欧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双手按桌,一副怒不可遏的表情。右边的三个人看上去有些惊讶,正在交头接耳,互相询问。耶稣右边靠近他的三个人外表善良,不像是出卖自己老师的人。只有接近耶稣左边的三个人有点与众不同,老人彼得伸出头在问约翰是谁出卖了主子。只有犹大一声不吭,躲在阴影里,手里紧握着一个钱袋,暗示他为钱而出卖灵魂。据说达·芬奇画这幅画花了四年时间,在这期间他画了大量的素描,每天早晚都跑到小偷云集之处悉心研究各种反面人物,寻找犹大的模特儿。《蒙娜丽莎》的模特儿是当时佛罗伦萨一位银行家的妻子。据说为了让她心情舒畅,还专门为她请来了乐师弹琴,演员唱歌,表演滑稽戏。这样画家就画出了一个对生活满怀信心和希望的市民妇女形象,特别是她嘴角上挂着的“神秘微笑”。

与达·芬奇同代或前后的意大利艺术家还有几位也享誉世界。他们包括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和建筑家布拉曼特。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otti, 1475—1564)是著名画家、雕刻家、诗人和建筑家。他从小就在著名的梅狄奇园接受艺术训练,在那里接触到大量的古代艺术珍品,陶冶出不凡的艺术气质。他的作品主要以圣经和宗教题材为内容,体现了市民阶级的人文精神。他的作品大都是教堂里的壁画和雕塑。雕塑的代表作是他为家乡佛罗伦萨创作的大卫和摩西塑像,而绘画代表作则是罗马西斯丁教堂天花板上的大型天顶画《创始纪》和祭坛后的壁画《末日审判》。《大卫》雕像高有5.5米,形象威武刚毅,表现了他准备上战场的情

景：头左侧，两目怒视，左手抚石机弦，右手握有石块，一副弓在手，箭待发的模样，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创始纪》描绘了数以百计、体形魁梧的人物，歌颂了为神学所贬低、却为大自然和造化称颂的人。它共有9幅主体画：《神分光暗》、《创造日月》、《授福大地》、《亚当的创造》、《夏娃的创造》、《逐出乐园》、《诺亚祝祭》、《洪水》、《诺亚醉酒》。这些画都采用“湿壁画”，也就是趁石灰水尚未干就把画绘上去以使画面永远保留在那里的方式。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在离地面20多米高的教堂拱顶上画了560多平方米的壁画，共计340多个人物。这些画虽然都以《圣经》为题材，但都是歌颂人体之美，尤其歌颂男性的阳刚之气。《末日审判》是画家在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动手绘制的。描绘耶稣在世界末日来临之时将世人招到他的面前，对各人的是非功过、善恶美丑作出判断和裁决，让善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的情景。整个画面容纳了200多人，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组。第一组和拱顶壁画相连接，上画无翼天使抱着耶稣用过的刑具和十字架。第二部分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第三组是无翼天使和那些受到过判决的人。第四组是地狱之河和地狱。这幅巨画位于西斯廷教堂祭坛的后面，约有200多平方米，大部分人物都是赤身露体的巨人。基督立在画的中央，举着右手，似乎是在进行裁决。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蜷伏在他身旁，面露惊恐之色。他左边的人都是些殉道的信徒，正在向耶稣提出控告。走向天堂的人都是画家所仰慕的人，如但丁、碧特丽丝。堕入地狱的人则是他所痛恨的恶人，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头朝下落、身挂钥匙的人，显然在影射贩卖赎罪卷的教皇尼古拉斯三世。对一般人来说，这幅画揭示了基督教所谓的末日审判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连云端的“神之子”——基督都为之侧目，抹上了浓厚的普通情感色彩。此画制作历时6年，期间他曾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被跌断。虽然这幅画还没有完成就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但更多的人却高度赞美它，甚至认为

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美术作品。

拉斐尔(Raphael Sanzio, 1483—1520)的作品融合了意大利两个世纪以来艺术品的精华。他所画的圣母像已不再是虔诚教徒所崇拜的圣母玛丽亚,而是城市市民阶层所欣赏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自1508年起他花了近十年时间为教皇的梵蒂冈宫殿画壁画,创作了总名为《教权的建立和巩固》的系列壁画。他首先以文化的四个领域:神学、哲学、法律和诗学为主题在教皇的签字大厅里画了四个女神像,然后以此相对应分别在四个角落和四面墙上各画了四幅壁画,其中最有名的是《雅典学院》。该画气势恢宏,人物众多,将古代希腊罗马和当时意大利的50多位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及其他名流聚集在一起,进行热烈的讨论和思考。这些人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克里特、毕达哥拉斯,甚至还包括他自己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人。整幅画面层次分明,具有开阔的视野效果,被普遍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他和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并称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

对意大利画坛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威尼斯画派,其创始人是乔万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 1429—1516)。他注重对自然风景的描写,把自然景色诗意化,作品充满宁静和淡雅的情调。但威尼斯画派最杰出的大师还是提香(Tiziano Titian, 1490—1576)。他的作品富有想象力,色彩强烈,体现了热情奔放的个性特征。他的代表作有《天上的爱和人间的爱》、《圣母升天》、《乌尔宾诺的维纳斯》等。《乌尔宾诺的维纳斯》为以后的女人人体画像提供了典范。画面上的浴后裸女躺在卧榻上,色彩绚丽柔和,凸现了人体肤色的质感,充满着日常生活气息和欢乐、平和的氛围。

文艺复兴期间意大利以外的一些国家也产生了几位著名的画家。例如德国的版画家丢勒(Albrecht Durer, 1471—1528),代表作是版画系列作品《启示录》。另一位著名德国画家是汉斯·贺尔拜因(Hans Holbein, 1497—1543)。他的人物肖像画线条洗练,非

常传神。还有一位在当时颇有名气的画家,叫做彼特·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1125—1169),出生在现今位于荷兰和法国南部的16世纪的尼德兰,他的画对油画的发展贡献甚大,特别在农民题材和民间传说题材上面有一定成就。

3.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除了绘画以外,文艺复兴时期也出现了一大批文学巨匠,其中包括意大利的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和薄迦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法国的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94—1553)和蒙田(Michel Montaigne, 1533—1592),西班牙的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英国的乔叟(Geofrey Chaucer, 1340—1400),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和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等。他们不仅对各自的国家,也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以人文主义为其思想内容,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开端。他们当中除少数人用拉丁语写作之外,大多数都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对本国的文学语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普遍都热爱生活,注重写实,具有历史感,描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创造了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形象,丰富了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另外,欧洲文学的一些主要体裁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创建并奠定基础的,如十四行诗,长、短篇小说以及打破悲喜剧界限的戏剧等。

1) 意大利的文学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迦丘,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但丁。

但丁出身于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早年曾参加要求政治独立,反对教皇干预世俗生活的政治活动,并于1300年当选

为佛罗伦萨市的行政官。两年后他们的政治运动遭到教皇的镇压,他被缺席审判,判为死刑。从此以后他一直长期流放在外,过了20多年的流亡生活,至死未能返回家乡。但丁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论世界帝国》中。该书中心思想是企求建立一个君主治理下的世界社会或国家。他认为罗马帝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当时的意大利却是一片城邦林立之地。如何才能平定混乱局面而建立统一的国家呢?他的答案是统一的君主国。但丁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他的《神曲》。写作时间开始于流放初期,逝世前不久才完成。当时政治上的挫折和个人的不幸遭遇使得他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怀有无比的忧愁,进行着深刻的思考。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认为有义务揭露现实,呼唤意大利人的良知。《神曲》采取梦幻形式,以但丁在森林里迷路、遭遇猛兽、遇到罗马诗人维吉尔并向他求救开头,描述他如何在维吉尔带领下游历地狱和炼狱,后又在贝雅特丽齐的引导下游历了天堂。整个游历过程构成了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曲。每一部曲分33篇,加上序曲,共计100篇。但丁在诗里把地狱分为九层,炼狱分为九级,天堂为九重。九层地狱是越下越深,里面都是形形色色的罪人,受到各种严厉的刑罚。那些贪官污吏,教皇僧侣,卖国求荣的都被放到了最下面的八、九两层。为了表示真实性,但丁甚至连姓名都用真的,教皇的姓名也不例外。炼狱是供犯有轻罪的人居住,这些人犯有贪色、贪食、贪财以及情、怒、妒和骄这七种罪行。他们都已经悔过自新,但还必须经过净火的煎熬,断除孽根,才可超度上天。例如妒忌者的双眼要用铁丝缝住,不让他们看见好东西以免嫉妒。好吃的人要饱受饥渴的折磨,让他们懂得珍惜食物。天堂是幸福的人居住之处,这些幸福的人包括守正不阿者,虔诚的教士,苦行派先哲和神学家,为基督教信仰奋战的十字军和殉道者,正直的国王和统治者,潜心修道者,基督和天使等。九重天之外是上帝的天府,那里充满着光辉、欢乐和爱。但丁在诗中试图表明人类群体和

个人如何要经历各种磨难 ,经受各种考验 ,最终凭借理性和信仰去认识邪恶 ,悔过自新 ,才能有望达到一种理想境界。诗歌过分强调了神学和信仰的作用 ,显示了诗人在认识上的局限。但他也表现了追求真理、关心人类命运等积极方面 ,尤其是对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的揭露值得肯定。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意大利在这一时期的另外两名重要作家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彼特拉克从小喜欢阅读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 ,称西赛罗和维吉尔是古典学问的两只眼睛。他的作品大都用拉丁文写成 ,如叙事诗《阿非利加》,歌颂了古罗马将军西皮奥的英雄事迹。但他主要作品《歌集》却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该诗集主要歌颂他对女友劳拉的爱情 ,也有些政治抒情诗。他的诗歌表现了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接近生活 ,摆脱了前人诗歌抽象和隐晦的毛病 ,将对爱情的歌颂和对自然的描绘结合了起来 ,在诗歌的形式上也有所创新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为欧洲资产阶级抒情诗开创了道路 ,特别是他的十四行诗格式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成为欧洲诗歌中的一种重要诗体。

薄伽丘的代表作是他的《十日谈》。它是一部爱情叙事诗 ,讲的是 10 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住到一座别墅里 ,待了 10 天 ,讲了 100 个故事。这些故事主要以爱情和才智为主题 ,表现了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 ,揭露了教士和贵族的堕落和腐败 ,歌颂了普通商人和平民的聪明勇敢 ,赞美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诗歌对于封建社会里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另外 ,《十日谈》在概括现实、塑造人物、刻画心理、语言使用以及构建故事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对意大利文学 ,而且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开创了欧洲近代短篇小说的先河。

2) 法国文学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文学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小说和诗歌最为繁荣。这时期的主要作家是拉伯雷和蒙田。拉伯雷出身于律师家庭,职业是医生。写小说主要是供病人消遣。他的代表作《巨人传》共有5部,讲的是祖孙三代巨人如何受到更好的教育,如何一代比一代幸福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小说中的三个巨人食量过人,他们纵情享乐,但同时他们又热爱和平,追求真理,反对宗教。作者在小说里充分展示了他的讽刺才华,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落后和教会的腐败。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和安岱雷希王国的女王都成了他的嘲弄对象。该书的语言富有创造性,有时气势磅礴,有时庄严雄辩,加之夸张手法,极有感染力。

蒙田在政界呆了不少时间,先后当过法院顾问和市长。他从小就喜欢读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并不断写心得笔记,为以后的写作做了准备。他的《散文集》包括多篇长短不一的文章,对当时社会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富于哲理性。例如他说人是渺小的,人和禽兽的不同在于人有思想。因此人也好,国家也好,总是有矛盾、有分歧,总是要产生争论,甚至会导致战争。这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其实这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他教人要学会说“我懂得什么呢”。这个例子说明了他的怀疑论思想。他怀疑,但他并不否定一切。他认为生活是真实的,应当充分享受它,只要个人真正享受到生活的快乐,什么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都变得无关紧要了。他的《散文集》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则是欧洲近代散文体的创始人。

3) 西班牙文学

随着西班牙对摩尔人战争的胜利,西班牙王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对外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对内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发展,使得西班牙一度成为称霸于欧、美两洲的强国。文化方面贵族的骑士文学曾经盛极一时,到了16世纪,流浪汉小说最为流行。这种小说多半描写城市下层人物的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成分,在当时受到广泛欢迎。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塞万提斯。

塞万提斯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打过仗、坐过牢、服过苦役,对下层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的《堂吉诃德》描写了一个穷乡绅外出游历、历经荒唐的故事。这个叫做吉哈达的绅士读骑士传奇走火入魔,自己拼凑了一副破烂不堪的盔甲,自名为堂吉诃德,骑上一匹瘦马,离家出走,从事游侠,前后三次。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真假不分,把风车视为巨人,把旅店视为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视为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视为军队,把苦役犯视为受迫害的骑士,把皮酒囊视为巨人头,不顾一切地冲锋陷阵、舞矛弄刀,引起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既伤害了别人,也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直到临终才醒悟过来。作者在小说里描写了将近700个人物,涉及当时西班牙社会的各种行业,表现了各类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集中揭露了西班牙贵族的没落腐朽生活以及庸俗自私的小市民习气。小说的发表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

4) 英国的文学

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展较早,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到了16世纪已有相当的水平,这就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涌现出一批杰出代表人物,其中有乔叟、莎士比亚、莫尔和弗兰西斯·培根。

乔叟出身于一个富有市民家庭,曾经当过外交官和其他官职。他的主要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包括有总序和24个故事。它们主要描写了从伦敦到坎特伯雷朝圣的形形色色香客,其中有骑士、侍从、地主、农民、市民、海员、学生和手工业者以及旅途上所发

生的各种事情。这些人和事组成了 14 世纪英国社会的全景图。这些故事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描写婚姻和爱情的,如对女权的肯定,主张夫妇互敬互爱,反对诉诸武力来处理爱情问题。另一部分主要揭露教会对人民的压迫以及金钱的罪恶。他的故事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的思想,在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在创作过程当中使用了双韵体,加强了诗歌的音律结构和可读性,这一诗体后来受到了许多人的效仿,他因此而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

弗兰西斯·培根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己曾做过枢密大臣,因受贿而丢官坐牢。他既是个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个杰出的散文家。他的文章都收集在《论说文集》里,共计 58 篇。这些文章涉及哲学、宗教、政治制度以及处世、修身养性等各种问题。措辞精炼,蕴含深刻,许多成为警世格言。他还善用比喻,文章因此而富于诗意,被誉为英国论说文的创始人。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最有成就的作家当然还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出身于英国中部城市斯特拉福的一个市民家庭,20 岁就来伦敦谋生,广泛接触社会上的各种人,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他一生写了 37 部剧作和 100 多篇诗歌。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正值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时期。这时他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基本上都是些喜剧,宣传爱情可以战胜一切、个性解放,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几部历史剧外,主要是《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前面三部是众所周知的喜剧,其中的《威尼斯商人》在我国更是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帮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夏洛克借钱,夏洛克假意不收利息,但规定如到时不还要割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安东尼奥的货船因故未归,不能准时还钱,夏洛克坚持要割安东尼奥身上的肉。在这紧急时刻巴萨尼奥未婚妻包西亚男扮女

装出现,提出要严格按照条款执行,夏洛克不准多割、少割和流血,也不准伤害安东尼奥的生命。夏洛克终于被迫放弃无理要求。《罗密欧与朱丽叶》严格地说是悲剧。两个来自互相仇视的家族青年男女一见钟情,却因世仇不能相爱,结果只能以死抗争。双方家长此时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终于言归于好。

第二时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成熟期。此时英国以王室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十分猖獗,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一种无权的境地,遭受到各种政治迫害,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莎士比亚在这一时期写的作品主要是些悲剧,力图表现正直善良的人如何遭受黑暗势力的欺凌和吞噬,但这些人往往在人格上更有力量。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是《哈姆莱特》、《奥塞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哈姆莱特》说的是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在父王被害、母后改嫁的情况下,从父亲的亡灵那里得知这一切都是他的叔叔克劳狄斯的阴谋所至。在他报仇的过程中不幸遭到了克劳狄斯的暗算,最终哈姆莱特、克劳狄斯、母后同归于尽。《奥塞罗》的中心人物奥塞罗是威尼斯的摩尔人将军,他误信手下旗官伊阿古的诬告,以为他的妻子,美丽的苔丝狄蒙娜和副将凯西奥有私情而将他们杀死。后来奥塞罗发现了真情后也自杀。《李尔王》叙述年迈的不列颠王李尔欲将国土分给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甜言蜜语,赢得了李尔的欢心。小女儿言语率直,得罪了父王,被剥夺了份地,远嫁法国。两个大女儿在得到土地之后忘恩负义,逼疯了李尔王。小女儿得知消息后起兵救父王,却兵败,和李尔一道被俘,父女先后死于非命。《麦克白》源于苏格兰的一个历史故事。苏格兰将军麦克白和班柯征叛胜利返回途中遇见三个女巫,她们预言麦克白本人和班柯的后代将做苏格兰国王。此时苏格兰国王邓肯正在他的城堡里作客,在他夫人的纵容下他先杀了国王又杀了班柯,班柯之子却逃脱。后来他又根据女巫的预言想去杀掉另一贵族麦克德夫,在他逃走后又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这时他

已经众叛亲离,妻子也已神经失常,终于被随后赶来的邓肯之子和麦克德夫率领的军队杀死。莎士比亚的这些悲剧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黑暗现实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专横和残暴、人性的贪婪、偏见和无知的危害。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时期,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言论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神话剧的写作上。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暴风雨》里,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东尼奥夺去王位,携带幼女米兰达来到一座荒岛。他在那里利用魔法制造了一场风暴,把安东尼奥所乘的船推到了荒岛,运用魔力战胜了安东尼奥,夺回了王位。后来他还是宽恕了安东尼奥,一起回到了意大利。他在作品里对社会黑暗和人性的不足有所揭露,但更多的还是用一种宽恕态度对待一切有错误的人,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和青年一代身上。

莎士比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生动描写了这一时期里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形形色色人物,间接反映了一般人的情绪和愿望。他手下的人物多种多样、栩栩如生、富有个性,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从古代到当代,从宫廷到战场,从城市到乡村,从英国到意大利,五光十色,斑驳陆离。他善用借鉴和改编,善于推陈出新,利用他人的故事情节,结合自己的思想,编写成不朽的名篇。同时他又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吸收了古代和当时的各种语言精华,或华丽,或精简,或诗文,或散文,信手拈来,得心应手,生动形象。他的许多词句已成为英国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思想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专制和神权礼教思想。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声称神学和教

会扼杀和歪曲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思想,现在必须恢复过来。他们从古代思想宝库中寻找有用的武器,试图恢复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思想文化。他们主张以个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其特征和核心是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

1. 但丁的社会思想

在反对神学、宣扬人文主义方面的先驱人物是意大利的但丁。他不但是杰出的诗人,也是思想敏锐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社会思想主要反映在《论世界帝国》一书里。该书中心思想是企求建立一个君主治理下的世界社会或国家。他认为罗马帝国是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而和他同时代的意大利却是支离破碎城邦林立。如何才能改变混乱局面而统一国家呢?他的答案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国。他用推理的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首先,只有统一的世界君主国可以实现和平。他认为人类生存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而欲获取幸福必须有和平环境作保障。要和平则必须同心协作,而要协作则要将人群组织起来,使之变得有秩序、有纪律。而要达到这种要求不是一人一家、一地一域乃至一国,只有君主治理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只有统一的世界君主国可以保证自由。但丁认为人类最自由的时候就是它状态最佳的时候。他还认为自由的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人民只有获得了自由的意志和目的才有幸福。他谈到公民与国王的关系时候说:“公民不为他们的代表而存在,百姓也不为他们的国王而存在。相反代表倒是为公民而存在,国王也是为百姓而存在。”

最后,只有统一的世界君主国可以实现世界大同。但丁认为幸福的东西在于它的统一性。所谓统一就是协调众多意志的一致行动。但是要想协调一致就必须也只能允许一个意志作为其他一切意志的主宰和节制力量,否则协调和统一就会落空也就实现不

了世界大同。因此“除非有一个一统的君主,他的意志能够控制和引导其他一切意志,否则这样一种同样的统治意志是不可能存在的。”^①虽然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封建割据的意大利有些积极意义,但用君王思想一统天下显然不容易被一般人接受。或许这是后来君主立宪在不少欧洲国家取代封建专制的原因。

2. 马基雅弗利的政治思想

尽管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了对神权和教会的挑战和斗争,但没有产生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也没有让人们摆脱形形色色的古代迷信,占星术和巫术仍然广为流传并为许多人信奉。许多个性乖僻但却无害的人被指控为巫师而烧死在火刑柱上。然而在政治思想领域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却造就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就是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马基雅弗利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律师,他从小有机会接触政治思想界人士,目睹各种政治事件的发生。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494年,当时在当地声势显赫的梅狄奇家族被逐出了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在多明我会改革家萨伏那洛格的影响下,掀起了反对罪恶和腐化现象的热潮。萨伏那洛格后来因为言辞激烈,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顶牛,而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件事在当时很有影响,马基雅弗利对此也很有感触,若干年以后他以萨伏那洛格为例写道,手无寸铁的预言家终归要失败。梅狄奇家族流亡期间,佛罗伦萨变成了共和国,马基雅弗利一度出来替这个政权干事,反对梅狄奇家族。1512年该家族重返佛罗伦萨掌权,马基雅弗利也遭到贬黜并退出政界,从此致力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著书立说。他得以成名的两部书分别是《君主论》和《罗马史论》。《君主论》的要旨是要取得政权就得干些罪恶的勾当。他认为如果

^① 引文分别见《论世界帝国》,17页,18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一个人想取得政权就必须冷酷无情。他不想关心这样的行为是善还是恶,认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他要讨论的对象。实际上这多少是当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

马基雅弗利在供职佛罗伦萨共和国期间曾多次出任外交使节,有机会亲身体会各种勾心斗角的政治阴谋。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凯撒·鲍吉亚混得很熟。此人酷似其父,十分阴险。他想方设法用计谋和胆略策划在他的父亲临死那天保住自己的地位。他的兄弟因为是他的拦路虎而被他搞掉。他还千方百计让他的一个朋友成为教皇的继承人,可谓费尽心机,耍尽手腕。时而对人极其友好,时而又要置人于死地。尽管他的阴谋后来以失败告终,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里仍然给予他以积极的评价,认为他是想要攫取权力的人的榜样。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但到了20世纪却在一些右翼势力中风靡一时。

他的思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治无道德论。他说过:“在国家安全所系的关键时刻,不应考虑正义或不义、仁慈或残忍、可嘉或可耻的问题。相反,一切其他考虑都应放到一边,唯一应当专心采用的是能够拯救国家生存和维护国家自由的方针。”^①他的政治基础有两个,一是意大利的统一,一是人性本恶论。他认为政治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的实际利益和安全。判断一种政治行为正确与否,不是根据行为者的个人思想品质如何,而是根据这种行为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如何。只要符合政治目标的行为就应该肯定。关键不是政治为道德目标和宗教服务,而是道德和宗教服从于政治。只要不影响国家权力的巩固,就不存在道德与否的问题。在具体的治国策略方面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

^① 《马基雅弗利论文集》,572—573页,华克(编),伦敦,1950年。

1) 慷慨不如吝啬好

因为过于慷慨会加大财政支出,反而因此要增加人民的负担而引起不满,不如减少开支讨得人民的欢心。

2) 如其显示仁爱不如施以威严

因为人性皆恶,若为仁而不杀,则将不保安全而祸及多数人。再说恩惠买不到忠信,一般人宁可愿意得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愿意得罪自己畏惧的人。

3) 守信不如失信好

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全都守信,在这种情况下守信反而对自己不利。

4) 恃碉堡不如恃民心好

总的来说治国要旨一在预防外敌,二在规避内乱。防敌宜在军事外交,安内则宜爱民而得民心。仅仅依靠修建碉堡来防御外敌远远不如安定民心更加安全。

5) 培养和奖励人才

从政要务在于拥有士农工商各方面人才并让他们安居乐业,思图进取。

6) 要择良臣而远小人

为君者要善于识别和使用各种人,通过处罚和奖励来有效地推行政令,遏利小人,重用良臣。

他的学说是当时意大利社会的一种历史分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虽然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却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

政治思想见解,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和西方的政治思想流派都有较大影响。

3. 其他人的社会思想

但丁以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也都以不同方式陈述了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概括起来,这些思想涵盖了以下内容:

1) 反对教会和信仰的权威,强调人的理性

基督教神学和教会鼓吹宗教信仰和盲目信从,认为凡是《圣经》写了的,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就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人文主义学者们自然反对这种观点。彼特拉克就认为亚里士多德虽是一伟人,但他并不是神,其著作不可能包括一切知识。在亚里士多德之外,在他之前,乃至在他之后都有许多知识是他不知道的。因此亚里士多德并非空前绝后的权威,人们可以不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有人进而批判教皇和教会里的神职人员,如爱拉斯莫在他的《愚神颂》里对这些人进行讽刺和批判,把他们看成是批愚人。说他们不识字,把不读书看成是最大虔诚,他们满口大话和名词,在教堂里高声朗读圣诗像是驴叫,他们以自己的脏和穷作为向别人乞讨的本钱。总之他认为“基督教和愚蠢同类,和智慧没有任何渊源”,信教的人把自己的幸福放在教会里面实在是一种不理智、不负责的态度。

人文主义者认为理性是人的自然本性,宗教的不合理性在于它为了神而牺牲人,扼杀人的自然本性,让来世天堂的幻想来取代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从而忘记自己在人世社会中的责任。

2) 反对封建等级桎梏,要求“个性自由平等”

人文主义运动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主张破除罗马教会和封建制

度强加于人的封建等级压迫、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例如薄伽丘就认为所有人都是人；“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在《十日谈》的一个故事里他讲述了一个国王女儿爱上他的一个侍从，国王责骂她，姑娘答道，你骂我的话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世俗成见，你应该知道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血肉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人类天生一律平等。只有人的德行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发挥大才大德者才可谓之“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

3) 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世俗伦理

由于人文主义者把眼光从神转向人，从天堂转向尘世，试图用人的眼光观察社会问题，他们认识到封建制度是最大的不合理，宗教信条是最坏的东西，禁欲主义是最荒谬的偏见，和所谓的天国幸福一样都违反了人的天性。彼特拉克认为人应该首先认识自己。他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我自己是凡人，我只求凡人的幸福。”^①他还承认他对情人劳娜的爱情，说是既爱她的形体美，又爱她的精神美。显然他的爱情观念和教会提倡的禁欲主义大相径庭水火不相容。

另一位人文主义者彭波那齐说道，灵魂是肉体的机能，离开了人的肉体，灵魂也就不复存在。人的肉体一死，灵魂也随之死亡。所以一个人只有在今生今世追求幸福，“不朽幸福”是不存在的。

4. 人文主义的局限和影响

作为市民阶级的社会思想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是人文主义，打有明显的市民阶级印记，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① 《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34—35页，周辅成（编），商务印书馆，1971年。

和享乐主义。他们所表现的社会实际上只是部分有产者可以自由放任的社会。他们的活动领域也仅仅是少数学者和艺术家们参加的场所。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教会及封建专制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的活动尽管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却不可避免地脱离了劳动群众,也不可能走上同神权政治及教会彻底决裂的道路。

尽管如此,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如果说中世纪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其特征是神支配人,教会支配世俗社会的话,那么人文主义者则力图把这个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人对神、世俗社会对教会至少是独立的地位。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向教会和封建专制要人权,其后的启蒙运动则是资产阶级向教会和封建专制要政权,甚至可以说没有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就没有以后的启蒙运动,也就不会有资产阶级革命。

四、宗教改革运动

1. 改革的意义和原因

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既是一场思想运动,也是一场社会改革。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复兴”古代的文化,反对封建与神权文化的话,那么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复兴”古代神学,反对封建神学。它要求改革教会的陋规旧习,反对教会和教皇至高无上的社会霸权,追求思想和社会的解放。它和文艺复兴一道冲击和瓦解了中世纪的神学思想,扫清了通向新思想和新社会的某些障碍。

宗教改革的产生和教会的腐败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宗教改革之前,教皇和神职人员在一段时间里极其腐败,他们行贿受贿,搜刮民财,鱼肉百姓,引起了罗马和各地的教民和世俗民众的公

愤。德国人对于教会的腐败行径尤为痛恨。当时的德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经济上十分落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强烈要求政治民主,彻底改革教会,有的人甚至喊出“抓住那些神甫,将他们统统杀掉”的口号。由下层贵族、行会手工业者组成的改良派也有进行改革教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16世纪的德国成为一个火药桶,只要有一颗火星,便会引起强烈爆炸。

1. 马丁·路德和他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领导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父亲是个矿工,他自己则当过乞丐,后来靠父亲辛勤劳动上了大学,读了法律专业并拿到了硕士学位。后来他在德国维登堡修道院当上了神甫、副主持,并兼任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他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教士不应监督和干预。他以圣经为依据,说明人的得救主要依靠自己的信仰。他主张建立没有教阶制度,没有繁缛礼拜仪式,适合中产阶级要求的廉价教会。

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借口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出售赎罪卷。教皇特使特兹尔到德国兜售时则宣称,只要购买赎罪卷,罪人的灵魂就可以从炼狱跳上天堂。1517年10月31日路德写成了95条论纲,公布于维登堡教堂门口,斥责教皇的无耻行径。起初,路德并未想到要和教皇决裂,但由于当时德国大多数人对教皇和教会的不满情绪已经达到极点,路德的纲领因此而得到人们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路德也就变得强硬起来,拒绝了教皇提出的撤回论纲的要求,并投靠萨克森选侯,受到其保护。1519年,他在莱比锡的神学论战中开始否认教皇权力,称教会没有教皇也可以照样存在。1520年12月,他还当众烧毁了教皇斥其论点的敕令。第二年1月,教皇下令开除其教籍。作为回应,他不久写了封《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建议组织脱离罗马的德国教会,把教会

土地收归国有。他在另一篇短文里声称每个教徒都有读圣经的权利,不需要神甫作中介。此时,德国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即位。查理因要与法国打仗,需要教皇的支持,要路德在帝国议会上辩论或是悔改,但路德不肯让步。会后皇帝下令逮捕路德,他只好让萨克森选侯将他藏在前者的领地瓦德堡里。路德利用这段时间将圣经的《新约全书》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译成了德文。他的译文不但对德文的统一有很大帮助和贡献,还有利于德国普通农民和市民直接利用圣经词句。

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改革之风从德国传到了法国、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也日益广泛。由于地位和利益的不同,他们也越来越显示出了分歧。由贫穷农民和市民组成的革命派要求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而由中产阶级和下层贵族组成的改良派则只希望取消教会特权和对罗马的依赖,建立廉洁的教会,而不想对现存制度作根本的改变。路德的立场则越来越趋于妥协和后者站到了一起,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路德的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第一,以《圣经》最高权威论反对教会和教皇最高权威论。他称罗马是人间地狱,教皇不是至圣者,而是撒旦的母猪和强盗头子,是最罪恶的人。他认为必须改变只有教皇才有权解释《圣经》的情况,信徒可以直接阅读《圣经》,信仰自己从《圣经》中所理解的东西。强调《圣经》是最高权威,自由是上帝赐给基督徒最神圣的权利,是基督的福音。所有基督徒“不只是一切人的王,一切人中最自由的人,并且也永远是祭司——一种比王位更高的地位”。^①

第二,他用“因信称义”说取代“事功赎罪”说。首先他认为教皇无权也不能赦免任何人的罪恶,其次,他指出赎罪卷不能拯救任何罪恶,而且钱币只能增加利欲和贪婪。他认为每个基督教徒只

^①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册) 453 页,周辅成(编),商务印书馆,1964 年。

要真正悔改,即使没有赎罪卷也完全有权免除惩罚和罪恶,赎罪所必须的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源于《新约》保罗致罗马人书——“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义人必因信得生”、“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这种因信称义有些神秘色彩,但有着否定教会及其制度,赋予人自由意志的意义。事功就是从事功德,也即交钱给教会做善事来赎罪。

第三,以“政教分离”观取代“政教合一”论。他认为:“必须区分世俗与神圣的东西,必须区分政治与神学,因为上帝也允许不信神的人之统治,并嘉奖他们的美德,但只限于尘世生活之内”。^①主张教会和国家应当分工合作,各司其职:教会应当协助国家,国家应当维持教会,就是说国家管理现实需要方面的事情,教会管理信仰或精神领域的事情。他从人性本恶论出发,认为人的一切情感、欲望和意向都是邪恶的和破坏性的,因而国家不可没有。如果人人都是好人,政府就不需要了,基督教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但这在短时间里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教会和国家应当同时存在,共同发展,互相支持。

3. 加尔文和他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另一位有影响的领导人是瑞士的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加尔文出身于法国的一个市民家庭,其父是主教秘书,又是当地贵族的法律顾问。他12岁时便由其父为其谋得大教堂副堂神甫职位,先后在奥尔良和巴黎大学攻读神学和法律。他通晓古代语言和历史,研究过天主教和路德的新教思想,并受到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莫等人的影响。1533年他被罗马天主教宣布为异端后即声明脱离罗马天主教,开始进行自己的宗教改

^①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册),483—484页,周辅成(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

革。他著有《基督教原理》和《信仰指南》等书,后定居瑞士的日内瓦并于1541年创立加尔文教,担任首领和政教合一的日内瓦地方共和国领导人,对其议会影响极大。他还在该地创立日内瓦新教学院,派人去各国传教,坚决排斥不同意他的宗教观念的“异端”。其时日内瓦有“新建罗马”之称,他本人则被人叫作“日内瓦的教皇”。

加尔文的思想有别于路德的宗教思想,更加非贵族化,更符合资产阶级的社会利益。他的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前定论

他认为等级观念以及据此确定的教皇、主教和神甫统治人民的权力是中世纪基督思想,应于否定,应恢复基督的本来面目,按照《圣经》去传播纯洁的福音。在他看来认识上帝只有两种途径:内在的神性感受和《圣经》中神的启示。《圣经》是“永恒的真理原则”,是教义和生活的标准。上帝有无上的权能,他是万物的创造者、管理者和支配者。他在创造世界、历史、天命和救赎等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荣耀。作为一个基督教信仰者,人只能靠神的恩典而免入地狱,因为上帝早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就预定了谁是他的选民而蒙得救,谁是他的弃民而遭永罚。上帝的这种预定是永恒的、绝对的。对上帝的这种预定我们没有理由诉苦,而只有责怪我们自己。对上帝的这种预选,任何人也别想加以改变,人只有在现实生活中顺从上帝为自己预定的命运才能平安度过一生。上帝的这种预定是秘而不宣的,谁也无法知道,但对上帝的预定可以通过上帝对人的内在召唤体现出来,通过圣灵的启迪作用产生得救信心,经过个人在圣世生活中的实践情况鉴别出来。这就是说,人虽有原罪,“仍要教导人去热望他所没有的善和他所失去的自由,应当唤醒人用更踏实的勤奋而不是假定人有更大的

力量来克服怠惰。”^①人这样做了就可以成为心地纯洁,道德高尚,公正清廉的人,而上帝所要求的正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成功的人才能证明他是上帝事先决定拯救的人。

加尔文的前定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际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要求。他认为,社会必须有资本,有金融活动,依靠经营和投资获得的利润和利息同工人的工资一样是正当的,财富非但不是罪恶,恰恰相反是受上帝赐恩的成功标记。社会只有进行资本经营才能获得发展,凡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人就具有所要求的各种美德,这些成功的人也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构成了新教的生活基础。这种新教中的“宗教个人主义”对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 民主共和的教会制度

路德对教会组织没有任何触动。他既没有建立新的教会管理机构,也没有亲自过问这件事。加尔文不同,他认为,一切教会组织原则和仪式都应按照《新约》所说的“所有信徒不但平等而且皆为祭司”的精神用平等原则管理教会,即按照共和制原则改革教会,建立一种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他不同意教会采用君主专制制度,认为整个世界由教皇一人治理既荒唐可笑,也难以得到教徒们的拥护。他主张,基督教堂由信徒选的长老管理,再由长老聘请牧师负责传教。教区会议由各教堂长老和牧师各一人组成。最高领导机构是全国宗教会议,由各教区推一名牧师、一至二名长老组成,任务是负责审查和处理教会信徒违反教规的案件,讨论和决定有关的教义和仪式问题。神职人员,包括教皇必须遵守和服从教徒大会的决定。违反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① 《西方论理学名著选辑》(上册),周辅成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492—493页。

加尔文在日内瓦严格推行了他的这套宗教改革理论。他这样做有两个理由。一方面,他认为上帝的意志和权威高于一切,必须服从。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上帝,世俗政府是按上帝的意愿建立的,应以促进宗教信仰为其首要任务,教会则是代表上帝的精神政府,管理人的精神信仰和灵魂,应该参与辅助政府的活动。他根据这些思想担任了教会核心组织中央教会主席,常以领袖身份出席市政会议并拥有重要发言权,事实上成为日内瓦政教合一共和国最高掌权者。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例如规定所有居民都是新教教会成员,都要服从其教义教规,否则便会受到无情打击。5年中这个国家16000人里就有58人被处死,76人被放逐。这些惩罚主要和整顿社会风气有关,如禁止赌博、跳舞、酗酒、卖淫等。

加尔文宗教思想尽管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适应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要求,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恩格斯称:“加尔文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手中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在英国特别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①

五、自然科学的发展

1. 哥白尼和科学革命的开始

随着人们对神学思想和封建专制的怀疑和不满的日益加深,一场科学革命也在进行当中。从15世纪开始,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之后的17世纪。这场科学革命的启端是波兰科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对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心说的研究和论证。哥白尼早年游学意大利,1505年回波兰后在费劳恩堡大教堂任牧师,闲暇时开始研究天文学。他在意大利留学时注意到了日心说的假说,试图用些拼凑的仪器来验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行星一定稳定运行在圆周轨道上,因为圆是一个完美的象征,只有通过匀速运动才能展现天体的特征。这些观点反映在他逝世那年出版的《天体回转论》里。尽管这还只是种假设,但却受到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的敌视和攻击。后来哥白尼的研究由泰冠·布刺和开普勒继续进行。布刺提供了广泛而准确的行星运动记录,而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则通过研究观测记录发现哥白尼说的圆形轨道并没有完全正确地说明天体现象。他在哥白尼研究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观测和计算,取得了以下的一些成果(1)他认识到行星轨道是椭圆的,太阳则在一个焦点上。(2)他发现连接太阳和一颗行星的半径在一定时间里所掠过的面积对那颗行星来说是恒定的。(3)对于所有的行星来说,其旋转周期的平方与距离太阳的平均值的立方之比原是相同的。这就是著名的开普勒三定律。

2. 伽里略和牛顿等人的科学成就

这一时期的另外两名重要科学家是伽里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和牛顿(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伽里略提出了动力学学说,通过实验证明了包括加速运动和自由落体运动在内的一些力学定律。此外,他还改善了望远镜的功能,已经观测到了银河、金星和木星卫星这样一些天文现象。他的科学研究受到了宗教法庭的敌视。1616年他在一次秘密审判中被判有罪,1633年他再次受到宗教法庭的公开审讯。为了息事宁人,他被迫当众认错。意大利的科学事业因此而停顿了几个世纪。

伽里略去世的1642年正好是牛顿出生的年份。虽然那时的交通和通讯的条件都很差,牛顿还是了解和掌握了他的先辈们所

取得的科学成果。他在 1687 年出版的《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发表了运动三大定律。第一定律是对伽里略原理的广义化陈述,即一切物体,如不受阻碍,则以恒定的速度沿一条直线运行。第二条定律把力定义为非匀速运动的原因,即力与质量和加速度的乘积成正比。第三定律的原理是每一作用力存在一个相等而相反的反作用力。在天文学方面他对哥白尼和开普勒开创的工作做了最终的完整论述,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即在任何两个质点之间存在一种吸引力,它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由于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人们对于行星与其卫星和彗星的运动轨迹都能予以详尽解释,同时对其他物体引起的轨道运动也能进行准确的计算。也是因为它的提出,开普勒的诸定律就此变成了牛顿理论的推论而已。人类终于找到了打开宇宙之门的钥匙,从此数学和物理的发展速度大为提高。

这段时间是人才辈出的时代。除了他们几位以外,16—17 世纪还产生了一些其他著名的科学家,例如研究电磁学、创造电的英国物理学家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 1544—1603),提出光波动学说的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发现血液循环的英国生理学家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开始分析化学的研究、让化学摆脱炼金术的英国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 1627—1691)等人。随着这些重大成果的出现,不仅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代正在到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之外,文艺复兴期间西方还造就了一批探险家和航海家。由于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地球上的一些未知地方得到了发现,人类文明的版图突然间扩展了许多。这些人里首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他原是意大利热那亚人,得到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赞助,率领一支船队于 1492 年的 8 月出发,原来想到东方的印度去,结果两个月以后却到了拉丁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后来他又陆续发现了美洲大陆

的其他地方。此外,葡萄牙航海家巴图罗摩·狄亚士(Bartoleme Dias,1466?—1500)在1488年发现了非洲的好望角;葡萄牙航海家瓦斯可多·伽马(Vasco da Gama,1460—1524)在1497—1498年间首次取道好望角到达印度,从而为葡萄牙取得对印度洋的控制权;意大利商人和航海家阿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7—1512)确认大西洋以西的陆地不是印度和亚洲,而是一个新大陆,以后这个新大陆便以他的名字命名。

六、近代哲学的开端

1. 弗兰西斯·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自然科学实验引起人们更多关注的时候,工作的方法和工具的使用便成为当时许多人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弗兰西斯·培根是现代英国实验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其父为英国掌玺大臣。他自幼好学,12岁便进了剑桥。他很早就关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写有不少宣传文艺复兴思想的文章和著作。他公开反对宗教唯心主义和经院哲学,认为经院哲学就像是献身于上帝的修女一样,是不能生育的,主张哲学应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犹如精神和宇宙结合一样。人们要作自然界的主人,取决于人们的知识的丰富程度。他说:“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人类需要新的科学,其对象就是自然界,其目的是把自然界变成人的王国,即让人来控制自然力。他持有这种观点,也身体力行。

在科学领域,培根热衷于探求一种新的方法或工具以便为科学研究提供一种简便易行、适用于一切领域的万能工具。他不满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段论演绎归纳,而试图发明出一种更为有效的办法。他在1620年出版了《工具论》,试图取代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虽然没有成功,却为以后的自然哲学研究方法开辟了道路。

此外他还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其文字优美的随笔至今仍是英国文学的宝贵财富。在政治上他当过英国的大法官,后因受贿罪而下台。

就哲学而言,文艺复兴后期更有影响的是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霍布斯从小就失去父亲,由叔父抚养成人。他在14岁便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后来当上了英国威尔斯亲王和他儿子两代人的老师。以后他常年住在法国,并和保皇党人交往。但他的一些观点既得不到保皇党人的赏识,也得不到教会的好感,以致于他后来不能发表任何政治问题的见解和著作。他是一位机械唯物主义者,用当时机械论的自然科学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他的代表作是《利维坦》。该书认为社会就像是一部巨大机器,自然是上帝创造和治理世界的技艺,所谓生命就是一部机器,人也是机器。利维坦是人模仿自然,用自己的技艺制造的一个人造动物——人造的“人”,其组织和力量超过自然人,它就是国家。他还认为人是利己主义者,都要趋利避害,保卫自己的安全。人在自然状态中都是平等的,但可能为了保护自己而侵犯他人,从而引发了战争。

他认为,迄今为止几何学是唯一的科学。理性之功能具有几何学中论证似的性质。我们必须从一些定义出发,制定它们时不要自相矛盾的概念。他是典型的机械论者,只承认力学和数学的作用,被马克思称为特殊的禁欲主义者,使物理运动成为机械和数学运动的牺牲品。他把客观世界看做是单个物体的总和,这些物体不可缺少的特性就是几何学上一一定的广延和图形,甚至硬度这样的物理特性也是一种数量的规定。他认为科学应以运动为研究对象,运动只是物体在空间的机械移动,而在物质内部并无运动。他认为,人是肉体的存在物,他否认天使的观点,同时又否认人的精神存在,因为它既无广延性也无形状,他认为思维的实体是物质的假设最恰当。

他是无神论者,仇视神学,反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权力。他认为,宗教形成的根源是因愚昧无知而产生的恐惧心理。有关君权问题,他认为这是人们联合起来把自己的权力授予一个核心的权威。具有理性和竞争性的人不得不达成一种人为的协议或惯例,据此他们同意去顺从某个权威。一旦这套制度付诸实践,他们就不能背叛,只有当统治者不能提供保护——这是他们之所以被选为统治者的首要条件,人们才有理由宣布协议无效。以这种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就是共和政体,它像是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巨人,一个“利维坦”。他认为核心权威应称为君权,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拥有绝对权力。

2.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后期在哲学上影响更大的是法国的雷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笛卡尔出身于下层贵族,父亲是个地方议员。他先是就读于一所耶稣会学校,受到了良好的古典文化和数学教育,以后又学了法律。但他似乎对法律并无多少兴趣。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巴伐利亚的军队,在一次沉思里他想出了他的哲学大纲。为了不卷入当时有关自然学科的一些争论,他将自己出版的内容限制在三本书的范围里。这三本书就是《屈光学》、《流星》和《几何学》。三本书里最出名的是《几何学》。该书陈述并应用了解析几何的原理,后来他又出了《沉思录》和《哲学原理》。他成名以后,受到了瑞典女王斯蒂娜的邀请,去瑞典为她讲学。工作十分辛苦,每天早晨5点钟就要起床为女王讲课。如此重负他实在不堪忍受,拖了一段时间后便一病不起,第二年,即1650年,就客死他乡。

笛卡儿的哲学思想是从他的数学演算开始的。他在几何学里凭借简单的方程式就可以描述整族曲线的性质,他因此相信数学里成功应运的方法也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里去。他认为,只有作

者独立完成的著作才有价值,根据这种观念他觉得除了逻辑学、几何学与代数以外,其他所有的学科都没有什么价值。他从这些学科里找出了四条有用的规则,即:

1) 决不接受任何东西,除非是清楚的理念。

2) 必须把每个问题按照解决时的需要分成许多部分。

3) 思维必须遵循简单到复杂的程序。如果那里没有顺序,我们就必须假设一个。

4) 为了保证没有忽略任何东西,应当经常详细核查。这是他把代数方法运用到几何里的一次重要尝试,并据此创立了解析几何。

在哲学的思辨方面,笛卡尔的方法将他引向了系统的怀疑。对他来说,感官提供的迹象是靠不住的,必须进行怀疑。甚至数学虽然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应提出些怀疑。怀疑是他的名言“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的基础。笛卡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是思维的东西,完全独立于自然界诸物,也完全独立于自己的肉体。这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一片哗然。他进而运用广延性和运动性这些术语来解释一切,甚至对生物学也是这样。他认为动物是些自动装置,没有灵魂,他提出这些观点是从动物不会讲话因此一定没有理性这一事实出发推想出来的。这就强化了人的灵魂独立于肉体的观点。他还认为,没有任何力量能让我们相信灵魂不朽,那种认为灵魂不朽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他把关于运动的不可创造性和不可毁灭性的原理运用到整个宇宙当中,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基础。^①

笛卡儿思想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批判性怀疑的方法。作为思维方法它引向一种普遍性的怀疑。它认为广延性和运动是独立于感官的一般概念,为一般知识所具有。感官知觉如色、味、触等则

^① 以上参见《西方智慧》,伯·罗素,258—26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属于第二位性质,并不在事物当中真正存在。他认为,理性不仅和感性知觉相比是认识世界的最高阶段,而且也是我们感官所不能直接感受到的一切知识的独立源泉。他是唯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还反对经院哲学和神秘主义,提出用知识代替信仰,用理性代替非理性,用逻辑证据代替权威崇拜。虽然他的哲学是非宗教的和世俗的,但仍然给宗教留下了地盘。他把哲学分成了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即关于自然的学说(物理学)和超自然的学说(形而上学)。他认为存在有两种独立实体,即具有广延属性的物资实体和具有思维属性的精神实体。同时他认为物质本原是互不依赖的,因而他是二元论者。同时他又认为每种实体都服从于第三种最高本原——神。他的二元论清楚地表现了当时资产阶级思想所具有的妥协性。

3. 斯宾诺莎的哲学

文艺复兴后期的另一个著名哲学家是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他出生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家庭,宗教改革使他难以恪守正统的犹太教教义。由于他个性腼腆,宗教上的冲突使他完全离群索居并拒绝去大学里教授哲学。他的代表作是《伦理学》。全书按欧几里得的方式叙述,从一些定义和一组定理开始,由此推导出下述命题的全部主要内容:第一部分论上帝,首先给出六个定义,其中包括和经院哲学相同的有关上帝和实体的定义。有关泛神论,他认为实体似乎必须是某种可以进行自我解释的东西,必须是无限的,而且只能有一个,因而它与上帝是一致的。所以上帝和宇宙即万物的全体是同一的,这就是著名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值得注意的是斯氏的论述里不含任何神秘主义,而且是一种演绎逻辑,其基础为一种创造出来的定义和公理。

对于教会来说,上帝与大自然同一的观念是一种异端邪说,因

此对此极为反感,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种看法是合理的,是演绎论证的结果,是不得不接受的结论。根据这个理论斯氏把人的智慧看做上帝智慧的一部分。和笛卡儿一样,他要求清晰明确。有了完整的理念,人们无疑就懂得事物之间的秩序与联系,如同理念之间的秩序与联系一样。这样斯宾诺莎就实现了自己的名言:“心灵的本性就是以某种超时间的观念来感知事物。”

书的第三部分指出人的激情会对思维产生不利影响,使他看问题不能全面地进行思考。他认为,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这种观点使他看上去有些像犬儒主义者,其实这是一种误会。一个人不追求私利是不可能的,但他的私利和信仰上帝并不矛盾,并且要结合起来。他认为一个人要是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以永恒的形式”按照一种超时间的观念来看待世界上的一切。

作者在书的最后两部分里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些思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处在外部思想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下面,就始终摆脱不了奴隶状态。但我们一旦和上帝息息相通,我们就不再受到这些影响的支配,因为此时我们已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而宇宙整体是不受条件限制的。在通往宇宙整体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获得相对的自由,或者相对于上帝的独立或自决,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恐惧。

他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一样,认为无知是万恶之源,知识则是导致智慧和德行的重要条件。但他不愿去探讨死亡,他觉得他的智慧不是对死亡而是对生命的沉思。在他看来罪恶是消极的,上帝或大自然不缺乏任何东西,不可能有罪恶。世界上无论何事,天道决不负人。在实际事务里,人理应作为一个有限的存在物,以保存自己的方式行事,尽其所能多接触社会。^①

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对17世纪的科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① 以上参见《西方的智慧》,伯·罗素,266—26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它对宇宙间万物运行方式所作的解释带有含蓄和命定论的特点,为以后的一元论科学发展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虽然他的思想还受到他的时代限制,但开始脱离神学的摆布,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样就伦理而言,他的思想也有积极的方面。他认为,罪恶不完全是消极的东西,例如一些残酷的行为对宇宙整体来说就有推动作用,他还认为,在永恒状态下残酷行为不会总是任性的。实际上他的这些观点重新阐释了基督教的原罪说,在当时具有积极的影响。可以说他的哲学体系是对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七、古典主义和文化沙龙

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17世纪的古典主义是这种特征的继续。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者们对希腊罗马文明中的理性秩序尤其感兴趣。出于这种恢复古典秩序和追求新的秩序原则的欲望,无论是人的一般行为,还是文学创作都强调这种符合古典主义原则的正确性标准。为了建立一种合乎情理的管理,人们就成立了可以仲裁正确性的科学艺术“学院”。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理智来发现更好的人类行为准则,也可以探讨自然法则的普遍规律。这种趋势促使文学向社会靠拢,接近社会生活。说教性的反讽则成为一种受欢迎的表达方式。艺术家追求含蓄、简洁和形式的优美。在讲究形式方面,法国人尤其具有代表性。

1. 法国社会文化状况

法国在17世纪是个君主专制国家,其宫廷在整个欧洲是最豪华,也是最光彩夺目的地方。从政治上来说,法国人1430年在圣女贞德的领导下赶走了英国人,结束了百年战争,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期。16世纪中叶法王路易十二凭借王位的权威夺回了原来分散在各地贵族手中的地方行政和税收权力,将

它们委托给他任命的政府中上层官员。真正给法国带来和平与稳定的是亨利四世。他在大臣苏利的帮助下结束了和西班牙的战争,终止了宗教冲突,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计划。然而他在1610年遭暗杀,由路易十三继位。经过几次反复,大权落到主教黎塞留(Richelieu)手里。黎塞留在镇压了新教和封建割据势力之后,加强了对政府部门的有效管理,改善了军队的组织,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他还鼓励对科学文化艺术的研究,使得法语逐渐成为欧洲的重要交际语言。

2. 法国的文化成就和特点

1642年黎塞留去世以后,其首相职位由马萨林(Mazarin)主教担任。马萨林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沿用了同样的施政方针。1661年马萨林逝世,路易十四(1643年在路易十三死后即位)自封为首相,视自己为上帝在尘世间的代表,宣称“朕即国家”。他也是艺术的提倡者和艺术家的保护人,建造了举世瞩目的凡尔赛大宫殿,收藏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宫廷里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更是别出一格,与众不同。出入王宫的绅士头戴假发,身着华服,讲究礼仪,言谈优雅,在上层社会里建立了规范的语言和行为规范。

在文学创作当中一些作家追求形式的完美,而内容和主题则退居其次。他们以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文艺批评标准作为文学的基础,推崇古典作品的形式和主题,因此被称作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主义作家在学习古典文化的过程中,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肯定人的力量,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思想。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特点是真实、中庸、对称、和谐和唯美的趋向。

3. 文化沙龙的建立

这一时期的一种重要文学和社交活动采用了沙龙的形式。公

元 1628 年,沙龙(Salon)首先由出生于意大利,后嫁给法国德·朗布依侯爵的凯瑟琳·德·维丰内(Catherine Viverot)组织起来。她来法国以后发觉宫廷内的文化生活难以适合她的口味,于是在靠近罗浮宫她的家里邀请并款待一些有情趣的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当时,她的家中还没有客厅,这些客人就呆在她的卧室里,或坐或站,以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文化问题作为谈话内容,尤其是对如何改进语言表达方式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这些交谈当中,他们发明了些各种委婉的表达语,如用“嘴上的家具”代表“牙齿”,用“空气的孩子”代表“叹气”,用“维持生计”代表“面包”等。后来这种活动改在客厅进行,由于高雅方便,很快流行起来,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文化交际活动形式。

虽然沙龙的活动内容不无称道之处,但是有些沙龙的活动整天陷于无谓的争辩,追求所谓的“高雅”,有些庸俗化的倾向,成为莫里哀《可笑的女才子》的讽刺对象。

4. 法兰西学院和古典主义戏剧

沙龙的建立使得社会和文人对文艺和其他学术讨论的兴趣大为增加,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公元 1629 年在路易十三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八位文人组成的俱乐部,讨论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以后在黎塞留的建议下,这个俱乐部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常设机构,将人数限制在 40 位。1637 年这个组织正式得到了议会的批准,叫做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1672 年这个组织又得到了路易十四的恩准,在罗浮宫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从 1638 年起这个组织就计划编撰一部辞典,直到 1694 年《学院辞典》问世才如愿以偿。学院对当时的文学作品拥有生杀大权,可以表示它对作品的赞许或谴责,制定国家对文学、语言 and 艺术的指导方针,领导社会对人文学科的情趣。法国文人一旦进入法兰西学院,就几乎成为政府中的一员,享有贵族的地位,能够对文化艺术

施加很大影响。

这时期的法国戏剧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古典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628年,皇家喜剧院成立后搬进了布哥涅府邸。剧团的主要作家是亚历山大·哈尔迪(Alexandre Hardy, 1569—1632)。他在希腊悲剧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推出了自己的作品。他省去了合唱,引进了更多的动作和场景。他按照希腊悲剧模式组织戏剧情节,但故事情节围绕一个中心展开,这和莎士比亚的将整个故事戏剧化不一样。他的这些创新为以后的拉辛和高乃依的创作铺平了道路。古典主义戏剧的集大成者是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 1606—1684)、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和莫里哀(Jean-Baptiste P. Moliere, 1622—1673)。他们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拥护封建制度和王权统治,但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生活、贵族的腐朽思想以及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加以揭露和鞭挞,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此外,他们的作品结构严谨,语言简洁、准确、清楚,合乎逻辑。他们大都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历史故事当中搜寻题材,有的也取材于现实生活,无论采取那一种形式,他们的作品普遍关注现实社会。他们在表现和描绘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物特征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高乃依是法国古典主义早期的代表作家。他写的30多部剧本当中大部分是悲剧。他的《熙德》是法国第一部古典主义悲剧。情节取自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的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说的是西班牙贵族青年罗德利克为报父亲受辱之仇杀了自己情人的父亲,后来他在击退摩尔人的战争当中成为民族英雄,在国王的帮助下终于和情人重归于好的故事。这个剧本表现了爱情和责任的冲突,反映了理性战胜感情、个人恩怨要服从国家利益的主题思想。

拉辛是法国古典主义中期的代表作家。共写有11部悲剧和1部喜剧。代表作是《安德洛玛克》,取材于希腊悲剧。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的寡妻安德洛玛克为了救儿子被迫同意和厄庇洛斯国

王皮洛斯结婚,引起了他的未婚妻赫尔弥俄涅的嫉恨,她在唆使他人杀害了皮洛斯后自己也自杀。剧本着重表现了理性不敌情感、情欲毁灭一切的悲剧情调,同时也歌颂了安德洛玛克委曲求全、忠贞不贰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理性。他的另一部悲剧《费得尔》也取材于希腊悲剧,描写雅典王后费得尔爱上了国王前妻之子,因遭拒绝而害死他的故事。拉辛的悲剧和高乃依的悲剧完全不同。高乃依的人物都是些英雄形象,而拉辛的人物多数缺少理性、感情用事,对当时的封建社会有一定的揭露意义。

莫里哀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堪称是杰出的喜剧家。他参与建立的卓越剧团在法国各地巡回演出达12年之久。他的主要作品首先当推《伪君子》。该剧叙述一个叫做达尔丢夫的伪君子伪装着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走进了奥尔恭的家。他表面上道德高尚,十分虔诚,因此而赢得了奥尔恭一家的信任,但在内心里他却非常卑鄙。他一方面进行挑拨离间,破坏他们家人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试图勾引奥尔恭的妻子。在他的罪行暴露以后,他又打算霸占奥尔恭的家产,甚至想在政治上陷害奥尔恭。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影射着当时上层社会的伪善,鞭挞那些披着善良的外衣,暗地里陷害好人的伪君子。此外他还写了不少揭示当时社会黑暗、世风日下的剧本,其中包括《堂·璜》、《恨世者》、《屈打成医》、《吝啬鬼》等。他的剧本语言概括而夸张,形式严谨,富于冲突性,语言文字流畅自然,口语化程度很高。

古典主义文学与戏剧的出现和发展对17世纪的法国和欧洲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推动了法国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形成。由于它重视文学对社会的作用,主张文学反映生活,注重人物的内心描写,对欧洲现实主义流派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古典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影响相当大,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不少国家都经历了古典主义时期,前后长达200余年。

第七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

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中和文艺复兴后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开始对神权思想和封建专制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新兴的资产阶级出于本阶级的利益驱动需要,更是千方百计地希望登上政治舞台。封建专制制度本身也由于自身的原因处于一种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局面当中。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调整社会秩序和分配政治利益也就势在必行。这一发展态势的序幕首先由英国的光荣革命揭开。它表明资产阶级已经具备了执掌政治权力的资格和能力。初试牛刀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以后的几十年里,英国人霍布斯和洛克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经验主义思想很快传到了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最终登上政治舞台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推动了西方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19世纪后期到来的现代主义提供了思想和形式的前期准备。

一、启蒙运动产生的原因

1. 法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1) 政治上加强王权的倾向

17世纪中叶以后路易十四在法国亲政,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王

权。这些措施包括：

① 打击法院权力。他首先削弱法院的权力,先是流放法官,以后又跑到法院亲手撕毁有关议事记录,宣称“朕即国家”,使法院丧失对国王政绩表示异议的权利。

② 改革贵族分封办法。他还下令取消1631年以来部分有钱资产阶级花钱买来的贵族称号并审查一切有封号的贵族“合法性”。这样就抬高了贵族的地位而堵塞了资产阶级通向贵族集团的道路。

③ 加强中央集权。他还亲自出席王室会议,扩大中央集权,签署一切国家公文,派出或任命各地财务、司法、行政和军事长官。

2) 经济的发展和殖民地的扩张

为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路易十四还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是16到18世纪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当时欧洲各国都力求聚敛更多的金银,增加贸易顺差。该政策由财政总监柯尔柏负责,包括以下内容:

① 兴办大型手工工场——“王家工场”,开运河,修建道路;

② 取消部分国内关卡,降低税率来支持和鼓励工业生产,提供财政补贴;

③ 建立了一支可供贸易和军事需要的庞大舰队;

④ 设立了若干专利特许贸易公司,如东印度、西印度、近东、北方等公司,一时间法国生产的商品,如威尼斯式镜子和花边、英国式袜子、荷兰式呢绒和德国式铜镜在各国之间畅销。

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推行殖民地政策,参加西欧各国争夺殖民地的竞争。他当政期间,法国在印度占领了本地治里等地,在北美沿密西西比建立了路易斯安那领地,在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也占领了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殖民地的扩张大大增加了法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成为欧洲军事上最强

大的国家。三十年战争后,德国的力量受到削弱,哈布斯堡家族远远不能和波旁王朝抗衡。在英国重新执政的斯图亚特王朝势力也很弱小,需要接受路易十四的资助,在对外政策上不得不听从法国。一时间法国成为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3) 军事上的胜利和挫折

法国利用对它有利的形势积极进行扩张,参加了一系列战争。虽然路易十四在1667和1672年的两次对西班牙的战争里赢得了胜利,占领了西班牙的南尼德兰的一些土地,但在以后奥格斯堡联盟的战争中,由于英国发生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站到了荷兰一边,法国实际上不但没有沾到什么便宜,还不得不退还了占据的西班牙的土地。1721年法国和奥地利又爆发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英国同荷兰帮助奥地利抗击了法国军队。战争长达12年,路易十四之孙腓力虽被立为西班牙国王,法国却不得不割让土地给奥地利和荷兰,撤回驻洛林的军队并让出北美的一些殖民地,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

4)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政治经济危机

连年的战争和凡尔赛宫的挥霍无度使法国的财力大伤元气,财政赤字高达25亿锂(1锂为不到5克重的银币)。农民不得不担负沉重的负担,一边向领主交纳沉重的地租,一边要向教会和国家缴付各种苛捐杂税。其间还发生过两次大饥荒,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农民和城市平民举行抗租抗税的活动,反对粮食投机的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1715年路易十四死时已是怨声载道,群情激奋。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继位时年仅5岁,由奥尔良公爵腓力摄政。腓力起用苏格兰银行家约翰·劳进行财政改革,通过发行大量纸币的办法偿还所欠的公债,但不久便因发行额(30亿锂)大大超过其银行实际资产

(7 亿锂)而掀起兑现风潮。约翰·劳不得不逃出法国,银行因此而倒闭,许多富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不得不宣告破产。但政府却因此而偿还了许多债务,很多人因此发了财。这一切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普通百姓的不满。

路易十五亲政后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切为女宠左右。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已经够了,让我的后人去设法解救吧!”在他的统治下实行许多新的税收,人民的负担更为沉重,宗教迫害也更为严重,有些胡格诺教徒被迫移居国外。政府进行粮食投机,造成人为的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和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暴动。

对外政策方面,法国为了对抗西班牙、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三国联盟,不得不对它的劲敌英国委曲求全。尽管如此,它还是遭到一连串的挫折。在以后的 1733 年对奥、俄的战争和 1740 年对奥地利的战争以及 1756 年对英国、普鲁士的战争都未能取得成功。特别是在 1756—1763 年和奥地利联合对付普鲁士与英国的七年战争中,法国遭到惨败,并且在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势力都被英国逐出。一连串的失败导致了法国最终丧失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地位,而将霸主地位拱手让给了英国。

5) 变革的呼声

长期的战争使得法国的元气大丧,不仅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而且由于西南各地的饥荒和农民、平民的不断暴动,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反抗封建专制的斗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法国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发展能力,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法国人对经济发展有了强烈呼声,但同时,以法国国王为首的封建专制政体不顾人民的愿望一味进行战争和掠夺剥削。这种复杂和多变的法国政局迫使那些有思想有觉悟的进步思想家进行思索,希望能够通过思想探索和社会的革新找到一种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办法。这种思考是导致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2. 科学知识的传播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

启蒙运动和科学知识当然也是分不开的。在文化思想领域里,人们那时以讨论和研究科学知识为荣,科学研究成果正在改变人们对生活的见解。哥伯尼、伽里略和牛顿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正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开始影响许多文化人的思想。他们逐渐放弃了宗教思想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从科学知识中看到了人的力量和希望。这种思想最初是由英国的经验主义者提出来的。经验主义的三位代表人物分别是洛克、柏克莱和休漠,其中洛克的思想影响最大。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出身于严格的清教徒家庭,父亲当过律师。他20岁进了牛津大学,先当学生后当老师,开始是教希腊文和哲学,后因不同意经院哲学思想观点而改为研究医学。他最著名的哲学论著为《人类理智论》。他的哲学观念在这篇论文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宣称,人的心灵和我们所能进行的探索都有局限性,第一它不像理性主义那样预先断定人类知识的范围。其次它强调感觉—经验的因素。因此这种方法既是经验主义传统的开始,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起点。他是第一个把知识放在经验基础之上的人。他认为虽然人一出娘胎就有与生俱来的学习知识的资质,但未经教育,心灵内不会有知识的内容。因此心灵起初犹如一张白纸,使它具有思想内容的是经验。这种内容洛克称之为理念。理念可分两类,第一是感觉理念,是通过感官观察外部世界而获得的。另一种是反思理念,来自心灵的自视。他认为这两者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在思维和推想的过程中我们决不能超越感觉和反思的范围。

洛克的政治理论代表作是他的《政府两论》(*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在这本书里,他反驳了费尔摩默提出的“君权神授”的说法,提出以理性主义的社会契约论为组成社会的基础。

他认为,社会的契约论的动机是保护人的财产,却放弃了对本人权利的保护,把它拱手交给了政府。既然国王也可能会卷进民事纠纷,根据没有人应当审判涉及他本人案件的原则,司法应独立于行政。洛克第一次成熟地论述了权力的划分,特别认识到了议会的立法功能,以及它和国王的行政权的区别。洛克本人没有把司法系统作为一种单独的权力来讨论,但他认为司法获得独立的地位显然对于组成一个相互制约的平衡体系、防止不受约束的权威兴起是至关重要的。

在思想家中,洛克大概不算是最为博大精深的,恐怕也不能算作最富有创新精神的,但他的工作却在哲学和政治两方面对资产阶级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哲学上他是新经验主义的鼻祖,在理论上为资产阶级准备了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思想武器。跟在他后面的是柏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边沁和穆勒乃至以后的法国百科全书运动。政治上洛克的自由主义对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和思想体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启蒙运动里都可以找到洛克思想的踪迹。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的思想对近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确实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可以说他是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重要设计师之一。

二、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

18世纪上半叶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夕,一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倡导和参加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浪潮。运动的中心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虽然参加者的动机、热情和取得的成果各不相同,他们追求的目的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依据一种新的理性思想和科学方法来全面考察和批判当时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宗教思想,探讨未来社会

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好政治和思想准备。启蒙运动的思想成分比较复杂,既有温和的开明君主派也有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当中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以及杰斐逊、潘恩等人,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 伏尔泰(Francois-Marie Arouet Voltaire, 1694—1778)

伏尔泰原来名叫亚路特,出生在巴黎并在巴黎接受教育,是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家庭富有,父亲为一知名人士,母亲出身贵族。年轻时因写诗讽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而被捕,关进巴士底狱,在狱中写完悲剧《哀狄普斯》,首次署名“伏尔泰”。出狱后,他出任法国驻荷兰使馆秘书,返国后因得罪贵族而再次被捕,被迫去英国。在英三年刻苦攻读哲学思想书籍并广交名流,深受牛顿和洛克的影响,完成《哲学通信》,抨击法国社会政治弊病,引起轩然大波,不得不流落在外。他先后到过洛林和普鲁士,后定居弗尼。在弗尼他努力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组织人开荒兴办农场、工厂和教堂并在这里写有多部著作。以后曾任宫廷史官和法兰西学院院士。1778年返巴黎,受到热烈欢迎,因社交活动过多,疲劳过度,不堪重负而去世。后人编有100卷本的《伏尔泰全集》。他的作品跨度很大,谈了很多问题,包括政治上的和平与自由、宗教上的宽容、经济上的企业经营、艺术上的问题以及大量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但他的声誉和地位主要建立在对宗教愚昧的批判以及对洛克、牛顿等人的思想传播上面。

1) 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的批判

伏尔泰一生致力于批判封建迷信和封建专制。他用“消灭败类”的口号痛斥天主教会和宗教迷信思想。他指出,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历史上“如此之多的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他在1771年写给俄国叶卡塞琳娜二世的信中说,自这位圣处女的儿子去世以

来,几乎没有一天没人因他而被害。他统计人类因基督教而损失了1700万生灵。一部教会史就是一连串胡作非为、抢劫谋杀的历史,教皇、主教、神甫是一群“文明的恶棍”和“两足禽兽”,所以是“败类”,人们应群起而攻之。^①

伏尔泰虽然始终不渝地反对天主教,却又认为神是存在的,人们还是需要宗教的。他这种思想显然受到自然神思想的影响。这是因为自然客观世界之外还存有一个上帝。至于上帝是什么,他又说不知道。他相信社会没有正义就不能生存下去,而上帝是贤明的,人们应当信仰公正的上帝。“人如果否认神,必至于恣情纵欲,犯极大的罪恶,这岂不可怕?”他甚至说,“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捏造一个出来。”^②

他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人,尽管种族不一,但人性相通,不善不恶。人有三种本性,即自然合群性、自然合理性、宗教性。

这种人性论是伏尔泰社会起源观的基础。根据他的理论,人生来就是生活在社会里,有产生自由的要求,即要自由地表达本性,而要做到这点便要有社会组织,即国家。他认为,国家不是产生于社会契约,而是产生于暴力。由家庭联合产生的共和制是国家的最初形式。他相信人的行为只要符合自然规律和理性,人类就能不断改善自己,拥有光明的前途。

在国家政体方面,他无情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而主张实行开明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他反对专制政体的理由是其专断,但他也不赞同共和制度,因为他认为共和制会产生竞争,引起内战,破坏国家统一。他所赞赏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度,对其赞不绝口:“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达到节制君主权力的唯一国家。在这个政府里有无限的权力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坏事,

① 参见《西方社会思想史》,251页,袁华音,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 参见《伏尔泰》,28页,索柯洛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那就双手被缚了。在这个政府里老爷们高贵而不骄傲,且无亲臣;在这个政府里人民心安理得地参与国事。”^①这些话收集在他1734年发表的《英国通讯》(又名《哲学通信》)里。在这些信里,他对英国的贵格会(一种新教)、议会乃至商业精神都十分推崇,对新兴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培根、莎士比亚和洛克更是称赞有加。与对英国的赞美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对法国的批评。他在《路易十四的时代》对于路易十四执政时期法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而在他的政治小说《康迪德的故事》里,他通过年轻热情的眼睛目睹了世界上的各种邪恶和灾难,不仅揭示了人类生存环境的隐患,也表现了人本身的无奈。故事结尾主人公说的“我们必须修建自己的花园”既可以理解为他的感慨,也可以理解为他对世人的忠告。

他的这种调侃和批判精神当然不限于这几本书。实际上他的一些代表作都有一种超前的敏锐和犀利。他的《论容忍精神》《哲学辞典》等都昭示了他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的鞭挞,对人类美好明天的向往。

2) 主要思想特征

伏尔泰的名声和启蒙运动紧紧连在一起,他的思想主要表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怀疑主义方面的。他的怀疑主义没有笛卡尔那么极端,但他从根本上否认了欧洲一些形而上学的理论依据,对于经院哲学宣扬的神学教条更是嗤之以鼻。其次是经验主义。他强调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的重要性,认为经验给我们带来了知识,也提供了做事的方法。虽然他对经验的认识还不够完全,但比起他的大多数同代人来说不啻是个很大的进步。这里面当然有洛克对他的影响。第三是人道主义。他对教会和神学的批

^① 参见《哲学通信》29页,伏尔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判基于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认为当时的认识水平不足以支持任何神学和哲学理论。换言之,任何人都有权利表达他认为正确的思想。社会和宗教应当容忍不同的宗教和哲学观念,对不同观念的人进行迫害是不能允许的,也是不人道的。尽管伏尔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这些思想的原创者,但他以优美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和形象、批判的眼光和讽刺的语调,成功地宣传和扩大了这些思想的影响,他本人因此成为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2.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1689—1755)出身于波尔多附近一个贵族法官家庭,早年就读于波尔多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先后任律师和省参议员,并任省高等法庭院长,获男爵封号,成为当地最有影响的名流之一。1721年出版《波斯人信札》(*Les Lettres persanes*),从多种角度抨击法国社会和专制制。1734年出版《罗马胜衰原因论》,首次提出社会理论并探讨历史更替的基本原因。1748年出版名著《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比较系统地提出并解释了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特别比较明确地总结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726年辞去波尔多法院院长。172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从此开始了一种以巴黎为中心的新生活。他的政治和社会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 社会起源理论

他认为在社会建立之前,人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只有认识的能力却没有知识,人接受的规律就是自然法则。这样的法则有四条:

① 和平共处。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感到不如人,因此不会去攻击别人而要和平共处。

② 求食本能。人必须想法设法才能在自然界获得生存,出于生理和体能的本能需要,不得不求取食物。

③ 两性之间的吸引。对自然的畏惧感使人类不得不团结和亲近,而这种亲近会带来快乐,两性的亲近又会产生一种本能上的性依恋,从而增加了这种快乐。

④ 建立社会的欲望。由于人类结合一道对付自然的愿望和对知识的追求,必然产生互相联系,建立社会的要求。

前三种法制是人和禽兽共同拥有的特性,第四种则仅为人所具备,这就使人类区别于禽兽并优于禽兽,产生了新的结合动机和过社会生活的要求。互相帮助,相亲相爱是人类建立和处理各种关系的通用原则,国家和社会也是这样。或许它们的动机不完全一样,但所有的国家和社会也都是从这种关系起源的。

2) 环境气候对人类影响

孟氏认为,法律和制度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特性,也和其周围物质环境的影响分不开。他说:“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气候的寒冷、炎热以及温暖相联系,也和土地的质量、形态和面积、和农、猎、牧各种人的生活方式都密切相关。法律应当和政治体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他认为,所谓民族精神就是这些因素相互发生作用的结果。

孟氏认为,在各种地理因素当中,气候最为重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民族特性。由于气候冷热不一样,寒带人精力旺盛,体力充沛,自信心较强,也有勇气;热带人比较软弱乏力,胆小怕事。例如印度人天生发育较早,寿命较短,缺少勇气和斗志。

^① 参见《论法的精神》(上),7页,孟德斯鸠,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政治制度。气候炎热的地区,人们的情欲早动而早衰,智力成熟得早也衰退得早,常常体力不支,较适合于专制主义统治。寒带人的体质和精神能从事长久、艰苦和勇敢的活动,渴望政治自由,反抗政治专制,比较适合民主政体。欧洲就属于这种情况。

③ 婚姻制度。热带人早熟早婚,女子8—10岁就可结婚,所以小小年纪就要谈婚论嫁,过早踏足婚姻了。由于天热,妇女容易衰老,男人因此常常外出寻觅新欢,常常是一夫多妻。寒带男子经常喜欢饮烈酒,克制能力比女性弱。所以“一妻制”在生理上较适合于寒带的气候而不适合于热带气候。

除了气候以外,他还认为土壤和政治制度也有关。土壤肥沃之地,多数人居住在乡村。他们只注意一己之利和舒适的生活,不关心自由,而且因是平原而无法抵御外来军队,作战时常会屈服,容易丧失自由。而多山国家或岛国常易防而难攻,不易征服,常能维护自己的主权。孟氏的地理环境论试图从物质因素当中寻找各国人在民族特性和发展状况等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说明社会历史的进步不是由上帝意志决定的,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以此作为推论的主要依据,过分强调了地理气候条件对社会进步和民族特性所起的作用,似乎有些以偏概全,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3) 宗教观

虽然孟氏认为封建社会不可取,对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他是个有神论者,声称宗教有好坏之分,好的宗教对国家有利。具体地说,他认为一方面宗教是虚伪和骗人的,另一方面它的一些主张和做法却又符合社会利益。例如宗教通过说教可以使人变得仁爱、控制情欲,调解婚姻,也可以消除政治制度的弊害、解救国家,同时还可以约束君主过于放肆的行为。

4) 政体论和三权分立说

孟氏把政体分为三类：共和、君主和专制。其中共和政体又分全体人民执掌最高权力（民主政治）和部分人执掌权力（贵族政治）两种。

孟氏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是有政治自由，实行三权分立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其中心是自由论和三权分立说。他认为，政治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应该”与“不应该”要以法律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只能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否则自由和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如何才能得到这种自由呢？他认为必须要在三权分立的国家里。

所谓三权，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是制定、修正或废止法律的权力，应由人民集体享有，由人民选出代表机关行使。行政权是媾和、宣战、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侵略的权力；应掌握在国王手里，因为政府的这一部门时时需要急速的行动，所以由一个人管理比几个人管理要好些”。司法权是惩罚或裁决私人讼争的权力，应由选自人民中的人负责执行，可以每年在一定的时间里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他认为这三种权力不能相互合并或兼含，否则就会滥用，侵犯公民自由。他明确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掌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和裁判私人犯罪或讼争权，则一切都完了。”^①

孟氏的三权分立说是在总结英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来

① 参见《论法的精神》（上），156—157页，孟德斯鸠，商务印书馆，1982年。

的,目的是改变当时法国君主专制的统治。三权分立说的核心是三权牵制论与平衡说,也就是三权互相牵制、彼此保持平衡,以达到公正、公平的理想统治,防止专制独裁。这个理论表达了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统治的强烈愿望,对后来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很大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和以后的宪法都提到了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暴政的武器,并在一个历史时期里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论法的精神》是西方在亚里士多德后最重要的一部社会政治著作,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人类社会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3. 卢梭

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出身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生下来母亲就去世,而父亲则在他10岁时就离开了他。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过流浪儿的生活。不过他天资聪明,十分勤奋,在他人赞助下自学成才。他先后当过仆人、秘书、教师、乐谱抄写员等工作。1749年他以论文《论科学与艺术》获第戎科学院征文头等奖,一举成名。其后发表过三部重要著作,即《新爱洛伊丝》、《爱弥尔》和《社会契约》。后两部发表以后在法国引起极大反响,卢梭因此而被捕。晚年他又写出自传《忏悔录》,对后世影响很大。卢梭思想极具创新意识,其核心是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提出了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途径和方法问题。虽然在他生前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攻击,他从来都没有屈服过。他去世后,他的思想精华对法国和欧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影响。他的社会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人类社会的起源

卢梭认为文明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也是不平等的。

人们应当按照社会契约精神,建立一个保持自然人精神的真正文明社会。他在《社会契约》一书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①

他在早期论文里就对当时流行的有关文明社会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而在《爱弥尔》和《社会契约》里则进一步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

他首先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史前社会人的生活,在人类社会没有形成之前,人处于一种“自然人”的状态,那时人的物质生活十分低下,但是人性却非常善良。他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像霍布斯所说出于一种安全的需要,而是由于一种较为高尚的道德本性的作用。虽然互相之间有些冷漠,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比较快乐和满足,而且具有同情心。

然而他又同时认为,人的自然本性虽然美好,但不可能指望人在自然环境当中发展自己的高尚品德。这是因为后来随着家庭的出现,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人类先后有了自己的部落、社会和国家。卢梭觉得人类既可以在自己的社会里保持独立的自然属性,又可以为自己的社会承担责任,服从社会发展的规律。然而这种理想却不能实现,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了私有财产的缘故。卢梭认为,财产的私人占有是人类历史上犯下的最大的一桩罪行。人类自从有了私有财产就有了一连串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行为,进入了一个历史黑暗时期。

卢梭认为,土地被私人占有是私有制的开始,它表明所有权观念的形成和自然状态的结束。农业和矿业的发展要求人们实行社会分工,使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当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去帮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平等就不复存在……劳动就变成强迫性的了。

^① 《社会契约论》,23页,卢梭,商务印书馆,1982年。

2) 社会契约的产生

社会契约的概念最早由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他认为,国家源于自由人的相互协定,相互保证不受他人伤害、共享幸福。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荷兰格劳修斯(Hugo Grotius, 1583—1645)的重申和肯定。这是个人为概念,主要用于反对封建社会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并很快在欧洲和美国传播开来。卢梭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学说,用来解释人民为何有生存的权利和进行革命的权利。他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思想,写了《社会契约》。

① 产生原因。私有制产生后,由于存在不平等和贫富对立,人类受到了连续不断的战争和其他动乱的困扰。富人们感到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都受到了威胁,于是宣传联合的必要性,导致社会契约的制定和社会的形成。

② 契约内容。所谓社会契约,用卢梭的话来说,就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的人身和财富安全,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参与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①

卢梭不像其他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把社会契约当成一种解释现存社会制度合理性的工具或是上下级之间的一种约定,而是共同体视为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由于这个共同体是由所有成员组成的,所以这种约定实际上就是“人民是在同自己签订契约”。把社会契约归纳为一句话,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②

根据这种所谓的契约,订约者把自己的全部权利交给了社会,以自然的自由去换取社会的自由,以自然所造成的人类体力上和

① 参见《社会契约论》23页,卢梭,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参见《社会契约论》35页,卢梭,商务印书馆,1982年。

智力上的不平等换取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人们通过契约组合成了一个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体,获得了由全体个人形成的公共人格。这个公共人格从前叫城邦,现在叫国家。然而国家诞生后,人们并没有获得他们期盼已久的那种平等和自由,相反富人成了强者和统治者,而穷人成为弱者和被统治者。人们在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不仅在社会地位上不平等,在政治地位上也不平等,形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样两个截然不同和完全对立的阶级。

3) 人民主权思想

卢梭把他的社会契约论发展成一种激烈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人民主权思想是这一发展的表现。

① 主权问题

卢梭称主权为公意的运用,就是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活动。主权属于参加社会契约的全体人民。卢梭对主权提出了三项原则:

a. 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他说:“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集体的生命,所以只能由他自己代表自己。”^①

b. 主权不可分割。他说因主权是公意的表现,如分割就不成其为公意了。

c. 主权是不能加以限制的。就是说不允许任何人可以拥有超越主权的权利。

② 君主和行政官同人民的关系。君主和行政官都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君主和行政官都不能代替法律,只有人民才能制定法律,而只有人民能够立法的地方才有民主和自由。

^① 参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16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他认为：“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于这些官吏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而且在承担国家所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来争论条件的权利。”^①只有人民才是主权者，任何个人都不是主权者，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掌握行政权力的人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官吏。人民既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

③ 革命的权利。卢梭说，国家成立后，“一切都被妖魔吞噬了；人民再也没有首领，再也没有法律，而只有一些暴君了。从这个时刻起，也就再也没有风化与美德的问题了。”^②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成了奴隶般的被压迫者，官员成了暴君般的统治者，国家到了毁灭的边缘。

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运用暴力手段把这个政府完全消灭。卢梭说：“政府的契约被专制制度彻底粉碎。……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如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支持他的只有暴力，推翻他的也只有暴力。”^③

恩格斯说，按照卢梭的论述：“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所拥有的旧的自发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之否定。”^④

① 参见《社会契约论》，13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参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16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③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16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④ 《反杜林论》，138页，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9年。

4) 社会平等论

卢梭谈到社会平等时说：“至于平等，这个名词决不是指权力与财富的程度变得绝对相等。而是说就权力而言，它应该不能成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凭职位与法律才能加以行使。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购买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这就要求大人物这一方必须节制财富与权势，而小人物这一方则必须节制贪得与婪求。”^①他认为，要想使国家稳固，就应该使两极尽可能地接近，既不许豪富，也不许赤贫。这两个天然分不开的阶级对于公共幸福同样是危险的，一个会产生暴动的拥护者，而另一个会产生暴君。

他认为，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是一切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并且在某些方面比自由更为重要。他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以便保留私有制，限制大私有制。他说：“我的思想并不是绝对破除个人所有制，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把它限制在狭隘的界限之内，给它以一种措施，一种窥测，一种羁绊，借以遏制它，指导它，使它始终服从于公共的幸福。”^②具体的措施包括：

减少金钱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认为，金钱使人养成舞弊、欺骗等恶习，人们不要做有钱的人，而要做富裕的人。

征收所得税。根据法国当时的情况他主张对大土地所有者（国王、教会、贵族）按土地多少征税，对普通人减税，对财产多的和奢侈品课税。

人人劳动。他说：“一个人坐吃不是他本人挣来的东西，就等于是在盗窃……劳动是社会的人不可或免的责任。任何一个公

① 参见《社会契约论》，69—70页，卢梭，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参见《社会契约论》，70页注（2），卢梭，商务印书馆，1982年。

民,无论他是贫或富,是强或是弱,只要他不干活,就是一个流氓。”^①

5) 社会教育论

卢梭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就一无所有,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能力。我们在出生时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部要由教育赐予我们。”^② 他的教育思想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① 培养目标

他认为,培养目标应当是自然人。所谓自然人,是指,第一,是个自己养活自己的人。他认为人之所以要劳动为生,是因为没有劳动就没有饭吃。只有自己养活自己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人。第二是做什么都可以的人。他认为自然人都是平等的,只要有人品,做什么工作都没有问题。他说:“别人要我的学生做军人,做教士,或者做律师我都没有什么意见。在从事他父母的职业以前,大自然就已经叫他任职人生了。生活就是我要教他的技能。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③ 第三是个多面手。这个人会管理社会生活,也会办企业,懂经营。另外凭着他的才能和经验,能做其他任何事,并指导他人工作。第四是个经得起挫折的人。这种人能经得住命运的打击,不把豪华和命运看在眼里。他就像笛福所描写的鲁宾逊那样,有能力克服物质生活中的任何困难,经得起命运考验。

② 教育方法

① 《爱弥尔》(上),262页,卢梭,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② 《爱弥尔》(上),7页,卢梭,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③ 《爱弥尔》(上),13页,卢梭,商务印公馆,1979年。

卢梭认为驾驭儿童要在腐败的社会之外进行。要按照自然原则,就是根据儿童的特点发展儿童的个性。他把教育分成四个阶段:从初生到2岁;从2岁到12岁;从12岁到15岁;从15岁到20岁。他的教育方法按照四个阶段分步骤进行。

例如从2岁到20岁,卢梭强调感觉教育,目的是为了发展儿童的感官,丰富他们的感觉经验,他反对在这一阶段进行知识训练,说是“世界以外无书籍,事实以外无教材”。如果要读书,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应是《鲁宾逊漂流记》。孩子做错了事,例如打破了教室窗户的玻璃,不要急于纠正,而要让他昼夜受风吹接受教训。如果修好后又打破的话,就让他关在一个没有窗子的屋子里,以此剥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自由,以便让他体验人生,认识错误。

再如第三阶段,卢梭强调进行劳动教育。他认为:“在人类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在所有一切有身份的人当中最不受命运和他人影响的是手工业者。”^①他把木工定为儿童首先要学的职业,因为在他眼里,这种工作既对身体有帮助,又带有一定技术要求。总之他的教育观强调人身心的自由发展,强调教育和实际生产劳动相结合,反对死啃书本。他的教育思想是对封建贵族教育和神学经院教条的有力批判,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卢梭不仅在社会思想上比较激进,在思想方法上和对待古典遗产的态度和他的同代人也相距甚远。他竭力反对专制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对古典作品的生搬硬套态度,注重人的情感,肯定自然界的重要影响,主张人应当自由地发展和表达自己内心里自然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这些思想和主张是对当时流行的古典主义和其他正统的温和思想和价值观的背离,为此,他和伏尔泰、狄德罗乃

^① 《爱弥尔》(上),262页,卢梭,商务印书馆,1979年。

至休漠等人有过激烈的争吵。也因为他对自然和人的内心情感的尊崇,他被后来的浪漫派视为他们的开山鼻祖。

4. 百科全书派和美国独立战争

启蒙运动中对传播科学进步思想贡献最大的媒介当算是法国的《百科全书》了。该书共计 35 卷,汇集了各门学科的知识,重点是科学和哲学。它对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教会神学都起过重要作用,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声。该书起源于 1745 年由一些巴黎的印刷商发起组织的一个翻译英国人 E·钱伯斯两卷本百科辞典的计划,狄德罗和他的朋友达朗贝尔接到任务之后不久便决定把这个翻译项目改成编纂一部反映当时法国社会、文化、经济、科学和艺术最新成就的百科全书。此后 30 多年间里他们邀请了 200 多位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了编写,规模和时间都创下了当时之最,对当时法国和欧洲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形成及传播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百科全书派高举理性和无神论的批判旗帜,立场鲜明,反对宗教迷信,试图证明科学理性的正确性、自然法则的合理性,培育批判精神,推动新科学的发展。在宗教问题上,他们虽然坚持无神论观点,反对一切形式宗教,但为避开官方审查在遣词上比较慎重,有时故意含糊不清。相当大一部分撰稿者采用比较折衷的手法以调和当时的正统思想。但是狄德罗、达朗贝尔和霍尔巴赫等人却坚持自己的自然主义审美思想,坚定地反对各种封建迷信、蒙昧主义和狂热的宗教观念。他们将宗教中的迷信信条、神学中的虚无和神秘成分当做批判对象,主张自然道德优于神学伦理,要求宗教能够容忍不同思想观念,首次提出了人权思想。与此同时,他们还探讨了当时哲学发展的历史条件,对工业和贸易方面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开拓作用。此外他们对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如历史学、社会

学、经济学和语言学也注意独辟蹊径,有所建树,对这些学科的建立或完善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该书的完成对当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和思想影响,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对于推动当时的社会发展、扫除愚昧和落后的阴影、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知识水平都具有重大意义。该书的发行和传阅也因此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加《百科全书》撰写工作的人多达 200 多位。著名的除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以外,还有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特构特(Baron de l'Aulne Turgot, 1727—1781)、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霍尔巴赫(Paul Henri Baron Holbach, 1723—1789)、爱尔维修(Clande Helvetius, 1751—1771)等人。这些人代表了当时走在时代前沿的先进思潮。虽然各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尊重科学和人的尊严、弘扬自由平等的观念等方面却能找到不少共同之处。他们冲破了当时旧思想的羁绊,向旧世界发出了挑战。他们点燃的信仰之火一直持续燃烧了许多年,对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乃至 19 世纪的科学主义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革命的彻底性,主张用改良的方法改变当时现状。《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和其他启蒙时期的学者一样,以人的权利和幸福为中心,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危害,论述了他对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并进而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虽然他和卢梭是好朋友,邀请卢梭和其他一些反对封建神学统治的代表人物为百科全书撰稿,但他不像卢梭和其他一些人那样激进。他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更强调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理性批判来推动社会进步。这些思想或许和他的出身及经历有些关系。

他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商人家庭,但他没有经商,也没有按照他父亲的愿望去当牧师,而是在巴黎学法律之后走上了一条自由职业道路,凭着他的勤奋和才华一个人在巴黎独自闯天下。他既教书又搞翻译,边写理论文章边进行创作,且有戏剧、小说作品问世,可以说十八般武艺都试过。虽然他在这些尝试里没有取得过特别令人瞩目的成就,却也留下了一步步的坚定脚印。他在巴黎文艺界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并结交了一大批朋友,为他以后担任百科全书的主编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狄德罗和他的百科全书从理论上帮助总结、宣传、和普及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发明创造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倡理性思辨精神,发扬光大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的话,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则在实践上面进一步印证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权理论和国家学说。法国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卢梭有关社会革命思想的一次演习,虽然由于过多的流血和内部的分歧未能保住胜利成果,但它发表的“人权宣言”却是资产阶级第一次把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公告方式向全世界公开宣告。美国独立战争作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次成功尝试,不仅在于它最终从英国人那里赢得了独立,更在于从一开始就按照启蒙运动提出的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三权鼎立式国家机器。而美国独立的成功除了华盛顿在军事上的贡献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托姆斯·杰斐逊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所开创的建国思想。

托·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对美国独立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他对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上。宣言除了包含着自己的同胞的亲切之情和从英国殖民者那里获取独立的决心之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它谈到了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之权、自由之权、私有财产之权和追求幸福之权。在他看来,人民是政治的核心,自力更生是一般人最为重要的美德,政府的职责是保证每

个人接受足够的教育,得到足够的财产去发展普通人的个性。在他这里,教育不再是特权而是每个人都应当有的权利,也是政治上必备的条件。政府也不再是神授的特权象征,而是人民按照法律选举的。《独立宣言》不仅使得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变得合理,还是对启蒙运动原则的一种肯定和张扬。就这个意义来说,杰斐逊及其《独立宣言》继承了启蒙运动原则并进一步使之具体化。美国的诞生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胜利成果。

另一个对美国独立运动作过重要思想贡献的著名人物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潘恩是个传奇人物,生于英国,先后去美国和法国参加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发表过大量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权的文章与著作,对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普及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和殖民统治等都有重要贡献。他在《常识》里猛烈攻击英国政府的暴政和封建专制政体,坚决支持北美殖民地成为共和制的国家。在《人权论》里,他着重论述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自由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见解,热情赞扬共和政体。在《理性时代》里他主张废除英国国教,给人以宗教信仰自由。他的这些思想使他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卓越斗士,在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标记。

三、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

文艺复兴以后,古典主义文学在欧洲各国一度很有影响。无论是戏剧还是诗歌都在追求一种古典美,认为古人的成就今人无法超越,可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更加关注夺取政权,更加关心如何摆脱过去的清规戒律,以获取更多的自由,创作出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作品,结果引起了激烈的争辩。这场从法国开始的“古今之争”对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影响。

启蒙时期的一些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英国文学当中。在英

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方面有些作家受到法国古典主义的熏陶,写出了些古典主义剧本,他们包括德莱顿、维彻理和康格利夫等人。他们的作品一般都是些爱情故事,迎合了当时贵族和一些市民的趣味,大多数文学作品价值不是很高。另外一方面密尔顿和班扬的作品能够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揭示了一些社会弊病,反映了人文主义精神,呈现了现实主义的倾向。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古典主义虽然还有一定的势力,但在文学上更受欢迎的已经是些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了,诸如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下面就这期间英国的一些主要作家分别作些介绍。

1. 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

严格地说,密尔顿属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的作家。尽管如此,鉴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他。他出身于英国一个清教徒家庭,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积极参加反对英国国王和国教的斗争,担任新政府首脑克伦威尔的拉丁文秘书,反复辟失败后遭到迫害,致使双眼失明。他在担任公职期间写过许多政论文章,主张取消主教制度,力主言论自由,在政治上打击王党,并称人民有废除和杀死暴君的权利。他的代表作《失乐园》是他失明后写的,长约一万行。该诗内容取自《旧约全书》并加以改编。撒旦因为骄傲自大对上帝的统治心怀不满,纠合部分天使同上帝作战,失败后被打入地狱。为了报复,他试图毁灭人类。上帝没有进行阻挡因为他想考验人类。结果是亚当和夏娃两人都没有经得住考验,在撒旦的诱惑下,偷吃了禁果。上帝决定对他们惩罚,将他们逐出伊甸园。放逐前上帝的天使迈克尔把人类将要遭遇的灾难告诉了他们。他的另一部名著是《复乐园》,其故事源自《新约·路加福音》。说的是耶稣受洗后准备进行传道。在此之前上帝准备对他进行一次考验,让撒旦去诱惑他。撒旦先许他出

席宴席 ,再许他目睹城市的繁华和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 ,最后使用暴力恐吓 ,都未能动摇耶稣的决心 ,说明他经受了考验。这两部诗作显然都在借古喻今 ,表达了作者坚强的信念、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决心以及对英国摆脱封建统治 ,迎来革命胜利的信心。

2. 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7)

他是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作家。他也曾经参加过反对封建王朝的战争 ,失败后被捕入狱达 12 年之久 ,其代表作《天路历程》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主人公“基督徒”抛家别子 ,跋山涉水 ,克服千辛万苦 ,终于到达天国之城的故事。第二部分写他妻子步他的后尘 ,也去寻找天国的故事。这部小说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如在市场上什么都可以拿去贩卖 ,包括灵魂肉体 ,富贵功名。语言上比较口语化。

3. 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 ,1688—1744)

启蒙时期英国最重要的诗人 ,为古典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既有对爱情的称颂 ,也有对当时社会弊病的嘲弄 ,尤以仿英雄体的讽刺诗歌著称 ,代表作是《夺发记》和《群愚史诗》。他还写有些说教诗 ,并翻译了希腊史诗《奥德塞》和《伊利亚特》。他的诗风精巧有余 ,讲究形式 ,擅长说理 ,但感情不足。

4.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

英国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 ,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他本人是个商人 ,但关心政治 ,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发表过很多有关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论文。因为讽刺当时执政的托利党而被捕入狱也导致破产。他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在他 59 岁那年出版 ,一举成名。此后一发而不可收 ,他又陆续写出了好几部长篇 ,从而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逊从小不安于平常的生活,不听父亲劝告,跑到海外经商,几经曲折,终于在巴西当上了庄园主,因缺少劳力,想去非洲购买奴隶,不幸途中遇难,一人爬上了一个孤岛。在28年的生活里,他和大自然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通过劳动和智慧改变了环境,表现出了勇敢的拼搏精神,终于获得了生存的条件。后来他救出了一个即将遇害的土人,命名为“星期五”,让他作他的奴隶。经过长时间的磨难鲁滨逊终于回到了英国,成为一个富翁。

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歌颂了艰苦创业、劳动致富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资产阶级在资本进行原始积累阶段时所需要和提倡的,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鲁滨逊作为资产阶级成员当上了小说的主人公,这也是以前文学作品所没有的,不同于过去的以流浪汉和贵族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所以就其题材和主题来说,这部小说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5.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

他家境贫寒,依靠亲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后来编过报纸,写了不少政论文章。由于长期在爱尔兰生活和工作,对爱尔兰的状况有着深刻的认识,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强烈不满,不少文章都是讽刺英国殖民政策的,受到爱尔兰人的尊敬。

他所写的唯一小说是《格列佛游记》。小说描述了英国医生格列佛漂洋过海,来到几个虚幻国家的神奇经历。首先去的是小人国。该国居民身長只有6英寸,因鞋跟的高低不同而分为两派。政客们一个个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为了鸡蛋的大端小端而和另外一个小国连年战争。格列佛为了避免牵连而设法逃离。第二个去的国家是大人国。当格列佛向国王炫耀英国各个方面的实力时,受到国王的抨击。作者显然是通过国王的批评来揭露英国的腐败和侵略成性。此外,大人国本身政治稳

定、民心安定,没有常规军队,国计民生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妥善安排。这些都体现了作者的理想。最后格列佛来到了马国。在这里,马是主人和统治者,虽然还处于原始阶段,但民风淳朴,表明了马的理性和对和平的热爱。和马相对照的是耶胡,他们长得和人一样,代表着丑恶、贪婪、淫乱等恶劣品质。

这部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揭露了英国政治、社会、军事、司法等方面的问题,作品语言生动,反语、夸张、对比等手法比比皆是,是一部集流浪汉小说和讽刺小说为一体的政治讽刺型小说,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经久不衰。

6. 撒缪尔·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

理查生出身于一个木匠家庭,本人年轻时当过学徒。他的小说带有强烈的说教色彩,注重心理描写,善于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属于早期心理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他的第一部小说《帕米拉》写的是乡村姑娘帕米拉注重自己的贞操,结果赢得别人尊重的故事。她才到主人家当女佣时,主人试图对她不轨,她坚决不从,迫使主人明媒正娶。婚后,她注重操守,处事谨慎,内外上下无不称赞。第二部小说《克莱丽莎·哈娄》是书信体,女主人公克莱丽莎被家里人强迫嫁给一位她不喜欢的有钱人,情急之中跟了一个纨绔子弟勒普雷斯。等她认清他的真实面貌时为时已晚。最终她惨遭他的折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7.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

他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早期主要写剧本,写过多部讽刺当时社会风俗和政治黑暗的喜剧及小歌剧,如《巴斯昆》和《历史记事》讽刺了著名的贪污首相瓦尔浦。《历史记事》通过年鉴和戏中戏的手法,描写了几个政府首脑在一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榨取

钱财的故事,商量的结果是决定对无知征税,因为有钱人大都无知。戏中还影射瓦尔浦用这样搜刮来的钱财收买反对派,瓦尔浦因此十分恼火,当年就使得议会通过了戏剧审查法,封闭了大批戏院,菲尔丁也不得不就此封笔改学法律,当了名治安官来谋生。过了些年,他又不甘寂寞,重新执笔,改写小说。他的长篇小说当中有四部比较重要,分别是《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约瑟·安德鲁传》、《汤姆·琼斯》、《阿米莉亚》。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借用当时的一个强盗故事来讽刺瓦尔浦之类的政客。魏尔德夺取钱财不惜手段,甚至不放过他小时候的同学——善良的哈特夫利。哈特夫利诚实善良,对他一片热情,魏尔德不但骗了他的大批财宝,害他进了牢房,还拐走他的妻子,企图霸占她。被捕后,他和另一强盗头目还在牢房里争权夺利。在作者看来强盗和政客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心狠手毒、不惜手段、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一丘之貉。

《约瑟·安德鲁传》围绕贵族夫人的男仆安德鲁而展开。安德鲁因拒绝贵族夫人的引诱而遭解雇,于是他离开了伦敦去找他的情人芳妮。途中他先后遇到了牧师亚当斯和芳妮。一路上他们看见了各种类型的人物——糊涂的治安法官,拿穷人开心的地主,一毛不拔的管家,企图不轨的绅士。最后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美满地结合在一起。

《汤姆·琼斯》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小说通过私生子琼斯和乡绅女儿苏菲亚的恋爱故事,歌颂了真挚的爱情,描绘了18世纪英国社会的世俗生活。小说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汤姆斯的出身和他在乡绅奥尔华绥家长大的情形,写他如何受到奥尔华绥的外甥布立菲的诬陷和中伤,被迫离家出走。第二部分写他和苏菲亚一路上所碰到的各种事情,经历了许多惊险的场面,终于到达伦敦。第三部分写汤姆在伦敦又遭布立菲的陷害,苏菲亚也受到家人的责难的情形。几经反复,大家终于识破了布立菲的阴谋,

两人成了婚。

《阿米利亚》据说是菲尔丁反理查生的《帕米拉》的立意而写的。阿米利亚出身富贵人家,却爱上了贫穷的军官布斯上尉。结婚后,由于经济拮据,加上布斯的轻率,阿米利亚的生活并不幸福。后来布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从外地得到了一笔财产,两人才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菲尔丁的小说具有较为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农村和城市下中层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和各种社会矛盾,其语言朴素,富有幽默,带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可读性较强。从结构上说,作者的参与作用比较明显,有些章节里常常会有作者自己的评论,类似中国的章回小说。

8.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他是英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词源学家,曾编辑《英语词典》,该词典为历史上英语语言的第一部词典。此外还编过带有注释的莎士比亚戏剧集。

英国文学在启蒙运动前后无疑占有重要地位,但在这段时间里其他几个主要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家。法国的几位启蒙思想家也写过些文学作品,有的是散文,有的是小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悲剧和哲理小说,狄德罗的戏剧理论著作和身后出版的小说;卢梭的长篇小说《新爱洛绮斯》以及《爱弥尔》、《忏悔录》等散文名篇乃至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都可以说是这段时期的文学名作。德国的歌德、莱辛将在下一章里作介绍。意大利在这一时期先后处于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统治下,文学上的成就不很引人注目,但出了位剧作家,叫做卡尔洛·哥尔多尼,写过些喜剧。俄国这时候出了个罗蒙诺索夫。他是个多面手,既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又进行语言

研究,还搞些文学创作,主要是写些诗歌。就整体而言这些国家都还比不上英国。

四、启蒙运动时期的艺术

这一时期的音乐、美术和建筑都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涌现了一批重要的艺术家,传下来许多不朽的名作。

音乐

近代西方音乐是16世纪末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开始的,那里是歌剧的故乡。起初是一些音乐爱好者聚集在一道,探索一种新的途径把诗歌朗诵和音乐结合起来,试图仿照古代戏剧(他们以为希腊戏剧是唱的),于是就有了朗诵式歌唱。经过一段时间的演练,到了1607年一部比较像样的歌剧——蒙特威尔第的《奥尔夫斯》——正式推出。1632年建造了第一座华丽的歌剧院,不过那时主要是为贵族服务的,后来威尼斯干脆造了座公共歌剧院,受到中下层人民的欢迎。1642年后歌剧的题材不再限于神话,而扩大到历史。17世纪歌剧传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里,如维也纳、布鲁塞尔和华沙。维也纳宫廷实际上已经成为歌剧演出中心。由于歌剧需要乐队伴奏,器乐也很快发展起来,风琴、提琴、钢琴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乐器,风琴音乐、古琴音乐、器乐合奏逐渐成为一种人们所喜闻乐见的音乐活动。接着“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也随之诞生。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音乐表演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音乐家也随之出现。下面介绍其中几位。

1.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巴赫出身于德国的一个音乐世家,其祖父和叔父都是当时有

名的音乐家。他少年时代从叔父学习音乐,后加入当地教堂的一个唱诗班并开始学习管风琴。18岁时去魏玛宫廷担任乐队小提琴手,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后来他长期在多家乐队任职和演出,名声越来越大。在演奏的同时他开始谱曲,一生作品浩如烟云。晚年视力急剧衰退,去世前几个月失明。

他的作品受到教堂音乐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音乐风格影响,他才气横溢,乐感强烈,作品热情奔放,蕴涵丰富,优美动听,尤其是在管风琴乐曲上他更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他的音乐把对宗教的信仰和对音乐的热爱融为一体,同时兼顾了宗教和世俗两方面对音乐的需求,被人称为“德国音乐之父”。但也有人认为他的音乐过于雕琢,风格有些守旧。

2. 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 1685—1759)

德裔英籍音乐家,其父是个外科医生。他自幼喜欢音乐,并显示出这方面的天分。虽然父亲坚决反对,他还是终止了他的大学学业去汉堡的一家歌剧院担任了一名小提琴手,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他的才华首先表现在歌剧上面,20岁时他创作的两部歌剧就首次公演。后来他专门去了意大利观摩歌剧以及其他意大利风格的音乐演出,并在威尼斯创作出歌剧《阿格里皮娜》,演出后获得成功。后来他又创作了清唱剧、室内奏鸣曲、合唱曲等多种音乐形式的作品,名声鹤起,受到英国女王的赏识。从1712年访问伦敦后他就一直住在那里,再也没有回德国。他的作品融合了意大利的器乐风格,英国的合唱传统和德国的对位特色于一体,形象丰富,音符严谨,乐色和谐,光彩照人,慷慨激昂,节奏强烈,常能使听众陶醉其中,表现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奋发向上的一种情绪。但是由于他谱曲既多又快,难免有敷衍草率之嫌,在感情表达上面有时显得肤浅。

3.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 (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

奥地利作曲家 ,出身贫寒 ,因嗓音甜美 ,8 岁时便被维也纳的一所大教堂的唱诗班吸收为成员。以后一直从事音乐工作。从 1761 年起开始为奥地利尼科劳斯亲王作曲 ,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府中度过。亲王去世后到英国访问 ,在那里创作的歌剧和交响乐及其他作品深受伦敦音乐界和听众的欢迎 ,好评如潮 ,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音乐博士。后来他又写了不少弥撒曲和交响乐曲。晚年生活比较安逸 ,作品不是很多。

海顿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交响乐上面 ,被称为“ 交响乐之父 ”。他的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以其结构紧密、乐色和润、节奏匀称、自然而富有活力、乐观向上而广为人知。他把意大利和斯拉夫的风格同德意志民族的传统结合在一道 ,呈现出比较浓厚的民间音乐特色。这些特色为古典音乐奠定了基础 ,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但是他的钢琴协奏曲相对于交响乐而言不很突出 ,缺少一种始终如一的感染力。

4.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 1756—1791)

奥地利作曲家。父亲是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在父亲的鼓励 and 帮助下 ,莫扎特 6 岁就在慕尼黑和维也纳举办钢琴独奏会 ,7 岁由他父亲带领 ,和姐姐一道开始长途巡回演出。三年后回到家乡已经写成几部交响乐曲和 30 多首其他作品。他成年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不得不靠教授钢琴和举办音乐会来谋生 ,终生贫困。尽管如此 ,他还是写了大量的钢琴协奏曲、交响乐、歌剧、奏鸣曲、室内乐、弥撒曲以及其他的乐曲 ,达 625 部之多。他的死亡来得有些突然。当时他在一个贵族的要求下替他捉刀写一首安魂曲 ,还没写完就溘然逝世。

莫扎特素有神童之称。他不仅悟性极好、富有想象力和灵感,而且善于吸收欧洲各国作曲家的特长,精通各种音乐体裁。他习惯先在内心里构思一部作品,完全考虑成熟以后再写出来。有的作品甚至在演出之前一两天才拿出来,如《唐璜》是公演前两个晚上才完成的。他的作品融合了他的前辈和同辈音乐家的风格,但这些风格已经成为他的风格的一部分,无论在作品的布局上,戏剧的意识上,音调的处理上,他都自成一家。他在每种体裁上几乎都尝试过,而且每种体裁都有杰作问世。他的钢琴协奏曲似乎无人能够超越,音调和谐,乐感柔和。他的交响乐富于变化,时而明朗欢娱,时而激昂动情,时而壮丽宏伟而振奋人心。他的小夜曲和圆舞曲如行云流水,令人陶醉,他的歌剧音乐朴素而感人,内容和形式都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美术

文艺复兴以后出现了巴洛克、古典主义及洛可可等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艺术流派,在音乐、美术和建筑上面都有所表现,尤其体现在后面两种艺术形式上。

1. 巴洛克艺术

巴洛克(baroque)的原意是歪曲和怪诞的意思,是那些古典主义者对他们不很喜欢的前辈艺术的一个称呼,后来有人就借此名泛指17—18世纪初的欧洲各国艺术,其含蕴带有激情,注重空间感,富于变化。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Caravaggio,约1573—1610),意大利的贝尼尼(Gianni Lorenzo Bernini,1598—1680),弗兰德尔的鲁本斯(Peter Rubens,1577—1640)和西班牙的魏拉斯开茨(Diego Velazquez,1599—1660)。

卡拉瓦乔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曾在马耳他岛坐过牢,后来越狱

逃跑又被抓住,最终贫病交加,30多岁就饿死在异国他乡。他的画最大的特点是无情的真实,表现现实不带任何掩饰。他画的基督、圣母和圣徒都以街上的穷人和小贩卖模特儿,其现实感和真实感超过了和他同代的任何画家,却因此而不能见容于那个社会。他的一幅《死去的圣母》就遭到了教堂的拒绝,说是画得太粗野了。

和卡拉瓦乔比较起来,贝尼尼要走运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他能够想方设法获得雇主的欢心。他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既能从事雕刻,也能搭建房屋,还能把雕刻和建筑合为一体,将绘画的技巧放进雕刻之中,因此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而被人称为“巴洛克”——一种奇形怪状的艺术。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为罗马维多利亚教堂所创作的《圣苔列莎的幻觉》群像。圣苔列莎为一西班牙的女修士,在日记里记载她被小天使的金箭射到心窝时既疼痛又甜蜜的感觉。画面上她半倚半卧在云朵上面,小天使正高高举起金箭,呈现出真假难辨的景象。故事本身原是称赞灵魂“神圣交感”的,可是处理得又像是一种尘世肉体之爱。这正是巴洛克艺术的与众不同之处。

鲁本斯的成就主要在绘画上面。鲁本斯幼时丧父,曾给一位伯爵夫人当过童仆,从小熟知宫廷礼节,并展露出语言和绘画方面的天分。他后来凭着自己的绘画得到弗兰德尔大公的赏识,被赐以贵族头衔,作为外交使臣经常出入欧洲各国宫廷。他的组画《玛丽·美蒂奇的一生》是他的代表作。玛丽·美蒂奇原是意大利贵族,后来出嫁给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这组由21幅画组成的大型组画显示了画家娴熟的技巧,旺盛的生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也体现了巴洛克特征。其中的《亨利四世接受玛丽的画像》构图复杂,人物众多。亨利身披盔甲,满意地注视着小天使捧着的玛丽画像。天使的上方是神王和神后,他身后站着的是智慧和胜利女神,前面是两个小爱神。加上禽鸟、云彩和闪亮的金属、飞动的丝绸带,建构

了一个复杂的 S 图形,完全不同于构图简单的古典主义艺术。

魏拉斯开茨是西班牙的一个宫廷画师,除了给王公贵族绘画以外,他没有忘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的《纺纱女》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他的画在绘画的真实性、光线的明暗强弱以及构图格式上,仍然带有些巴洛克的特点,但似乎更加接近现实主义的风格。

2. 洛可可艺术

洛可可(rococo)原意为螺壳,用来表示盛行于 18 世纪法国的一种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刻意追求一种曲线美,模仿螺壳或者树叶的形状,通常涉及到建筑和装潢,尤其是在家具、挂毯、吊灯这样一些家用摆设的图案上面。但是后来这种风格也指享乐阶级,尤其是法国皇室和贵族当中盛行的讲究细巧、追求感官享受、以及典雅、奢侈、豪华和糜烂生活方式的风气,进而指表现这种生活方式的艺术。这种风格后来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从法国传到了英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这个画派的代表画家主要有华托、布歇和弗拉戈拉尔。

华托(Antoine Watteau, 1684—1721)出身贫寒,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才进入了上层社会。他的画色彩鲜艳漂亮,一些细节,例如人的神态和装饰物表现得非常精致独到,特别是女性形象鲜活丰满。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画虽然活泼,富有个性,却没有庸俗的东西。代表作有《发舟西苔岛(爱情岛)》和《任性的女人》。

布歇(Francois Boucher, 1703—1770)原来只是宫廷里的一个画匠,后来他的画得到了路易十五情妇蓬巴杜夫人的赏识,当上了宫廷的首席画家。他善于察言观色,深知王公贵族们的嗜好。他专门以希腊罗马神话为题材,画了许多裸身谈爱的场面,代表作有《猎神之浴》《淋浴的狄安娜》等。

洛可可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弗拉戈纳尔。他更善于捕捉贵

族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但晚年画风有变,代之以各种生活小景。他在技巧上面更具有表现力,也更带有抒情色彩。

3. 荷兰画派

17世纪以来,荷兰画派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荷兰人生活简朴,工作勤奋。他们一般不愿去购买大型绘画,更加需要小型精致的油画,所以小画比较多。另外荷兰画派中画风景的也不少。当时的一个画风景的高手是霍贝玛,他的《林阴道》构思极为出色,画的透视焦点掌握得非常准确,远近距离都恰到好处。

荷兰画派的另一特色是静物画。他们善于表现各种物质特性,丝绒、金属、玻璃等物质经过他们的处理就有一种逼真感,例如希达《静物图》里的玻璃杯具有的透明度,酒具有的流动感,银器具有的亮度都表现得非常真实。此外,风俗画也是荷兰画派的特色。农民的生活和市民的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他们的画作里得到了表现。

荷兰最有名气的画家当推伦勃朗(Van Rijn Rembrandt, 1606—1669)。他一生画笔不辍,留有大量画作在世,可是却一辈子潦倒穷困。他善于运用色彩,尤其善用红色,把朱砂般的沉着红色配以金黄和深褐,形成一种暖色,再插入青、蓝、绿等色,他的画因此有一种高贵感,令人赏心悦目。他还善用光线,通过明暗的对比来把握虚实,根据艺术的需要突出主题。他多才多艺,善画各种题材:宗教、神话、肖像、风景乃至动物。无论他画什么,都有独到的成就,在铜版画方面尤为突出。《基督向穷人说教》是他铜版画的名作之一。这幅画里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基督被画成了犹太人,他的圣徒穿上了东方人的服装。这在绘画史上是罕见的,表明伦勃朗面向历史真实的勇气。另外他一生曾经多次画过自画像,从这些像里可以看出他的悲哀,特别是在最后一幅里,那种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形象充分表现了他内心的悲伤和愤慨。

4. 英国画派

英国人在 18 世纪之前还没有自己的画派。虽然英国的绘画实力早已在欧洲受到称道,但它的艺术水平一时间似乎还难以对抗大陆国家,尤其是法国。那时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领域,名人总是来自欧洲大陆国家。到了 18 世纪,这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造成这种变化的英国人名叫贺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他在思想上受到了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关心社会,具有民主意识,在版画和油画上面都有建树。他还是个美术理论家,著有《美的分析》一书。

成就更大些的是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1792)。他曾担任过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后来发表过 15 篇《讲话》,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学院艺术训练的宗旨和要求,对古典艺术推崇备至,甚至有些走极端。他声称“不要过分逼真地摹写自然,在绘画艺术里有较之所谓模仿自然更为高贵的东西”。公开把古典置于自然之上,使两者对立起来。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当中,雷诺兹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原则,否则他大概无法画出他的那些肖像画来了。和雷诺兹同时代的画家庚斯博罗也擅长肖像画,而且更富于创新精神,在色彩运用上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和雷诺兹也是艺术上的竞争对手,斗了一辈子。除了他们以外,学院派的画家中间还出了不少人物画、风俗画和历史画的高手。例如奥恰德森的历史画《“贝列洛风号”上的拿破仑》和人物画《琴声》、胡伯特·荷科默的《罢工》。以技巧著称的约翰·沙尔金更善于捕捉人物表情,笔法流畅,克服了前人过于纤柔和繁琐的倾向,用笔简洁轻快,虚实结合,颇能传神。

总的来说,学院派代表官方艺术,在思想上和艺术方法上都显得保守、陈旧。所以 18 世纪 50 年代以后遭到了一些年轻人的反对,先是在英国,以后在法国,一些新的画派开始出现,如拉菲尔前

派、流动画派、写实主义等。

五、启蒙运动的意义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思想运动,启蒙运动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神学统治发起了强烈的攻击和深刻的批判。虽然在18世纪以前和文艺复兴时期也有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的神学思想表示过怀疑,发出过挑战,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无法同启蒙运动相比。可以说经过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前后几十年的努力,社会平等、人权自由和无神论的思想吹遍了法国和欧洲大地,极大地动摇了封建专制的根基,动摇了神学思想在人们心灵中的地位。

其次,它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提供了理论与思想准备。虽然绝大多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没有活到1789年巴士底狱革命爆发的那一天,但无疑他们所阐述的思想和革命原则在法国革命酝酿过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启蒙运动所表现的核心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抗,就是理性主义对神权思想的挑战,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旗帜。这些正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为法国革命所奉献的最好礼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启蒙运动的女思想和理论的准备,法国革命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在文学艺术方面,启蒙运动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文艺复兴运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文艺思想和创作手法上面有了新的突破。例如现实主义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音乐中的古典主义开始形成,绘画和建筑当中的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传遍了欧洲大陆。这些成就的取得表明启蒙运动已经为欧洲文化艺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随后不久出现的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而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是通向现代派运动的桥梁。

第八章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18—19 世纪不仅是资产阶级在西方各国陆续走上政治舞台，从封建贵族手里接管政治权力的重要时期，也是西方文化经历重要变化的时期。这时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大都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级。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也逐步摆脱了封建专制和神学思想的桎梏，获得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的才华得到了空前未有的表现机会，同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种新的形势面前，他们或者继承发展了原有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原则和方法，或者创建了新的创作思想和模式，如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艺术的进步，使得文学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为 20 世纪文学艺术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浪漫主义

1. 浪漫主义的产生

文艺复兴运动当中表现了一种对古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崇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股思潮影响了艺术家和文学家，尤其是诗人们的创作思想。他们以古典主义的秩序、和谐、典雅、庄重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

品。法国古典主义作家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都属于这个流派。但是即使在古典主义鼎盛的时候,也有人指出,那时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并不比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品差。他们为此和古典主义者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浪漫主义出现时这个问题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浪漫主义最早是从卢梭开始的。虽然卢梭也和启蒙运动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崇尚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赞赏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民主意识,对法国的波旁王朝憎恨万分,但他在感情方面却比百科全书派的那些理性主义者更加接近真实生活,更主张崇尚乃至回归大自然。他认为,人的自然感情指向正确的方向,而理性则使人类误入歧途。

虽然他在去世前好几年就已经离群索居,头脑已不是很清楚,他的思想还是为他赢得了一大批热心的追随者。一些有名的哲学家,诸如休谟、康德、赫尔德文、托马斯、潘恩等人将他当成他们的导师,而歌德、席勒、圣·皮埃尔、爱多布昂等作家和诗人则把他运用的文体和表现的主题当成他们模仿的对象。甚至还有个别荒唐的人根据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牧羊女,跑到森林里过起中世纪的隐居乃至原始生活来。在他的影响下,浪漫主义首先在德国产生,这就是著名的狂飙运动(1770年)。

2. 浪漫主义的特点

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文艺运动,是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欧洲形成和发展的。它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和艺术,最主要的有如下一些特点:

1) 个人主义

浪漫主义把个人利益当成是天下万物的主要目标。强调一个社会应当允许绝对的个人自由、人和人之间应当绝对的平等和平

均,甚至认为人的个性乃至怪癖是天才的一种表现。

2) 感情主义

浪漫主义非常重视人的感情,而不是理性作用。他们认为,人生来是美好的,只是社会不好的影响才使人堕落,让他窒息。古典主义认为表现情感是“低级庸俗”,因而要约束人的内心冲动这一自然情感。但浪漫主义者认为不应逃避情感,而应表现情感,认为这是人的独立性和优越感的表现。

3) 崇尚自然

浪漫主义者认为一切自然状态、自然形态都是美好与善良的象征,无论它们是在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上,还是在美丽的风景里,凡是自然就值得称道。他们崇尚所谓“高贵的野蛮人”,崇尚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人,认为他们体现了人性中最英勇的特性。由于这种对自然优越性的认识,他们创造出了超越绝伦的绘画、诗歌和音乐,提出了深刻的哲学思想。

4) 对异国情调的崇拜

由于浪漫主义者对自然崇拜,加上他们富于幻想,他们很多人喜欢寻求异国生活,歌颂异国风光和各种各样的外国人。他们经常沉浸在一种神秘和超自然的氛围里,甚至在饮食、服饰、娱乐等方面还有些病态的怪僻。另外他们还崇尚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历史和过去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以此来对抗古典主义对希腊、罗马文化的过度赞誉。

5) 民族主义的倾向

在中世纪的欧洲政治里,民族主义占有中心地位。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浪漫主义者在他们创作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当中大力

拓展民族主义这个中心议题。他们把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放进了交响乐里,而他们写的戏剧和歌剧里常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诗人和哲学家们对于那些饱受外国侵略者压迫、丧失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和民族痛哭流涕。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被他们当成个人自由的必要前提。他们中的许多人怀着浪漫的理想,满腔热血地告别祖国,奔赴希腊、意大利甚至美国,为这些国家的独立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例如英国诗人拜伦到希腊参加反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战斗,牺牲在战场上。再如英国青年潘恩从祖国长途跋涉去美国参加独立战争,后来又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思想的鼓舞,跑到法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6) 理想的破灭

浪漫主义者的情绪一般起伏都比较大。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想兴奋、激动,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可以因为暂时的不顺利而变得心灰意懒,甚至完全丧失信心和绝望。法国大革命爆发时,许多浪漫主义者都相信人的启蒙,认为革命很快就会取得成功。但是当革命遇到挫折而进入恐怖时期,或者当拿破仑遭到一系列失败,最终被囚禁起来的时候,这些人便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沮丧,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他们觉得人类所受到的腐朽影响太深,无法回到从前的理性主义生存方式上去,除了经历更多的灾难和不幸,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在这种悲观消极的思想驱使下,这些年轻的浪漫主义者,或者逃到国外,或者离群索居,个别的甚至自杀身亡。

3. 浪漫主义流派和表现

浪漫主义的源头虽然是在法国,但这个运动的实质性成果却分别是在德国和英国取得的。在德国是著名的狂飙运动,形成了浪漫主义音乐和哲学。在英国则是名噪一时的浪漫主义诗歌。

1) 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和音乐

① 基本情况

18 世纪的后半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 the Great,1712—1786)当政。这位国王足智多谋,政绩卓著。德国那时虽然还没有统一,但已从战争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变得比较太平。腓特烈当政时期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情(1)组建强大的军队击败了奥地利,大大提高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2)进行了农业和经济改革(3)改善了教育制度,增强了普鲁士的实力(4)大力鼓励科学艺术的发展。他本人就非常喜欢文学和艺术,他的宫廷在当时成了一个豪华的沙龙。当时欧洲一些主要的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经常是他的座上客。伏尔泰就曾经在他的宫里住过 3 年时间。他们大多数是法国人,他们的到来使得德国人更加崇拜法国的哲学和艺术,也促进了德国人发展自己民族艺术的欲望。这样在腓特烈大帝的提倡和鼓励下,德国的文学艺术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

当然除了法国的影响之外,德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们还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不少帮助。从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一些德国诗人就开始模仿蒲柏、汤姆逊等人的诗作,并将这些作品译成了德语。与此同时,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塞缪尔·理查逊的《帕米拉》以及《克拉丽莎·哈洛》也很受欢迎,书摊上到处是仿制它们的劣作。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介绍到德国稍微晚一些,但一传到德国就引起了轰动效应。

英国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可以从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的创作生涯里见一斑。莱辛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和评论家。他早年就意识到德国戏剧的发展不应按照法国古典主义的模式,而应走英国的喜剧之路。他创作的早期戏剧《萨拉·萨姆逊小姐》就是模仿英国戏剧家乔治·李洛的《伦敦商人》所

写的一部日常生活剧,演后深受德国人的欢迎。这样法国的贵族悲剧就逐渐受到了冷落,而源于英国模式的生活题材戏剧在德国则慢慢占据了重要地位。

② 德国的狂飙运动

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最早出现在1770年的德国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向一群年轻诗人(包括歌德)宣传莎士比亚的伟大人文精神、卢梭的开明社会思想以及尚待开发的德国民间文学。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运动就发动起来。很短的时间里大量的德国民歌集就开始出现,许多诗人仿照民歌文体进行创作。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关于一般民众生活的感伤小说或戏剧。卢梭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感伤主义情调大大激发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使得他们的伤感情绪一下迸发出来。这些书中最著名的是歌德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当时大大倾倒许多德国人和欧洲人。整整一代青年人都去模仿维特服饰,仿照他的痛苦感情,更有甚者,还有人去自杀,以寻求最后的解脱。

歌德那时候和许多浪漫主义者一样很喜欢外出旅游,特别喜欢观看古代文明的遗迹,如罗马的椭圆形竞技场或是雅典的巴台农神殿,独自在那里徘徊沉思。他的这些旅行不仅让他写出了《伊菲格涅亚在陶斯》和《托夸多·塔索》这样的作品,还为后来的《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的部分章节提供了灵感。德国浪漫主义的新高峰出现在19世纪的初叶。当时奥古斯特·施雷格尔兄弟俩创办了《雅典娜神庙》杂志,通过介绍莎士比亚戏剧和评论各种文学作品,让文学走进了一般读者中间,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联系的纽带。杂志办得很成功,许多作家和有文化的人将它看成是一种文学“圣经”。

③ 文学上的成就

歌词在德国文学创作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德国的歌词简朴，富有乐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抒情诗。它最早起源于《青年羊角》上的《民歌集》，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很多有名的诗人都参加了歌词的编写。歌德、海涅、默里克、沙米索等作家都写了感情强烈、词意简练而又清晰的歌词，经过舒伯特、舒曼等人的谱曲，成为传颂一时的歌曲。

和歌曲紧密相连的另一种文学形式是民间故事，最有名的是 J·L·提刻的作品和格林兄弟写的童话，此外还有各种民间传说，主要是哥特传奇。它的基本成分有些荒诞不经，多悬念，并富于想像力，常常是耸人听闻。当然文学中成就最大的恐怕还是戏剧，席勒的《奥尔良姑娘》和《威廉·退尔》、歌德的《浮士德》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政治和个人、理想与传说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堪称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性作品。下面着重介绍几位德国的浪漫主义重要作家。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是德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家之一。他出生在法兰克福，父亲是个法学博士，母亲则是法兰克福市长的女儿。童年时代，母亲经常给他讲故事。她的幽默谈吐和富于幻想的声调对歌德的影响很大。中学毕业后，他根据父亲的意愿上了来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后因病而改上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学业。读书时受到狂飙运动的影响，形成了反封建、要求民族发展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从那以后他就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歌德早期的作品包括一些诗歌和喜剧，表达了他对封建统治黑暗的不满。他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个爱情故事，带有强烈的感伤主义色彩，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共鸣，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以后他应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都的邀请在那里担任了部长和枢密官长达 10 年。他很想在这个位子上实现自己的抱负，对魏玛的财政、经济和文化进行一些改革。遗憾的是他遇到

了很大的阻力,美好的理想难以变成现实。他因此变得非常苦闷。后来他摆脱了行政工作,从事写作,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写出了不少剧本和小说。除了文学创作以外,他还写了些自传以及动植物的学术著作。他最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诗剧《浮士德》。其中《浮士德》是他花了将近60年时间完成的不朽之作,共计两部。

《浮士德》根据中世纪民间故事编写,表现了浮士德追求真理、进步和科学的一生,反映了诗人的远大理想,也显示了启蒙主义思想有关人的信念、有关理性和尊严以及善良战胜邪恶、进步战胜反动这样一些观念。在这部诗剧当中,浮士德一共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悲剧,克服了内在和外在的矛盾,终于找到了“智慧的最后断案”。这五个阶段分别是: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第一部)、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第二部)。

第一阶段的知识悲剧里,浮士德在书斋里上下求索,探讨了各个学科里的知识。但是学得越多越是觉得糊涂,对于人生中的许多问题他还是弄不明白,既不能认识,又不能享受,求生不能,求死未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苦闷。第二阶段爱情悲剧里,魔鬼梅非斯特来找他,说是可以陪他去小世界和大世界享受人生。浮士德听了他的话,和魔鬼签订契约后离开了书房。接着浮士德被带到了一个女巫那里,喝了魔汤,恢复了青春,从一个小市民出身的姑娘那里获得了爱情。但结果却很悲惨:岳母被毒死,儿子被溺死,妻兄被杀死,妻子变疯,关进监牢被判了死刑。浮士德有了爱情的体验,但内心遭受到了极大的谴责和震撼。在政治悲剧和美的悲剧里,他又被魔鬼带到了宫廷里面,看到了古希腊美女海伦。又在魔鬼的帮助下,通过“人造人”下了地狱,找到海伦并和她结了婚,生下个儿子。但很快代表浪漫主义精神的儿子夭折了,海伦跟着也消失了。最后在事业悲剧里,浮士德想带领人民改造自然,向大海要地,此时他已经一百岁,而且双目失明,再也干不动了,终于倒在

地上,离开了这个世界。

《浮士德》是一部欧洲资产阶级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思想文化发展史。它的悲剧意义在于它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封建社会及王公贵族之间的不可调和矛盾。浮士德代表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努力向上,积极进取,特别是在改造自然方面显示了这种精神。但他在社会改革方面却未能做出什么事情。这个人物掺和了歌德本人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同时从象征意义上说,也暴露了当时还未掌权的资产阶级弱点。在艺术结构上面,《浮士德》第一部比较紧凑,第二部则内容过于庞杂,一些地方显得艰深难懂。其次该剧语言风格变化多端,或而严肃,或而轻松,或而明朗,或而隐晦。虽然它和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带有古典主义的痕迹,但从整体上来看,歌德基本上采用了浪漫主义手法。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作家。他和歌德一样,年轻时积极参加狂飙运动,后来则转向了古典主义。但他的“古典”主要是指提倡一种宽容和妥协的精神来解决情感和理智,自由和法则,个人和社会的矛盾,而并非完全排除反封建反宗教的内容。实际上他写的东西基本上是积极健康的,艺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例如他的《奥里昂姑娘》被他自己称为“浪漫的悲剧”,描写约翰娜(贞德)在抓住了敌人将领时的一瞬间竟然产生了爱慕之心而放过了他,表现了所谓的浪漫之情和人性,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就没有多少古典主义的理性。另一部戏《威廉·退尔》描述了瑞士人反抗奥地利统治者的故事。威廉·退尔是个著名射手,为了逃脱奥地利人的追捕,他射杀了奥地利总督,于是瑞士人纷纷起义向他表示声援。统治者终于失败,显示了瑞士人民不畏强暴、抗击外族压迫的大无畏精神。这也是一部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更为积极的浪漫主义者是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他的代表作是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首诗

将叙事和抒情结合在一道,中间穿插着民间的传说、典故和比喻、幻想和憧憬,充满着激情和信念,扬起美好的理想风帆,深刻地揭示和嘲弄了普鲁士的黑暗统治,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和教会的愚昧无知,抨击了封建社会的落后和丑恶。写这首诗时他正好才结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些了解,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所以和歌德与席勒比较,他的作品不仅更加富于激情,对穷人和劳动群众更有同情心,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然而并不关注理性的作用,更不在乎参照什么标准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虽然他的诗歌常常表现出忧伤和悲哀,也流露出一些动摇和徘徊的情绪,但他并不逃避现实,也不回避矛盾。

德国浪漫主义作为一个运动正式在文坛上的创立是在18世纪末。主要标志是文学杂志《雅典女神殿》的出刊。代表人物是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他曾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浪漫主义做了界定:“浪漫文艺是一种前进的综合文艺。它的职责不仅是把文艺中一切划分开的种类又联合起来,使文艺和哲学与辩论术相接触。……使诗成为生动的、有社会性的、使生活和社会成为诗的……。浪漫主义的诗还在演变中,其实这是它的本质。……只有它是无限的,……被认为是它的第一条法则的是诗人的为所欲为,不能忍受任何约束的法则。”^① 他的小说《路琴德》没有任何情节,结构松散,拼凑着一些对话、信件、文章片断。两个人物尤利乌斯和路琴德一直在对抗着社会,生活在性爱自由和官能享受当中,沉浸在一种幻觉和欲望里,以为这就是浪漫爱情。他的兄长奥古斯特·史雷格尔是另一个代表人物,曾经写过两本书来宣扬浪漫主义。一本是《论美的文学和艺术》,另一本是《论戏剧艺术和文学》,从理论上划分了古典和

^① 《欧洲文学史》(下),33页,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浪漫的界限。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翻译上面。他要求翻译保持原文精神,并身体力行,在莎士比亚著作的翻译过程当中做到了这一点。其他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家还有诺瓦利斯、鲁德维希·蒂克、鲁特维希·约·阿尔尼姆、克雷门斯·布伦塔诺等人。上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些消极的浪漫主义者。

④ 德国的浪漫主义音乐

文学以外浪漫主义在哲学和艺术领域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哲学方面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将另章论述,这里就不说了。这里介绍一下德国人在音乐上面的贡献。18世纪古典主义在音乐当中还占统治地位。它强调各种艺术要素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能过多地突出个人因素,要服从曲式原则,要通过多样性来表现统一性。这种音乐多少限制了个性的发展。比较起来,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音乐为创作者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受到更多人的欢迎。一批才华出众、流芳百世的作曲家在這一时期露出头角。从1803年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开始,浪漫主义音乐就以其截然不同的风格区别于海顿和莫扎特的古典主义作品,而形成独特的个人主义特征。贝多芬后期所写的弦乐重奏曲和舒伯特优雅的歌曲,在表现方式上完全不同于18世纪的维也纳古典主义作曲家们。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舒曼和门德尔松的作品,或许这二人的交响乐和歌曲没有贝多芬的深刻,但同样令人着迷。其他的一些音乐大师,诸如勃拉姆斯·拜雷特、比塞特等都留下了不朽的传世之作,对其他国家的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19世纪所有的西方音乐都深深地扎根于德国的土壤。有人说浪漫主义音乐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鲁德维希·范·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 贝多芬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但过高的期望值、贫困的家境和酗酒的父亲使得他的童年相当不幸。11岁时他就不得不辍学,13岁就进了宫廷乐队开始了漫长的音乐生涯。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30

岁左右就发现了重听。当他意识到耳聋无法治愈时,一度非常悲观,甚至准备自杀。但他还是挺了过来,并以一批不朽之作证明了自己的音乐天分。

和其他的著名音乐家相比,贝多芬作品的数量不一定非常多,可是他的作品几乎每一件都是精品。他的九部交响乐荡气回肠,激动人心;他的钢琴、小提琴协奏曲和奏鸣曲首首感人肺腑,久听不厌。他写的唯一歌剧《菲代里奥》是德国歌剧的压轴之作,成为爱情和自由的象征。他的音乐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影响,讴歌自由、平等、博爱,表现了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者和教会神学思想的斗争中的热情开朗、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他的音乐作品在结构上面更为紧凑,也更具有磅礴的气势,感情效果更加强烈,思想内涵也更加深刻和丰富。无论是他的交响乐和室内乐,还是他的歌剧,都表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色彩,歌颂了自由、平等和爱情这样一些具有高尚情操的人类情感,宣扬了人类美好的思想。

罗伯特·舒曼 (Robert Alexander Schumann, 1810—1856) 舒曼的音乐天赋最早得益于他父亲的赏识和支持,可是在他父亲过早地离开他以后,他母亲却一定要他去学习法律。但他终于还是回到音乐上面来,想要成为一个钢琴演奏家。但是由于他的手指受伤,他不得不把重点放到了作曲上。他创作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钢琴协奏曲和歌曲上面。他的钢琴作品采用了不少新的手法来处理各种不同的音素和它们的连接,表现了多变和无拘束的风格。他的歌曲没有任何情节,是一种主观情绪的宣泄,比较含蓄和细腻。在创作的同时,他还经常撰写音乐评论文章,批评了一些庸俗的音乐倾向,向公众推荐和称颂了一批杰出的音乐家,包括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舒伯特以及一些新人的作品。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 (Felix Mendelssohn, 1809—1847)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银行家,母亲是个

钢琴家,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9岁就开始公开演出。他的作品富有抒情色彩,兼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气质。无论是在他给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所作的序曲里,还是他的《意大利交响曲》里,他都表现了一种精练细巧和带有诗意的特色,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旋律和风格。除此之外,他还创建了莱比锡音乐学院,努力宣传和普及一些音乐大师们的作品,例如他在20岁时举办的巴赫作品演奏会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这位音乐大师的重新认识。

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理查德·瓦格纳由于父亲早逝,他的童年并不幸福。他从小就喜欢上了戏剧和贝多芬的音乐,很早就开始谱曲并参加演出。他的名声主要建立在歌剧上面。他决心创立一种全新概念的戏剧形式,能够容纳歌唱、表演、音乐等诸多项目。为了能将他的设想付诸实践,他非常希望建造一座专门的剧场来演出他的作品,但由于经济问题,这个愿望在他生前一直未能实现。他提出了一整套歌剧理论,包括以下要点:

- a. 传统歌剧题材和歌词形式有缺点,音乐有凌驾戏剧之上的趋势;
- b. 音乐要与歌词相辅相成;
- c. 传奇作为题材比以日常生活为内容的题材更适合于歌剧演出;
- d. 歌词内容不能仅仅易理解,而是要能让观众感受乃至感动,音乐只是起一种辅助作用;
- e. 乐队不仅是伴奏,而应表现人声所不能表现的一切;
- f. 最重要的是交响乐必须前后连贯。

他的这些理论原则体现在他所写的几部歌剧里面,例如《尼伯龙根的指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名歌手》和《帕西发尔》。他在这些歌剧里融合了许多短小而简洁的故事片断,让它们

前后连贯、上下结合,通过不断变化的形式和重复让观众体验到了一种全新歌剧所创造的“无穷尽旋律”的效果。

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除了一些德国音乐家外,还有些欧洲其他国家的音乐家,包括奥地利的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1797—1828),施特劳斯父子(Johann Strauss (jr)& Johann Strauss (sr)),波兰的肖邦(Frederic Francois Chopin,1810—1849),匈牙利的李斯特(Ferencz Liszt,1811—1886)以及俄国的柴可夫斯基(Piotr Ilyich Tchaikovsky,1840—1893)等人。

2) 法国的浪漫主义艺术

艺术领域里法国的德拉克拉瓦为首的浪漫主义绘画以其强烈的色彩、坚实的架构和不拘一格的画风在西方美术史上建立起一种崭新的绘画流派。称得上是第一张浪漫主义绘画的是法国青年画家基理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的《梅杜萨之舟》。此画根据当时一起严重的沉船事故绘制。画面是在倾斜的木筏上挣扎的一群人,凸现了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古典主义的特征。从线条来看,不是古典主义所青睐的水平和垂直线,而是斜线。从光线看,不是古典主义喜欢的柔和与均匀的照射,而是明暗强烈的对比,表现了一种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浪漫主义想像力。在法国画坛上更能表现浪漫主义特性的是德拉克拉瓦。

德拉克洛瓦(Ferdinand Victor Delacroix,1798—1863)的首幅浪漫主义画作受到了《梅杜萨之舟》的影响。这幅题为《但丁的小舟》的油画取材于《神曲》,画的是但丁随维吉尔游地狱的场面,表达了人们在当时形势下所感受到的压抑和苦闷。德拉克洛瓦多才多艺,感情丰富,通音乐,懂文学。他的画作几乎具有浪漫主义的所有特征,例如对历史的缅怀,对自由的呼吁,对异国情调,尤其是对东方风味的追求,表露的对神话、自然和原始社会的情感。代表作有《自由领导人民》和《但丁与维吉尔在地狱里》。他的创作对印

象派和后期印象派均有很大影响。

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家是法国雕塑家吕德(Francois Rude, 1784—1855)。他的代表作《马赛曲》是以1792年法国人民保卫共和国的事迹为题材创作出来的。雕塑的上方是在天上飞翔的胜利女神,下方是参加战斗的勇士们。整个浮雕在风格上和它的外部环境——凯旋门——协调一致,浮雕本身的上方女神形象和下方战士形象在动作、表情、衣着和方向上面都保持了风格上的统一,通过情感的夸张和理想的张扬展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形象。

除了这两个公认的代表人物以外,还有几位和浪漫主义多少有些联系的艺术家的,他们包括杜米埃和柯罗。杜米埃(1808—1879)是个漫画家,主要靠夸张、幻想、象征这些浪漫主义手法来处理各种题材。和现代画比较,他的画是在写实的基础上稍加夸张,但画笔细腻,讽刺的分寸掌握得十分准确。

3) 英国的浪漫主义诗歌

浪漫主义在德国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而在英国则主要是在诗歌领域。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就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虽不能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可称得上是超越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就其政治态度和美学观念而言并不完全相同,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派。积极浪漫主义派通常指拜伦、雪莱和济兹,而消极浪漫主义派则主要指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这些湖畔诗人。

乔治·拜伦(George Byron, 1788—1824)出身于贵族家庭,在剑桥大学念书时就已有诗集出版。早期代表作是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表达了他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对遭受外来侵略的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此同时他也流露出一种孤独和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在他受到统治者和反动势力的猛烈攻击以后变得更加严重,他忍受不了国内压抑的气氛,离开英国去了欧洲大陆。先后去

过瑞士、意大利和希腊。除了不少短诗和剧本外,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长诗《唐璜》的创作上面。该诗一共写了16章,尚未完成。前6章描写了主人公唐璜的恋爱和生活,写他如何不满西班牙国内的封建道德标准逃亡国外,海上遇风暴,后来一人漂流到海岛上,被一海盗女儿搭救并与之相爱的经过。接着描述了他被送到奴隶市场上拍卖进了土耳其的宫廷的经历。中间3章叙述了俄土战争,唐璜在战争当中立了功,成为俄国女皇的宠臣,奉命出使英国。后面6章描写了英国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的生活、环境和处事态度,集中塑造了贵族政客阿孟德维尔和他夫人的形象,揭露了他们伪善的面目。这首诗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反封建、反侵略的激烈情绪,也暴露了他的虚无主义思想。他的诗歌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无论是他的个人主义和激进主义立场,还是诗歌的优美格律都曾极大地鼓舞了不少人。

波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的出身虽然只是一般的乡绅人家,但他和拜伦一样,学生时代就受到启蒙时期思想家的熏陶,形成了他强烈的反封建、反剥削思想。这在他的第一首长诗《麦布女王》里便有了反映。诗歌采用梦幻和寓言的方式描写仙后麦布带领熟睡的少女伊昂珊的灵魂到宇宙观察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在一个大城市里看到了统治者过着糜烂的生活,而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却饱受煎熬。作者通过仙后的言谈指出变革是自然的法则,人民要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制度和宗教迷信。这首诗发表后,统治阶层很不高兴,雪莱也被迫出国,远走他乡。在浪迹天涯的日子里,雪莱又陆续写了长诗《伊斯兰起义》。该诗通过象征手法歌颂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他的代表作是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该剧通过普罗米修斯坚强不屈、不向天神尤皮特投降、最终获得解救的故事,传达了作者对革命前途的信念。另外,雪莱还有许多精彩的诗篇以及未完成的论文《诗辩》。这篇文章阐述了对诗歌功能的看法,强调诗歌应当起到改造社会

的作用。

约翰·济兹(John Keats, 1795—1821)在浪漫派诗人当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他有理想,有追求,可是他不像拜伦,也不像雪莱,没有过多地卷入政治漩涡。他的诗没有多少他们两位的政治激情,而把眼光放在一些具体的事情或是物件上面,观察和琢磨其中的特点,寻找其中的意义,考察其中美的表现,再用象征和其他修辞手法传达出来。这是一种自然的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心灵感受,经得住别人和后代人的推敲,或许这是济兹的诗歌在20世纪步步走高的原由。他的出身比较低微,祖父和父亲都是养马的,而且主要亲人过世都比较早。他写诗完全出于自己的爱好,同时也是对他审视自然以及社会才能的一种补偿和肯定。他在他的写作生涯开始的时候曾经模仿过别人,他的第一部诗集就包括这样的诗。他的长诗《安狄米恩》把希腊神话和自己对理想的追求结合起来,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他写了大量的诗歌,无论是十四行诗还是几首颂诗,都显示了他捕捉美的能力和语言表达的才华。当然他的部分诗歌也流露出一种病态美的唯美主义倾向,也有一种回避现实的思想。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和撒谬尔·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两人曾经是关系密切的朋友,长期住在远离城市的西部湖区,一边写诗,一边讨论些诗歌理论方面的问题,还曾经合作出过一部诗集《抒情歌谣》。尽管后来他们的关系破裂了,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是能够找到不少共同点。例如两人都主张文学不要介入现实生活,盲目赞叹远离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隐居生活。他们的作品都力图表现一种大自然的美和带有神秘色彩的田园和异国风光,美化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华兹华斯的主要作品有《序曲》、《露茜》、《迈克尔》、《旅游》、《彼德·贝尔》、《马车夫》等叙事抒情诗歌。柯勒律治的主要作品包括《古代水手》、《古布拉汗》和《克里斯特贝尔》等一

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诗歌。此外柯勒律治还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的诗歌理论主张诗人应当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应当表现人,表现人的内心情感。这个主张无疑使得他和以后的现代派文学观念关系更为密切了。

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1. 背景

1) 欧洲的政治形势

18 世界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宣布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推动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继法国革命以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民族运动和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19 世纪 20 年代先是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试图推翻法国波旁王朝统治,后来又有意大利烧炭党人组织的起义反对奥地利帝国统治,尽管它们都失败了,却极大地震动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者。接着希腊发生了争取独立的战争。这次战争主要是反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虽然开始的时候由于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加上内部分裂而遭到挫折,但后来土耳其在英、法、俄联军的夹击下被迫在 1827 年承认了希腊的独立。紧接着俄国有十二月党人反对沙皇的起义,30 年代有法国反对波旁王朝复辟的七月革命,英国有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国会改革运动。1848 年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兰都有强烈冲击。接连不断的动荡局势进一步增强了资产阶级在这些国家里的力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封建势力的障碍。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深入进行。无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中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并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开始登上政

治舞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增长,广大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在资本家和剥削阶级政府的双重压迫下过着贫困的生活。

2 欧洲的社会和思想领域概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也从空想阶段发展到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宣告诞生了。其标志为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就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10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根据他对世界各地动植物考察的结果,发表了《物种起源》,提出了有关“适者生存”和“自然选择”的理论,即“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学说。这个学说触动了罗马教会有关上帝创造世界的教义,引起了教会为一方、达尔文主义者为一方的激烈争论。这是达尔文学说产生的第一个轰动效应。

大约在这段时间里,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了他的实证主义学说,主张人类社会开始于神学阶段,经过了形而上学阶段,而达到他所谓的实证阶段。他认为所有科学领域都经历过这三个阶段的演化。他的理论试图调和科学理性和神学信仰之间的矛盾,他坚持认为人的认识从经验开始,知识要经过实际的证明才有真正的价值,这是实证主义的由来。

2. 现实主义文学

19世纪以前西方文人均将亚历士多德的艺术模仿说作为首要的和毋庸置疑的创作原则。就是说,凡是从事诗歌、戏剧、绘画这些艺术创作活动的,理所当然要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原型。就这个意义来说,现实主义手法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写作方法了。

19 世纪的一些作家,例如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勃兰特姐妹,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福楼拜,俄国的屠格涅夫、果戈里、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人,把他们写作的重点放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谴责上面,写出了许多具有强烈震撼意义的作品。可以说他们继承了在他们之前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凸现了它的社会功能,有些评论家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

这些作家尽管差异很大,但他们也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在他们的作品里对社会黑暗势力做了强烈的抨击。抨击的对象或者是封建专制制度,或者是虚伪的教会学校和济贫院,或是贪图虚荣、嫌贫爱富的人,或是有钱的资产阶级,或者是贪财爱物、爱占小便宜者,或是残酷无情的地主老财,或是虚情假意的纨绔子弟,或是明火执仗、专干坏事的土匪强盗。第二个共同点是对贫穷、善良和弱小者的同情。这些人或是孤儿,或是受骗者,或是欠人钱款的穷人,或是陷入圈套的好人,或是一时糊涂、是非不分者,或是感情用事、意志不坚定者。第三,这些作家的批判矛头不仅仅是对书中描写的个别反面人物,而且是指向这些反面人物后面的更为深层次的东西。例如社会制度、剥削阶级及其腐朽思想。

这些作家一般在本国的文坛中具有较高地位,这种倾向虽然在习惯上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但有这种倾向的人不等于他们的思想都是非常进步乃至非常革命的。事实上这些人出自不同的目的对他们所描写的对象持有不同的批评态度。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站在右翼保皇派立场,抱有强烈的复旧情绪,用保守眼光看待社会现实,巴尔扎克就是这类作家的代表。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揭示和批判现实黑暗问题上面还是一致的,他们的作品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值得肯定。

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不少,分布在好几个国家,下面择其主要者分别予以介绍。

1) 法国

司汤达(Marie Henri Beyle Stendhal, 1783—1842), 原名亨利·贝尔, 法国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律师家庭, 从小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 崇拜拿破仑。曾经发表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 强调文学应反映现实, 要为现代人和 社会服务。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重要宣言,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的长篇小说《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名著。写的是普通人家出身的于连·索瑞尔从小野心勃勃、想要出人头地, 后经当地牧师的介绍到市长家里当了家庭教师, 和市长夫人德·瑞那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发现, 被迫离开。后来他去了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 并和他的女儿恋爱, 侯爵准备送给他土地和贵族封号以便门当户对。正在他踌躇满志、得意洋洋的时候, 德·瑞那夫人写信揭发了他的丑事, 导致侯爵取消了这门婚事。于连一怒之下开枪击伤了德·瑞那夫人, 因此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红与黑》表现了贵族和正在得势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以及社会各个阶级同教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描述和揭露了当时贵族的恐慌心理, 虽然没有完全反映出中小资产阶级反贵族、反教会和反复辟的斗争精神, 却勾勒出了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安定情绪。此外, 司汤达还写有多部小说, 例如《帕尔玛修道院》、《吕西安·娄凡》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的一生》。他的小说故事性强, 语言简洁生动, 有一定的心理描写, 很受读者的欢迎。

奥诺瑞·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 早年写过不少神怪小说, 但都没有成功, 后改写历史小说, 推出《朱安党人》, 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稳定和成熟的发展时期。他的代表作是由许多长篇和短篇组成的《人间喜剧》, 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 其中“风俗研究”最为突出, 包括“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

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巴尔扎克在这些小说当中表现了法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种种社会现象，尤其揭露了资产阶级对金钱的贪婪和社会的阴暗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比较有名的小说包括《高利贷者》、《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高老头》是《人间喜剧》当中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叙述了王朝复辟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里如何亲眼目睹面粉商人高老头的遭遇。小说中的高老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二女儿嫁给了银行家。高老头一生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她们，他牺牲了他的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抛弃，在贫困和疾病当中死去。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深刻揭示了法国社会生活，尤其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生活当中的阴暗面，用批判和嘲讽的手法描述了金钱对人性和社会的腐蚀作用。

居斯达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在青年时代曾经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对社会的认识逐渐加深，文风变得现实起来。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包法利夫人》一发表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小说女主人公爱玛年轻时接受贵族学校教育，受到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幻想过浪漫主义的生活。结婚后，不满意丈夫包法利医生的平庸以及庸庸碌碌的社会生活，和他人私通，后又负债累累，终于服毒自尽。小说对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嘲弄不切实际的幻想刻画得入木三分，相当深刻，对后世影响较大。

盖伊·莫伯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深刻的揭露，一生写有300多篇，其中的《羊脂球》、《项链》更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2)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出身贫寒，小时

候因父亲破产曾经进过监狱,对下层社会有深刻的了解。所写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方方面面的腐败和不公,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社会,是批判现实主义在英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作品有《奥里弗·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荒凉山庄》、《双城记》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带有自传性质,通过一个孤儿的遭遇揭露了扼杀人的儿童教育、腐败的司法制度和自私自利的小人。《荒凉山庄》以久悬未决的庄狄斯家族遗产分配案为线索,描写了青年男女理查·卡司东和艾达·克莱亚的遭遇。他们由相爱而秘密结婚。理查一心想继承庄狄斯的遗产,为此陷进了一场无底洞的司法官司,耗尽了钱财,受尽了气,终于过早地丢了性命。另一个和庄狄斯家族有牵连的贵族妇女戴德洛克夫人因为一个私生女,受到阴险的家庭律师要挟和作弄,倒毙在她情人的坟墓跟前。作者在抨击司法制度黑暗的同时,还揭示了英国议会两党之间的争吵,议会选举的腐败。全书人物众多,表现了英国社会里的方方面面:伪善的牧师,刻画了贪婪的高利贷者,招摇撞骗的女慈善家,吃白食的文人。

夏洛蒂·勃朗台(Charlot Brontes, 1816—1855)以《简·爱》而闻名,小说描述了出身下层的妇女如何以自己独立和自尊的个性获得尊严,进而取得自己的地位的。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被誉为19世纪英国最有才气,知识最为渊博的女作家。她在创作初期搞过翻译,当过编辑,35岁以后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她的小说大都以她长期生活过的乡村环境为背景,结合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些重要动向,描述了那里的各种人际关系和事件,语言幽默,富有情趣和想像力。主要作品有《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和《米德尔马其》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以《米德尔马其》最有代表性。该小说以19世纪的一个乡村小镇米德尔马其为背景,主要描述了乡村姑娘多萝西·布卢克的一生理想追求。多萝西为人热情,思想单

纯,崇拜理想中的人物。牧师卡苏本饱读经书,举止高雅,成为多萝西的精神楷模。她不顾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和他结了婚。但卡苏本是个缺少情感和关爱的人,而且嫉妒心很强,怀疑她和年轻的拉狄斯劳有关系。婚后他们并不幸福。卡苏本临终时留下遗嘱,规定如果多萝西和拉狄斯劳结婚,就将失去他留下的所有遗产。尽管如此多萝西还是坚持按照她的理想生活,继续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赢得他人的信任,并最终和拉狄斯劳走到了一起。小说的另一条主线描写了外来的年轻医生利德盖特试图改革当地的医疗制度、克服各种阻挠和困难的故事。

作为一个女作家,艾略特以其细腻的笔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带有一定的人生哲理,进入20世纪以后她的声誉日高。

威廉·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早期写过一些短篇和杂文,成名作《名利场》描写出身低下的蓓基·夏泼不择手段,利用自己的美貌企图打入上层社会的故事。她虽然费尽心机,但上流社会始终因为她的出身和贫寒而阻碍她获得成功,她终于遭受失败。小说对揭露社会的黑暗有一定意义。此外他还著有《潘簪尼斯的历史》、《钮克姆一家》和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等。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是英国继狄更斯之后的又一重要小说家和诗人。他的小说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给普通人,尤其给农民所带去的痛苦和灾难,表现了命运的不公和悲观主义情调。他写的《苔丝》对出身贫困农民家庭的青年女子苔丝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小说带有浓厚的宿命论思想。苔丝还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而到地主德伯家去打工,遭到纨绔子弟亚雷·德伯的奸污而怀身孕,成为一个失身妇女,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和欺辱。孩子死后,苔丝在一家奶场工作时认识了青年大学生安基·克莱并和他相爱。克莱是个牧师的儿子,不顾他家

庭的反对,毅然决定和她结婚。但在新婚之夜苔丝向他讲述她遭亚雷奸污并怀孕的经历之后,克莱却一反常态,不告而别,使得苔丝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无奈之下苔丝只好又去农场打工。此时亚雷又来找她,要求和她同居。苔丝对克莱已不抱任何希望,同意了亚雷的要求。不久克莱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又重新回来找她。苔丝面临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思想准备,把一切的愤怒和仇恨都倾泻到亚雷的身上,将他杀死,和克莱一道逃亡,最终被捕并判死刑。

哈代的小说还包括《无名的裘德》、《绿荫下》、《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等多部。此外他还是个著名诗人,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里出版了7部抒情诗集和1部史诗剧本《君王们》。

3) 美国

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是美国19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以其辛辣的语言、尖刻的讽刺笔调揭露了美国社会的虚伪民主、腐败风气、种族歧视和对穷人的欺压。马克·吐温出身贫苦,幼年丧父,从小在密西西比河一带当过学徒,干过各种活计,后来长期在密西西比河上开船,熟知那一带的民情世故。以后他又当过记者,报道过各种社会新闻。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一生著述甚丰,除小说之外,还写有各种游记和散文。他的小说代表作《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表现了他对语言的创新和独特的风格。

《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主人公汤姆是个聪明活泼,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不喜欢读书,经常逃学。有一次,他和好朋友哈克夜里在外面坟地上,无意当中看到混血儿无赖因均·乔杀了镇里的医生,却把凶器放到了醉汉波特手里。他们在外长久不归,村里人以为他们死了,正在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时,他们突然出现,让大家喜出望外。汤姆戴罪立功,在审判会上揭发了因均·乔的罪行。《哈克

贝利·费恩历险记》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姊妹篇,叙述哈克·费恩和黑奴吉姆一道冒险的故事。哈克的父亲是个醉鬼,不关心儿子的生活,却想把儿子的抚养费骗到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无奈之下哈克只好逃到一个小沙洲上,在那里遇到了逃亡的黑奴吉姆,和他一起开始了冒险生涯。他们在途中遇到了汤姆,目睹和经历了各种惊险场面,最终哈克得知他的醉鬼父亲已经死去,吉姆也从他的主人那里获得了自由。但哈克表示还要继续他的冒险,因为他不愿受到别人的束缚。这部小说采用了大量的口语和俚语,让以前在文学当中没有地位的下层社会的语言汇入到了正统的文学语言里面,使得美国文学摆脱了以往对英国文学的模仿,以一种朝气蓬勃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受到评论家的高度评价,开创了美国文学的新纪元。

欧·亨利(O'Henry, 1862—1910),原名威廉·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以其短篇小说著称。幼年家境贫穷,读书很少,后在一家药店工作,并因经济问题坐过三年牢,因此而增加了不少社会阅历。他的故事大都以纽约为背景,语言幽默而机敏。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冷嘲热讽,对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充满同情,很有人情味。故事情节往往多巧合,结尾则常常出乎人的预料之外。他是个多产作家,其作品深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脍炙人口的佳作包括《麦琪的礼物》、《带家具的房间》、《警察与赞美诗》等。这些笔调辛辣、饱含人生感悟的故事都收集在以下这几部小说集子里《四百万》《西部中心》《整修过的灯》《和蔼的移植者》《城里的声音》,《选择》《命运之路》《旋转》和《完全是买卖》。

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以其对社会的深刻批判闻名,是美国19—20世纪之交期间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早年寄人篱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一个蜚声国内外的小说家。短短一生中写有大量长篇和短篇小说,此外还写了许多游记、报道和政论文章。代表作有长篇小

说《铁蹄》、《马丁·伊登》,短篇小说集《荒野的叫声》。早年受到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思想比较左倾,但后期生活不太检点,作品质量受到影响。

4) 俄国

尼古拉·果戈里(Nicolai Vasilievich Gogol, 1809—1852),乌克兰人。曾在彼得堡大学任教,后因写剧本《钦差大臣》而受到贵族社会的诽谤,到意大利罗马侨居多年。他的《钦差大臣》描述俄国国内地的一个小城里围绕钦差大臣即将到来的消息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错把一个小官当成了大官,结果闹成笑话的故事。他的小说《死魂灵》通过主人公乞乞科夫想要买卖死魂灵发财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俄国农奴制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乞乞科夫是个小官吏,从小受到其父的影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他一直善于投机钻营、巴结上司。但在官场里却仍然不得志,屡遭失败。但他斗志顽强,坚持屡败屡战。后来他发现买卖死魂灵可以发大财于是转行此道。小说思想深刻,讽刺性强。可惜小说第二部写作时由于思想的变化,果戈里已经无法完成原来的主题框架,最终陷入到了极端的矛盾之中,临终前将第二部的稿件全部烧毁,成为文坛的一件憾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 1821—1881)年轻时因对民主革命同情而被捕,在监牢和西伯利亚先后呆过10年时间。所写小说注意从人的深层次意识当中寻找原因,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小说,将爱视为解救社会和个人的唯一途径。代表作是《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对20世纪小说创作的影响很大。《罪与罚》叙述贫困大学生拉斯克尼科夫杀害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来受到良心的谴责,变得痛苦不堪,几乎发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街上遇到醉汉马尔美拉多夫的女儿索尼亚,得知她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竟然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这种为了他

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品德深深地打动了拉斯克尼科夫。于是他毅然去官府自首以便求得新生。小说着重刻画了拉斯克尼科夫的犯罪心理,描写他如何受到“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的影响,表现他如何在超人哲学的影响下,展露出了一种资产阶级的掠夺心理和无政府主义的心态,分析了他的犯罪心理,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对欧洲心理现实主义文学和小说的创作具有广泛的影响。《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写的最后一部小说,描写了地主卡拉马佐夫一家人无耻贪婪的腐朽生活,并通过基督教对他们的感化宣扬了宗教的作用和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此外他还创作了《白痴》、《魔鬼》等长篇小说,表现了他那个社会里各种不同的人物在处理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时所经受的各种压力以及他们的复杂心理活动,构成了他独特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系列。

列夫·托尔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 1828—1910)是19—20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出身贵族,对农奴制度十分不满,但并不赞成使用暴力,而是主张通过道德忏悔和赎罪的方式来改变社会。这种思想在他的小说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无论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都表现了主人公对社会罪恶和腐败的不满,但同时也显示了作者通过道德力量的作用来引导人的煞费苦心。

托尔斯泰的小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贵族和奴隶制度一些丑恶现象的揭露,如他的三部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和《青年》。第二部分则表现了作者对于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前途问题的思考和进一步探索,代表作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

《战争与和平》围绕着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和俄国人的抵抗,通过对战争场面和平和生活的交替描写,展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对俄国社会、政治、经济面貌的勾勒,也有表现家庭生活和具体人的生动画面。全书一共出现了559个人物,

包括皇帝、大臣、将帅、贵族、商人、士兵和农民,场面十分壮观。反映了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的问题。小说一方面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腐败,抨击了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仍然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的生活:舞会仍旧在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勾心斗角。”另外一方面,小说又以赞赏的态度描写了安德列·保尔康斯基和比尔·别祖霍夫这样的勇敢无畏、富有正义感的贵族青年。安德列·保尔康斯基出身名门,但却鄙视贵族阶级的碌碌无为,决心通过个人的奋斗,而不是家庭地位来为自己建立功名。他担任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的副官,忠于职守,英勇作战,最后以身殉职,死在战场上。另一个正面人物彼尔·别祖霍夫为人正派,向往理想的道德生活,却被生活堕落的妻子爱伦折磨得痛苦不堪。他在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感染下,决心在自己的贵族庄园里进行改革。后来他和娜达莎相遇而产生爱情,重新组织了家庭,跟随十二月党人参加秘密团体活动,走上了反抗沙皇的道路。

《安娜·卡列尼娜》安排了两条平行的叙述线索。一条是贵族妇女安娜的爱情悲剧,另一条是乡村地主列文如何取得爱情和事业成功的故事。安娜出身贵族,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龄大很多的大官僚卡列宁,夫妻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和谐。贵族青年渥伦斯基这时闯入了她的生活。在他的纠缠下,安娜背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开始和他同居,因此而遭到贵族社会的谴责。她内心里因此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后来渥伦斯基又和其他女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安娜无法忍受这些屈辱,终于卧轨自杀。列文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地主,憎恨城市文明,看不起城市资产者。与此同时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国农奴制度行将崩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出现的事实。为了挽救封建贵族制度,他在自己的庄园里进行改革,试图通过局部的让步,吸收部分农民参加管理改革来调动农民积极性,从而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但他并未取得成功,终于皈依

宗教,求得精神上的平静。列文的思想 and 经历同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和经历非常相似,是托尔斯泰鼓吹的非暴力主义和宗教忏悔思想的表现。

托尔斯泰的宗教忏悔思想在《复活》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小说描写了贵族聂赫留朵夫一次作为陪审团成员参加审判一名妓女时,发现她竟然是他年轻时诱奸的农奴少女玛斯洛娃,因此而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决定尽自己所能,为她赎罪。他先是为她到处奔走,替她申诉,申诉失败以后又陪她去西北利亚流放地。他的行为深深打动了玛斯洛娃,使她重新产生了对他的爱情。但是为了不影响他的名誉和地位,她还是和一个同她一道的流放者结了婚。小说揭露了法院、监狱和反动政府的腐败和官吏的昏庸残暴,控诉了教会的伪善,指出专制政府的暴行实际上得到了教会的直接支持,教会不过是沙皇统治的另一个工具。有鉴于书中对教会的激烈言辞,托尔斯泰因此被开除了教籍。

安东尼·契诃夫(Antony Chekov ,1860—1904)是 19 世纪俄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也写过一些剧本。他的作品深刻揭露了俄国社会的尖锐矛盾,对各种不良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但也显示出作者本人的内心苦闷。代表作有《套中人》和《第六病房》等。

伊凡·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1818—1883)出身于贵族家庭,在政治上是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主张对农奴制度进行一些改革。他的作品描写了农奴制度下面人们所过的悲惨生活,揭示了农奴制度的罪恶,探讨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写有多部长篇和短篇小说,代表作有《猎人笔记》、《父与子》。

除了上面一些国家之外,其他西方国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挪威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c Johan Ibsen ,1828—1906)所写的《玩偶之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篇了,瑞典的戏剧家奥古斯特·斯特林

堡格(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以及澳大利亚的亨利·劳森(Henry Lawson, 1867—1922)也都有一定的声望。

3. 现实主义艺术家

近代欧洲现实主义绘画的先驱当推西班牙画家戈雅(Goya y Lucientes, 1746—1828)。他虽然是西班牙宫廷画师,却是一位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士。他的名画《狂想曲》画出了宗教的残忍、伪善和贪欲。另一幅画《查理四世一家》上包括皇帝和皇后在内的十四个人当中除了戈雅本人没有一个真诚可亲,富有朝气。皇后更是又丑又傲慢。他的《五月三日的枪杀》表现了西班牙人被拿破仑军队枪杀的情景,显示了画家强烈的爱国热情。

19世纪是现实主义文学蓬勃发展,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也是现实主义艺术获得进展的时期。虽然现实主义艺术早就存在,但它作为一种不同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流派在新时期里还是有它独特内容的。这面旗帜首先由法国画家古斯塔·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在1855年举起。当时他的两幅画被巴黎的一个画展拒绝,一气之下他在官方展览会旁搭建了一个木棚自己展览起来,并声称他要“如实地表现出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从那以后现实主义绘画就以一种新的面貌发展起来。

库尔贝不顾其他人的反对,我行我素,坚持走自己的路。他不但在题材上面进行了革命,以劳动人民和下层社会场景作为绘画内容,而且在技法上也有创新。构图简单而大方,色彩就在黑白之间,体现了一种整体性和稳重感。

现实主义绘画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让—弗兰哥·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是个出身农村的画家,他的画善用光线和线条,通过强烈的对比来传达内心的炽烈情感,质朴无华,尤

其是那些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在绘画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他 20 岁以前一直在家干活,只是在他父亲去世后,才去巴黎学画。在他以绘画作为终身职业以后,他画的相当多的内容还是农村生活。他的《拾穗》、《播种者》、《扶锄者》这些名作都表现了农村的景象和劳动场面。他的画带有一种雕塑般的单纯和简练,善于运用粗厚的线条和丰富的光线。同时他的画往往蕴含了一种意境、一种诗意,这和他的文学修养分不开。

19 世纪也是音乐经历重要发展变化的时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音乐家。他们在音乐理论和演奏上的创新对 20 世纪都有重要意义。

安托宁·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 1841—1904),捷克音乐家。乡村长大,后在父亲的鼓励下去布拉格学习音乐,接着在布拉格国家剧院乐队拉提琴,一干就是 11 年。这中间他写了些曲子,获得了成功,于是离开剧院专门谱曲。他创作的《圣母悼歌》、《d 小调交响曲》、康塔塔《幽灵的新娘》和清唱剧《圣柳德米拉》在英国演出获得很大成功,被授予剑桥大学荣誉音乐博士,并被聘为布拉格大学教授,以后又担任校长。他的音乐最大优点是有一种自然的新鲜感,仿佛是鬼斧神工,天人相助,其实这是他精心琢磨、反复推敲的结果。他对前辈经典作品常常是再三咏诵,悉心体会,加上他对民歌的心得,能够吸收黑人和印第安人的音乐,将各种成分融于一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克洛德·阿西尔·德彪西(Claude Achille Debussy, 1862—1918),法国音乐家,被认为是现代音乐的重要人物之一。8 岁开始学习弹钢琴,11 岁进巴黎音乐学院,以后又进入作曲系就读,学习期间其演奏或作曲曾几次获奖。他的音乐个性在《弦乐四重奏》和《牧神午后》里得到了体现,在《夜曲》里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其千变万化的和声和音色可以和印象派绘画相比。他在钢琴演奏当中发现了前人所没有注意的音响,以此发挥出来呼唤听众的联想。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所作的室内乐变得简洁,富于灵感。此外他还写了不少音乐评论,虽然有时难免失之偏颇,大多数文章还是直率有趣,对当时的音乐界有很大的影响。

4. 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

自拿破仑对外战争失败之后,法国人一直处于一种沮丧和失望的情绪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总是在留恋过去拿破仑帝国时代的辉煌和在欧洲事务的主导地位。当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继位之后,人们总要情不自禁地拿他和拿破仑进行比较,拿今日战败国的屈辱地位和昔日欧洲盟主的身份进行比较,越来越多地同情拿破仑,越来越多地厌恶路易十八和他的继承人。这种情绪一时间在整个法国蔓延开来,而受刺激最大的是一帮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尚未出生,记不起帝国的事情,只是一味地夸大拿破仑的神话,将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来崇拜,迫切希望重建法国过去的荣耀,重新收回割让给盟国的领土。或许这是促使路易十八的继承人查理十世最终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拿破仑的侄孙路易·拿破仑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路易·拿破仑是个诡计多端、善于伪装和玩弄两面手法的政客。他先是参加意大利烧炭党运动,利用宣传拿破仑的机会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后来利用拿破仑的声望当选为法国最高行政官。在行政官三年任期内他伪装民主,操纵法律,修改宪法,成立了第二共和国,自封为皇帝。在他的18年统治里,法国的国际地位并未获得提高,却因战争和外交政策的失败处境不妙。在对内政策上由于他使用秘密警察实行大规模政治监禁和剥夺人权,法国已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这样当法国1870年9月在色当和德国军队相抗衡时,一下子便被打败,路易·波拿巴也成了德国人的俘虏。1875年1月德国人进驻巴黎,法国人的羞辱和绝望这时达到了顶峰。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法国人,特别是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更多地看到了人类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弱点。他们认为现在的人掠夺成性、意志衰退、精神沮丧,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寄托,是一群在模糊的自然力控制下的可怜虫,在世界上到处漂泊,同时不可避免地卷进了一场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和经济斗争中去。于是有的作家就试图用一种比较自然的方法来客观地反映和表现现实生活。这种方法和现实主义手法有相似的一面,即都是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要目的,但自然主义更强调遗传和环境对人性 and 人的行为的影响,而不注重挖掘小说的社会和历史蕴涵。

第一位全面阐述自然主义原则的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 1841—1902)受到实证主义哲学家泰纳和遗传学家克洛德·贝尔纳的影响,认为艺术家要想表现生活,就必须先从科学和“事物的自然演化”中寻求生活的答案。小说不仅仅是忠实地反映现实,而且要从描写的事物当中得出符合某种自然科学定理的结论。他进一步声称写小说就像做实验一样,不过实验对象不是物质,而是人。他还认为小说家的任务只是观察事实,研究事实,但不作任何结论,小说家应该超越政治和道德。在实验小说里,作者就是一位实验室科学家,依靠遗传和社会环境去研究各个人物的反应。他声称:“我们从生理学家手里接过人就是为了从科学上解答这个人在社会现实中表现的问题。”

在他的代表作《卢贡·马卡尔家族》里,他以第二帝国为背景描写了路易·波拿巴时期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的不愉快历史。在这套多达20本的多卷小说里,作者的目光像是把手术刀解剖着各个人物的思想脉络和他周围林林总总的人际和社会关系,揭示了资产阶级衰败颓废,展现了从沙龙到煤矿,从大厦到妓院的一卷卷画面,表现了各种环境和遗传因素对人物个性演变和事态发展的公开和隐僻的影响。《萌芽》是其中写得较好的一部。小说描述了一家叫做蒙苏煤矿公司的工人的悲惨生活。那里工人失业情况严

重,公司老板为了克扣工资,控制工人,有意在工人之间挑起事端,分裂工人队伍。面对这种情况,工人在郎杰的领导下开始罢工,跟着就发生了暴动。公司老板利用断绝口粮办法迫使工人让步,但工人没有被吓倒。接着公司又和政府勾结,出动军警镇压,最后利用罢工运动内部的分歧瓦解了罢工。郎杰目睹自己队伍的分裂,意识到这里很难再坚持下去,于是决定到巴黎参加革命。另一部小说《崩溃》表现了第二帝国瓦解和巴黎公社革命的经过,试图比较客观地描述这些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

除了左拉以外,龚古尔兄弟(Edmond Louis Goncourt, 1822—1896, & Jules Alfred Goncourt, 1830—1870)的小说也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他们在一篇日记里曾声称:“今天的小说来源于自然的叙述式复制文献,就像历史来源于书写文献一样。”他们以此为准则搜集了大量的第二帝国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自然主义小说。

第九章 18—19 世纪欧洲的社会和 哲学思想

启蒙运动从欧洲开始以后,资产阶级先后在欧洲各国走上了政治舞台,从被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不仅促进了欧洲经济上的发展,也带来了思想上的自由和解放,推动了学术上的繁荣,使得社会文化和思想理论研究变得十分活跃。新的哲学和其他社会思想理论的产生又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资产阶级当权以后带来的民主开放的局面,同时规范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增长,也为以后日趋激烈的政治斗争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指导,做了必要的准备,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活跃和发展的时期。这里着重介绍对欧洲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英国功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一、英国的功利主义

1. 产生背景

从 17 世纪到 18 世纪末,英、美、法、荷等国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而是经过了一个巩固和确立的曲折过程。法国尤其是这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招来了欧洲一些封建君主制度国家,例如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

国的仇视。他们不愿看到法国波旁王朝被推翻,千方百计帮助法国王室卷土重来。英国此时虽然已是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当权,但名义上的统治者还是英国王室,它的统治集团既不愿看到一洲并存二主,同时也怀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复杂心态,于是也加入到了反对者的行列。这样从 1796 年起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多次和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统治下的法国交战。起先拿破仑总是能够赢得胜利,但 1814 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时被库图佐夫重创,遭到毁灭性打击。1815 年复辟后再次遭受重创,被英国人流放到圣海伦娜岛。在那里他被人严加看管,不得离开雷池半步,终于郁郁寡欢,直到去世。这样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又登上了帝王的宝座,欧洲各国的反动贵族弹冠相庆,封建主义势力又一次甚嚣尘上,气势汹汹。一时间欧洲上空黑云密布,历史车轮又往后倒退了几十年。英国铲除了它的老对手,其在欧洲的政治地位这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英国国内,产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从 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 30 年代这 70 多年里,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各主要工业部门都用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业操作。全面的技术革新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如同恩格斯所说:“18 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结果是,由于产业革命而形成了无产阶级。”^① 产业革命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利润,却给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带来了新的劳役和痛苦。工人阶级承受着巨大的劳动压力,而收入却非常低微。

与此同时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一个新的工业资产阶级集团在英国开始出现。这个集团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在政治上却处于无权地位。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和掌权的商业金融集团及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676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建贵族进行斗争,争夺权力,以便实现对他们有利的变革。这种斗争导致了1832年的国会改革,并最终使得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上台执政。

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和欧洲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两股思想潮流。首先是正统的封建主义思潮,包括英国的柏克、法国的梅斯特尔和博纳德以及德国的历史法学派等。他们攻击卢梭、潘恩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否定法国革命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赞美英国的君主制度,用宗教神秘主义和复古主义否定资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论及理性主义思想,用君权神授和君主专制论否定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用等级特权论和人类生来不平等论否定自由、平等及天赋权利论。

其次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建立政权以后的愿望和要求。对他们来说,从前的一些资产阶级理论,例如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已经过时,既不符合它反对封建贵族和金融商业集团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它对付无产阶级的需要。它要有一种新的社会思想来为自己服务。于是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就应运而生。所谓自由主义就是主张公民自由的理论。功利主义则是个人谋求私利的主动精神,具体地说,就是要求获得经营企业和订立合同的自由,进行贸易和剥削工人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守夜人,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身安全和财产私有制,保证公民自由而不要干预正常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这一思想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边沁和穆勒。

2. 边沁

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律师家庭。祖父靠经商发财。他从小聪明,有神童之称。7岁进威斯敏斯特学校,12岁入牛津皇后学院,15岁取得学士学位,后入林肯

学院读法律。从 1770 年起开始在法国旅游和居住。法国革命时曾一度成为法国公民,但以后改变了观点,开始反对法国革命。后来主要从事学术著述。去世那一年还出资创办了《威斯敏斯特评论》,专门用来宣传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和改革计划。一生著作甚多,但未注意发表,有限的几部传世之作还是他的朋友悄悄地从他身边取走的。代表作为《政府片论》(1776)和《道德与立法原理》(1789)。下面我们对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原理及其运用作些介绍。

1) 功利主义原理

边沁年轻时最佩服法国的爱尔维修和意大利的贝卡利亚。前者在伦理学方面的成就,后者在犯罪学方面的论述使他对伦理学和政治学产生了兴趣。

他的学说有两个基础,即心理学和伦理学。与此相应的两个概念是“联想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他的伦理学思想和“最大幸福原理”来自英国哲学家法兰西斯·胡奇逊(Francis Hutcheson)。胡奇逊说过某种行为在道德上的罪恶要根据不幸的程度和受害人的数目来确定,因此最好的行为必须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此来衡量法律和国家的利弊及作用。他的心理学和“联想原理”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戴维·哈特里(David Hartley)。联想原理就是观念联合,也即接受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它相似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说,但后者属于生理学,前者则是心理学。根据联想原理,他提出让人接受好的思想影响,因为只有接受好的思想才能变成一个好人。

边沁根据这个联想原理提出要从法律上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制定出使人自动变得善良有德的法典,以便从法律的本质和形式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从而推动人性改造的社会工程,最终建造起一个善良有德的社会制度。那么什么是善良有德呢?他根据最大幸福原理给德做了界定,提出让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是道

德法律的标准,这就是所谓“最大幸福原理”。

边沁认为自然有规律,人类也要有规律。只有探明了规律,人类才能得到改善。人类的规律就是人的自然本性。那么人的自然本性是什么呢?他将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 1715—1771)的自爱原则或利益原则(即每个人首先爱自己,这是人的本能)改造为求乐避苦原则,认为这就是人性之所在。他声称,每个人都紧紧追随求乐避苦原则,都把个人利益作为自己做事的依据,说明求乐避苦是道德产生的源头。用他的话来说,所谓善就是快乐或幸福,所谓恶就是痛苦,所谓功利就是乐,就是个人利用外部力量求福避祸的特性或能力。一种事态如果其中包括的快乐超过痛苦的程度大于另一种事态,它就好比另一种事态善。他从实用主义和人性出发,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凡是能减轻痛苦、增加快乐的,在道德上就是善,在政治上就是优越,在法律上就是权利。这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

他还认为,人有追求最大幸福和利益的野心,只要计算得当,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一致,那么个人利益就可以不违背乃至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利益。他的这种理论虽然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和榨取利润的本质,但却不失为一种调动人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发展的方法和策略。

2) 功利主义原则的具体运用

边沁认为幸福和公益的目的在于改革法律,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求乐避苦既是道德原则,也是立法原则。他认为要增进人的幸福必须从立法开始。立法者的责任就是计算苦乐,以为大多数人增加最大幸福为目的。

① 国家产生原因

在国家产生的问题上,他反对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理论等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学说,认为那是虚构的。他认为,国家是人的集

合体和有机体,其产生不是依靠订立什么社会契约,而是依靠人们对苦乐的计算,就是说,人们是根据对苦乐的计算来决定是否建立国家。当他们认为建立国家所造成的祸害比不建立国家所造成的祸害要少时,他们才决定建立国家。

② 法律的功用

关于法律,他认为远在国家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他认为法律本身是一件苦事,也是一件恶事,因为它和刑罚的运用联系在一起。但法律又是不可避免的恶事,因为它是和命令、义务这些强制性做法联系在一起,不服从就要受到惩罚。法律又只是当权者的意志,并不完全公正。他认为,义务与权利一样产生于法律,权利乃是法律的产物,是一种乐。义务是根据权利的保障产生的,是一种苦。他认为人有三种义务,即政治义务、宗教义务和道德义务。不履行政治义务要受到统治者的惩罚,不履行宗教义务要受到上帝的惩罚,但是不履行道德义务则不一定受到惩罚。与三种义务相对应的是政治、宗教和道德的权利。法,归根结蒂就是统治者向被统治者公布有关权利和义务的强制性条款,必须加以完成。

③ 道德的功利作用

边沁按照功利原则,把法和道德的作用都放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他说过:“个人的伦理以幸福为它的目的,而立法也不能有其他的目的。个人伦理涉及每一个人,……而立法也不能涉及更多的人了。”^①他认为法与伦理道德的本质、目的和内容都相同,只是方法、作用、范围和程度有些差异。他认为,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就一定要有依据,凡是没有依据的,法律和道德就不应过问。凡是没有侵犯他人利益的,或是惩罚对人的行为不起作用的,即使违背法律,法律也不应干涉,道德谴责也极为有害。如对酗

^①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495页,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酒,用法律惩罚就不太成功。理由是酗酒是个人的事,并未侵犯他人利益,通过惩治所取得的效果远远小于这件事本身所造成的恶果。

④ 衡量法律的标准

根据功利主义,边沁把是否符合苦乐原则作为衡量立法的标准。这就是:

- a. 法律草案的假定行为对任何人来说是苦多还是乐多;
- b. 法律草案的假定内容是否带有普遍性;
- c. 法律规定的內容是有利于多数人还是有害于多数人。

他根据这些功利标准批评了英国法律,要求进行法律改革。他说过:“在一个法制政府下,善良公民的金科玉律是什么呢?那就是‘严正地服从,自由地批判。’”^①他反对君主立宪,反对两院制,主张改革国会,认为立宪权应属于人民,由一院制代表机构行使。选举应每年进行一次,取消选举财产资格的限制,妇女也应有选举权。行政人员应对立法院负责,经常更换。反对严酷刑法,也反对滥用死刑。他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他的改革理论对推动英国的改革起过很大的作用,是当时英国改良主义思潮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张适应了当时英国产业资产阶级追求贸易自由和加强政治权力的要求,也体现了资产阶级追求功利的阶级本性。

3. 约翰·穆勒

约翰·穆勒(John Mill, 1806—1873)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老穆勒是19世纪英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幕后推动者,也是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重要鼓吹者,反对和蔑视浪

^①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479—480页,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漫主义思想。老穆勒非常重视教育,在小穆勒身上花了不少时间。约翰·穆勒 3 岁就开始学习希腊文,14 岁被送到法国去学习法律,回国后进东印度公司工作,长达 35 年。后来担任国会议员,经常批评政府。他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也因此失去了不少儿时的欢乐。他在晚年时抱怨道:“我从来就不是个孩子,从来没有玩过蟋蟀。”由于用脑过度,他在 21 岁就得了精神分裂症。他是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后期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除了受到其父的影响之外,他还受到当时的一些主要思想家,例如柏克莱、休谟等人的影响,也得到过边沁和孔德等人的熏陶,其代表作有《论自由》(1859)、《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1863)等。

1) 有关自由的论述

① 自由的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他代表要求更多个人自由,更多贸易和竞争自由的产业资产阶级。什么是自由?他认为任何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其他人时,他本人的权利就不应剥夺,而应受到尊重,绝对不应侵犯。只有当个人行为有害于他人利益时,他才要对社会负责,接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根据这个原则,他认为人类自由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 a. 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即良心、思想、学术、信仰和言论自由;
- b. 趣味和志趣自由,即自我规划,发展个性的自由;
- c. 个人之间相互联系的自由等。

②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他非常强调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说这是人类精神福利,是人类其他福利的前提和基础。其目的之一是论证行动自由,而行动自由的目的是发展个性。他认为个性是人类福利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尔文学说不可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把自我意识当成人的一大罪状。有个

性才能有发展,压制人的个性就是专制,有个性才能有首创性,才能有进步和发展。

③ 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

他又说个性和社会可以而且应当各得其所。社会并非契约,但每人都在社会中生活,应对生活有所报答,对他人应有某种行为准绳,担负自己的责任。如果谁不肯这样做,社会就可以强制他。但一个人的行为不影响他人利益时,他的行为不管多么被人厌恶,人们可以不理睬他,甚至在道德上责备他,却不能去惩罚他,不能把他当成敌人。

2) 有关政府的论述

① 政府的起源和产生条件

他反对认为政府是一种实际的艺术和发明创造的社会契约论观点,也反对认为政府是一种自然产物,是从一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形成的有机产物,即所谓的国家起源自然说。他认为这两种观点不完全错也不完全对。

他认为,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其根源和存在有赖于人的意志。其次政治机器由人操作,需要人们的积极参与。这样政府包含着三个条件,即:

- a. 为人民设立的政府形式必须为人民乐意接受;
- b. 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作为维持它必须做的事情以使它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维持最基本的社会职能;
- c. 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做为实现目的所需要做的事情。除了担负起管理国家机器的功能,使之能够正常运转以外,还要推动国家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以便实现更高层次的目的。^①

① 参见《代议制政府》,7—8页,约·穆勒,商务印书馆,1982年。

从他的这些思想观点看来,他既反对自然成长说,又带有自然主义倾向;既反对社会契约论,又强调人的意志在其中的作用。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对前人思想的调和与折衷。

② 关于判断政府的标准

- a. 他认为检验政府好坏的标准是社会利益的总和。而政府增加被统治者良好品质的数量多少可以看成是衡量政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 b. 议会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他说:“最理想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整个社会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最终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① 这样他就了解政府工作的性质,对政府工作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这种议会制政府建立在每个人均有自保或自助力量的原则上面。有了这两种力量,他就可以获取自由,避免遭遇他人的迫害,同时可以养成一种斗争精神,和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

③ 议会制政府的职能和弊病

他认为,议会制政府是一种最完善和理想的政治体制。它是全体人民或大部分人通过由他们定期选举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人民是支配政府一切行动的主人。议会的职能不是管理国家事务,而是履行以下职责:

- a. 监督和控制政府;
- b. 议会本身是公民议论国家大事和表达意见的地方。

关于代议制政府的弊病,他说:“最大的危险之一在于掌权者的有害利益,这就是阶级立法的危险,就是意图实现(不管是否真

^① 《代议制政府》43页,穆勒。商务印书馆,1982年。

正实现)统治阶级的眼前利益,永远损害全体的那种统治的危险。”^①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不让任何阶级或阶级的联合(政党)在政府里占压倒地位,各种社会力量要均衡地分配和占据议会席位。

④ 关于选举问题

他认为,代议制作为民主政体是代表一切人的,而不仅仅代表多数人。真正的民主政体必须听取少数人的意见,使少数人有其代表。

他主张扩大选举权,但又强调财产资格,他称“代表权的范围应与纳税范围相同,既不要超过,又不要达不到。”他还主张教育程度的限制,认为普及教育应先于普及选举权。他还主张给予妇女选举权,认为性别差别同身材高矮、头发深浅一样,和政治权利毫不相干。这些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对以后西方国家的民主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3) 有关功利的论述

① 功利的界定

他认为,改良主义就是最大的幸福主义,不仅包括对幸福的追求,也包括对不幸福的避免和减轻。穆勒和边沁都认为功利意味着最大的幸福,但边沁认为快乐只有量和程度的不同,而穆勒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不同,快乐本身就说明有优劣高下的不同感受。也就是说,他认为理智的、感情的和道德的快乐比起感官的、肉体的快乐有着更高的价值。

② 个人幸福和他人幸福的关系

他还认为,应提倡每个人为增加全体人的幸福而牺牲,为别人的幸福而牺牲的精神。功用伦理学的精神体现在《圣经》的两句话

^① 《代议制政府》,98页,穆勒。商务印书馆,1982年。

里 :待人像是你期望人待你一样 ,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要做到这两点 ,就必须做到 :

- a. 法律与社会应尽量使每个人的幸福与利益同所有人利益一致起来 ;
- b. 通过教育和舆论培养人的良好品质 ,把公共利益和个人幸福结合起来。

他认为一般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必须依靠一种强制力。他将这种强制力分为内、外两种。外力即人们相信得到上帝或人类之爱的感情 ,会促使人去做促进人类幸福之事。内力是“一种内心情感 ,一种伴随违反义务而起的相当强烈的痛苦”。这种情感是“良心的精髓”。人类服从自己的良心 ,按良心办事 ,就能达到功利。他还强调“一切人的集团利益”就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所在。它们包括 :爱金钱 ,他认为钱是人生的原动力之一 ,是达到幸福的工具 ,也是幸福的组成部分 ;权力和名望 ,它们是协助达到其他欲望的工具 ,对它们的追求超过任何其他的欲望 ;美德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流芳百世的欲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不计名利得失。他认为功利就是公道 ,离开功利原则就谈不上公道观。说到底人的所有欲望、道德和追求都要通过利益的计算。

这里穆勒在逻辑上似乎有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的理论称求乐避苦是人的本性 ,是个人行为的原动力 ;另一方面他又要求人们使他们的求乐避苦行为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 ,同时还要借助法律和社会的强制力。既然如此 ,一种需要强制力才能实行的行为如何又称得上是人的本性 ,又如何成为人的原动力了呢 ?

二、德国的社会和哲学思想

1. 背景

德国哲学早年受到法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歌德和康德在

法国大革命初期就曾经追随法国的解放热潮,提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要求,吸取了法国人的反神学、争自由和反封建的精神。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哲学偏离了唯物主义轨道,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和法国唯物论相对立,攻击唯物论和无神论。这样西方近代哲学就经历了17世纪由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18世纪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之时,正值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产业革命蓬勃发展,整个欧洲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这种社会变化引发了欧洲的三大主要思潮,即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这三大资产阶级思潮同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而表现方式又不相同。其中的德国古典哲学则是在当时经济落后、实力较弱的封建德国发展起来的,是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所谋求的一条政治和经济的出路。

德国哲学家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提出了个人自由、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权等要求,却又有意地进行了德国式的解释和变动。例如康德在接受卢梭的自由思想之时,声称人民无权暴动和对君主施行暴行或处死。黑格尔在称颂法国革命的同时,又攻击群众革命行动是“可怖的暴虐”,是“野蛮和恐怖的”。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要适应当时德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当时的德国比起英法等资本主义强国要落后许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是宗教改革,一个是三十年战争。宗教改革基本上是市民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运动,打击了德国封建主义势力。但是德国那时还只是一个农业国,乡村统治着城市,农业远比商业和工业强大。工业也主要是些手工业。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面资产阶级出于本身的弱小地位,不可能公开反对封建贵族,注定要向封建统治阶级妥协。

三十年战争既是对德国封建势力的一次打击,也对德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兴起产生了负面作用。这次战争涉及到欧洲各国的政治矛盾、领土纷争以及宗教、意识形态的分歧。这次战争具有两方面的特点,既带有内战性质,又有国家间战争的特点。参战的除了德国两派诸侯之外,还包括丹麦、瑞典、捷克和法国等国家。战争的结果是大大削弱了德国的实力,使得德国人口大为减少、土地荒芜,工商业大批倒闭,严重地阻止了资本主义发展,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在这次战争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更加分裂,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德国当时被分割成 300 多个诸侯小国,皇帝和联邦议会徒有虚名,并没有统一和治理国家的权力,普通德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德国最初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发展起来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是由地主贵族转化来的,就是在地主贵族的支持下演变过来的。德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封建地主贵族阶级具有依赖性,比较软弱。同时由于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和无产阶级结盟。这就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妥协和动摇的特性。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大。德国资产阶级并不甘心处于一种依附地位,他们也希望思想自由,政治独立,国家统一,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经济。但是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变得比较激进,出现暴力事件时,德国资产阶级便害怕起来,表现了他们既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又不敢进行革命乃至反对革命的两重性。这种情况在思想领域里表现出了一种调和资本主义自由平等要求和德国现实矛盾的倾向。

然而尽管德国哲学在理论形势和革命内容方面不如法国哲学那样激进,但就内容实质来说,德国哲学仍有批判封建主义的一面。它用科学代替了神学,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代替了封建神权理论,为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力提供了理论武器。

德国哲学的产生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哲学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渊源。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就有了库萨的尼古拉哲学。尼古拉是罗马天主教的红衣大主教,曾经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上帝万物的看法,提出了上帝即万物、万物即上帝、上帝与万物同一的泛神论思想。他建立了人的三种认识能力的学说,认为人有感性、知性和理性。这些观念具有辩证法思想,对后来的德国古典哲学有很大影响。另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是莱布尼茨。他认为,宇宙由许多独立的精神单子组成,单子是内在活动的源泉,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觉力和能动性,精神、理性是这种知觉力和能动性的最高形态。理性和精神可以使人认识真理,理性和精神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此外德国哲学还继承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优秀哲学传统,例如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和法国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培根的哲学思想重实验、重感觉、重经验。笛卡尔肯定理性自我,提倡怀疑论,认为“我思故我在”,主张“天赋观念”;“清楚、明晰”是认识的真理标准。他们都从不同侧面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另外德国古典哲学还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以及中世纪哲学当中获取了营养。从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到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无一不对他们产生极大影响。

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有一定的作用。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动力学,牛顿的三大定律,哥伦布找到了美洲大陆,麦哲伦发现了新航线等,都是那时世界上具有轰动效应的重要事件。德国的古典哲学,尤其是其中的辩证法思想,正是在这一自然科学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同时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康德的两个天才假说。它们既促进了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也在自然科学当中获得了应得的荣誉。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渊源。黑格尔以后,德国哲学又出现了叔本华

和尼采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从不同侧面加入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对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哲学家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情况可以从下面的介绍当中得到些初步的了解。

2. 康德的二元论哲学和社会思想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出身卑微,父亲是个做马鞍的,祖上是苏格兰人。他从哥尼斯堡大学毕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靠替人家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计。直到 1755 年他才在哥尼斯堡大学找到了一个教席,从此以后就一直在这个学校任教,直到去世。他先教神学,后来改教哲学和其他许多课程。

康德知识渊博,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仅能教神学和哲学,对物理、逻辑、数学、伦理、地理等均有研究,也都教过。他发表在 1755 年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对研究天文学有重要贡献,被恩格斯誉为“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但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在政治和哲学方面。

康德终身未娶,但生活起居,特别是时间的安排比较有规律。据说他的邻居甚至根据他的起止来确定时间。虽然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一辈子几乎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他对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局势还是非常关心的。例如对于启蒙运动他就发表过意见:“我们亲见这场由这个极有才华的民族所发动的革命在我们面前进行……它充满了如此的悲惨和恐怖,以至于任何善于思索的人决不会再用这样的代价来从事这场实验了。”^①

^① 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 15 页,人民出版社,1979 年。

1) 哲学上的二元论

康德的哲学思想表现出了一种二元论的倾向,既受到了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的熏陶,又受到以培根、洛克和休姆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影响。但他的思想主要还是得益于牛顿和卢梭。他说过:“卢梭是另一个牛顿。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正如牛顿揭示了外在世界的秩序与规律一样,卢梭则发明了人的内在本性。必须恢复人性的真正观念。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关于人的实践知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轻视无知的大众。卢梭纠正了我。我的优越意识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认为自己远不如普通劳动者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够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有权利。”^①

康德的哲学革命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批判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形而上学”开始的。后者试图用人类理性证明上帝存在,灵魂不死以及意志自由这样一些形而上学说教的。康德证明这些东西不是科学研究对象,而只是信仰对象,他认为,把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知识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如上帝、灵魂乃至自由这些东西既不能证明它们的存在,也不能证明它们的不存在。它们虽不能作为认识对象,却可以作为信仰对象,对人们的道德生活还是有用的。这样他就陷入了一种双重标准,滑到了二元论的圈子里。

康德哲学还有一个“物自体”的重要概念。他说:“唯心主义认为除了思维的存在体外别无它物,认为直观所感知的不过是思维之内的表象,外界并无任何对象与之相应。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作为我们感官对象在我们之外的东西是存在的……这些东西怎样固然不可知,但由于它们作用于我们的感性,便使我们知道它

^① 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们,我们把它们叫做物体。”^①这段话代表了他的“二元论”理论,即一方面他把物自体当成了感性来源,有其唯物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把物自体当成认识的界限,认为它是不可认识的,表现了他的二元论思想。

康德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他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通过宗教神学和牛顿机械力学的不断批判,逐步和莱布尼茨—沃尔夫唯理论划清了界限,但并没有实行彻底的决裂。康德认为宇宙的发展、天体的起源虽然可以用物质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但宇宙存在的原因却又不能完全由物质和力学来解释,上帝虽然不是宇宙的建筑师,却是宇宙的设计师。

2) 社会观念

康德在政治上高举“理性”和“启蒙”的大旗,反对封建宗教势力和专制制度,主张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或代议制共和政体。他赞同美国独立战争,同情法国大革命,代表了当时德国市民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要求。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政治上的变革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而不能依靠人民革命。所以他在政治上主张用进化来代替革命,希望在“开明君主”领导下实现共和。

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上,康德继承了卢梭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赞同“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说”,但他更加强调社会起点是原始自然状态,建立社会的目的是限制互相的竞争。为了尽早脱离自然状态,有必要组成一个联合体,共同服从由公共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对外部限制。卢梭对康德的影响很大。但是康德并不满足于卢梭的思想,特别是他不赞同卢梭注重自然感情,轻视理性知识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

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并进而得出以下这些观念:

^① 参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二版。

a. 主权在民；

b. 人民的集体意志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和最高标准。他积极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同时他又主张服从现存的法律、秩序、制度和君主，声称只有在这种“忠诚”和“服从”当中才能获取自由，认为强制和自由是完全一致的，个体的人必须放弃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服从国家的法律和权力，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他又提出了建立国家的三项原则，即公民的三项法律属性：

a. 宪法规定的自由；

b. 公民的平等，有权不承认任何在他之上的人；

c. 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康德的社会思想源于法国，但在封建的德国行不通。他不得不因此而避开现实而转向内心世界，主张用一种从上而下，从容不迫和平稳可靠的改良方式进行变革。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在康德身上的反映，同时也必须看到康德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可谓用心良苦，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3. 费希特的哲学社会思想和国家主义观点

费希特(Johann G. Fichte, 1762—1814)，出身贫寒，只是由于天资聪颖，记忆力非凡而得到了一个贵族的赏识和赞助，得以在耶拿和莱比锡等大学念书，研读神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有可能研读康德著作并专程去哥尼斯堡请教康德，因而成为他的学生。从1794年起，他历任耶拿大学和柏林大学等校教授，成为新唯心主义派的领袖。

1) 哲学观点

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即回答

一切认识的最根本的根据 ,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他把
自己的哲学著作命名为“知识学”,即科学理论、科学知识的逻辑,
把科学、知识、认识解释为积极的、有改变力的活动。虽然他得到
过康德的恩惠(他的一篇论文就是在康德的帮助下出版的),在他的
学术生涯开始阶段是以康德思想的追随者的面目出现的,但他
很快发现了康德二元论哲学观点里的缺陷,并提出了批判。他认为
康德的“物自体”并不存在,世界上只有“自我”是唯一的实在,它
是认识和意志的主体,其他的一切都由“自我”推演而来。他有三
个基本命题:

- a. 自我设定自身;
- b. 自我设定非我(非我即客观存在);
- c. 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即以自我为基础,自我和非我相互
限制,又彼此统一。

这种自我与非我统一的思想,否定了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看做
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在自我的范围里,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
础上,论述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性。这样他把康德的“不可知
论”统一到了人的意识之中,即唯心主义里去了。费希特的哲学强
调行动,他的哲学可以称为行动哲学。他把行动与自我连接在一
起,强调自我的创造性,发展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他把自我看作
是种活动,是力量,是斗争,多少克服了形而上学思维的僵化。他
还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在一定意义上看到了理论活动与实
践活动的同一。他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是一切
理性的源泉,只有实践理性才能获取知识,达到自由。尽管费希特
把实践活动理解为理性的范围,而且带有唯意志论的特点,但却包
含了实践和理论的统一,自由是对必然认识这样一些理论命题的
萌芽,也是对康德实践理性观念的发展,并为黑格尔的实践观点开
了先河。

2) 社会观点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初期,费希特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呐喊。他反复论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思想,成为当时德国杰出的自由战士和思想家。他在他的小册子里热情赞颂了法国革命,批驳了保守分子对法国革命的偏见,表达了反封建、反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想,特别是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的要求。即使当法国革命发展到了雅各宾专政时期,费希特仍然对法国革命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为此,他甚至丢掉了他在耶拿大学的教授位置。

在社会问题上,他不同意康德讲的人有反社会性的观点,而认为人类具有社会本能、道德本能和共同生活的本能,即社会性。他反对人性本恶的看法,为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从伦理道德上说,他认为道德规律决定了人与社会相始相终,任何人都不能存在于社会之外,因此人有社会性。其次就人的本身而言,他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必定要在社会中生活。再次,从社会本身而言,人有一种与其他理性生物交往和共同生活的本能,这种在交往中形成的关系就是社会。

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他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的三种契约关系,这就是:

- a. 承认他人财产合理合法的“财产契约”;
- b. 一个人财产受到侵犯时,其他人互相支援的“保护契约”;
- c. 把单个人结合在一道的“结合契约”。

他认为,国家不是目的本身,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仅仅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① 他极力证明法国革命的合理性,驳斥了那种

^① 参见《西方社会思想史》,379页,袁华音,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只有人民才是最神圣的力量。他强烈谴责封建主压迫人民的黑暗现实,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条件,每个人都必须依靠他的劳动生活;“不劳动者不得食”,必须废除等级特权,建立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民权。他继承了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认为社会契约应当成为一切国家体制的基础,而权力无限制的君主政体和社会契约是相抵触的。他还论证了人的基本权利是不可转让的,也是不可剥夺的。人们订立契约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如果国家变得不保护自由,反而破坏它的话,人们就可以改变它。费希特的社会契约论虽然是唯心的,忽视了经济基础,忽视了社会阶级的划分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它在理论上为资产阶级革命张目,成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武器。但从 1800 年起他的观点开始变得温和起来,把希望寄托在改革而不是在暴动上面。

3) 有关国家主义的观点

费希特的国家主义观点在他发表的呼吁书《告德意志国民》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拿破仑军队正在入侵德国,他用激昂的语言号召抵抗入侵者。他认为,战胜敌人、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根源在于发扬民族性。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宗教、道德、艺术和科学等精神方面。他认为就这些方面而言,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优秀的”民族,拉丁族,尤其是法国人和犹太人是腐朽种族。德意志民族更具有独创性精神,例如他们的语言文字,他们的路德新教,他们的哲学都更富有独创性。这样费希特就把德意志人看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认为只有它才能担负起领导欧洲和世界的责任。他并非是这一说法的首创者,但他是这一思想的一个重要鼓吹者和继承者。以后在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那里这些观点都有重复,给世界带来了灾难。特别是在二次大战当中经过希特勒和法西斯的进一步歪曲和误导,这一思想所造成的破坏更是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

4.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黑格尔(George. W. F. Hegel ,1770—1831),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高级官员家庭 ,就读于图宾根大学 ,曾经当过家庭教师和中学校长。从 1816 年起先后出任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 ,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派 ,去世前一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

1) 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建立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和集大成者 ,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为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从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入手 ,形成了他的唯心主义思维和存在同一论。他的哲学从思维和精神出发 ,由思维转化为存在、精神转化为物质 ,然后再由物质转化为精神、存在转化为思维。他用以论证这个转化过程的理论武器就是所谓的“绝对精神”。也就是他所说的“绝对理念”、“理念自身…永恒的精神”(《小逻辑》,商务印书馆 402 页,1980 年)他说理念的概念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理念统一。这概念以理念本身作为对象,客观世界即为理念——在客观世界里一切规定均统一起来了。因此这种统一乃是绝对的和全部的真理 ,自己思想自己的理念。”^① 简言之 ,这就是绝对精神。他认为绝对精神是万物最初的原因和内在的本质 ,是自然界和人类还未出现时就已存在的实在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它的表现。它是客观存在的 ,永恒的精神实体。其所以是绝对的就因为它不是个人的精神 ,也不是人类的精神 ,而是囊括宇宙万物的精神。换言之 ,即宇宙精神。绝对精神的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和精神这三个阶段。它的哲学就是对这三个阶段的描述 ,其体系相应地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组

^① 参见《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哲学》,345 页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成。他在《逻辑学》一书中论述了正、反、合的辩证进程。他试图通过两种对立的要求取得某种妥协性解决办法。这种辩证法原则以后用到他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考察里。这种逻辑思维方法有一定意义,马克思在建立自己的哲学过程中间就吸收了它的合理成分。

① 社会思想

黑格尔的社会思想反映在精神哲学这个阶段。他的精神哲学由主观精神(个人意识)、客观精神(社会意识,包括抽象法、道德和伦理)、绝对精神(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来认识自己)这三个依次交替的阶段组成。他的国家理论是在客观精神阶段中的伦理阶段里提出的。伦理阶段分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小阶段。他认为,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婚姻不仅是两性关系,而且是一种精神的统一。他说的市民社会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个不同阶段,是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即在普遍性形式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员和财产的法律制度以及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的。市民社会的特殊性排除了普遍性,属于“知性”范围,包括“需要体系(物质生活)”、“司法”和“警察及同业工会”三个环节,用以调节和缓和各种矛盾和利益,维持社会秩序。

他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对个人具有最高权利,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国家不能以保护个人利益、自由和权利为限,不能把个人利益看成是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他说“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他还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国家的根据就是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力量。”^①他认为,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形式,君主、贵族和民主制都是片面的,只有君主立宪制才是最发达、最完善的国家政治形式。他声

① 参见《法哲学原理》(德)黑格尔,25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称,君主制国家里公共权利和私人利益既分开,又互相联系。国家随时可能陷入暴政或是无政府状态。民主制国家建立在以德为基础的情绪上(人民以德为标准,根据好恶的情绪来决定谁去执掌政权),但它需要的是合乎理性的法律形式而不是情绪的形式。它通常不是采用前一种形式,而是采用“人民意志”这么一种情绪来充当或是行使乃至代替法律。这样他就把三种形式分别降格为三个环节,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的三个要素:君主,贵族和人民。这三要素同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相对应,成为他理想的君主立宪制模式。同时他把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思想加工改造为王权(单一的权力)、行政权(特殊权力,相对于贵族掌握的权力)和立法权(代表人民享有的普遍权力)相结合的政治制度。

② 社会历史观念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念包括地理环境说和世界历史四阶段说两部分内容。他认为,自然环境或者地理条件是精神发展所需要的场地,一定的民族精神产生于一定的地理基础,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地理环境,即:干燥的高地或内地缺少雨水的广阔草、平原;平原流域,巨川大江流经之地,靠近海洋的沿海地区。他声称高地居民没有法律概念,人民好客、豪爽,但喜欢劫掠,成吉思汗便是证明。平原有利于农业发展,农业经济发展了,要求有土地所有权和其他法律关系。生活在海洋附近的人有冒险、勇敢的精神,勇于开拓和进取。他受到孟德斯鸠的影响,看重地理环境,但并不认为地理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还认为,历史的真正舞台在温带,寒带和热带被排除在世界历史舞台之外。他相信地中海是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声称世界历史是从亚洲开始的,亚洲是地球的东部,是创世的地方,而欧洲则是世界的中央和终极,位于西方。

他说,世界历史有四种模式,即东方、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他认为东方王国(包含中国、印度和波斯以及埃及)是从家长专制的

自然整体当中产生的,其世界观是实体性的,内部还没有分裂。根据这个世界观,尘世政府就是神权政治,统治者就是高级僧侣或上帝,国家由行政、立法和宗教三位一体的制度管理,唯一有自由的人是君主。东方王国是世界历史的幼年时代。在希腊世界里,精神摆脱了自然(物质)的束缚,人们开始享受到了精神上的快乐。这时世界历史进入到了青年时代。到了罗马时代,精神已完全从“自然”束缚下解放出来,且同“自然”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这是人类史上的“壮年”时代。但他非常厌恶罗马世界,说罗马原则是窒息一切生机勃勃的东西,要个人在道德生活上为国家牺牲,不惜用一切没有灵魂、没有仁爱的残酷手段去追求赤裸裸的统治。罗马灭亡之后,世界历史的中心就转移到了日耳曼世界。精神与自然的对立已经消失,而归于统一,一切人都绝对地自由。日耳曼人的发展不像希腊人和罗马人是从内向外进行的,而是从外向内进行的。也就是在征服其他民族之后,受到所征服民族的文化、宗教、政治和立法的影响。经过路德的宗教改革,基督教原则开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自由精神”的原则在这里成为世界旗帜。在他看来,日耳曼世界里,精神得到了最高体现,普鲁士是世界历史高峰。

根据黑格尔的论述,世界精神到了日耳曼世界里就不再向前发展。所谓三个最后,也就是:他的哲学是思维与存在达到了完全统一的绝对真理的体系,是“最后的哲学”;君主立宪制也就是普鲁士的国家制度,是最高最完善的国家形式,是最后的国家观念;世界历史发展到日耳曼世界,展示为“理性的现象与现实”,精神化为现实,是最后的历史实践。这三个最后是黑格尔哲学和社会思想形而上学特性和保守性的表现。此言一出,也就表明其哲学开始走下坡路了。

另外黑格尔哲学也还有些其他的缺点,例如他的辩证法过于强调斗争,暗示战争在道德上高于和平,敌国外患是提高一个国家

道德水准的重要条件等。这些观点似乎都有些偏颇之处。

5. 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当地的著名法学家。他的思想代表了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是启蒙主义、反封建和反天主教思想的代表人物,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当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

他的哲学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对上帝的信仰,即神学阶段。他在进大学读书的时候学的是神学,认为世界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一年的大学生活使他很失望,于是他决心放弃神学而改学哲学。1824年他从海德堡大学转到了柏林大学哲学系,师从黑格尔。这时他的思想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理性阶段。他在这段时间里对黑格尔非常崇拜,把黑格尔看成是他的“第二个父亲”,认为黑格尔哲学使他认识到自己和这个世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对黑格尔说的自然是由理性派生出来的说法感到怀疑,尽管如此他仍未彻底摆脱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从1830年起,他就开始发表文章,对宗教神学进行批判。他的《论死亡与不死》从根本上否定了灵魂不死说,声称只有理性是不朽的,要求人们不要向往来世,而要关注自己和现世。以后发表的一些文章进一步对神学作了批判,认为哲学和神学、理性和宗教是不可调和的。由于对宗教的批判,他被迫从哲学讲台上走下来,迁居到穷乡僻壤,失去了工作,靠妻子来维持生活。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在极为艰难的环境里继续进行自己的哲学研究,使自己的哲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他对黑格尔先是怀疑,继而开始批判。他在1839年发表的论文《黑格尔批判》标志着他和黑格尔哲学的决裂,也标志着他

的第二阶段哲学思想的结束。从此以后,费尔巴哈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束缚,成为一个初步的唯物主义者。他围绕着人和自然这两个最为基本的命题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集中论述了宗教与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的关系。该书声称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反映,成为宣布人和自然互相独立的“独立宣言”。书里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在当时的德国乃至欧洲知识界掀起了极大的波澜,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受到了恩格斯和其他思想进步人士的称赞。恩格斯说它炸开了黑格尔的“体系”,人们的认识水平因此为之一变,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对基督教批判的基础上,他又对其他宗教作了分析和批判,写出了《宗教的本质》。这本书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一些观念,但也暴露了他的形而上学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对封建君主的独断专行和惟我独尊,对社会当中蔓延的伪科学、伪道德、伪宗教作了揭露,公开反对封建专制政体,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身上存在的德国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妥协性。例如他拒绝参加当时德国的政治斗争和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满足于长期生活在“大自然的殿堂里”。这样他就不能正确评价社会发展、政治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也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及其意义,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观念,使之和形而上学决裂。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费尔巴哈的哲学就逐渐落后于社会实践,落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和科学发展的趋势了。晚年的费尔巴哈继续写过一些批判神学,阐发唯物主义思想的文章,并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但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费尔巴哈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批判,对唯物主义的阐述都是人类文明的一笔宝

贵思想财富。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的最大功绩在于他冲破了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对人的思想的禁锢，部分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思想权威。这方面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上面，也表现在对康德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评判上。例如在认识论当中，他否定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提出了形而上学唯物论的可知论命题。可以说是费尔巴哈结束了自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开辟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崭新阶段。

其次，费尔巴哈发展了德国哲学当中的人本主义传统，建立了他的人的学说。在这方面他继承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启蒙主义、反封建和反基督教、尊重人的思想，同时又指出人本主义的实现不仅应当在思想上，而且应当在实际生活当中。但是他所谓的人只是指自然的，肉体的和单个的人，而没有把人看成是社会的、历史的和阶级的人。虽然他用人否定了神，用无神论代替了有神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的人本主义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他的理论偏离了当时德国的社会生活和实际斗争，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第三，费尔巴哈的另一功绩是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在这方面他有大量的论述，也是他走上唯物主义的契机。他的著作分析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提出人不是上帝创造的，恰恰相反，倒是人创造了上帝。他认为，上帝是人本质异化的表现，从而揭穿了宗教的人本学本质，对深刻认识宗教神学具有一定意义。

第四，费尔巴哈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的原理，构成了他哲学的“基本内核”。他指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所谓先于世界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只有我们的物质世界才是可以感知的唯一现实。我们的意识和思维无论是多么超感觉，总是物质和肉体的人脑产物。换言之，不是精神创造了物质，而是物质创造了精神。他的这一基本观念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也是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内

核,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为他们批判地吸收,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

6. 叔本华的意志论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商人家庭,年轻时曾一度想做生意,后因得到一小笔遗产而进了格廷根大学学习。1811年进柏林大学,主要学习理科,后来听了费希特的课,颇不以为然。几经周转,从1819年开始在柏林大学以编外讲师名义讲课。他十分自信和乖戾,想把那时也在讲课的黑格尔学生吸引到他的教室里来。遗憾的是他的文采和口才都还做不到这点。于是他就决定退出讲坛,去了法兰克福,在那里定居下来,潜心构思他的哲学体系。他所渴望的名利直到晚年才意外地来到。

叔本华的哲学观点形成较早,其核心是唯意志论。他的代表作是《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发表于1818年,当时他才30岁。在这本书里,他声称没有意志世界就将一无所有。他像康德一样用了物自体的概念,但他又不像康德那样认为物自体既存在又不可知,而是把物自体等同于意志。他认为人的经验世界由现象构成,但引起这些现象的不是不可知的本体(指世界的本原或本性),而是本体的意志。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意志的表现。人的本质也是意志,人的一切行为都是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命冲动力,即生活意志所支配的。他的观点和康德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康德把意志看成是与本体相联系的。如果人行使自己的意志,那么在经验世界里与之对应的便是人的身体运动。叔本华把身体看成是一种现象,现象的实在性由意志来体现。他和康德一样,也认为本体的世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作为本体的意志也不会受到它们(时间和空间)的支配,因此意志是非时间、非空间的。

叔本华的伦理学建立在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基础上。他声称世界既然是意志的产物,就必然充满着痛苦。他把这种意志看成是一种彻底的罪恶,认为意志应对人生的苦难负责。这是因为人的意志是一种盲目的欲求愿望,而欲壑难填,有欲求就有痛苦。快乐只是暂时的,是痛苦的短暂结束,而痛苦则随着人的意志和欲求长期存在。世界是由人组成的,充满着意志,也充满着罪恶。归根结蒂,人是利己和自私的。利己的求生意志决定着人要永远互相争斗,人生就是战争,“人是自食的狼”。所谓美德,不过是美化了的利己主义。此外他还认为知识不像黑格尔所说是自由之本,而是苦难之源。性在他看来也是一种万恶的买卖,因为生男生女只会为苦难提供新的牺牲品,而女人在这方面更是蓄意的。所以叔本华的哲学描绘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前景。他认为,人要摆脱痛苦和罪恶、享受幸福,就必须否定意志、压制欲望。人可以通过哲学沉思和艺术鉴赏来得到暂时的解脱。而恻隐之心则可以通过对整个人类意志的认同来取得。但最终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佛教教义的琢磨和到佛教当中去修炼,才能获取解除苦难的答案。因为让我们饱受苦难的是意志,只有让意志麻醉才能得到解脱,而佛教中的涅槃或四大皆空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的这个观点使得他的哲学带有一些神秘主义色彩,引导人们通过修身养性、克制情欲来防止意志可能对人们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完全相对立,强调意志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哲学家,包括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但叔本华的神秘主义则为主流哲学之外的问题了。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后来为许多现代派文学家与艺术家所接受,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基础之一。

7. 尼采的哲学思想

叔本华的哲学带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的遁世观念。尼采的观念则不一样,似乎比较入世,就是说它在对待人生和现实的态度上面更为积极主动。

弗里德利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祖辈连续 7 代都是牧师,他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牧师之家。他 4 岁丧父,从此便和母亲、祖母、姑妈和妹妹一道生活。虽然他的出身和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从小就似乎对宗教没有什么好感。先是不愿参加家中的祷告仪式,后来在大学里又不愿念神学,情愿去攻读枯燥无味的古典语言学。他先后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就读,以他在这个领域里的才华赢得他的导师李契尔的赏识和推荐,他因此在 24 岁时便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由于健康原因,加之学校里同事的闲言碎语,他在 1879 年辞去了教授职务而专门从事著述。从 40 岁开始他的身体状况就似乎越来越糟糕,先是患了精神分裂症,以后又为一匹马撞倒,导致头部受伤,基本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其生活由其母亲和妹妹照看,直至去世。

1) 对 20 世纪哲学、文化、艺术和文学的影响

他的思想对 20 世纪的哲学、文化、艺术和文学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冲创意志》和《善恶之外》等。

他的第一本著作《悲剧的起源》提出了把希腊精神区别为阿波罗式心态和狄俄尼索斯心态的观点。他认为,前者代表了晴朗、平和的特点,抵消了后者代表的阴郁激情。希腊悲剧可以看成是狄俄尼索斯所渴望的阿波罗精神的升华。这个观点类似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但并不完全相同。他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悲剧看成是

感情的净化,而认为悲剧是木然地接受生活。他像叔本华那样承认意志是人生中最重要因素,但不是万恶之源,而是一个人从善的卓越特性。

这个观点在他的《善恶之外》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本论述伦理学基础的书里,他把人和道德区分为两种类型,即主人和奴隶。主人道德包括独立、慷慨、自信、勇敢、真诚这样一些品质。虽然这部分人也有弱点,例如也会猥琐、萎靡,缺少朝气,但他们总的来说积极进取,勇于创造。奴隶道德主要是指那些乐天知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他们也可能勤劳节俭、勇于吃苦,但他们在对待人生态度上,却是怯懦、畏缩和虚伪。不难看出尼采是在通过对奴隶道德的批判,造就一种健全、坚强、独立、进取和真诚的人格类型。他认为能否造就这样的“主人”类型的人、这种人能否处于社会的支配地位,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但他的道德学说带有明显的偏颇,对奴隶道德的批判既有否定旧传统、旧道德的积极作用,也有全盘否定人类道德的倾向,如他对同情的批判,一概否定,不分真诚的同情还是虚假的同情,未免以偏概全,因噎废食。

在尼采的著作当中,最著名的还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运用诗语言写的哲学著作既深沉玄奥,又活泼清新,是他哲学观念和人生价值的一次展现和称颂,是了解他的生命哲学和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来源。他曾经这样表达他对此书的看法:“在我的著作中,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本书,声音响彻千古,它不仅是世界上最高迈的书,山顶雄风最真实的书...而且也是最深邃的书。”^①

书的开头描述查拉图斯特拉离开家乡,隐居山林。10年之后独自下山,准备传教,途中遇见一位圣人,经过交谈他宣布上帝的死亡和超人的诞生。接着通过背死尸的经历他领悟到要寻找“共

① 转引自《悲剧哲学家尼采》,37页,陈鼓应,三联书店,1994年。

同的创造者”。前言之后共有四个部分,均由警句组成。首先他提出要推翻一切堕落的东西,包括上帝,道德和基督教。他声称“道德在于他们使人谦卑与驯服,使狼化为犬”;他们只是想借他们的道德挖刮其仇敌之眼,他们高举自己,仅仅是为了压低别人”。一方面他鼓吹查拉图斯特拉的思想如同一阵狂澜卷走了陈腐的道德,另一方面他又断言他的思想又创建了一种新的“坚强者的道德”,一种反基督教传统的道德。他认为,人应当具有道德勇气。但由于受到陈旧的宗教文化和奴性十足的道德观念支配,逐渐失去了这种勇气,而变得日趋软弱。“凡是柔软的种性,凡是生于奴隶的种性,如今都成为一切人类命运的主人了...市场上满是叽叽喳喳的小丑——群众称颂他们为伟大的人!这些人便成为时代的主人。时代压迫着他们,于是他们便转而压迫着你们。...有谁必须在善与恶之间成为创造者,诚然,他必先成为毁灭者,破坏价值。由是,至恶也属于至善,但这是创造的善。让一切东西破碎吧,还有许多屋子得盖起来。”^①在这里尼采试图向传统的价值观念挑战,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价值体系,用勇敢者的道德观念代替懦弱者的道德观念,用充满生命力的超人代替虚幻的上帝。张扬生命的意义和尊严,恢复人的价值和能耐。

2) 对 will to power 的理解和解释

尼采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 will to power 的理解和解释。有人将 power 当成权力,实际上这有背尼采的原意。尼采对于权力一向反感,早在他的第一部书《悲剧的诞生》里他就称“权势是邪恶的”。Power 在这里指的是 creative power(创造力),而不是 worldly power(权势),所以根据陈鼓应先生的意见,will to power 应译成“冲创力”较妥。尼采在《自我超越》中这样提到它:“凡是我

^① 转引自《悲剧哲学家尼采》44—45页,陈鼓应,三联书店,1994年。

发现有生物之处,我便发现冲创意志,……凡有生命之处,就有意志:但不是生存的意志,而是——冲创的意志”。后来他又进一步论述了冲创意志的含义:“生命,存在中最好说明的形式,是蓄积冲创的意志——每件事物的目的,不在于保守而在于成长壮大。…生命本质上是追求更多的力量,所有最基本最深沉的事物都是这种意志。”^①由此说来冲创意志可以视为尼采哲学当中有关生命和生命力最富有表现力的一个概念,也是他对生命意志力追求的一种表现。

3) 主要社会思想影响

一般认为尼采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对20世纪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 首先他从基督教信仰已经衰亡(“上帝死了”)这样一个事实得出结论,认为一切传统价值观念也将随之崩溃。在他的时代许多人都把他的当危言耸听,可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的话的正确性,他们都在谈论“现代人的无家可归”。价值的真空意味着人们失去了从前似乎明白的道理,于是人生的荒谬性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学探讨的一项重要内容。价值真空还意味着人生没有什么超验的约束,人生的自由和人性的开放也成为西方哲学与文学探讨的重要课题。他批判柏拉图的理念主义,也批判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科学主义、文化庸俗主义,这些批判都开了现代价值观的先河。

② 从旧价值观的崩溃里,尼采得出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结论。他强调每个人都必须独立地为自己创造价值,提倡个人至上,自我实现。虽然他没有用“异化”这个词,但他已经揭示了个性的丧失和自我的失落。现代西方人所谈论的“无名无姓”的人,都可

^① 转引自《悲剧哲学家尼采》,91—93页,陈鼓应,三联书店,1994年。

以追溯到尼采的价值观念。

③ 尼采是最早揭示科学理性局限的人之一。他第一个明确地剖析和描述了人的心理领域里的情形。在他之前虽也有人作过类似的尝试,但无人像他这样具体和透彻。遍布西方文化各个领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如现代派文学、艺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哲学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

④ 尼采也是现代西方人生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明确提出了哲学要以探求人生意义为目的。他对人性的看法以人的超越性为基调,富有现代性。尼采思想形成的主要契机是他对人的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人类未来前景的关心。他认为伦理是颓废的征象,现代文明的最大弊病就是颓废。与此同时,他对现代文明的商业化、科学化、非理性化、非精神化的倾向也多有揭露。他提出了“超人说”来表达他对现代人通过自我超越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即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大大超过现代人的优秀人种。

我国知识界前辈,如梁启超、鲁迅、王国维、陈独秀等人,很久以前就先后介绍过尼采的思想。他们所倡导的思想解放,振兴民族性和个性的观念实际上均受到尼采很大影响。例如鲁迅对于“国民劣根性”的看法和他就有不谋而合之处。

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最早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的配第曾经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到过商品、价值和价格等经济现象,但并未作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和分析。真正创立政治经济学的还是在他去世后多年才诞生的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全名为《论国家财富的本质和起因》)里,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商业主义的理论和原则。商业主义主张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以便为个人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不去考虑国家利益。但是亚当·斯密却认为个人和国家利益均应全盘考虑,工商业不应由政

府控制,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这样做的结果对个人和国家都有利。自由企业制度实际上就是由他创立的。在他之后的大卫·李嘉图补充和完善了他的理论,尤其是在商品价值和劳动力耗费成本的关系,商品价格和商品供求关系上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对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税收的原则》里对于国民收入的分配理论作了详尽的研究,提出如果某个阶级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获得较大的份额,就一定意味着另一个阶级的收入被减少了这样一个著名论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后世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从他们的理论当中获得了不少营养。除了他们两人,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人也在理论和实践当中从不同的方面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对这几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作些介绍。

1.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科卡尔第。这是个人口只有一千来人的小镇,离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不远,经济繁荣,设有海关。他的父亲就是海关的主管会计。他在当地读了几年书,由于天资聪明,14岁就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受到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哈奇生的很大影响。17岁大学毕业之后又进了牛津继续攻读哲学。虽然在那里没有碰到什么好老师,却让他培养了自学能力,有机会读到大量的哲学著作。6年的牛津研读帮他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回到爱丁堡之后他开设了一系列讲座,内容宽泛,从修辞到哲学到历史,深受各方好评。几年之后他便担任了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一年后又转任更为重要的道德哲学(伦理学)教授,使得他有机会研究经济学。

从此以后,亚当·斯密进入了他的治学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他

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感论》论述了人性的原则,把它视作社会习俗和社会行为形成的永恒前提。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人对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包括自己的行为在内,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源出于何处。他的答案是人的内心里有一种公正的旁观机制,负责对别人和自己的行为表示赞同或是指责。一方面人类受到自己的情感驱使,根据本能作出判断;另一方面又依照他们的理性和同情心加以调节。这本书的主题可以看做是对人社会化,面向市场经济,形成阶级的这一趋势所做的道德解释。

他的另一本书《国富论》则对经济制度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人类社会经历的四个阶段,即原始社会狩猎时期,游牧农业时期,封建庄园农业时期以及最后商业互相依赖时期。这些不同的阶段都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狩猎时期几乎没有什么财产,也就没有建立什么正规的治安或者司法管理。到了游牧时期社会组织形式要复杂得多。不仅有了人数众多的军队,还有了由法律和秩序为支撑,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社会机构。他认识到这些社会组织是用来保护特权的,而不是用来表现公正的自然法则的。他描述了社会从封建阶段向更高阶段的进化。社会在商业互相依赖新阶段要求有新的组织形式,例如工资要由市场,而不是行会来确定的体制,企业要有自己的管理自由,而不是由政府来控制,也就是允许企业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等。

此外,他还对社会进行了划分,将人分成了三个阶级,即劳动者,地主和制造商。这种划分对应着他所谓的人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人的情感,一方面是人的理性和同情心。由于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种改善自己生活条件,获取更多利益的愿望,竞争势在必行。社会组织作为无形的手可以通过商品价格,生产成本的自然调节来影响这种竞争。他根据分配所得的不同形式:工资、租金和利润

确定了这三个不同阶级。同时他又指出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竞争体制的完善,而竞争体制又取决于国家是否允许特权的干预。这些观点构成了他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框架,建立了他所谓的自然自由经济体制,对当时和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影响很大。

2.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

虽然亚当·斯密已经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概念,建构了这门学科的框架,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础,但是使得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经典学科,带有系统性和权威性的还是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出生于一个荷兰籍的犹太人家庭。父亲靠在伦敦股票市场的炒作发了一笔财,李嘉图在14岁时就跟在父亲后面参与股票买卖,如鱼得水,深得其中奥秘。以后他在宗教信仰上面和父亲闹翻,索性斥资单干,凭着悟性和机灵居然也有不少收获,在股市上赢得了某位有名金融家的青睐和支持,短短几年之间就建立了相当的资产。他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除了股票,也喜欢文学和数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立即被其论述所吸引。在以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潜心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开始著书立说。

他的研究和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联系较为密切。他的第一部书是《金银的高价:货币贬值的证据》。它针对当时英国由于和法国的战争而禁止兑换黄金的作法,提出货币量和价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价格水平反过来又影响汇率和黄金的进出。银行作为国家黄金的托管部门,其借贷政策必须根据总的经济形势制定,控制钱币和信贷的发行量。后来局势的发展证实了李嘉图的论断,由议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经过调查,要求废除《银行限制法》。另一件事情是《谷物法》引起的。当时的英国国会出于对英国谷物价格下降的关心,通过了一项提高进口小麦关税的决议,结

果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李嘉图据此写了一篇《论低价谷物对股票利润的影响》,指出提高粮食关税有可能提高地主的租钱,而减少制造商的利润。

他在股市上经历了几十年的搏杀之后急流勇退,40岁以后改行从政,进了议会,积极宣传他的贸易自由的主张,写出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和税收的原理》。该书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原理作了分析,指出社会里存在着三个阶级,即地主阶级、劳动者和资本家。同时又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还把租金从生产成本里去掉了。他认为,利润完全不同于工资,利润随着必需费用的浮动而浮动。他还认为,租金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只要耕种费用有一点增加,租金都会提高。他担心人口增长过快,抑制了工资的增加,如果耕种面积增加,利润倒会减少,资本形成便会受到影响。他声称,国际贸易不是由相关生产成本决定的,而是由不同的内部价格结构决定的,这些结构反映了贸易国之间相对而言的长处,进行交换所得到的益处。他对钱的问题,尤其是税收的问题谈得很多。虽然有些观点参照了亚当·斯密的著作,但他研究的范围要具体得多。由于身体不太好,他的政治生涯和学术生涯都不是很长。他在50岁时就退出了议会,第二年就与世长辞了。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在他生前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即使在他身后也广受好评,被尊为英国主要的经济学家。在他手里,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科。他的主要经济思想,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不干预主义思想对后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无论是赞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还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都从他的经济思想当中获益匪浅。

3.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托马斯·马尔萨斯,以

他的人口论闻名于世。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其父深受卢梭思想影响,试图用卢梭的教育思想来培养小马尔萨斯,致使他在进大学之前一直在家接受教育。他进剑桥耶稣学院后学了不少课程,尤以拉丁和希腊文为佳。后来他受到法国革命和一些激进思想家的影响,相信人类不要法律和社会组织也可以过上富裕和和谐的生活。但他不像他们那样仅仅从理论上进行论述,而是结合社会实际,尤其联系英国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他在1798年匿名出版的专著《人口原理》是这一探讨的具体结果。他在这本书里首次提出人类追求幸福的愿望是徒劳的,因为人口的增长要远远超过生产发展的速度。人口的发展如果不加以节制,将会呈几何级数增加,而人类的生活资料只会呈算术级数增加。总有一天人口的发展将会达到生产发展的极限而无法再继续发展下去,饥荒、战争、疾病乃至邪恶、悲伤和自我克制都将阻止人口的增长。他是个悲观主义者,把贫穷看成是人类难以逃脱的命运。虽然他的这本书后来再版多次,他也增添了不少具体材料,但是从现代观点来看还是有些不足。首先是缺少严格的统计学方法,没有对搜集来的资料进行详尽、科学的处理和分析,这样未免有些以偏概全,看问题不够全面和精确。其次,由于他在材料处理上面的问题,立论也就不够科学和完整,他的推理也因此显得有些逻辑性不够强。尽管如此,他的人口论对当时的经济学理论还是有相当影响的。它有助于减少当时对人类前途的一些盲目乐观情绪,也阻止了一些传统的慈善活动形式。例如人们曾经认为人口的增加会使国家财富增加,另外有关贫穷的法律规定人口多的家庭会得到国家或者社会的慈善捐助。这些通行的作法和观念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出现后都有了很大改变。

除了人口论以外,马尔萨斯还写了些其他经济著作,例如他的《政治经济学实际应用原理》。在这本书里,他提议应在公共设施

和个人娱乐领域里进行投资,以便减轻经济弊病。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繁荣。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勤俭节约的方法可以用来无限制地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他说恰恰相反,过分强调节约反而会对生产产生副作用,使得生产失去原动力。为了让一个国家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就必须在生产力和消费意愿两方面取得一种平衡。事实上他一直关心经济过热的问题,这个问题和现代社会的经济萧条一脉相承,应该说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对后世经济学有着重要影响。

马尔萨斯由于人口论而一举成名,将近 40 岁的时候当上了地处英国东南部哈福德郡的东印度公司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从此以后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那里,一直在那边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到了晚年,各种荣誉接踵而至,皇家协会、皇家文学学会、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德国柏林皇家协会纷纷吸收他为他们的成员。

4. 约翰·穆勒(John Mill, 1806—1873)

约翰·穆勒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穆勒多才多艺,既是哲学家,以其功利主义哲学闻名于世,也是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还是个著名社会人士,写有不少议论时政利弊得失的政论文章。

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两本专著,一本是《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未解决问题》,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前者主要针对当时社会经济领域里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国际贸易盈余的分配问题,生产当中消费的影响问题,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界定问题,利润和工资之间的确切关系问题等。这本书里他主要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论证李嘉图的一些观点和立场,没有多少自己的真知灼见。但在第二本书里,他的创新精神和独立的见解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在书里提议创建

农民所有制办法,作为一种补救措施解决爱尔兰当时存在的混乱和令人担心的局面。他认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样重要,不能分开。财产问题是在原始社会里产生的,起到过重要的安定作用,但是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已经没有必要把财产问题看得如此神圣。他认为,比较起来分配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他将分配问题和生产问题作了区分,对当时的分配制度提出了批评和改革建议。他认为,当时的劳工阶级正生活在一种低劣和悲惨的生存空间里,他们经常饥寒交迫,受冻挨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和解决办法,而是建议考虑重新加固社会基础的问题。应该说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具有相当的政治敏锐性,对社会改良有一定的贡献。

四、法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1. 创立初期

启蒙运动之前就有人提出过科学社会主义,例如英国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他用拉丁文写过一本书,叫做《乌托邦》,描述了一个非基督教的理想社会,里面的居民都是些哲学家,在共和制社会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能够勾画出社会蓝图,并试图从理论上表达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思想、超脱资产阶级视野的,还是启蒙运动时期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并驾齐驱的一些思想激进派,其代表人物是梅叶和摩莱里。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梅叶的思想。

梅叶(Jean Meslier,1664—1729)原为一名神甫,但他自己却并不相信宗教。他在他的代表作《遗书》里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称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一切骚乱、罪恶和不幸的根源。他认为,宗教只是一种谬误、错觉和欺骗,基督教不值得信仰,神并不存在,这只是统治者用来欺骗人的手段。他还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

的社会和不平等制度,并提出了自己的公有制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平等劳动和平等享受,把生产和消费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即共有财富上。虽然他的思想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不太成熟。但在他的那个时代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为以后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特别是对神学思想的彻底批判作了必要的准备。

2.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空想主义思想到了 19 世纪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Saint Simons, 1760—1825)、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

1) 历史条件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是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变化。在法国经由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新社会是对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的讽刺。“自由”、“平等”、“博爱”成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压迫平民,损人利己的幌子。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在英国,产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经济成果落到了资本家手里,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则日趋贫困,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但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开始暴露。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一种成熟的理论。如同恩格斯所说:“不成熟的理论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及不成熟的阶级状况是相适应的。”^① 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① 《反杜林论》256 页,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2 年。

2) 思想渊源和主要精神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机械唯物主义。他们根据所谓人的天性不变的前提,用理性主义看待社会,用数学方法推导出社会和伦理方面的原理,用理想主义的方法制定出所谓符合人天性的社会制度。例如他们都把人的天性当作他们理论的主要依据。傅立叶有关人的热情和情欲的分析;欧文则强调政府应首先了解人的天性,弄清所谓“人的天性基本原则”;而圣西门则断言他的哲学建立在人的天性概念上面。这些都说明他们的思想还没有离开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带有浓厚的英雄史观,乃至人性论思想。

为了证明他的社会理论,圣西门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叫做“万有引力哲学”。所谓万有引力哲学,就是用牛顿的万有引力观点解释世界上的发展变化,把“万有引力”看做是解释宇宙之间一切现象的灵丹妙药。他运用万有引力哲学力图分析人类社会,认为人类自从诞生开始经历了许多阶段,大致经过了五个发展时期。每个阶段都较之前一个阶段有所进步,也就是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他还认为每个社会制度都是相对的、历史的现象,不是不可改变的,也不是永恒的。但他把数学术语和人类发展阶段机械地联系起来(如列举十二项数列来论证人类智力发展的十二个阶段),显得有些可笑。尽管如此,他的一些思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他主张每一种制度既包含着以往社会发展的成果,又包含着未来社会发展的萌芽。他还列举出了较好社会制度的标准,即:

- ① 尽可能使得社会上的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
- ② 获得高级职位的机会取决于人们是否具有高尚品德,而不是他们的家庭出身;
- ③ 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抵御外敌;
- ④ 能够鼓励劳动,推动科学和文明的进步。

傅立叶和欧文也都有自己的社会哲学思想。例如傅立叶提出

了几种社会发展模式,欧文则相信“环境决定人的性格”。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思想合乎理性。合乎理性的社会没有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发现理性的天才,而他们自己就是这样的天才。他们找到了真理,制定出了合乎理性的计划。但他们的做法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分开,脱离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样的社会计划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

3) 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

① 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了比较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应该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他们的前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早期进行的残酷原始积累和封建制度产生的罪恶现象。但是三大空想家批判的矛头已经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指向了造成各种罪恶活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必然趋势。虽然他们的论证还缺乏理论的深度,但却不乏真知灼见,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们的学说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圣西门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游手好闲者是“真正的吸血鬼”,他们依靠“暴力和欺骗,雇佣军和警察”来维持统治,整个社会因此充满着专横、暴力、霸道和阴谋。^①

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贫困随着富裕而产生,随着生产的发

① 参见《西方社会思想史》454页,袁华音,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展而增长。雇佣劳动就是奴隶劳动,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复活的奴隶制”。欧文明确指出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无数灾祸的原因。”“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①

② 一些有见地的社会历史观念

这方面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贡献最大。圣西门首先试图找出历史规律,提出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指出每个阶段的社会都是从前一阶段的社会发展而来,都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进步。他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指出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未来社会应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此外他还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认为法国革命不仅是贵族和市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也是贵族、市民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一提法被恩格斯誉为极为天才的发现。此外傅立叶还制作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图表,说明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上升线和下降线。指出“任何社会在它本身主要特征的高峰时,它就达到了分娩的阵痛时期。”^②恩格斯认为这些有关社会历史的看法是傅立叶最伟大之处。

③ 有关未来社会的积极的设想

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提出了不少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构思了诸如“实业制度”、“协作制度”和“劳动公社”这样一些理念。另外圣西门认为“一切人都要劳动”,声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社会权力应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实际上这意味着国家的消亡。他还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前驱。

① 参见《西方社会思想史》454—455页,袁华音,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 同上 456页。

傅立叶提出了劳动权,称在新社会里劳动不再是一种谋生的痛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同时他还提出了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的思想。欧文则声称要消灭旧的分工制度和城乡对立的现象,要让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后来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用实验证明即使没有资本家,工人照样可以进行大工业生产。虽然他们的这些思想没有经过详尽的理论探讨,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还缺少实际经验的论证,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面实属不易,表现了他们惊人的创新才华和超前发展的思想,为以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准备。

3. 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局限

他们这几个人是马克思之前社会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着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最高成就。

他们的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要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如同恩格斯所说:“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确立起来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①

当然这三个大思想家也有其不足之处。这些缺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 宣扬“天才论”

他们以“永恒真理”、“永恒正义”和“永恒平等”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作为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把意识、理性、智慧当做历史发展和社会改造的推动力,难免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怪圈。这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00—30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做的结果使得他们无法深入研究和发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无法找到正确的社会变革方向,也不能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和历史地位,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天才人物身上,以为只要出现天才人物就可以发现和认识真理,使人类摆脱黑暗和痛苦,走向美好的社会主义。圣西门认为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天才,而他自己则是仅次于他的第二个天才。傅立叶认为自己将世界千年的愚昧化为乌有,俨然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这些言论说明了他们身上存在着严重的英雄史观和历史局限性。

② 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统治者身上

他们向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呼吁,希望拿破仑、路易十八、维多利亚女王和尼古拉一世等剥削阶级统治者赞同自己的主张,协助他们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结果是事与愿违,难以兑现。

③ 对人性抱有幻想,宣传阶级调和

他们相信人性的复归,以为人的本性一旦获得理性的指导,就会发挥巨大作用,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虽然他们意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他们更强调人的感化,不愿意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要的斗争方式,一再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是“非政治的社会主义”,宣扬非暴力的阶级调和,试图走和平改造道路。这在当时情况下似乎不大现实。

列宁指出他们的理想之所以成为空想,是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阶级统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①到了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当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迅速发展的时候,三大空想家们的信徒们公开站到工人运动的对立面,公开宣扬阶级合作,和以后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逐渐离开了政治斗争的主战场。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6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十章 19—20 世纪的西方社会概况和 现代主义文化运动

从 19 世纪后 30 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政治上资产阶级进一步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同时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殖民扩展,逐步树立了西方势力在世界范围里的优势;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其规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社会上各种阶级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化,特别表现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和危机方面。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标志着西方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和文学、艺术形式发生了重要的突破和令人瞩目的进展。

一、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概况

1. 资本主义工业和社会的空前发展

1) 机械化取代了手工劳动

产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 18—19 世纪开始形成,并迅速地从英国和意大利发展到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科学和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成果也被广泛地应用到了生产领域,

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总额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但是发展又是不平衡的,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和部分欧洲国家发展速度不是很快,而另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德国则很快。一方面一些产业革命开展较早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不仅巩固了其传统的工业领域成果,例如纺织和服装,而且进一步开辟和发展了一些新的工业项目,像电力和化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热力学、电磁学、化学和地质学开始与实际的机械工程及其他工业生产方法结合起来,加上电力工业所提供的崭新能源,大大推动了许多新的产业部门的发展。诸如采矿、建筑、冶金、农业、炼油、橡胶、水泥等部门都有了全新的面貌。一些新的产品,如自行车、电话、打字机、人造丝、充气胎和鞋类也都第一次成批和大量地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一时期,机器生产首次代替了手工操作,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得到了普遍运用,机械化已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生产特征。

2) 生产水平的的大幅度提高

工业生产不仅出现了质的飞跃,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从1870年到1900年,世界工业生产几乎增长了4倍,生铁产量从1225万吨增加到了3700多万吨,煤从2.2亿吨增加到约8亿吨。但一些老的工业国,如英国在这一时期增加速度只有1倍,占世界工业的比重从1870年的 $\frac{1}{3}$ 下降到1900年的 $\frac{1}{5}$ 。而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如美国和德国增加的速度则大大超过了那些老工业国。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起,德国则从20世纪初期开始都先后超过了英国的工业产量。

3) 海外扩张的加剧

随着工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欧洲诸工业国的海外投资也不断增加。英国从1855年的2亿镑增加到1907年的27亿,增加

了十几倍。法国慢一些,但也增加了 1 倍多。德国从一无所有开始了它的投资。与此同时,欧洲人大批地迁移海外。据统计,从 1870 年到 1900 年,总计有 2 100 万欧洲人移居到其他国家,其中半数去了美国,另外一半去了拉美、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其中一部分又回到了他们的原籍,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了他们的新居地,参加了当地的开发建设和工业化进程,促进了这些地方的发展和繁荣。从 19 世纪末开始,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阿根廷等国家开始向其他国家输出谷物、羊毛、肉类乃至矿物、石油、乳酪制品和水果等商品,加快了世界贸易的发展步伐。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也带到了这些殖民地。这段时期虽然由于在一些国家里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蓬勃兴起的外贸发展势头多少受到些影响,但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中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4) 大城市和大公司的出现

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人口迅速增长,这些增长的人口主要集中到了城市,城市数目有了空前的增加。德国在 1870 年时超过 10 万人口的城市不过 8 个,但到了 1900 年已经增加到了 41 个。这时的美国约有 1/3 的人住在城市或工业集中地,英国人口的 1/10 住在伦敦。一批 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已经出现,其中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莫斯科、纽约、芝加哥、费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东京、大阪和加尔各答等城市都已赶上了巴黎和伦敦的人口。

一些大型的垄断企业和金融公司此时也已开始形成,例如美国的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公司,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几家钢铁公司,德国的克虏伯、阿姆斯特朗等军火公司,瑞典的诺贝尔成立的第一个国际托拉斯——甘油炸药托拉斯公司等。

工会这时也普遍在西方工业国家中设立,工会会员也开始大

批增加,英国工会会员从1870年的100万增加到1900年的200万,德国从30万增加到85万,法国从5万增加到25万,美国从1900年的50万增加到1904年的150万。这个时候西方社会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为以后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 西方的政治形势

自从19世纪中叶意大利和德国先后统一以后,欧洲的政治版图基本上确定下来。几个主要的国家——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俄国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而美国和法国则都是资产阶级直接统治,这样资产阶级实际上已在政治上控制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领导权。

然而,这时候这些国家都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动荡和变化,19世纪后半叶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们包括美国的南北战争、日本的明治维新、普法战争、法兰西拿破仑三世的灭亡、西班牙的君主复辟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另外许多国家还经历了民族独立和反对外来侵略及独裁的斗争,例如巴尔干及东欧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古巴反对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等。

在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开始着手完善国家机器,推动科技及文化的进步,提高生产力,扩大对外贸易,加剧了互相之间的竞争。这时候虽然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议会,但它们大多数只是种象征和名义,对于行政部门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监督权力,从1870年开始的30年时间里,只有日本建立了一个新的议会,所有这些议会普遍都对政府无可奈何。即使美国这样议会力量比较强的国家里,由于总统权力的扩大以及最高法院的否决权,国会也只好退到从属地位,充当摆设。这样保守势力几乎在各个西方国家都咄咄逼人,而主张改革的自由主义似乎却在节节败退。这段时间里,虽然很多国家都修改了选举法,扩

大了选举范围,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有所改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似乎远非完善。但这时候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框架,无论是在资产阶级直接统治的国家里,还是在君主立宪、资产阶级掌握实权的国家里,都已按照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提出的模式,即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三权并立的方式初步组建。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纷纷登台亮相,议会民主正在形成当中。

在西方诸国当中,德国由于在普法战争后击败了法国,取得了统一,经济实力有了迅速的提高。到了 19 世纪末,它已超过了所有欧洲大陆国家,和英国并驾齐驱,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英国。如在 1900 年,德国钢产量达到了 740 万吨,超过了英国的 600 万吨。与此同时,德国的对外政策也有一种咄咄逼人的趋势,开始寻求在欧洲的霸权,引起了欧洲一些国家的担心,甚至是恐怖。

二、一些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流派

19 世纪后半叶既是社会生产力取得空前提高、科学技术取得空前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全面取得统治地位的时代,又是一个各种民族和社会矛盾空前加剧、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一些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流派和学说或取得了重要进展,或陆续问世,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乃至人类的思想面貌,它们包括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柏克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等。

1.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批判地吸收了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后,结合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深入研

究后创立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标志当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8 年 2 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但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却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完成的三卷本《资本论》。这部书为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运用提供了详尽的论证,阐述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学原则,首次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和揭穿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学说经过了恩格斯和第一、第二共产国际的努力,迅速在欧洲工人阶级内部传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列宁和他的战友们组织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着曲折和反复,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上存有一些分歧,也因此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的修正主义者,但无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为工人阶级和其他无产者反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统治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做了理论和思想准备,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机遇。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世界的发展是多样和多元的,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模式,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选择上面将面临着更多不同的观念,人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将会变得更加理智、冷静和实际。

2. 达尔文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达尔文学说对人类认识和掌握自然界规律也创造了一种新的途径。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出身于医生家庭,早年先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后又到剑桥大学攻读神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获得英国政府的资助,参加了官方组织的环球旅行,在 5 年时间里随船观看了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全面考察了物种起源问题,考察结束后先是发表了他的考察日记,后来又发表

了《物种起源》,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在这部书里根据他的考察结果推翻了那种认为各种动、植物各不相同、渊源不一的观念,提出了物竞天择的思想。他整理出了许多材料证明人和其他生物一样,也是通过自然选择,从早期比较简单的生物一步步衍变而来,认为人和现代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达尔文的思想包括这么几个部分:物种的变异性,种与种之间的继承性,也即不同物种可能有共同祖先,物种的变异通过自然选择让最适用于某种条件下生存的物种保存下去。

达尔文学说问世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特别遭到了教会的强烈反对。达尔文和他的学生们不得不为捍卫自己的学说而斗争。他的追随者托马斯·赫胥黎比起他的恩师来更加富有战斗精神。通过几十年的宣传和论战,他终于使得进化论思想成为人类生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达尔文的思想方向一致,具有同样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马克思甚至想把他的《资本论》第一卷献给达尔文,可是达尔文以他独有的审慎拒绝了他的好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所做的演说里宣称:“正像达尔文发现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①马克思和达尔文都发现了一条简单的运动和发展原则,找到了更好地理解整个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关键。两个假说都带有革命性,都猛烈冲击着有关人类和人生的传统观念,让人重新审视以前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两个学说都认为变化的起因是斗争——生存斗争和阶级斗争。

一些人面对当时欧洲激烈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试图把达尔文主义用于政治社会理论,出现了后来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其中赫伯特·斯宾塞是其主要的代表。他的《社会学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理》发表于 1872—1873 年间,提出“最大的善就是让社会进步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下去”。主张社会政治科学必须承认和采纳生物学的“普遍真理”,绝不能“由于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而违反自然选择的原理。他的观点受到了保守派和有钱人的欢迎。这些人认为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他们拿着很高的薪水,过着豪华的生活,对社会来说是合算的一笔交易。

达尔文主义后来受到很多人的歪曲和滥用,特别是为一些种族主义者利用,用来鼓吹种族优越论或作为歧视非白人种族的理论依据。也有人利用达尔文的“渐变必然”理论,鼓吹通过改良而不是暴力去实现社会的演变,例如英国的费边主义就是如此。

3. 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

1) 孔德的实证主义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留下了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革命激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启蒙思想中革命激情部分的一次实践,而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即尊重科学和反对神学的思想却以哲学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这种哲学流派之一就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孔德主张真理是由看得到的现象和经科学证明的事实代表的,这种哲学思想在一段时间里相当流行。

奥古斯德·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出生于法国的大学城蒙特毕里,其父是个政府公务员,信仰天主教。学生时代,孔德因参与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当局开除,因此而未能得到大学聘任,造成终生遗憾。他不得不靠当私人教师来维持生计,并不时受到朋友和崇拜者的接济。尽管如此,他的才华还是在创立实证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间显露出来。他在 26 岁时就出版了实证主义的第一个“摘要”,6 年以后他的代表作《实证主义教程》6 卷本出版。

他主张,认识必须从直接得之于经验的东西开始,而不必深入

到现象背后。这是实证哲学的由来。社会开始于神学阶段,经过形而上学阶段而达到他所谓的实证阶段,他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解释历史才能产生正当和幸福的结果。在第一阶段人类力求获得绝对知识,运用超自然的力量影响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在第二阶段人类运用一种拟人化的抽象,即形而上学的“本质”以及“自然力量”去解释,事实上也就是承认有可能获得客观本性的认识。他声称,实证阶段受到理性科学的支配。这就是他的发展三阶段论。这个理论主张所有科学领域都经历了这种三阶段的演化,其中唯一已经越过全部障碍的领域是数学。而在物理学科中,形而上学的概念还大量存在。他对所有学科都做了一次全面的分类,对它们的逻辑顺序进行了全面的安排: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学。

社会学是孔德根据休谟说的人的科学所创造的新名词。社会存在的实证阶段点燃了他的思想火花,但却带有乌托邦思想的缺陷。例如他在伦理上强调个人要为人类的进步抑制自己的欲求,而不承认有一种内省的心理。他将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种,提出建立社会的标准,但却反对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改造。

孔德的这些思想由他的学生伊波利特·泰纳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泰纳说:“有关人类的一切事实,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都有其原因,并受法则支配。因此一切人类的创造——艺术、宗教、哲学、文学以及道德的、政治的或社会的现象,都只不过是普遍由科学方法确定的结果。”为了证明他的见解,他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当代法国的起源》,开创了一种更为科学地研究历史资料的标准和方法。孔德的实证主义也对英国和意大利的思想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证主义陷入到繁琐的考证当中,将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走向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最终它失去了往日的力量,而逐渐为查尔斯·皮尔斯和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

义所代替。

2)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

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 ,1839—1914)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 ,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他本人除了在大学里讲过两次课以外 ,主要从事政府部门的测量工作 ,只是在业余时间撰写些哲学论著。虽然终生贫病交加 ,壮志难酬 ,却始终乐此不倦 ,锲而不舍。

皮尔斯的哲学思想在他生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他的一些观点经过其他人的研究和宣传才逐渐为人知晓。皮尔斯的一个重要理论是“ 错误难免论 ”。他认为 ,一个人探究真理是由于某种不满足或不安的结果 ,其目的是为了排除烦恼 ,达到一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一个人从来不知道新的证据是否能够改变他的立场 ,也不能担保是否要犯错误。这就是他的“ 错误难免论 ”。联系到这个理论 ,他说真理是一种见解 ,照此行事社会就会安定下来。从其表层意思来看 ,这个观点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假如我们都相信 $2 + 2 = 5$,又假如地球在此时毁灭 ,那么我们的错误就会延续下去。至于任何特殊真理的意义 ,皮尔斯坚持认为任何自称为真理的陈述都必须有实际的结果 ,这就是说它必须允许某个未来行动去证实它。

3) 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

皮尔斯的哲学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 ,实用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流派还要归功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詹姆斯是美国东部新英格兰人 ,长期担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他的《心理学原理》是心理学领域最有权威的论著之一 ,他也是实用主义哲学的领袖人物。他为人仁爱宽厚 ,有强烈的民主倾向 ,思想并不那么深邃 ,但在哲学上却有很大影响。

詹姆斯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一篇题为《实用主义》的论文

里。他认为,真理应由实际结果来确定,真理都是相对的。他还声称,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他把这种方法同经验主义的态度等同起来。作为一种方法,实用主义不规定任何具体的结果,而只规定一种探讨世界的途径。这种方法大致相当于说没有差异的区别毫无意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任何争论最终都不会得到解决。

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的观点使詹姆斯把科学理论看成是未来行动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对自然界问题最终可以接受的答案。为了确保一种理论的正确性,实用主义者坚持要审查理论里的每一个词,审查每个词的“现金价值”。实用主义关于真理的定义是这样下的:真理就是一种能够产生“有成效后果的”东西。杜威后来关于真理的工具性概念和这种说法基本一样。

这样实用主义就成了一种模棱两可、形而上学的学说了,皮尔斯之所以不愿意和它有牵连问题恐怕就在这里。这是因为很难一下子确定某种观点的后果以及这种后果的成效,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总有一些后果有成效,而有些后果没有成效。詹姆斯自己似乎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承认一个人有信仰的自由,因为他认为信仰可以增进他的幸福。但是一个信徒不是因为估计到信仰可以带给他幸福才去信仰的,恰恰相反,是由于先有了信仰,他才感觉到幸福。

4)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实用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他的祖籍是新英格兰地区,从小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虽然他从 1894 年起就在芝加哥大学当哲学教授,倒没有受到多少学院哲学派的约束。他的哲学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一些教育思想上。他主张,人的知识是从经验而不是从权威那里获取的,他还主张要把传统教育和职业培训结合起来。他认为,学习是根据必要性进行的,而不是一种机械式的操作,重要的是采取行动,而

不是仅仅停留在言辞上。他的理论里很大一部分是黑格尔的思想,把一些逻辑步骤看做是通向整体的工具。这种逻辑的工具性概念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辩证法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通向完整体系的工具。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对美国哲学,尤其是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多作用。他的学生很多,其中包括中国的胡适。胡适的一些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多少和杜威的思想影响有关。

4.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

1)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青年时代就读于巴黎师范学校,后在中学里长期任教,直至1900年才当上了大学教授,192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继承了卢梭开创的浪漫派非理性传统,对小心谨慎、不动感情的理性思维比较反感。他主张像实用主义者那样行动第一。

他的哲学一反19世纪的唯物和唯心的一元论思想,又回到了二元论上来,然而他所说的宇宙两部分不完全是早期的两元论思想。他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这两部分一边是活力(élan vital),而另一边则是物质,两者处于永恒的对立和冲突之中。在这里积极的生命冲动,试图克服惰性的东西,越过生命途中的种种障碍,从而推动宇宙的发展。尽管由于一定程度上的物质条件制约,生命之力依然保留了它行动自由的特点。柏格森不同意传统的进化论观点,认为这个理论阻碍了新事物的出现和进步,因为它限制或者损害了那种行动自由。柏格森的理论源于对艺术创作的模拟。他声称,如同艺术家受到创作冲动的影响进行创作活动一样,自然界里的生命力也会因为冲动而产生运动。对于人类来说,进化过程使得他们的智能能够超过本能,但这种超过是不幸的,因为智能有可能扼杀本能,从而剥夺他们的自由。同时,由于智能往

往把自己的概念框框强加于客观世界,因此常常歪曲了客观世界。这样,柏格森的学说就完全不同于那种认为智能是争取自由力量的理性主义观点。

在柏格森看来,本能的最高形式为直觉,它是直接对客观世界作出反应的某种精神活动。直觉可以如实地操纵经验而智能则歪曲经验。柏格森认为,智能的毛病是由于它只适用于具有不连续特性的物质世界。这个观点显然涉及到语言问题,因为语言在这里被当成了一种具有非连续性特征的概念。同时智能也无法理解基本上具备连续性的生命,而这些直觉则可以做到。柏格森认为,智能与直觉之间的差别相对于空间与时间的差别,对世界进行分析和分解的智能是用一种超时间、梦幻般的方式进行运作的,就是说智能是理论的,它以几何方式观察世界,对于客观世界来说,只有空间,没有时间。但是生命在时间中流逝,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正是在这里直觉介入了进来。虽然智能进行的空间解剖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解剖对理解生命却是一种障碍。柏格森把直觉的现实时间称之为“绵延”,然而到底是什么却不易说明。柏格森似乎将它当成了一种不加修饰的经验,和认识上的存在主义有些相似。

柏格森的哲学或许最好把它当成是一种经验的心理学,而不是逻辑学。实际上它和心理学理论的一致之处不少,特别是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间有很多联系。它是 20 世纪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派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影响。

2) 弗洛伊德的精神心理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原是奥地利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在行医的过程中他提出了精神分析理论。它的理论核心是“无意识心灵”的概念。精神分析说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着相互制约和不可分割的三个组

成部分。第一部分是精神病治疗及其理论,精神分析的许多概念产生于弗洛伊德从事医疗实践工作的精神病病理理论。他认为,正常人和非正常人并无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健康人身上也有些不健康的心理因素,而精神病人身上也有些健康的心理因素,健康人和精神病人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分析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第二部分是心理学。传统心理学将其对象和范围限定在人们所能意识到的心理过程之内,而弗洛伊德则认为人的心理是由各种成分组成的混合体。它不仅包括有意识的,而且包括无意识的。无意识乃是人的心理内更加广阔、更为原始的领域。于是对无意识的实质及其在人心理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所进行的揭示和说明便构成了精神分析说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和性本能冲动(libido)这两个基本概念。这部分内容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部分。

第三部分则是哲学。当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从非正常的精神病患者扩展到正常人时,这一理论的哲学倾向就显示了出来。当这一理论从单一的心理领域扩展到人的全部活动,延伸到人的社会、道德、宗教、科学、艺术、文学等文化活动,并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人类活动的普遍性时,它的哲学性质也就表现了出来。

无意识学说是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他称之为“深层心理学”。他认为,人的无意识领域犹如冰山下面部分,范围极大,隐藏着大量的本能冲动和被压抑的欲望。这些东西从根本上来说不能见容于社会风俗、道德、禁忌和法律制度。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后来他又引进了三个概念,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以便解释无意识领域里的冲突。“本我”是指与生俱来的人的本能,例如性本能、生的欲望、死的惧怕、追求快乐的要求等。超我则是道德、法律原则的约束。“自我”指的是无意识领域

中的部分；“本我”在外界刺激和影响下，出于保护的需要，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组织，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起到一种缓冲和调解的作用，用来接受或抵制外部刺激。这部分功能称之为“自我”。它主要由理性支配，但有时也会受到本能的影响。

弗洛伊德本人喜欢艺术和文学，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文学的鉴赏能力。他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都有研究，并有独自的见解。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理论建立后不久便应用到文学艺术的批评上去了。弗洛伊德学说开始形成时只有他一人孤军奋战，后来这个理论逐渐为人所了解，并在 1910 年召开了纽伦堡大会。该会标志着他的学说正式成立，并为世人所接受。但也就从这时起，他以前的一些追随者和他产生了分歧，精神分析派开始分裂成了几个学派。首先是容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和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对他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修正。容格不同意他把里比多仅仅归为性本能，把无意识看成是个人的心理意识。他认为，里比多可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和先天的生命力，既包括性本能、营养和生长本能乃至人的整个原始动机。他还认为，无意识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是集体的，并且集体的无意识更加基本和原始。这样，容格提出并建立了他的分析心理学。阿德勒同样如此。他认为，人的行为不是由生物学本能力量决定的。人行为动机的原始基础也不是性因素，而是由于身体缺陷造成的自卑感以及追求权力的欲望、优越感，它们才是人类活动的内驱力。这些观点构成了他的个体心理学的基础。

弗洛伊德学说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霍妮（Horney）、沙利文（Sullivan）和弗洛姆（Fromm）。他们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一步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方向引向了社会学领域。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这些新观点的出现表明了弗洛伊德主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符合西方社会多元文化的特点，对弗洛伊

德学说的传播未免是坏事。弗洛伊德的学说因此也进一步延伸到其他领域,成为 20 世纪运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也是对现代派文学和艺术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

5. 存在主义的发展

存在主义的先驱和创始人是丹麦的克尔恺郭尔(Seren Aaby Kierkegaard, 1813—1855)。他在 19 世纪上半叶曾一度到德国学习,对当时影响很大的黑格尔哲学不很满意,认为它过于抽象和枯燥。作为一种补充,他觉得哲学应当注入一些个人的情感。他针对德国哲学过于看重理性的倾向,提出把意志放在理性之前,认为对人不应太强调科学原则。他觉得科学讨论的东西是普遍的原则,只能从外部去接触事物,但如果对人也用科学的方式便会忽略真正重要的东西,所以人的感受只有用“存在”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克尔恺郭尔的思想在他生前影响并不大,但在他过世 50 年之后,由于贾斯柏、海德格尔以及萨特等人的提倡和补充,它成为 20 世纪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

贾斯柏(Karl Jaspers, 1883—1969)对存在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种新的不同概念。首先是“存在于那里的”客观世界,包括所有的科学领域,这种存在不能导致正确的认识。其次是“我存在”,即个人存在。个人存在于其本身当中,有一种不确定的潜力蕴藏。第三是“超越存在”。“我”使其本身与一个第三种存在协调起来,即一种包括前两种在内的“存在于本身”。他的这三种存在说明了人的认识是辩证发展的,也说明了理性是难以超越的。他还认为,哲学是个人在超越中的奋斗,个人的道德生活则是个人存在层面上的运作。可以说如果“存在于那里”的层面受到理性支配,“我存在”的领域却受到精神状态的控制。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敢于进取和超越,他的哲学因此又叫超越存在主义,有一定进步意义。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是另一位存在主义

的代表人物。他宣称,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个人存在的方式和情态的分析,来揭示一般存在的意义和本质。他主要关心个人内在的非理性情绪,关心人同周围世界、同他人、同自己的道德实践关系。他认为,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是一种“沉沦”,其思想、行为和感情都受到社会的法律、风俗和传统道德规范的支配,从而失去了自由,忘却了自己的责任。这种存在是一种非真实的存在。海德格尔声称,人的真实存在是个人在面临种种选择时对自己的自由选择,人身上固有的一种神秘情绪——畏惧,这是达到真实存在、恢复其本来自我的动因。畏惧指的是对虚无和死亡的惧怕,它能唤起人的良心和道德心。他断言,良心是内在的,先天固有的,能够让人记住自己的责任,以免丧失自己的真实存在。他的思想对萨特和新教神学具有很大影响。代表作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言》等。

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萨特曾跟随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学过哲学。他抛弃了克尔恺郭尔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继承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经过对过去哲学的修正补充,形成了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萨特哲学的影响很大,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下面对他的主要观点作些简单介绍:

他认为,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是“存在先于本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再给自己下定义”。^①所以人的“存在”在先,而“本质”在后。也就是“自我”先于本质,人的“自我”决定自己的本质。

存在主义的第二个原则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他认为,人各有思想,各有意志,每个人都有他的“主观性”。在这个“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和人之间必然是心怀鬼胎,勾心斗

^①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载《外国文艺》,121页,1980年5期。

角,为了自己切身利益不惜犯下各种丑恶的罪行。每个人和集团都为了自身利益联合一方去对付另一方。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攻击敌人常常伤了朋友,而帮助好人又常使坏人受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理性、主宰。人在生活当中到处碰到障碍、限制和不幸。每个人都是荒谬和冷酷环境当中一个痛苦和孤独的人。

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第三个基本原则是“自由选择”。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个人自由,都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环境“自由选择”自己的行动。如果一个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而是根据别人的意志办事,就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自我”。这种人就不是真正的存在,或者他自己就没有真正存在过。萨特专门写过一本《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书来论述这个问题。他声称,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的时候也为所有的人作出了选择,选择固然是自己的,但必须是慎重的,要对后果“承担责任”。他说:“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我们总是选择更好的”。^①实际上一个人不可能既为自己,又为所有的人。他认为,人既不可能接受“自身以外的命令”,也不可能接受“自身以外的辩护”;“人注定是自由的”。由此不难看出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是存在主义的理论核心。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有其积极的一面,这就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他要求恢复失去了的人的价值,要求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的金钱关系中的人来说,这种要求带有人道主义的意义,也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不合理及其腐朽和没落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萨特用自我存在的观念,或者说人性论的观念去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过分强调了个人的绝对自由,忽视或有意避开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如愿,只能将人引向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深渊。难怪有人感到奉行存在主

^①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载《外国文艺》,123页,1980年5期。

义哲学犹如置身于没有星光的黑夜,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永远没有光明,随时会跌进万丈深渊。

存在主义哲学对文学创作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在二次大战后产生了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文学流派。这个流派在法国文坛统治了 10 年之久,是战后法国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存在主义文学主要反映在小说和戏剧上,代表人物除了萨特以外,还有阿·加缪、西·博瓦尔、莫·布朗肖等。同时,存在主义哲学对其他一些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和“垮掉的一代”等流派也都有一定影响。

三、现代主义文艺运动

1. 界定和渊源

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虽然在 19 世纪下半叶已见其端倪,如波德莱尔诗歌及早期象征主义,但作为一个运动,一般从本世纪一次大战前后算起。较早出现的是以法国为中心的象征主义、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主义以及英美为中心的意象主义等。以后,又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等流派产生。二次大战以后还出现了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新的派别。对于现代派的界定,西方评论界一直莫衷一是:有的评论家认为中世纪以来,也即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学艺术均为现代派;有的则用作品和作家是否有朝气和生命力来作为判断标志;还有的则从社会学角度去界定现代派,认为西方的主要矛盾是文化价值观念与发挥技术、经济效率的必要性之间的对立,这是西方将来不得不经受的一场考验,促使文化思想上这种变化的是独立的反资产阶级艺术,即所谓的现代派艺术,更为一般人所接受的界定是美国的《现代文学杂志》主编莫莱斯·比伯提出的。他认为倘若不谈年代,仅从内容来看,现代派包含两个极端和

一条中间路线。一个极端是指重建宗教信仰,另一个极端是指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所进行辩解。中间路线则是指摇摆于信仰和困惑、相信和怀疑之间的思想危机,共同特征就是冲破传统表现手法,诉诸于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段,大大增强了文艺作品的效果。^①

现代派运动的高潮出现在本世纪20年代,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渊源。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上由于各种利益的冲突而造成了互相之间的尖锐矛盾,思想上则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一些思想和哲学流派,如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生存竞争和自由选择的达尔文主义,声称“个人意志”和“冲创意志”的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宣传本能意识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

2. 现代主义文学流派

现代派文学相当复杂,不仅流派繁多,对待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态度也并非完全相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文学界普遍产生了一种精神空虚、生活苦闷、没有欢乐、悲观失望的氛围。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创作的注意力放到了用非理性方式表达对社会不满和人性的揭示上面,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意象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象征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其代表人物否认理性认识和逻辑思维的意义,认为人可以借助神秘的直觉能力,透过外界具体、平凡的现象来洞察超物质和绝对的意象。他们主张艺术家应摒弃周围的现实,凭着直觉能力臆造出不可捉摸的理想美和抽象的意象,其基调总是痛苦、绝望和哀伤。最常见的主题是死亡,经常描写的景物是黄昏、秋天、落叶、坟

^① 参见《西方现代派文学参考资料》,章俗(编)8页,黑龙江社科院,1984年。

地钟声和燃尽的蜡烛等。

象征主义的先驱当推法国的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 1821—1867)。他的《恶之花》被普遍认为是象征主义的滥觞之作。他去世 20 年之后 ,在巴黎出现了一个象征主义的热潮 ,首先是诗人让·莫里阿斯在 1886 年正式著文 ,在《费加罗报》上面亮出了象征主义旗号。许多年轻诗人积极响应 ,竞相办创诗刊 ,模仿波德莱尔的诗风 ,其代表人物有魏尔伦(Paul Verlaine , 1844—1896) 韩波(Arthur Rimbaud , 1854—1891) 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 1842—1898)等人。他们注重诗歌的形式和音乐美 ,强调朦胧的诗意 ,对后来的诗歌有很大影响。

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包括美国的艾略特(T. S. Eliot , 1888—1965) 英国的叶芝(W. B. Yeats , 1865—1939) 奥地利的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 1875—1926) 法国的瓦莱里(Paul Valery , 1871—1945)等人。他们声称 ,真实不在现实生活之中 ,而在人的主观世界 ,诗人不应直接描写外在事物 ,而应寻找所谓的“ 客观对应物 ” ,用象征的手法来揭示人内心世界的情绪。象征主义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喜欢用各种宗教象征 ,例如基督教的十字架、洗礼和圣餐仪式等 ,其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对整个现代派文学和西方文坛都有极大影响 ,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

未来主义最初诞生于意大利 ,以尼采哲学为其思想基础 ,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冲创意志 ,创始人为马利奈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 1876—1944)。他在 1909 年发表《未来主义宣言》 ,后又通过办刊物和组织活动推动了未来主义的发展 ,使之成为一个很有声势的运动 ,不仅从文学扩大到戏剧和绘画 ,而且从意大利波及到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等国家 ,以在俄国的影响最大。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前期作品里就明显看到未来主义的特征。未来主义提倡一种“ 现代精神 ”。所谓“ 现代精神 ”就是都市化和工业化

以及高速度发展。他们宣称,人类以往的文学艺术都已过时,应当予以摧毁。他们后来在政治上追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否定过去的一切文化遗产,歌颂现代大都市生活和资产阶级的机器文明。在艺术上,他们鼓吹形式主义,主张摧毁文字形象和语言句法,用数字符号来创造一种特殊的“电报密码式文体”,称这种文体为“未来的艺术”。当然他们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创新的,例如阿波里奈的楼梯式诗歌,马雅可夫斯基的立体式(先是台阶式,后是楼梯式)诗歌格式。

意象主义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及法国的象征主义有关。他们认为,意象就是直觉语言的本质,艺术家的任务就是通过直觉捕捉生活中的意象。这些观点最初由英国人休姆提出,后经过庞德和艾略特的发展而成为一种新古典主义,即一种复杂立体的文体,更加晦涩难懂。由于它对语言和意象的把握要求很高,一次大战以后,庞德和其他意象派作家基本上就已停止该派诗歌的创作了。

现代派文艺的中心是表现现代社会的危机和人的异化,表现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流派和手法。它在20世纪初产生于德国,在一次大战前后曾经影响过很多国家。它最初是从绘画界开始的。1911年德国艺术杂志《狂飙》首次使用“表现主义”来称呼一个与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相对立的画派。这个画派反对模拟自然或再现外在世界的印象,而主张突破事物的表象,表现内在世界的本质。几乎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出现了一批表现主义作家,他们的先驱者当推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

表现主义作家受到各种哲学思想的影响,既有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也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乃至马克思的阶级论。他们往往破坏匀称、协调的传统美学原则,经常使用夸张、幻想、漫画、梦幻等表现手法扭曲事物的表象,突出内在本质。表现主义戏剧是最有成就的领域,其代表人物包括史特恩海姆、哈森克

莱维尔、温鲁、凯撒和托勒等人,但更具代表性的还是奥尼尔(Eugene O'Neill, 1888—1953)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他们的戏剧经常采用梦幻、面具、怪诞的形式,用舞台上的外在视觉或听觉形象配合人物的独白来表现他的精神状态,把人物的内心活动改变成舞台形象。剧情离奇,没有清晰的逻辑关系,语言近于梦呓。如奥尼尔的《毛猿》、《琼斯皇》、《悲悼》,布莱希特的《伽里略》和《母亲的勇气》。表现主义对小说的创作影响也很大,其代表人物是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异常孤独,在残酷而没有人性的环境下进行着无望的挣扎,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无情、人生的荒诞和没有意义。他的《变形记》、《城堡》和《审判》等作品体现了 20 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对许多德语作家和其他现代派作家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意识流文学是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派文学流派之一。意识流一词最先出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一篇文章里面,意指人的意识犹如流动的河流,后来被一些小说家们借用过来,用以表达一种心理描写手法。最早使用意识流手法的,据说是法国作家艾杜阿·杜夏丹的《月桂树被砍掉》(1887)。到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意识流手法也被其他一些艺术部门所使用,如诗歌、绘画、音乐和电影,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意识流小说。这方面出现了几位世界级的大师,他们包括法国的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英国的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42—1941)、美国的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等。

意识流小说要求人物直接表达他的思想意识,充分发挥自由联想的作用,借助于回忆和幻觉,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而扩张了时空的跨度。其主要技巧是内心独白,大量采用跳跃的联想、时序的颠倒和融合以及象征和暗喻的手法。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最后一章描写莫利的潜意识活动,一连几十页都没有用标点符号。福克纳的《喧嚣和骚动》和《当我弥留之际》等南方小说大量描写精神病患者、白痴、乱伦、凶杀和挖掘人的潜意识和本能方面的题材,不断变换视角,造成主客观意识交错融合、时空顺序颠倒错位,凸现现代人内心世界的错综复杂,在语言表达和揭示内心世界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地。

二次大战以后现代主义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荒诞派戏剧就是在 50 年代诞生于法国的一个流派,其名称源于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埃斯林所写《荒诞戏剧》(*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一书。荒诞戏剧主要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其荒诞是指现代人与其生活环境的脱节,人既不是世界的主人,也不是社会的牺牲品,他对世界既无法理解,也无能为力,因而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荒诞戏剧集中描述了现代人所面对的尴尬难堪的局面。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91)的名剧《等待戈多》说的两个流浪汉一直在徒劳无益地等待,他们不知道他们等的那个戈多是何许人,是否会来和何时会来,所以只好苦苦地等待。这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半死不活的现状和许多人的心态,有那么一点希望,但更多的是失望。

荒诞戏剧的代表人物除了贝克特以外还有尤奈斯库、阿达莫夫和热奈等人。他们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不再遵循戏剧冲突、舞台规范、悲喜剧的界限等戏剧创作原则,而是采用支离破碎的舞台形象,夸张、怪诞、反逻辑和梦幻这样一些荒诞悖理的手法,以此来表现非理性世界和非理性人物。通过没有内容或者语无伦次、答非所问的独白或对白,来揭示人生的荒谬,人情的冷漠。荒诞剧由于比较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不足,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曾经盛极一时,出现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剧作家,意大利的布查蒂和戴里科,英国的品特和辛普生,美国的阿尔比和德国的魏斯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但由于荒

诞戏剧过多地追求荒诞,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手法,脱离了一般观众的审美情趣,60年代以后逐渐受到冷落。

新小说(Roman Nouveau)是50年代出现的另一个现代派文学流派。该流派首先在法国诞生,代表人物有娜·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1900—)、阿·罗布-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克·西蒙(Claude Simon,1913—)等人。他们受到存在主义的很大影响,但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萨特的一些观点。如反对萨特提出的“文学介入”说,认为文学不应掺合任何政治、道德和社会意识,否则就会变得平庸。他们主张摒弃传统的小说观念,在人物、情节、叙述方式和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提倡“非人格化”的语言,客观冷静准确地表现和描写对象。在他们的作品里,人物只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状态的工具,既没有典型的性格特征,也没有明确的生活经历,有时连姓名也没有,只用“我”、“你”、“他”来称谓。在叙述上完全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相互交错,现实、想像、记忆、梦幻和潜意识活动交叉、重叠在一道。故事没有连贯的情节,变化不断,离奇荒谬,艰涩难懂。他们通常只向读者提供一些“路标”、“支点”,让读者自己凭想像进行再创作,重建小说中的人物、环境乃至人物内心的秘密。新小说派试图缓解小说的危机,但由于过多依靠技术手法的变化,而忽视内容,使得他们的实验走进了死胡同,7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

黑色幽默(Black Humour)是60年代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名称来源于美国评论家弗里德曼1965年编写的一部叫做《黑色幽默》的小说集。收集在这本书里的小说有些共同之处,例如用强烈的夸张乃至荒谬的幽默和嘲讽手法来表现死亡、战争、疫病等题材,反映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厌恶和绝望。他们用喜剧手法处理悲剧内容,将可怕和可笑相结合,努力描写周围世界的荒诞和社会对人的压迫,让人既感到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又觉得压抑乃至绝望。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 1923—)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库特·冯尼格(Kurt Vonnegut, 1922—)的《第五号屠场》。前者讲的是二次大战期间美军飞行员尤素林和他的战友们的经历。尤素林不想打仗,寄希望于第二十二条军规,但又无法逃脱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约束。一方面,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精神失常的人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遣送回国;另一方面又规定任何人只要提出自己不正常就证明自己正常,因此他永远不能指望利用第二十二条军规帮助自己回国。后者说的是二次大战期间美军飞机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惨剧。小说以精神病患者毕利的视角,用一种荒唐可笑、玩世不恭的口吻既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又谴责了盟军的过火行为。与此同时,还运用了高度想像力描述了另一个星球的和平世界,对比了战火纷飞的地球生活。

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是 50 年代产生于英国的一个包括年轻剧作家和小说家的文学流派。他们主要以描写所谓的“反英雄人物”著称,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威廉·库柏的《地方生活片断》、约翰·韦恩(John Wain, 1923—)的《每况日下》、金斯利·艾米斯(Kinsley Amis, 1925—)的《幸运的吉姆》以及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 1929—)的剧本《愤怒的回顾》等。这些人的创作内容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有的笔调辛辣,有的冷嘲热讽,作品大多取材于中下层阶级乃至劳动人民的生活,对他们比较同情,就这点来说他们的作品有一些积极意义。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蒙昧主义和超人哲学的影子,却用生动的语言和愤怒的笔触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了挑战,他们所创造的反英雄人物,面临着社会的沉重压力,活得很累,处处碰壁。他们的写作技巧也有独到之处,情节简单,线条分明,善于把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同意识流技巧结合起来。

魔幻现实主义(Magical Realism)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就已在拉丁美洲产生,但真正引起世人注目还是 50 年代以后的事。

南美大陆一向社会动荡,大自然神秘莫测,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神话广泛流传,这是魔幻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底蕴。这一流派最大的特色是将现实与幻象结合起来,如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1928—)的《百年孤独》中出现的人长猪尾巴,墨西哥作家里纳尔多·阿里纳斯的《幻象》所写男修士能够带上镣铐飞越大西洋等等。其次,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喜欢使用象征、比喻、借代和暗示,小说因此变得玄奥、神秘、阴晦和艰涩。第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在结构上常有惊人之举。他们有的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方法,有的则打乱正常时间次序,利用心理描写现实,交错时空顺序。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面,他们吸收了欧洲现代派作家的内心独白,表现了没有逻辑、超越时空的现代派技巧。

现代派文学的基本文艺观点是表现论,强调表现主观现实,而不是反映客观现实。他们认为,客观现实是表象,主观现实才能获得“最高的真实”。主观性和内向性是现代派文艺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分析人物的变态心理、曲折地反映病态的社会关系,是现代派常见的表现程式。现代派文艺流派纷呈,竞相标新立异,但其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上也有若干相似之处。一般来说以下这几点是它们所共有的:

其一是象征。现代派对象征的运用既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客观描写,又不同于浪漫主义的直接抒情。它不但用来表现人的思想情绪,还用来表现人思想情绪的发展变化。先是在诗作中通过联想、比喻和暗示取得了精炼而又意境深远的效果,以后象征又从诗歌发展到了小说、戏剧乃至绘画和音乐领域。

其二是荒诞。对事物极度夸张的表现手法在现代派文学艺术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未来主义经过表现主义到荒诞戏剧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表现荒诞的艺术手法。荒诞和象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荒诞离开了象征便失去了寓意,象征超出了极限便成了荒诞。

其三是反传统。虽然有些现代派作家还是重视传统艺术价值的,但从总体来说,现代派对传统的东西持否定态度。未来派走向极端,喊出“摒弃全部艺术遗产和现存文化”。其他一些流派也普遍反对传统的创作方法,反对传统的艺术形式,甚至反对各类文学体裁的特点。有的写出了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人物性格的“反小说”;有的写出了没有动作、没有对话乃至没有冲突的“反戏剧”。总之“反”字成为一种时尚。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现代派这一倾向对于创新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现代派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新奇,走进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所谓的具体诗只是字母的重新组合,所谓的“新新小说”只是一叠印有文字的活页,像是一副扑克牌,随你怎么看都行。

其四是强调对内心世界的表现。他们将直觉与幻觉、想像与幻想、现实与梦境结合起来,采用自由联想、用心理时间取代物理时间、把重点放在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上,不再关心外部世界的描写,最典型的恐怕就是意识流作家。

3. 现代派艺术

1) 西方艺术社会地位的变化

19 世纪之前的绘画很难成为画家们谋生的职业。虽然社会的发展让不同的阶级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但无论何时,画家们的生活都离不开艺术资助人。18 世纪之前的资助人主要是教会、宫廷和贵族。到了 19 世纪,西方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使得原来的资助人几乎都丧失了这种赞助的能力,而具备赞助能力的工商阶级却对艺术不甚了解。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艺术家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有的人甚至不得不为了艺术而忍饥挨饿。法国著名画家雷诺阿在 1869 年说过他不是每天都吃饭的,另一著名画家米勒为了买一双鞋不得不卖了 6 幅画。莫奈也因为无钱买颜料而不得不停下画笔。连这些后来驰名世界的大画家都过着艰辛的生活,一

般画家的生活更可想而知。音乐家们的地位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一般都要到宫廷或是一个贵族家里去当乐师,再不然就是去教堂弹风琴,其地位和一般的佣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2) 印象派的创立

尽管艺术的社会地位在 19 世纪还不是太高,但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重要的原因是印象派(Impressionism)的创立和发展。

印象派的滥觞之作是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 1832—1883)的《草地上的早餐》和《奥兰毕亚》。他的画在三个方面为以后的印象派作出了示范。一个是用直射光而不是室内光照射绘画的对象,特别是人体上。二是表现当时的日常生活题材。三是让画框任意切去画面,运用快速、有力的粗线条以及动态的笔触去表现人物的活动。他的这些画突破了当时传统的绘画技巧,实际上继承了两个世纪前两位画家——委拉斯开兹和戈亚的画法,委拉斯开兹在 17 世纪就用过直射光来处理画面。后来在马奈周围很快聚集了一群优秀的年轻画家,经过他们的努力形成了对 20 世纪画坛产生重大影响的印象画派。他们包括埃德加·德加,克劳德·莫奈,奥古斯都·雷诺阿,卡米耶·毕沙罗和阿尔弗雷德·西斯莱。从 1869 年开始的 5 年里,这几个人紧密地团结在一道,创作出了一批很有些新意的作品,并于 1874 年举办了第一次印象派画展,来对抗当时的官方沙龙——一年一度在巴黎举行的当代画家作品展对他们作品的压制。这些画的共同点是除了中心的人物或是景物之外,其余的背景部分都是蒙蒙一片,非常不清晰。莫奈的一幅画正好叫做《印象·日出》,当时的一家杂志《喧哗》周刊就开始用印象来概括他们这些人的艺术特色,于是印象派便正式被叫了起来。

3) 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绘画

印象派创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遭到了冷落。《费加罗报》

甚至把印象派的第二次画展称之为一次灾难。只有左拉早在1868年就著文称赞他们,预言马奈的画会在卢浮宫里收藏。随着时间的推移,印象派的价值逐步为人们认识和接受。60~70年代他们的画一般只卖到100多法郎,而到了90年代,莫奈的一幅画就可以卖到1万多法郎了。与此同时,印象派越过了法国国境,在其他西方国家画坛上吹起了一阵清风,英国、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的画坛纷纷仿效印象派。出现了一批印象派画家。在法国国内印象派继续得到发展,先后出现了新印象主义(neo impressionism)和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sionism)。

新印象主义由修拉(Georges Seurat,1859—1891)和西涅克(Paul Signac,1863—1935)发起,主要特征是根据光科学原理来处理色彩。实验表明,在光的照耀下,一切物象的色彩是分割的。新印象主义者为了真实地表现这种色彩,把不同色彩的点和块并列一道,构成了新印象主义的画面。其优点是以科学理论为基础,恢复了绘画中某些方面的具体性、实在性,但由于过分注重理论规则,绘画也因此失去了直观性。这个流派的代表作是修拉的《阿尼埃尔的水浴》和《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

后印象主义画家不满足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的那种客观主义表现,不满意他们对光线的片面追求。他们强调自我感受,注重主观感情。他们采用线条、色块和整体表现来达到内心化与个性化的目的。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和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塞尚在学习绘画之前曾经学过法律,也爱好文学,后到巴黎学画,结识马奈等印象派画家,受到他们的一定影响。他更关注物质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内在结构,喜欢用色的团块表现法去描绘物象的体积、深度,喜欢传递一种美感,画面充满着诗意几何造型,虽有些沉重、压抑之感,但在结构和色彩上面能给人新意。

凡高出生于荷兰的一个牧师家庭,年轻时当过传教士,后到巴黎学画,画风受到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的影响。他对日本和中国的版画很有兴趣,注意在自己的绘画中吸取日本画的营养,以提高自己的表现力。他在巴黎待了两年便感到烦躁不安,于是来到法国南部的城镇阿尔。那里阳光明媚,是个绘画的好地方。他在那里除了画果树、吊桥和田园风光外,还画了草原和海滨。他特别喜欢画向日葵,向日葵是他的崇拜物,富有象征含义。在他眼里向日葵是太阳之光,是他内心感情烈火的写照,也是他苦难生命的缩影。他还用颜色来表现情感,用红和绿来表现人的恋情,用蓝色表现凉爽的夜景和人物的背景,用纯黄色表示神秘的价值,用原色表现他激动不已的内心世界。他热情似火,神经过敏,因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一次竟然试图谋杀另一个著名画家高更,没有成功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用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送给了一个妓女。后来他被他的弟弟送往一个疗养院,虽然一度病情有所好转,甚至还画了几幅上乘之作,如《星月夜》和《麦田上的鸦群》,但时隔不久他还是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高更出道比较迟,虽然他以前也曾在业余时间画过画,但专门从事绘画时已经 35 岁了。他先后去过法国的布列塔尼和阿尔,打算找到一种不同于城市文明的地方进行创作。后来为了寻找更加原始的生活环境,又去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希望能从那里的土著人生活和文化当中汲取营养,并和当地的一个土著人姑娘同住。在那里待了两年时间以后,他又迁往马贵斯群岛中的多米尼格岛,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激发灵感的力量,可惜两年后就在那里病故。高更的艺术活动反映了当时欧洲绘画对原始的回归,反映了一种追求生命本源的倾向。他被称作是法国绘画的象征主义派的首领,集东方绘画技巧、黑人雕刻、中世纪宗教艺术和民间版画为一身的大师,创造了一种装饰性画风。

4) 20 世纪的早期绘画

一次大战对艺术家们的创作和西方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了 19 世纪拿破仑战争在当时的影响。它不仅中断了连续不断的物质生产,也使得正处于创作旺盛时期的艺术创作欲望和热情突然发生了逆转。西方文明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能从这次战争创伤当中恢复过来。虽然 20 年代和 30 年代还是出了一批比较杰出的美术作品,但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显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诸如立体画派、野兽画派的一些代表画家,如布拉克和马蒂斯,多多少少都失去了他们战前所具备的那种力量和朝气,在色彩处理和画的风格上似乎减少了不少昔日雄姿。就连毕加索这样的大师也不如以前那样精力过人,一往如前了。巴黎仍然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是西方艺术和时尚的发源地,但那种不可一世的支配地位和影响却消失了。

20 世纪初出现的现代派运动不仅对文学,也对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流派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其作用却持续了很久,达达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达达派最初是在瑞士苏黎世创立的,其成员主要是些作家和诗人。搞艺术的起初只有一个让·阿尔伯。后来因为达达派否定一切,其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得不到多少人的支持,一次大战后没多久就消亡了。尽管如此,它的一些艺术创作原则却流传了下来。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人马塞尔·杜香所谓的“现成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利用日常生活用品经过艺术家的有意挑选让观众进行思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减少直至剥夺艺术品的传统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从而达到部分和全部否定艺术的目的。他一再强调,他的选择是建立在视觉冷漠反应基础之上的,没有任何好坏的判断标准,没有任何的感觉因素。他的早期代表作叫做“泉”,其实是个倒置的白色搪瓷便器。对此他的解释是他“选取了一件平常的生活用品,放在这里是让它在新的题目

和视角下 ,除去它原有的功能 ,为它自己创造一种新的思想”。

达达派由于其极端的艺术创作观点而为超现实主义派取代。超现实主义派从本质上说也是反传统的 ,只是它不像达达派那样否定一切。超现实主义派里主要是些作家和诗人 ,主要代表人物和组织者布赖东是个作家 ,他竭力提倡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他说 ,超现实主义是“完全的自动心理表现手法” ,虽然超现实主义是从作家和文学开始的 ,但是艺术家 ,尤其是美术家的贡献使得这个运动得以深入。布赖东后来也承认了他们对运动的贡献。

超现实主义派画家首推意大利的乔治·德奇里科(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他的前期作品多半以意大利街道、广场或长廊为题材 ,表现了一种对人类社会和前景担忧的主题。“神秘与忧郁的街道”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画面是一条长长的街道 ,一边是清一色的拱门和小窗口式长廊的房子 ,另一边也是类似的房子 ,只是被巨大的阴影遮盖。街道的这头是个滚铁环的小女孩 ,只是个黑色的形象 ,街道中间则是个人和杆子的阴影 ,露出来的仅仅是灰黑色的小块天空。整个画面全是黑白两色 ,而黑色似乎正在吞噬白色 ,给人一种阴沉和压抑的感觉 ,预示着某种灾难即将来临 ,人类社会处于一种威胁当中 ,而人类对此却毫无防备。

超现实主义派首次画展于 1925 年在巴黎举行。一些超现实主义画家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表现人的梦境或无意识和下意识的精神状态。例如麦克斯·恩斯特(Max Ernst ,1891—)采用了所谓的“摩擦法” ,即用黑铅在破旧的地板上或其他平面上摩擦 ,产生出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美丽而含蓄的意象来。从理论上来说 ,这种方法避开了有意识的操作 ,也就绕开了所谓的趣味和技巧这样一些问题。但在实际运用当中 ,画像总要去挑选材料 ,去处理摩擦过的东西 ,所以严格地说 ,这还不能完全算是无意识的自动画。恩斯特创作的另一部作品《一百个头的女人》采用了拼贴手法 ,从不同的书本里搜集到 149 幅插图 ,通过剪辑自由组合成不同的画面 ,

重新构架为一个故事,表现了梦幻一般的意境,比较自然,令人信服,是超现实主义较为成功的作品。

更富于想像力的超现实主义画作是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 Dali, 1904—1989)的“持久的记忆”。在这幅画里,他试图用和时间有关的意象来表现人梦境中的时间意识。这只金属表不走了,而且永远不走了,像是有机体一样腐化变质,引来了昆虫,如同树上的果子腐烂掉到地上一样。他的画作表明他从自动主义手法朝前迈出了一步,他被称之为“内心积极的偏执狂”。他和疯子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疯,只是用积极的偏执方式去观察真实世界,并使之变得不可信任,甚至完全走向它的反面,让人感到不安。比利时画家列内·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 1898—1967)的画更带有破坏性。马格里特原来是搞设计的,熟悉各种商品形式和特性,擅长运用人物造型和交叉效应,创造出立意新颖,形状独特的作品,构成对传统现实和艺术观念的挑战。往往作品标题引人瞩目,但和意象之间的关系却让人琢磨不透,甚至看上去毫不相干。他的代表作“强暴”,表面上看像是女人头像,但仔细端详却不是。原来头发下面的脸部只是女人的上身,两只乳房充当了眼睛,肚脐是鼻子,而阴部则是嘴巴。至于脖子又长又粗,更像是男人的阴茎。这种拼凑在一道的意象很难让人一下子就理解原来标题的内涵,但仔细品味却又觉得余味无穷,所以这幅画出来后很受布赖东的赏识。另一幅受到布赖东青睐的作品是西班牙画家胡安·米罗(Joan Miro, 1893—)的“女人头像”。这幅看上去像是张开血盆大口动物的画作,据说主要表现了画家当时听到西班牙内战爆发和世界大战也迫在眉睫时的感受。画的形式从原来的天真可爱一下子变得凶恶讨厌,像是泡在酒精瓶里的标本一样,反映了那个时代欧洲在大难临头时的恐惧心理和焦虑不安的心情。

4. 建设主义流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苏联曾经出现过一些现代主义流派和艺术家。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对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曾经起到过一定的影响。就艺术而言,比较有名望的人物主要是卡西米尔·马勒维奇(Kazimir Malevich, 1878—1935)、马克·恰加尔(1889—)和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1)以及其他一些艺术家。他们在革命前就在绘画理论和创作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因为其现代主义的理念和技法而引人瞩目。革命后,他们曾一度呆在苏联国内,但以后因其艺术观念不能见容于当局而纷纷离开,大部分先后去了德国、法国和美国。在苏联国内发展起来并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是建筑上的现代主义流派。这个运动的发起者是些建筑师、雕刻家和设计师。为首的是弗拉迪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 1885—1953)和埃尔·李斯茨基(1890—1941)。塔特林革命前曾经去过巴黎,颇受毕加索组装起来的艺术品的启发。回来后,他尝试用各种日常生活用品来组建类似的东西。他的首次尝试是对莫斯科一家咖啡馆的装饰,但较为成功的作品是他为第三国际设计的纪念碑。这是座巨大的双层坡形螺旋式结构,由水平式主梁支撑,每层都有旋转厅,整个建筑高达 530 米。虽然这个设计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却体现了建设主义流派的宏大主旨,是革命现代主义的象征,带有功利色彩的简洁和对物质逻辑性的尊重。除了建筑以外,建设主义流派的作品还表现在印刷排版、广告宣传以及展览设计等方面。李斯茨基的兴趣除了建筑上的以外,主要在一些立意新颖、富于现代意识的设计上面。他所谓的“为了新艺术”是指在建筑和绘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建设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显然有些脱离苏联革命的实际,也因此受到了冷遇乃至排斥,它的一些主要成员纷纷离去。李斯茨基 1922 年去了德国,在那里一呆就是 9 年,把建设主义的理论传到

了西方。一次大战后德国是表现主义的大本营,那里对现代主义流派一直有着热烈的期待。魏玛的波哈斯运动自1919年发起以来,就积极提倡艺术家和建筑师们一道工作。李斯茨基来到这里以后就成了这个运动的指导者,他的艺术思想使得这个运动更加规范,目标更加明确。李斯茨基还和另一抽象艺术团体“德·斯迪夫”有关。德·斯迪夫的代表人物格里特·里特维尔德(Gerrit Thomas Reitveld)此时完成了他的著名建筑“希罗多房舍”。这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小屋,以不对称著称,外形是所精确、清晰的立体形石板屋,窗户高大,坐落在水平线上面,拐角往往多出一块。没有任何刻意的加工和装饰,更没有刻意追求特定的色彩,给人一种透明而不是结实的感觉。结构安排去掉了承重墙和让人压抑的摆设性空间,人们因此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这座小屋的风格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成为一种国际风尚。德·斯迪夫的另一位大师皮埃·蒙德里安(1872—1944)早年从事印象主义绘画,后来又改为象征主义,同时受到立体主义画风的影响,但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纯洁、自然和以具有活力的抽象艺术来表达内心的主观情感。他的代表作之一“狐步A”为一菱形淡色方框,内有三道黑边组成的框架,这种看似简单的构图蕴涵着什么确实让人费思。水平线和垂直线的隐出和交叉,各自构成的格子之间既有联系又不对称,上、下、左、右之间,既是三角形,又是不等边和不规则图形,是数字和几何的抽象理念,还是人类物质世界的抽象概括,或是精神思维的一种喻指。越是简单的越是复杂,在这里似乎得到了印证。但是毫无疑问,这幅作品中所表现的一种公开、爽直的精神倒是鼓励和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不少艺术家。

建设主义的风格和波哈斯运动结合起来,在欧洲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建筑艺术时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所发展,出现了一批有所建树的画家和建筑师。他们包括瑞士的画家兼建筑师查尔斯—埃杜瓦德·让奈赫(别名勒·高比尤资,Le

Gorbusier, 1887—1965) 德国建筑师路德维格·米·凡·德·罗赫 (Ludwig Mies Vander Roche, 1886—1969) 法国建筑师奥古斯特·贝勒特 (1874—1954) 英国建筑设计师埃德温·路特银 (1869—1944)。路特银原先以设计花园式房屋著称, 后来他设计建造了一次大战纪念碑, 该碑以其简洁、庄严的风格表现了一种深沉的旋律。

勒·高比尤资曾经给房屋下了一个有名的定义, 称之为“供在其中生活的机器”。很多人认为他的意思是贬低房屋, 把房屋当成没有任何艺术特色的机械装置。但实际上他和俄国建设主义派一样认为机器是完全有益于人的东西。房屋应当用理性方式设计和建造, 那种用传统和非理性方式规划和设计的房屋简直就是对新时代美好前景的破坏, 也是对机器可能给人类所带来的美好生活的破坏。他所设计和建造的巴黎郊外萨福耶别墅以及路德维格·米·凡·德罗赫设计建造的带家具的柏林家庭住宅都充分利用了当时较为新型的建筑材料, 即钢筋混凝土、钢和玻璃, 充分展现了开阔的空间和自然特色。勒·高比尤资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的萨福耶别墅从三个方面, 尤其是从东南和西南方向留出了层面, 形成了立体空间, 以便让阳光直接射进楼房。由于承重墙取消了, 房屋内部空间更为开阔, 正对内部平台的一面墙从上到下都装上了玻璃, 采光极好。由于每边都是敞开的, 也就无所谓正面和反面, 前面和后面。这样, 他就在各种视角之间取得了统一, 使得里、外空间之间互相渗透和融合, 实现了他的目标。米·凡·德·罗赫的柏林住宅也很有特色, 不仅隔墙可以移动, 人可以在屋内自由走动, 比较方便, 机器的美学原则同样表现在屋中的家具上面。无论是前面的巴塞罗那椅还是后面的管状钢椅都和大规模生产的传统工艺家具迥然不同。虽然这两种椅子都不是他发明的, 但它们制作得都非常完美, 造型极为考究, 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家具。

在雕刻方面也有人受到波哈斯运动的影响, 最为成功的当推

康斯坦丁·布朗初西(1876—1957)。这位罗马尼亚人自从1904年来到巴黎创业起,一直受到未来主义和其他一些现代派思潮的影响,但中、晚年以后风格变得更为抽象和追求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他的代表作之一是一幅题为“空间里的鸟”的抽象派作品。画面是一个两头尖尖、呈流线型的青铜雕塑,表面经过抛光处理,亮光闪闪,竖立在一个座位上,远看像是倒竖的一条赛艇或是鱼,虽然外表不像鸟,但还是有可比因素。例如一种持续的上升运动动作,一种表现速度和冲向天空的诗意和隐喻,多多少少向观众展示了摆脱重力和一切束缚的精神。

强调主观并使用夸张手法是后期印象派、野兽派和表现派的共同特征。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绘画风格首先见于野兽主义画派的作品。野兽主义(fauvism)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画家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他的作品,色彩比印象派更加强烈、鲜明,在画面上大胆地追求更多的感情因素,因其粗野奔放的色彩而被人称之为“野兽派”。野兽派画风的形成为20世纪一系列的艺术变革起到了开创作用,紧跟其后的是立体派。

立体主义原则最初出现在毕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的油画《亚威农少女》里,这幅画是传统美术和现代画的分水岭。立体主义用块面的结构关系分析物体,表现体面重叠、交错的美感。立体派的代表人物是毕加索和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毕加索一生画风多变,从立体主义变到超现实主义,将情欲和原始的情感通过夸张、扭曲和变形表现出来。现代派的特点在他的作品中一览无遗,既有解体破坏,又有梦幻意识,代表作有《坐着的浴女》、《镜前少女》、《红椅子》。后来他又从超现实主义转向表现主义,这方面的作品似乎更多的和他的社会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为控诉德国人轰炸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画的《格尔尼卡》,抗议弗兰哥在德国法西斯的支持下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猫与鸟》。

如果说立体主义是受到工业科技的影响、表现物体静态的美的话,那么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则是在工业科技的刺激下,用分解物体的办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用线和色彩去描绘一系列的形状和连续的组合甚至试图用线描绘光和声音。现代主义艺术除了绘画以外还包括雕刻和音乐,其活动范围也不仅限制在法国和意大利,还发展到了俄国、德国、瑞士和美国。二次大战以后,在美国产生的抽象表现主义(或称“行动绘画”)是包含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在内的流派,它特别注重艺术家的行动自由和无目的性。在此之后产生的“硬边抽象”以及“后绘画性抽象”则是从主观表现到客观表现的转变。50年代以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是继现代主义之后的前卫美术的总称,从建筑领域逐渐扩展到了美术的其他领域,但其确切含义却一直没有明确界定。概括地说,后现代主义美术具有下面这些特征:企图突破审美范畴,打破艺术和生活的界限;从传统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范畴转向方法论,用艺术表达多种思维方式;从强调主观感情到转向客观世界;从对工业社会的反感到与工业社会的结合;对个性和风格的漠视和敌视;主张艺术平民化,广泛运用大众媒介。

虽然,后现代主义美术不同于现代主义,但就其本质而言还是现代主义思潮的继续和发展。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潮流中,虽然现代主义流派引人注目,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也不容忽视。现实主义的美术作品贴近现实生活,通俗易懂,因此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乃至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现实主义美术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德国女画家凯丝·珂勒惠支、男画家奥托·纳格尔、法国画家亚历山大·斯坦伦、安德鲁·富热隆、意大利画家热纳托·古图索、加布列尔·穆基、英国画家弗兰克·布兰文都以他们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各自的国家享有盛誉。

5. 工艺美术和建筑业的发展

印象主义画派的兴起不仅影响了欧洲的画风,也对美国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推动作用。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Whistler, 1834—1903)曾经专门赴法国学习印象派的技巧,特别是朦胧色彩的处理。但他学习这些新的创作方法并不单纯是为了绘画,而是和他的装潢艺术结合起来。有他这种想法的人还不止他一个,另一个是英国人威廉·莫利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从绘画技巧方面来说,他属于拉菲尔前画派,喜欢用明亮色彩。他和他的朋友们把绘画和建筑结合起来,成立了专门公司设计家具、砖瓦、墙纸和彩色玻璃窗,建立了简单实用的风格。他认为,机器和工业是敌人,只有手工劳动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

他的这种简单实用的风格在建筑上体现在英国人菲力普·韦布设计的“红房子”上面。这种房子和其他类似的房屋都是砖结构,把荷兰和17世纪的英国建筑风格结合到一起,具有一种精美、雅致和轻快的格调,是法国印象派和英国“住宅建筑复兴”运动联合的产物。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国出现了一系列这种风格的建筑,包括新西兰会馆、阿伯特纪念堂、贝德福德公园,后者成为花园郊区和城市的首创工作,此外还有许多上层人物的宅第。莫利斯也因此而名声大振,他的演讲和著作伴随着英国建筑复兴运动的发展,吸引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注意。法国和意大利争相仿造“花园城市”,德国专门派人去英国取经。但是这种模仿主要还是在私人住宅方面,一些大的公共建筑,如意大利的埃曼努埃尔二世纪念碑和司法部大楼、德国的国会大厦和大教堂仍然还是巴洛克风格。这种风格多用装饰曲线,以求动态和起伏、铺张与浮华,在许多欧洲国家流行。

美国这时国力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提高,一些大型建筑也陆续问世,但其风格却不同于英国的建筑。如1892年落成的波士顿图

书馆带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样式,而 1910 年建成的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在风格上甚至比欧洲的巴洛克模式更为严谨。

装饰艺术在 19 世纪末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掀起了一个叫做“新艺术”的运动,主要表现在版画艺术方面。这个运动不仅影响到插图艺术,而且影响到印刷工艺和招贴画。有成就的如格拉斯哥画派,他们用木料、玻璃和金属材料进行加工创造。在建筑上成功推行新艺术的是西班牙的安东尼·高迪。他的成名之作是他家乡巴塞罗那的维森斯大楼,这座摩尔-哥特式建筑具有棱角形状以及尖长的铁饰品。

混凝土建筑物最早在巴黎出现,而采用铁架结构造摩天大楼的则是美国芝加哥的工程师们。但欧洲的建筑师们似乎表现了更高的驾驭钢铁建筑的水平,埃菲尔铁塔、巴黎的世界博览会和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在高度上或是宽度上都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这段时期在艺术和建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宣告了一个旧时期的终结,也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现实主义终于为印象主义所取代,而印象主义到了 20 世纪也发展到了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艺术家们也因此将面临一个更为孤独的境界,曲高和寡,阳春白雪难以和普通人沟通。但是建筑艺术及其设计却因为从绘画艺术当中汲取的营养以及它本身所具备的特性,而更为一般人所认同和接受。

6. 西方现代派音乐

西方音乐从 19 世纪末以来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西方音乐和古典音乐比较起来音域更加宽广,也不常用主调来处理音阶之间的关系,而强调每个全音都是平等和独立的。这种方式演奏的音乐通常比较刺耳,叫做不协和音,完全不同于以和谐和平稳为特征的古典音乐。同时在节奏上现代音乐较之古典音乐也更加

复杂,它在一小节里不再是两拍或是三拍、四拍,而是五拍、七拍甚至十拍、十一拍。再者传统音乐曲调变化较少,特别是急剧性变化几乎没有,而现代音乐不但有,而且很频繁,差不多每隔一两节就有这种变化。上述的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在20世纪的前10年发生的,代表这些变化的是4位音乐家,他们分别是奥地利的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俄国的伊戈尔·F·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odorovich Stravinsky,1882—1971),匈牙利的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和英国的拉尔夫·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1872—1958)。

勋伯格是奥地利的一个犹太人,靠自学成才。早年曾在柏林和维也纳执教,希特勒上台后,因遭到其迫害而前往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他对音乐的贡献主要是创建了“十二音作曲法”。该法将半音音阶的十二个音排成一定的次序,称为音列,用来作为乐曲的旋律与和弦的基础。他自己在晚年不如早期那样忠于这种作曲方法,但他的学生却一直采用这个方法进行创作。他的一生创作了大量钢琴、小提琴和其他音乐作品,如钢琴作品《小曲五首》(op.23)、《组曲》(op.25)、《小夜曲》(op.24)、《第三弦乐四重奏》(op.30)、《乐队变奏曲》(op.31)、《第四弦乐四重奏》(op.37)、《华沙幸存者》等。

斯特拉文斯基出身于俄罗斯的一个音乐世家,其父为圣彼得堡帝国剧院的歌唱家。他的音乐才华体现在多方面,既有轰动一时的歌剧《春之祭》也有集表演、舞蹈、朗诵和演奏为一体的反歌剧《士兵的故事》,既有典雅宏丽的《俄狄浦斯王》也有明净洗炼的《C大调交响乐》,既有风趣横溢的《敦巴顿橡树园协奏曲》也有简洁优美的《乐章》。他的成就主要在于他对节奏的使用,用以产生喧闹的效果。他没有像勋伯格那样采用无调性方法作曲,而是将两个或更多的主音放在一道,即所谓的二重调性或是多重调性。

巴托克从小丧父,跟随音乐家的母亲弹钢琴。在学习音乐的

同时,他还从事收集和整理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拉夫民间音乐的工作。40 年代二次大战期间他去了美国,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任职。他的作品充分融合了民间音乐,富有抒情色彩,受到普通人的喜爱。他的弦乐四重奏尤为著名。他的主要作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管弦乐曲,包括《钢琴与乐队狂想曲》和《小提琴与乐队狂想曲》;舞台作品,包括《蓝胡子城堡》(歌剧)、《木刻王子》(芭蕾舞);室内乐,弦乐四重奏 6 首,小提琴奏鸣曲 2 首;钢琴曲《野蛮的快板》《小宇宙》等;合唱曲《世俗康塔塔》。

沃恩·威廉斯年轻时先在剑桥后又到柏林和巴黎学习音乐,以后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并担任乐队指挥。他对民歌一直非常感兴趣,又对古典音乐很熟悉,加上他的强烈创新意识,他的作品显得丰富多彩,富于个性:粗野的狂暴、奔放的热情和近乎神秘的静谧。他的作品往往包容着不同的品性,甚至一部作品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其间的对比不是矛盾,而是同一性格的不同侧面。他的性格有些怪僻,但还是有很多人尊敬他。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伦敦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等多部交响乐,《走向未知的领域》、《神秘歌五首》等合唱,《牲口贩子》、《骑马下海人》等歌剧以及室内乐、歌曲和其他作品。

四、基督教思想的演变

1. 基督教面临的挑战

基督教思想经过了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形势到了 19 世纪中叶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当时的欧洲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要求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实行国家的统一。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潮流,统一后的国家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增强了政治和经济的实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以后对于禁

锢他们思想的天主教和新教思想日益不满,提出了挑战。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欧洲到了19世纪,在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乃至科学技术领域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新的思想大多数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更容易为经过思想启蒙,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新一代欧洲人所理解和接受,也对基督教思想构成了新的威胁。

在这段时间里,教会与国家之间出现了一系列公开的冲突。例如法国宗教界人士同反宗教人士有关教育问题的论战,德国的文化斗争(指德国首相俾斯麦对天主教及其政党“中央党”的限制及反限制)以及梵蒂冈与意大利新王国之间的长期不和。这种社会和文化上的冲突加剧了社会思想的动荡,也使宗教内部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s)和现代派(Modernists)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基要主义者主张对圣经的解释不能改变,要遵循古训,而现代派则认为要用现代主义方法,将科学新思想吸收到神学中间去,以适应新的情况。因此产生了“多行善事”的宗教主张和鼓吹社会天主教及天主教民主主义的两种倾向。

与此同时,新教阵营里出现了新的宗教运动。1878年英国成立了救世军(Salvation Army),19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基督教科学派”运动。新教徒关心更多的是人道主义、教育、慈善、社会改革及到海外传教这样一些事情上,而对一些宗教理念不再过于探究。在英国,教会还组织了许多戒酒运动和少年团,旨在保护儿童和动物,开展对穷人的帮助。

在这一社会和思想演变过程当中,罗马天主教教会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置的问题。它对待社会发展的态度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教会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了抵制和反对,结果导致了政教之间的冲突。第二阶段则是采取了一种妥协和接受的态度,逐渐平息了这场危机。

这场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

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在社会上引发了一种对教士和教会的厌恶态度。这方面以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其次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欧洲的胜利大大扩大了国家的权威和影响,自由主义者认同了这种发展趋势,采纳了黑格尔哲学的国家观念,认为国家是达到自由的最有效手段,而教会则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由于其本身的体制更是成为自由主义者反对的对象。第三,罗马天主教本身的保守主义态度,表现在 1870 年的梵蒂冈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加强教皇制度和“宗教法制精神化”的决议,更加激起了自由主义者的不满。

政教冲突首先在意大利爆发。在那里,教皇管辖的各个小国被并到统一后的意大利,引起了罗马教廷的不满和对抗。梵蒂冈不愿接受 1871 年 5 月 13 日颁布的“意大利保证法”以及政教分离的原则,该法声称意大利将保护罗马天主教享有独立、主权地位的权益,但是这样一来天主教在政治上无法形成反对力量。在法国,教会势力同样遭受到了重大挫折。1882 年法国政府制定的学校法确定了学校脱离教会,而由国家管理的原则,规定不得讲授任何宗教课程,1886 年又禁止教士在公立学校任教。在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比利时、荷兰、奥地利,教会学校虽然还都继续存在,但其数量和教学内容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这种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当时的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他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表现采取了对抗的态度,甚至将一些试图把教皇和自由主义、世俗社会放在一块、使之和谐一致的言论也都视为洪水猛兽。

第二阶段主要是 1878 年以后,庇护九世的继承人利奥十三世(Leo XIII, 1810—1903)改变了他的前任反对社会进步的态度和政策,发表了一系列的通谕,从正面解释了天主教关于国家和社会学说的含义,调和了信仰与理智、神学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奠定了适应社会现实的神学基础。他虽然仍旧谴责唯物主义和不可知

论,但已有条件地承认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性,以便注入基督教思想,反对富有斗争性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有能力和责任建立自由的工人协会,用立法手段反对经济压迫和社会贫困。

在他的鼓励下,大多数西欧国家都成立了天主教工会。这些工会凭借自己的工人产业组织去和社会主义的工会运动分庭抗礼,一些以社会天主教思想为基础的政党也开始出现,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政党相抗衡。这样,社会天主教思想的理论和运动从19世纪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不仅对基督教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改变了当时欧洲的政治思想格局。

2. 社会天主教思想的发展

在德国社会天主教思想最早由阿·柯尔平和冯·凯特勒两位主教传播,并建立了一个叫做中央党的政党来推行其宗教思想。这个党在德国文化斗争中大大增强了实力,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奥匈帝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成为攻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思想的武器。奥地利成为各种宗教力量和种族力量发生冲突的中心地区,泰奥多尔·赫茨尔在这里写出了《犹太国家》,创立了“犹太复国运动大会”;阿尔道夫·希特勒则在这里写出了《我的奋斗》,鼓吹他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人思想。

法国的政治形势在普法战争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一事实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基督教思想的演变。就其政治态度来说,法国人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共和派,他们的信仰原则是相信政治自由,忠于民主制度,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使任何革命暴力非法。实际上他们都是反教权主义者。另一边是反共和派的右派,与共和派势不两立。他们或许在一些政治社会观念上并不相同,但在捍卫天主教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一股天主教徒归顺共和国的潮流却涌现出来。这股潮流

的产生首先在于法国的教会保守势力已经意识到他们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很小,时间越往后推移,他们重新掌权的机会就越小。虽然他们在 80 年代曾几次做出过努力,但在选举中并未如愿。其次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对待现代社会政治及法国共和政权的态度也起到很大作用。他在 1888 年的《自由》通谕中宣称:“有人硬说教会对绝大多数现代政治制度持否定态度,并对当代天才的所有发现一概加以拒绝,这是一种徒劳的而且毫无根据的诽谤。”对他来说,法兰西共和国并不比其他政权更加不可接受。在以后的通谕中他声称所有各国已确立的政府都是合法的,天主教徒必须致力于修改立法,言外之意是应参加共和制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右翼反动分子都同意教皇的看法,但显然他的意见对缓解政教的对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基督教,首先是罗马教皇调整了和世俗社会的关系及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政策,宗教的影响尽管有所减少,却能够维持下去,并进入到 20 世纪。

第十一章 二次大战后的西方哲学和神学

二次大战后西方各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虽然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东西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冷战状态,但这似乎并没有更多地影响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文化和人文科学也呈现了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

现代主义的高潮虽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过去,但其影响在文学、艺术乃至哲学领域依然可见,并在 60 年代以后进一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由原来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和反抗转化为对传统的宽容和回归,由原来的单一择向转化为多元的选择,由原来对形式的追求转化为对内容的反复探索。哲学方面战前影响还不大的存在主义通过海德格尔、萨特和加缪等人的努力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屈指可数的主要思想潮流。其他主要哲学流派,例如现象学、阐释学、逻辑实证主义和过程派也都有一定影响,但它们的作用主要还局限于学术界。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进展很快,不仅在学术界成为许多人文学科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探讨内容,而且大有取代现代主义,成为新的思想潮流之势。和哲学关系密切的神学在战后也有很大的变化。对西方人精神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基督教,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都对传教方式进行了变革,使之更加贴近民众。在学校里普遍开设了神学课程,加之各地十分活跃的教堂,可以说基督教及其他宗教在西方社会的影响相当大。

通过改革,基督教所形成的公开性、通俗性和感召力正在改变以前神学陈旧、过时和腐败的形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这些理论全部都作详尽的介绍限于篇幅显然是不可能的,也超过了本书的范围。但是择其要者,做些概括而具体的述评却完全可以办得到,而且也符合本书的宗旨。本章便是对西方二次大战以后在哲学和神学等领域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潮流及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和他们思想倾向的概述。

一、哲学

从18世纪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叶的哲学情况来看,德国和法国是主要哲学流派的发源地。无论是古典哲学还是以后流行的存在主义,其大本营都设在这两个国家。产生这种情况除了些特殊的因素(如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和个人原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有一些偶然巧合。所以,当另一个重要哲学流派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出现在英国时,人们并没有感到突然,因为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同样也具备有利于产生新思想的条件。

1. 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

在英国哲学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支配地位的一直是绝对唯心主义。它认为现实是单一的精神或经验整体,其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布拉德莱(F. H. Bradley, 1846—1924)。这个观点在20世纪早些时候遭到了波特兰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和G. E. 莫尔(G. E. Moore, 1873—1958)这两位年轻的剑桥哲学家的挑战。他们认为,这个理论有关现实部分不无道理,但不够全面,而且缺少非思想部分的对应物,如果不联系整体的话就找不到这样的对应物。于是,这两人在较短的时间里朝着一种玄学的方向努力,试图找到修正这一理论的方法。

罗素的兴趣比较广泛,除了哲学之外,他还研究逻辑数学,积极参加反战运动——从一次大战到越南战争,从常规战争到核战争,关心各种社会问题。他不仅是位杰出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是位有正义感的社会活动家,在英国国内和国际上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他的哲学除了采用一种逻辑推理方法外,还继承了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手段,强调真知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如果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变得枯燥无味的话,那也不是伟大的哲学所造成的。人类如果生活在偏见的“监狱”里,把一层“穿不透”的面纱放在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话,自己就会变得渺小。他还说,我们通过哲学扩大了自己的兴趣,包纳了整个外部世界,也就扩大了自己,把自我和非我连到了一起。所以,他的哲学并没有什么神秘主义的目标,只是不赞同纯理性认识。他进一步论证说,即使世界是枯燥的,它也非常伟大。通过哲学我们认识到思想也是伟大的,它能够让我们和宇宙连在一起,这是它最大的功绩。

罗素将他的立场说成是逻辑原子论,以区别物理上的原子论。所谓逻辑原子是指那些为解决各种逻辑悖论,通过语言表明我们的意思,展示如何真正知道我们为求知进行分析时想要知道的东西。哲学家的分析不同于物理学家的分析。物理学家分析的是物质世界,而哲学家分析的则是有关这个世界的话语。由于在物质事实和它的象征物之间有某种基本的结构认同,这种分析的结果就转用到物质事实上。

罗素的逻辑原子论思想遇到了奥地利人路德维格·威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挑战。威特根斯坦一方面同意罗素所说人的日常语言像衣服遮住身体一样,遮盖了人的思想,所以需要进行分析,需要将它分成基本成分以便描述物质世界的基本事实。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思想的表述需要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的话就没有价值。他还认为,罗素未能确认逻辑思

想的一个独特特征,这个特征不是常用的“不”和“或”,因为这两者并不代表物质世界的内容或关系,否则逻辑研究的对象就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样了。他说逻辑先于各种经验,从物质世界寻找逻辑问题的答案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分析必须表明对语言的限制以及使用逻辑原则的可能性。所用的方法就是要确定意思的基本单位,确定如何这么做,这样就把逻辑和“神秘”这两部分东西区分出来了。

威特根斯坦对罗素逻辑原子论的补充和修正非常重要,影响也大,不仅是反玄学的宣言,也为反对玄学的人提供了论战的材料。这些人因为大都住在维也纳,于是被人称为“维也纳圈子”(Vienna Circle)。当时有一个重要论点,说是那些不能减至基本经验单位的陈述句超越了对有意义语言的限制,所有必需的真理都是绝对正确的命题,因此没有提供什么信息也就无关紧要。这个论点让他们觉得玄学不仅陈旧而且在逻辑上也站不住脚,因为它已经没有语言的基本特征。有了这个共识这些人就以逻辑为基础,建立了一种新的实证主义,很快被人称为逻辑实证主义。

但是“维也纳圈子”的人对于威特根斯坦的理论也不是完全赞同,他们对他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甚至提出了异议,这个观点声称要对语言描述的现实结构进行框定。他们认为,根据威特根斯坦的标准,这样做未必妥当,因为无论是无条件正确的命题也好,经验陈述也好,真实和语言在结构上是一致的。这样,威特根斯坦的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玄学。正如布拉德莱(F. H. Bradley)所说,想要证明玄学不行的人恰恰也在使用另一种玄学。

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不同的哲学家对实证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都提出了不同看法。大部分人都认为实证主义的功能应当是一种分析活动和对语言的解释。虽然具体说法有些分歧,但都承认这种分析不是经验主义性质,就是经过证明完全正确的命题。德国哲学家莫里兹·史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说:“我们

只是建立了大家一直遵循的规则去解释各种词义”,但是如果大家都用现在的情感去解释过去的意思,那就令人费解了,即使这样做了,对这种解释也会提出疑问。另一位哲学家鲁道夫·卡纳伯(Rudolf Carnap, 1891—1970)认为哲学要研究逻辑性的句型结构,分析仅仅是弄清楚包含在科学语言当中的“组成”和“转化”规则,但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去分析似乎就不对头了。^①他后来相信分析和证实原则是要科学家们采用某些规则,避开那些根据这些规则无法分解成基本陈述句的东西。这种证实理论包含道德和宗教信仰,而不是那种许多人不喜欢的绝对玄学思想。

在对一些表面上看意思十分接近的句子进行分析时,哲学家们发现了自然主义特性的谬论。这种谬论把根据道德直觉判断的“简单”,和非自然特性的“善”,同根据自然特性判断的“喜欢”等同起来,真正的错误是把道德判断当成了一种事实的陈述。事实上,道德判断中的有关伦理方面的词完全是情感方面的,用来表达某些感情,道德判断中的这种情感叙述经过了各种加工。有些人认为,卡纳伯所描述的道德判断只不过是一种命令,会贬低感情的意义,因而强调道德语言中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作用。不管怎么说,道德判断就是人们通过理性或直觉陈述真理并予以确认的手段。实证主义者通过自己的著作表明这个世界没有包含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没有任何自然科学家找不到的东西。

宗教和伦理一样用来证实或考验,宗教信仰甚至都没有被说成是犯了一个诚实的错误,而是说他讲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他的上帝看上去并没有不被人看好。对宗教语言的处理忽冷忽热,有时被看成是证实无神论的分界线,后来又在基督教新神学当中被视为一种僵化的工具。伦理和宗教当中的神秘成分难以言传,这表

^① 参见 *World Philosophie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David Coop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p. 441—443.

明道德和宗教语言不陈述事实,因而是胡言乱语。但也不等于说可以将它们当作一种情感宣泄或是影响其他人的方式。

有关善的宗教情感带有东方文化的色彩。威特根斯坦的思想显然源于叔本华的意志罪恶说,而叔本华的理论又取自于印度的吠陀教。威特根斯坦有关上帝和神秘的论述带有更为强烈的东方印记。根据他的理论,如果要确立对世界的态度;“我”必须能够注视和感觉到它的整体,而不仅仅是一堆原子般的事实,正是这种有限的整体给人以神秘感;没有哪种经验性的观察用那种方式向我揭示它”。这样看到的世界可能也可以称作“上帝”,因为;“如果这样看待世界的话,我们就明白世界上的东西并不是物质的终结,而只是组成整体的一部分”。相信上帝就要赋予生命以意义。

他认为对于世界的依靠是双重性的。作为一个经验的自我——也就是有血有肉的人;“我”是整个世界的一份子,除了用网套住就无法对其了解。作为一个形而上的主体——意志;“我”的立场就是要对付世界。人的整个存在在于一种态度,如果没有世界就没有态度针对的目标。无论是否有连续性,是否超越了感觉范围;我们在与逻辑实证主义视角相对立的另一极上都有一个位置,以便可以把自我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结合起来。”这样做了就可以正确看待世界,也就能认识到只有自然科学里没有严格的有意义命题,但这些命题却无法触及人生中那些重要的神秘东西。^①这里显然有些二元论的观点,是威特根斯坦思想中无法克服的弱点。

2. 自然主义哲学

战后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哈佛大学的 W. V.

^① 参见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p. 978, Robert Audi, Cambridge, 1999。

奎恩教授(W. V. O. , Quinn , 1908—)曾经说过:“知识、意义和思想是他们所需要的相同世界的一部分,也要用同样的经验精神去研究,这种精神使得自然科学变得有生气,早期的哲学没有地位。”他的话大致勾勒出了自然主义哲学的特征,即“自然就是所有的一切,自然人就是完整的人”。^①用这种自然主义的观念去看待和理解有关人生的一切乃至世界的一切,把一切都置于自然主义顺序的发展基础之上,把自然属性看成是一切事物唯一存在的特性,是各种自然主义哲学流派共同之处。自然主义哲学在古代就有,但在20世纪比较活跃的主要有两个派别,一个是科学自然主义,一个是人类学自然主义。

科学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已经承担了对世界和人类进行完整描述的责任,因此任何和科学智慧相抵触的哲学观念都必须排斥,对于意义、思想和价值的理解都必须和科学世界观一致起来,譬如有关自由意志的信念就必须和对人体行为的解释吻合才行。人类学自然主义对自然科学没有作特别的强调,而是把重点放在世界上有血有肉的人本身上。这种研究目标不同于科学自然主义,却和存在主义现象学相当接近。但人类学自然主义主要不是研究不同文化的实践活动,而是自然基础,因为不管是什么文化实践都有共同的“生活形态”,例如对他人苦难的同情之心。

“生活形态”是威特根斯坦在他的晚年提出来的。威特根斯坦不仅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人类学自然主义哲学的领头人。他说命令、质疑等“像是走路和吃饭一样,是我们自然史的一部分”,对于它们以及其他脑力活动的分析“确实涉及到对人类自然史的看法”,这些看法没有人会怀疑,但由于它们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往往不会受到注意。比较起来,对科学的细致分析和

^① 参见 *World Philosophie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p. 501, David Coop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用语没有多少联系,哲学家也没有义务用日常生活用语去表达他的分析。科学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 W. V. O. 奎恩声称:“哲学和科学一道持续下去...不管什么可以知道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科学手段知道”。^①如果信仰对一个有科学思想的人起不到什么解释的作用的话,那他就想不到去参照它,这就导致了两种自然主义哲学的分歧。

事实上,这两种哲学派别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诸如在语言、知识、思想和道德等方面都各持己见,但有时它们之间也会求同存异。这时,这些分歧更多地涉及到其他流派乃至前辈哲学家。举个简单例子:术语和它们所代表的物质意思之间,究竟哪个更为重要?传统哲学认为物质术语如水,一定要表示和水(物质)有牵连的意思。自然主义哲学派反驳道,如果水表示这种“清澈的可携带液体”的意思,那么如果其他星球也有这种符合该定义的物质,那它也应该称之为水。但是如果其他星球的这种物质不是 H_2O 的话,我们就不会称之为水。就是说,如果术语有意思的话,那也是物质本身,如水或者 H_2O ,而不是它的符号表示的意思。自然主义哲学的这一观点对传统经验主义哲学关于必需物和优先观点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经验不能揭示世界上必需的东西,但自然主义哲学却认为能够。例如水即 H_2O 是必需的,在一切可能的环境下都对,而且这一事实是通过经验发现的,不是事先制造出来的。这一挑战的意义还不在于个别物质术语上,而是物质世界对文字理解的重要性。

在语言和人行为的关系上,人类学自然主义哲学派也有些独到见解。他们认为,语言行为犹如一场游戏,必须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意味着和其他人一道参加到其中的“习惯”和“传统”里去。

^① 参见 *World Philosophie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p. 502, David Coop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任何语言的理解都离不开人类的共同行为。所谓规则,就是要认识到理解仅仅是对常规的掌握,而这往往会忽视“自然生活”的巨大贡献。对威特根斯坦和其他人类学哲学家来说,人类是通过语言和自然界联系在一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语言必须和物体或情况直接挂钩,而是因为我们和自己的同伴一起服从同样的规则是人类共同的禀性。

关于知识的来源和性质,自然主义哲学,尤其是人类学自然主义哲学也有些与众不同之处。例如一般人常用的“我知道”被普通人和哲学家(如笛卡尔)当成是“自己明白”的意思,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对讲话人所处语言环境的反应,而不是对他思想状况的描述。在这方面威特根斯坦和他的追随者试图阐明建立一种合理的信仰是明智的道理,但同时却认识不到他们的信仰缺少依据。他不愿讨论达尔文思想,却把它看成为一种浅薄的理论。问题不在于这种观念正确与否,而是如何对待生活。问题也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同意这些信仰,因为它们来自于我们共同继承下来的背景,是我们的“自然历史”留下来的。最终这种继承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让我们一看就明白的本能,因为它不是我们所能看得见的,而是置身于我们语言游戏之间的行为。所以,我们的基本信仰表达了共有的自然行为模式,没有这种自然行为模式,其他的信仰、咨询和语言都是不可想像的。

同样,自然主义哲学家们在思想的性质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的思想和大脑是有联系的。人在精神上遭到痛苦,头脑里就会有反映。根据这种观点,痛苦只是头脑的一种状态,如同水是 H_2O 的一种状态一样。还有一种功能主义观点,认为思想痛苦就和肉体痛苦一样,要通过身体来体现。但思想痛苦是否就等同于肉体痛苦,显然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在道德的意义和作用的问题上面,自然主义哲学和其他一些哲学也有广泛的分歧。自然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

性是一种自然属性,人的权利也是天生就有的。道德原则不是像康德所说的,是人无视自然属性所服从的原则。这些观念为20世纪大部分哲学家所接受,显然和19世纪乃至更早些时候的经典哲学不一样。他们强调人的意志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人的道德观念只是对人的意志加以限制的结果。尽管自然主义哲学在人的道德问题上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但争论显然还没有结束。是用理性的方式解释人的道德责任和价值观念呢,还是认为这种抽象的道德原则只对那些没有血肉感情的怪人起作用,而不适用于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呢?

3. 后现代主义哲学

20世纪后30年里,理性主义和理性哲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抨击。对于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来说,自我的失落是理所当然的,是哲学末日或死亡进程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理性主体,或者没有了德国哲学家朱仁·哈波马斯所谓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①,传统哲学就失去了它所喜欢的主题,也就没有人去研究它了。

对于传统哲学的批评最早开始于尼采,后来又进而提出“哲学末日”的则是马丁·海德格尔。这两位哲学家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开山鼻祖。海德格尔称“哲学在现代已经进入它的最后阶段”。其实远在海德格尔之前就已有人对哲学的命运做了类似的预言。黑格尔在完成他的集哲学之大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实际上已认为哲学在他手里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则宣称随着哲学被更多的专业学科所取代,哲学已经进入了它的最后结束阶段。然而,海德格尔的宣判更带有说

^①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244 Jürgen Habermas, The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1.

服力,因为他的解释完全不同于他的前辈。他认为,哲学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相反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就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取代哲学的不应是科学,因为科学也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学科。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当然也同意他的观点,即传统哲学在道义和智力上都有缺陷,其主张至少是造成这个贫乏和无家可归时代的原因之一。

虽然海德格尔的思想对后现代主义的形成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然而真正对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几位法国人,即所谓巴黎三杰:迈克尔·福考(Michel Foucault, 1926—1984),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和让-弗兰绍斯·里欧塔德(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以及德国的朱仁·哈波马斯(Jurgen Habermas, 1929—)。后现代主义这个标签当然绝不仅仅是哲学思想,甚至还不仅仅关系到文学、艺术和其他人文科学的发展,它是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一种思想潮流、生活方式和文化倾向。它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这么几点:热衷于讽刺、仿讽、拼凑、多元化和折衷主义。这些特征在以上这几位哲学家们的著作里可以找到答案,或寻找到踪迹,例如德里达在书写和文字上玩的伎俩,里欧塔德对科学游戏应追求分歧而不是一致的论述,罗蒂所谓在理想自由社会里,知识分子一个个都具有冷嘲热讽的欲望这样一些超越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言论乃至行为。

后现代派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现代派,有时甚至是在大唱反调。例如后现代艺术和建筑总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作品说成很肤浅,没有深度。一位后现代画家就拒绝同意现代派画家有关多视角的观点。后者认为,使用多视角可以揭示统一和富于内涵的现实。再譬如后现代派的画展宣传品公开声称他们没有任何高水平的体验,也不保证更为深刻的思想含蕴,还说作品对艺术家的内心很少有什么揭示,他们的主体就是一个观察者。其次,后现代主义

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作者的淡化”，也就是罗兰·巴思（Roland Barthes，1915—1980）所说的“作者的死亡”。这个观念实际上是对以前现代派和传统作品中让作者主宰一切，而读者只能消极接受的现象的否定。这两种特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为因果关系。一部作品既然没有了深度，也就不能向读者传递多少重要信息，也就意味着作者在作品中不再起多少作用，反而可能以一种揶揄、调侃的语调处理他和作品及读者的关系。

以上这两种在后现代文化中经常碰到的现象是后现代哲学赖以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有两个与此相关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命题值得一提：一个是对玄学的否定，一个是“自我的失落”。前者为基本的信仰、话语和基本行为提供了基础或证据，是对后叙述的拒绝，是试图对科学和话语的合法论证。例如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呼唤等。后者作为一种理性的主体意识，认为应该首先对所有信仰进行批判性审查，以使其拥有正当的基础。如此说来，两个命题都有联系，基础主义要求对个人从基础开始的个人理性主义有信心。德里达对此进行了总结，把两者合到了一块，认为我们“超越于人。在整个玄学的历史当中，人梦见了他聊以自慰的基础”^①。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尼采和海德格尔两人。德国哲学家哈波马斯说过：“正是尼采成为进入后现代的标志”。^②因为尼采没有从外表去评价玄学，而是公正地从现实结构和知识结构两方面作了探讨。尼采认为玄学如同基督教，展现了一种巨大的历史需求。自从古老的神话消失以后，我们的文化就一直感到有这种需要。玄学是一种意志冲创力的功能，是对“真实世界的创造”。对于那些不能忍受瞬息即去思想的人来说，

① Derrida, Christopher Norris, p. 218. Fontana, London, 1987.

② 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341. The 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1.

是将稳定的“存在结构”和流动的经验放置在一道的一种手段。哲学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隐喻性的,或者说只是些视角而已。人们不应当从中寻找和辨认真假,因为其中并无什么事实,只有不同的视角。但从哲学体系的研究视角来看,历史、心理和生理的因素倒是存在的。尼采发明了所谓的“理性自己”,因为道德主义者需要某种承担责任并在需要时予以惩罚的东西。

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观点大多都赞同。他认为,玄学是用来代替人类自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时代以来就已失去的东西。这种替代显然被误导了。对玄学主体的理性引导可能是所创建的一种特别的玄学时代。然而,海德格尔同时还认为尼采并没有超越“玄学”,相反却是最后一位玄学者,只是从相反的方向去实行柏拉图主义而已。尼采把玄学所显示的两种主要倾向推向了极端,因此把玄学的基本可能性都用之殆尽。对海德格尔来说,玄学可以理解为对“存在物的存在”的检查。所谓存在物即指人、物体,那些可以被认识、处理或加工的东西。存在则是产生这些存在物的最终原因。存在因此被解释为起到原因作用的存在物,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任何东西负责的“现物”而存在。这种存在无论是柏拉图的“善”、基督教的“上帝”、斯宾诺莎的“物质”、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总是通过类比被解释为某种更为熟悉的物品。例如是人,还是什么物质的东西,玄学常用的解释世界的手法,虽然并不是非常清楚,但都是作为某种产品或是物品——存在——而出现的。

这种用“生产”观念看待现实的倾向和对待存在“基础”进行主观“叙述”的倾向有着密切关系。两者的关系在于典型的生产者——当然首先是人的主体。这个观点在以前的一些哲学家,如笛卡尔和普罗塔哥拉那里实际上都可以找得到。普罗塔哥拉说过“人是一切东西的尺度”,笛卡尔则将现实世界界定为“可以通过表现主体和为了表现主体表现的东西”,但只是在尼采那里“玄学主

体”和“生产性”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提出的“冲创力绝对主体性的玄学”把世界看成几乎完全是由人的主体产生的,将人视为由“驱使力和影响力”组成的复合体,而不再是笛卡尔所称的“理性动物”,只是些野蛮的兽类。他所说的“冲创力”已经推翻了正统的玄学体系,但他仍然想用一种特别的内涵来阐释现实和认识之间的关系。^①海德格尔指责玄学忘记了存在,没有注意到存在和存在物之间在本体上的极大不同。存在不是一种存在物,而是一种存在方式。从历史上看,在我们面前受到揭示或是昭示的是存在物,是存在而不是人要对这些揭示方式负责。这样玄学史也就是存在史,玄学家们只是做了些揭示,却自欺欺人地以为他们探讨了现实的永恒基础。当代哲学的争论正是从这两位哲学伟人的思想里引发的,其代表人物则分别是福考和德里达。德里达曾经是福考的学生,但似乎对待老师的著作并不留情面,用他的结构主义理论毫不客气地把福考有关疯癫的书进行了分解。福考因此很不高兴,称之为“既不严肃也有点教条”。实际上这件事还只是根导火线,问题的根子还在于他们不同的思想倾向。

福考的理论和尼采的观点关系紧密。首先福考认为语言并不反映客观秩序,而是将顺序和结构强加给客观世界,这和尼采所说的“事物没有本质,它们的本质都是人为制造的”基本一致。其次,福考的“家谱学”理论是在尼采提出的从权力角度解释知识和话语构成的“家谱”方法上形成的。对于福考来说,尼采的方法尽管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了“冲创力”和驱动力,对玄学表示了怀疑,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还有不足之处。他的“家谱学”理论对于从属体系和控制游戏进行了全面仔细的检查并作了记录,内容涉及到医药、罪犯处罚制度、两性关系等。结果,据称获取了有关知识,特别是有

① 参见 *World Philosophie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pp346 - 361, David Coop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关话语许可的方式。这套理论可以追溯到战后风行一时的结构主义。在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他采用了所谓的“考古”方式来研究人文科学的知识代码或话语。他认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这些代码或话语虽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却没有连续性。这表明对知识、思想和争议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代码产生于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说有一套方法可以将产生科学的各种实际活动统一起来。因此文艺复兴时的科学受制于“相似的”认识,科学家们发现宇宙具有一种相互联系的特性,而在古典时期,人们就喜欢把认识对象放在一种复杂的等级次序里。然而经过实践,福考逐渐认识到这种考古式研究方法有它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些转弯抹角的语言陈述不利于它的采用,其权力效果难以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话语需要在一种直截了当的语境里去理解和运用。他从18世纪末以来人口控制和技术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受到了启发,想到了“生物权力”时代。过去200年的时间里,围绕着性问题而大量产生的医学和神经学领域的话语,是作为一种对人体和生物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的手段。这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认识的进展依赖于适当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也不是说权力精英要把大众媒介作为一种思想工具。福考感兴趣的权力没有什么标记,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机构对它进行支配。权力和知识并非偶然地联系在一起,并非仅仅是各自的手段,恰恰相反它们包容和建构了对方。

福考对权力和知识作了大量和详尽的描述,特别是从中得出了相对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的结论。他以前在考古理论的文章里把真理说成是相对于会产生言语和理论的代码,而现在他认为真理成了一种有秩序的程序系统。这是因为这些程序产生于和权力系统有关的周期性关系。真理不在权力之外,而是多种因素限制的结果。每个社会都有自己对真理裁定的体系。由于这些裁定言论和争论对否的体系都是相对的,寻找一种理性的仲裁就没有任何

意义。

福考的理论对玄学派的基础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冲击。继尼采提出的“上帝之死”的命题之后,西方学术界又掀起了一个所谓的“人之死”的辩论高潮。所谓“人之死”主要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对超验自我的现代理念,也就是对所谓的一种永恒的、普遍的、为思想和行动提供了最终基础的理念抱有怀疑。其次是,这种怀疑主义对人们视为理性、知识或正确行为的任何持普遍、反历史的立场和观念都表示怀疑,甚至对哲学的功能特征,对其作为理解或组织事物整体的最终基础的价值都提出了疑问。

人类社会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把神看成高于一切,神在那时成为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基础。文艺复兴以后,神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本身受到了更多的尊重,由此产生了人文主义。人的思想逐渐变得像神一样,成为一种超验的主体,人性则被用来作为解释知识和行为的基础。于是人成为一种新的形而上的主体。在人文主义的旗帜下,一切不同的声音、观点和思想都被纳入到一条特别的历史通道,打上了特制的历史印记,那就是白人、男性和西方。尽管不时听到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但更多的人则担心一旦失去了西方文化的这个重要基础,西方世界将面临心智和道德的危机,出现社会和思想上的混乱。人们的思想观念将会分裂成各不相同、无法比较的断层,对生活或文化的看法将因失去了基础因人而异,各持己见,文化传统也将因此而失去了连续性。这样下去不但在理论上带来欠缺,在政治上也会产生危险,理性主义의思想和批评实践因此将会消失,学术和思想阵地势必会被非理性主义思潮占领,结果西方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将掌握在这些非理性主义者手里。面对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危机,一些西方思想家重申超验主义的基础,德国哲学家朱仁·哈波马斯便是其中的一个。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哈波马斯在重建哲学

话语的现代性方面有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他同意福考有关理性有一席之地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仅仅承认理性作用是不够的,必须对真和假,正确和错误进行区别,同时理性也要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为这些区别所建立的标准,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是必要的,但它们不应阻碍对其中超验性的理解。正是由于理性的力量,对问题的理解,对内在关系和不同题目之间的交叉处理都应当是公开的,也是可以批评和修正的。有关理性、真理和正义的思想可以在我们批评传统观念时派上用场。虽然我们不应脱离社会实践去谈它们,它们也不应被仅仅当作具体的事务来处置。这就有必要从认知和行为两个方面去重新思考理性思想,使之具备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实际的、必需的 and 积极的特性。

哈波马斯的哲学研究方法中的关键是对“意识模式”以及相关的“主题哲学”的否定,而主张采用“交际行为”式的跨主题模式。他认为,这在哲学现代话语里是一条敞开的路径,但在一些重要时候却没有人去走,例如黑格尔用他的“绝对知识理念”选择了现代哲学的主观主义模式,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自我意识”方式。以后的左、右黑格尔派都试图去掌握“理性”,也选择了主题哲学这条道路,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是在当代实用哲学中的反响,其二是在新保守主义中的影响。哈波马斯试图更新“反话语”的概念,把它作为批评主观主义及其后果的武器。他从一开始就把反话语和现代性放在一道来论述,将尼采的“反启蒙”说作为他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尼采的学说实际上开辟了两条路,一条通过海德格尔发展到了德里达,另一条则通过巴泰伊(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发展到了福考。

哈波马斯不同意海德格尔有关存在和存在物之间、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之间具有本体分歧的观点。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分歧论是想根除有关真理的命题,同时又想贬低有关迂回辩论的思想。

海德格尔提出了语言具有通解的一面,将它同内部世界的学习过程分开来,以后又提出了语言历史主义以及“真理产生”和“存在命题”这样一些不确定概念。哈波马斯声称,海德格尔的这些理论缺少一种互相依靠的辩证关系,在对世界的历史认识和其间可能经历的实践活动之间并没有这种联系。内心世界活动是由认识世界的普遍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但这些因素反过来也受到社会实践的影响。社会实践为正在进行的整个朝气蓬勃的生命世界提供了背景知识。意义和有效性不能截然分开,正是有了有效性,学习进程才能得以继续下去,而学习进程可以对含有社会实践的世界观提出质疑。他认为,海德格尔没有对真理命题和真理发现之间的相互关系给予注意,将前者当成了后者,同时把对“形而上的克服”变成了一种“临时性的超基础主义”。

在研究德里达的文学理论在美国接受的情况时,哈波马斯也采用了同样的语言操作观点以加以抵制,乃至否认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区别,颠倒把逻辑放在修辞之前的传统。他声称,一旦柏拉图的逻各斯概念不能得到认可,语言的修辞范围得不到确认的话,哲学话语的性质也就要改变,变得既没有逻辑性也没有文学性,只有表面意思而没有内涵,简言之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哲学了。修辞分析的方法总的来说关系到文本的质量和效果,这么一来也就关系到哲学文本中的那些将要独立的领域。经过哈波马斯的论述,这场争论的实质变成了是否能在日常会话话语和诗歌话语之间划出一条分界限。如果划不出的话,德里达所提议的语言美学特色就会带有其他任何一种用文学修辞手段进行分析的特定话语所产生的后果。他坚持认为要区分两类语境,一类是诗歌功能占主导地位,其结构受其制约的话语,另一类是诗歌功能占次要地位,只担负辅助作用的话语。在坐标的一端是日常交际语言,由一种习惯力量来协调不同参加者的语言行为,通常用正规的说话方式来进行社交活动。坐标的另一端使用的是编造的叙述性的和隐

性的语言,不用于日常生活语言。这两类语言担负的功能不一样,各自的特性也不一样。哈波马斯认为,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让语言解决问题的能力消失在创造世界的能力之后,这样他们就不承认不同于交际行为,为了处理特别类型的问题,满足特定要求而形成的特别话语的独特地位。这些话语包括科技、法律、道德、经济学、政治学等。在这些话语以及处于它们和日常话语之间的哲学当中,经常出现的会话修辞成分受到了限制。它只用来表示解决问题的特别目的,从属于特别话语的需要。

他认为,在当代哲学的主要课题中对哲学的批评不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不再有什么“神秘主义的存在”这样的议题。中心依然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以及对自然、社会 and 自我的控制这样一些内容。但是主线是尼采的力量理论,基本前提是现代理性只不过是一种通向力量,偏离方向,经过伪装的意志。批评的目的是拉开理性的面纱,彻底揭示它所服务的力量。在巴泰伊那里这种揭示采用了呼唤和询问另一种理性的形式来了解这个已知的世界上什么东西受到了排除。而在福考那里,这种揭示采用了家谱的形式披露了和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复杂的知识本质。

在法国哲学家当中他比较喜欢福考。他认为,相比较而言,福考开辟了社会研究的调查领域,他没有把神秘的社会病理因素放进原始力量的命运里。他赋予力量概念以历史超验和社会理论意义。他认为,福考的家谱学首先是一种超验的历史学,其目的是构建一种客观物的客观史,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基本思想作些形式上的批评,用对主、客观的认识(知识)来构筑自己。它把任何这样的构筑都当成是一种历史事件,在它周围构建数量不等、可以理解的内外关系。福考说这是一种分析性的分解,带有政治理论性,表明事物并不需要多种偶然的和任意的方式去代替单一的、必须的和经常的方式。福考特别想要除去人内心的“现代”人的科学,在其背后隐藏着日益蔓延的现代控制技术,也隐藏着日趋活跃的自

我。其次,他认为福考的家谱学还用来指明了一种历史方向,多少带有一些功能主义特性和对社会学知识的批评,尤其是针对各种融于辅助治疗手段和服务社会的技术知识。他觉得实际上这是用于规范和整顿“真理”效果的主要传输工具。

然而,哈波马斯也没有全部认同福考的观念。在力量—知识的理论框架中他主要不赞同福考的整体批评,也就是把理论性批评,理性的方式变成完全用理性修辞肯定的另外一部分来批评理性。

从康德到马克思都采用了社会历史的思想批评形式,也就是用理性批评理性。在哈波马斯看来真正的问题是理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给人的启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他认为,福考回避不了因为使用理性批评理性而造成的“行为矛盾”。由于他把家谱式调查方法用在了一个他所激烈批评的、和“人的科学”极为相似的情况里,家谱方法因此显得用得过多过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有效性和价值结果通过他所用的一些术语,如相对主义又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受权力论启发而产生的现代性经过社会科学理论的解读正好把标准的人事解读颠倒过来,但并没有代替它。这样,原来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里很含糊的现象都被挤压到“权力”层面当中去了,例如法律和道德中的内部动态关系,不论是控制的后果还是解放的后果,都从福考关于规范化功能的叙述里消失了。他感到正是由于理性化过程中的部分论述比较含糊,似乎突出了它的必要性,但也有些显而易见的断章取义,这就要求重新构建一种辩证的启蒙,而不是对它进行全面的批评。

哈波马斯的策略是重新研究现代性的反话语,这部分内容正是尼采等人所忽略的。这部分话语里有一种自成体系、自我约束的主体原则对批评起着管制作用,但这种作用是以现代性为代价的。他指出了一条已经开辟,但还没有人去走的道路。这是一种不用强制而在主体之间进行的方式。它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承认,

也能够解释理性,重构黑格尔的伦理生活意念。他断言,后尼采主义者所呼唤的另一种理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而是受到了破坏,现在最好还是把它当成一种分裂的伦理整体概念去处理。他同意黑格尔将理性视为一种统一和妥协的痊愈力量,然而他心里想的不是那种绝对力量,而是那种非强制性的、主体之间能够协调一致的作用力。他同时也赞同马克思提出的哲学必须联系实际、其理性内容必须在实践当中得到发挥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好和后尼采主义特别重视美学、神秘和古老的经验领域的观念针锋相对。如果一定条件下的理性被视为社交场合中的互相作用,理性的潜能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活动中体现出来。但是哈波马斯心目中的社会实践和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并不完全等同。他认为,生产活动过于具体,难以等同于理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劳动作为一种组构世界的异化形式是一种唯心主义残余的表现。如果我们一定要超越主体模式的话,就一定要克服它的影响。但他不同意简单地取消主体,而主张用所谓的“可以确定的否定”来这样做。如果交际行为是模式的话,非中心的主体依然要参与到语言的交际活动当中。在这方面交际活动和理性之间有一种内在关系,因为语言运用总是按照有效要求方式进行,而有效要求最终只有通过非强制性的理性力量在主体之间互相承认时才能得到补偿。这种朝向有效要求的交际行为使得求知过程得以实施和延续,从而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以及理性的条件和标准。

总的来说,哈波马斯的观念和一些激进思想家相似。他和他们一样,认为意识模式已经枯竭,而理性在历史、社会、人体和语言上都担负着重要作用。但和他们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启蒙运动的缺陷只有通过进一步启蒙才能得到纠正,整个理性批评破坏了进行批评的理性能力。他不承认现代化进程既发展了理性,又歪曲了理性。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人,他的思想在今天的西方哲学和学术界有着广泛和重要

的影响。

雅克斯·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当今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的名声大有压城之势,在学术界似乎鲜有人比。这位出生在阿尔巴尼亚的犹太人后裔凭着他对哲学的熟悉和理解以及对文学的兴趣,每年不辞辛苦在法国和美国之间穿梭,传播他的解构主义新思想。有人为他喝彩,也有人对他挑剔,究其原因,盖出于他的解构主义理论。

一般人总认为解构主义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其实这正犯了德里达的大忌,因为他一直强烈反对把他的理论仅仅看成是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方法和技巧。事实上他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打破学科之间界限,特别是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他认为,哲学不仅仅应追求永恒和客观存在的真理,而且要和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德里达的学术生涯应当从他到巴黎求学、受到存在主义文学家和思想家卡缪的启发报考巴黎师范学校哲学系算起。但他真正成名还是因为他在许多年后的1966年美国霍布金斯大学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用解构主义观点谈文学的论文。从那以后,解构主义就在美国文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或许也就是因为这篇论文,德里达却发现自己在哲学家当中不大受欢迎,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兴趣从单纯的学术范围转向政治和其他一些实用领域。例如他参加了一个研讨哲学实用教学的研究机构,试图让哲学在大、中学的教学当中减少它的神秘性,让年轻学生更喜欢哲学,成为哲学知识的使用者和传播者。

当然他更关注的还是他的解构主义理论。他在一篇“论文的时间”里说过他的著作在当代哲学里只处在边缘地位,解构主义“基本上不是哲学的内容、主题和论点,但它有自己的意义框架,特定结构,说教或修辞标准。就其市场来说有其可能的规律、权威和

代表”。^① 德里达喜欢把不同文体意义顺序中的思想等级制度和对立概念加以拆散,寻找其中的盲点,或者说自相矛盾的时刻或地方。这些东西在文本中会引起修辞和逻辑之间的对抗,引起它想说的意思和受限制的意思之间的对抗。也就是说,解构一篇文章就是实行战略上的颠倒,抓住那些用传统方法进行阐释容易忽略的非重要细节,或者对文体的边缘部分进行再发掘,从而找出一些埋藏在文本深处的重要意念。由此看来,德里达在运用解构主义方法时确实可以对文本(包括文学文本)做出阐释。那他为什么又再三否认他的理论是方法或是阐释呢?合理的解释是他要解构的正是那种认为总是可以依靠某种适当的自我认同概念或形式去掌握的见解。他在一封致日本友人的信中写道:“所有 x 受到了解构,或是所有的 x 没有受到解构的句型都没有抓到要害,就是说它们至少都是假的。你知道,我的文本里主要的危险之一是那些称作‘解构’的东西,是对本原的框定,以及那些称为第三人称现在时陈述句的东西。”^②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反对把解构当成一种方法,因为如果那么做了,就会把它纳入到从希腊柏拉图开始的传统理性主义思想轨道。把解构阅读的具体活动细节置之一旁正是为了肯定和支持他的理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具体运用时可以包纳各种活动,而不仅仅是解构一种文本。他的这个观点或许也是针对他的那些对手们,因为他们一直说他是个诡辩家,纯粹在玩弄诡辩游戏。他声称,哲学有压制写作并使之升华的倾向,哲学家甚至可以界定为习惯忘记自己是在写作的人。为了证明这点,他不惜从哲学史上引经据典,从古希腊到当代的胡塞尔、索绪尔和列维—施特劳斯,来证明通过解构的倒置逻辑

① 转引自《法国当今哲学》,阿兰·蒙特菲奥 44—45 页,剑桥,1983 年。

② 见 OP. Cit., David Wood(ed), pp1—8.

辑,所有关于语言、哲学和文化的思想都是在广义的写作背景下面进行的。他之所以强调文本写作,并非和哲学分离,也不是想获取阐释的自由,而只是反对把解构思想和哲学对立起来,反对把他仅仅视为一个修辞大师而对哲学理性和真理性只有一知半解。

他说过“我们仅用符号来思维”,还说过“除了符号别无所有一”这样的石破天惊的惊世之语,^①因此赢得了许多文学界人士对他的赞许,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哲学家,剑桥的哲学家们甚至拒绝授于他荣誉博士称号。细析起来哲学家的愤慨或许不无道理,因为德里达攻击的两个主要目标都和哲学有关。其一是“逻各斯中心论”,其二是“哲学存在论”。他认为,二者都反映了“超验所指”受到了“不能压制愿望”的误导,所谓“超验所指”是指独立于语言的东西。为了解释语言现象,他发明了新词 *differance*,此词由 *difference* 和 *defer* 两词组成,用以表明词义之间既有差异(*differential*),又有一种时间延误(*deferred*)。他认为词义取决于该词和其他词之间的差异和对比,即所谓“所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在话语产生过程当中,词语通过能指指向未来,为语境的发展和语义的延续提供了条件。他的解释应当说充实和推动了语言理论的发展,为他所说的“所有的语言都是种写作”作了最好的注释。^②

除了以上这几位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之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还出现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围绕着几个重要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自我的失落”。这里的自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人那里当然有不同含义,但对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来说主要是指个人主义。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不同哲学派别之间有很大差异。例如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

① *Derrida* p.113. Christopher Norris, Fontana, London, 1987.

② 参见 *Derrida* pp.15-16 Christopher Norris, Fontana, London, 1987.

说过,马克思在年轻时曾经是个个人主义者,但以后他却认为“人的主体不是历史的中心,只有在想像当中对‘自我’产生错觉时是例外”。^①福考作为一个代表后尼采主义思想的人一度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因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方式构成的。人类在这些方式的作用下成了臣仆。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人是大自然近期的一种发明。海潮一旦上涨,海滩也就消失。人也同样如此。大自然一旦变脸,人也会被抹去。

更多的人似乎赞同用“人道主义”来描述“自我”。个人是或可能是相对独立的意义和理解的渊源。但这种观点早就遭到了法国结构主义者的反驳,他们声称,决定性的不是人,而是结构!人算不了什么!到了海德格尔那里,人成了附于他或她讲的语言了,与其说人讲语言不如说语言讲人。也就是说我们被送进了某个特定时代的语言结构里,为我们指定了能够进行说话和思维活动的方式。罗兰·巴思宣称的“作者死亡”将这场人和语言的关系的辩论推向了一个高潮。

他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他称“代码游戏”的语言插进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结果作者无法掌握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更糟的是作者无权决定文本的意思,因为意思的理解是代码的功能。德里达走得更远。他认为“自我”或“主体”插在语言功能里,因为在整个讲话过程中我只能是“自我”(self),我讲的话要符合不同类型的语言体系,要符合从差异到延缓的流行运动。这就使得主体不再需要,而是成为集语言的“代理、作者和主人”的身份为一身的人。

当代哲学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对玄学的态度。一方面许多哲学家和流派对玄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它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哲学如果真的完全摆脱了玄学似乎又缺少了深度。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哲学家奎因的思想没有什么说教,也没有给人什

^① For Marx, p. 34. Louis Althusser. London, 1977.

么较为深刻的启发,因此而缺少当代一些哲学大师如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那种“西方玄学意识”。由此看来玄学有点像才出炉的烤山芋,既烫手碰不得,又好吃不能舍弃。随着玄学的淡化,人们似乎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受到它的约束。一些非理性的东西,如情感、狂热受到了福考和德里达等人的重视,被专门列出来当作理性的对立面。德里达则提出了“阳物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可分”的观点,想对理性和情感、脑力和体力这些相提并论的术语进行解构,而一些女权主义思想家据此认为德里达有一种男性特权思想,甚至进一步提出玄学思想中一些重要的理性自我概念有一种阳性特征,是对女权的轻视和挑战。

当代哲学家中更受玄学影响的恐怕还是海德格尔。他提出的“陌生感”和“无家可归”这两个概念高度概括了现代人的特征。造成无家可归的原因是技术,技术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实践活动,而只是一种揭示世界的方法。他说过,地球通过勘测和揭示成了一个矿区,土壤成为矿藏。地球上的一切都被加以利用,得到了开发。这种揭示将“存在”解释为“生产”的原因,使得玄学达到了顶峰,人也由此成为一切事物的基础,世界则被视为人的商品。

这种揭示当然是相当可怕的,远远超过了美学或是其他任何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即使那些极端主义者看问题也要温和得多和实际得多。其次,这种揭示远离了事物的自然属性。技术让人主宰一切,破坏了人和自然界之间的亲密关系,造成了人和自然界的隔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剥削者而不是它的伙伴。技术是玄学达到顶峰的产物,它之所以可怕还在于它严重影响了人对一切事物,尤其是对语言的看法。语言既是“存在”的房屋,也是人类的家。房屋作为工具看待时并不是家,而只是存放东西或者投资的地方。同样,一大堆符号如果只是当成工具看待时也不是真正的语言。所以,如果对语言只是观察、控制和使用,和语言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把它当成我们的存在,人就会成为无家可归的过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确实应当成为语言的主人,但这并不是要去控制自然,或者是掌握作为工具的技术,而是取得类似于运动员或工匠们掌握的技巧。这是一种高雅的和天衣无缝的自我把握,显而易见是人类有可能实现的愿望。

4. 现象学和阐释学

现象学(Phenomenology)术语最早在18世纪就在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当中出现,不过当时并未形成一种系统的哲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它还是在20世纪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正式提出的。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出生于普罗斯涅茨(Prossnitz,即现在捷克的Prostejov)。他早期学习自然科学,如物理、天文和数学,但后来认为哲学是一切科学之本,于是开始致力于哲学的研究。他先是跟随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学习,后来到德国哈勒大学担任哲学讲师,最后经李凯尔特推荐到弗赖堡任哲学教授,直到退休。他在生前就发表了奠定现象学基础的一批著作,其中有《算术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rithmetic*,1891)、《逻辑研究》(二卷,*Logical Investigations*,1900—1901)、《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1913)和《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The Crise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1936)的一部分。他去世以后,留下了一大批手稿,由比利时人范·布雷达(Herman Leo Van Breda)建立了卢万胡塞尔文库陆续出版。通过教学和研究,他培养、影响和提携了不少哲学家,其中包括海德格尔、萨特、莫勒—潘提等人。虽然他和他的学生们的观念后来发生了分歧,但他所建立的现象学,作为哲学的一门学科,在20世纪的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现象学似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原则,而

更像是个松散的运动,分成了不同的方向各自发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和存在主义的靠拢和对存在本质的关注。它是一种超验主义哲学,只关心现象过后留下的东西,但又主张世界在思维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有的哲学家声称现象学是对超验主体的思考,而另外一些人却相信它只是接近具体存在的一种方法。有些人运用它来寻找由时间、空间和大千世界组成的哲学,就像是我们从中经历的那样。最后有人说现象学试图直接描述我们的经历,而不去考虑心理因素,也不去解释原因。尽管对现象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同点。其中主要包括这么几点:

① 区分自然思维态度和哲学思维态度。胡塞尔认为认识论是对哲学进行的反思,也是对理性进行的批判。他还认为,自然科学不是最终的存在科学,只有现象学才是科学。他的这种看法过分强调了认识论,受到了他的学生海德格尔的质疑和挑战。后者把现象学的重点放到了本体论上。

②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科学和哲学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担负着为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的任务,而科学则起码为哲学提供了某些实质性的内容。

③ 哲学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在观念上产生些根本的变化,要从具体事物到抽象概念,从实质到本体,从科学上的客观意义领域到生命世界的直接经验意义领域。虽然哲学家们对这种变化的特点可能有些分歧,但对其必要性却无人怀疑。

④ 现象学哲学家们大都赞同精神现象的原则。胡塞尔认为,精神现象是一种有意识的现象或行为的特性。从更深层次上说,它是一种原在客观世界以外的限定意识特性。海德格尔和其他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则认为精神现象是人类现实本身。

⑤ 所有现象学哲学家们还都基本同意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回答有关存在物的“意义和存在”。另外他们还同意为了使这一目标

具体化,哲学家主要关心的不是所有限定物的最终原因,而是存在物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是如何形成的。最后,他们还一致认为为了回答有关存在意义的问题,主体性要特别予以注意,也就是要特别注意质疑存在物存在的那个存在。当然,哲学家们对于主体性还是有不同看法的。胡塞尔把它看成是物质世界没有的单一体,而海德格尔和其他后期的现象学哲学家们则把它当成世界上的一种存在。胡塞尔对海德格尔的不同观念似乎很是不满,称之为“从一个原先它想要克服的层面曲解了现象学”。

⑥ 所有现象学哲学家们都力图捍卫某种形式的直观主义原则,赞同胡塞尔所谓的“所有原则中的原则”。^①

阐释学(Hermeneutics)最早是对神学文本的解释,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在20世纪的德国演变成一种更广义的阐释性哲学。阐释学有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其一是迪尔塞(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等人提出的,把阐释视为对历史或人文科学进行研究的方法;其二由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将阐释看做是一种本体经历,是一种阐释者和要理解的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活动。对第一种发展方向来说,主要是为作者或是当地人的真实意图的理解提供一套规则或者标准。第二种方向则强调对规律的解释,因为在他们看来运用规律的过程必然要改变原来的意思。总的来说阐释学是对这一过程及其可能条件的分析,特别注重对古代文本和边远居民文本的阐释。

阐释学作为现代意义的科学方法是从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开始的。他分析了对文本及口语的理解和表达。19世纪的历史主义继续强调了阐释作为方法的功

^① 参见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pp. 665 - 666, Robert Audi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能,并在迪尔塞那里达到了高潮。后者试图把人文科学磨合到阐释学的理论里去,使之成为一种既有想像力,又可以在公共场合下再证明的他人主体经验。这种阐释揭示了人类在无法通过询问等经验主义手段获取客观知识时所可能采取的另一种方法,这样就为人文科学增添了一种识知工具。19世纪阐释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循环阐释的承认。循环阐释这个概念最初由施莱尔马赫发展起来的,意思是指阐释对象中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对每一部分的解释依赖于对整体的阐释。如果每个阐释都依赖于其他阐释的话,那么循环阐释也就难以避免了。

20世纪的阐释学在海德格尔和加达摩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的推动下,对循环阐释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正,视之为所有知识和活动都具有的特征。这样阐释学就不仅仅是人文科学的方法了,且带有更大的普遍性。阐释和人类所有有限与确定的知识分不开。因此,哲学性的阐释学批评了笛卡尔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和伦理学中间的启蒙普遍论,将科学看成是一种文化实践,而将所有判断中的偏见看成是无法避免的。从积极意义方面来说,阐释学强调理解不仅是一种公开的对话,也是一种历史传统的继续。这里偏见受到了挑战,视野得到了扩充。

阐释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加达摩尔。加达摩尔早年曾经跟随海德格尔学习哲学,30年代初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柏拉图和他的辩证伦理学》(*Plato and His Dialectical Ethics*, 1931),表明了他对希腊哲学的兴趣。但他的成名之作还是30年之后的《真理和方法》(*Truth and Method*, 1960)。该书出来后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不仅在哲学界引起轰动,而且在神学、法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都有广泛影响。该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抽象的美学思想。提出艺术品需要真理这一命题。他以把玩艺术品,体验其中的美感为例,喻指文本吸引读者追求真实经验。书的中心部分将传统当成理解的条件加以论述。他认为,传

统并不是学习历史知识的目的,而是存在的一部分。最后一部分声称语言是传统的载体。他努力把阐释学的重点,从默默无闻和引起误解的问题,转换成人们通过语言对话参与的共同理解。

5. 西方马克思主义

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后,它在全世界范围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一些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年代发表名著《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1923)的匈牙利人卢卡契(Georg Lukacs, 1885—1971)。他在这本书里声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要归功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吸收,强调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思想之间的联系。他所阐发的理论显然有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当时遭到了不少共产党人的批判,但却受到了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的欢迎。从那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就独辟蹊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当中迅速发展起来。下面重点介绍几位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是卢卡契。他的经历比较复杂,早在1918年他就参见了当时的匈牙利共产党,还在第二年成立的苏维埃政府里当过教育部部长。后来他又先后跑到了德国和苏联,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回到了匈牙利,在一所大学里当了教授。这以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里度过的。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理论著作,以其独特的视角而引起许多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他的作品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期,第二个阶段为斯大林时期,第三个阶段为斯大林以后时期,贯穿这几个时期的中心思想是对辩证法问题和整体概念的研究。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有关主观和客观统一可能性的辩证法思想。在大家认识到真理还没

有完全实现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通过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和随之而来对社会经济异化的消灭而获取。他当时受康德早期思想的影响,强调人类经验的主体性和社会经验的不真实。后来他又声称现实主义是通向文学批评的唯一正确道路,又说既然人类是讨论任何社会问题的核心,形式就取决于内容,政治内容对所有从社会历史方面阐释的文学都至关重要。他还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垄断经济的观念必须和其必要性及赋予人类本身自由一道考虑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另外,他还指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整体概念的重要性,提出只有通过马克思的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进行具体研究,无产阶级才能被视为历史的主人,才能解救全人类。他还认为,所有的真理都要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由无产阶级认识和检查。真理不是给予的,而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结合过程当中为人们所理解。这种结合不是通过统计数字去理解,而是通过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和指挥主、客观协调一致的党的行动来实现。

他的这些思想对西欧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受到了他们的欢迎,但在苏联和东欧却受到了谴责。他本人感受到了政治方面的压力,写了《青年黑格尔:辩证法和经济学关系的研究》(*Young Hegel: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 1938),在这本书里虽然他对自己的一些观点作了修正,但仍然坚持强调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辩证法上面的共同点。卢卡契在晚年试图对伦理学理论做些研究,但不是非常成功,留下已写了2000多页的社会本体论初稿。

卢卡契之后影响较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这是一个由哲学家、文化评论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群体,1929年还在法兰克福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他们中出了几位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 郝克黑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 朱仁·哈波马斯(Jurgen Habermas, 1929—), 心理学家埃力克·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和文学理论家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等。他们所做的一件最为引人注目的工作是对马克思批评理论的修正,建立了所谓的社会批评理论。他们摒弃了一些教条说教,改造了马克思的道德哲学,使之成为一种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批评理论主要是一种研究哲学的方法,把哲学反映论的一些规范方面同社会科学的阐释成果结合起来,最终的目标是理论联系实际、提供洞察问题的视角、增强主体性、改变人类受压迫的状况、争取全人类的解放和建立一个满足人类需要的理性社会。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从成立到30年代末期,代表人物是郝克黑默,反映在他的《跨学科历史唯物主义》的写作提纲当中。他声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可以产生社会研究的成果,使之带有一种批判视角。第二阶段主要是建立批评理论。他们抛开了马克思主义而采用了更为概括的批评意念。郝克黑默和阿多诺写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1941)以及马尔库塞写的《单维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 1964)都声称自然受工具控制的过程导致了人类的非人化和受控制。他们在二次大战以后写的作品里面更是流露出一种越来越悲观的情绪,认为人类社会完全是个受操纵的社会,人类文化也是受人利用的商品文化。郝克黑默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在第一阶段写成的,集中反映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此外,他还界定了批评性社会科学的概念,并为其制订了纲领。他提出哲学的方向应当规范,应当和社会科学的实际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后哲学的发展方向,突出了和传统相对的“批评”理论,例如它要求重新考虑认识论和社会科学的关系。

阿多诺的作品主要是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发表的。他认

为,鉴于进行批评的可能性似乎日益减少,他力图在美学和模拟自然的领域去找到它们。他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整个现代社会都是虚假的这样一个趋势制定出的。他将这一趋势归咎于对自然和人类的过度控制这样一些片面原因。由于这一理由,他力图在人和自然以及其他东西之间建立一种非工具性和非控制的关系。他首先在当代社会的艺术领域里面发现了这种可能存在的关系。这是因为艺术本身带有一些模仿性或者说和物体之间有一种“非同一的”关系。由于他没有遵循“逻辑的同一性”,他去世后发表的《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 1970)以及其他一些后期作品里面带有些前后不一的提法。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些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朱仁·哈波马斯重新梳理了批评理论,再次强调了规范基础的重要性,回归到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上来。以后他又转向建立交际行为预设和话语规则理论的工作。他对交际的分析试图为建构一种和他人的非控制性关系,以及更加广泛的理念提供了规范。

另一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他在1965年出版的两部论文集《为了马克思》(*For Marx*)和《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先是在法国,后来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引起了轰动效应,对7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根据法国一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声称,马克思作品里有一段认识论上的空白,出现在19世纪的40年代。在他看来,空白之前是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那里得到的科学前理论人道主义,在此之后则是历史科学,其发展所具备的里程碑意义犹如7世纪兴起的自然科学一样。阿尔都塞认为这门新兴学科的特色,甚至存在的意义都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论述。所以马克思乃至他的追随者如列宁,都应该在他们的作品(如《资本论》)里补上这一段。然而,阿尔都塞并没有详细讲述这门新学科的内容,只是为自己的观点作了充分的辩护。

当然阿尔都塞的更大贡献在于他对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认为这一思潮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在批判这一思潮的同时提出了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使用了结构主义观点和方法去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了一系列相当精辟的论述,如对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人道主义化和存在主义化倾向的批判。虽然如此,他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个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而实际上他既不是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个彻底的结构主义者,只是沿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而已。他的理论著作当中既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有符合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内容。他既强调保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甚至还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现状不满,试图运用资本主义的结构主义思潮来重新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西方的宗教思想

宗教在西方社会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对西方人的影响可以说是任何其他宗教和思想流派都是无法相比的。然而到了20世纪以后,基督教的发展受到了西方社会日趋多元化和经济、科技迅速发展的影响,呈现出不少以前没有的特点。在新的形势下,基督教一方面仍然在西方社会中担负着安抚人灵魂的重要使命,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变化。

这些变化大体上是从宗教改革以后开始的。其一是其神学思想基础成为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引进了柏拉图和亚历士多德的古典主义理念作为指导原则解释神学里的一些重要概念。例如运用物质转化来解释耶稣的神圣和显灵,作为人和神的双重身份,用超自然性来界定神灵。把存在视为一种超越自然的生命界限,无处

不有的现象。其二是学究特性,将真理作为一种始终追求的目标。自从经院哲学产生后,在阿奎那和其他一些经院哲学家的带动下,对圣经和基督教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些具体、琐碎的问题展开,但却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因而逐渐受到冷落。其三是反历史性。鉴于神学不是历史,但又不能不涉及到历史,对待历史的态度成为基督教神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维护其所谓的权威性和信仰的真理性,教会上层集团往往会无视历史事实,尤其是对涉及到教会丑闻和错误之类的问题总是百般掩饰和抵赖,有时甚至不惜撒谎,此外还试图借用教皇的地位去抵制对历史事实的揭露和分析。例如在梵蒂冈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对所谓“教皇无错论”提出质疑时,有人竟然说“教皇无错论”可以解决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其四是教条性。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关注教义的建立和对其权威的维护,而到了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和其他新教由于在教义看法上的分歧更加注重对自己教义的解释。他们对物质转化、教皇无错和圣母升天等重要问题的不同看法往往是引起激烈争论的导火线。另外,这些教义也常常受到些无神论者的攻击,称它们是反科学、反理性和反历史的。由于对教义的解释权往往掌握在少数教会上层人士手里,其权威性常常受到质疑。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社会经济动荡和重要的思想文化演变。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多种思想流派的出现给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教会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但当其内部的现代主义运动发出了改革的猛烈呼声时,它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伴随现代主义运动的是其使用的历史分析及其他新方法,导致了对经文的新解释。总的来说,现代主义运动主要反对教会的等级制度,上天的权威和经院哲学。他们力图把宗教经历、怜悯和神秘主义当作宗教生活和神学辩论的中心问题,然而他们的改革主张却遭到了教皇和教会领导集团的反

对和镇压。他们不仅受到了斥责和批驳,有的还被从教会里驱逐了出去,失去了在教会的职位或教席。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还是给教会带来了一些重要变化,在20世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他们的重要痕迹。

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神学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主要的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得出来:

1. 进化论的影响

达尔文的进化论结束了世界万物静止和孤立的形而上学观念,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为过。它已经成为观察和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主导思想和方法。这一切的范围也包括教会和神学思想。天主教神学一度引以为荣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基本思想在进化论思潮的冲击下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例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观点看待和解释不同社会阶层的起源和发展,将那些贫困、没有财产和残废的人视为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被社会淘汰的人,认为他们的消亡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教会内部有些人则认为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可以以后在上帝那里找到安慰和归宿。社会问题归根结蒂是个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则要用上帝的启示去解决,而不是像进化论主张的那样听其自然发展。

2. 对历史的重新认识

从19世纪开始,一种对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倾向蔓延开来。这种倾向使得人们对于历史上已有定论的许多问题产生了怀疑,对于原来问题的出处不再简单地就其表象进行研究,而是采用详尽、细致的分析,对于各种权威提出了质疑乃至挑战。教会中的神学家们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也对教会中的各种教义作了评估,尤其是对教会所谴责的人都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重新作了审视。

这场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德国的一个叫做德林格的天主教神学家。他除了对历史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研究之外,还对梵蒂冈所宣布的“教皇无错论”表示了不满,觉得这有悖于历史事实,并最终退出了天主教。

对历史的这种重新审视导致了对耶稣的重新了解和认识。例如有些人对福音书上有关耶稣的记载表示了怀疑,甚至重新编写了有关他的故事,只是众口难调,莫衷一是。虽然这种尝试始终都未结束,但总的来说由于上述原因都没有取得多少成功。对历史的重新评估实际上是教会内部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遭到了教会上层的抵制和反对,其观点也始终不能为教会所接受。然而它的影响又是深远的,至今仍然对神学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3. 对意义的阐释

历史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圣经意义的理解和阐释。这里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种以圣经原教旨主义(biblical fundamentalism,又译圣经基要主义)为代表,主张对圣经作字面意义的理解,直接从文本当中解释其意义。另一种则主张用批评眼光对文本进行认真、仔细的审视,对历史背景,尤其是历史和当今情况的差异进行对比研究。这个过程会出现许多问题,例如,意义是如何从一个意义世界传到另外一个意义世界的?又是如何从上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的?如何阐释文本,尤其是过去的文本?如何在阐释过程当中既要忠于意义本身,又要忠于对文本施加影响的传统?

在那些具有现代主义思想的神学家的阐释下,耶稣的形象不再是一个温和、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牧师,而是一个能言善辩、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对世人进行启示的祈祷者。对于20世纪早期的信教者来说,这种变化显然是巨大的,耶稣已经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形象了。

4. 文化意念的变化

19 世纪之前的基督教神学完全是在欧洲人的支配下,欧洲文化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而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教皇本尼迪特十五世(Benedict XV,1854-1922)甚至扬言,教会所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把文化带给了野蛮人。然而 20 世纪伊始,这种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在欧洲,欧洲因此而遭受到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失去了往日的文化领导地位以及精神和道义上的优势。其次,一些非欧洲文化开始大量传到欧洲,使得欧洲人接触到不同来源的文化,从而逐渐受到多元文化发展氛围的影响。基督教神学作为欧洲传统文化的核心成分之一,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种多元文化氛围的辐射,在面对这种多元文化的挑战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带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 阐释性

基督教神学关注对文本,尤其是对圣经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关注其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些意义的传播。教会内部的一些神职人员和社会上一些关心基督教的人士常常撰写并兜售有关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或其他宣讲材料。教会不仅在许多书店里设有销售宗教书籍的专柜,甚至还有专门的宗教书店,不仅在许多社区建有教堂或宗教场馆,定期举办各种宗教活动,而且在各种公共场合常常还遇见宣讲基督教教义的信徒们。

2) 多元性

基督教神学已不再是单一和统一的宗教性学术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多元文化的迅速传播以及各种不同思想的交流,惟我独尊的基督教经典文化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普通

教民文化层次的提高,也无法将统一的观念强加给他们。此外,基督教内部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不同教派,而自从宗教改革之后对基督教教义的不同理解更是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司空见惯现象。基督教教会的众多教派和多元化发展趋势是当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重要特色。

3) 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

当代神学家和一般教会人士对教会上层集团解决神学争论的能力和运用权威的可信度都表示怀疑。许多神学界发生的事例表明,一些神学家的作品之所以遭到教会上层的否定,并不是这些作品不符合教义或者其他理论问题,而是因为教会上层人士担心这些作品超过了已有的传统作品或思想,对自己的地位构成了威胁,或者会成为新的正统教义,为年轻人所接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神学家卡尔·拉纳的作品遭遇。他的神学著作富于创新意识,敢于揭示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受到年轻一代神学人士的欢迎,但却遭到教会上层人士的嫉恨和反对。结果他的一套神学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遭到了梵蒂冈神学委员会的禁令。于是中下层教会的年轻神职人员都觉得教会权威不是用来审查他们的作品是否符合教义,而是用来检查它们对教会当权者是否提出过批评,表现了它的狭隘性。

4) 反对形而上的玄学

玄学体系一直被视为教会上层以及教会传统的思想体系,是他们看问题和处理各种事端的主要依据。康德曾经对玄学思想的有效性表示过怀疑,认为它既缺少批判性,又没有多少意义。正因为如此,形而上的玄学思想在当代已被普遍冷落,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更接近人本性的哲学思想所取代。

5) 对经文价值的重新认识

基督教和天主教神学已经越来越重视经文的使用价值。经文不再被简单地用来作为一种文本,而是用作摄取灵感和鼓动人心的重要手段和源泉。近年来,西方很多国家有一种对耶稣和其信徒事迹的持续兴趣,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圣经和宗教信仰的热情。这是因为随着物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西方人的精神状态越发空虚,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加之对宗教内容的了解手段由于科技的进步而变得更加便捷,宗教宣传活动也日趋广泛和通俗,为经文的普及和重新审视提供了条件,经文的作用显得日趋重要。

6) 人性化的倾向

当代神学从哲学和人类学当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同时也从心理学,尤其是从弗洛伊德深层次心理分析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当中借鉴了一些有益的思想原则,另外还参照了存在主义和人性化哲学的一些提法。神学理论由此变得和人类的实际经验以及社会发展更为贴近,对人际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表述。神学思想因此变得更加通俗,和社会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受到更多人的欢迎。

7) 辩证法

随着基督教和天主教神学的通俗化,它变得更为宽容,更能容忍不同流派观念的出现。这种多元化倾向提出了如何把不同观念糅合在一道,识别和克服不同神学观念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和鉴定各派的长处和短处的辩证过程,也是一个不同流派和观念从对立走向统一、互为补充、形成一个更为广泛的思想体系的过程。

8) 寻找共同基础

对辩证法的使用可以协调各种不同观念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协调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面。基督教一方面要承认神学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从而容忍多种神学派别的共处;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派别也应当有共同点,也就是要寻找共同的基础,从而为这些表面上分歧很大的不同神学观念的统一提供条件。这一趋势在西方世界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成为许多宗教流派的共识。

基督教神学在西方社会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任何一种庄严的仪式似乎都离不开宗教颂歌,大到全国性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小至每个星期日的礼拜、各种仪式或者其他一些重要活动,教堂里都会聚集许多信徒聆听牧师的宣讲,婚丧喜庆更是和宗教祝辞紧密相连。虽然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和个人信仰的自由愈加普遍,信教的绝对人数不见得很多,但它的影响还是随处可见。可以说它已经深深地打印在西方社会的每个角落里,融化在西方人的血液里。如果说日常生活里宗教的存在完全是凭感觉的话,宗教在上层建筑中的地位和影响则随着它对其他学科,尤其是对人文学科的渗透而有日益蔓延的趋势。

首先是宗教和哲学的互相影响。历史上的每个重要时期,特别是基督教本身遇到阻力,无法取信于它的教民时,它总是要从哲学当中摄取一些有用的思想,用来补充和修正它的一些教义。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理性思想的重新发现和吸收。后来康德提出了“自在物”和超验唯心主义,认为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人的自由都不好确定。这种非人类经验可以确定的思想对以后基督教神学影响很大,以至出现了一个神学派,叫做“超验主义与纳斯主义”,超验便直接源于康德影响。当代哲学当中对基督教神学影响较大的是存在主义哲学,主要用来阐明《新约全

书》。有的神学家试图用存在主义思想除去其神秘主义外罩,去掉天堂、地狱以及各种神迹的形象,而代之以存在主义的解释。例如他们认为信仰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行为,由于对现实存在的不满才去找耶稣而建立了信仰。另外一种对基督教神学影响较大的哲学是阐释学。

阐释学的重点放在对基督教教义的阐释上面,包括意义的传递和意义的解释。鉴于信仰,教会和神学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都对基督教教义的意义和价值做过反复而谨慎的审视和处理,在当代神学当中对阐释的理解和运用更加关注。在诸多运用中,有关怀疑的阐释尤为突出。这个释疑过程主要是对人的行为动机的意义作出分析,特别是对其意义来源作出判断。除了释疑,还要力图恢复原有的意思以显示人的创造力。

其次是神学和文学及艺术类学科的互相影响。当今西方的人文科学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但其共同点是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圣经形象及其他神秘思想,甚至文艺批评当中也会涌现夹杂神学思想的理论。对于某些艺术家和作家来说,仅仅用理性和科学的原则来思考和创作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只能涉及创作对象的外观,只能创作出肤浅和表象的作品,而只有通过神和神秘的视角去观察才能洞察和创作出具有深刻内涵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审美是否一定要通过神和神秘主义来进行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无可否认西方艺术中和宗教有关的题材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很多都是精品。把人的想像力和神联系在一起是这些作家和艺术家的共同点。浪漫派诗人济慈说过:“想像当中美的东西不管是否存在过,一定就是美。”^①这句话延伸出来的意思是说真的存在并不重要,上帝和其他一切神

① *Complete Poetry and Selected Prose of John Keats*, p. 426, Harold Briggs, Random House, 1951.

话、神秘主义是否真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或它们的形象给人以美感,而这正是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们所共同追求的理想。

宗教和神学能够带给文学与艺术美感,因而成为一个持久不衰的创作源泉,那么文学与艺术又能给宗教带来什么呢?基督教和天主教神学自从其内部的现代主义运动开展以来,逐渐转变了以前的保守主义立场和观念,十分注意吸收非神学领域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和处理无神论学科范围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以缓和它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压力。最新的例子是对解构主义的运用。解构主义理论出来不久,便有神学家用它来对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作了解剖,试图改变“科学是真理,宗教是邪说”的传统定论。解构阅读是为了改变概念式或其他性质的对立解构的,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一向被认为处于一种不可逆转的对立状态,而且一方为真理,明显优于另一方。解构理论由于自身的特性,显然要颠覆这一对立解构,改变一方占优的传统模式。其次,为了推翻科学占优的传统对立解构就必须推翻科学赖以发展的修辞结构,修辞的毁灭在所难免因为其毁坏的技术已经产生,同时由于要去驯服自然,于是产生了毁坏环境的灾难。再其次科学领导人们离开“生存的基础”越来越远。这样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关系就需要重新建立、加以建构,目的是清除概念上的障碍。第三解构策略似乎旨在肯定某种活跃的神秘东西,这种神秘东西要解构两极概念,要解构玄学、神学和宗教里所具有的结构性的对立特征。这些对立皆源于人文主义和诸如新柏拉图主义、可知论、黑格尔唯心主义这样一些两重性的传统思想,其重点在于对立的产生和消除上面。

第十二章 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绘画、建筑 and 音乐

二次大战不仅改变了世界上的政治格局,美国 and 苏联从此成为两个政治强国,以它们各自为核心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东、西两个阵营,而且在文化和艺术上也带来了重大的变化,使得昔日以巴黎 and 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化艺术转向以美国 and 纽约为中心。造成这些变化的直接 and 主要原因当然是二次大战的影响。由于战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 and 艺术家纷纷从德国、法国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地方逃往美国 and 纽约,他们当中包括 20 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8—1953),音乐大师阿诺尔德·勋伯格(1874—1951)、贝拉·巴尔托克(1881—1945) and 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绘画大师汉斯·豪夫曼(1880—1966)、马克斯·贝克曼(1884—1950)、乔治·格劳(1893—1959)以及德国波哈斯组织成员。巴黎沦落以后,以巴黎为创作中心的许多著名画家 and 雕刻家,如赖杰、门德里安、加波、马克斯·恩斯特、达利、夏加尔、里普齐茨等也都几乎去了纽约。这样,战前欧洲两大艺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离开了欧洲 and 巴黎,而纽约因为一下子拥有了这么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家而成为世界新的艺术中心。

一、绘画艺术

由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些原来互相对立的艺术流派似乎

不像以前那样过分计较不同的艺术观念和手法,加之美国人比较开放,善于吸纳不同的东西,于是推出了一些新的手法和流派。美国以前也有人崇善抽象派手法,他们不在乎什么形式,而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这种人数很少,成不了什么气候。欧洲人来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一种新的流派不知不觉在二次大战后形成了,这就是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

这是批诞生在 20 世纪初期的相对年轻的画家。他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宣言,但几乎都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出了一些类似的特色。用一位年轻的评论家的话来说,他们“在某个时候”,发现“画布成为...行动的领域,而不是产生,设计,分析或表达真实或想象的物体的地方。画布上要出现的不是画,而是事件。画家走向他的画架的时候,心里不再有什么形象,他走到它跟前用手里的材料对他前面的其他材料做点什么事情而已,而形象只是那次相遇的结果”。^①

这段话实际上勾勒了抽象表现主义,也就是行动画派的主要特点。对他们来说,绘画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表现美学特征,或者说美学特征成为次要目的,形式、色彩、构成乃至绘画本身都是辅助手段,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样都可以拿掉,而始终起作用、不可须臾或缺的是行为本身所揭示的内涵。对行为画家来说重要的仅仅是把色彩放到画布上,并不是表现什么情感或是感官刺激。这个流派的代表画家之一是汉斯·豪夫曼(Hans Hofmann)。

豪夫曼曾经先后从事过立体主义、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艺术实践。20 世纪早期曾在巴黎生活过 10 年时间,认识毕加索、巴蒂斯这样一些大师。一次大战期间他跑到了慕尼黑,在那里收藏了大量康定斯基在表现主义和抽象派转折期时的画稿。后来他去了纽约,办了一个艺术学校,极力主张立体主义和野兽派之间的统

^① 参见 A WORLD HISTORY OF ART, P606, FLEMING HONOUR LTD, 1982。

一、形式和色彩的统一,表明了他对艺术世界和表象世界二元论的立场。在艺术实践上他身体力行,将画家的个性和抽象性结合起来。他通过混合使用不同的油画材料,诸如油彩、印度墨水、奶蛋白、铝颜料来进行他的滴落试验。他认为,绘画就是使用颜料来创造形式,他对绘画构成的界定是遍布表面形式和色彩力度的推拉。这一论断以及他在教学上的成就,使得他的影响相当大。然而,真正在欧洲画派和美国画派之间起到媒介作用的还是亚美尼亚画家阿西尔·高尔基(Arshile Gorky, 1905—1948)。

高尔基成名之前曾经长期跟随康定斯基和米罗学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终于厚积薄发,一下子名声大振,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才华。他将豪夫曼宣传的抽象画技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甚至超现实主义的文学性成功地融为一体。他后期的作品常常是色彩单薄、含糊不清、带有一种神秘的情调,在一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不确定世界里浮现着谁也无法知晓,却又要给予肯定答案的东西。这在他的《订婚》里一展无遗:地下天上堆放和悬浮着乱七八糟、讲不清道不明的物体。或许这是他自己所说的“我不是在大自然前面作画,而是从大自然里面作画”的原因吧。

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话,或许高尔基会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画派的领头人。这一位置后来阴错阳差,被美国画家杰克逊·帕罗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占据了。帕罗克是个极具创造精神和个性、嗜好暴力、带有神经质、情绪波动很大的画家。年轻时他曾经分别学过不同流派的画法,不知是缺少才华还是脾气太大,似乎并没有多少成绩。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好像有了一种心灵感应,突然间想尝试一下行为派画法。他甩开了画架和画板,甚至连画笔也不要了。他将画布铺到地上,开始将颜料从上而下滴下来,倒出去,泼过去乃至摔到画布上。如此这般,画布上的斑点摆脱了原来的意思,而只是记录下他用颜料作出各种动作的结果,形成了图案,表现了他内心的情绪。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他终于取得了成

功。他作画时通常用极大的画布,人称“可以移动的壁画”,观众看他作画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或近或远,从各个不同视角欣赏他绘画的动作和结果。然而,这种绘画是否由意识操纵,艺术效果是否完全出自于自发的创造力,似乎都还有争议。不管怎么说,帕罗克本人终其一生都是十分孤单的。他既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也没有什么学生和追随者,唯一和他关系比较亲近的人是威勒姆·德·柯宁。他们两人一道被看成是抽象表现主义行为画派的领军人物。威·德·柯宁以前曾和高尔基是朋友,两人曾共用一个画室。他的画力度更大,在颜料上喜欢用更有色感和肉感的粉红、嫩黄和翠绿,花纹更为粗阔和凝重,像是经过了多次加工,没有任何帕罗克的细腻和多变的特点。此外他也并不完全是抽象的,各种形状的意象堆积在一起,似乎作出了一些隐隐约约的暗示。另一个行为派画家的代表人物是弗兰士·克林(Franz Kline, 1910—1962)。他从30年代起用纽约的各种城市景点作为他的绘画对象。他受到城市里的热闹气氛和暴力影响,喜欢用黑、白两种颜色作画,表达一种抽象的意念。他一再表明他是在画他所经历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形式,只是在画桥梁或是摩天大楼而已,实际上他的作品常常是在试图表现城市里的各种形象。

除了行为画派以外,抽象表现主义还有一个画派,就是颜色领域绘画。这一派代表画家主要有三位,就是比特·蒙德里安(Pieter Mondrian, 1872—1944),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 1903—1970)和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 1905—1970)。这一派的思想表现在他们三个人1943年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里:“对我们来说艺术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只有那些愿意冒险的人才能到这个世界去求索。我们赞同对复杂的思想作简单的表述。我们主张表达的形式要宽大,因为只有这种宽大的形式才具有一清二楚的效果。我们主张平常的形式因为它能除去幻觉,显示真理。...我们

声明我们和原始与古老的艺术之间有着精神上的联系。”^①

三人中间最为先锋的人物当推比特·蒙德里安。他最先为他这一派重新确定了艺术发展的新方向,这个方向不同于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烙上了他们自己的标记。从1946年起,他的画风就基本定型,建立了独特的自然表现形式,从此以后就始终如一,没有动摇过。这是一种很不对称的结构,层次凹凸不齐,颜色表面上的涂料非常厚,看上去就像是浮雕一样。画面给人的感觉非常稠密,空间虽然还有一点但却很渺小。那形状通常总让人想到黄色的牛皮,破烂的广告牌,或是深山峡谷里开裂的岩石。让人奇怪的是画面总是很干燥,像是长着鳞片似的,这些给了他那巨大的抽象结构一种原始力,如同西部广阔而无边无涯的自然风景一样。

马克·罗斯科原系俄国人,1913年和家人一道移居美国。三人中间他显得更为伤感和忧郁。这种情绪以后日益恶化,使他终于不能自拔而自杀。但从作品的表现力来说,或许他更能体现抽象艺术的真谛。他说过:“我对任何东西的形式和颜色并不感兴趣,我只是对表现人的基本感情——悲剧、激情和命运等——感兴趣。许多人在我的画展面前失声痛哭,说明我在传递那些人类的基本情感。那些在我画前哭泣的人也在经历着我作画时的宗教情感。如果你说你是受到那些颜色的感动,你就没有抓到要害。”^②他的画色彩轻淡,飘浮不定,有一种明亮而高雅的气质。观众站在面前,如同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发光空间。

纽曼更注意通过崭新的艺术形式来体现人生的普遍意义。对

① *A World History of Art*, H. Honour and J. Fleming, p. 610, Fleming Honour Ltd, 1982.

② *A World History of Art*, p. 610, H. Honour and J. Fleming Fleming Honour Ltd, 1982.

他来说,艺术是一种探索以达到人类未知和崇高的境界。他说过:“我们不是从基督、人或者‘生活’当中去造教堂,而是从我们自己,从我们的感觉当中去造教堂。”^①他运用自己的艺术努力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一块巨大的画布上涂上了红色,然后用四条狭长细小的条状物,将其从上而下分为四份,颜色和宽度均有些微区别,以此来表达他对世界的理解。除了画作以外,有时他还有些神来之举。例如他曾经用钢做了个小型金字塔模型,上面倒放了个破旧的四边形铁锥,正好立在塔尖上,用以表示人的愿望虽有些缺损但却长久存在的境况。

真正在抽象表现主义雕塑上作出成就的是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 1905—1965),他的雕塑形象既鲜明生动又有对人类情感和命运的隐喻。他年轻时在纽约学过画,后来在工厂里干过焊接工,因此对金属的处理得心应手。他可以把不同形状的金属根据需要放置在不同位置上,用以象征不同的意义而不考虑重力的影响。他可以把金属表面加工得很粗糙以便涂上油漆,放置在自然风景当中。他的作品把细致和粗犷、典雅和力量、自然和人工制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有的风格。

抽象表现主义尽管被少数人捧过了头,但不可否认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是美国人对世界艺术的一次重要贡献。比较起来,欧洲人在二次大战以后的这段时间里似乎没有取得多少引人瞩目的成就,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画家马蒂斯的创作。此时的马蒂斯已经80多岁了,不仅疾病缠身,而且卧床不起,但他的创造力依然旺盛。他通过彩纸和剪贴,创造出了一些极富想象力的图案,诸如彩色玻璃窗户,墙上饰纸和书封面设计等。此外,他在临终之前还创造出了一批大型剪贴,包括《大洋洲回忆》和《蜗牛》。这些作品

^① A World History of Art, p. 611, H. Honour and J. Fleming, Fleming Honour Ltd, 1982.

总结了他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人生理想——天真,这种理想激励他运用另一种艺术形式来实现他年轻时就梦绕魂牵的精神追求。

波普艺术(pop art)

抽象表现主义到了 60 年代早期达到了高峰,这时美国和西欧的艺术发展都经历了急剧的变化。战后一段时间所特有的严峻和压抑氛围在西方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财富和繁荣,一种比较乐观的情绪也随之而来。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发言人,评论家克莱蒙·格林伯格说过,抽象表现主义最活跃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一种更有约束的形式主义艺术。这时候虽然有些艺术家通过追求一种冷静、克制和高雅的艺术形式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他们的声誉,但从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抽象表现主义对艺术的影响更带有决定性意义。作为这一影响的结果便是波普艺术的发展。

早期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是罗伊·李其通斯坦(Roy Lichtenstein, 1923—)。他的画法还是抽象表现主义技巧,只是进行了非人格化处理,同时采取了一种反嘲态度,运用画家的主观意识和视角语言传递他对表现对象的想法。这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自然流露、自发表达的绘画。简言之,所谓波普艺术就是通过使用商业化艺术或是其他大众媒体艺术的形象建立一种非人格化的风格。这种艺术很快在美国和英国几乎同时展开,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少联系。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的拼贴画《琳琅满目的现代之家》可能算是第一张真正的波普艺术品。它将男、女的性吸引进画面,电视、浪漫史宣传品、耐用消费品、电影广告和汽车标志这些当代社会共有的特征,甚至“通俗”字样都拼凑起来塞进了这张画里。当它首次出现在伦敦的一个展览会上时,招来了不少曲解和批评,认为它不是亵渎现代艺术就是攻击当前的商业消费社会。后来还是画家本人出来做了解释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欧洲人眼里这些大众媒介形象具有某种奇特的吸引力,但是

美国人却觉得它们平淡无奇。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能够吸引社会和公众的注意力,他们努力翻新,给作品贴上各种标签。例如罗伯特·罗新贝格和贾斯伯·约翰斯利用各种现成的日常用品乃至别人弃之不用的东西进行创作,隐含对艺术价值和概念的质疑,被人称为“组装”或者“新达达”以期产生轰动效应。贾斯伯·约翰斯利用美国国旗制作的“三面旗子”就是这种形式的产物。三面旗子大小不等,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种易毁的物质上。貌似恭敬,实含一种戏弄乃至挑衅,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嘲讽。另一件由克莱斯·奥尔登伯格制作的《巨型汉堡包》直径达2米,由上了颜料的帆布制成,里面充上了泡沫,软得有些让人担心,像是张羽绒床一样。这件作品完全打破了人们关于雕塑的概念,突破了传统艺术和日常生活用品的界限,使得观众有关艺术的观念有了根本的改变。他认为,艺术在经过了非常严肃而沉闷的抽象表现主义阶段之后,应当回到普通人的生活里。他将他的作品放到普通商品的商店去卖,而不是送到画廊里去。

波普艺术并不限于采用普通的形式。有时候它也可能以最极端、最具颠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安迪·华霍尔(Andi Warhol, 1928—)是个经商的成功艺术家。他起先仅仅为一些通俗文化杂志写稿,后来则画些画,接着开始拍电影,作雕塑。这一系列从事艺术活动的经历使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他说,他喜欢机器式的重复,甚至愿意自己就当机器。他说过要是每人都一样就太好了。他在绘画上首次采用了绸布屏幕技术。所选主题都是事先确定好的最大众化的内容,并由他的助手帮助完成。由于内容已经确定,形式又是一再重复,不管是什么,经过这种乏味的重复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然而,也有少数的作品经过这种重复处理会变得更为深刻,更有力量。例如他的《“灾难”系列》,可怕的镜头通过一次次的出现产生了一种震撼人的力量。

和波普艺术有联系的老一代艺术家不多,英国的弗朗西斯·培

根(Francis Bacon, 1909—)算是个例外。由于他在创作中喜欢用大众媒体里的一些现成图像(如新闻照片,电影镜头),他的作品和美国大众艺术有些相似之处。他认为,艺术不仅是一件物体的图像,还是用来打开人的感情窗口的方法。他创作的《耶稣遇难像的三种研究》表现了一个狭小且条件很差的旅馆房间所呈现的恐怖症形态。人体像是遭到了部分肢解的尸首。这种阴森可怕的镜头或许也有它的象征意义,但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更何况又有多少人能够喜欢它了。难怪在美国培根的作品完全被当成了颓废派艺术。

极简抽象艺术和照相现实主义

战后最具美国特色的艺术形式是极简抽象艺术(minimal art)。该艺术追求一种完全纯洁和完美的品质,在创作当中力求除去一切不是艺术的成分,把艺术减少到仅有的自然属性。艺术家的创作手段也因此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只有绝对单一和简单的创作活动存在。

最早展示极简艺术作品的是法国艺术家伊维·克莱恩(1928—1962)。他从1956年开始举办蓝色极简绘画系列展。他在巴黎的展品完全是内白外蓝,曾经引起轰动。另一位保加利亚艺术家克里斯托·亚卡勒夫(1935—)在巴黎创作并展出了所谓的“移动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56只桶》,完全由油桶堆积而成。有些作品只是些构想而从未完成,例如一只只能盛200万加仑油的油船项目就仅仅是个计划而已。另外一项庞大的作品是在澳大利亚沿海选用100万平方英尺的地方用塑料皮包装起来。这项计划虽然完成了,但是否属于艺术品范围则有争议。另一件受到质疑的作品是乔治·莫兰狄所画的一堆废弃瓶子和罐头盒子。这张取名“平静生活”的油画带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似乎并不能反映欧洲文化里的安逸生活传统,也不大符合极简艺术概念。归根结蒂,它的思想要

从中感受和发现,而不是提取。尽管如此,极简艺术所提倡的纯洁和形式主义主张还是带动了一些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照相现实主义。

照相现实主义(photorealism)提倡运用高超的技巧选取平常的快镜头和彩色幻灯片来换得自然主义的形象和幻觉般的空间。这方面最为成功的艺术家是理查德·伊斯特斯(Richard Estes)。他的《所罗门·古根汉博物馆》通过相片的技术处理,成功地将明和暗、动和静、现代和传统这么几个方面融合到一起,表现了一种既带有自然主义色彩,又不失想象空间的艺术形象。其他的艺术形式大都比较粗糙,带有反美学性质,诸如过程艺术、土地艺术、人体艺术,其发展趋势是消灭艺术本身。60年代末出现的概念艺术提出了“艺术品的非物质化”,更是使得这一趋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概念艺术的核心观念主张艺术品本质上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既可以产生出一种看得见的形态,也可以不产生。其早期的表现出现在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基的一部题为《4分33》的作品。他所谓4分33实际上是指曲子里的一段无声区,用以表达作曲家的一种思想。

极简艺术和概念艺术都强调艺术家的作品并不重要,相比之下创作过程却要重要得多。有了创作过程才有作品,而作品只是创作的一种记录而已。这种观点后来和反对艺术品商品化的思想不谋而合。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强调艺术不等于一种特殊的物品(诸如商品或是可以复制的东西),也不等于一个地方(诸如画廊或是博物馆、展览馆)。他们想找到一种可以避开现存评估、销售和收藏艺术品的制度,把艺术品商业化的方法,显然这在目前还不容易。

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

70年代抽象表现主义和极简艺术对西方艺术发展所起的作

用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它的期待和怀疑同时在增加。一方面它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不仅绘画、雕塑,连建筑这样实用性很强的领域也受到它的影响。与此同时,建筑上的一些新鲜东西也对雕塑产生了作用。例如建筑上的极简格式,像格子结构一度也为部分雕塑作品采纳。另外一方面不少人又觉得这种抽象和极简限制了艺术和建筑的发展。一位美国画家曾经说过:“现在我们需要不再是默默无声的格子结构,空无一物的画布和闪闪发亮的白墙。我们对于冷冰冰的广场和单调的帘子墙摩天大楼厌恶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比其他艺术更加清晰地体现了现代运动的原则性和对自身的否定,对自身形象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这时候建筑领域首先出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两极分化是不奇怪的。

建筑上首开时尚之先的是法国建筑师米·凡·德·罗赫。他在二次大战以后为美国设计了一批堪称具有国际主义特征的新建筑,其中范斯威斯屋和湖畔道公寓将立体的简明风格和构思的精细,巧妙地加以对称结合。另一个引人瞩目的建筑师是法国画家勒·高波斯。这位以绘画为生的艺术家时常搞些建筑设计,他的风格起伏不定,早期从事纯粹主义创作,后来则改为表现主义手法。而表明他新风格的则是在法国中部建造的一个小教堂。这个叫做容项的教堂给人一种力量,一种歌颂英雄主义的气派,充满了暗示情感的建筑语言,完全改变了他早期作品中的几何和理性原则,在欧洲建筑史上带有里程碑意义。从那以后,一批较为年轻的建筑师开始用他们的作品顺应这一新的潮流,开创了欧洲和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到了70年代这一现代主义潮流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后现代主义时尚。

现代主义建筑比较讲究集体主义,主张创新、技术和功能这样一些理念,带有一种单一的理性主义目标。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建筑逐渐受到冷落,而被一种不那么认真、不那么讲究、更为民主的思想所取代。这一发展趋势虽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主义,却导

致了折衷主义。这里面既有大众形象的展示,也有历史主义的表现。后者尤其表现在文杜里的建筑设计当中。

文杜里(Ventris)是德国建筑家。他替他母亲设计的住宅再现了现代主义出现之前的传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称原则,例如屋顶下面的山墙完全仿照了旧式房屋的模式。他的建筑设计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过多地考虑传统原则,而是变得更为实用。在这方面迪斯尼乐园的设计尤其值得称道。它将开放性和娱乐性融为一体,把传统的美学原则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道,为后现代主义建筑提供了样板。查尔斯·莫尔所设计的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是另一个杰作。这座为意大利裔美国人设计的建筑色彩丰富多样,由千变万化的霓虹灯组成,列柱加上神庙作为建筑,正前方为嵌入意大利地图的喷泉。一切都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然。

另一座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建筑是美国奥赖根州波特兰市的公务大厦。这座由迈克尔·格赖夫设计的大厦外部采用了大面积的玻璃装饰,具有一些现代摩天大楼的特征。同时又引进了一些18世纪法国新艺术的建筑装潢风格,如飘荡的玻璃纤维花束,加上经过改动的古典主义工艺,如巨型方柱和拱门上的红色条石,因而又带有历史主义色彩。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各种天然的建筑材料和各种形式、空间,创建一种具有深刻内涵的建筑语言,不仅能够为懂行的专业人士接受,也为不懂行的普通人所喜爱。

欧洲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两位代表人物分别是西班牙的里卡多·鲍非尔(1939—)和意大利的阿尔多·罗西(1931—)。鲍非尔最有特色的设计是靠近凡尔赛的《湖边拱廊》,其风格可和附近的凡尔赛宫相媲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采用了不同于过去的创作理念,但又没有完全撇开过去,而是选取了某些历史镜头嵌入其间,使之和整个建筑浑然一体,融合其中,相辅相成。阿尔多·罗西的设计更多的效仿了法国18世纪建筑师波莱,具有一种大胆和简

朴的风格。如他所说,他将波莱的特色做了进一步改进,提高到一种具有更高境界的理性主义层次,兼备感情和隐喻特征。

随着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广泛传播,一些优秀的后现代建筑设计师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东方也开始出现。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他们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更富于内涵,也更加活泼。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同时也由于他们所具有的东方文化背景。他们的设计带有典雅和质朴的特征,因此不仅在日本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受到了推崇。

20 世纪的经济发展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人们变得更加富有,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多彩,艺术活动也不再是少数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专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使之成为一种为更多人喜爱的活动。与此同时,艺术也失去了以前神圣的桂冠和宗教功能,而更多地成为一种大众文化。过去的所谓“精英”和“先锋”观念以及“永存”价值都在受到质疑,更不要说各人的审美情趣千差万别,更加难以统一了。尽管如此,艺术作为一种高尚的文明活动,其地位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是各个国家文化框架的重要支撑点之一。由于物质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多元文化体系的形成,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艺术本身的进步。艺术家们在努力开掘民族文化源泉,借鉴他国文化的同时,也在努力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使之成为艺术表现的重要方法。可以预言,艺术在新的世纪里将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重要的不是对艺术的不同解释,而是看到它以更为通俗的形式为更多的人所喜爱和接受。

三、流行音乐和其他娱乐活动

西方流行音乐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照相(1877)、留声机和唱片(1888)等科技产品相继问世投放到市场,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从那以后一些名人,包括名演员的形象和声音便被保存下来,供更多的人知晓和欣

赏。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无线电商业电台在美国建立,首次开始使用广播器和麦克风对外播音,并播放广告节目,让动听悦耳的歌曲在美国大地上空飘扬。当时最有名的唱片公司叫“阿莱唱片”(Tin Pan Alley),以制作流行怀旧的歌曲和新歌而闻名,在美国歌坛曾经独步一时。到了 50 年代,爵士音乐兴起以后,因跟不上发展潮流而遭淘汰。

1. 爵士、摇滚和迪斯科的兴起和流行

如果追溯西方流行音乐的历史恐怕还要从 19 世纪的美国算起。当时的美国主要流行些在饭店旅馆大厅里唱唱的感伤歌曲,非裔美国人歌曲以及外来移民的歌曲。到了 20 世纪以后,这些歌曲逐渐让位给一些其他的歌曲和爵士音乐了。

爵士音乐(Jazz)

最早在美国走红并席卷西方是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但它的起源要早得多。有人说爵士乐是随黑人奴隶 300 多年前被贩卖到美国时和他们身上的铁链一道带进来的。这种说法虽然未经严格的考证,但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从广义上说,各种爵士乐在节奏上都含有强烈的变音,虽然歌词主题变化不大,但演唱者往往依靠即兴发挥,抒发出个人的情感并进而激发出听众的情感。“爵士”(jazz)一词来自美国新奥尔良土语“加斯”(jass),原来含有“性交”之意。据说 1916 年时芝加哥有个乐队因演奏爵士乐而受到当地观众的喝彩。喝彩声中有句话叫做“孩子们,加斯吧”。加斯的声音和内涵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爵士由此而诞生。以后,这个乐队乃至其他类似乐队便开始被冠以“爵士”了。

爵士音乐在其出现的初期受到了另外二种黑人音乐拉格塔(ragtime)和布鲁斯(the blues)的影响,其活动范围从新奥尔良一带转移到了芝加哥,在那里建立了新的爵士音乐表演中心。从 20

世纪20年代起,随着路易·阿姆斯特朗和比克斯·贝多北克这样的爵士明星的出现而进入了它们的黄金时代。30年代,美国诞生了几个以演奏爵士乐著称的乐队,进入了所谓的摇动爵士时期。这些乐队相对于早期的爵士表演队来说规模要大得多,每场都至少有15个人以上,所以称作大乐队。他们通常穿着闪闪发光的上衣,随着音乐作出各种舞蹈动作,中间也会停下来让独唱演员唱上一段。从30年代到40年代,这些大乐队曾经红极一时,先是在美国,后来在英国都随着这些乐队的表演而出现许多狂热的场面。名声比较大的有美国的查理·巴奈特(Charlie Barnet),埃林顿公爵(Duke Ellington),贝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福莱丘·汉德森(Fletcher Henderson),英国的阿姆布罗斯(Albert Ambrose)和杰克·海尔通等。大乐队演出的开销比较大,40年代以后逐渐走下坡路,除了几个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消失了。摇动爵士后出现了比鲍伯爵士(bebop),通过破裂的节奏和复杂的谐音等新技巧进一步推动了爵士音乐的发展。60年代后又出现了自由爵士,一些先锋派音乐家使用即兴演唱的手法,围绕一个主题临场编词,并在作曲时运用了无主调音乐。代表人物有奥奈特·柯乐曼(Ornette Coleman),其代表作有《未来的爵士乐》、《世纪的变化》和《自由爵士》等。此外,爵士乐的创作手法还包括对一些经典作品的借用和改编,一些经典音乐家也乐意看到自己的作品由爵士和摇滚歌手演唱。著名的例子包括受到伊高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odorovich Stravinsky)和基里·德·卡纳瓦和伯纳希多·多明各(Placido Domingo)青睐和利用的歌曲,诸如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肖邦的《即兴狂想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等。

早期爵士乐,尤其是拉格塔的曲作者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钢琴家兼作曲家司各特·约伯林(Scott Joplin, 1868—1917),后来则为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 1888—1989)。后者在其漫长的一生当中作曲达1 000多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白圣诞”。其他著名

作曲家还包括索菲·塔克(Sophie Tucker, 1884—1966)和保罗·惠特曼(Paul Whiteman, 1890—1967)。一些较为流行的歌曲包括《枫叶衫》、《我找到了你》、《爱我吧不然就离开我》、《激情布卢斯》以及《漫不经心的爱情布卢斯》等。

布卢斯(blues)是20世纪黑人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美国南方种植园里的黑人之间。那里的黑人一直在贫困当中挣扎,在白人的压迫下过着艰难而痛苦的生活。布卢斯是他们喜欢唱的一种曲调,带有民歌色彩。歌声哀婉悱恻,带有一种绝望、屈服的声调。传统的布卢斯内容包括贫穷、疾病、失业、美国监狱里的非人生活、集体私刑、酗酒等。早期的一些布卢斯歌手命运都很悲惨,几乎都是短命的,不是被谋杀,就是死于吸毒或是酗酒。但是布卢斯却以其独有的特色保存了下来,并得到了发展。

传统的布卢斯歌曲一般都是五个音符,12节,每个音节四分之四拍,形成了所谓的布卢斯音符。演唱时可以即兴发挥。通常布卢斯演奏主要靠吉他和口琴这两种乐器,而不使用鼓。这是因为在种植园时期,奴隶主害怕黑人奴隶会利用鼓声作为一种信号起来造反,所以禁止使用鼓作为伴奏乐器。演唱布卢斯的黑人因此只好用声音相对较弱的吉他和口琴,尽管如此,进入20世纪以后,布卢斯的作曲者已经为在爵士和摇滚中使用的各种乐器都谱了曲,只要愿意,布卢斯可以用各种乐器弹奏。这说明了布卢斯和爵士、摇滚有密切关系,也说明了布卢斯对它们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爵士和摇滚最终是从布卢斯里诞生出来的,其原因在于爵士和摇滚的作曲者几乎都从布卢斯曲调里吸收了许多营养成分。甚至一些经典作曲家也这样做了,例如法国著名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就称他的小提琴奏鸣曲为布卢斯。

早期布卢斯演唱家虽然主要是黑人,但已有白人加入到它的演唱行列。著名的演唱家包括马莱尼(Ma Rainey)、贝茜·史密斯(Bessie Smith)等人。但是布卢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完全是口头

相传,没有曲谱。这一情况直到 W.C. 汉迪把布卢斯的曲子记录下来之后才有了根本性变化。后来,在布卢斯音乐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美国广告牌》杂志使用了布卢斯节奏来形容以前被称为“种族音乐”的布卢斯音乐。这种布卢斯节奏具有一种活力,既高雅又很通俗,其内容都和现代城市生活有关。演唱者早期基本上都是黑人,后来则有不少白人加入。他们身披装有电子扩音的乐器,手持萨克逊管,在各种场合当中演唱,逐渐被主流社会认同,不少人因此而成了布卢斯节奏的歌王,例如洽克·贝里、雷·查尔斯、萨姆·库克、波·迪德莱、法茨·多米诺、埃尔冒·詹姆斯等。他们的演唱在黑人和白人中间都赢得了大量的听众,从 40 年代到 50 年代形成了一股布卢斯热,直到以后在布卢斯基础上产生了摇滚音乐才慢慢淡化。即便如此,一些著名演唱队仍然愿意使用布卢斯的名义,如“漂流者”、“滚石”和“杰克逊五人组”等。

对爵士音乐有重要影响的另一种音乐拉格塔(ragtime)是 20 世纪初开始在美国走红的,一直持续到 1915 年左右,爵士音乐诞生后才逐渐冷落下去。之所以叫做拉格(rag),可能是因为其声音比较粗野的缘故,开始由一些黑人音乐家使用,很快得到了许多白人歌手的响应,随之形成了拉格塔的高潮。最有名的作曲家是斯各特·约柏林,他用拉格特曲调创作了几首经典歌曲,例如《枫叶拉格》(1899)。后来虽然他的歌不再时髦了,但几十年后电影《伤口》选用了他的《娱乐者》作为主题插曲,他的名字又再度走红。拉格塔后来受到其他音乐的利用,被一些通俗歌作曲家大量剽窃,同时也对爵士音乐的最终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音乐都具有强烈的特征和感人力量。拉格塔是一种美国黑人早期钢琴曲,常将原来曲调中非重要音变成重音。布卢斯的节奏比较慢些,但情调较为忧郁、压抑。从 40 年代起因其节奏感强、富于表现力而逐步流传到美国各地,到 50 年代成为美国流行音乐的主导流派。摇滚音乐是在布卢斯等爵士乐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节奏更快,感情更加宣泄,动作更为突出和夸张,从 50 年代起逐渐发展成为现代音乐的主要潮流。

摇滚音乐

对 20 世纪音乐发展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通俗意义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摇滚音乐的出现。摇滚乐的最初演出大约是在 50 年代中期。当时一些自由人音乐家开始仿照黑人歌手,在演出时吸收了布卢斯节奏和另外一种产生于密西西比一带的黑人音乐布吉一屋吉,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这种风格强调一种简单而有冲创力的节奏,重复一种三节拍的模式。这样的节奏和演唱风格很快受到了社会上年轻人,尤其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的欢迎。他们在舞场上跟着这种节奏狂热地扭动着身体,宣泄着内心的情感。一时间,美国和英国社会都成了这种音乐的天下。就连当时继位时间不长的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也为之倾倒,亲自下令取消了一场为皇家演出的新电影而改映摇滚影片《通宵达旦的摇摆》,以便能够欣赏并理解那时候(1956 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是如何爱上这种新的音乐舞蹈的。

遗憾的是摇滚音乐的全盛时期不长。当几个摇滚歌星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从歌坛上消失的时候,似乎它的下坡路也就开始了。到了 1960 年,它的几个主要人物纷纷都已经停止了演出,首先是伯莱斯雷(Elvis Presley,1935—1977),他在 1958 年入了伍。后来则是布迪·浩莱(Buddy Holly)和埃迪·考克兰(Eddie Cochran)的早逝,再后来是哈克·贝里(Chuck Berry)和杰里·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的丑闻。而最终让摇滚音乐受到致命打击的是对摇滚唱片排行榜内幕受贿的曝光。从此,那些唱片商都不敢也不愿再出摇滚歌手的唱片了。

尽管如此,摇滚音乐在短短的几年里还是红遍了西方世界。几个代表性的歌手和歌曲曾经让西方社会的歌坛为之震动,他们

包括比尔·哈莱的《通宵达旦去摇滚》和《摇,响,摆!》以及卡尔·伯金斯的《蓝色的锃亮皮鞋》。

随着科技的进步,流行音乐和歌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伴奏从早期的乐队到电子音乐,到声光控制,从灌制留声机唱片到制作磁带和 CD,音域变得越来越广,演出的场面也越来越大。一些重大的演唱会经过电视实况转播会传遍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反映演唱会实况的磁带,录像带和 CD 片像雪片一样在各个国家的文化市场上滚动。

迪斯科(disco)

属于通俗音乐的一种,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非常流行。当时跟随录制的磁带跳舞很受欢迎,这种跳舞的地方或是方式都被称为迪斯科。这种音乐的节奏比较快,同时热情奔放,但又不难学,所以连续几年一直高踞排行榜首位,超过了其他的摇滚乐。迪斯科里也出了许多明星,例如瑞典的 Abba 四人演唱队、美国的 Chic 演唱队、英国的 Beegees 演唱队以及道娜·塞姆、约翰·特拉伏尔塔等歌星都是以演唱迪斯科歌曲闻名于世的。他们演唱的歌曲多次名列歌曲排行榜首位并多次获奖,他们也因此文化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和巨额的商业利润。

首先将迪斯科音乐变成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音乐形式的是斯莱·斯通(Sly Stone)。他把摇滚、苏尔和芬克三种不同的音乐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成为一种对黑人和白人听众都有吸引力的美妙声音。除了他以外,还有几位对迪斯科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音乐家。他们是美国的奈尔·罗杰斯(Nile Rodgers)和伯纳德·爱得华兹(Bernard Edwards)歌曲创作组以及以慕尼黑为创作基地的乔治·莫罗德(Giorgio Moroder)。莫罗德把纽约的迪斯科热引进了欧洲,使之成为欧洲人所喜欢的文化消费热点,成为当时迪斯科音乐的一个领军人物。

2. 各种各样的通俗音乐

进入 80 年代之后,迪斯科音乐逐渐地遭到冷落,而被其他更为适合城市生活的音乐所取代。这里有必要谈一谈通俗音乐。

通俗音乐通常是指 50 年代摇滚音乐问世以后的商业化音乐。它的覆盖面比较宽,可以说能够容纳绝大部分的音乐种类。与此同时,由于它所具有的商业化特征,一些自鸣清高的音乐家,无论是经典的、爵士的、还是摇滚的都不愿意和它沾边。这是因为它总是和赚钱、缺少思想内涵、赶时髦、浅薄等联系在一起。然而,20 世纪的大多数音乐形式又都和通俗音乐分不开,它对普通人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一些成功的歌手都是以演唱流行的通俗歌曲成为巨星的,因此,不能否认通俗音乐对音乐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除了前面谈到的爵士、摇滚、迪斯科等以外,这里对其他的一些通俗音乐流派和通俗音乐中的代表人物逐一作些介绍。

苏尔(Soul)

这是一种从 60 年代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源出于布卢斯节奏,诞生初期受到了黑人和白人歌迷的共同喜爱。该音乐的产生和 60 年代黑人的反种族歧视、争取种族平等、要求同等权利的民权斗争有关,反映了黑人种族意识的觉醒。苏尔(soul)英文的意思是灵魂,意味着他们想要作一个有灵魂而不受人摆布的人。第一个苏尔歌星是赖·查尔斯(Ray Charles)。他在他的歌唱中间不仅唱出了普通黑人所经受的各种磨难,也用影射的方式要求政治权利。其他歌星还有许多,包括萨姆·库克(Sam Cooke)、阿莱萨·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马文·盖(Marvin Gaye)、奥蒂斯·莱丁(Otis Redding)和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等。

拉拍(rap)

80 年代兴起的一种通俗舞蹈音乐 ,从另一种通俗音乐赖格 (reggae)衍变而来 ,以节奏感强、速度快、节拍重复为特征 ,一开始出现在纽约的哈莱姆和布兰克斯一带的年轻黑人当中 ,后来吸引了大西洋两岸的许多音乐爱好者 ,用于他们发泄对政治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早期这种音乐只是被一些音乐主持人(唱片经营者)用作其他一些主流音乐的陪衬而已。随着它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 ,它逐渐成为通俗音乐中的新贵 ,最终产生了自己流派的歌星。这些歌星有的就是这种音乐主持人(唱片经营者)本人。这些人当中包括格兰斯特·费拉西(Grandmaster Flash)、糖山演唱组(the Sugar Hill Gang)、瓦尼拉·爱斯(Vanilla Ice)、M. C. 哈姆(M. C. Hammer)等。拉拍演唱者还有自己一套专用行头——垒球帽外加闪亮的球衣 ,脚登垒球鞋。歌迷们经常提着大功率的立体声收录机放在街区的角落里 ,一边播放着拉拍 ,一边狂乱起舞。歌星们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墙上。

阿西德屋(Acid House)

80 年代后期流行于英国的通俗音乐流派。这是一种声音响亮、气势恢宏、不断重复的综合性舞蹈音乐 ,适于在俱乐部或是人多的公众场合里播放 ,乐迷们有时也可以在播放过程中添加点自己的东西。这种音乐最早出现在美国 ,被称之为芝加哥屋。后来三个英国的音乐主持人(唱片经纪人)使之和欧洲迪斯科结合起来 ,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流派 ,叫做阿西德屋。阿西德(acid)取自美国俚语 acid burn ,意为“作样本” ,因为它开始时是附在那些弃之不用的样本片上 ,尔后走俏的。这种音乐还经常和那些吸毒者掺和在一起 ,经营这种音乐会的人往往把地点选择在废弃不用的仓库或者其他建筑里 ,在音乐会上兜售毒品 ,让那些参加者一边吸

毒,一边听阿西德屋,更具刺激性。所以,阿西德屋音乐会也是警察们时常光顾的地方。

电子芬克(Electro-Funk)

80年代西方通俗音乐的一种,在电子音乐中占主导地位,其源头和苏尔及布卢斯节奏等有关。现代摇滚中使用的所有电子乐器在电子芬克中都有所体现,其代表人物大都为黑人,其中有普林斯(Prince Rogers Nelson)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这种音乐的特点包括大量使用机械鼓,还插入霹雳舞以及其他富有活力的舞蹈,另外还有些外露的性感成分。

格莱姆摇滚(Glam Rock)有时也称作格莱特摇滚(Glitter Rock)

70年代初期英国风靡一时的通俗音乐流派。它虽然是从硬摇滚演变而来,但它比较轻松一些,也比较活泼和有趣味,带些自嘲色彩。一些表演者,如马克·波兰(Marc Bolan)、斯莱德(Slade)、加利·格里特(Gary Glitter)、戴维·波伊(David Bowie)等人喜欢化妆上场,不但喜欢穿奇装异服,还喜欢隐瞒自己的性别。在一段时间里,这一流派相当有影响,但随着70年代末朋克摇滚的诞生,它的高潮也就结束了。但它的个别明星人物,如加利·格里特却还经常巡回演出,直到90年代仍然能听到他的声音。

朋克摇滚(Punkrock)

硬摇滚的一种,诞生于70年代中期。当时,摇滚和通俗音乐受到了迪斯科和行进摇滚的冲击,年轻人当中由于受到经济衰退影响,表现了对政治的冷漠和思想上的虚无。这类音乐由于首先从伦敦城区的次文化圈里产生,体现了和常见的摇滚与通俗音乐相当不同的特点,不妥协,无政府性,并有意在视觉上造成一种不

好印象。歌迷和歌星们经常是破烂的黑皮衣、奇特的发型、与众不同的打扮,弹着吉他,挤在一个邋遢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声嘶力竭地唱着同一首歌。这一流派没有什么思想纲领,完全是一种心血来潮时的组合。70年代末达到高潮后不久便很快自行瓦解了,但它的一些特色还是保存在新潮流音乐里。其代表有性手枪演唱组、电视演唱组、冲突演唱组等。

行进摇滚(Progressive Rock)

英国摇滚音乐的一种,70年代为其活动期。它和普通摇滚不同,歌词常常很长,词义也很难懂,所以虽然它问世后对音乐市场有所推动,但却难以在市场上立足。然而,它的唱片封面设计常常富丽堂皇,富有想象力,加上抒情色彩较浓,所以在艺术摇滚传统流派中颇有潜力,在中、长期市场上被看好。但随着朋克摇滚等新潮流音乐的出现,它最终还是遭到了排挤,其代表作为70年代初期平克·费劳以德(Pink Floyd)的《月亮黑暗的那边》。

泡泡糖(Bubblegum)

60年代美国的一种流行摇滚音乐,以其简单、通俗,面向十几岁乃至更年轻的青少年著称,因这些青少年爱吃泡泡糖而因此得名。比较成功的作品有俄亥俄快车演唱组(Ohio Express)的《好吃,好吃,好吃!》、阿奇斯演唱组(the Archies)的《糖糖》以及受美国流行歌曲制造商,号称泡泡糖之王的奈尔·波加特(Neil Bogart)影响而发行的许多歌曲。

3. 20世纪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和组织

20世纪的西方音乐是个新潮流不断、各种派别风起云涌的世界,也是歌星和其他杰出音乐人才辈出的时代。在这里选择几个代表人物和演出组织作些介绍。

1)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 ,1901—1971)

20 世纪爵士音乐最有名气的代表人物 ,出生在美国新奥尔良的斯道里维尔 ,也就是爵士乐的诞生地。他从小在家就学会了吹小号 ,13 岁后就开始一边打工一边参加当地的一些乐队演出活动。这些演出对他的演奏技能提高有很大帮助。20 世纪 20 年代他就开始在芝加哥崭露头角 ,以其非凡的才华震动了那里的乐坛。后来他又到了纽约参加了弗赖切乐·汉德森乐团 ,和他们一道录制了许多经典作品。以后 ,他又建立了自己的乐队 ,和自己的妻子利尔·阿姆斯特朗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 ,成功地举行了许多巡回演出。在此期间 ,他把小号改成了大号 ,并参加了演唱 ,发挥了他独特的演唱风格。在以后的 40 年时间里 ,经过巡回演出和唱片灌制 ,他的许多歌曲 ,如《你好 ,道里 !》、《世界多美好 !》以及许多其他布鲁斯曲调的歌曲走进了千家万户 ,传遍了全世界 ,他也因此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爵士音乐明星。

2) 格劳莉亚·盖纳(Gloria Gaynor ,1949—)

美国通俗歌星 ,70 年代中期之前以其迪斯科歌曲著称 ,其顶峰期间获得迪斯科王后的称号。经她演唱而走红的歌曲有《蜜蜂》、《决不能说再见》、《去吧 ,我将在那边》、《我将活下去》等。这些演唱和灌制的唱片使她登上了 1979 年美国 and 英国排行榜首席宝座 ,后来她参加过音乐剧的演出并担任电台的音乐主持人。

3) 道娜·塞姆(Donna Summer ,1948—)

美国 70 年代黑人歌星 ,有迪斯科王后之称。最早因为参加德国的一出摇滚音乐剧《头发》的演出而出名 ,后来和迪斯科唱片制造商乔治·莫罗多合作 ,灌制了大量迪斯科唱片 ,遂走红乐坛 ,成为 70 年代名气最响的迪斯科歌星之一。经她演唱而走红的歌曲包

括《亲爱的,除了爱还是爱》、《我感觉到了爱》、《麦克阿瑟公园》。成名之后,她又和其他人进行二重唱,完全改变了以前性感的形象和演出路子,而以一种虔诚基督教徒的面目出现在舞台上。这方面的代表歌曲为《独立国家》。

4) 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1958—)

美国当今名气最大的通俗歌星之一,有通俗歌曲之王的美称。80年代,他是美国通俗歌曲独唱演员当中卖座率最高的人。从70年代初期开始,他就在印第安纳州的加利加入了杰克逊五人演唱组,受到了许多听众的热烈欢迎,为其以后的演唱生涯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独唱演出从1971年正式开始,几年之后他的唱片集就在发行榜上超过了其他任何黑人,为自己建立了电子芬克演唱最受欢迎的形象。从80年代起,他的一系列唱片集在发行量上就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其中《让我心惊胆战》当时卖了3700万张,更是创造了当年的世界记录,其他唱片集还有《糟糕》、《危险》、《历史》等。除了演唱,他还能在舞台上或是录制棚里表演一些舞蹈动作。他的收入和他的名气一道一直在不断增加,1988年的一场演出创下了一秒钟200美元的纪录,恐怕可列当时的世界之最,而在1991年签下的一份合同里,据说他可以在15年里获取5亿美元的收入。这在通俗歌曲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他的财富和地位加上他的一些独特行为,使他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重要人物之一。这些年来,有关他的绯闻不断,诸如他和一些女人的关系、他的整容手术,甚至他的捐款和对儿童的情有独钟都会成为一些媒体的跟踪对象和重点新闻标题。

5) 鲁西阿诺·帕瓦洛蒂(Luciano Pavarotti, 1935—)

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60年代以后以唱当代歌剧而闻名于世。他出身清寒,父亲是个烤面包的。1961年他在意大利现代著

名作曲家贾考莫·普西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Boheme)里担任罗道尔夫一角,以其洪亮的男高音征服观众而一举成名。从此以后他开始周游世界,在许多大剧院的舞台上出演了一系列经典歌剧的重要角色,例如在莫扎特的《伊都迈尼欧》里扮演了伊达门特,在福迪的《利高赖特》里扮演了曼图阿公爵,在道尼塞蒂的《无所不能的爱》里扮演了奈莫里诺。这些演唱给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使他成为当代最优秀的歌剧演员。特别是1988年在柏林的一次演出当中,他创造了谢幕165次的全新纪录。他的歌集在许多国家畅销,有的还名列歌曲排行榜前列,例如《奈森·道玛》在1990年时被许多国家列为最畅销歌集。他还和其他歌星一道参加了世界杯宣传活动,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 埃尔维斯·普赖斯莱(Elvis Presley, 1935—1977)

美国歌手和吉他演奏手,绰号《摇滚王》,又称‘猫王’。他是20世纪摇滚和通俗歌曲史上的著名传奇人物。他出身于密西西比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喜欢唱歌。18岁那年,他有机会第一次将自己的歌声录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了他母亲。他的演唱才华不久受到了音乐制作人塞姆·菲力浦的赏识,有机会录制了他平生的第一首歌曲《那好吧,妈妈》,从此以后他走上了专业演唱的道路。他的歌集《伤心的旅店》在通俗歌曲,布卢斯节奏和乡村等不同种类歌曲的系列排行榜上都名列首位,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他把黑人和白人的音乐传统、把布卢斯和乡村音乐、白人摇滚音乐结合起来,加上他在演唱时富有刺激性的表演动作,如臀部扭动,使得他在电视上露面不久,就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歌星,受到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的狂热喜爱。他所演唱的一系列歌曲,例如《猎狗》、《蓝色的剥亮皮鞋》、《不要无情》、《牢房的石块》、《全都摇起来》、《轻轻地爱我》等都创造了空前的销售记录。

后来,他在美国军队里服了两年兵役,回来后他的演唱风格从

旧有的摇滚叛逆者形象变得温和了些,但仍然保持着他在听众当中摇滚明星的地位。他在60年代发行的唱片《要不现在,就永远不再》、《今宵孤独吗?》、《屈服》和《返还》都在大西洋两岸的排行榜上高踞榜首。取得歌坛上的成功之后,他又涉足电影,参加拍摄了30多部影片,但大多数都不很吸引人。他后期生活极其豪华奢侈,又因染上了毒瘾而不能自拔,后被发现死在自家浴室里,估计是注射了大量毒品而导致身亡。他的死亡对整个通俗音乐世界是个不小的震动。他的歌迷当中也有好几个因此而自杀身亡。他的家和墓地更是成千上万的歌迷们瞻仰和朝拜的地方。作为一个独唱歌手,他的名声和影响在西方世界都是空前的,几乎无人可以和他相比。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摇滚巨星将会在音乐史上得到永久的保存。

7) 甲壳虫演唱组(The Beatles)

英国利物浦的一支通俗音乐演唱组,整个60年代一直在世界各地的音乐排行榜上领先,被普遍认为是通俗音乐有史以来最受欢迎,也是最有影响的演唱集体。他们最常用的一个绰号叫做“四人杰”(Fab Four),为他们的歌迷们广泛接受。这个演唱组最早是其主要成员约翰·列农(John Lennon)在1957年他还是个中学生的時候建立的。建立初期演唱组带有斯基弗尔的风格,在以后的发展当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主要成员经过一番闯荡各自为自己起了艺名,其中一个叫做银色甲壳虫。此名主要是仿照1954年拍的电影《狂野的人》中甲壳虫牌摩托车而起的,在歌迷们当中颇受欢迎。于是他们5个人干脆在1960年时一道改用甲壳虫作为演唱组的代号唱了起来。这个演唱组的另外4个成员分别是保尔·麦卡尼(Paul McCartney, 1942—)、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 1943—)、低音乐器斯图亚特·塞克里夫(Stuart Sutcliffe, 1942—1962)和鼓手彼得·贝斯特(Pete Best, 1941—)。其中塞克

里夫不幸于 1962 年早逝 ,而贝斯特则由林哥·斯达所代替。他们先在利物浦和汉堡演出 ,并在德国录制唱片。从 1962 年开始 ,他们就逐渐受到歌迷们的注意 ,所灌制的单个唱片和歌集在音乐市场上慢慢走红 ,不久他们所演唱的《她爱你》、《爱我吧 !》就获得了成功。紧跟在这些唱片后面的是些内容更加深刻以及和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的歌集。如反战运动中的和平主义思想、毒品文化、东方神秘主义和个人的抱负等。他们的单张唱片 ,从《从我到你》开始 ,连续 11 次在排行榜上名列首位 ,到 1969 年最后一张《约翰和犹可的歌谣》,共计 18 次在排行榜上独占鳌头。最重要的歌集有《手轮枪》、《派波军士孤独俱乐部乐队》、《白人歌集》、《阿比路》和《随它去吧》。

70 年代这支在西方世界名噪一时的演唱组宣告解散 ,让许许多多歌迷感到十分失望。一段时间里曾经谣传它会东山再起 ,但随着它的主要人物列农被一个狂热歌迷谋杀而破镜难圆 ,90 年代中期 ,收集甲壳虫歌曲的三卷本歌集卖到了二亿册 ,创下了破天荒的世界记录。此外甲壳虫歌星留下的另外一份遗产是他们的拖把式发型。时至今天仍不时见到留有这种发式的年轻人在街上游荡。

8) 比基斯演唱组(The Bee Gees)

英国通俗歌曲的一个演唱组织。60 年代末以《1941 年的纽约矿井灾难》一炮打响 ,引起歌坛注意。紧接着他们在马萨诸塞州上了排行榜首席宝座。他们取得的成功对当时的歌坛是个不小的震动。

比基斯(BG)实际上是 Brothers Gibb(吉伯兄弟)的缩写 ,由 Gibbs 兄弟三人(Barry Gibb ,1946— ;Robin Gibb ,1949— ;Maurice Gibb ,1949—)组成。他们在 50 年代开始了他们的演唱生涯 ,后来随其父母迁居澳大利亚。1967 年他们三人又回到了英国 ,加上吉

他手文斯·麦罗尼(Vince Melouney)和鼓手考林·彼得森(Colin Petersen)重新建立了他们的演唱组。取得初步成功后,他们曾经一度散伙,好在时间不长又重新聚集一道恢复了演出。在美国歌曲排行榜上以《孤独的日子》和《你怎能修复破碎的心》技压群芳。以后,他们又改为较活泼的迪斯科唱法争取到了新的听众,如《你应当在跳舞》、《天堂太多》、《悲剧》、《爱你爱个够》。他们的几支电影插曲《你爱有多深》、《活着》和《夜热》更是倾倒了不知多少听众,在1976年当年就荣登排行榜首席宝座,唱片集列入了长期畅销的行列,只有杰克逊的《惊险者》(Thriller)可以与之媲美。

他们的演出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以后仍然一边自己演出一边替其他歌星谱写歌,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小弟弟安迪·吉伯(Andy Gibb, 1958—1988)。他们谱写的《你又赢了》仅仅在1987年就在排行榜上获得过7次首席位置。

9) 麦当娜(Madonna Louise Veronica Ciccone 1958—)

美国当代最有名气的通俗歌星和演员,原籍意大利,意大利教会学校毕业,曾经当过服务员,从70年代末开始改行从事演艺生涯,先后当过鼓手、舞蹈演员和歌手。1982年首次走进唱片录制棚,一炮打响,一年后她的《假日》以及《幸运明星》就登上排行榜。以后又因在电影《急寻苏珊》里的出色表演获得评论界好评。她的唱片集《和圣女一样》很快又畅销世界,使她成为一个既天真可爱又性感、独立的女性形象。

她的歌曲碟片和录像带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增加了她对听众和观众的吸引力,也有助于她插足影坛。虽然她在一些电影中的表演并非尽善尽美,有些评论家对她的演技并不看好,但她在歌坛中的地位却扶摇直上。她的一些唱片集如《和圣女一样》和《真正的布卢斯》一直受人欢迎,并创下了1100万的销售纪录,在28个国家名列排行榜第一。与此同时,她一直敢为天下先,如摄

制或拍摄了一些和性有关的电影和照片,利用自己的性形象四处作广告,成为她这一代中公认的性象征。

10) 阿巴演唱组(Abba)

瑞典的一个通俗音乐演唱组,成立于1973年,第二年就获得欧洲眼歌曲比赛的大奖。阿巴(Abba)取自于该演唱组四个成员姓名的第一个字母: Agnetha Faltskog(1950—), Bjorn Ulvaeus (1945—), Benny Andersson (1946—), Annifrid Lyngstad (1945—)。后来又以单张歌曲唱片《米亚妈妈》,《舞后》,《知我知你》和《全归赢家》连续在英国走红相继获得排行榜第一。到了1978年,这个演唱组成为继甲壳虫后世界上最成功的音乐搭档,其商业性盈利超过了瑞典任何一家企业,甚至比汽车制造商伏尔伏还要多。鉴于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这种成功尤为可贵。该演唱组在乐坛一直活跃了10年。直到1983年,因其中二个人的婚姻因此而告解体才最后结束,但到了90年代初他们又以其他名义恢复了一些演唱活动。

11) 契克(Chic)

美国通俗音乐演唱组,活跃于70年代,以演唱和弹奏迪斯科著称。他们所灌制的唱片是当时大西洋唱片公司经销的最大交易项目。其主要成员为低音乐器弹奏手尼罗·罗杰斯(Nile Rodgers , 1952—)和吉他手伯纳德·爱德华兹(Bernard Edwards , 1952— 1996),以后又有两位女歌手琴·莱特(后为露茜·马丁取代)和阿尔夫·安得森加入担任名义上的领头人。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精心策划,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迪斯科舞蹈音乐唱片,节奏非常快,在美国和英国都大受欢迎,名列排行榜前列,因此而产生了许多效仿者。他们的唱片包括《舞,舞,舞》、《心血来潮》、《好时代》。罗杰斯和爱德华兹于1983年分手,但在1992年又重新合在一起演出。

4. 现代舞蹈和音乐

西方现代舞蹈大约是从 20 世纪初叶,尤其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欧洲的表演舞台上一些演员通过形体的动作,有时是一些夸张的动作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和一些复杂的思想。这种表演方式显然不同于过去传统的表演方式,显得更有力量、内涵更加丰富、动作幅度更大、观赏性更强。这种舞蹈先是在一些档次较高的场合里表演,得到了上层阶级的观众喜爱,后来逐步走向社会,并从欧洲传到了美国、澳大利亚,从西方社会走向了世界,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

现代舞蹈是作为古典舞蹈,特别是芭蕾舞的叛逆者而诞生的。它的先锋人物是美国舞蹈家伊萨多拉·顿肯(Isadora Duncan, 1878—1927)。顿肯认为芭蕾舞技巧过于古板,限制和歪曲了人体的自然表现力,将人体的舞蹈动作和人的内心世界分离开来,使得舞蹈者的舞蹈姿势看上去就像是机械的玩偶一样。她所设计的舞蹈动作简练实用,节奏自然。她从风和浪这样一些自然现象当中获取了灵感,也从古代的雕刻以及其他艺术品里面受到了启迪。她的舞蹈动作包括手臂的高举和远伸,头部的高昂,各种不受约束的翻腾、雀跃和动作连贯,一气呵成的节奏。这些生气勃勃、力量型的舞蹈动作加上别出心裁的服装,表现了她的舞蹈思想,那就是舞蹈应当反映人的高尚精神。这一思想推动了现代舞蹈对原始本能以及人内心世界中的各种激情和冲突的探讨。经过顿肯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产生了一种比芭蕾舞更为自然、更加富于表现力的新型舞蹈。

顿肯所创造的简单和明快的舞蹈风格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真正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的却是另外两位美国舞蹈家——路丝·丹尼斯(Ruth Denis)和特德·肖恩(Ted Shawn)。这对夫妻在 1915 年共同创办了丹尼肖恩舞蹈学校,承担起非芭蕾舞的教学任务,培

养出了不少现代舞的新秀。这些人当中,最为出名的当数多利丝·汉弗莱(Doris Humphrey)和玛莎·格拉翰(Martha Graham)。汉弗莱注重舞蹈的技巧和结构安排,尤其是集体舞的组合及层次。格拉翰则注意舞蹈动作的感情渲染。他们及其后来者更加强调人体躯干和骨盆的动作,表现出一种更有力量,更加贴近人的本能和现代人生活的创作欲望和要求,和以芭蕾舞为代表的经典舞蹈相比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表现主义舞蹈。

表现主义舞蹈在西方舞台上一度一枝独秀,长达20年。直到1940年莫斯·卡宁汉姆的舞蹈思想出台,这一情况才得到了改变。莫斯·卡宁汉姆(Merce Cunningham)认为舞蹈应有一定独立性,它既非叙述性的又非情感性的。它和音乐及设计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区别。在舞台上舞蹈动作有自己的表现空间,在和音乐及背景互相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同时,应和它们适当拉开距离,维持各自的功能范围,让观众自己进行判断和欣赏。他认为,大自然中的一切运动都是舞蹈的素材,既包括自然现象,也包括人类的活动。同时他也从古典舞蹈,尤其是芭蕾舞当中吸取营养,例如轻匀的空中跳跃、腿部的抬高和控制。此外,他也注意吸收格拉翰舞蹈的合理部分,例如舞步中心放在人的脊背和骨盆上面。他所设计的舞蹈动作总是围绕着头部、躯干和四肢的迅速变化而展开。一些集体舞在舞台上表演时常常没有什么中心,而由演员们自由发挥,在同一时间里显示出不同动作。这种乍看上去很不协调的舞蹈不是根据什么故事展开,而是用一种激情或理念激发观众的想象力。这方面的代表作是1964年上演的《冬天的树枝》。舞蹈通过上天下地的表演表现了一种抽象的精神状态。观众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既可以联想到战争和集中营这样的人类悲剧,也可以想象到暴风雨到来时的情景。他始终坚持认为,舞蹈的特性不是反映在故事里,而是反映在动作当中,有了动作就有了情感。

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新一代舞蹈家成长起来,他们继

承了卡宁汉姆的部分舞蹈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扩展。他们也认为舞蹈里可以包含一些日常的动作,但他们不主张舞蹈进行道德说教,也不赞同舞蹈编排和表达过于复杂,否则会影响观众的欣赏和理解。结果,这些称之为后现代的舞蹈以一种非常简单的动作,例如走、跳、跑、滚取代了他们前辈的舞蹈模式。这些基本动作在他们的演出当中占有很大比例,围绕着时间、空间,根据人体的重量及能量展开。后现代的另一个特征是摒弃了对场景和服饰的考虑。表演者可以身着普通服装,不要任何舞蹈背景和灯光。户外露天里,画廊当中,楼阁上都可以作为他们的表演场地。他们的表演没有任何故事线索,结构编排非常简单。代表作如汤姆·约翰逊(Tom Johnson)的《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让一个演员在舞台上一边跑一边背诵一篇课文,最后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才停了下来。

现代派舞蹈主要由一些规模较小的演出团体经营,他们一般资金不多,观众面也有限,由于场地较小,可以和观众面对面地交流。这样做的优点是贴近观众,有较强的生活气息。

舞蹈里最受欢迎的是音乐舞蹈,诸如爵士舞、迪斯科舞、踢踏舞等。这些舞蹈虽然没有多少独创性,但却由于一些演员的高超技巧而成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著名的有杰罗米·罗宾斯的(Jerome Robbins)《西边的故事》、阿格尼斯·德·米尔(Agnes de Mille)的《奥克拉赫马》以及鲍布·福斯(Bob Fosse)为电影编排的舞蹈《那首爵士》。

现代舞蹈和现代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迪斯科、摇滚等现代音乐既可以以演唱的方式出现在舞台上,也可以以舞蹈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更多的情况下是演唱和舞蹈同时进行,一个或几个人演唱,旁边则是几个、十几个乃至更多的伴舞者。而各种乐器或者电子乐器则随着闪烁的五颜六色灯光在那里不停地敲击、拍打甚至吼叫。一台这样的音乐晚会往往会吸引成千上万的听众和观

众 ,其表演实况常常通过卫星电视转播传遍世界各地。

除了观赏性舞蹈之外 ,也有些西方人 ,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光顾舞厅 ,或者可以跳舞的酒吧 ,在那里和自己的心爱的人一起共度良宵。舞上一曲 ,或者跟着唱片哼哼旧调都不失为一种轻松的休闲方式。但眼下对更多的西方人来说 ,在家看电视或录像似乎更为普遍。

第十三章 二次大战后的文化潮：电影电视和文学文化批评

二次大战以后西方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电影电视的制作,还是文学文化的批评,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局面首先归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是归于文化界比较宽松的环境以及多元文化的竞争机制。电影电视迎合了大众文化的需求,在创作题材和艺术手法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得到了文化市场和专业人士的认可。西方高雅文学虽然受到通俗文化冲击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有才华的作家和成功的作品还是层出不穷。文学理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带动下也跨出了新的步伐,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接受美学、文化物质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一个流派接着一个流派,让人目不暇接。

一、二次大战以后的西方电影

电影是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于 1894 年首次播放的。但他的电影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充其量只是供儿童们观赏的万花筒,既没有银幕,也没有放映机,更不要说声音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是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他们研制出了一部放映机,于 1895 年 12 月 28 日在巴黎首次放映了 12 部每部一分钟的影片。这一天意义重大,从此以后世界上开始有了电影,人们多了一种娱乐方

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出现了很大变化。

从电影诞生的那天起,欧美两地就显示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拍的都是些现实主义场景——火车进站、工人下班、熙熙攘攘的人群等等。爱迪生拍的则是各种娱乐活动、歌舞表演、拳击比赛。这种不同的风格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以后。现实主义电影一度对饱经战争痛苦的欧洲人很有吸引力。例如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多为揭露法西斯分子的战争罪行,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在战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很受普通人的欢迎。有代表性的影片包括《游击队》、《偷自行车的人》。但5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兴起,现实主义电影逐步为美国的西部片以及其他娱乐片所取代。

二次大战以后西方电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美国的奥斯卡奖之外,法国的嘎纳、德国的柏林和日本的东京等国家都先后建立了电影节。尽管好莱坞不再独领风骚,还是制作出诸如《告密者》、《愤怒的葡萄》、《沉默的人》、《三十九级台阶》、《失踪的女人》、《蝴蝶梦》、《陌生的人》、《简·爱》等一批有质量的影片。一些受到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导演试图在电影创作上融合进新的理论和手法,如美国的《白日的罗网》、《烟火》、《兔子月亮》,法国的《喘息》、《四百下》、《广岛之恋》和《奇遇》。但是他们的这些尝试似乎不是很成功,普通人更愿意看些他们能够看得懂的、用传统手法拍的片子。

1. 美国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严格地说是从1913年起逐渐成为世界电影中心的,培养出了一批电影人才。首先是导演戴维·格里菲斯,他是电影技术派的先驱人物。在他的手里出现了叠印和蒙太奇这样一些技巧。他还拍了不少喜剧片,得到不少人的喜爱。另一位著名导演是马克·塞纳特,他发现并培养了大名鼎鼎的卓别林。查理·卓别林是

20 年代的电影明星。他的那个头戴小礼帽、脚穿大皮鞋、手持细手杖的形象,不知逗笑了多少人。除了他以外,还有因主演《风骚女人》而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玛丽·壁克馥以及英俊潇洒的弗兰西斯·波斯曼等。这个时期的著名影星还有勃斯特·基顿和哈莱·兰格东。他们都以自己的卓越表演赢得了许多观众。

虽然那时的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所喜爱的娱乐活动,让人欣赏到各种精彩的表演,但是却不能听到任何声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这个问题到了 1927 年 10 月为华纳电影公司所解决。他们所拍的《爵士歌手》成功地把声响、对白、音乐和歌唱结合到了一起。这部描写一个演员成长道路影片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7 年以后,彩色电影试制成功。这样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从技术上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境界。与此同时,电影界出现了一个合并的浪潮,最后剩下的 8 家电影公司几乎完全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这 8 家公司包括米高梅、派拉蒙、华纳兄弟、20 世纪福克斯、雷电华、联美、宇宙和哥伦比亚。这些公司在制作内容和发展方向上做了进一步的分工,建立了制片人和明星制度。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电影事业有了飞快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包括故事片和新闻片在内的品种繁多、规模日渐扩大的电影制作体系。到了 30 年代,故事片电影已经有西部片、歌舞片、喜剧片、恐怖片、科幻片、战争片和体育片,而非故事片也有广告片、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等品种。故事片当中西部片最具吸引力,延续时间也最长。从 1904 年的《火车大劫案》到 1924 年的《铁骑》、1938 年的《关山飞渡》,再到 1953 年的《原野奇侠》,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西部片独特的风采。歌舞片在一段时间里也曾经使不少观众倾倒。例如 30 年代的《第 42 街》、《快乐的离婚者》、《高帽子》都体现了歌唱和舞蹈的完美结合。此外,由邓波儿主演的儿童片也盛极一时,其形象经久不衰。科幻片自环球公司 1930 年首次推出以来也受到了公众的热烈欢迎,成为好莱坞票房收入的又一重要来源。以

上这些影片都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与此同时他们也制作出一些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的故事片,例如《大卫·科波菲尔》、《乱世佳人》等。一些影星也随着这些影片的上演而名扬内外,如克拉克·盖博、费雯丽,莱斯丽·霍华德和奥丽薇·哈薇兰等。

在西方电影的发展史中,好莱坞电影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随着电视的迅速发展,好莱坞的电影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从总体来说,它凭着它的雄厚实力和应变能力还是站稳了脚跟,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从1975年开始好莱坞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年的6月,发行了一部新的影片,它便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巨嘴》(*Jaws*)。2年以后又发行了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星球大战》(*Star Wars*)。这二部影片,尤其是后者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掀起了一阵电影狂潮,创造了1亿美元以上的票房纪录。紧接着的是《超人》(*Superman*)、《勤务兵》(*Batman*)、《美人和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谈话》(*The Conversation*)、《教父续集》(*The Godfather Part II*)、《唐人街》(*Chinatown*)、《出租车司机》(*Taxidriver*)、《飞过斑鸠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纳什维尔》(*Nashville*)和《都是总统身边的人》(*All the President's Men*)、《英迪安娜·琼斯》(*Indiana Jones*)、《抢劫迷舟的人》(*Raiders of the Lost Ark*)、《编外人》(*E. T. The Extra-Terrestrial*)、《帝国还击》(*The Empire Strikes Back*)、《杰迪归来》(*The Return of the Jedi*)等一批极有影响力、具有轰动效应的影片。这些影片所涉及的领域并非相同,但普遍迎合社会上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猎奇、感情冲动、正义感强烈、嫉恶如仇等特点,同时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惊险和刺激性场面,不惜巨资投入。例如卢卡斯导演的《星球大战》是一部科幻片,将丰富的想象力和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而又适当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刺激和调动了观众,特别

是青少年的猎奇心理,上演后没有多少时间就获取了2亿美元以上的收入。另一部高收入影片《英迪安娜·琼斯》系列片则表现了二次大战期间抗击纳粹德国的故事。剧中人英迪安娜是个既有种族偏见又有正义感和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社会的普通人。放映后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票房收入达到了1亿美元以上。票房价值近年来创纪录的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编外人》。这部影片讲述了二个孩子的故事。这两个孩子都遭到了失落的痛苦,一个是由于家庭的破裂而不得不在社会上流浪,一个则因为太空船的失误而在宇宙当中游荡。影片不仅故事情节离奇,容易勾起观众的求知欲望,而且包容了人类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对一些男性当权者的调侃,把幻想和实际结合起来,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创造了2.28亿的租金额。

在好莱坞的发展史上大公司的兼并是个令人瞩目的现象。8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这些合并对好莱坞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它们包括20世纪福克斯公司并入默多克的国际出版和广播财团、华纳公司和时代公司合并成为华纳—时代影业公司、日本制造业公司购入哥伦比亚和三星公司、日本松下(Matsushita)电器试验公司对美加亚和宇宙公司的兼并等。这些由于国际财团牵头的合并促进了媒体、通讯和文化业的一体化,增强了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实力,有利于国际资本的渗透,带动了电影、电视和录像业新一轮的发展。

除了上面这些影响较大的片子外,喜剧片在好莱坞也占有重要地位。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导演的《国人对动物之家的奚落》(*National Lampoon's Animal House*)。该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喜剧演员约翰·贝路什(John Belushi)近似癫狂的精彩表演。此片之后,好莱坞又推出了一系列喜剧片,它们包括伊凡·莱特曼(Ivan Reitman)导演的《群鬼》(*Ghostbusters*)和马丁·布赖斯特(Martin Brest)导演的《贝福里山

的警察》(*Beverly Hills Cop*)。前者是 80 年代最为成功的喜剧片 , 由来自加拿大的年轻演员比尔·默里(Bill Murray)和丹·艾克罗以德(Dan Aykroyd)担任主角 , 他们出演后一举成名。比尔·默里在此片成功后又在《贝福里山的警察》里担任主要角色 , 再次获得成功。

在制作许多成功的影片过程中 , 好莱坞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当中既有导演、演员 , 也有编剧和制片人。这些人里有些还身兼几种身份 , 显示了多方面的才华。70 年代中期风靡一时的《磐石》(*Rocky*) 的主角由西尔维斯特·斯泰隆(Sylvester Stallone)担纲。他同时还是这部表现一个来自菲律宾拳击运动员生涯影片的编剧 , 结果在奥斯卡的评选中他既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又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 从而成为继卓别林和奥森·威尔士之后在同一部影片之中连获二奖的第一人。斯泰隆后来又在续集和《第一滴血》(*First Blood*) 及其续集当中有过出色表演。后者是部反映越战时期美军遭遇的影片 , 带有强烈的反战思想。另一位成功的演员是曾经当过举重运动员的奥地利人阿诺德·海格尔(Arnold Hegger)。他在一系列军事题材情节中担任主角 , 诸如《结束者》(*The Terminator*) 《捕食者》(*The Predator*) 《孪生兄弟》(*Twins*) 和《幼儿园警察》(*Kindergarten Cop*)。他在这些影片里几乎都充当了超级英雄角色 , 以其强壮的体魄、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或者非凡的能力击败了各种邪恶势力 , 最终成为胜利者。

好莱坞的导演里弗兰西斯·考波兰(Francis Copperland)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执导了《教父》(*Godfather*) 这部票房纪录创新的影片 , 还是另一部成功影片《谈话》的编剧和导演。这部片子讲述一个专门搞窃听人的行为和内心思想 , 虽然票房收入不算很高 , 细节描述却相当细腻和真实 , 是一部电影艺术的经典之作。拍完《谈话》之后 , 考波兰又拍了《教父续集》。这部片子虽然不像《教父》那样具有轰动效应 , 却更为深入地探讨了集团犯罪的

社会根源和政治上受人操纵的原因,因此显得更为深刻。

另一位成功的编剧兼导演是阿伦(Woody Allen)。他既编又导又演,一年基本上推出一部片子。最成功的杰作是《安妮大厅》(Annie Hall),在1977年的奥斯卡奖里,该片不仅荣获了最佳影片称号,而且还一举拿到了最佳导演和编剧的奥斯卡奖,击败了《星球大战》获得了最佳演员的提名奖。一个人获得了如此多的殊荣实为罕见。他的其他一些影片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其中包括《曼哈顿》(Manhattan)、《枪疯》(Gun Crazy)、《鲍尼和克莱德》(Bonnie and Clyde)等。

在好莱坞的名人当中有一个十分抢眼的人物,他就是奥立佛·斯通(Oliver Stone)。作为编剧,他写的《午夜快车》(Midnight Express)和《疤脸》(Scarface)以描写暴力和残忍而著称;而作为导演他的风格简洁明快、单刀直入、敢于针对有争议的问题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同时结合使用些讽刺和象征手段,因而能够产生些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作为一个曾经在越南战场上服过兵役的老兵,斯通熟知这段战争历史和战场上各种人物的心理。他导演的《一排人》(Platoon)赢得了许多参加过越战老兵的喝彩,被誉为同类作品中最真实记载这段历史的影片,因此一举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他的另一部影片《约翰·肯尼迪》(JFK)描写了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的历史事件,由于影片将他视为美国政界一次阴谋的牺牲品,因而引起了朝野上下广泛的争议和许多言辞激烈的批评。

米歇尔·西米罗(Michael Cimino)在好莱坞导演业当中是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成名之作是《猎鹿手》(The Deer Hunter)。这是一部以越南战争为题材的影片,对美国人在越战期间的作用进行了反思。尽管好评不少,但也有不少人对影片所揭示的种族主义和傲物自大表示不满。作为首部反映越战的重要影片,它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他的《天堂之门》(Heaven's Gate)是部以怀

俄明州早期开发历史为背景的影片,投资达到3 600万美元,场面壮观、制作华丽,遗憾的是放映效果并不理想,观众反应冷淡,结果造成巨额亏损。投资方某个艺术家联合公司也因此被好莱坞梅加美公司接管。

马丁·斯考西斯(Martin Scorsese)是位有才华的导演,但他的运气似乎并不太好。他的两部富有激情的影片《喜剧之王》(*The King of Comedy*)和《几小时之后》(*After Hours*)投入市场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票房收入相当低。但他并没有气馁,在下一部片子《钱的颜色》(*The Colour of Money*)吸取了教训,适应市场需求,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部《基督的最后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s of Christ*)里,他从一种市民的视角探讨了耶稣的思想及其生活态度,虽然该片遭到了一些非议,但终究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认可。此外,他还执导了堪称好莱坞80年代杰作的《狂怒的公牛》(*Raging Bull*),表现了一个叫做杰克·拉·摩他的拳击手生涯。

在好莱坞,戴维·林奇(David Lynch)以导演商业片闻名。他的第一部片子《橡皮头》(*Erasehead*)拍于1976年,开始是为美国电影学院电影研究中心的学生观摩用的,后来则成为午夜电影的固定放映节目。从那以后,他逐渐养成一种了解普通观众情趣的习惯,为以后执导商业电影作了准备。他的第一部商业片《象人》(*The Elephant Man*)开始是用黑白胶卷拍的,投入市场后观众反映很好,从此拍摄了一连串的商业片子,以满足商业社会的各种要求。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编剧兼导演是约翰·休斯(John Hughes)。他的影片打破了以往好莱坞的名种影片类型的界限。他所导演的系列青少年片《十六支蜡烛》(*Sixteen Candles*)、《早餐俱乐部》(*The Breakfast Club*)和《穿红衣服漂亮》(*Pretty in Pink*)真实地记述了住在大城市富人区的十几岁少年的生活情景和他们的苦恼人生。另一部片子《菲里斯·贝勒的休息日》(*Ferris Bueller's Day*

Off)以其对平凡人的描述而赢得了许多人的好感,其票房收入因此而创下了他所有影片的新记录。

好莱坞基本上是一个由男性主宰的世界。尽管女权主义吹来了一阵变改之风,这种局面也并没有多少变化。然而一些女性导演和编剧还是凭着自身的努力在这里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例如亚密·赫克林(Amy Heckerling)导演的《活跃的里奇蒙中学》(*Fast Times at Ridgemont High*)一举成功并推出了新秀辛·彭(Sean Penn)。玛萨·古里其(Martha Coolidge)原是个独立的新闻片制片人,后来加入好莱坞,导演了《山谷姑娘》(*Valley Girl*)和《真正的天才》(*Real Genius*),以后又导演了《迟开的玫瑰》(*Rambling Rose*),女演员戴安·拉德(Diane Ladd)和劳拉·邓(Laura Dern)这对生活中的母女因此也名声大振。另一位女导演苏珊·塞德尔门(Susan Seidelman)的《小片断》(*Smithereens*)还获准参加了法国嘎纳电影节的竞选活动。她最初导演的电影是部喜剧《急寻苏珊》(*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因此而推出了一位通俗歌星麦当娜(Madonna)。她们都用自己的扎实工作为好莱坞的电影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70年代另一部有影响的片子是《唐人街》(*Chinatown*)。这部由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执导的影片描写了一个腐败、充满政治权力和性诱惑的世界。虽然表现的都是30年代的故事,但是其中的经济活动和政治腐败之间的联系又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了当今的社会生活。马丁·斯考斯的《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讲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如何在开车过程中观察到的肮脏和黑暗的城市生活,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复员军人用自己的良知表达了内心不安,从而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这在同时代的影片中并不多见。

70年代后半期,好莱坞电影业不仅制作了一些大片,还出了一批受到广泛称赞的精品,因此被称为好莱坞的黄金时期。除了

上面提到的一些片子外,这一时期的影片还包括下面这几部:米罗斯·福门(Milos Forman)执导的《飞过斑鸠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该片获得了197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罗伯特·阿尔门(Robert Altman)执导的《纳西维尔》(*Nashville*)、阿兰·帕库拉(Alan Pakula)执导的《都是总统的人》主要反映水门事件期间新闻记者跟踪调查的情况,此外还有西尼·卢迈(Sidney Lumet)执导的《网络结构》(*Network*)。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黑人进入好莱坞电影圈子并一举成名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数量极少。但从60年代开始这种现象有了改变。第一部由黑人导演并获成功的影片是高登·帕克斯(Gordon Parks)的《知识树》(*Learning Tree*),它基本上以他个人经历为主描述了一个黑人青年成长的经过。他的另一部影片《通道》(*Shaft*)是一部侦探片,讲述了一位黑人私家侦探的故事,其影响超过了前者,电影放映之后又改成了电视系列片在各家电视台播演。从那以后,一批由美国黑人制作的电影涌现出来。黑人制片人首推美尔文·凡·皮波尔斯(Melvin Van Peebles)。他导演的第一部片子是在法国完成的,片名为《三日通行证的故事》(*The Story of a Three-Day Pass*),后来又回到好莱坞拍了喜剧片《西瓜人》(*Watermelon Man*)和《亲亲爱爱的坏歌》(*Sweet Sweetback's Bad Asssss Song*)。后者表现了黑人强烈的叛逆精神,在黑人当中反响很大,尤其是对黑人青年有较大影响。皮波尔斯后来转搞电视和戏剧,不再从事电影制作了。

真正从事电影制作的黑人制片人是斯培克·李(Spike Lee),他的处女作是故事片《她得拥有它》(*She's Gotta Have It*)。他靠了一笔基金赞助花了13天时间拍完了这部半彩色、半黑白的影片,塑造了一个黑人妇女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形象,有些性暴露的镜头,因此而遭到一些批评。后来他又拍了《学校震惊》(*School Daze*),揭示了校园里的种族歧视问题。接下去是表现一家意大利

比萨饼店发生的种族暴力事件的影片《别做错事》(*Do the Right Thing*)和另一部描写爱情的影片《丛林热》(*Jungle Fever*)。当然他更为出名的电影还是《马尔科姆 X》(*Malcolm X*),该片讲述了一位出色的黑人垒球运动员成名的经过。

其他较为知名的黑人导演还有约翰·辛格勒顿(John Singleton),他的《戴帽子的男孩们》(*Boyz N the Hood*)描述了洛杉矶郊区的黑人青少年如何在暴力中成长起来的经历。

2. 欧洲电影

欧洲电影起步不比美国电影迟,但由于比较分散,整体实体有所影响。在当代欧洲电影界中,最为知名的电影制片人当推丹麦的卡尔·德莱易尔(Carl Dreyer)。他的电影生涯开始于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但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他在 50 年里仅仅拍了 14 部片子,而其中有声电影只有 5 部。他最后的一部片子《吉特路德》(*Gertrud*)在 1964 年拍完时他已有 75 岁高龄。这部宣扬爱情至上、爱情艰难的影片带有悲伤情调,虽然遭到了一些影评家的抨击,却是那些喜欢思旧和多愁善感的影迷们钟情所在。

英国电影在欧洲电影当中受美国影响最大,一度几乎为好莱坞电影所遮盖。二次大战后,几位年轻的英国导演试图探索出一条将好莱坞电影和英国电影结合在一起的新路子,其中戴维·林(David Lean)的二部片子《奎河上的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和《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比较成功,先后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和导演奖。他们在二战前后还创办了一家由牛津大学电影协会编辑的电影杂志《顺序》(*Sequence*)。这家杂志虽然只维持了 6 年时间,但在当时对于探讨一些和电影有关的实际和理论问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他们还发起了自由电影运动,强调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表现。在思想上面他们接近本国的愤怒青年文学流派,常把他们的剧本和小说改编成电影。这

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托尼·理查逊(Tony Richardson)。他曾经是位戏剧导演,后改拍电影,将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的二个剧本《愤怒回首》(*Look Back in Anger*)和《娱乐者》(*The Entertainer*)拍成了电影,而他最成功的改编是将菲尔丁的名著《汤姆·琼斯》(*Tom Jones*)搬上了银幕,并因此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导演奖。理查逊的另一贡献是对《周六夜和周日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的制作。这部片子基本上采用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意大利电影导演贝朗杰罗·安东尼奥尼(Belangelo Antonioni)的《扩印》(*Blow-Up*)在法国的嘎纳电影节上先声夺人,获得了最佳影片奖。影片开始采用了现实主义手法,让主人公——一位时装摄影师在他的暗房里冲洗照片。正当他加工和扩印他在一个公园里拍的底片时,无意中发现了某种谋杀的迹象,于是他开始在伦敦进行搜寻,试图揭开这个谜底。但他越想弄清事实真相却变得越加糊涂。影片的新颖之处在于导演不再关心视觉,而将重点放在如何使用和控制画面上,这样影片就从写实主义过渡到对后现代意念的追求。

西班牙导演刘伊·步努埃尔(Luis Bunuel)曾在墨西哥工作过将近20年,后来回到欧洲,和法国、意大利等国导演联合摄制了一批影片。这批影片中最有名的恐怕是《风度翩翩的资产阶级》(*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Bourgeoisie*)。该片讲述了3对男女时隐时现的生活片段——乡间散步,就餐准备,做梦和梦中梦以及贩卖毒品受人保护时的情景。影片被冠以超现实主义,甚至后现代派的帽子加以理论上的阐释和发挥,以对应该片经常出现的一些模糊费解之处。尽管如此,这部片子带有不少生活情趣,也博得了许多观众的好感。

瑞士电影大都依靠进口,但70年代他们自己拍了一部颇令瑞士人感到骄傲的影片,这就是阿莱恩·唐纳(Alain Tanner)导演的

《约拿 2000 年将要 25》*Jonah Who Will Be 25 in the Year 2000*)。影片表现了四男四女围绕新生儿约拿的教育问题所展开的思想交锋。一方面电影里有人声称政治完蛋 ,但另一方面电影里又呈现了一种想象中的政治 ,让各种不同思想观念在一起碰撞。

意大利电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了新写实主义的支配 ,但进入 70 年代以后也逐渐融入到国际主义潮流当中 ,受到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电影的影响 ,并加强了和他们的交往。这一倾向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莉娜·瓦特缪勒(Lina Wertmuller)。她继菲利尼和德·西卡之后成为战后意大利电影的著名导演之一 ,在国内外都拥有大批观众。她拍的一些电影 ,如《厄运横扫》*Swept Away by a Strange Destiny on an Azure Sea*)和《七美人》*Seven Beauties*)都具有较为深刻的内涵。表面上看虽然都涉及到许多性描写 ,语言颇多嘲弄 ,实际上其主题都关系到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意大利的另外一位著名导演是波那多·波托鲁西(Bernardo Bertolucci) ,他在二十几岁就已成名 ,70 年代和法国人合拍了《巴黎的最后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 ,起用美国影星玛伦·布兰多作主角。由于事先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这部影片还没有开映就被炒得沸沸扬扬 ,许多人认为里面有许多暴露镜头多少增加了它的票房价值。波托鲁西却因而为他的下一部史诗片《诺维多—1900》*(Novecento 1900)* 筹够了开拍经费。他在这部影片里还吸收和利用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合作资金 ,并启用了来自美国、法国和加拿大等不同国家的演员 ,演员阵容庞大 ,场面恢宏 ,表现了意大利从 1900 年到二次大战结束这段时间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化。但由于影片内容过于庞杂 ,中心不够突出 ,显得有些拖泥带水。

比较起来 ,意大利导演保罗·塔维亚尼(Paolo Taviani)的《我爸爸我妹妹》*My Father , My Sister*)成就更大些。这部片子剧本是根据一位语言学者的自传改编的。由于故事情节感人 ,加上在拍摄过程中 ,导演善于使用声音来表现人物内心思想 ,整个影片显

得情声交融,比较协调。在嘎纳电影节上一举获得最佳故事片和国际评论奖。

70年代前期的西班牙还处在弗朗哥的独裁统治下,电影不算突出,但也有一部引人注目的影片,这就是维克托·埃里斯(Victor Erice)导演的《蜂窝鬼魂》(*The Spirit of the Beehive*)。影片描写西班牙山区的一个小屋里,连电都没有,一片漆黑,6岁的小安娜生活在恐惧当中,害怕鬼怪,而且认为这鬼怪就住在蜂窝里。该片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和历史上的40年代黑暗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这部影片受到影评家们的称赞,被喻为欧洲电影中不多的几部表现人类命运的影片之一。

德国电影和其他欧洲国家比较起步较晚。二次大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德国人主要都在看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进口来的影片。直到60年代德国(西德)政府才拨款支持本国电影制作,70年代以后德国国家电视台也开始投资拍摄故事片。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德国电影迅速崛起,其影片不仅在本国,也在其他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赢得了新德国电影的称号。

在德国电影导演中莱纳·瓦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是比较突出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多产,在36岁的人生和13年的电影生涯里拍出了将近40部电影,而且是因为这些片子有一种连贯性。他拍的电影主要反映了二次大战后德国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条件,尤其是妇女的精神和心理动态。他很欣赏好莱坞拍的家庭生活剧,常常借用这种形式加进政治和历史内容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如《玛丽雅·布朗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他的部分片子也有性描写,如涉及同性恋的《P. V. 康德的苦涩眼泪》(*The Bitter Tears of Petra Von Kant*)和《福克斯和他的朋友》(*Fox and His Friends*)等。

在德国当代电影中影响较大的是9位导演集体创作的《秋天的德国》(*Germany in Autumn*)。其背景是1977年秋天所发生的

一连串事件,其中有一位德国实业家的绑架和遇害、1架飞往索马里的客机被劫持和解救、3位游击队员在狱中遇害或是自杀。这几件事对当时的德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动。电影试图通过纪录对比和虚构等方式来描述人们对这种形势所做的反应,同时也对国家行使权力的方式提出了告诫。其中,法斯宾德所负责的部分结合了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尤其是他和他的爱人同母亲的关系在这些危机当中所经受的考验,相当感人。

德国电影中女导演占有重要地位,她们的代表人物是海尔克·桑德尔(Helke Sander)。她不但是位出色的导演,还在一段时间里担任全欧洲唯一的女权主义电影杂志《妇女和电影》(*Women and Film*)的主编。桑德尔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莱达波斯的全部个性精华》(*The All Round Reduced Personality-Redupers*)是一部日记式的故事片,既有真实性的记录,又有虚构性的描述。内容涉及到女权艺术家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所做的艰巨努力以及城市文化和这种分裂对人的影响。另一部妇女导演的电影《德国,苍白的母亲》(*Germany, Pale Mother*)在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由赫尔玛·桑都步拉姆斯(Helma Sanders-Brahms)导演的电影以一种自然主义和家庭剧的方式记述和表现了德国人二次大战后的生活,初看有些像是一种自传体文献。

战后好莱坞电影和其他美国文化一道对德国电影影响很大,不仅一些德国电影导演跑到了好莱坞从事导演工作,德国电影本身也从好莱坞电影里吸收了不少营养成分。典型的例子如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和嘎纳最佳导演奖的《铁皮鼓》(*The Tin Drum*)。这部由施隆道夫(Schlöndorff)导演的片子在70年代成为德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受到好莱坞电影风格影响最大的导演当推威姆·文德斯(Wim Wenders)。他在70年代拍了几部探讨美、德之间的文化互动影响,如《艾丽丝在城里》(*Alice in the Cities*)、《美国朋友》(*The American Friend*)等。不久之后他应

邀去好莱坞工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拍出了《哈麦特》(*Hammett*)、《巴黎,德克萨斯》(*Paris, Texas*)等片子。后来他回到德国拍出了他最好的一部片子《柏林的天空》(*The Sky over Berlin*),通过高度想象力和天使形象描述了德国人热爱和平、厌恶战争的心态,因此而获得了嘎纳电影节上的最佳导演奖。

3. 澳大利亚电影

澳大利亚的电影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20世纪初叶,澳大利亚就制作了电影故事片,是当时最早建立电影业的国家之一。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其电影市场基本上依赖进口美国和英国等外国的影片来满足本国的需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70年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电影对发展本国文化和民族特性的重要意义,决定建立澳大利亚电影发展公司(后改为电影委员会),拨款支持电影发展。结果70年代澳大利亚的电影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共拍出了100多部故事片,其中《我的光辉历程》(*My Brilliant Career*)和《驯马的莫朗特》(*Breaker Morant*)先后获得了奥斯卡单项奖,此外还有些影片也取得了不少赞语,如《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及其续集、《悬石上的野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和《最后的浪花》等。这些影片有的根据小说改编,如《我的光辉历程》就是从澳大利亚20世纪初著名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自传体同名小说移植过来的,《悬石上的野餐》也是从一部同名畅销书里改过来的。有的则根据历史事件为基础写成的剧本拍的,如《驯马的莫·朗特》里的故事就是19世纪末波尔战争中的一个真实事件:二三个澳大利亚人在英国军队里作战被判有罪后处决。这些影片的摄制无疑大大提高了澳大利亚电影在国际影坛上的威望。遗憾的是,上面这几部电影的导演和演员,包括执导《我的光辉历程》的吉琳·阿姆斯特朗(Gillian Armstrong)和执导

《驯马的莫朗特》的布鲁斯·贝莱斯福特(Bruce Beresford)在内 ,从 80 年代开始都陆续离开了澳大利亚而跑到了好莱坞 ,在那里加入了美国的影片制作队伍。虽然这在国际合作和人才流动司空见惯的西方来说不是什么大事 ,但对热衷于本国民族文化和电影业发展的澳大利亚来说显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好在江山代有才人出 ,90 年代以后澳大利亚的电影又有了新的起色 ,他们摄制的《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舞场风波》(*Strictly Ballroom*)、《绿卡》(*Green Card* ,和法国合作)、《钢琴》(*The Piano*)、《黑袍》(*The Black Robe*)、《恐惧中醒来》(*Wake in Fright*)、《别着急》(*No Worries*)、《回家》(*Return Home*)、《一个女人的故事》(*A Woman's Tale*)等又重新在国际影坛引起了人们的注目。1999 年 ,他们获得了两项奥斯卡金奖。

4. 试验性电影

在电影发展史上一部分在创作手段上标新立异 ,与众不同的电影特别引人注目。它们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从新美国电影到同性恋电影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试验性的电影流派 ,其基本倾向是不考虑商业性赢利而坚持各自的美学欣赏原则。因此 ,这部分电影尽管数量比不上那些商业化电影 ,却因为其独特的追求而具有存在价值。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的 ,也有欧洲的一些导演及其影片 ,例如美国雪莱·克拉克(Shirley Clarke)的《联系》(*Connection*)、斯坦·布拉克基(Stan Brakhage)的《蛾光》(*Moth-light*)、《狗星之光》(*Dog Star Light*)、肯尼思·安哥(Kenneth Anger)的《斯考匹出世》(*Scorpio Rising*)、法国玛丽·斯特劳布(Marie Straub)和丹尼尔·回莱特(Daniele Huillet)夫妇的《安娜·巴赫编年史》(*Chronicle of Anna M. Bach*)、德国强他尔·阿可曼(Chantal Akerman)的《安娜的约会地点》(*Anna's Meeting Place*)、英国劳拉·莫尔维(Laura Mulvey)和彼得·沃伦(Peter Wollen)的

《斯芬克斯之谜》(*Riddles of the Sphinx*)、萨莉·波特(Sally Potter)的《畅销书》(*Thriller*)和《掘金者》(*The Gold Diggers*)、奥地利瓦里·埃克斯鲍特(Valie Export)的《看不见的敌人》(*Invisible Adversaries*)等。这些电影从50年代起步,开始都是一些个别人独自的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艺术价值和不同凡俗的观念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同。到了80年代中期它们已开始不断出现在大城市的艺术电影院和大学里的放映室里,逐步进入到商业发行渠道。虽然其发行规模还不能和一些商业性大片同日而语,但和当初的地下活动时期相比却有了天壤之别。

80年代开始,一些新的试验性电影导演及其作品不断涌现出来。在美国较为出名的是伊凡恩·莱纳(Yvonne Rainer)。她曾经是位舞蹈演员,从60年代起就尝试把一些现场演出的片断拍摄下来。70年代摄制了她的第一部故事片《演员生活》(*Lives of Performers*),到了80年代又拍了《有关一位...女人的电影》(*Film about a Woman Who...*)和《羡慕女人的男人》(*The Man Who Envied Women*)。这些片子从政治的视角以及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了女权主义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时利用静态和动态的转化,控制声音的大小和长短等手段取得了一些常规电影达不到的效果。

另一位著名女性导演是丽茜·鲍登(Lizzie Borden)。她在1983年拍的《烈焰中诞生》(*Born in Flames*)带有未来主义政治幻想色彩。这部影片把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电影的直接摄制技术结合起来,让观众领悟到未来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有着直接的关系。影片中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发生了一次社会民主革命,但妇女并没有受益,结果一些激进妇女组织了抗议示威活动,导致了暴力冲突。贝特·高登(Bette Gordon)拍的《多样性》(*Variety*),则描写了一位在一家黄色电影院当售货员的妇女所经历的内心情感活动。

在西方电影界有影响的新潮电影导演中还有原籍智利后来移居法国的罗尔·鲁伊兹(Raul Ruiz)。他的作品有《盗画的设想》

(*The Hypothesis of the Stolen Painting*)和《海员的三个王冠》(*Three Crowns of the Sailor*) ,前者通过对一系列绘画的隐喻探讨来质疑叙事技巧乃至画家本身。后者则以一种谋杀案的方式让一个凶手听一个海员去讲一个奇怪而不连贯的故事 ,虽然这个海员也遭谋杀但叙事者却又让他再次出现以挑战传统的叙事方式。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还有从香港去美国发展的王威恩、从埃及去美国的亚托姆·埃戈炎(Atom Egoyan)等。

除了虚构性故事片外 ,试验性电影中还有不少非虚构性题材的影片。这部分影片在早期阶段强调真实性和客观性 ,但从80年代起转而变得更为不确定 ,带有更多的主观色彩。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他的《西伯利亚来信》(*Letter from Siberia*)和《没有太阳》(*Sunless*)都采用新闻纪实手法把一些不同的 ,从真实生活当中摄制的画面拼凑起来 ,经过导演主观的安排制作成电影。如《没有太阳》汇集了从日本、非洲和冰岛等地拍到的不同画面片断 ,配上各种声音背景音乐 ,让观众在欣赏各种不同图像和音乐的同时去思索和理解影片意义。

另一部较为成功的非虚构电影是迈克尔·莫尔(Michael Moore)的《罗吉和我》(*Roger & Me*)。莫尔自己在银幕上以一位失业记者的身份去采访当时的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罗吉未果 ,从此揭开了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描述。在这个过程中 ,摄制人兼解说的莫尔充分表现了他的语言天分 ,既有说笑的成分也有严肃庄重的解说 ,因此赢得了不少观众。此外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也拍过几部较有影响的影片 ,如《天堂之门》(*Gates of Heaven*)、《威尼斯 ,佛罗里达》(*Venice ,Florida*)和《薄薄的蓝线》(*The Thin Blue Line*)。其中《薄薄的蓝线》叙述了一个遭受冤屈的人如何通过证人和自己的辩解一步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放映后获得强烈反响 ,是非虚构性题材试验片中较为成功的代表作。

二、电视和其他休闲活动

西方人的电视节目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从那以后,电视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今电视传播方式已从过去单一的无线发射发展到现在的卫星传播,电缆输送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数字传送等多种形式。人们坐在家里可以自由选择几十甚至上百个频道,了解地球上每个角落里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挑上一部观赏性强的电影或电视剧。或者随着体育记者或是文娱记者的解说走进哪个体育场、馆或大剧院欣赏一下当今一流的文体表演,或者参加一次知识或是智力竞赛,或者碰碰运气去摸摸彩票。有人作过统计,西方人一生当中有 15 年是花在看电视上面的,如果再加上看书读报、听音乐、观看电影或录像,至少花去了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一方面说明电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说明电视内容有一定的可看性,人们在闲暇当中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加拿大的一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把过去印刷造成的社会断裂重新连接起来,电子媒体让社会重新回到印刷产生之前的和谐状态。他甚至预言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会像一个地球村一样紧密地团聚在一道。

人类社会是否能像这位学者预言的那样发展当然还需要时间来证实,不过电视在过去 60 多年里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概括起来,西方电视的内容和特性大致可以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晓得个端倪:

首先是电视台的类型。大致是两种,一种是国家出钱的多少带些官方性质,一种是商业性的。前者如英国的 BBC,美国的 ABC 和 CBS 以及澳大利亚的 ABC。当然它们现在也都有股份公司,也有私人股在内,后者则为数甚多,主要以赢利为目的,表现的形式则是广告数量。一般来说商业性电视台的广告特别多,现在

的倾向是西方的大多数新闻单位,包括电视台、电台、报纸都集中在四大通讯社手里,即美联、合众、路透和法新社,他们的占有率在90%以上。他们播发的新闻有2/3是有关西方国家的新闻节目。除了及时性以外,电视更强调形象逼真。如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有线电视工作人员从前方拍的镜头都是当时最紧张危险的场面,不仅对一般的电视观众有很大吸引力,甚至连美国总统布什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都要据此分析战况,可见其新闻价值。各种新闻,国际的、国家的甚至地方的都是各家电视台争相报道的对象。新闻节目是电视台的重头戏,为了突出新闻价值,电视新闻记者往往肩负着比一般文字记者更艰巨的任务,因为他们不仅要调查重要事情的经过,更重要的是要拍到有关人物及背景材料的图像。这也是为什么电视新闻更受欢迎的缘故。在一些重要新闻的采制过程中尤其是这样。例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戴安娜王妃及其情人的车祸,克林顿的桃色新闻乃至最近的纽约“9·11”事件和美军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等显示了电视新闻曝光手段的及时性和真实性。电视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能提供各种娱乐片。除了一些大型文体活动的实况转播以外,它既能转播电影,又能播放多集电视连续剧。电视连续剧普遍都很长,大都40—50集,上百集的不在少数,既有家庭伦理型的,又有爱情浪漫型还有侦探或者警匪枪战型的甚至还有不少儿童动画片。这方面较为有名的作品包括《最后一位武林高手》、《独立日》、《勤务兵》、《幻影》、《火遂石》、《101个达尔马西亚人》。它们当中除了部分是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生产的外,大部分都是好莱坞电影公司的作品。

电视片和电影有时很难分开。一些片子专门用于电视收看,而一旦它们的收视率下降,它们便被制成录像带在市场上出售;另有一些片子估计原来收看率就不高,甚至轮不到在影院或者电视上播映就被制成了录像带。这方面尤其以一些音乐电视片为多。

有些制作商干脆就以家庭录像片为市场销售对象,这种录像片不少都有些弄虚作假,而有些则带有较为强烈的政治或者功利动机。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和保护动物权利组织等都经常把他们的一些重要活动制成录像广为散发。

随着数控技术和网络技术等新的电讯传播方式的使用,信息的传递更为迅速和便捷。经过压缩处理的数字信号可以通过某个频道输送更多的图像和其他信息。电视观众不仅可以收看到更多的节目,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乃至重复播放相同的内容。当然,这种技术的推广使用要靠金钱的投入,比较起来上网要经济得多。现在上网不仅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资料和信息,甚至也可以看到电影。有人已经预言将来总有一天报纸将不再以纸张的形式出现,而完全可以上网浏览,甚至根据个人的需要用剪裁的方式供应小灶,而再往前发展,媒体的进步不再依靠电子技术,而要靠生物技术,换言之,技术的发展将决定一切信息的来源,将让人类在他们之间以及人和自然界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层次的联系渠道,通过多元文化方式互相了解,通过绿色媒体来了解自然。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社会本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将相处得更为融洽和协调。

电视和电影之间既有很大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不仅在生产方式上接近,在观看和欣赏的方式上也雷同。但在科技发展迅速进步的今天,一度曾经独步天下的电影却面临着电视的猛烈冲击。西方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已经关闭了许多电影院。然而,电视尽管有它廉价、播放迅速、收看清晰度越来越高的特点,却不可能完全取代电影,相反电视收视率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电影的播放。正因为如此,一些大的电视台及其老板不惜斥巨金投资拍电影。一部好的电影不仅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电影观众,创造新的票房纪录,还能为提高电视的收视率,进而增加录像带的销售量作出贡献。这种电视和电影业合并或合作的趋势从 70 年代

开始普遍展开,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国的政府部门鼓励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商之间的合作,美国则领风气之先,从 70 年代末就利用它在卫星传送和有线电视播放方面的技术优势,放宽了这方面的管制,增加了播放电影故事片的频道。一些大的有线电视公司,如时代和瓦耀考都斥资拍电影,购买有偿电视的独家经营权,建立全国范围的有线电视电影播放频道。在这种情况下,好莱坞四家大电影公司——哥伦比亚、派拉蒙、20 世纪—福克斯和宇宙在 1978 年宣布联合成立伯莱密欧有偿电视服务公司,试图抗衡。不幸的是,这家公司还未正式挂牌便遭到美国司法部的禁令而夭折。但这几家公司并不就此罢休,没有多久他们就投资有线电视行业和生产录像带的市场,在 80 年代后期依仗自己的传统优势在电影电视市场上抢占了一席之地。他们的加入,加上巨片录像等唱片公司所推广的激光电脑录音等新技术,在 90 年代大大加快了录像带发行的势头,有力地推动了以好莱坞为中心的电影、电视、录像带和流行音乐的生产和发行一条龙的运作。

在美国的影响下,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也都闻风而起,纷纷建立、调整和合并了有关的公司,加强了生产和销售影视媒体产品的能力。法国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负责电影的投资和销售及管理。德国则引进了 4 个商业频道,意大利除了依靠私人投资建立了 3 个全国性的网络外,还专门增加了电影生产能力与之配套。英国在原有专用电影频道基础上又设立了电影生产项目,为电视电影的出笼作准备。1988 年英国广播公司宣布它打算配备一个专门编辑,负责监察年产 6 部电影的计划。

三、当代文学文化批评中的新潮流

进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的文学批评发展势头迅猛,可以说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前几百年。或许比速度更为重要的是其在文学当中

的地位也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对所有的流派都作详尽的介绍。这里先概述一下 20 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文学批评的大致情况,然后再对近 20 年发展起来的几个流派做些进一步的述评。

1. 20 世纪文学批评的一般情况

回顾 20 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大体上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不同的文学批评流派在二次大战以后的不同时期里都曾经风光过一时,甚至可以说各领风骚数十年,如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精神分析、读者反应批评等等。这些流派虽然情况不一,各有侧重,但在 30—80 年代的文学批评领域里相当活跃。

1) 形式主义

最早是由俄国的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等人在一次大战期间提出的。虽然他们的一些主张(如强调文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文学性,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支持,但是因为政治原因,形式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倒是由于它在学术思想上和英美新批评派的一些共鸣,在批评实践上面它的部分思想观念由新批评派继承和扩展了。新批评派似乎取得了更多的实质性成果。英美新批评的滥觞人物应当算是英国的理查兹(I. A. Richards, 1893—1979)、里维斯(F. R. Leavis, 1895—1978)和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他们把批评的重点放在对作品的研读上,强调作品的好坏取决于作品本身是否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而不应过多地纠缠作品的背景和作者的情况,从而把作品看成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本体。英美新批评在西方文学界影响很大,从 20—30 年代直到 60 年代结构主义批评问世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2)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先驱是瑞士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 1857—1913)和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 1908—)。他们分别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和推断 ,例如索绪尔的“ 语言 ”和“ 言语 ”、“ 所指 ”和“ 能指 ”等概念 ,列维—施特劳斯对亲族关系、婚姻习俗、饮食方法、图腾象征的考察和推断 ,都为结构主义批评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结构主义批评不再把文学作品看成是独立的单位 ,而是将它视为某个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对作品起作用的不是作品本身 ,而是超乎其上的系统结构。这样作的结果是对作品普遍性的重视 ,而其缺陷则是对特殊性的忽视。分析一部作品重要的是了解其独特之处 ,而不是 ,或者不仅仅是知道其一般的特点。结构主义这种自身的缺陷似乎是结构性的 ,很难靠它自身的努力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 ,结构主义行时了一阵子之后便为后结构主义所取代。

3) 神话原型批评

是在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提出的原型概念基础上建立的。荣格原来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但他后来不同意弗洛伊德有关性欲决定人所有行为的观念 ,而提出了人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以及原型概念。这方面最为成功的范例则是加拿大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1957 年出版的《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他在这本书里声称 ,文学总的来说是移位的神话 ,西方文学在过去 15 个世纪里经历了神话、传奇、悲剧、喜剧和讽刺这样一个顺序 ,从神话向现实发展。而现代文学则又倒转过来 ,从现实走向神话。

4) 精神分析批评

是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精神分析理论发展而成的。他的理论强调性本能的作用,认为性本能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对人格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并具体提出了自我、本我和超我三个概念。精神分析派把批评的重点放在读者心理的分析上面。他们认为作者的无意识通过作品得到了象征性的表现,读者在阅读过程当中通过设身处地的联想也得到了心理的满足,这样两种自我就达到了认同。当然精神分析派过于强调了性欲本能的作用,难免有些牵强附会。大部分批评家更愿意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和其他一些批评手法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独使用。

5) 读者反应批评

主要是70年代开始在德国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发展起来的。这一派批评理论在考察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时,充分尊重读者对作品意义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审美价值的创造性。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还认为文学并不只是白纸黑字,而且还是读者阅读过程当中的体验,意义则是读者对作品文本的认识,随着读者认识水平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换言之,这种批评理论允许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就从一个方面否定了文本的客观性。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似乎还不太好说。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批评所面临的危机一时也就无法解决,却是毫无疑问的。

在当代西方的人文思想当中,很难把不同学科和文化截然分开。一方面各个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往往是一种新思想一出现,其他不同学科便会不约而同地做出反映。另一方

面文学文化常常又是新思想的试验园地,成为新思想一展身手、崭露头角的前沿阵地。当代哲学影响比较大的几位思想家迈克尔·福考、雅克·德里达、吉尔斯·德路士(Gilles Deleuze,1925—1997)和让—费朗科斯·里奥塔德(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等人都曾经在文学领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最能反映这种动向的是文学批评领域最新出现的两种流派——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物质主义。

2.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物质主义

新历史主义的思想最早见于罗依·H·皮欧斯(Roy Harvey Pearce)1969年出版的《重新出现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 Once More*)。后来,在1972年的时候威斯莱·莫里斯(Wesley Morris)在他的《走近新历史主义》(*Toward a New Historicism*)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新历史主义。而使这个术语真正流行起来并逐渐得到文学批评界公认的还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82年为《体裁》杂志专刊《文艺复兴时期的权力》一文所写的序言。从那以后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学批评方法开始取代以前的历史主义批评。旧历史主义方法把对文学的研究放在对历史真实性的考证上,探讨诗歌、小说和戏剧同社会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它也不像有些批评流派把文学作品压缩成几句响亮的口号,形成一种模式。它主张从文本当中找出线索,而不是把它精简为一种单一的叙事结构。它把作品的思想和社会以及传记领域联系起来,去反映作品的时代和作者的内心思想,认为文本在构建社会现实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从事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许多人当年曾经是其对立面新批评的追随者,而新批评的许多原则如今却成为新历史主义要批驳的对象。新批评认为,对文本的分析要和外在的时间、地点和体裁等分开,要把重点放在其内在的语言特性上。新历

史主义则认为文本分析要通过换文性(intertextual)联系故事发生的外在情景,其目的是要解除文本所具有的神秘性和其他特有的文本特点,消除其不受环境和其他文本影响的免疫力,通过揭示其在争夺权力的文化斗争中表现的微妙冲突来消除所谓与政治无染的特征。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新历史主义还是不能摆脱和新批评之间的联系。这两种批评流派虽然在使用的的方法上大相径庭,它们的目的一似乎却大同小异,那就是都在远离历史。新批评是把作品和历史现实完全分开,而新历史主义则把历史现实变成了一种文字说明。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1980 年时出了一本叫做《文艺复兴的自我开创》(*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的书,首次描述了他所谓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8 年后他在另一本书——《和莎士比亚交谈》(*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的序言里再次用到了这个术语。他表示用“文化诗学”而不是“新历史主义”这个术语,是因为他想强调文化的文本性,而不是文本的历史性。这样一来,批评的范围就不仅是理论原则,而是整个文化领域,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分析也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诗学本身和结构主义有牵连,强调批评对象的横向和空间排列,而尽量避开它们历时性的历史变化,不管原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文化和社会之间、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历史性区别。对它来说,这种强调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区别表明不仅要有对产生原因的解释,还要对道德和审美价值作出判断。比较而言,文化诗学涉及的范围要宽得多。它把文学看成是整个文化领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文化解读过程当中的一种修辞特点。新历史主义者对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实践没有厚此薄彼,也没有专门挑出什么文本进行特别仔细的审视、将其解释为某种进程的产物,而是通过跨学科的跟踪研究,密切注视着其他文化流派的动向。

用这种方法作文学分析显然有其吸引力。它把一个时期的文

学看成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定经济规模的组成部分,是许多交换场地的一个。一种文化的界定符号通过这些交换场地的周转,填平了等级差别。作品通过这些周转回到了它们离开这个社会领域。与此同时,作品在建构其时代特征时又赋予诗歌、戏剧和小说一种创造性和互补的角色,但是它又不是一种正在展开的真实历史事件。这种方法当然也有其危险之处。“文化”本身就有一个人类学的内涵。它表明持续变化的重要历史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可能会被一种对当前现实并不重要的过去意识所取代。

新历史主义倾向于把文化看成是有限的领域,把对文化的抵制化解掉或者将它变成自身的一部分。这就难怪它会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权力支配下阴谋活动的产物。即使那些政治倾向不很强,或者有进步倾向的作品,也被视为过时的、不再有什么颠覆性的东西。大部分文化物质主义者当然都认为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各种文化蕴涵,担负起文化代理的角色。但他们同时认为现在没有理由再继续那么干下去,它的文化职能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对作品中的政治权力倾向应予以更多的关注。他们把文本中体现的领导权当成是一种不稳定、易受伤害的东西,不断受到它过去排挤过的其他权力的冲击和中伤。为了生存,它不得不经常在苦苦挣扎。这种长期权力之争的影响必然在那些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中间得到直接或是间接的反映。对于文化物质主义者来说,关键的任务是小中见大、从微观当中探其宏旨。即是说,努力在作品中间寻找并扩大社会下层的声音,揭示文本中无意识政治的罪愆,通过合理的途径加深和扩展对过错的认识。

新历史主义批评所用的概念很多都来自于市场资本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和福考的理论。这些概念要求阅读更加重视现代性,而不要过多考虑过去的作用。文化物质主义批评认为,不能在

不承认作品的历史价值情况下就无视其中原有的重要意义。除非它根本就不予考虑,否则它必须首先把历史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批评手段放在文学批评当中。尽管有这些分歧,这两种文学批评流派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

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化物质主义批评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手法。它们允许其他学科加入到文学批评行列,把文本重新放到历史场景当中进行研究,探讨文学的社会、种族和性压迫的内涵,把政治的刀刃和普遍欠缺的社会意识交还给了文学批评。但是它们也有它们的局限性,不是在过去领域里打圈子,就是跟在现代性后面寻找灵感。追溯过去的阅读无论怎样和现代意识挂钩,无论怎样想方设法适应当代的政治日程安排,似乎都无济于事,文学和历史最终还是不能焕发青春。

虽然这两种文学批评从 70 年代起才相继出现,但它们的起源显然要早得多,而且都明显受到近、当代几位知名的思想家的重要影响。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欧茨(Clifford Geertz)首先证明文化并不是人类近代才获得的特性,而是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经过长期逐步的积累形成起来的,人类没有哪种特性能够离开文化,了解人类就必须从文化物品开始。他的思想强调文化对于其他人文学科具有一种首要和涵盖的地位,从而为文化物质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福考的理论对它们的影响也很大。福考曾经提醒人们要从权力结构中监测到裂缝。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带来一些弊端。在一个瘟疫爆发的城镇里需要采用极其严格的纪律管束,而边沁(Bentham)提出的强制性透明管教为统治者设计了一种统治手段。写作因此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他们由此而指控写作和观察是侦察和控制的重要工具。文化物资主义者也由此受到启发,指控小说和戏剧从其自然属性来说也具有压迫的性质。福考所描述的那些受害者尤其受到他们的同情,表现为所谓的边缘人物地位在他们的批评里常常被急于颠倒过来。

当代另一位语言理论大师德里达对它们的发展也有很大作用。他的有关语言对人类掌握现实的作用,对历史的了解必须通过再现的折射等观点曾经在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物质主义者中间引起过很大反响,使得他们一度对文本的权威性和叙述的客观性产生了怀疑。他同时也推动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知道叙述故事是对历史的压缩。随着科技的进步,用不了多少时间,世界很快就要消失在全球文本网络后面。这个主要由新历史主义者所做的推论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他对有关语言声音与意义同语言文体关系的研究导致了这样的结论:有关语言意义不仅是思想的先决条件,也是进行历史思考的原因,是区别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能力。但是,由于文本性已经成为一种永无止境的现象,历史经验的物质性可能也就消失了。随之而去的也包括那些旧的玄学思想,文学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和观念,从而为一种非玄学思想和新的历史主义批评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这两个批评流派同时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姆斯以及瓦尔特·本杰明那里吸收了不少营养。阿尔都塞不同意那种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现状推销给被统治阶级的廉价品。意识形态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幻想,而是通过和个人有联系的机构对感觉和想象所进行的结构性歪曲。如果这些无稽之谈可以像它应该的那样被理性观点所驱除的话,那些编造这些思想的人早就被推翻了。人们从幼年时代开始就习惯顺从这种思想生活,把它当成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改变这种思想就很困难。那些对现状不满、想把文学当成一种思想实践的人,或者想对意识形态进行批评的人都从他提出的意识形态产生物质实践的观念获得了不少启迪。

首先使用“文化物质主义”术语的是英国文学评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他在197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用这个术语描述了当时的文学

理论和实践。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它很快风靡一时,在欧美文学界得到了许多人的热烈反映,成为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滥觞之作。文化物质主义不仅对过去的文化表示了兴趣,也很关心当前政治领域中的一些问题。不能说新历史主义对重构过去的文化无动于衷,或者说它的阅读理论对当前政治无关紧要。但是文化物质主义却在更为积极、更为明确地争取用昨天的文学去改变今天的世界。它的批评观点更为醒目,也更引人注目。它以从过去文本里激活一些非正统的观点为己任,向当前的保守主义观念提出了挑战。

雷蒙德·威廉姆斯作为文化物质主义的创始人,觉得福考的权力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念都有些单一,于是采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安托尼奥·格拉姆西的“支配论”概念。“支配论”一方面承认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可以渗透到社会每个部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价值观没有能够处理好现实的阶级冲突和统治问题。威廉姆斯利用了他的“支配论”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的理论,把文化作为一种变动的生活方式作了分析,得出了文学艺术不能离开其他社会实践,并服从于特别的显而易见的规律,任何时期大部分写作都是对有效的主导文化的一种贡献。同时他又认为,在现实当中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主导社会、主导文化可以耗尽人的精力和聪明才智,人的实践可以永远持续下去。

瓦尔特·本杰明主要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他所处的艰难环境和人类的过去作了分析,提出了“文明的记录无不同时都是野蛮的记录”的观点,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除非能够一反过去的倾向去处理历史问题和研读文学文本,过去的历史和文学才能得到重新的评价。这种思想显然对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物资主义的文学批评有很大帮助。

3. 西方文化理论

西方文化如同西方人的历史一样由来已久,但对西方文化的正式研究,或者更严格地说把西方文化当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却是在二次大战以后的事。最早进行这种研究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利维斯(F. R. Leavis)和他的门徒们。利维斯和他的剑桥派从50年代开始试图利用剑桥的影响传播文学知识,扩大他这一派思想的影响。他在他的名著《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1948)里建立了一种以道德思想为核心的批评标准来审视英国文学史上的主要作家,只肯定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如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亚历山大·蒲柏和亨利·詹姆斯,而那些追求创新意识的,如詹姆斯·乔伊斯、费吉尼亚·伍尔夫等人则被排除在外。他认为,文化生活不仅仅是一种休闲和享乐活动,也应是一种陶冶情操、认识生活、使人成熟的学科。妨碍这个目标的是所谓“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欢乐性。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普通人文化水平的提高,一种市民文化意识在文化研究中出现,这就是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德·威廉姆斯创立的市民文化理论。这里尤值一提的是霍加特和他建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①

霍加特一方面对传统的高雅文化以及没有受到商业文化污染的工人社区文化表示了赞赏和提倡,另一方面又对商业气息越来越浓的大众文化忧心忡忡。为了对抗这种商业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他建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写了一本书,叫做《文化的用处》(*The Uses of Literacy*)。文化研究中心设在伯明翰大学,提供硕士课程,研究各种文化问题,尤其关注电视文本和读者观众的关系,通过讨论和演讲在当时英国乃至欧洲的文化界引起很大

^① 详情见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 3 和 p. 540, Simon During(ed), Routledge, 1999。

反响。尽管如此,文化的发展毕竟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大体上说英国文化沿着两个方向重新组织,一个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建立了文化研究体系;另一个是社会上的大众文化,诸如音乐、电影电视和电视广播以及其他娱乐活动和媒体组成的文化产业。从70年代早期开始,文化就被当成了一种“支配权”。“支配权”这个词前面已经提过,主要用来描述一种看不见的控制关系,它并非指对受控制者的压力而是指对它的赞同。后来文化在福考的理论里被视为一种“统治权”的形式,也就是主要通过教育制度培养“顺从”公民的手段。

以后的文化研究在发展方向和研究方法上产生了分歧。一种是所谓的“文化主义者”强调对“生活形式”的研究。另一种是结构主义理论,强调对文化“符号”的研究。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他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把实际生活中的政治以及其他有待变化的东西变成了某种似乎“自然”普遍以及永恒的东西。但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并不只限于政治或经济,所以它虽然可能对经济关系持有一种具体看法,其主要的作用还是对市民生活,尤其是核心家庭、单个和自由的人作出带有想象力的描述。他认为,个人在意识形态里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因为他可以在意识形态帮助下认识世界,进入“象征秩序”获得权力。个人可以通过对照主导意识形态来认识自己,找出差异。实际上有个性的人永远难以认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永远解决不了个人和家庭中的问题。也没有一种象征性结构可以提供最终的意义或者保证平安无事。

由于这种政治心理分析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过于理论化,难以对个人或集体发挥足够的影响力,流行了一段时间后便让位给一种更为灵活、适应性更强的“多义”文化批评。这种多义文化批评顾名思义指批评对象在批评过程中可以在不同上下文当中有不同的含义。它允许批评对象有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语义。同

样的一个 Marlboro^① ,人的形象既可以硬朗、潇洒 ,成为后现代的象征 ,也可以作为畅销杂志的封面人物代表西方人的财富和自由。香烟制造商、医药公司乃至女权运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70 年代末开始 ,文化研究受到了几位法国思想家的影响 ,他们主要是三位 :皮埃尔·波尔迪(Pierre Bourdieu)、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和米歇尔·福考(Michel Foucault)。他们认为个人的生活背景由不同的领域组成 ,包括家庭、工作、社交圈子、教育机构和政治党派等。每个领域都有具体的物资形式 ,大部分都带有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畴。每个领域都面向未来 ,含有“ 想象 ”的成分 ,作出承诺要建立一种令人满意和欢悦的形象。例如家庭生活就依靠一种完美的家庭形象支撑。之所以称之为“ 想象 ”是因为这些领域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局限性 ,例如家庭生活就受到家庭收入、年龄结构和代沟冲突等因素的影响。由于这些局限 ,这些领域充满了各种权力关系。具有一种等级结构的倾向。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经验、知识、钱财或者权威。等级制最利害的领域 ,如学校和办公室纪律最严明 ,组织得也最好。那里的一切工作的安排目标也最明确 :学校是教育商业部门。每个领域都具有各种类型的成分 ,学校里有不同类型的学生 ,看电影的人当中有的是偶尔去看的 ,有的则是逢场必到的影迷。这些领域也就包含了两种选择 ,一种是“ 自我形成 ”的选择 ,另一种是福考所说的“ 自我统治 ”的选择。同样个人既可以做出在一个领域发展的策略 ,也可以根据本人情况做出些妥协。一个人如果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买不起某件商品 ,他可以说他不怎么喜欢它。与此同时 ,也有可能通过消极抵抗、反语相讥、颠倒黑白等手段来违背甚至破坏一些常规或

① Marlboro 为美国南卡罗里纳州一县 ,曾经是印第安人居住地 ,内战时也曾为联军所抢劫。以盛产棉花、烟草著称。

传统的习俗及等级。这在欧洲、南美的一些社交场合或传统节日里都屡见不鲜。最后每个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例如工作当中上下级之间的人事关系和家庭里的家长同子女之间的家庭关系就很相像。但在一些高度理性化的领域,如学校和工厂,这些关系和其他领域就完全不一样,自当别论。然而那些最理性、最注重纪律的领域,其内部等级位置往往可以转换成其他领域中的位置。例如在教育领域中获取高学位的人常常可以在其他领域得到较高的职位。

法国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西方民主社会政治理论。传统理论注重于经济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法国理论却强调社会领域各部分的独立性。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发展除了它本身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特征,能够抵制其他力量之外,还在于它能够在政治社会体制的夹缝当中找到生存的空间,在于它不依赖任何一种单一的主导意识形态或者思想体系。它的非政治性分析源于 70 年代中期民主政治权力的衰落。这种衰落使得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新右翼代表人物得以上台执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法国理论为重要依据的文化研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

新右翼也有人称之为“撒切尔主义”或是“里根主义”。其特点是:一方面反对国家过多干预公民的个人生活,而主张尽可能由市场经济来建构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交换。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国家内部存在的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性别之间的差别,对国家构成了威胁。从 70 年代开始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了西方经济的发展步伐,同时也提出了建立后殖民地时代新秩序的要求。这种秩序既有经济上的,如 1971 年达成的以美元为各种西方货币结算单位的体制,也有文化上的,也就是所谓文化上的“共识”。其中包括人的家庭观念、勤奋品质和实用性看法以及社会秩序和受人尊重等主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受到一般人认同的伦理标准。

由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

多,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也就在所难免。新右翼之所以注重家庭价值观,强调传统价值的重要性,就是因为担心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但是这种强调又会产生对外来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伯明翰派一方面重视对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和黑人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右翼思想提出了批评,指出英国人对法律、秩序的担心是媒体宣传的结果,也是警察形象造成的后遗症。然而文化研究和新右翼思想都面临相同的社会环境,因此有些主张相当接近。例如它们都反对国家对社会发展的干预,主张社会的非中心论。实际上这种文化研究是在向新右翼思想靠拢,不再像早期那样重视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状况的分析,而是着重研究诸如种族主义、性特征和文化产业这样一些超阶级、具有全球性特征的课题。对以法国理论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来说,理论本身只是在特定领域产生的,具有特定权力结果的行为。它有一种了解他人价值观和“常识”的修辞能力。没有超验的“元话语”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论点。

这种新的文化研究不再把审读文化的目标面对国家。起先它受到了女权主义的影响,肯定了其他的生活方式。其研究重点从原来的依靠阶级或者权力集团或者次文化组建的社区转移到以维护自身价值、个性和伦理道德为职责的种族和妇女团体上面。它把社会描述成一个没有中心的组织,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的思想家们,而把研究重点放在纪律、理性化以及公共机构的领域内。由于它把社会分成了由两性关系、阶级和种族文化连接的几个部分,如何处理这些不同部分之间关系的问题就变得棘手起来。研究者们最终找到了两个解决办法。这两个办法都具有前瞻性和理想主义色彩。首先,为了达到一种特定的目标,例如实现所谓的临时社会或者“微型政治”这样的目的,可以采用一种“虹式”办法来进行跨越式连接。其次,这些集团之间也可以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它们的关系因此可以成为一种对话

式的方式。不论这些解决办法的效果如何,这里面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政府在鼓励施行单一文化,推行传统的阶级模式,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这种“别样”和“差别”属于一种更为松散、更加多元和后现代的概念模式,比之不喜欢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模式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新的文化研究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再把社会制度的变更作为追求的目标。

这种对“别样”的肯定和对元话语的否定的文化研究显然和传统的文化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对它的理解要追溯到 70 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文化发展和传播浪潮。由于科技的进步和文化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有些文化领域,例如电视转播已经打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界限,通讯卫星转播技术可以让一场在巴黎或维也纳举行的音乐会、一场在意大利或巴西举行的足球赛的镜头在同一时间里出现在全球的每个角落,走进每个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当然这种全球化是有代价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投资一方面促进了全球化进程,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又带来了城市化、生态环境恶化、贬低文化等问题。当然,一些非西方社会也能对引进的西方技术和文化进行吸收和消化,形成带有自己特色的模式。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香港。除了对这些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外,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内容是采用所谓的“第四世界”(即“欧洲中心”)概念去研究至今还处于原始阶段、没有任何发展且十分讲究迷信阶段的民族。这种研究虽然也有它的意义,但在有些领域很难坚持下去。然而,有些人类学家没有放弃他们的努力,仍然孜孜不倦地在辛勤工作,希望能够在在这个领域取得一些开拓性成果。

全球化同时也意味着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汇和碰撞,意味着西方文化不得不接受非西方文化的挑战。西方的一些传统观念在坚守自己阵地的同时,必须在纷至沓来、形形色色的东方和其他非西方的思想观念面前重新审视自己。例如它一向认为文学是超然

的,不介入政治和宗教。但当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遭到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和穆斯林的严厉谴责且生命也受到威胁时,西方人和西方知识界似乎一下子乱了阵脚。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放弃了自己的信念,但他们不能再对非西方的思想熟视无睹了。

文化研究可以看成是学术研究中的边缘话语,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少对大众文化进行攻击了。这个学科里还包括商业文化,也称之为“文化大众化”。文化大众化在文化研究反控制的传统里有可能实现。这是因为尽管新右翼依靠文化市场散布了一些保守的价值观念,它还是通过传统的文化理论来支撑单一的文化主义。反之文化大众化也帮助了文化研究走出了书斋,进一步走进了普通人中间,并日益全球化。这是因为商业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也逐渐超越了国界,融入到了国际化潮流当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显然不能无视这一事实。那么文化大众化在文化研究当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实际上它并没有参加70年代对文化主流派的围攻。它认为,某些大众文化产品有些类似政治性的效果,而非教育和批评话语。英国评论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在谈到英国电视剧演员麦当娜(Madonna)时说过“她把女权主义的思想批评交给了她的影迷们”,还说大众文化在创造意义的过程当中也提供了愉悦。^①他的观点实际上是法国思想家罗兰·巴思观点的翻版。巴思曾经宣称内容多义的文本产生的欢愉不但特别多,而且还让人特别能够放得开。这样的作品往往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它不受单一文化里的等级观念约束,同时它也不像主流文化派那样有意去迁就庸俗文化。当然大众文化也有一个如何处理演出效果和票房收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合作选择”。即使像麦当娜这样的名演员有时也不得不为了提高经济收益而在屏幕上

^① 见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91, Simon During(ed), Routledge, 1999.

面显露一下玉体,做些违心的事情。市场经济原则在大众文化上面可能更加有说服力。

近几年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流派叫做“文化政策研究”派。这个流派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民主派权力集团衰落的结果。它又分成两个分支:一个偏重于经济和实用,一个偏重于理论。第一种经济文化政策认为大量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要求对少量的资源进行分配,例如能够进行有效的无线电信号发射的电台和电视台数量就很有限。同时它还认为文化生产和消费对于国家经济来说越来越重要,对于文化高度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鉴于上述理由,政府应当为文化生产与传播建立一种机制,采取措施来帮助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设立公共广播系统,保护本国公民的就业权益不受外来移民的影响。地方政府也需要配套的文化政策,建立必要的文化设施,例如博物馆,来满足当地人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游客。这种文化政策研究可以帮助政府部门从经济视角研判一定条件下文化产业的框架和实施办法。另一个分支主要是从理论上研究文化政策,起源于米歇尔·福考的后期著作。福考曾经几次对法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过有关文化政策的建议。但他同时也主张知识分子在提供政策咨询建议时尽可能持批评态度。新福考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认为文化本身既不是目的,也不是与世隔绝的产品,而是一种传播“政府性”形式的机制,以便让人们根据它的指示来做事,思考和生活。所以文化作品及其效果只有在和政府机构发生关系时才会存在下去。因此有人说:“政策,政府的情况和决策过程应当被视为组成文化的不同形式和领域。”^①这里的含义就是文化政策研究应当和政府部门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并对其决策过程施加影响。

新福考主义的理论提出后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其中的一个

^① 见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 16, Simon During (ed), Routledge, 1999.

重要理由是个人的精神感受在这个理论展示过程当中没有得到重视。反对派认为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政府工具或是技术,而欢愉、狂欢、意愿、批评、违愿等对文化研究、分析和接受这些都十分重要的东西却都消失了。另外这个理论减少了政治的作用。“政策”成了一个调和各种关系的代名词,而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的各种冲突及复杂的关系却正是文化赖以产生、传播和接受的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政治的辐射和介入。

尽管如此,文化政策研究头一次把文化研究方向引向了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面,从以前文化研究对国家控制的抵制到这种合作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转变。但是在把文化研究引向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同时,如何保持自身的学术性和独立性,如何体现以人的个性为宗旨来维持文化研究本身的特色,这些似乎都是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4. 女权主义批评

女权主义可能是二次大战以后最为活跃的思想潮流之一。虽然早在19世纪它就已经出现,但是真正对西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还是在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思想认识上说,女权主义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认真看待女性的利益,个性和有关问题,反对歧视女性,或者把女性和男性混为一谈的观念。其二是承认女性的生存、思维、做事的方式和男性一样有价值。由于西方文化一直把理性和男性联系在一起,而把情感和女性联系在一起,人们总是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能代表人的特性。女权主义者则认为理性和情感是共同存在的,都是人类知识的来源。这种学术上的争辩带来了妇女的思想解放,也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妇女解放的意义,女权主义的第二次高潮在60年代终于到来。这场运动首先在美国兴起。当时美

国正在掀起一场反种族歧视和反对越南战争的高潮,人们开始对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提出质疑和反思。在这中间,妇女权利和自由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也得到了广大妇女的热烈响应。这时候美国女作家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发表了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在前面两部分里,她从分析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着手,回顾了两性之间关系发展的历史。第三部分她着重解剖了D.H.劳伦斯的作品,论述了男性中心主义在他的小说里的表现,从而把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结合起来,揭开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序幕。不但许多报纸和杂志发表了大量评述女权主义的文章,一些高等学校也纷纷开设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课程或者讲座。一时间女权主义文化和文学批评充斥了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维吉尼亚·吴尔夫30年代写的《一个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和西蒙娜·德·波福瓦写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更是成为最畅销的理论书籍,无形当中成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乃至女权主义运动的精神支柱。

由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也由于现代文学批评本身的需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从揭露和批评男性文化歧视女性特征开始,逐步过渡到抨击阳物批评,进一步采用女权视角阅读和阐释文学作品,推出了一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论著。其中有帕·迈·斯帕克斯(P·M·Spacks)的《女性想象:妇女作品中的文学和心理探究》、西·德·卡普兰(S. L. Kaplan)的《现代英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艾伦·莫尔斯(Allen Morse)的《文学妇女》等。随着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英国和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批评理论。从80年代中期起,这一批评流派不再拘泥于文学,而是发展到了对性别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诗学”。同时法国派的兴起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逐渐形成了美英和法国两派不同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一般来说,美英派关心男女性别原形,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关注作品本身的内涵,经常从现实主义作品里寻

找例证。法国派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较大,重视语言结构,而将人物形象视为语言的转义或效果、探求文本潜在的发展趋势。

总的来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积极批判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思想,开展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强调女性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和主体。此外,她们在重新审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她们认为,原有的文学史是男尊女卑思想的产物,发掘了一批受到冷落的女作家作品,纠正了一部分被父权中心思想所曲解的东西。在开展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过程当中,她们积极提倡一种女性自觉性的阅读,鼓励妇女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夺取被男性长期占领的传统文化阵地,从性别视角审视和辨别人类语言、叙事方式和思想特征。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女权主义文学和诗学。

5. 后殖民主义批评

后殖民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后殖民主义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后半叶,但它真正受到重视,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经常提到的思想原则或者方法,主要还是在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在60年代前后。当时一些文学文化批评对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殖民现象,对于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以及对于殖民文化的批判,都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对一向作为经典小说的英国作家约·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中心》(*Heart of Darkness*)所描写的殖民者的贪婪和种族偏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话语可以看成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先声,但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作用和影响到了70年代才真正看得出来。

20世纪60年代在全世界范围里都出现了较大的动荡。文化革命不仅在中国,也在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发生,而且带来了一股批评和反思传统文化的热潮。在这场国际文化大辩论当中,一批来自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西方国家知识精英,对

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理论和话语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正式推出了“东方主义”这个术语。这批学者当中最为著名的是爱德华·赛伊德(Edward Said, 1935—)。赛伊德出生于耶路撒冷,后在开罗和美国上大学,毕业以后先后在美国哈佛、斯坦福、约翰·霍普金斯等校任教,写下了大量有关后殖民文化方面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恐怕就是他的《东方主义》。所谓东方主义,在他看来,主要有三层涵义:其一是指学术上的。凡是和东方问题有关的教学、写作和研究都属于这个领域。其二是指风格。凡是在本体和认识上面不同于西方的思想风格也属于这个领域。这样一大批作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也可以把他们的作品归到这个方面。其三是历史和物质方面。西方人用来作为一种控制、改组和统治东方人的方式和手段。他声称,不把东方主义当作一种话语来审视,就不能理解欧洲人操持乃至建立的这套极为系统的行为准则。这套准则由欧洲人在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并成为东方人在政治、社会、军事、思想、科学和想象力方面的规范。

除了赛伊德之外,美籍印度裔女学者加亚特利·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她在自己的理论当中结合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对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原籍是伊朗,后来从英国迁居美国。他着重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从话语入手,结合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念,杂交成一种独特的后殖民理论。从70年代末期后殖民主义批评形成以来,这个批评流派进展很快,已经形成了几个不同的方向。它们包括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派、以霍米·巴巴为代表的精神分析派、以莫汉迪为代表的女权主义派和以艾哈迈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这些不同的派别虽然结合了当代不同的批评理论,在批评方法和侧重点上面各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互相交叉和渗透,其主体大同小异。概括起来,后殖民主义批评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内容：

1)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

他们都普遍指出,西方人所描述的东方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东方的实际情况,而是带有西方人偏见的一种文化构筑,总是赋予东方人以所谓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和怠惰性”。赛伊德还进一步指出了东方主义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揭示了西方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对东方弱势文化的歧视和支配。

2) 对殖民地历史的揭露和批判

在殖民者千方百计淡化和遗忘殖民地历史和文化的条件下,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总是力图挖掘出这一段受到压抑的历史。但这种发掘又不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而是重现帝国主义时期的档案,解构殖民话语中的普遍主义,重新调整西方话语,修正“殖民化”的历史记忆。

3) 文化身份的重构

文化身份意味着一个民族或者群体或者个人的文化根本特征,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后殖民主义批评认为,身份是流动和杂交的,一方面主张身份要根据时代的不同而重新建构,另一方面又主张这种建构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的身份,反对永恒不变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本质主义身份观念。

4) 前殖民地妇女问题的研究

鉴于前殖民地妇女问题的特殊性,她们受到了殖民主义和父权主义的双重压迫,随着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深入开展,她们的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看来,前殖民地妇女受到了父权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丧失了自己的主体

地位,被剥夺了自身的历史和政治发言权,只有通过反抗才能建构自己的主体地位。

5) 文学批评的东方主义参照

针对西方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的西方优越、文明和东方落后、愚昧的偏见,一些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放进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去考察,揭示了文学叙事的重要作用,指出了西方人的偏见来源于他们在跨文化阅读中的文化价值参照,从而批评了某些文化霸权主义的阅读心态和审美观念,凸现了文学批评当中的东方主义理念的参照意义。

第十四章 20 世纪的西方城市文化和大众文化

尽管对文化的定义可能千差万别,但无可否认其基础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真正了解西方文化,还是应该比较全面地了解普通西方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它们的历史渊源,尤其是要考察西方现代社会的变迁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诸如城市化、商业化、女权主义乃至移民浪潮对传统生活习惯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此同时,现代西方人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例如他们的衣食住行、文娱、体育活动、旅游度假等休闲生活,更是其文化的基本成分,不可须臾或缺,都有对其详尽了解的必要。一方面这些都是西方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西方文化的基础,我们可以从中窥探西方文化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通过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考察西方文化的真正蕴涵,从而把有关西方文化的一些概念和具体内容结合起来,加深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认识。

一、西方的城市文化

1. 西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的发展和城市密切相关。首先这是因为城市是文化依托的重要基地,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

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纵观西方文明史,城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的城市虽然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都还十分有限,但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成为后来城市雏形的特色。著名的城市有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Knossos)、古希腊的迈锡尼(Mycenae)和梯伦(Tyrins)。到了公元前5—6世纪左右,一些城市已经相当繁荣。例如考古学家们在希腊一带发掘的丘荪讷叟斯(Chersonesos)和马塞利亚(Massilia)^①这两座古代城市都拥有发达的工商业经济活动,和其他地区建立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城市人口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丘荪讷叟斯就有两万多居民,不但有整齐的石块街道,还建有剧场和神庙,并定期举办集市,为了方便来往船只和对外贸易,还专门建起了一个港口。这样的城市在当时还不只这两个,而是有一批。它们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人类在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自身,寻求建立一个有益于自身物质和精神发展的永久性基地。这就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虽然城市从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已经具备了一些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甚至也有了些满足精神生活需求的设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还是罗马以及以后的威尼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罗马城市不仅街道整齐,房屋高大、宽敞,城市设施也比较齐全,如给排水管道、交通要道都已修建完毕,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此外文化氛围也比较浓厚,文化娱乐场所也比较多,贵族们普遍都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城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竞技场、戏院这样观看各种表演的地方,还有妓院等消遣的去处。君士坦丁堡由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自然地担负起东、西交通和贸易

^① 参见 *Europe: A History*, pp. 105 - 107, Norman Dav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的枢纽角色,而威尼斯则充分利用了它四面环海的环境和精明的商业头脑,把和地中海邻近地区的海上贸易当作自己的生命线。商业的繁荣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旺。如果说君士坦丁堡的发展多少还是和它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的话,威尼斯的昌盛更多的依靠了它对商业机会的把握,带有更多的现代社会的特色。

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滞后,总体上说西方城市在中世纪几乎没有多少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改变。产业革命不仅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开始了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进程,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使得产品得以大批量地出现在市场上,从而降低了成本,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同时,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相对集中于城市,城市的规模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一时间,西方城市化的浪潮此起彼伏,持续高涨。在这个进程当中,大城市变得更大,中小城市变成了大城市。与此同时,城市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也逐步得到了改善,变得更加健全。在以后的几百年历史进程当中,西方城市作为西方社会的主要载体和窗口,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沧桑之变,又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功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 城市的各种功能

早期的城市只不过是个城堡,是贵族的住地,也是周围农民和其他人在危急情况下避难的地方。随着商业的发展,这些城堡及其附近的地方逐渐成为商人路过或是堆放货物的必经之处。时间长了,这些商人便在自己的住地周围建起了围墙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因此被人称之为商埠。商品经济的流通促进了这些商埠的繁荣,其规模逐渐超过了附近的城堡而演变为城市。所以西方城市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商业开始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这些商人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商会,同时也在考虑逐步完善城市的功能。经过上千年的努力,西方城市终于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

的城市管理体制和运作功能。不但对周围的农村地区起到了一种辐射和规范作用,而且还吸引了许多人进驻城市,使其商业和工业的规模和效益日渐增长。

首先是政治功能。作为西方社会的基层政权,城市拥有市政厅、市长、警察局和地方法院这样一些象征或行使权力的机构和职位。这些权力主要用来管理城市的社会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西方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利益共分的基础上的,城市权力职位的设置和使用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法律明确而严格的限制。有的职位完全是一种荣誉性的,例如市长的职位通常只是礼仪性质的,只在必要的场合下代表城市出头露面,并没有实际权力,甚至也不拿工资,任期也很短(通常只有1年)。办事机构是常设的,但都十分精干,工作效率比较高。市政议员和市长一样均由选举产生。有的地方分开进行,有的地方干脆合二为一,由市政议员轮流担任市长。

其次是社会功能。西方城市一般都分成若干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市一级一般都不设管理机构),主要是为社区的环境、治安和文化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做出规划和安排。城市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如公共交通、自来水、电、道路整修、城市绿化、公共卫生、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图书馆、大型运动(旅游)场所、基本上由政府规划或组织实施,按照市场经济模式,或者由政府部门牵头安排,或者用招标方式交给私人公司经营。

除了对社会有影响的少数行业由政府控制以外,城市里绝大多数经济和社会生活都掌握在私人手里。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商业公司完全按照商品价值规律进行运作。成功还是失败全部都要经过市场的检验,产品质量、价格高低、服务好坏和商业信誉等都是直接关系到其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城市里每天都会有很多企业和公司开张,每天也都有很多企业和公司倒闭。社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前进,城市在这紧张、喧嚣的氛围里变得更加繁华。

城市的繁华虽然有它本身的诸多因素,但一个重要前提是它的治安情况如何。西方城市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工业革命和以后的科技进步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以外,它的比较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比较高的工资待遇、比较开放的人文思想和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对其他地区和国家都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次大战后,世界各地先后出现过几次大的移民高潮。如果说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国家的移民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宗主国到殖民地的话,那么20世纪以后的移民则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移民的到来给西方国家,尤其是为西方城市增添了一定的压力。他们中的部分人由于语言和就业能力的差距不能很快找到工作,加入到了城市里原有的失业队伍,成为新的治安问题。

其次,移民的到来也带来了种族问题。有些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原来就有黑人问题,欧洲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犹太移民和亚裔移民问题。大量的移民涌现一方面凸现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尤其是就业和治安形势,例如会不时产生种族歧视和摩擦,但更急需解决的还是如何让不同的种族生活和工作在一道的问题。这就把多元文化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由于大批移民的到来,许多西方大城市出现了以种族为标记的社区。这些社区普遍都具有各自的文化特征,从文字、习俗到过往人群都可以辨认出不同的民族特色。有的地方还专门举办各种文化节,倡导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城市的开放性和亲和力,也使得多元文化成为许多西方城市流行的潮流。

第三是文化功能。西方城市除了有众多的文化设施,诸如电影院、戏院、体育场馆、歌舞厅、图书馆、书店、艺术馆以及新闻媒体、出版机构等,此外,它也是艺术、文化人才的汇集地。一些大城市,如巴黎、纽约和伦敦更是许多文化、艺术和思想流派的发展地或主要活动中心。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化功能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完全根据文化市场的需求而自生自灭。城市只是

为这些活动的进行提供和创造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大量的机会。正是这些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为西方人提供了精神食粮,诸如道德标准、审美情趣、生活常识、信息资料、科技知识以及其他的精神需要。

不可否认,在这种十分活跃而又十分无序的文化背后也隐藏着一些有争议乃至消极的成分。例如卖淫、同性恋、吸毒往往和西方文化的过分开放和宽容分不开。这些现象在有些西方城市有时甚至越演越烈,例如近些年来同性恋的情况就是这样。巴黎、纽约、阿姆斯特丹和悉尼等城市不仅每年都有同性恋游行示威,还出现了专门为他(她)们设置的商店和街道。吸毒也是这样。在有些西方国家吸毒不但是合法的,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卖淫和赌博更是这样,西方大城市恐怕很少没有红灯区,赌场大概也是司空见惯。这些在我们看来是消极的东西,只要不妨碍其他积极和正面东西的发展,他们一般是不加干预的。他们这样做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根据辩证法,事物总是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在矛盾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绝对禁止,还不如制定一些规则来加以适当控制,让其获得发展空间。一方面这符合西方社会自由化的原则,另一方面让其经受社会和市场的检验。等到大多数人通过实践认识到它们的危害,自然就不去参与了。如果失去了大多数人和市场,再流行、再红火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

20 世纪以来,西方的一些大城市尽管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但恢复得普遍比较快。首先是经济生产在不长的时间里几乎都赶上了或者超过了战前的水平,除了一些自身努力的因素之外,科技的进步对生产水平的提高当然带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对科技的重视和投入为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成本的降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同时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对生产效率的改进有很大的推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不仅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为提高

工资待遇和改善福利条件创造了条件。城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消费者不断鼓起的钱袋是西方社会进入消费时代的重要信号,几乎就在人们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消费主义的浪潮已经开始高涨起来。一般的商店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众多的消费者的需求,超级市场应运而生,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通过各种贸易渠道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购物环境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不仅商品变多了,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货架上的品种让人眩目,买东西也更加方便,随手就可取出。出门一张信用卡可以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里畅通无阻。有时不想出门,一个电话,甚至干脆上网,鼠标轻轻一点,不多一会功夫,你想要的东西马上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广告满天飞,但一般不会担心上当受骗。厂家或者商家稍有疏忽便会被消费者告到法庭,不仅面临赔偿和几倍乃至几十倍的罚款,弄得不好还要坐牢。

和消费主义浪潮相对应的是城市建筑的高层化。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巴黎、伦敦这些国际性大都市从20世纪开始就不断地增添高层建筑,80层乃至10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不断拔地而起。金融大厦、商务大楼、豪华旅馆、购物中心,各种类型的高层建筑以其不同的风格代表着不同的建筑流派,争奇斗艳,蔚为壮观。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那高空中闪烁的灯光和天空中的星光连成一片,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地上,有一种置身于天地之间的感觉。

3. 女权主义的影响

西方城市文化除了受到城市化的明显影响以外,同时也受到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女权主义思想是在启蒙运动思想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和英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要求妇女和男人一样地位和权利的妇女运动组织,只是限于当时社会条件,影响不算太大。19世纪末,芝加哥女工举行的游行示威,要

求妇女和男人同工同酬,声势比较大,后来那一天(3月8日)被国际妇女组织定为国际妇女节。尽管妇女权利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一直受到广大妇女甚至许多男人的关注,但对女权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还是从20世纪开始的。法国著名作家和妇女活动家西蒙·德波瓦所著《第二性》堪称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她本人则被尊为现代女权的第一人。从她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女权主义运动,而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也被许多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用作一种武器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或者文学、文化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女权主义本身也产生了分歧,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互不相让,争执不下。

首先有关“妇女”本身的界定。妇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一部分人认为妇女的本质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是由她的生理特征决定的,不可改变。这种绝对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基旨主义思想。更多的人则认为“妇女”的含义远不止那么简单,而是含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女性的生理特性,其次后天发展起来的和女性身体条件也有某种关系的个性,再其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父系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女人习性。

随着女权主义的深入,有关和性病牵连的问题受到了关注并进而引发了争论。一些受到种族歧视的妇女提出了少数种族妇女受到的压迫和抵抗,指出了白人或西方女权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之间的对立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主要是针对白人妇女提出的,因此造成了女权主义运动本身的不团结。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如何在对待黄色书刊的问题上,女权主义运动内部再次出现了分裂倾向。一种主张可以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作品中间描写性爱,另一种则反对这样做;一种认为性与性别没有区别,不存在什么生理(身体)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不同,另一种认为两者之间应当有所区别,互相分开。这个争论为以后的女同性恋的大量出现乃至公开化、合法化创造了条件。后

来男同性恋也以这种争论为契机很快就形成了一种国际范围的运动,在较短时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在今天的西方社会里同性恋已不再被视为非法,在很多或者说大部分西方国家里它已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得到了默认,不能不说和女权主义运动中一种同情同性恋的倾向有关。实际上当代女权运动不仅仅在同性恋问题上,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和传统观念大相径庭。

女权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热点是“妇女”这个词的内涵和功能。对于部分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权运动的主体不应该由“妇女”来体现。“妇女”本身有多种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意义均不相同。而且由于性别和种族、阶级、伦理、性及地区这些不同领域的特性交错在一起,很难将其意义和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剥离开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权主义思想有一个统一的基础,那就是妇女都遭受着父权的压迫。但是这种观点近年来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它不能解释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性别压迫的具体情况。第三世界妇女的遭遇和压迫经历也不应由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去解释。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争论,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也没有能找到一个可以代替“妇女”成为女权主义运动主体的中心词。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随着女权主义对政治斗争的卷入,原来的主体所具有的生理和性别含义已不能再满足这种政治和其他需要,其文化和社会内涵肯定要扩展到相当大的范围。但是这个问题又不太好解决,不仅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和现实情况密切相连。女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一些问题的解决远不只是一种理论探讨。

女权主义争论的另一个热点是性和性别的区别和含义。在她们一部分人看来,性只是一种生理和生物的含义,而性的文化含义则应由性别来承担。虽然从生理或身体角度考虑,把性分为男女是有道理的,但从文化角度考虑把性别再区分为男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样做完全是仿照担负生理功能性的表现。如果从理论

上把文化功能的性和生理功能的性分开,文化功能的性就可以相对独立,不受生理功能的性的束缚,男人和男性可以将女性的身躯当成男性的,女人和女性也同样可以把男性身躯当成女性的。但这样一来会带来一连串的问题,诸如生理功能的性和文化功能的性是怎样形成的呢?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形成的呢?性到底是什么?性是一种自然属性,可以通过解剖或是遗传信息性激素来认识吗?女权主义者如何来看待自然科学已经证明的这些事实依据?这些问题显然都是难以回答的。如此看来,把性分为两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性别不应仅仅视为在原有的基础上所显现的文化内涵,性别也应包容性里的生殖含义。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瓦在《第二性》里说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①她的意思是说性别是形成的,它是一种可以引起反应的原料,可以变成为这种性别,也可以成为那种性别。但是这种变化要受到必需的文化因素影响,这种必需文化并不是“性”,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成为女人并非都是女性。她声称,如果身体是环境的话那身上没有那种可以用于帮人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用文化蕴涵去解释。所以性不应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去理解。她这种解释强调了后天环境因素,尤其是文化成分对于性别形成的重要性,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似乎仍然不能解决文化与生理之间不同关系的问题。持有人文主义女权立场的人把性别看成人的一种特性。这种人能够进行理性思维,具有语言能力和道德水准,但这种人和社会学家们将性别理解成为特定社会环境里的一种关系的说法自然有差距,不能成为这种社会理论的出发点。这种理论强调性别是一种变动的环境(背景)现象,并不表明什么实质性内容存在,而只是几组具体的历史文化关系的有关汇合点而已。

虽然女权主义理论还有很多争议的地方,不可能指望在较短

^① 参见 *The Second Sex* p.1, Simon de Beauvoir, Vintage, New York, 1973.

的时间里取得一致,但是女权主义的影响在西方社会中可以和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相抗衡。男、女平等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国家法律和各行各业的规则当中,体现在就业、上学和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中,而且在每一个人的行为里,在家庭和私人关系里都可以觉察到它的存在。女权主义产生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男人不再是家庭里的唯一主人,在很多方面丈夫不但要听妻子的,甚至还由妻子说了算。这不仅是因为妻子也有工作和收入,而且对一个丈夫来说找到一个合意的妻子实在不容易。离婚率的居高不下在一些西方国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而男女单身,甚至一辈子不结婚也很平常。离婚在很多家庭里往往都是由妻子率先提出。至于女子因为学位高或地位高找不到般配的男子在西方社会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这些都表明女权主义思想已经对西方人的文化生活和城市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这些还都是一般社会问题,用一句话来总结,女人的聪明才智和社会地位确实今非昔比。但是女权主义的作用还不只是提高了妇女的地位,而且在其他的领域,尤其是对文学/文化批评起到了很大推动。这方面的内容已在第十一章里作过介绍,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4. 城市的规划和改建

城市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这不仅是因为自从工业革命以后农村人口大量迁移至城市,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相比已经占有绝对优势,是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也是因为城市里拥有众多的文化机构,城市建筑和其他物质设施也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和氛围。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将城市建设和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力图创建或重建一些高度文明、具有优美工作与生活环境、文化高雅的地方。解决旧城市的社会与物质环境方面的问题,减少城市里部分人的贫

困化以及管理混乱等方面的矛盾。他们认为,城市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压缩人口和缩小规模,大都市要改造成花园城市。

较早进行改造试验的是英国的萨尔泰城(Saltaire),但影响较大的则是 1879 年在英国伯明翰郊区、由卡德伯里(the Cadbury)一家建造的伯恩维尔城(Bournville)以及英国利物浦附近由威廉·列福(William Lever)1888 年建造的阳光港(Port Sunlight)。这些城镇的兴建主要是想取代旧城中的破旧房屋,建筑一般都比较考究,但由于造价较高,除了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和上层技术工人以外,一般人只能看看而已。类似这样的城镇在英国其他地方也有,这种规划得体的新式城镇一段时间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里蔚然成风,一直从 19 世纪蔓延到 20 世纪。当时城市规划设计者当中较有名气的是帕特里克·格德斯(Patrick Geddes)。格德斯原为生物学家,后改行搞城市规划。他的设计照顾到女性的特点,认为女性比较温柔,城市环境应当朝花园城市方向发展才有益于女性,当然也有益于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人的身心健康。花园城市的思想是针对人满为患的大城市提出来的,强调更有秩序,环境更为优美,并且注意男女两性之间的区别。这一思想提出之后受到许多人的肯定和重视,而贯彻最力的是另一位城市规划者埃本奈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霍华德于 1902 年筹集了资金,根据这一设计思想,建造了英国的第一个花园城市莱切华斯(Letchworth)。这座城市的设计注意让来自不同阶级、阶层的居民和睦共处,注意协调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让中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住房分离开来。中产阶级有专门的单个新村居民区,工人阶级则住在由草坪和大院连接在一起的成片房屋里。此外,还为单身汉设计了合住的房屋,这些房子普遍配置共用的餐厅和洗衣间。工人住房主要租给技工和老工人。除了这些,设计还充分考虑了环境因素,在新城周围安排了农业地带,把工业区和居民区隔开。这样的设计,在当时可能还不能对普

通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一些标新立异、赶潮流的人,其中包括一些独立性较强的妇女则很乐意搬到这里,过上一种新颖别致、与众不同的超前生活。

类似的新城镇还有汉姆斯泰德花园城郊区(Hampstead Garden Suburb)。该城建于1907年,也是参照花园城市的原则建造起来的,吸引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妇女,也吸引了一些包括吉普赛人在内的,住无定所的少数民族。当然前提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身无分文的穷人是住不进来的。无论如何,这种花园城市的思想和实践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先是在英国,后来在其他国家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并逐步推广开来。

美国花园城市的样板是新泽西州的拉德朋(Radburn)。它具有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是把人行道和汽车道完全隔离开来。这在30年代还是首创。同时它把居民区放在交通要道的旁边,这在当时也不多见。更为罕见的是把带有停车场地的一个购物中心建造了起来,和今天的一些大型购物商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说明城市规划者们已经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和消费者的需求有了明确的认识。

二次大战给欧洲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也给城市规划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在中欧地区尤为明显。一些历史城市在战后重建当中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得到了恢复和新生。在英国,德国人的轰炸毁坏了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市,花园城市的思想因此有机会得到进一步推广,就连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也乘机机会把一些旧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建设列入了城市计划并很快付诸实践。

大量的城市改造和修建工程成为私人房产商发财的好机会,因为政府部门无暇经管这么多的工程。他们从政府部门接下已经修整好的地皮,签下合同之后负责承包工程项目,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给城市带来了生机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他们之间对于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多少沟通,对于他们负责的环境更是缺少统一

的考虑,由此而带来了不少诸如交通、安全、建筑风格不协调等方面的问题。建成以后的郊区居民区由于地点比较偏僻,和外界联系较少,不少家庭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尤其是妇女,除了上街购物和很少的娱乐活动之外,整天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因此而造成了一些家庭和社会问题,引起了部分女权主义者的批评。

从 50 年代末开始,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刮起了一阵高层建筑的建设风。这些外表富丽堂皇的现代主义建筑为了节省开销没有配备电梯管理员和看门人。尽管如此,由于中央空调和其他预制件的昂贵,一般中、底收入的家庭还是住不起。结果是房子离市区越来越远,里面的设施也越来越简陋,甚至走廊里的路灯都取消了,共用面积也越来越小,从而又引发了安全、卫生等方面的问题。

在城市改建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一些陈旧的工业设施。以前碰到这些问题简单的办法是全部拆除然后重新建造。从 60 年代早期开始,一些艺术家们接管了这项工作,使之改造成画廊或其他艺术活动的场所。60 年代期间,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改造便是这样完成的。这种改造往往集艺术和商品、风格和生活方式于一体,从房产开发、环境保护和艺术特色等多角度考虑其价值,遵循商品价值规律,从而在资本积累、文化消费和房产投资等诸多方面创造了经验。类似的旧城改造计划在巴黎马莱区(Marais district of Paris)也付诸了实施。

马莱是 17 世纪建造的豪华宫殿所在地。天长日久,这些房子早已日渐衰落,破烂不堪,成为一个贫民区了。早在二次大战以后就有人主张将它拆毁,但由于意见不一,这项工程还是耽搁了下来。到了 70 年代拆除之风已变为建旧之风,马莱区的旧式豪华建筑终于逃脱厄运,迎合了当时的潮流而保存了下来。经过恢复性改造的马莱区一改昔日的陈旧和衰败,重新成为一个豪华区。当然,原来住在这里的劳动人民是无法回来了,因为改建后的房租不

知翻了多少倍,周围的物价也跟着上涨了许多,只有那些有钱人和新贵们才能在这里享受改建后带来的文化氛围和其他种种物质上的好处。

5. 城市的社会和文化生活

随着城市改建步伐的加快,城市郊区出现了更多的变化。那里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居民从城市中心迁往郊区新建的住宅小区或者私人公寓。大城市市中心往往成为非白人贫民的居住地。这在美国尤其是这样。这一趋势从50年代就已经开始,到了60年代已变得相当严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纽约城区里的黑人。由于种族歧视,加上贫困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黑人单亲家庭相当普遍。一个母亲带上一个甚至几个子女,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这就使得黑人居民区常常成为大城市中间最拥挤、最破落、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从60年代末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里出现了许多成群结队的市民组织,有的是无家可归而去抢占房屋的人,有的是付不起房租的房客,有的是因为城市改建或交通问题房产受到侵占或者威胁的人。他们各自的情况可能不完全一样,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城市继续受到破坏、不能安居乐业的局面继续下去了。他们试图组织起来阻止这一趋势,喊出了“接管城市”这一口号,成为当时政治激进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特大城市里,住房和交通总是最为敏感、最容易引发事端的缘由。在伦敦和巴黎,交通系统都是工会的重要据点,房主和房客之间的对立更是城市生活当中常见的现象。

在城市骚动当中,妇女的作用相当明显。以往,妇女主要参加一些和住房、带孩子等有关的运动,以后则连一些护理病人、救济贫困、提供娱乐这样的活动也都卷入了进去。60年代以后妇女参加城市的斗争积极性更为高涨。一方面这是因为在市中心旧城区

当中居住的妇女远远超过了男人,老年妇女和当母亲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她们所受到的城市问题威胁远非一般男人可比,甚至失业的男人都比不上她们。美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城区男女之比为 100:115,而 65 岁以上的人当中更是高达 100:157。^①同时单亲家庭大部分都由单身妇女领头,所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就远远超过了一般男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妇女当中产生的贫困比率都相当高。女权运动的重新高涨说明了妇女作为社会问题已经很严重。

城市当中另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是男女同性恋运动。在北美的几个大城市里,旧金山是男同性恋发展规模最大、最早的城市。此外,在西方其他几个大城市里,如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悉尼也都有同性恋社区。

60 年代之前,同性恋还始终是个敏感的禁区,在人们的言谈里被视为一种禁忌。但从 60 年代开始,它逐渐抬头,发展为一派势力,在旧金山率先建立了自己的社区文化。该市的卡斯特洛街一带开设了包括酒吧、咖啡厅、商行、旅馆和专卖店等一大批专门供同性恋群体消费的商业设施。这种社区文化的建立和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在于同性恋群体还是比较富裕的,许多同性恋者都是专业技术人员,口袋里不乏钱财,有的甚至收入相当可观。由于这个缘故,许多人都把钱投入到城市改建当中,通过房地产为自己争得了活动的地盘。虽然该运动在 80 年代遇到了一些风浪和反复,但同性恋(其中也包括女同性恋)群体还是想方设法依附城市,利用城市里的条件和西方社会比较宽松的环境扩大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摆脱了社会传统习惯对他们的歧视,在西方社会里站稳了脚跟。

20 世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其文化的确认。一方

^① 见 *The Sphinx in the City*, p.118, Elizabeth Wilson, Virago, London, 1991.

面妇女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越趋重要,另一方面妇女活动又对城市建设有着一定的制约。城市为个人和团体的发展都提供了自由空间,同时又有意识形态的限制。次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例如各种各样的吉卜赛文化、同性恋文化以及黑人文化。城市生活为各种次文化的展现提供了空间,为它们特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然而这些次文化越是发展,越是得到认同,它们便会越是有隙可击,越是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贫民居住区通常在区内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到了外面却比较容易受到攻击。两次世界大战前华沙的犹太区就是这样。犹太人集中住在一道有数量上的优势,但也容易被识别。这些边缘文化群体在城市里比在其他地方更便于自己管理自己,但他们声称“接管城市”的口号却常常让人觉得有些不好理解。对同性恋者来说,城市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正是他们的生活所需要的,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为城市生活增添了一个景观。没有可看性就没有个性,城市景观需要戏剧形式的自我识别和界定。这些次文化姑且算是城市中上演的一场戏,能否演得下去就要看其是否有可看性了。

二、西方人的衣食住行

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基础是生产的迅速提高和科学技术的飞快进步、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个人收入的增加。这些变化的具体表现首先反映在西方人的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生活里。

1. 衣

工业革命的最早成果是机器在纺织业的运用,由此而大大提高了纺纱织布的能力,从而使得纺织品的生产能力超过了英国和其他一些老工业国的自身需要,形成了工业品出口倾销到其他国家的能力和要求,由此揭开了近代产业革命的序幕。由于机器的

大规模生产,导致了成本和价格的下降,也为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质优价廉的纺织品为西方的服装革命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条件。

虽然 19 世纪之前一般人的衣服还是喜欢送到裁缝店里定做,但对普通人来说衣服的款式和布料的质量并非要十分考究。也就从那时起批量生产的衣服开始出现在市场上。人们发现同样样式和布料的衣服从商店里购买和在裁缝店里定做会出现不同的价格,也就从那时起主要由机器生产的批量服装首先在西方国家当中逐步风行起来。这种趋势到了 20 世纪仍有增无减,二次大战后,除了少数特殊情况,绝大多数人的衣服几乎都是某家成衣工厂生产出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人衣服的款式和衣料乃至色彩也在不断翻新。除了纺织工厂不断对各种纺织品的原料和成分进行改进之外,一种以服装款式为工作对象的职业从 20 世纪开始,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逐渐走红起来,这就是服装设计。普通西方人在二次大战之前由于物质上的原因对于衣饰并不十分考究,甚至大人和小孩的衣服款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二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对衣着的追求逐渐成为西方人的一种时尚。领风气之先的是 40 年代妇女穿的尼龙长袜,紧接着发明了用松紧带作吊带。等到法国人克里斯汀·迪奥尔为女士们设计了一种颇长而又宽大的裙子时,整个西方似乎都沸腾了。从那时起,西方人的衣饰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随着时尚改换一次。以后同样引起轰动效应的还有超短裙和牛仔裤。西方的一些重要服装样式对世界服装的潮流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每年在几个国际性大都市,如巴黎、纽约、罗马和伦敦都会有定期的大型服装展示和比赛,一些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各种款式服装由一些训练有素的服装模特穿着,展现在各种公共场合。凡是那些迎合流行潮流,受到评委赏识的衣服款式很快成为生产厂家和商家争相追逐的产品,也

很快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的认同,出现在大街小巷。从西方到东方、从大都市到中小城市再到乡村,这种时装潮流已成为当今商品消费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时装联系在一起的模特儿们也会跟随服装展示而名利双收。那些一流模特不仅经常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成为名人,而且也会因此而成为富姐、富妞,从而腰缠万贯,挥金如土。

2. 食

西方人的吃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早餐一般都是饮料(牛奶、果汁、咖啡等)再加几片烤面包。有时也会来个鸡蛋,煮的或是油煎的均很平常。午餐大多作为工作餐,一杯咖啡再加一个三明治(面包里夹点咸肉或是蔬菜),有时再吃个水果——苹果或者香蕉。晚餐一般都当作正餐,比较考究。正常情况下总是先喝一碗汤,然后是主食,或牛排或煎鱼或咸肉或香肠,加点土豆泥和蔬菜,通常都放在一只大盘子里。吃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口味用桌子上的盐瓶和其他调料瓶给自己的食物上适当添些佐料以改善口味。吃完主食以后,还有一道甜点心或是水果,抑或二者皆有。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一般分别使用勺、刀和叉。一般情况下,每换一道食物就要换一次刀和叉。

以上三餐是现代西方人常见的生活习惯,但比较考究一些的,或者还留恋传统习俗的西方人则一天还不止这三餐。他们在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3点左右分别还有一顿非正式的早茶和午茶的习惯,一般都是一杯咖啡加些糕点。

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当然还不止这些。除了在家或是工作单位吃些正规的餐食以外,大多数西方人经常到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种饭馆去品尝各种风味的饭菜。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移民的增加,西方各国,尤其是大城市里不仅有很多西餐供应点,其他非西方的餐馆,诸如中国的、日本的、朝鲜的、越南的、印度的等东方国

家的美肴也纷至沓来,呈现在西方人的面前。通过比较,他们不仅饱了口福,也对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有了更多的了解。

西方人的另外一个重要饮食习惯是对酒和咖啡的钟爱。他们不仅在晚餐桌上常常喝些甜酒,下班后或一个人或约朋友到酒吧间坐一会儿,喝点白兰地、威士忌或者其他带酒精的调味酒是经常的事情。晚上,在大街上或是商店橱窗前碰到几个酒气冲天、喝得酩酊大醉的,甚至因为喝得太多开车在街上横冲直闯的都不乏其人。当然更多的还是喝咖啡的。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边,西方人对咖啡的需求绝对不比东方人对茶的需求小,咖啡馆遍布街头巷尾,难以计数。如果说酒吧对成年男性更具吸引力的话,咖啡馆则是包括女性和老年人在内的一般顾客更喜欢去的地方。咖啡的品种很多,恐怕不会少于茶的品种。但一般吃法分白咖啡和黑咖啡两大类。白的即加牛奶,黑的则不加。至于放不放糖又是个人自己的选择。

啤酒是西方人喜欢喝的另一种饮料,其消耗量远远超过任何一种酒。酒类当中,一般来说德国以产啤酒闻名,法国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等地以产葡萄酒出名,苏格兰以威士忌享誉天下,而俄罗斯的伏特加几乎无人不知。

西方人,尤其是有些地位的人,或者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买东西也好还是用东西也好,喜欢讲究牌子,有一种品牌意识,吃东西也不例外。当然食品不一定非要牌子,却很注意是什么地方来的,诸如意大利的帕马火腿、法国诺曼底奶油、匈牙利和法国考尼克的白兰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威士忌、美国旧金山的陈酿面包、西班牙的猪肉。另外西方人还喜欢用酱油,其加工方法可以各不相同,但其基本品种却只有三大类,即棕色、白色和黄色。乳制品比较普遍,西方人似乎不在意产地,新鲜就行。面包制作方法两大类,一为烤制,一为发酵制作。葡萄酒一般在欧洲南部酿制。带酒精的白酒则南北都有,而且烧菜时都可以加用。在吃肉方面,南欧的人

喜欢吃羊肉和小牛肉,具体地说希腊人喜欢吃羊肉,意大利人喜欢吃小牛肉。稍北一些的欧洲人喜欢吃牛肉,美国人也是这样。再往北面去则喜欢吃鱼。东欧人喜欢吃羊肉和猪肉。腌肉和熏肉及香肠,欧洲人不分地区都普遍喜爱。南欧人的食谱里含有较多的蔬菜和水果,胆固醇含量较低。北欧人食谱里动物脂肪和淀粉多些,东欧人更多。欧洲人当中意大利人是比较讲究吃的,而且意大利各地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不仅面包是这样,乳酪、葡萄酒也是这样,甚至连他们的比萨饼和面条都有数不清的品种。德国以及沿莱茵河一带的欧洲人则以他们的白葡萄酒闻名,沿着莱茵河河谷顺流而下,会尝到各种不同风味的葡萄酒,而法国葡萄酒的产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到它的乡间走一趟则会吃到成百上千种乳酪。

就正餐而言,西方世界中最讲究的是俄罗斯人,如果熟悉了俄国人吃饭的那套方式,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能适应。首先看看他们桌子上的摆设。每个位子上中间总是一个大盘子,左边是三把叉右边是三把刀,右方稍远处放汤匙的碗里还有一把尖端靠在汤匙上的小叉专门用来吃牡蛎,在汤匙的后面还摆着一大排刀叉,从外到里不分左右,分别是鱼叉刀、肉叉刀、色拉叉刀。汤匙上方还有一只放烈性酒的酒杯,鱼叉的上方是放白色甜酒的酒杯,肉刀的上方是红色葡萄酒的酒杯。红色酒杯后面是放水的杯子,水杯旁边是放香槟的小酒杯。

第一道菜通常是牡蛎和大虾,这时最好用牡蛎叉去吃。如果虾不是用盘子而是用一个容器送上来的话不要用刀而要用叉,咬上二三口就可以了。旁边的生菜只是用于作点缀的,不要去吃。吃完后侍者会从客人右边取走用过的餐具。第二道是汤,舀汤时一定要轻轻从汤碗上面去盛,切忌不要舀得太多太满,喝汤时则要避免声音太大。第三道是机动的,比较正式的宴席一般没有,但一般宴席,例如在饭店里安排的,可以送上这道面包和黄油。面包不

会太大,这时不要用刀去切而要用手去扳。涂黄油时也不要全部涂满,而是涂一口吃一口。第四道一般是鱼。正餐中鱼是连头带尾整条送上来也有可能里面的鱼骨已经去掉。即便如此,如何熟练地使用鱼刀和鱼叉把鱼分成小块送上嘴也要注意分寸。第五道是主菜,一般是肉或是家禽,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应付。

在使用刀叉的方式上西方人之间有区别。例如美国人喜欢用交换式,就是先用右手持刀将食物分割开来以后放下刀,再把左手上的叉接过去将切成小块的食物一口口送入嘴中。欧洲人则用直接式,即右手持刀担负切割任务,左手握叉担任运送任务,互不干扰。在正式场合里吃饭,用完的刀叉和盘碟总是由服务员从右边取走,新送上来的饭菜则从左面放到桌子上。如果服务员端一个大浅盘子为客人加菜,用叉时从左边去接。

吃饭过程中间客人加菜,刀叉所放位置会有不同的含义。如果客人还没有吃完,只是在讲话或是倾听旁人说话,这时可把叉靠在刀上,叉尖朝下,放在盘子里。如果已经吃完,刀和叉应当平放在盘里,叉尖还是朝下。如果还要服务员做什么事,刀叉平放在盘子的边上,要是把盘子当成钟表的话,柄部在 2 点钟位置,刀的刃部和叉的尖部则靠近 11 点钟位置。如果这一招不灵,则用眼光引起服务员注意,他会走过来询问情况。

色拉的吃法不完全一样。美国人一般喜欢在吃饭之前先吃色拉,而欧洲人的正餐桌上色拉一般放在最后。这是因为色拉里含有醋和柠檬汁,早吃的话会破坏胃口。宴席上不同的酒要配不同的食物去吃。Y 形状酒杯通常装烈性酒,紧靠汤匙上方,吃汤时饮这种酒。白葡萄酒通常吃鱼时饮用,其酒杯放在鱼刀的上方。放红葡萄酒的杯子一般比白葡萄酒的杯子大些,紧靠白酒杯。最靠桌子中央的是放水的杯子,也是杯子中间最大的一只,原意可能是希望人们多喝点水少喝点酒。如果宴席上有香槟的话,通常会放在一只细长的杯子里,吃甜点心时饮。放烈性酒的杯子一般情况

下在汤喝完了一道撤下,但是其他酒杯都会保留在那里,在酒宴过程当中随人饮用。

服务员上甜点心时,放点心的盘子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小碗,两边是吃点心时用的叉和勺。可以先把叉勺放在盘子的两边,再把碗放到桌上,盘子的左上方。如果酒宴非常正规的话,会有三道附加食品,即冰其淋,甜点心和新鲜水果。

在西方人家作客要适当注意些他们的风俗习惯。例如在英国人或是澳大利亚人家中吃完饭不要说“我塞饱了”,因为这句话里有强烈的性意识寓意。在英格兰人家里吃完饭喝茶时茶盘总是交到桌子上面年龄最大的妇女,由她作为女主人把茶一份一份地送到每个客人手里。如果桌子上面没有妇女,这份荣誉则归在场年龄最长的男士,由他去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此外,西方人的饮食习惯还包括在家举行派对(party)。通常是过生日或其他喜庆的日子,往往邀请些朋友,订购(也有自做的)大蛋糕和食品。节假日到外面野餐或吃烧烤等,也是许多西方人喜欢的习惯。

3. 住

工业革命和随后的圈地运动使得许许多多的农民从农村移居到城市,城市人口在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迅速膨胀。到了20世纪,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一般都是农村人口的4—5倍,另外两次大战后出现的移民浪潮也给西方城市增加了许多人。如此多的人口给住房增添了巨大压力。除了政府盖了些多层和高层的公寓楼房外,住房主要是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

在住房的兴建和管理上,西方各国的具体作法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上都经过了两个阶段。60年代之前主要由政府出面组织一些私人公司结合城市改造在一些城市及其郊区兴建了一大批居民区。这些房子除了部分是高层或多层公寓楼外,相当一部分是独

立门户的花园式房屋,主要供中产阶级和部分收入较高的技术工人居住或购买。市区的一些老房屋则主要是黑人或其他收入较低的工人、贫民以及外来的移民居住。住在条件较差地区的居民经常因为房租、水电费等问题闹事。60 年代以后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西方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繁荣的阶段,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白领阶层的迅速扩张和专业人士的大量增加,导致了整个西方的阶级结构调整和个人平均收入的上升。这些变化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住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房产商和金融机构联手很快推出了一系列房产建造和销售项目,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让许许多多的普通西方人拥有了自己的花园房。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拥有一幢带有花园的房子不再是梦想。它设施齐全、有一个大客厅加上 3 个左右的卧室,还有厨房、卫生间、储藏室和车库,总面积可达 200—300 平方米左右。对一般人来说这已经是件很平常的事了。

4. 行

20 世纪之前西方人出门作长途旅行一是靠轮船,二是靠火车。这两样东西也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具体来说还是 18 世纪的事。再早些时候西方人的运输工具和东方人完全是一样的,在陆地上靠骑马,在海上则靠大帆船。即使到了 20 世纪初叶,西方人在近距离的交通工具也还是用马或马车。那时的绅士要是拥有一辆自己的私用马车会是一件相当体面的事。但是汽车的发明和使用使得过去长达数千年的交通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西方人出行很少不自己开车的(除非距离太近或是为了锻炼身体的缘故),出远门一般也很少不坐飞机(偶尔也会因为游览的缘故改用其他交通工具)。

在交通工具上的变化当然主要是由于科技的进步。飞机和汽车都是 20 世纪发明并投入商业性使用的。当初的飞机从研制试

验到最终上天化了十几年时间,终于飞过了英吉利海峡,并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来飞机经过多次改进,时速已经远远超过了音速,接近1小时1000公里。今天的波音或者空中客车穿过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只要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在过去简直难以想象。汽车的发展也是这样。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装配线上生产出的第一辆汽车到现在,汽车的款式、速度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提高了多少档次,其耐用性、外观、价格、易操作性和安全性等功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此外,飞机和汽车的种类也根据实际需要增加了许多。除了军用的以外,民用飞机和汽车大体上都根据容量的大小和载人、载货的标准分成不同类型,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水上交通工具也有很多变化。虽然船的速度还不能和汽车与飞机相比,但由于它的容量大,比较平稳,费用相对较低,也有不少优点,用于游览和货运比较普遍。现在大的油轮载重量可达20—30万吨,远远看上去宛如一座海上城市。而一般豪华游轮上,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在上面的几十,乃至几百名不等的游客可以尽情地沿江或沿海游玩,享受大自然和物质文明所能够带来的各种精神和物质条件,大有乐不思蜀的感觉,而绝无任何生活上的担忧。当然西方人现在更喜欢的还是自家独用的私人游艇或飞机。这种小游艇也是大小不等,大的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小的则可以坐上3—4个人。小游艇尤其普遍,不用时放在家里,要用时用一辆拖车挂在后面就可以拖到海边或湖边。那里一般会有专用码头,可以放心地启用,十分方便。私人飞机的开销可能大些,因为平时要停放在机场上,加上日常维修和保养,应当是笔不小的数字。更多的人喜欢临时租用由专业飞机公司提供的小型飞机,这样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考虑似乎更加划得来一些。

火车当然还是常见的交通工具之一,不过其速度已经大大提高。尽管这样,除了货运以外,用它作长途代步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但在大城市乘火车上班的人却大有人在。这是因为城市交通

堵塞比较严重,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期间自己开车要想不耽误时间非常不易,乘火车则可以完全避免这个问题。城市公共交通更多的当然还是依靠汽车。大城市一般都有地铁,可以解决不少问题,特别是解决市中心和郊区之间以及邻近城市之间的不算很长,但也有一定距离的交通问题。对城市公共交通贡献最大的还是汽车。一方面中小城市有地铁的不多,另一方面即使在大城市,地铁也不能完全代替汽车的作用。地铁建造的费用成本很高,同时还有个安全管理和覆盖范围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汽车在城市交通网里起的作用更大。西方城市里的公共汽车一般较为准时有效。但由于乘客不多,经营成本较高,许多城市当局改请私人公司管理,适当给予补贴。这样一来,往往票价不菲。

更多的西方人出门通常喜欢自己驾车。今天的西方人不会驾车的恐怕已经不多。除了未成年的孩子法律规定不准驾车以外,其余的人,甚至 70—80 岁的老年人,都不会把驾车当成是件很特别的事情,只要自己的经济条件许可,道路设计和修造有利于开车。因为城市本身比较大,通常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几十公里,加之公共汽车不是很多,自己如果没有汽车的话,办事便会很不方便。由于汽车生产已经大大超过对它的需求,国际市场竞争空前激烈,汽车价格已经是一降再降,再加上二手车很多,买车对今天的西方人来说已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一个人一部车,一个家里拥有 2—3 部乃至更多的车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三、西方人的休闲生活

二次大战后虽然地区性冲突不断,各种矛盾此起彼伏,但总的来说,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形势是稳定的。社会危机尽管越来越突出,经济却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增长,普通人的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工作时间却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的休闲生活变得愈加丰富多彩。他们或许不像东方人那样愿意把时间花在

做饭这样一些琐碎的家务上面,但肯定愿意花更多的钱去周游世界,或者去海滨、雪山度假,或者去看球赛、听音乐会。那么西方人究竟有哪些休闲生活呢?这里从旅游、运动和阅读三个方面分别做些简单的介绍。

1. 旅游

西方人的收入近些年来有了相当的提高,从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标准来看除了买房买车以外,应当还有不少的积蓄,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却并没有多少,其中原委当然因人而异,然而很大的一笔花费恐怕还是和旅游有关。

旅游在西方早已成为产业部门,被称为无烟工业,仔细想来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在一些有旅游价值的地方兴建一批旅游设施,既有利于当地的城市建设,又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何乐而不为?

西方的旅游具有普遍性。这个普遍性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各个地方,大、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凡是有旅游资源的都会充分利用,即使表面上看没有的也会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去挖掘。所以游客不管到什么地方,基本上都会受到热情接待。另一层含义是绝大部分西方人都喜爱旅游,这是旅游业之所以能够兴旺的原因。平均算下来,他们每年花在旅游上的钱要占到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旅游目的地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自然风光地区。这类旅游景地一般具有自然资源优势,靠近海边湖边,热带或亚热带,适于夏天度假。例如美国的迈阿密和旧金山地区附近,南北卡罗里纳之间的莫特尔海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法国的嘎纳、尼斯一带,意大利的地中海小岛卡布里海滨周围地区都属于这一类。另外一些不算很高的(大约在海拔 3000—4000 米左右)的雪山风景区也是颇受欢迎的旅游地。例如欧洲的阿尔卑斯山(Alps)、美

国和加拿大的落基山(Rocky Mountains)、澳大利亚的考休斯科山(Mt Kosciusko)。夏天可以避暑,冬天可以滑雪,还可以登山。此外,还有不少国家的自然风景区和森林公园,如美国和加拿大边境上的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美国的塔卡墨农瀑布(Tahquamenon Falls)、大峡谷(Grand Canyon)、加拿大的加尔格里国家冰川公园(Calgary-Glacier National Park)、阿卡迪亚国家公园(Acadia National Park)、莱福辛瀑布(Reversing Falls)等都算得上是举世闻名的游览胜地和风景如画的自然风光区。

第二类是人文古迹地区。这类旅游景点一般都有一定的人文历史,历史古迹保存得比较完善,常常和一些名人、名著或者历史上的一些重要记载联系在一起进行介绍,增加了旅游的价值,也因此而吸引了许多游客。一些历史名城因其名胜古迹而有吸引力,如罗马的公共广场(Roman Forum)、竞技场(Colosseum)、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万神庙(Partheon)、比萨的斜塔(Leaning Tower of Pisa)、佛罗伦萨的钟楼(Bell Tower)、雕塑广场(Sculpture-studded Signoria Square)和美术馆(Gallery of Fine Arts);巴黎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罗浮宫(Louvre)、香谢丽舍大街(Champs-Elysees)、凡尔赛宫(Versailles)、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和圣母院(Notre Dame);伦敦的大本钟(Big Ben)、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伦敦塔(London Tower)以及英国其他地方的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和巨石阵(Stonehenge);美国费城的议会厅(Congress Hall)、自由钟亭(The Liberty Bell Pavilion)和独立厅(Independence Hall);希腊的雅典卫城(Acropolis)和帕台农庙(Parthenon)以及厄瑞克修姆庙(Erechtheum);奥地利维也纳的国家歌剧院(The State Opera House)、当年的皇家豪夫伯宫(The Hofburg Palace)和圣斯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德国科伦的哥特式大教堂(Gothic Cathedral);比利时

布鲁塞尔的巴洛克式大宫殿(Grand' Place)和著名的肖像展览馆(Mannekin-Pis)等等。

一些小地方也可以因旅游景点而身价倍增。如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统帅考恩瓦里斯(Cornwallis)向华盛顿投降的地方——约克镇战场历史公园(Yorktown Historical Battlefield Park)原为一个普通村子,因为有了这个景点而闻名遐迩。该地的旅游价值也借此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类似情况很多,如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英国英格兰南部一些名人诞生或是埋葬的地方,如莎士比亚的家乡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奥地利莫扎特的故乡莫拉贝尔(Mirabell)等,可以说举不胜举。

第三类是娱乐性的。这类地区原无什么旅游资源,既无自然风光,也无人文景观,但由于经营者善于开发,人为地建造了一些吸引游客的设施或项目,从而创造了旅游价值。最有名的大概是美国的迪斯尼乐园了。这座位于洛杉矶附近的游乐场所原来是拍电影的地方,完全靠创建者瓦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 1901—1966)的丰富想象力,参照他对社会的了解,对游客,尤其是青少年游客的心态把握,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建造起来的。他创造出来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形象生动风趣,经久不衰,每年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前去观赏,应该说是旅游业上的奇迹。其他娱乐性旅游业还包括赌博、嫖妓等,最有名的当然是美国的拉斯维加斯(Las Vegas)和欧洲摩纳哥的蒙特卡罗(Monte Carlo),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

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除了饮食、旅馆服务业之外,交通运输、旅游纪念品的生产、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都受到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业确实是一个微本,甚至是无本而万利的产业,值得提倡。

2. 运动

西方人对运动的喜爱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举行的马拉松长跑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现代运动中的许多项目,或者说绝大多数项目都是起源于西方,以后才逐渐传到东方和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性运动项目的。田径、游泳、篮球、足球、排球、冰球、乒乓球、羽毛球、曲棍球、网球、垒球、棒球、赛车、赛马、赛艇、射击、自行车、高尔夫球、橄榄球、举重等,可以说包揽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热门项目。每年除了一些世界性运动会以外,相当多的一些精彩比赛,例如欧洲的三杯(优胜杯、冠军杯和联盟杯)和南美洲的美洲解放杯足球赛、美国的职业篮球赛,都云集了世界级的高手,吸引了成千上万人的注意力。

在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间除了大型的体育场、馆之外,一般的游泳池、健身房和球场遍布城市的街头巷尾。但更多的人还是在自己宽敞的房子里布置了健身设备,除了哑铃、健身器乃至单、双杠外,有的还设置了游泳池和网球场。每天早、晚都会看见一些人在户外的马路上或绿荫覆盖的人行道上奔跑。到了夏季许多人都喜欢和自己的家人或朋友一道去海滨,在那里每天在海边游上几个小时,然后在沙滩上晒晒太阳绝对是一种超级享受。当然也有人因此而乐极生悲,或者在海上碰上了鲨鱼,或者太阳晒多了而生皮肤癌。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经过一个星期乃至更长时间的海边锻炼和生活都会一个个变得红光满面,意气风发,精力充沛。

虽然很多西方人喜欢参加经常性体育活动,但更多的人似乎还是宁愿观看体育比赛。各种球类运动的比赛,诸如足球、橄榄球、篮球、网球的观众大部分还是青少年。他们喜欢激烈、紧张的场面,也愿意自掏腰包乘上飞机跟着自己心爱的球队和球员,不远千里去国外哪个地方观看一场比赛。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以

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都有不少这种铁杆球迷,尤其是足球球迷更喜欢动辄倾巢出动,稍不如意便是恶语相交乃至拳棒齐来,他们由此而被称为足球流氓。警察对此也别无良策,只是将他们记录在案,禁止入境,或者严加看管。

大部分中、老年观众似乎更喜欢观看另外几项运动,其中有赛车、赛马、赛船、高尔夫球、台球等。赛车包括场地赛和越野赛两种,由车型来分,又分为汽车赛和摩托赛两种。这种比赛,尤其是场地赛比较紧张,虽然场地很大,但因为车速很快,转弯处往往稍不注意就会因被撞或者操作不当或者发动机发生故障而出事。越野赛不像场地赛规定要专用又扁又低的赛车,而基本上是性能较好的各种越野车。它和场地赛不一样,行程常常是几千里乃至上万里,路上要走几天,而且路况普遍很差,有的地段根本就没有路。对赛车的质量要求固然很高,对车手的意志和技术也是个严峻的考验。比较起来赛马的危险性或许要小些,但也十分紧张。但赛马之所以在西方十分流行主要还不在于比赛本身,而是在马身上下的赌注。赛马和下赌是同时进行的。你赌的马赢了也就意味着你下的赌为你赢回了钱,你赌的马输了也就意味着你下的赌钱输掉了。所以,一场赛马往往牵动着许许多多人的心,不仅是场内的人,不少情况下场外的人也随着赛马情况的进展而情绪起伏。因为他们也同样买了彩票。

体育运动的发展近些年来有进一步专业化和国际化的趋势。由于体育运动竞争的激烈以及激烈竞争带来的巨额利润,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体育组织总是很早就从学校或其他青少年聚集的地方物色对象开始培养和训练,虽然在还没有成名之前一般不会让他们正式脱离原来岗位,但为了比赛,他们常常进行脱产训练。而一些有名气的球队或运动员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参加比赛的出场费有时就是个天文数字。如拳击运动员刘易斯、泰森、鲍等人只要登场亮相,赢了当然不用说,即使输了也会有几百万乃

至上千万美元的入帐。一场重要比赛往往会招来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仅仅电视转播费和随之而来的商业广告费就足以让人咋舌。当然这样的比赛完全是商业性的,门票收入和转播费使得体育比赛,尤其是重要的国际比赛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西方文化乃至全球文化生活的一个亮点。

3. 阅读

当代西方人普遍都有爱阅读的习惯。在公共汽车、地铁的车厢里以及大饭店的大厅中,手持一本书或杂志或报纸的不乏其人,有时甚至相当多。至于家里看书看报或许就更多了。这一方面当然和人的文化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社会环境有联系。二次大战后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普及。今天的西方人如果想在社会上站稳脚,没有一张大专以上的文凭恐怕是很难的。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不管你是白人,黑人还是黄人,也不管你是当地人还是外来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有钱的还是无钱的,有地位的还是无地位的,也不管你的宗教信仰、年龄、性别、职业和地区,都应接受较好的教育是人们的共识。由于科技的迅速进步,信息时代已经来临,行业之间、公司之间乃至个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精神的压力也空前加大。知识和专业技能是普遍的要求,然而这还只是人们养成阅读习惯的部分原因,或者说是生存的需要。对不少人来说,仅仅为生存奋斗是不值得的,毕竟每个人应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和精神需求。对他们来说,阅读纯粹是享受。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精神追求也不断增加,把阅读当成是精神享受的人也在不断增多。

阅读的前提固然和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也和近几十年来科技进步对印刷、装帧发行质量的影响密不可分。现代西方书籍从排版、封面设计到插图和印刷基本上都是电脑操作,不仅速度快,

而且印出来东西的质量有了很大的飞跃。无论是书还是杂志、报纸,拿到手里不再是黑白相间的文字,而是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形象逼真的艺术品。当然,这种感觉还只是表面的,但是中国人素有先入为主的说法,有了美好的第一印象才更愿意深入进去获得更多的了解,这是人类共有的特性。此外,由于大批量的生产当地印刷以及全球发行,很多书、杂志和报纸的价格相对而言都比较便宜,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买到一本或一份外观漂亮且内容有吸引力的书,读杂志或报纸是很多人愿意做的事。

从阅读的内容来看,每个人都会因为年龄、性别、地位种族、职业和文化层次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但是出版商和报纸杂志的编辑们往往会抓住社会的热点和人们的共同心态推出一些人们或者许多人都有兴趣的书籍或新闻来。近年来,西方社会的一些热门话题可以说无一不被做足了文章,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绯闻、英国王妃戴安娜之死及其婚外恋、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神秘私生活、日本皇太子及太子妃从恋爱到结婚的经过,以及大量的有关电影明星、歌星、体坛高手的各种动态、私生活,几乎是所有西方媒体,包括各种书刊杂志报纸热衷于宣传的内容。

除了些热门话题之外,就书而言恐怕就是各种畅销小说了。畅销小说的两大题材是言情和侦探。西方小说市场上这方面的内容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大概也不过分,尽管如此,各种情节的变换还是会吸引不少读者。当然文化素质高些的读者可能更愿意读些经典的或获奖小说,应该说这类书的销路也一直不错。西方文学的奖种不少,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外,英国的布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法国的龚古尔奖、澳大利亚的富兰克林奖都是一些有影响的奖项。每当获奖作品一宣布,除了获奖作家一举成名或者锦上添花之外,得到实际好处的当然还是这本书的出版商。他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这项荣誉来销售更多的书。

图书市场上近些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非小说类书籍的

畅销。这类书除了些纪实性很强的热点跟踪题材之外,人们感兴趣的是传记类作品。除了些政界人物退休后所写的回忆录,例如尼克松、基辛格、卡特、撒切尔、里根、施密特等人之外,大量的是一些歌星和体育明星们的传记。他们成名的经历多少有些让人羡慕或者嫉妒,由于是真人真事,对部分人来说可能更有些实际意义。如田径明星刘易斯、拳王泰森、篮球明星乔丹、网球明星格拉斯等热门人物的传记早已是不止一种了。

为了帮助人们节省时间,用较少的时间读到更多的信息,书商们或者杂志编辑们想出了摘录的办法。这方面最有名的可能是《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了。据说它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这种摘录或许不无道理,毕竟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多的知识是划算的,虽然会失掉一些书中的精华,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能有个大致了解也就可以了。

杂志当中真正纯文学和内容严肃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是真正内容淫秽的黄色期刊也难以在市场上长期站稳脚跟。就连《花花公子》(*Playboy*)、《藏春阁》(*Penthouse*)这样以刊登裸体女郎艳照的春光杂志现在也要出其所谓的洁本了。可见西方人对完全依靠低级趣味的期刊并不完全赞同。但不可否认,以各种休闲消费文化为主旨的文化杂志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围绕着性爱、犯罪以及其他引起读者兴趣的题材作文章。它们的印刷质量考究,传播社会新闻的速度快,加上图文并茂、语言明快、色彩鲜活、感染力强而颇得读者好感。当然,文化档次高些的读者恐怕还是更喜欢诸如美国的《时代》(*Time*)、《新闻周刊》(*Newsweek*)、英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观察家》(*The Observer*)、德国的《明镜》(*The Mirror*)、法国的《生活》(*La Vie*)、澳大利亚《公告》(*The Bulletin*)这样一些历史悠久、报道广泛、政论持平客观、观点相对保守一些的杂志。

报纸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虽然就新闻而

言,它已经落在电视和广播的后面,但它接触的社会面广,从国际到国内、大事到小事,特别是社区范围的一些人和事的具体细节地方报纸一般都会涉及到。此外,大量的体育和文化新闻、门类齐全的各类广告(尤其是周末版),是寻找各种信息的理想去处,这也是其他媒体无法代替的。加之现在报纸的印刷质量已经大有改进,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清晰度都很高,而且有些版面还都是彩色的,无疑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断言,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报纸都将会存在下去,会继续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洛杉矶时报》(*Los Angel Time*)、《基督教箴言报》(*The Christian Monitor*)、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communication*)、《卫报》(*The Guardian*)、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和《费加罗报》(*Le Figaro*)、意大利的《晚邮报》(*Evening Post*)、德国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澳大利亚的《时代报》(*The Age*)、《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等。

后 记

回顾近几百年,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历程,不能不使人感受到世界变化之大,发展速度之快。然而,或许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开始的,它从西方延伸到东方,再扩展到全世界。工业革命是这样,信息革命也是这样;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现代主义潮流是这样,目前正在展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是这样;学术领域里的哲学思想是这样,生活领域中的流行音乐和流行服装也是这样。这些现象在告诉我们,无论你喜不喜欢,西方文化或者说西方文明目前在世界上的确有一定的优势,能够聚集人气,领导潮流,创造新的思想。作为西方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文科学,近几百年来发展很快,进入 20 世纪以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我们目睹了很多不同观点和流派的争论、碰撞和融合。限于篇幅和资料,我只能较为概括地来描述这一过程和趋势,难免会有遗漏之处,我想读者在看完这本书后还是可以基本了解西方世界文化领域内的大致情况。当然事实上人文科学里的理论和学术观念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它们当中的一些观点是否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恐怕也不是我这本书的任务。

西方文化是个范围很大的领域,这本书只是就其一些基本的情况做些介绍而已,目的是让国人对西方人的过去和现状有个大致的了解。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借鉴,我们可以在知晓和洞察西方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和反思来进一步提高对自

己民族文化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民族特性,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这是该书命名“史鉴”的初衷。全面正确地认识自己并非易事,首先得摆正自己的位置。这里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不愿承认和西方人之间的差距,至少不愿承认在文化思想上的差距,总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就是体现在这方面。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不少封建主义的糟粕,而资产阶级文化里面也有不少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另一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总觉得样样不如人。买东西要买洋货,吃饭要吃西餐,念书要到国外,连结婚都要找个洋妻或是洋夫。这当然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心态,但在当前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大可不必这样,我们自有自己的长处。远的不说,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以华人文化为主的地方。他们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面赶上乃至超过了不少西方国家了吗?他们的人均收入不是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了吗?可见问题不在于民族本身,而在于你是否愿意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否愿意了解其他民族的特性。了解不是为了妄自菲薄,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分析比较,洋为中用,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拿来主义”。一个开放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我们能够从西方人那里学习到的东西,恐怕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要进行反省的东西。

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承认差距才能赶上乃至追回这段差距。须知差距不是一天两天拉下的,但我们却要努力使之一步一步地缩小。即使从鸦片战争算起,我们的落后也有一个半多世纪了,何况真正的差距实际上恐怕从文艺复兴时期(相当于我们的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么说来,这点差距也是正常的。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加之现在的信息社会和来之不易的安定形势,应该说赶上还是完全有可能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经济上的差距能够赶上,文化上的差距也应该能够赶上。但愿这本书在这方面能

够做些什么,有益于加快这个进程。

只有那些善于利用别人的长处,敢为天下先的民族才能跟上时代潮流,不被历史所淘汰。这一点恐怕是西方文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单凭这一点,就有必要深入了解当代西方文化。我们不但要了解二次大战之后,西方人文科学领域里的哲学、宗教和文学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倾向及其代表思想,而且还要了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文化娱乐,也即所谓的大众文化。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专门安排了部分章节介绍西方人的基本文化生活,提供些他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内容,让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有个比较全面的切身感受。在这个基础上对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城市的发展变化做些综合性的概述,就其文化层面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些介绍。这里要强调的不仅仅是西方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的质量,而且还有创造物质文化生活的方式方法。无庸讳言,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进行现代化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物质生活如此,精神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当然在我们打算学习西方人长处的同时,也必须警惕隐藏在其中的污泥浊水和苍蝇蚊子。然而这丝毫不应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毕竟我们所注重的不是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而腐朽没落的东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存在。关键是要保持警惕,保持一份清醒。

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相对于东方文化而存在的。它从古希腊文化算起迄今已接近5 000年,而它分布的范围更是超过了它的发源地欧洲,随着殖民扩展而遍布世界各地。可以说它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本书旨在介绍西方的主要文化传统及其历史渊源,描述西方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影响,为进一步学习西方文学、历史、宗教、哲学和艺术奠定基础,也为掌握西方各国语言提供些相关的背景知识。与此同时,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部分,识别和摒弃其中的糟粕部

分,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早日实现现代化。

文化的界定是不容易的,一般来说文化是指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或者是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在这本书里就是探讨在一定时期内西方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些方式的特点和它们的表现形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的重点放在对一些重要的思想流派,文化思潮,社会倾向的介绍和探讨上。除了一般性介绍外,主要是通过对代表人物的重点描述进行。这些代表人物总的来说,都是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影响,能够代表当时社会,或者某一领域成就的人,或者是某一思想倾向的代言人。对这些人物或思想倾向的介绍主要是结合他们的经历进行,通过对他们的认识和把握来了解某一流派和倾向,从而比较全面地认识和掌握西方文化。此外,本书的重点放在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文化发展上面,因为这部分内容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关系似乎更加密切,也就更有意义。这样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是否妥当,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本书的补充和修订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完成的。该校丰富的藏书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而尤其让我难忘的是人文学院不少老师对我的帮助。他们当中有人文学院院长伊恩·莱特(Iain Wright)教授,迈克尔·格林哈尔希(Michael Greenhalgh)教授,英语系前主任戴维·帕克(David Parker)教授,阿克塞尔·克拉克(Axel Clark)博士,吉尔·马修斯(Jill Matthews)博士,西门·海恩斯(Simon Haines)博士,里维约·多布莱博士,帕特·多布莱博士(Livio and Pat Dobrez),罗斯玛丽·坎贝尔博士(Rosemary Campbell),杰克琳·罗(Jacqueline Lo)博士,温尼弗雷德·拉姆(Winifred Lamb)博士和莱文·阿瑟(Raewyn Arthur)女士。此外这本书的插图是由迈克尔·格林哈尔希教授提供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曾在复旦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的外语专业学生当中试讲过几次,在这个基础上,这次我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汪义群老师。他不仅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帮助,而且作为这个领域里的行家,对书稿内容的扩充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算起来,从落笔到现在前后已有4—5年时间里了,中间虽经几次修改,而且还去过国外搜集资料,想尽可能形成一些特色,但似乎总难以如愿。或许是这个题目太大了,用有限的篇幅来处理这么大的题目总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有识之士指教。

主要参考书目

1.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Simon During(ed), Routledge, 1999.
2. *Europe: A History*, Norman Davies, Pimlico, 1997.
3. *A Short History of Philosophy*, Robert C. Solomon and Kathleen M. Higgi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Robert Audi(general edi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 *World Philosophies: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David E. Cooper,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6. *The Oxford History of World Cinema*, Geoffrey Nowell-smi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Film: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Medium*, Robert Sklar,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1993.
8. *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 Don Slater, Polity Press, Oxford, 1997.
9. *At the Picture Show: Small-Town Audiences and the Creation of Movie Fan Culture*, Kathryn H. Full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6.
10. *After the Future: Postmodern Times and Places*, Gary Shapiro (ed),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Foucault and Social Dialogue: Beyond Fragmentation*,

- Christopher Falz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12.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A Reader*, Kieran Ryan(ed), Arnold, 1996.
 13. *Millennium: 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Charles Scribners Sons, Simonand Schuster Inc. 1995.
 14. *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John Frow and Meaghan Morris, Allen and Unwin Pty Ltd, 1993.
 15. *A World History of Art*, Hugh Honour and John Fleming, Macmullan Reference Books, 1982.
 16.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Judith R. Walkowitz, The University of Chicaco Press, 1992.
 17. *The Sphinx in the City: Urban Life ,the Control of Disorder and Women*, Elizabeth Wilson, Virago, London, 1991.
 18. *Derrida*, Christopher Norris, Fontana, London, 1987.
 19.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Jurgen Haberma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1981.
 20. *Essential Art History*, Paul Duro and Michael Greenhalg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1994.
 21. *Orientalism*, Edward W. Said, Penguin Books, 1985.
 22. *The Great Tradition*, F.R. Leavis, Penguin Books, 1966.
 23.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erry Eagleton,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1985.
 24.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Sir Paul Harvey(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5. *The Penguin Companion to European Literature*, Anthony Thorlby, Penguin Books, 1969.

26. *Classical Companion to 20th-century Music*, David Pickering, Cassell, 1998.
27.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张隆溪,三联书店,1987年。
28.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厚诚、王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29. 《西方的智慧》,伯特兰·罗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30. 《西方社会思想史》,袁华音,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
31.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32. 《德国古典哲学教程》,杨文极、石倬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33. 《悲剧哲学家尼采》,陈鼓应,三联书店,1994年。
34. 《欧洲文学史》,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35. 《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亨利·皮朗(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6. 《哲学史》(欧洲哲学史部分),敦尼克等,三联书店,1972年。
37. 《西方美术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迟轲,1983年。
38. 《西方现代派美术》,鲍诗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
39. 《圣经文学词典》,帅培天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40. 《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李青宜,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41. 《美国文化批评集》,赵一凡,三联书店,1994年。
42. 《现象学的观念》,埃德蒙德·胡塞尔(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43. 《音乐的故事》,保罗·贝克(马立、张雪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
44. 《外国音乐辞典》,汪启璋、顾连理、吴佩华(编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
 45. 《文化论》,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46. 《欧洲文化的起源》,兹拉特科夫斯卡雅(陈筠、沈澄译),三联书店,1984年。
 47. 《外国美术简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48. 《欧美现代派文学三十讲》,石昭贤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
 49. 《基督教的起源》(英),罗伯逊,三联书店,1989年。
 50. 《犹太百科全书》,徐新、凌继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